苏联兴亡史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第一节　20世纪初叶的俄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俄国的社会矛盾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农奴制改革尽管从许多方面保护了原来的地主阶级利益，改革也很不彻底，然而，它毕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俄国缓慢地而又不可阻挡地由一个农奴制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1861年到1891年的30年间，生铁年产量由32万吨增至100万吨，煤由37万吨增至623万吨，石油由0.2万吨增至431万吨，棉花消费量由4.2万吨增至15万吨。1860年，全国铁路总长为1500公里，1892年增至3.12万公里。19世纪末，生铁年产量达300万吨，煤年产量达1500万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它同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20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农奴制残余的存在，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政治上沙皇专制制度阻碍了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在世界帝国主义营垒中，俄国属落后型的国家，但沙皇政府又具有极大的野蛮和贪婪的本性。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是和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联的。

第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奴制残余并存。在俄国，工业资本主义从其发展初期开始，就具有相当高的集中化水平。1879年，百人以上企业的工人占全部工厂工人的67%；1890年占71%；到1913年，产业工人人数增至350万人，其中40%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工作。由于企业和工人高度集中，大城市出现了。19世纪末，彼得堡已拥有120万人口，莫斯科居民也超过100万。20世纪初叶，垄断组织已成为俄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年代里，45个工业部门中约有200个卡特尔和辛迪加，全国12家大银行集中了国内50家股份银行80%的固定资产和债务。另一方面，俄国还保留着大量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农民小商品生产、宗法式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普遍存在于农村。农业的经济技术水平极其低下，1910年的统计，全国正在使用的有1000万把木犁和2500万个木耙，铁犁仅420万把，铁耙不满50万个，农业机械几乎等于零。在一些地区一直存在着公开的"短期农奴制"。正如列宁所说，在那些穷乡僻壤里，到处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地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把乡村和铁道隔离开来，即和那联结现代文明的大城市的脉络隔离开来，俄国经济"一方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不文明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有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财政资本主义"①。

第二，高度的中央集权同广大农村的愚昧相结合，形成沙皇专制统治的显著特征。沙皇既是政治统治者，又是神授的国家团结的象征。在普通居民的心目中，上帝授予沙皇管辖世俗事务的全部权力，并负责领导东正教教徒。到19世纪，绵延300多年的沙皇专制统治使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臻于完善，森严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19页。

的等级制度已形成传统，使君主能完全统治整个社会的舞台。这种统治植根于分散的落后的小农对君主制的迷信和崇敬，不论贵族和平民都对沙皇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绝对服从和忠诚。东正教势力在全国各处的渗入强化了这种意识和传统。进入20世纪以后，时代的变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沙皇统治的残暴程度略有缓和，但中央集权的、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形式以及亿万居民对君主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崇敬心态基本上没有改变，各种社会矛盾也没有缓和。

20世纪初叶，俄国面临的矛盾有：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高度发达的工业地区与落后的边区之间的矛盾；大俄罗斯民族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与欧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沙皇专制制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和激烈。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加剧了沙皇统治面临的各种矛盾。在这一背景下，爆发了1905年大规模的人民革命，显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巨大作用，也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如召开"国家杜马"，尽管这种代议机构在俄国仅仅是咨询机关，它无权监督和制约政府，沙皇却可以随意干预它的活动，命令它暂停召开或解散，将其成员逮捕或流放。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把俄国卷入战争的漩涡，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无能，使俄国革命的客观条件臻于成熟。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和活动

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提出纲领，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把农民村社看作实现这种演变的条件和保证。这种"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带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

80年代，"民意党"人采用个人恐怖手段对付沙皇制度，也不可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奠基人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他脱离民粹派后，潜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并于1883年创建了"劳动解放社"。他和流亡国外的一批革命志士一起，把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译成俄语，他们自己也撰写出版了许多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得到传播。

早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就出现了"南俄工人协会"等自发工人组织。8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危机的出现，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肆意降低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强迫工人接受奴役性的雇佣条件，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据统计，从1880年到1894年间，共爆发罢工500次，约50多万工人参加了罢工。

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为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准备了条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喀山、维尔诺、明斯克等地相继出现许多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小组。列宁的革命活动就是从参加喀山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的。他在小组内学习和研究了许多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帮助他弄清了俄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复杂现象，逐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洪流。

从90年代起，俄国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首都彼得堡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社会民主主义者。1895年11月，成立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它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继彼得格勒之后，莫斯科、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南高加索等地先后建

立了“斗争协会”和“工人协会”，为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1898年3月，各地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聚集于明斯克，秘密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党的机关报及党的国外代表机关，从而宣告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莫斯科、基辅等城市分别建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党的国外组织也正式建立并开展活动。列宁在流放地获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立即宣布，从今以后他已经是一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党的中央及各级组织均遭到沙皇军警的破坏，许多领导人被捕。党内一些经济派分子乘机曲解马克思主义，大肆宣传经济主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使党陷入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危险境地。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回来后，就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合作编辑出版《火星报》，清除经济主义的影响，为在俄国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而努力。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党内分成两派，拥护列宁的多数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拥护马尔托夫的少数派被称为孟什维克。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一套独立的纲领、路线和策略，它标志着一种崭新的革命思潮——布尔什维克主义问世。党的二大以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而载入史册。

在1905年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虽然在策略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两派在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上基本相同，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也在不少场合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革命沉重地打击和动摇

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各个阶级都在革命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彻底暴露了它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无产阶级勇敢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创立了新型的阶级组织——苏维埃，积累了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经验，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进行了一次总演习。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反动统治日趋加剧，革命转入低潮，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党内出现的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1912年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最终分裂，各自成为独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成长和发展，是革命的主观条件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

1914年8月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8月1日，俄国和德国宣战后，沙皇政府就在国内进行总动员。至1917年3月，俄国先后有1500万人应征入伍，使农业失去将近一半的强壮劳动力，大批土地荒芜，牲畜大量屠宰以供军需。由于原先俄国经济技术基础落后，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军事上的虚弱，战争开始才几个月，就发现枪炮和弹药严重短缺，不得不依靠西方盟国的援助和借贷。战争期间，战备生产虽勉强维持和略有增长，基础工业生产却下降了，1916年的钢产量比1914年下降16%，这又反过来影响军工生产，致使大批工厂因缺乏原料、燃料而被迫停产。俄军在前线屡遭失败，德军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和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大批居民被迫离乡背井，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

战争一开始，沙皇政府就在国内加强了反动统治，它采用严厉的高压政策，主要矛头对着布尔什维克党。宣战前夕，当局将一大批党的中央委员和著名的活动分子逮捕入狱，判处徒刑或

流放西伯利亚。为了避开凶残的迫害，许多党的活动家不得不侨居国外。巴库、敖德萨等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真理报》和一些工人报刊被查封，罢工运动遭取缔，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还在正式宣战前，布尔什维克就号召无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有组织的反战运动。7、8月间，在彼得堡、莫斯科、里加、特维尔等许多城市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及群众集会游行，人们高呼"打倒战争"的口号，散发传单，提醒工人和农民，在别的国家的劳动人民中没有他们的敌人。

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右派的操纵下，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们打出"保卫祖国"的旗号，公开支持战争，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俄国国家杜马定于7月26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批准军事拨款和对战争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党团试图同孟什维克党团和劳动派采取共同的反战行动。结果，未能与劳动派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尽管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最后制定了一致同意的宣言在杜马会议上宣读。这份宣言是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公开对战争狂热提出抗议的文件，在国内外一片沙文主义的喧嚣声中，它却象一声霹雳，震聋发聩。然而，社会民主工党两个议会党团反战的共同行动，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侨居国外的列宁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西欧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表明布尔什维克对这场战争的立场和态度。列宁提出的中心策略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同这一口号紧密相连的另一句策略口号是，"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两句口号表明布尔什维克党把战争与革命联结起来，利用战争造成的统治阶级危机，来加速本国的革命进程。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应当采取的正确策略，在欧美各国社会民主

党中，惟有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这种策略。

战争期间，列宁研究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认为在帝国主义体系里会形成一些矛盾的集合点，在那里会出现革命的形势和提供革命爆发的先决条件，只要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那些国家就会成为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和取得胜利比任何地方都要早一些和容易一些。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 一年之后，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把这一思想具体化了，他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② 列宁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是引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理论指南。

1915年8月，由于军事上屡遭挫败，俄国已在前线损失350万人，并丧失了加里西亚和波兰。此时，国家杜马中形成了一个革新派，它包括以米留可夫和李沃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人和以古契柯夫为首的十月党人。他们谨慎而胆怯地要求沙皇成立一个"受全国信任的政府"。沙皇却颁发诏书，以"临时解散"国家杜马来回答革新派和其他反对派。从开战后的两年期间，俄国撤换过4个首相，6个内务大臣，3个外交大臣和3个国防大臣，这些走马灯似上台的人物都无回天之力，而是愈来愈招致公愤。1916年底的一个深夜，宫廷的"妖师"拉斯普廷被宫廷的近臣刺杀，这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一事件深刻反映了沙皇统治的危机。战场上的失利，严重的饥荒，肆无忌惮的投机倒把，无止境的战争动员，这一切，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革命的时机到来了。

第二节　二月革命和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二月革命的胜利

1917年来临之际，俄国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1月底，首都彼得格勒只剩下10天的面粉储备，肉类在市场上已经匿迹。战乱、饥荒威胁着千百万人。1—2月，全国至少有67万名工人罢工。军队的厌战情绪和革命情绪都在不断高涨。

2月17日（俄历）①，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冲压车间的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让被解雇的工人回厂。几天之内，4个车间工人支持冲压车间的罢工，规模逐渐扩大。2月22日，当工人来到工厂上班时，工厂的大门紧闭，厂主声称由于工人破坏厂规而宣布同盟歇业。拒之门外的3万名工人聚集街头，使形势迅速激化。为声援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许多工厂的工人也走上了街头，举行罢工，要求给予面包，抗议粮食不足和物价飞涨。最初，它被认为是一场因饥饿引起的骚乱，沙皇、宫廷、自由主义反对派和一些革命派也都持这种看法。但事态发展迅速，粮食骚动只是导火线，广大群众立即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的洪流。

俄历2月23日是“国际三八妇女节”，彼得格勒举行广泛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少数面包店遭到人群的袭击，市区到处出现写

① 俄历又称儒略历，20世纪与公历相差13天，2月17日即公历3月2日。1918年2月14日苏维埃政府停用儒略历前，本书所示日期均用俄历。

着“打倒战争”、“反对饥饿”、“革命万岁”的红旗和标语牌。纳瓦尔广场举行大型集会，喀山大教堂附近和兹纳缅斯卡娅广场也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群，全城都在沸腾，直至夜幕降临才平静下来。这一天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128000人。

2月24日，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达到更大的规模。这一天罢工的有20多万工人，占彼得格勒工人的一半以上。维堡区数万名工人冲破警察封锁线，进入市中心的涅瓦大街；其他地区的示威者也通过各种途径涌入市中心。示威队伍中最初的口号多半是“要求面包”、“抗议饥饿”，但当天夜晚，队伍中出现大量“打倒沙皇政府”、“打倒战争”的旗帜和标语。

2月25日，彼得格勒30多万工人拒绝上班，形成了政治总罢工。维堡区工人捣毁了警察分局，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占领了工厂。大批示威者涌向市中心，示威者中有工人、大学生和一些民主派人士。工人试图解除警察的武装，几支军队被调来镇压示威者，双方发生几起冲突，但许多士兵不肯向工人开枪，士兵中的动摇情绪在增长。

2月26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沙皇发布了一项解散国家杜马的敕令，并下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立即镇压示威者。在几个地方，军警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则向军警投掷石块和木棒。巴甫洛夫团的第10连士兵对本团教导队开枪射击工人表示愤慨，毅然举行起义，这是第一支军队转到革命方面来。这一行动在沙皇军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芬兰团一个士兵回忆说，这一夜谁也没有合眼，谈论着当前的形势，起义群众的要求，他们事业的正义性，我们中间燃起了对于镇压人民的暴君的痛恨和仇视。第二天早上，我们全连的人都站到起义群众一边。①

① 《真理报》1917年4月11日，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卷第8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月 27 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罢工普遍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与士兵联欢，解除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抢占军火库。沃伦斯基团、立陶宛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转到起义人民方面，他们同起义工人汇合，走向街头。不久，莫斯科团也转到人民方面。工人和士兵攻下了军火库，取出4万支步枪和 3 万支手枪武装了工人。工人和士兵联合组成战斗队，捣毁警察分局，占领政府机关，打开监狱，解除军官的武装，逮捕政府大臣。傍晚，起义工人和士兵已控制了彼得格勒所有重要地点及部门，首都卫戍部队已有66700人转到革命方面，还有许多部队正在瓦解和倒向革命方面。最后一届沙皇政府的大臣们被逮捕起来，送往彼得—保罗要塞。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形成

1917年2月27日下午，当起义工人还在同沙皇军警进行搏斗的时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些首领聚集塔夫利达宫，在这里酝酿成立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并定于当晚7时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在较晚的时候才得悉这个消息赶去参加会议。晚9时，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出席会议的工人代表约50人。孟什维克的尼·谢·齐赫泽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分子马·伊·斯柯别列夫当选为苏维埃副主席。组成了有12人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有2名布尔什维克人。28 日，首都卫戍部队全部倒向革命，各团队也选出代表参加苏维埃。3月1日，士兵代表陆续抵达，联合召开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其中 2 名是布尔什维克人。后来，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各增补 3 名代表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苏维埃的领导权掌握在被列宁

称之为"妥协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处于少数。

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开始就作为革命政权机关进行活动。2月27、28日，它通过了一系列符合起义人民利益的决议：1.建立粮食委员会。这个机构有权没收一切官方的公共储备的面粉，负责安排卫戍部队士兵和首都居民的面包和其他食品供应。2.执行委员会委员分别到各区和基层去组织人民政权机关。3.在企业中组织1/10工人参加的工人民兵队伍。4.立即中止旧政权支配国家财政资金，对这些资金的支出实行监督。5.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消息报》。3月2日《消息报》上公布了以苏维埃名义发出的《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戍部队的第1号命令》，这一文件规定所有部队在政治行动中要服从苏维埃的领导和指挥，武器应由士兵委员会支配和控制，取消军官的官衔称呼。这一文件未经苏维埃领导人的同意就在报纸上公布，表现了革命时期群众高昂的热情，它使士兵扬眉吐气，使杜马头目和反动军官大为恼火。

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奉行妥协主义路线，3月2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协议，于当天傍晚成立了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是，在国内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临时政府没有能力宣布它本身拥护帝制还是主张共和，也没有实力镇压掌握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它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完全是依靠了苏维埃的支持。实际力量在苏维埃方面，但它还不具备执掌政权的条件，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是"正式的政府"，它拥有社会中上层的支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是革命群众的阶级组织，它拥有实力，行使着一定的政权职能，它代表的是工人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两个政权并存的错

综复杂的局面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侨居国外的列宁得悉二月革命的消息后，于3月7日至26日在瑞士连续给《真理报》写了题为《远方来信》（共5封信）的一组文章，分析了这次革命的动力、特点和前途。列宁写道："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的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①] 列宁号召不要信任临时政府，要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扩大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4月3日，列宁回到祖国，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受到数千名工人和士兵的欢迎。次日，列宁在塔夫利达宫的全俄工兵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后来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又重复作了一次演说。这一演说后来被称为《四月提纲》。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这一演说的提纲，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他指出，即使推翻了专制制度，战争对俄国来说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主张，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国家从经济崩溃中挽救出来，才能满足人民的根本要求，才能使俄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走向民主与和平，因此，必须同改良主义划清界线。

列宁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不高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0页。

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手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才能把动摇不定的中农阶层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从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自下而上的，由全国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由于两个政权并存，苏维埃支持临时政府，而工人、农民和士兵又信任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号召立即推翻临时政府，那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反对苏维埃和脱离群众。但也绝不能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因此，列宁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两句口号意味着促使苏维埃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裂，临时政府如果得不到苏维埃的支持，必将垮台；而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后，布尔什维克可以在苏维埃内部进行斗争，揭露妥协党人的真面目，争取群众的支持，使苏维埃中的多数由妥协党人手里转到革命党人手里，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通过革命的和平发展，工人、农民和士兵就有可能组成自已的新政府。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各党派团体均有合法活动的条件，列宁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同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联结在一起的。他认为，用和平方式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人民来说是大有益处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①在《四月提纲》中，列宁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纲领，并建议更改党的名称，抛弃已经不适用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改名为俄国"共产党"。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6—7页。

临时政府的三次危机

工人、农民和士兵本来指望革命胜利后能获得和平、面包和土地，其中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革命进程中的首要问题。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准备承担原先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义务，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某些布什尔维克也认为沙皇政府被推翻以后，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俄国革命民主政府可与英法议会民主制政府联合起来，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政府进行一场决战，出于上述理由，他们认为可以继续战争。然而，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这一口号得到战壕里几百万忍饥挨饿、士气低落的士兵和千百万普通工人、农民的欢迎。但临时政府决心继续进行战争，政府发放了60亿卢布战争公债，前线仍然保持数百万军队。临时政府拒绝工人希望颁布八小时工作日法律的要求，也未考虑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这一切意味着，临时政府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和工人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和缓和，而是日益加深了，这些矛盾成了后来公开的阶级冲突的基础。

4月18日（公历5月1日），革命人民第一次公开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群众举着"要和平！反对割地和赔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欢庆这个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就在这一天，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各盟国发出照会，声明俄国仍将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盟国的义务，保证"将世界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4月20日，照会在报纸上一公布，立即激起了工人和士兵的愤慨，彼得格勒街头出现了游行示威，示威群众自发地喊出"打倒米留可夫"的口号。当天夜晚和21日白天，士兵、工人的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接连不断，抗议运动席卷各大城市和军队。陆军部长古契柯夫曾与旧俄将军策划，图谋用武力镇压示

威者，但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米留可夫、古契柯夫不得不提出辞呈，临时政府经历了第一次危机。

5月5日，临时政府成立了新的联合内阁，仍由李沃夫任总理，孟什维克党人策烈铁里、斯柯别列夫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加入了内阁，捷列申柯任外交部长，克伦斯基任陆海军部长。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人物参加了临时政府，危机暂时得以解除，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

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8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68名。有777名代表宣布了自己所属的党派，其中孟什维克248名，社会革命党人285名，由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105名。妥协党人企图利用代表的多数证明同资产阶级保持联盟的必要性，反对把政权转归苏维埃。孟什维克党人策烈铁里在会上说，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列宁当场走上讲台，响亮地回答：有这样的党！布尔什维克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

广大群众对临时政府的政策越来越表示不满，彼得格勒正酝酿着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通过了一个决议，把运动引导到有组织的和平的示威游行的轨道。游行定于6月10日举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竭力想取消这次示威游行。但他们也明白，在革命高涨时期，要完全取消群众的示威游行是办不到的。于是，由妥协党操纵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规定在6月18日举行游行。他们指望工人会在这次游行中表示拥护临时政府，削弱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影响。

出乎妥协党人的意料，6月18日那天，彼得格勒的50万工人和士兵从四面八方涌向马尔索沃广场时，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个工厂打出信任临时政府的标语，相反，却举着大批“打倒战

争！”“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在以后的几天内，莫斯科、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哈尔科夫等城市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革命示威。6月示威使布尔什维克威望大增，也使妥协党人的面目进一步暴露，临时政府经历了第二次危机。

在随后的两星期里，革命达到了一个奇异的转折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获得首都工人和大部分卫戍部队士兵的支持，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在地方各省区仍拥有比较大的势力。在临时政府内，代表右翼势力的立宪民主党人对妥协党人施加压力，企图解除赤卫队的武装，取缔布尔什维克，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工人和士兵中，自发的革命情绪仍在高涨，他们要求用武力推翻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尽快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布尔什维克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阴谋，同时认为起义的时机未到，劝说工人不宜过早发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7月2日，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们提出辞呈，从而使妥协党人面对联合政府垮台的威胁。妥协派准备让步，群众却用行动回答资本家部长的挑衅性辞职行为。7月3日，彼得格勒开始自发性的反政府示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分析当时形势后认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派代表到工厂和军队去，劝阻群众走上街头。然而，傍晚时分，不少工人和士兵手持武器开始出动。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夜间作出决定，领导群众发动，使它具有和平的有组织的性质。7月4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士兵和水兵走上街头，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在党中央所在大楼的阳台上向示威群众发表演说，号召大家沉着、坚定和提高警惕。临时政府在新的危机面前，决定用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命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维持市内秩序”，诬称布尔什维克是示威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妥协党人把持的苏维埃执行委员

会也作出决定，禁止群众示威游行。哥萨克团队和士官生根据军区司令的命令，开始射击示威群众，当场打死打伤400余人，政府宣布彼得格勒戒严。反革命军队和右翼势力散布谣言，袭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总部，捣毁《真理报》编辑部及其印刷所。7月6日，政府下令捕逮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伦泰等布尔什维克领袖。至此，苏维埃已成为临时政府的附属物，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布尔什维克撤回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第三节　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

临时政府改组和科尔尼洛夫叛乱

7月26日至8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半秘密状态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为逃避临时政府的搜捕，匿居拉兹里夫湖畔，未能出席大会。到7月，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人数已达24万人，比4月代表会议时增加2倍。大会讨论和制定了七月事变后的策略，并决定接纳托洛茨基和“区联派”成员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此以前，7月24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临时政府提交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解散国家杜马，禁止买卖土地以待立宪会议正式通过土地改革方案。李沃夫亲王拒绝接受这些要求，他的内阁也维持不下去了。由克伦斯基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的第二届联合政府宣告成立。8月12日，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开“国务会议”。会上，政府内部的妥协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以及克伦斯基与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之间的分歧都开始表面化。克伦斯基希望用军队作为

一支平衡力量来遏制苏维埃的行动，科尔尼洛夫则企图全部解散苏维埃；克伦斯基企图利用军队作为政府的支柱，科尔尼洛夫则利用临时政府来实现其个人野心。双方各怀鬼胎，矛盾日趋激化。

8月21日，里加被德军占领。科尔尼洛夫利用里加失陷作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借口。8月25日，他命令克雷莫夫将军率领哥萨克第三骑兵军团向彼得格勒推进，公开宣布收回他效忠于政府的誓言。他向克伦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临时政府成员辞职，把全部政权交给他。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克伦斯基不得不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叛逆，撤销了他的总司令职务，并求助于布尔什维克深入叛军内部进行宣传鼓动，向士兵说明真相，向工人赤卫队、首都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拿起武器来阻止和击溃科尔尼洛夫叛军的进犯。3天之内，首都有6万名工人和士兵投入战斗，他们赶制武器，拆毁铁路和桥梁，保卫彼得格勒。8月底，叛乱即告平定，克雷莫夫自杀，科尔尼洛夫被捕。科尔尼洛夫叛乱虽被粉碎，但这一事件说明，俄国社会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民主政治是难以维持的。

在同科尔尼洛夫叛乱作斗争期间及叛乱被击溃以后，苏维埃又一次表现了它的生机和活力，因为它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愈来愈大了。8月31日，布尔什维克首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获得明显的多数，托洛茨基从狱中被保释出来，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所有这些，意味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权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5天以后，即9月5日，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苏维埃中也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领导权。9月上半月，喀山、基辅、乌发、萨马拉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苏维埃领导权，也相继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

武装起义方针的确定

革命浪潮的高涨，引起了妥协党人的内部分化。社会革命党内出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内出现了一个"国际派"，他们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愿意同布尔什维克联合行动。

为了度过危机，克伦斯基再次改组临时政府。9月1日，组成由5名部长的执政内阁，并宣告俄国为共和国，解散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全俄民主会议"以商讨根据民主原则组成政权问题。然而，这一切都丝毫没有改变临时政府反人民的本质，也丝毫不能使临时政府获得稳定。

9月14日至22日，"民主会议"在彼得格勒召开。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成立所谓的"预备议会"，这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既没有得到选民授权，也无权制约政府。布尔什维克在"民主会议"上揭露了临时政府和妥协党人的花招，并决定抵制预备议会。"民主会议"也未能找到建立正规政府的途径，以取代残缺不全的执政内阁。会后，克伦斯基再次组成了以他为总理的第三届联合内阁。然而，这届内阁比以前更加混乱和软弱。

1917年秋天，俄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大工业开工严重不足，顿巴斯采煤量8月份比1月份下降27%，177个高炉中有44个停了工，8、9两个月内有231家工厂关闭，6万多名工人失业。铁路货运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34%。在农村，大批土地荒芜，全国性饥荒日益迫近，运进大城市的粮食不断减少。8月份，彼得格勒、莫斯科的居民每天只能得到200克面包。物价上涨和投机倒把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13年几乎降低了一半，1个卢布只相等于战前的10个戈比。经济危机加剧了人民对临时政府的愤慨，也使政局更加动荡不安。工人的罢工运动和农民的夺地斗争不断发生。8—10月，莫斯科发

生有10多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乌拉尔、巴库等地也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唐波夫、萨拉托夫、库尔斯克、基辅等一些省份，农民起义也不断蜂起。

危机成熟了。布尔什维克党开始把武装起义提上了日程。9月12—14日，列宁在匿居地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写信，指出有利的时机已经到来，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能够而且应该通过武装起义掌握国家政权。列宁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应当立即着手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①。9月15日，党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列宁的信，在讨论中，加米涅夫对列宁提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建议持反对态度。9月29日，列宁写道："危机成熟了。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正在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10月1日，列宁又指出："等待就是对革命犯罪"②。

10月7日，列宁乔装从隐匿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以便直接指导全党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日，列宁出席了党中央委员会讨论武装起义计划的特别会议。他再次强调转移政权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发言中反对举行起义。会议通过决议，确认"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按照武装起义的方针开展实际工作。其他地区和城市的党组织也召开会议，通过把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此时，布尔什维克已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与武装起义的方针联结在一起。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32—24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75、334页。

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

10月上半月，彼得格勒谣言四起，盛传德军将进攻彼得格勒，政府打算迁都莫斯科。谣言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情绪。孟什维克提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应承担保卫首都的责任。布尔什维克欣然表示同意，这是利用合法地位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的好机会。10月 12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的任务表面上是为了保卫首都，同卫戍部队保持接触，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指挥机关和战斗机关。克伦斯基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他下令将倾向布尔什维克的首都卫戍部队调往前线，表面上是为了对付前线的敌人，实际上是为了阻止革命，加强政府对首都的控制。托洛茨基利用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影响成功地阻止了卫戍部队的调动，使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武装起义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10月 16 日，布尔什维克党举行中央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外，还有彼得格勒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厂委员会、铁路工人和郊区的代表共 25 人。列宁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于 10 日通过的决议，他强调说，根据对俄国和欧洲阶级斗争的政治分析，必须制定最坚决、最积极的政策，这个政策只能是武装起义。列宁主张由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发动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则主张把起义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联结起来，以便使起义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基础上，并使起义表面上处于某种防御地位。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再次反对武装起义，然而，大多数与会者赞同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号召所有党组织、全体工人和革命士兵全面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并表示相

信中央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会及时地指出起义的良好时机和适当方式。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短评，文中以他个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的名义，泄露了党中央关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这一叛卖性的声明受到列宁及中央其他人的严厉斥责。

临时政府加强了防范措施，企图阻止起义的发动。10月23日，克伦斯基下令查禁布尔什维克报纸，重新逮捕七月事变后已被保释出来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并指控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调查它的活动。24日清晨，一批士官生占领了《工人之路》报的印刷厂，查封了这家报纸，又试图占领起义的指挥中心——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对反革命的进攻给予反击，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著名的"第一号命令"作为这次起义的开端。当天下午5时开始，工人赤卫队、革命的士兵和水兵以闪电般的行动占领了塔夫利达宫、邮局、火车站、国家银行、电话局、发电站及其他战略要点。夜里，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和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和曾经反对起义的加米涅夫共同领导了起义。10月25日早晨，整个城市已经掌握在起义者手中。上午，克伦斯基逃出彼得格勒。中午，临时政府成员被围困在冬宫。

10月25日夜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此刻，攻打冬宫的战斗准备均已就绪。"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炮声发出了攻打冬宫的信号。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丘德诺夫斯基率领赤卫队员和革命的士兵、水兵冲进了冬宫。一些士官生被缴了械，躲在房间内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全被逮捕，并将他们押解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大会通过了这一文件。26日晚，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和平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分别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宣布，苏维埃政权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土地私有权，没收地主、皇族、寺院教堂的土地，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交给农民使用。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了新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委员101名，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名，其他党派10名。大会决定成立人民委员会作为管理国家的政府机关。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任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任民族人民委员，米柳亭任农业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任劳动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任教育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克雷连柯、迪宾科三人共同掌管陆海军人民委员部。10月27日清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它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消息，10月25日早晨传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立即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党的战斗总部。赤卫队在第56团革命士兵的援助下，攻占了邮政局和电报局。在起义行动开始以后，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联席会议才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然而，在这个委员会里，不但有布尔什维克，也允许孟什维克参加。当晚，在市杜马的会议上，成立

了一个同布尔什维克对抗的"公安委员会"，孟什维克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这就使莫斯科起义的形势复杂起来。

10月26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通报，号召莫斯科工人和卫戍部队支持彼得格勒起义的工人，并要求卫戍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不要执行未经军事革命委员会批准的任何命令和指示。军事革命委员会还发布命令，封闭资产阶级报纸，占领国家机关和国家银行，下令第193步兵团的一个连进驻克里姆林宫。与此同时，"公安委员会"也在克里姆林宫集结兵力，士官生包围了克里姆林宫。由于发生了军队的对峙，莫斯科军区司令里亚勃采夫上校要求双方同时撤离。军事革命委员会同意接受停火，撤出部分兵力。但里亚勃采夫却破坏协议，宣布全城戒严，强行收缴革命士兵的武器。并于29日由反动军队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发生血腥屠杀事件。军事革命委员会号召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奋起反击，彼得格勒的赤卫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赶来支援莫斯科的阶级兄弟，向反革命势力发动联合进攻。11月1日和2日，革命力量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攻占了许多重要据点和部门。3日拂晓，攻克克里姆林宫，取缔了反革命的"公安委员会"，在莫斯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从彼得格勒逃跑的克伦斯基与旧俄将军克拉斯诺夫相勾结，于10月底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向彼得格勒进犯。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城内的反革命组织"救国革命委员会"策动士官生叛乱，企图里应外合，颠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依靠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人赤卫队和起义士兵，迅速平定了武装的反革命叛乱，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初步的巩固。之后，旧俄军队的大本营就成了新的反苏维埃政权的中心。最高总司令杜鹤宁将军依靠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盟国使团的支持，拒绝

接受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号召组织"全民政府"。布尔什维克党派遣革命士兵和水兵，迅速攻克大本营，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雷连科准尉为最高总司令。

在俄国，革命是由大城市首先发动，然后推向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各地城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些城市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原先比较强大，如鲁干斯克、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乌拉尔、萨马拉等地是用和平方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另一些城市则经过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较量，如基辅、哈尔科夫、罗斯托夫、巴库、敖德萨、萨拉托夫、斯摩棱斯克、下新城、伊尔库茨克、塔什干等地是通过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到1918年3月大体完成，只有少数地区和城市延迟了几个月。所以，列宁称它是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避开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一次伟大实践，是俄国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创举。

十月革命完成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使俄国彻底摆脱了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束缚，结束了剥削阶级的统治，解决了俄国社会发展最尖锐、最突出的矛盾。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人们不再只是从书本上去论证或设计社会主义社会，而可以在实践中去创造新生活，建设新社会。在一个经济文化并不发

达的国家里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会遇到种种新的特点、新的困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和总结，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十月革命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在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开拓了一个社会主义基地，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共处和竞争的世界新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不同制度的国家共处和斗争，也提供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互吸取经验，促进各自的繁荣。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榜样，可以不通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应该看到，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是充分具备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因此，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展开了一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合理的论战。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俄国工人阶级也远不能掌握政权，假若谁在无产阶级没有准备好以前过早地夺取政权，把"政权强加给它"，只能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①。考茨基也认为，俄国革命只有在同西欧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硬要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一个注定要夭折的"早产儿"②。这场争论，归结起来就是：十月革命是一场悲剧、一个错误，还是一次革命的创举？列宁辩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唯物主义者从来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6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参见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54—66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不否认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一个国家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革命的"客观前提"是否完全具备与革命时机是否已经到来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列宁看来，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尽管机器大生产还未占统治地位，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但只要国内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有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建立了工人政党，经过相当训练之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推翻反动统治而取得政权。在这里，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讲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这一"客观前提"，而在于某些落后国家由于矛盾集中、革命时机更早地趋于成熟，这时无产阶级政党是应当大胆地领导革命并去争取胜利呢？还是借口生产力发展不足而拒绝革命、放弃革命呢？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是前一种态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十月革命正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生动表现。

第四节　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初步骤

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建立

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无产阶级就着手摧毁旧的国家机关和建立新型的国家机关。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及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革命领导机关都集中在斯莫尔尼宫办公。不久，各人民委员部相继吸收了一批来自基层的工人、士兵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并分别搬出斯莫尔尼宫，但每天晚上各人民委员都来到斯莫尔尼宫，在列宁的主持下举行会议，商议和决定国家大事。

11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废除俄国现有的一切等级、身份(贵族、商人、市民、农民)、封号(公爵、伯爵)及文官官衔，全体居民一律以"俄罗斯共和国公民"相称呼，这是体现苏维埃民主的最初步骤。11月22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撤销各级旧法院，规定地方审判员将根据直接民主选举制选举产生。12月7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建立全俄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的法令，以便同旧政府机关的官员、职员严重的怠工现象和社会上十分猖獗的反革命破坏暗害活动作斗争。

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必须解决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在政治上的代表是社会革命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关系的演变，对局势的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起控制了苏维埃的多数，支持临时政府，后来又加入临时政府的联合内阁。然而，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左翼力量比较接近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七月事变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一步同布尔什维克靠拢，布尔什维克则接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土地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遂与社会革命党在组织上分手，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十月武装起义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参与了起义的领导，它的成员也直接参加了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十月起义胜利后，又有许多社会革命党成员转到左派队伍中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社会革命党领导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革命党中央决定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除。在这种情况下，1917年11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自己的党章，并正式宣告左派社会革命党(国际主义分子)成立。

十月革命后，除工兵代表苏维埃外，农民代表苏维埃是单独存在和独立进行活动的，其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手里。在1917年11月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选出了108名（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名）组成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加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2月初，形成独立政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正式达成协议，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分别担任农业、邮电、司法、城乡自治机构、内务、宫殿事务的人民委员。在新成立的"契卡"中，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分别推派人选担任正副主席。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人民委员会工作后，协助布尔什维克党在巩固地方苏维埃政权方面作出了贡献，尤其在广大农村，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比较弱小，到1918年3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在约40%的县苏维埃中未取得稳定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使无产阶级政党在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中拥有可靠的多数，使地方政权得以排除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干扰而迅速巩固起来，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中央，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同心协力解决了立宪会议问题。所以，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党合作最亲密的时期。

二月革命后，召开立宪会议来决定国家体制是许多党派的共同主张。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也提出这一主张。但临时政府对此一直拖延不决。至十月革命前夕，立宪会议选举的准备工作才告就绪。起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作了如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承诺。11月中旬进行了立宪会议选举。选举结果，在715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183名，社会革命党却有412名，占据明显的多数。这个名额主要反映革命胜利前的政治力量对比，也

预示着苏维埃与立宪会议之间的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1918年1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言记载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宣布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共和国，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任务。并决定将这一文件提交立宪会议予以确认。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宣扬立宪会议是高于一切的全民的民主机关，妄图用立宪会议代替苏维埃。1月5日，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向会议宣读这一《宣言》，遭到占据多数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代表的拒绝，布尔什维克遂发表声明，退出会场。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随之亦退出会议，以示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解散立宪会议。

1918年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1月13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通过了两个代表大会合并的决议，并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战争

十月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发出呼吁，停止世界战争，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英、法、美等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府的和谈建议，德国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意和苏维埃俄国进行和约谈判，单独媾和。

在没有可能缔结普遍和约的情况下，11月20日，俄德双方派出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谈判。12月2日签订

"停战协定"。12月9日开始和约谈判。苏俄代表团最初由越飞为首席代表，从12月27日起由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任首席代表。鉴于德国已占领了一大片俄国及其附属国的领土，德方提出的和约条件相当苛刻。苏维埃俄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抉择：要么接受这个带侮辱性条件的和约，或者继续同德国为首的中欧强国继续进行战争。数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已使整个国家民穷财尽，疲惫不堪，农村大批土地荒芜，前线士兵士气低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如果继续战争，无异于葬送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此时，一些被打倒的反动派人物俨然把自已装扮成"伟大的爱国者"，指责布尔什维克接受和约条件，就是出卖民族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围绕着要不要缔结单独的对德和约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内也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1月8日，列宁在一次党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他写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讨论时，形成了三派意见：以列宁为首主张立即签订和约；托洛茨基提出"不战不和"方案，即"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拒绝签订和约"；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强烈主张中断和约谈判，向德国宣布革命战争。

当时的情况是，假若把苏维埃政权继续拖入战争，就会扼杀这个社会主义婴儿；而立刻缔结屈辱性的割地和约，又为党内外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因此，当1月14日托洛茨基率领代表团再次前往布列斯特进行和约谈判时，列宁曾和托洛茨基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就接受和约条款。1月27日，德方提出最后通牒。28日，托洛茨基擅自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和约上签字，同时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并决定全面复员军队。至此，和约谈判中断。2月16日（以下用公历）晚，苏维埃政府收到德方关于中止停战并于2

月18日12时起恢复军事行动的正式通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连续召开两次会议，但列宁关于立即无条件地恢复谈判，签订和约的主张均未获得多数人的支持。18日中午，德军向苏俄发动全线进攻。当晚党中央致函德军司令部，同意与德方恢复和约谈判。德方于2月23日复电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新的更加苛刻的媾和条件，限令48小时内接受全部条款，才能恢复和约谈判。当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接受德方提出的新的媾和条件的问题。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央全会，会上争论激烈，最后全会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的提案，接受德方提出的全部条款，立即缔结和约。2月24日凌晨3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对德和约问题。会议以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议。3月3日，和约在布列斯特正式签署生效。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正确主张，终于被接受，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喘息"时机。和约的签订，是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行革命妥协策略的一个范例。在处理围绕和约问题的党内争论中，列宁多次处于少数地位，但他既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耐心说服，体现了列宁是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在对德和约问题上，持反对态度的，在党内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从"左"的立场出发，甚至说什么"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对此，列宁斥之为"奇谈与怪论"，并指出，这种"理论"反映了这些人"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和完全绝望的心理。"① 反对签订对德和约的，在党外是左派社会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21页。

党人和其他反对党分子。在3月14—16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批准和约问题的报告，左派社会革命党推举卡姆柯夫作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卡姆柯夫声称签订和约是一种“自杀行为”，布尔什维克党因接受和约条款而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还威胁说，如果大会批准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将退出政府，并号召人民用武力撕毁和约。大会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会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他们的代表仍留在苏维埃中，表示除和约问题外仍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和约问题上的争执是两党之间第一次发生的严重裂痕。

革命初期的经济、政治措施

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就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改造。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和步骤是比较谨慎的。1917年11月1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条例规定各企业工人成立监督委员会，在所有使用雇佣劳动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农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中实施工人监督，监督的范围包括产品和原料的生产、购买、分配、销售及财务。至1918年初，几乎所有工业企业都实行了工人监督。

从1917年11月开始，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银行、铁路、外贸、商船、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法令。截止1918年5月底，除全部银行国有化外，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已达512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冶金矿山、金属加工、电机等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企业。这些大型企业的国有化，奠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基础。

根据《土地法令》，1918年初又颁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规

定立即无偿地废除土地私有制，将所有土地都变成全民财产并交给耕地的劳动者使用。土地法令的颁布和土地改革的实行，使贫农、中农获得了1.5亿俄亩的土地和价值3亿卢布的农具。土地国有化虽然不能在农业中确立社会主义关系，但加强了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经济阵地，巩固了工农联盟。

12月2日，颁布了关于设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法令规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为了这一目的，它应当制订调节全国经济生活的总规范和总计划，协调中央和地方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经济活动，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就是说，它是管理和调节国民经济的全国性机构。

1918年春，列宁写下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许多篇文章，利用对德和约签订后可取得的"喘息"时机，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计划，规定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苏维埃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针。但是，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列宁的许多主张和设想不得不暂时中止了。

为战胜面临的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经济措施。由于饥荒日趋严重，5月9日发布粮食专卖法令，要求农民在一星期内把全部余粮卖给国家，凡隐匿余粮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10年以上徒刑。6月11日又下令成立贫农委员会，负责协助征粮队搜寻粮食，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措施受到贫农的欢迎，但大多数中农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反映小农情绪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俄共(布)① 之间在经济措施方面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加深。接着，在各项重大的政策措施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投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提案，两党关系日趋紧张。

---

① 1918年3月在党的第七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简称俄共(布)。

7月4—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布尔什维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谴责俄共(布)背叛农民阶级，称贫农委员会是农村懒汉委员会，但他们提出的决议案遭到大会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社会革命党决定采取冒险行动。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制造了谋杀德国驻俄大使的事件，并集结了近两千名受他们影响的士兵进行叛乱。叛乱第二天就告平息，但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宣告结束。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宪法确认了由劳动群众的革命创造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确认了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权的成就，确定了苏维埃国家结构的基本原则。

此后，1918年9月，从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分化出"革命共产主义党"和"民粹派共产主义者"两个小党，曾被邀请参加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后来，这些党的许多成员分别加入了共产党。根据1920年9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革命共产主义者党加入了俄共(布)。至此，在苏维埃俄国的一党体制终于形成了。

第二章　国内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全面爆发

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俄国退出了战争。由于数以万计的德军从东线调往西线，加上德国取得对乌克兰的开发权，大大增强了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一切使协约国深感惊恐。出于对苏维埃政权本能的敌视，英、法、美、日等国在1918年3—4月间就派遣小规模的干涉军，先后在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登陆，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挑衅。与此同时，在高加索、顿河一带，都有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白卫军的武装叛乱。

1918年5月，在英、法、美三国政府的指使和资助下，策划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这是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武装干涉的又一突出事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十月革命前由当时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在俄国组建的。起初，协约国打算把它调往西线同德军作战。俄国退出战争后，苏俄政府允许军团中的官兵经由西伯利亚和远东到法国去。军团司令曾经应诺，交出武器，只携带少量武器作为防护之用，并保证分批乘军用列车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军团中的共产党员成立了党组织，普通士兵

也不愿把枪口指向苏维埃政权。可是，军团司令部在协约国代表的怂恿下，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反对苏维埃的武装叛乱。5月下旬，当满载军团士兵的60列军车分散在奔萨—符拉迪沃斯托克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时，军团发动了叛乱。6、7月间，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的部分地区。被帝国主义的敌意宣传所蒙骗的军团士兵变成了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先头部队。

6月，协约国乘机扩大武装干涉，英、法、美、意四国混合部队4万多人在俄国北部登陆，美国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东西伯利亚，日本在远东入侵的军队扩大到10万人。德国也违背和约有关条款，派兵占领克里米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支持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顿河流域的反革命叛乱。外国干涉军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相勾结，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占领了苏俄四分之三的土地，形成了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包围圈。列宁说："北方有摩尔曼，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东南方有土耳其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造的包围圈几乎已经合围了。"①

外国干涉军、白卫军和隐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互相策应，进行叛乱、阴谋和破坏活动。8月，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在彼得格勒刺杀了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在莫斯科企图谋害列宁，使列宁身负重伤。9月，英国武装干涉军指使其走狗在巴库枪杀了邵武勉等26名布尔什维克党的巴库委员会委员。在土耳其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也发生了多起暗害破坏活动，国内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至1918年夏，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可获得的和平喘息时期就告终了，苏维埃国家被迫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战争。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7页。

全国宣布为军营，红军的初步胜利

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这两股反革命势力中的任何一股势力都不能单独地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俄国反革命势力拥有一定数量的军官和士兵，但他们缺乏金钱和军火；外国帝国主义有金钱和军火，却派不出必要的兵力来进攻苏维埃政权。出于共同的反对苏维埃的目的，两股反革命势力就联合了起来。

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人组织代表的联席会议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击退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下乡征粮运动，大规模地开展军事训练，大规模地武装工人，并且拿出全部力量向反革命资产阶级发动军事进攻。"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口号。"① 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要求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把党、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一切活动转入战时轨道，动员现有的全部人力物力用于国防的需要，并加强红军的建设。全体公民，不分职业和年龄，都应当无条件地履行苏维埃政权赋予的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为了统一领导和协调有关国防和红军建设的各部门、各经济部门、各国家机关的活动，11月30日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这是苏维埃国家非常时期的最高机关，它拥有动员国家的人力和资源用于国防的全部权力。

建立和加强红军的问题提到了首位。十月革命前，列宁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的政权下，将废除常备军，代之以人民的武

① 《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3卷第108页。转引自《苏联简史》第2卷第125页，三联书店版。

装。十月起义时，群众性的武装队伍——工人赤卫队和起义的士兵、水兵组成的起义大军一举摧毁了临时政府。然而，这些群众武装难以抵御帝国主义正规军的武装干涉，这是显而易见的。1918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1月29日，又通过了建立工农红海军的法令。红军、红海军起初实行志愿兵制，入伍的政治条件十分严格。同年夏天，红军拥有志愿兵30万人。这些兵力用来镇压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是足够了，但是用来抗击国内外反革命联合进攻的长期战争，就远远不够了。6月下旬，根据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①的报告，苏维埃政府决定由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在全国各地迅速组织红军部队。在7月初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中，规定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是全体苏维埃公民的应尽义务，这就把义务兵役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组织红军的专门决议。决议指出，苏维埃共和国需要建设一支集中的、有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团结起来的、训练有素的、装备精良的阶级军队，才能粉碎国内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决议提出在红军中加速培养工农指挥员的同时，必须在军事科学的基础上利用旧军队中的军事专家的经验和知识来建军，并强调了政治委员在加强军队纪律性和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各级政府机关、工会和厂矿企业，都要协助军事部门组织工人进行不脱产的义务军训，以培养红军的后备人员。

至8月中旬，红军已达43万人。10月，又增加到80多万人。9月初，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所有军事机关和各条战线，负责贯彻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关军事问题的指示，同时设置共和国武装力量

①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最初任外交人民委员，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改任陆海军人民委员。

总司令的职务。上述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一职均由托洛茨基担任。

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以东方战线为重点。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踊跃参加红军，开赴前线。在短短一个多月(7—8月间)时间里，东方战线就编成5个集团军和一支伏尔加河舰队。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经过夏季的激战，红军挡住了敌人的攻势。秋季，红军就转入反攻。至10月初，红军先后解放了喀山、辛比尔斯克、塞兹兰和萨马拉。东方战线的红军肃清了伏尔加河地区的白卫军，把敌人一直赶向乌拉尔。在南方战线(顿河、伏尔加河下游、北高加索等地区)，夏秋两季，红军击退了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顿河哥萨克白军和邓尼金将军的志愿军的多次进犯，粉碎了南方与东方两股白军会合的企图。

1918年11月，德国及其盟国在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正当红军帮助乌克兰、克里米亚、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民为驱逐德国占领者，建立新政权而斗争的时候，1918年11月底，协约国干涉军和白卫军主力又在南部集结。他们企图实行主力突击，占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随后夺取基辅、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等矿区。协约国出动12个师约13万兵力。在他们支持下的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及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军队联合向北推进，突破了南方战线，白卫军有突入苏维埃心腹地区的危险。党和苏维埃政府立即采取一系列巩固南方战线的措施，紧急动员了2500名共产党员奔赴南方战线，又从东方战线调来两个师的兵力，终于在12月遏止住了敌人的进攻。1月份起转入反攻，先后解放了哈尔科夫、基辅、顿河和第聂伯河的大部分地区。1918年底至1919年初，红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红军在1919年军事上的胜利

1919年春，在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国内外反革命联合的武装进攻开始了。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纠集一些仆从国家组成新的干涉军，连同国内的几股白卫军，共集结了约 130 多万兵力，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新的联合进攻。

高尔察克是第一次联合进攻的主要力量。旧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控制着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片土地，拥有 25 万兵力，还有近 20 万外国干涉军保护着高尔察克的后方。3月 4 日，高尔察克军队沿从北乌拉尔森林至南伏尔加河东岸大草原，在长达 2000 公里的战线上向西推进。3月，红军东方战线的中部被突破，敌军占领了沃特金斯克、比尔斯克、乌发、别列别依、布古尔马等城市。随后，高尔察克军队全力向伏尔加河推进，打算在这里同南方的邓尼金军队会合。4月中旬，高尔察克军队已占领了离喀山和萨马拉仅 85 公里、离辛比尔斯克 100 公里的地方。东线红军的整个右翼面临着被包抄的危险。如果红军撤到伏尔加河东岸，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就将会合，整个苏维埃国家的中部地区将受到威胁。敌人的猛烈进攻迫使红军从东线、北线、南线、西线、彼得格勒和高加索——里海战线全面后撤。局势又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

4月 12 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东方战线局势的提纲。提纲着重指出，东方战线又一次成了主要的、决定性的战线，提出要在最短时间内加强东方战线，把高尔察克军队赶出伏尔加河流域，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党中央号召全体劳动人民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积极参加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斗。苏维埃政府对俄国中部 9 省五个年龄的劳动

人民进行了动员，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普遍的动员。先后有6万名先进工人，其中包括1万5千名共产党员和3千名共青团员，迅速开赴东方战线。到1919年春，红军兵力已增加到150万人。

1919年4月，在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编组车站机车库的工人首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以战胜高尔察克的进犯。这一倡议立即获得工人的广泛响应，列宁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伟大的创举"。

由于全党和工农群众的广泛动员和支援，东线的战局有了转机。红军决定兵分南北两路，以南路为重点，集中3个集团军，组成由伏龙芝、古比雪夫领导的南路兵团，向高尔察克发起攻击。他们连续展开三次战役，即布古鲁斯兰战役（4月28日—5月13日），别列别依战役（5月15—19日），乌发战役(5月25日—6月19日)。值得一提的是，6月7—8日，由国内战争期间著名英雄夏伯阳指挥的第25师，在长达75公里的战线上，在没有专门渡江器材的情况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白河，并于9日解放了战略重镇乌发。7月，红军乘胜追击，月底解放了车里亚宾斯克；8月中旬，红军到达托伯尔河。至此，高尔察克部队全线溃败，后撤120—150公里，红军胜利地解放了乌拉尔。至此，高尔察克已不再成为主要危险了。1919年秋冬两季，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上，彻底消灭了高尔察克的军事力量，高尔察克本人于1920年2月被捕并被处决。

1919年5月，正当东方战线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尤登尼奇的白卫军发动了向彼得格勒的进攻。由12艘巡洋舰、20艘驱逐舰、12艘潜水艇组成的一支英国舰队从海上支持白卫分子，协约国间谍还策动了红丘、灰马和奥勃鲁切夫三个炮台的叛乱，形成了对彼得格勒的直接威胁。彼得格勒工人、红军第七集团军和波罗的海红海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奋起保卫革命的摇篮彼得

格勒。至6月底，终于击退了白卫军对彼得格勒的进犯。

7月，协约国在南方指使邓尼金将军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第二次进攻。邓尼金拥有15万兵力，还获得美国给予的10万支步枪、300多万发子弹、20万枚炮弹，英国给予的25万支枪、200门大炮和30辆坦克，以及其他国家给予的名目繁多的军援。7月初，邓尼金占领了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进攻的目标直指莫斯科。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最危急的关头。党中央发表了列宁起草的致全体党员和劳动人民的公开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又响应党的召唤，开赴南方战线。红军奋力遏止邓尼金的攻势。但是，邓尼金突破了红军的防线，8月底占领基辅，9月占领库尔斯克，10月占领奥廖尔，直逼图拉和莫斯科。邓尼金甚至下达了攻打莫斯科的指令。局势十分危急。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非党工人组成一支5万人的补充队伍加强南方战线。为了阻止敌军向图拉、莫斯科这一最危险的方向推进并转入反攻，红军司令部在南线的中段组织了一支突击集群，其任务是沿哈尔科夫—顿巴斯—顿河罗斯托夫一线对敌军实施主要突击。10月中旬，经过几天激战，终于歼灭了邓尼金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奥廖尔和沃罗涅日。在这一战役中，布琼尼的骑兵立下了赫赫战功。红军乘胜继续向南推进。12月12日，解放了哈尔科夫。12月16日，又解放了基辅。1920年1月，解放了察里津、顿河罗斯托夫。1920年春，最终击溃了邓尼金的叛乱。

1919年9月底，尤登尼奇白卫军在英国坦克的掩护下，对彼得格勒发动第二次进犯。10月，占领了亚姆堡、红村、皇村和儿童村，严重威胁着彼得格勒。彼得格勒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紧急动员起来，第7集团军得到了增援，与第15集团军协同作战，于11月粉碎了尤登尼奇的白卫军部队。

1919年是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到年末，红军总数已达 400 多万人。这一年，红军从敌军手里解放了乌拉尔、西伯利亚、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击退了国内外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联合进攻，巩固了苏维埃国家的地位，也赢得了1920年初一个新的和平喘息时机。

“军事反对派”

军事反对派是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对派。

1918年春，在红军组建过程中，俄共(布)中央确定了军事路线及一系列重要方针，其中包括改志愿兵制为义务兵役制，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委员的制度，规定在军队中实行新的职务委任制，废除原来选举指挥人员的制度，等等。从 1918 年 7 月开始，由于战争急剧升级，红军指挥人员奇缺，不得不吸收相当数量的旧俄军事专家和军官，并把他们派往前线各集团军担任各级指挥任务，由红军中政治委员监督他们的行动，防止他们叛变。从这些旧军事专家的情况看，他们之中能够认清历史潮流，自觉为红军服务的有识之士为数甚少。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无路可走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在环境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一些旧军官叛变投敌的事屡有发生。这就引起了党内一部分人对吸收旧军事专家的方针的怀疑和抵触，其中掺杂着对当时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不满和抵触。

1918年夏，南方察里津前线战斗激烈。9月初，保卫察里津的第 10 集团军在南方战线副司令员伏罗希洛夫的指挥下，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击退了白卫军的进攻。然而，伏罗希洛夫和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宁等人对利用旧军事专家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拒不服从南线司令员、前沙俄将领西丁的作战命令。

他们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得到当时也在察里津的人民委员斯大林的支持。这一情况被托洛茨基知悉后，大为恼火，他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不许干涉前线司令员作战命令的指示，并向伏罗希洛夫等人发出警告，如再不执行作战命令，就要将其送交军事法庭。托洛茨基还发电报给列宁，要求党中央召回斯大林。后经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的调解，冲突暂告平息。这一事件发生后，察里津地区支持伏罗希洛夫观点的一部分人逐渐形成为军事路线的反对派。

军事反对派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在红军中广泛吸收沙俄时代的军事专家，特别反对由他们担任军事指挥职务；主张维护军队中原来的志愿兵制和军官选举制，否认在红军中加强集中制和执行铁的纪律的必要性；留恋军队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建立正规红军，等等。

1919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任务之一是统一全党在军事方针问题上的认识。托洛茨基因前线战事紧张，未能参加大会。党中央委员会事先通过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并指派索柯里尼柯夫作为报告人。军事反对派推举斯米尔诺夫作副报告，在会上宣读反对派的纲领。反对派认为，旧军官担任红军的指挥人员，他们的职权比政委更大，这种制度是完全错误的。反对派指出，政委必须参加指挥，而不仅仅是监督，在建立起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完全可靠的指挥人员队伍以前，军队中应实行集体管理的制度。反对派还对军事条令、内务条令中规定的军队纪律和礼仪进行抨击，认为这是维护军官特权，损害士兵权利的"繁琐细则"，是在军队中"恢复专制农奴制度"。会上，拥护中央军事路线的人和反对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列宁对军事反对派的主张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反对派指责托洛茨基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列宁为托洛茨基作了辩护，他说"这是一种狂人的指责"，"一点根据也拿不出来"①，因为军事部门的政策，同其他部门和机关一样，是在党通过中央发出的总的指示的基础上得到贯彻执行的，而且是在中央的直接监督之下的。列宁还论证了使用旧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并主张把使用旧军事专家的经验推广运用到经济建设之中，提出要"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列宁指出，常常有一些最忠实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激烈反对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红军时使用那些曾为沙皇制度服务、甚至屠杀过工农因而有历史污点的旧军事专家，即沙皇的将军和军官。列宁认为这种愤慨的情绪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然而，"我们正是这样才把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建设起来的。……不仅军事上是这样，在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我们都面临着这个任务"②。

第二节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争环境下的经济状况

连年的战争，已使整个俄国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其中最大的灾祸是饥荒。饥荒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战争造成了饥荒，饥荒又造成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紊乱和破坏。

俄国原先是欧洲的粮食生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粮食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7页。

出口每年达6—7亿普特[1]，农产品占全部出口总额的73.7%。在三年多帝国主义战争中，农村近1千万青壮年被征入伍，大批马匹被征为军用，成片成片的土地荒芜，粮食生产急剧下降。1917年就开始出现饥荒。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由于城乡政权和阶级关系的变动，饥荒更加直接地出现在人们面前。1918年1月，粮食部门只完成粮食计划采购量的21.8%，2、3两月采购到的粮食只占计划的36.5%，4月为14.1%，5月为12.2%。由于不能按计划采购到粮食，各种粮食供应计划无法兑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1月份只及计划供应的7.1%，2、3两月是16%，4月只供应计划的6.1%，5月只能供应5.7%。夏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每人只能领到1/8磅的面包，有时整整一星期领不到粮食。1918年5月9日列宁给各地发出电报："彼得格勒处于空前的危急境地，没有粮食。只能把剩余的土豆粉、面包干发给居民。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延地支援彼得格勒。"[2]富农拒绝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粮食，投机贩卖盛行，黑市交易猖獗，也是造成粮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一普特小麦国家收购价为6卢布，黑市价高达150卢布，富农为了挑唆贫苦农民去反对苏维埃，就用平价给贫苦农民一普特粮食，让贫农用投机价格出卖这一普特粮食而"发发小财"，让这个贫农也变成大喊大叫的人，去反对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的苏维埃。

国内战争爆发以后，苏维埃国家的处境更加艰难。战争初期，外国帝国主义和白卫分子侵占了3/4的国土，苏维埃共和国陷于四面战火的包围之中，同主要的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在很长的时间里，国家失去了顿涅茨的煤，巴库和格

① 1普特为16.28公斤。

② 转引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第246页，三联书店1979年6月版。

罗兹尼的石油，南方和乌拉尔的金属，土耳其斯坦的棉花，西伯利亚、库班和乌克兰的粮食。而由苏维埃政权能够管辖的俄罗斯的28个省，有莫斯科、彼得格勒两个俄国最大的城市，工业企业也比较集中，城市居民共有1100多万人。为了对付战争，还必须供给一支迅速扩大的红军队伍。当时苏维埃政府还无法满足供给城市居民和军队最低限度的粮食需要，粮食问题极其严重和危急。工业原料和燃料也极度匮乏，约有40％的工厂不得不停工待料。1918年底，拥有15000名工人的全国最大的纺织企业、国营波克罗德斯克—格鲁霍夫纺织厂因缺乏燃料而被迫停产。

经济状况十分艰难，对此，列宁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说："罗曼诺夫和克伦斯基遗留给工人阶级的，是一个被他们所进行的掠夺的、罪恶的、非常痛苦的战争弄得完全破产的国家，是一个被俄国和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劫掠一空的国家。只有最严格地计算每一普特粮食，只有绝对平均地分配每一磅粮食，才能使粮食够一切人吃。机器的粮食即燃料也极端缺乏，如果不集中全力来严格无情地节省消费和实行合理分配，那么铁路和工厂就会停顿，全国人民就会遭受失业和饥荒的危害。灾难就在眼前，已经非常逼近了。"①

在严酷的战时环境下，为了克服面前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政策和措施。

从粮食垄断专卖到余粮收集制

鉴于饥荒的出现和粮食状况的极端严重，1918年5月9日，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36页。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予粮食人民委员特别职权，同隐藏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法令重申粮食垄断和粮食固定价格都是不可更改的，必须同粮食投机商进行无情的斗争，宣布所有拥有余粮而不送往收粮站的人以及浪费存粮酿造私酒的人为人民的敌人，要把他们交付革命法庭审判，处以 10 年以上徒刑，粮食全部没收。[1] 5月13日，人民委员会发出由列宁签署的粮食专卖法令，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征购和供应粮食的非常权力。5 月 27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及其地方机构》的法令，加强了国家机关对粮食的控制。

为了贯彻粮食专卖法令，严禁粮食私人买卖，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群众性的工人征粮队，每 25 名工厂工人中推派 1 名品质忠诚的工人参加征粮队，开赴农村征购粮食，并帮助建立贫农委员会，和贫农一起展开反对粮食投机和富农的破坏活动。6月中旬，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已有工人征粮队员 3000 名，8 月增至 1.66万人，到年底，征粮队员已达 8 万人。

1918年秋，还发起了一次快速收购新粮的运动，要求征粮队带上收割机器，首先集中收购那些产量多且最近工业中心的地区，如叶列茨县等地的粮食。这些措施收到一定效果，1918年下半年在全国采购到 6700 万普特粮食，比上半年增加 3900 万普特。

但是，根本问题在于形势险恶，大批土地抛荒，粮食生产大幅度萎缩，因此，征购来的粮食远远不能解决国家粮食供应的困难。当时国家粮食机关只能向城市居民供应口粮 50% 左右，其余50%仍需向私商购买，而黑市价比规定价格高达 10 倍。尽管

---

① 参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2卷第262—263页，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

颁布了粮食垄断和粮食专卖的法令，在小农经济占优势以及粮食奇缺的情况下，禁止粮食私人买卖和投机贩卖实际上办不到。加上当时国家收购价格过低，与零售价格很不适应，不仅遭到富农的反抗，中农亦不肯将粮食卖给国家。为此，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出了征收农产品实物税的法令，规定必须在交纳实物税后的粮食才能按固定价格出售或收购，这个法令的实质是以对农民中不同阶层征收不同数额的实物税来取代建立在"对农民一视同仁"基础上的货币税，因为富农和富裕农民手中拥有较多的粮食储备。然而，征收实物税也未能解决粮食问题。

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俄粮食工作人员会议，全面讨论了粮食产品的储备、供应、征收余粮的新情况。会议认为必须实行余粮收集制，才是大工业中心免于饥馑的唯一办法。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产粮省份收集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即著名的余粮收集制的法令。法令规定："为满足国家需求所必要的全部粮食和谷物饲料，摊派给各产粮省份向居民征收。"征收的办法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确定征收粮食的总数，自上而下地摊派给各产粮省、县、乡、村、直至每个农户承担，按固定价格强制向农民征购。并规定3月1日前所交数量不少于70%，6月15日前交足其余数量的，可免交实物税，未按规定期限交售粮食而又发现其储备者予以没收。严重窝藏粮食储备者予以严惩，没收其财产或逮捕法办。

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又发布《关于采购食品》的决定。决定重申坚决贯彻已经颁布的对基本食品（粮食、砂糖、茶叶、食盐）的国家垄断，严禁私人贸易。并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大规模收购其他重要产品（肉类、海洋鱼类、植物油、动物油、马铃薯）。

决定认为，不这样做，对居民的粮食正常供应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余粮收集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摊派征收农产品的办法，1919年下半年扩大用于肉类，1920年扩大到油脂及其他农副工业原料，如棉花、麻类、皮革等。

余粮收集制要求贯彻阶级原则：贫农不收，中农酌情征收，富裕农户多收。但在实际执行时，由于摊派指标高，征收任务重，常常把中农与富农相提并论，用对待富农的办法来对待中农，甚至对播种1—2俄亩的贫农也有50%列为应征户。同时，征购的粮食不仅是余粮，连必要的口粮和种籽粮也被征集一空。

为了贯彻余粮收集制，再次大规模地组织工人征粮队下乡。国内战争期间，有1/5—1/10的工人参加过征粮队，全国共有2700个征粮队，参加的工人计有82000人。工人征粮队既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为了必要时实行强制收购和对付敌人的武装袭击，征粮队还配备手枪、机关枪等武器。

实行余粮收集制以后，粮食征购量有较大幅度的上升。1917/18年度（粮食年度从当年8月至次年7月）征购粮食7340万普特，1918/19年度为10790万普特，1919/20年度为21250万普特。粮食征购量的增加证明这是战时环境下一种可行的粮食政策，既使红军的粮食供应得到保障，也使城市居民能配给到最低限度的口粮。

然而，余粮收集制在取得显著成就中也蕴育着危机。它触犯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把农民的全部余粮甚至包括口粮和其他剩余农产品一概强行征收，不但收购价格很低，而且所付纸币都是一些急速贬值的“彩色纸片”，用它买不到什么东西，近于无偿剥夺农民，这就不能不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加上战争的破坏，使种植面积大为减少。1920年全国主要谷物总产量为210亿普特，比

1917年下降33%，比1913年下降55%。此外，农民瞒产抗交，赶走征粮队和农民暴动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工农联盟潜藏着破裂的危机。

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注意调整工农之间的关系。由于缺乏经验和囿于某些传统的观念，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初期提出的口号是"中立中农"。由于农村土地改革以后，中农已占农村人口的60%，已成为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和补充红军的主要兵源，中农政治态度的向背直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所以，在1919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决议，决定改变"中立中农"的政策，为"依靠贫农，巩固同中农的联盟，反对富农和苏维埃政权一切阶级敌人"的政策，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工农联盟作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转变。然而，由于战争环境的险恶和余粮收集制的实行，在整个内战时期，党和苏维埃政权对中农的态度是比较严酷的。

加快工业国有化步伐、建立管理总局体制

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加速对大工业的国有化。法令指出，为了与经济遭受破坏和粮食危急状态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了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的专政，人民委员会宣布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采矿、冶金、金属加工、纺织、电气、锯木、木器制造、烟草、玻璃、陶瓷、皮革、水泥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大企业，以及蒸汽磨、地方公用事业企业和铁路运输企业的所有资本和财产，均无偿地转归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这类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条件主要是：资产总额在20万卢布以上或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企业。

这一法令颁布两个月后，收归国有的大企业即由原有的512

家增至3134家，其中半数以上是重工业。至1918年底，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工业国有化已基本完成。随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又颁布法令，规定凡有机械动力而雇工5人以上，或无机械动力而雇工10人以上的小工业均收归国有，到1920年底，国有化工业企业达37226家。非国有化企业是小型或特小型的，它们必须接受国家监督并务必完成国家订货。

工农国防委员会对国家经济实行总领导，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进行直接管理，它将各工业部门划归有关总局。总局按部门特征设置，如采矿工业总局、石油工业总局、煤炭工业总局、燃料工业总局、中央纺织工业总局、中央糖业总局，等等，总局的任务不仅是计划生产、分配产品，而且直接领导企业，掌管财政拨款及采购原材料。总局实行集中领导，不需经过地方苏维埃。总局的指令，其主管的部门和企业必须执行，企业和部门必须按照集中指令无偿上交自己的产品；作为交换，它们也按照相应指令到得原料、燃料和其他企业的产品。到1918年底，全国共设立总局18个，1920年底已有52个。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这种经济体制，通称管理总局体制。其主要特征是，由总局实行“直接领导制”和“统收统支制”。这种体制，在当时战争极其艰苦，在原料、燃料极其缺乏的条件下，有利于国家最大限度地根据国防需要来动用资源，组织生产。当然，这种体制注重行政命令和高度集中领导，不讲究经济效益、经济核算和发挥企业的活力，也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由于大批工人参加红军，走上前线，另有一批熟练工人因城市里粮食危机而流入农村，自1918年秋天起越来越感到劳动力

的不足。这使得苏维埃政权必须由自由雇工制过渡到普遍的劳动义务制。

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非劳动者的劳动手册》法令。这些劳动手册代替过去的身份证、公民证和其他证件。法令规定了按照劳动义务制应当参加公益劳动的公民范围包括，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人；使用雇佣劳动获取利润的人；私商；不参加公益劳动的自由职业者等等。只有得到标明相应月份标记的劳动手册，才能迁移和获得口粮。

1918年12月，公布了第一个《劳动法典》。法典规定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公民都有劳动的义务，责成有关部门吸收人们参加义务劳动，并付给不低于最低生活费的报酬。12月1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实施劳动义务制》细则，指出必须使用闲散劳动力参加公益劳动，同时强调这种义务劳动不应带有只适用于非劳动分子的惩罚性质。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了劳动义务制。

劳动义务制开始是为了完成某项临时性的任务，如燃料的采伐、扫雪、筑路等。后来是实行局部性的劳动动员，如1919年7月为在一个弹药厂进行紧急工程，动员了附近两个县的木工。由于燃料问题紧迫，工农国防委员会专门作出决定，要求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参加采伐和搬运木柴的义务劳动，并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劳动义务制总委员会。

1920年1月29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普遍的劳动动员制度具备了国家法律的形式。责成工农国防委员会对贯彻普遍劳动义务制实行总的领导，在其下面建立相应的总局。逃避义务劳动，擅离职守，故意破坏劳动工具，组织工作粗心大意等等犯罪分子均送人民法庭治罪。

取消自由贸易，经济关系的实物化

战时的非常经济措施，在商业和供应方面，表现为继粮食专卖之后禁止所有生活必需品的私人买卖，实行国内贸易国有化和实物配给制。

1918年11月，对国内私营商业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和征用政策。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组织居民各种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供应》的法令，即"贸易垄断法令"，是这方面的决定性步骤。法令规定，一切个人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的采购，统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办理，以国营商业和消费合作社取代私人贸易。5天以后，即11月26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公布了《关于对某些食品和日用品贸易的国家垄断》的决定，宣布对烟草制品、食糖和糖制品、茶叶、咖啡、食盐、火柴、纺织品、煤油、工厂产的鞋子、钉子和肥皂等实行国家垄断，禁止私人经营。此后，私人零星贸易只限于在露天集市和旧货摊上进行。由于日用品极度匮乏，这类小市场仍很活跃，在莫斯科的苏哈列夫卡市场上，平均每天有3000多名商人在从事贸易。

彼得格勒是最早完全禁止私人贸易的城市之一。1919年8月，市苏维埃禁止18—50岁的所有男子从事贸易；1920年初封闭了所有市场。其他城市也相继取消了私人贸易。到1920年中期，小商小贩亦告消失。

在食品和日用品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国家取缔私人贸易，实行商业垄断，有利于保证前线红军的日常生活供应，也便于对全国城镇3500万居民实行统一的定额供应政策。1918年下半年起，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大城市就实行按照体力劳动强弱原则的实物定额配给制。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令，把消费者分

成4类，分别配给不同的口粮：1.特重体力劳动工人，每人每月36俄磅；2.其他各类工人、负责工作人员、手工业者、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每人每月25俄磅；3.职员、学生、12—16岁儿童每人每月18俄磅；4.其他居民，主要指不劳动者每人每月12俄磅。

1919年3月16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在各地设立了统一的分配机构——消费公社。每个公民均为公社社员，到一个指定的分配点登记注册，才能得到一份配给的食品和日用品。苏维埃政权特别关心照顾儿童的供给，规定对14岁以下所有儿童享受国家免费供给，学校要组织食堂，以保证学生吃上热饭。1920年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分别对工人和苏维埃机关职员提供免费的社会食堂网点。

苏维埃国家最初通过极限数目来控制纸币的发行。余粮收集制实行后，人民委员会颁发法令，允许根据实际需要来发行纸币，加上各种物资均十分匮乏，大量发行的货币遂使通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1920年底，1卢布只相当于1918年7月的188∶1，相当于1913年的13000∶1。货币失去了自己的应有作用，以物易物的现象开始流行，食盐、火柴、粮食、肥皂、糖、印花布等物品均发展成为交换的等价物。银行的信贷业务急剧减少，银行作为信贷机构而独立存在已失去意义，于是，1920年1月19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撤销人民银行》的法令，宣布银行机构与财政机构合并。

1920年下半年，正当国内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经济关系实物化的趋向还在不断加强。1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取消若干货币结算》的法令。法令委托财政人民委员部拟订关于废除国家机关、企业和工人、职员的邮电费、使用自来水设备和其他市政公用设备费用的法令草案。燃料、住房和粮食人民委员部控制的产品的费用也予废除。

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评价

"战时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国家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非常政策和临时措施，形成一种战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列宁说："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①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从客观上说，是不得已的，是当时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和非常措施。正是实行这一政策，使苏维埃政权能够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城市工人和红军最低限度的供应。所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战胜困难，赢得战争，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一项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它的意义仅在于，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能够搜集到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物品并将它们平均地进行分配的一种经济形式。这种战时体制恰巧使国家迅速掌握了全国的一切经济命脉，使商业活动全部停顿，商品生产和市场货币关系全被取消。在人们的主观认识上，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布)领袖人物在内，战时共产主义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08页。

实践正巧和人们头脑中的某种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相吻合。既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意味着剥夺剥夺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取消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苏维埃俄国在战时环境下做到了这些，于是，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政策和措施看作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简捷道路。列宁当时认为，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战争破坏的国家里，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严格地计算和平均分配每一磅粮食，不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和对付战争，已经超越"一般革命"的任务，而是共产主义的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的门径"。这些想法，载入由列宁起草的、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中。党纲中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准备消灭货币"，等等，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列宁在回顾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时候，多次讲到这一点。列宁说："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①

第三节　国内战争的结束

1920年初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红军粉碎协约国第二次进攻后，苏维埃政权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1920年初，法国、意大利等国被迫解除了对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封锁，允许俄国与盟国、中立国之间在互惠基础上交换商品。2月初，苏维埃俄国与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3月，苏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维埃政府又同拉脱维亚、立陶宛开始了和平谈判。苏维埃俄国的国外环境有所改善。

1920年春天，西伯利亚、乌克兰、北高加索、顿巴斯、格罗兹尼、巴库等出产粮食和燃料的地区已从白卫军手中夺回，粮食供应状况略有好转。但从整个经济状况看，困难仍然十分巨大。农业总产量大约只有战前的一半，余粮的征集对农民来说，感到是日益沉重的负担。大多数工厂停工，铁路运输陷于瘫痪，整个工业状况也面临严重衰竭的境地。恢复经济的任务开始提上了日程。

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拟定了国家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最近任务，并根据列宁的倡议，开始制定全俄电气化计划。

然而，没有多久，协约国第三次进攻开始了。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起，波兰就由于领土问题对苏维埃俄国持敌对态度。1920年4月25日，波军在毕尔苏茨基指挥下侵入乌克兰境内。5月6日，攻陷基辅。6月，弗兰格尔也在南方发动攻势。南乌克兰、顿河、顿巴斯、库班河一带受到威胁。

波军入侵后，红军组织全面反击，由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担任主攻，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叶戈罗夫)担任辅攻。6月5日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突破敌人防线，迅速向西推进。6月12日，基辅重获解放，波军仓惶退却，红军穷追猛打，直至波兰与乌克兰分界的布格河岸。这时，红军要不要渡过布格河，把战争推进到波兰本土，进而夺取华沙？进攻华沙的问题曾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内展开争论。鉴于当时许多领导人寄希望于世界革命早日胜利，大多数人主张继续进攻。7月底，红军进入波兰境内。8月中旬，红军已抵达华沙城郊。红军的进逼，

迫使波兰集结全部兵力于华沙和卢布林一线，准备决战，这一行动得到西方帝国主义和波兰国内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红军则由于进军过快、战线过长而处于不利地位。8月16日，波军发动反攻，使战局逆转，红军一下子后撤400多公里。双方都由于战争而十分疲惫，遂于10月12日在里加签订了停战和预备和约，波兰占领了苏维埃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

在与波兰战争的进程中，苏维埃政府先后与立陶宛(7月)、拉脱维亚(8月)、芬兰(10月)缔结了和约。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是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两个反对派集团，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特点是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内外政策密切相联系的。

“民主集中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等人，他们大都是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观点的继续，他们的活动时期从1918年秋到1921年春。

国内战争爆发后不久，1918年秋，当时担任莫斯科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萨普龙诺夫等人首先反对肃反委员会的体制和权力。他们利用莫斯科的党政组织通过一系列决议，指责地方肃反委员会不受地方的任何监督，无法无天，要求把地方的肃反委员会置于地方苏维埃的领导之下，反对由中央政权机关垂直领导，并认为这样做是恢复官僚主义集中制，还要求党中央修改宣布全国为军营和在国家生活中实行集中化的方针。

1919年3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人认为，官僚主义已深入到一切机构，权力的集中已经超过限度，中央篡夺地方权力的现象已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

主张中央和地方都不要以党代政，要使人民委员会成为真正的决策机关；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反对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反对按照“条条”建立苏维埃机构；要划分军事当局与民事当局的权限，反对军事机关干涉地方的事务。代表大会否决了他们的主张，在其决议中强调指出：党正处在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环境下，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必须绝对执行，在目前阶段党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

1920年3月，萨普龙诺夫等人联名向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关于委员制和一长制的提纲》。提纲认为，委员制是苏维埃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体制的必要基础，除了个别实现军事化企业可以实行一长制以外，任何苏维埃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工厂均应实行委员制。提纲的提出，标志着“民主集中派”的正式形成。该派推派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就经济建设、组织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作副报告。但代表大会对“民主集中派”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民主集中派”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把一般情况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搬用到战时环境中来。他们一方面激烈地反对政治上的集中制原则和严格的纪律，另一方面又主张极左的社会改造政策，要求对生产资料实现“最坚决的社会化”，“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完全打倒资产阶级”，推行彻底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等等。如果说，“民主集中派”的某些政治主张在和平建设时期还有可供吸取的合理成分的话，他们的社会政策则带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明显痕迹。

俄共(布)党内的“工人反对派”的活动主要在1919—1922年间，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略普尼柯夫、柯伦泰、梅德维捷夫、米雅斯尼柯夫等，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的工会领导人。

1919年3月，施略普尼柯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使用专家。他还向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一份提纲，建议由党和苏维埃抓政治，由工会抓经济。在代表大会上，一些工会领导人与“民主集中派”一起主张在工业管理中实行委员制，反对一长制。代表大会批判了这些主张，认为它具有否认党的领导，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工联主义倾向。

1920年9月，梅德维捷夫等人正式组成“工人反对派”，他们认为，党正在蜕化，蜕化的根本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党对苏维埃和工会干涉过多。他们要求实行批评自由和工人民主。这时，国内战争行将结束，党的代表会议接受了反对派的一些正确意见，在决议中提出要充分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调动党内外群众的积极性。由此，“工人反对派”便以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工人反对派”是一个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党内反对派，它的成员往往站在工人和工会自身利益的狭隘立场上，同党和苏维埃相对立，不顾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而他们的理论和主张是错误的、有害的。

必须指出，“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是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中形成的，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是忠贞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某些主张也不无合理之处，但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是错误的。俄共(布)党内同“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争论，在内战结束后又持续了一段时期。

国内战争的结束

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以后，便着手对付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最后一个白卫军集团——弗兰格尔的武装叛乱。这支军队装备精良，队伍比较精悍，尤其在骑兵方面占有相当优势。为

了动员去同弗兰格尔作斗争，8000多名共产党员和2500名共青团员应召走上了前线，开赴南方。伏龙芝被任命为南方战线总司令。

从9月15日至10月15日整整一个月内，红军在南线进行了严酷的战斗，抗击企图占领顿巴斯、进攻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弗兰格尔白卫军。10月底，红军在北塔夫里亚地区发动总攻，一举击溃了弗兰格尔的10万主力军。在这一战役中，红军第一骑兵集团军起了巨大的作用。弗兰格尔军队在受到重创以后，突进克里米亚准备固守。这儿可以凭借强固的防御工事和有利的地形进行顽抗。11月6日夜，红军在敌军的正面和后方同时发动进攻，至11月17日，红军解放了克里米亚。弗兰格尔率残部搭乘英、法的海船，逃往国外。

弗兰格尔白军的被消灭，标志着国内外几股反革命势力的主力的覆灭，国内战争时期基本上结束了。

在远东，高尔察克军的被歼和当地游击运动的开展，1920年春，解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和除外贝加尔湖地区以外的大部分远东地区，迫使美、英、法等国从西伯利亚和远东撤军。但是，日本干涉者仍驻扎在远东的沿海地区，外贝加尔湖和赤塔地区也残留着白卫军。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暂不在远东成立苏维埃，而建立一个"缓冲国"。1920年4月6日，在上乌定斯克召开的贝加尔地区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按其形式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并建立了一支人民革命军，以肃清境内的白卫军残余分子。

然而，日本干涉者指使残余白军于1921年发起新的进攻，切断了远东共和国同苏维埃俄国的联系。至1922年10月，人

民革命军击溃了日本干涉者及其在远东的帮凶白卫军，从而完全解放了全部滨海地区。国内战争全部结束。1922年 11 月14日，远东共和国重新归并于俄罗斯联邦，取消远东共和国，它的领土划为普通行政单位。

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俄国共产党领导下，苏维埃国家和人民终于战胜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胜利地保卫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国内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红军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胜利地击退了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穷凶极恶的侵犯；工人阶级在后方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在饥饿、寒冷和经济破坏的条件下，以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搞好各个岗位上的生产和工作；广大农民群众和各民族人民也都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同心同德，为战争胜利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国际无产阶级对苏维埃俄国的声援，也是国内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在“不准干涉俄国”的口号声中举行群众性集会和罢工，反对本国政府派兵干涉苏维埃。红军中还有来自匈牙利、塞尔维亚、捷克、波兰、德国、保加利亚、中国、朝鲜等国劳动人民组成的国际纵队直接参加了保卫苏维埃俄国的战斗，这是无产阶级国际团结战斗的生动表现。

国内战争的胜利，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同时，也使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第三章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第一节　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国内状况

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危机

1920年末1921年初，国内战争的硝烟刚刚熄灭，俄罗斯大地满目疮痍。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工厂倒闭，土地荒芜，饥荒、瘟疫伴随着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战胜了内外敌人的武装干涉和武装叛乱，但它面临的局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连年的战争使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成千上万个工厂停工，其中包括许多大企业。就总的生产水平而言，俄国倒退了几十年：1920年煤炭产量为 870 万吨，只相等于 1898 年的水平；生铁冶炼量为 11.6 万吨，比 1862 年减少一半；棉织品产量只相等于 1857 年的水平。1920年的工业生产只相等于战前的1/7，交通运输业陷于瘫痪，有 7 万多公里的铁路和将近一半的机车车辆不能使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的作乱使俄国遭受的经济损失达 390 亿战前卢布，相当于 1913 年全国国民收入的1/4。

生产力破坏最严重的是国内战争期间被敌人侵占的地区。

苏维埃国家最重要的煤炭基地顿巴斯被堵塞了或者淹没了大部分矿井，毁坏了各种设备。在1920—1921年度，顿巴斯的煤炭产量总共才450万吨，比1913年减少9/11；1920年乌克兰冶金工业的产量只有战前的4%；石油产量为战前的40%；土耳其斯坦的棉花加工业基本停产，全国215家国营棉纺厂中，只有97家能维持开工生产。

经济的破坏造成工人阶级队伍的涣散、工人成分的改变和工人人数的锐减。1913年，在大企业中的工人有240万人，1920年只有132万人。同一时期，彼得格勒著名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由17000人减到4000人，乌克兰冶金工人由93000人减到40000人。工人阶级的成分也起了变化，许多工人从前线复员回家，却因工厂停工而失业，他们只得靠经营小摊贩度日，或因生活无着而向农村倒流。由于纸币惊人地贬值，当时一个莫斯科工人的工资收入，只相等于他实际消费标准的8—20%。

农业的状况也十分严重。谷物和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缩小了。土地耕种粗糙，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棉花、麻类、甜菜、烟草等技术作物的产量缩减了好几倍，大小牲畜头数也急剧减少了。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艰苦异常，工业品的缺乏和自由贸易的停止，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实行，严重地压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广大农民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抵触。

政治形势动荡和喀琅施塔得兵变

国内战争一结束，长期遭受战乱的俄国人民，迫切要求过安定的生活。可是，由于经济的极度破坏和国内政策存在偏差，使国内局势仍然相当紧张。特别是广大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逐渐演变为普遍的骚乱和暴动。在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

域、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等地处处出现了自发的暴动，参加暴动的不仅有富农，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农。即使没有发生暴动的中部各省、俄国北部和白俄罗斯等地区，农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农民给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粮食机关写了大量申诉信和请求书，其中许多信直接写给列宁。列宁把这些农民信件看作农民情绪的最好的"晴雨表"。奥格涅茨省一个地区的农民在一封信中说，"与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强盗的战争已经三年了，这就需要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和忍受极度的困苦，而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沉重的负担，一会儿动员马匹，一会儿动员耕牛，各种各样的劳役，无休止地征收余粮，等等，我们毫无怨言地承受着这一切重担困苦，但 1920 年对余粮征收额的增加是我们无力负担的，农村缺乏鞋子、衣服和家庭必需的工业品。"坦波夫省一个红军士兵在信中对征收余粮时滥用职权提出了控诉，他在信中说："农民的情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在我们县不很快根绝这类现象，那就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①

1921年 2 月爆发的喀琅施塔得兵变，就是农民这种不满情绪的集中反映。喀琅施塔得是彼得格勒以西方向芬兰湾上的一个海军要塞。1921年 2 月 28 日②，要塞区的驻军发动了兵变，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拥护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建立自由苏维埃！"等，他们要求"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新的完全自由的选举"、"立即取消粮食征购队"、

① 参见《列宁的国务活动》第48—5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2月28日参加兵变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军舰号召开舰员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提出取消余粮收集制、取消政治部、取消共产党的支配地位及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主义政党的15点要求，故有人主张以此日为兵变开始日。也有人主张以3月2日在锚广场群众大会，逮捕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和当地苏维埃主席作为开始日。

"恢复农民自行处理农产品的权利",等等。接着,士兵们组织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接管了要塞区的行政权力,逮捕反对兵变的苏维埃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告喀琅施塔得要塞和市民群众书》,声称"统治着祖国的共产党完全脱离群众,没有力量把群众从全面崩溃的现状中拯救出来","只有靠全体工人的努力和决心,才能给祖国提供面包和燃料,才能让人们穿上衣服和皮靴,才能使共和国摆脱困境"。

喀琅施塔得兵变是苏维埃国家面临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士兵的情绪从本质上说反映了广大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强烈不满,是工农联盟行将破裂的讯号。兵变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某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白卫分子的支持,而兵变造成的政治动乱无疑会有利于国内外敌人颠覆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决不能让兵变蔓延起来。苏维埃政府曾尽力避免流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亲自前往喀琅施塔得,向士兵们进行说服和解释,但没有收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决定派红军平息兵变。当时出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300多名代表随同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所带领的6万红军战士,奋勇冲击,3月16日攻下了喀琅施塔得炮台,3月18日占领了整个要塞,兵变终于被平息了。

苏维埃政府从喀琅施塔得兵变中吸取了重大的政治教训,必须消除农民中间存在的严重不满情绪,为此,必须改变现行的各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正当俄共(布)领导全国人民,为战胜眼前的巨大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的时刻,党内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这场争论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共持续4个月之久。

这场争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托洛茨基挑起争论。11月3日，托洛茨基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会议上发表演说，宣称工会面临"最深刻的内部危机"，解决危机的途径，就是要实行"整刷政策"，"把螺丝钉拧紧一下"，提出了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和劳动军事化的主张。这篇演说引起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等人的强烈反对。在紧接着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的提纲被否决，全会决定把工会问题提交一个专门委员会在小范围内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不宜把中央内部分歧诉诸广泛的讨论。但托洛茨基拒绝参加专门委员会，坚持要把他的意见在党报上公布。

第二阶段：争论公开化。1920年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撤销了十一月全会关于不把中央内部分歧公开讨论的决议，决定把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讨论，并在不久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展开讨论，以形成统一的决议。同日，在一次群众性集会上，托洛茨基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托姆斯基作了副报告，这是争论公开化的启端。12月30日，列宁以《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为题发表演说，参加争论。1921年1月12日，俄共中央全会决定，必须完全自由地进行争论，任何组织和派别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第三阶段：全党围绕工会问题的不同纲领进行争论。从1月中旬开始，党内先后有8个派别提出关于工会问题的纲领，他们是：由列宁、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等人共同签署的《十人纲领》，还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等人的"缓冲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伊格纳托夫派，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各种

相近的观点开始合并，到3月初，剩下了三个工会问题的纲领，即：以列宁、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十人纲领》、《托洛茨基—布哈林联合纲领》、"工人反对派"提纲。

第四阶段：争论的结束。3月8—16日俄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关于工会问题，季诺维也夫代表《十人纲领》的拥护者作报告，托洛茨基代表《托—布联合纲领》派、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作副报告，各派另外推派两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开展辩论，并进行表决。结果，336票拥护《十人纲领》，《托—布联合纲领》得50票，"工人反对派"得18票，通过了以《十人纲领》为基础起草的《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以列宁为代表的关于工会问题争论中的正确主张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和平建设时期到来的时候，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对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产生认识上的分歧，是不奇怪的，它可以在较小范围内通过实事求是的讨论取得一致的意见。可是，托洛茨基不顾大局挑起并使其成为全党的一场争论，从而分散了党对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恢复经济的注意力，被迫把许多精力放在工会问题这个不十分紧迫问题的争论上，这是托洛茨基的一个错误。其次，托洛茨基在争论中提出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和"工会军事化"的主张，都带有强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左"的倾向，不符合广大工人群众在和平建设时期到来的时候，要求工会推行民主原则，扩大民主，为工人说话办事，成为党和群众联系的纽带的愿望。所以，列宁明确指出，工会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①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6页。

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粮食税制的实行

1920年底，列宁就开始酝酿调整经济政策。他阅读了许多农民的来信和申诉书，亲自接见了各地的农民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列宁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摘记了一次非党农民会议上听到的意见，其中喀山省的农民说："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掉"。彼得格勒省农民说："我们那里发生过把手枪对着人家太阳穴这样的强制行为，人们很气愤"。吉尔吉斯的农民说："粮食被收集得象扫帚扫过一样干净，一点也没剩"①。列宁把这些意见转发给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参阅，要求人们重视农民的这些情绪和要求。

1921年初，列宁着手准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探索新的经济政策。2月8日，他写成《农民问题提纲初稿》。这一文件提出以下要点：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减低粮食税额；同意使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在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获得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和支配其纳税以外的余粮。以这一提纲为基础，党中央成立了由瞿鲁巴、奥新斯基、加米涅夫等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着手起草关于用征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并于2月18日完成初稿。

鉴于农民不断地派人前来莫斯科上访和申诉，2月中旬列宁在接见坦波夫省农民代表时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

---

① 《列宁文稿》第3卷第387—389页。

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我请求他们清醒过来并帮助自己的政权"①。

1921年3月8—16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必须始终力求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确立合理的经济关系；通过自由贸易周转刺激农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周转是工农业之间经济结合的形式。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法令规定：取消作为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办法的余粮收集制，实行实物税；实物税额应低于到目前为止实行余粮收集制方法征收的税额；随着工业的恢复，苏维埃政权将用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及早公布实物税税额，以使土地耕作者在春耕开始前就尽可能确实知道自己承担义务的数额；完成纳税义务以后剩余的全部粮食、原料和饲料储备，归土地耕作者自行全权支配。七天以后，苏维埃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1921—1922年的实物税税额为2.4亿普特，比实行余粮收集制时少征购2亿普特。具体说来，粮食降低43.3%，油料籽低50%，肉类低74.5%，亚麻纤维低93.3%。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实行粮食税以后，1921年度农业虽然遇到灾荒而歉收，但仍征得实物税1.62亿普特，并通过商品交换的办法采购0.6亿普特，两者合计国家共获得粮食2.33亿普特，第一年就取得了好的成效。1922—1923年度国家获得粮食就上升为4.3亿普特，1923—1924年度为3.97亿普特，1925—1926年度为4.96亿普特。其他农产品的国家采购量也有较大增长，1921—1922年度到1925—1926年

① 转引自根基娜著：《列宁的国务活动》第109页。

度，油料籽增加3.2倍，动物油增加2倍，籽棉增加27.5倍，畜皮增加1倍，麻类和其他工业原料都有增加，这是农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俄共(布)中央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成果。

租让制和租赁制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全部工业企业实现了国有化。新经济政策实施后，重新提出把国家无法经营的企业出租的问题，出现了租让制、租赁制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一大批小规模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早在1918年初，列宁就提出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把它作为过渡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的经济形式。由于战争的突然来临，没有来得及加以实践。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认为在苏维埃社会里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租让制就是将一些有利于加速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厂矿企业、油田、森林等等，按照一定条件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1920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的法令(通称《租让法令》)，法令规定，苏维埃国家可以与殷实可靠、值得信任的外国资本家订立租让合同，以开发和加工俄国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等)，还规定了承租者可以获得一部分产品作报酬，在贸易上享有优惠等法律保障。同时规定承租人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令，缴纳租金和税金，对雇佣的俄国工人必须保障他们的生命和健康等。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则进一步肯定了，凡属能够提高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民经济部门，均可以作为租让对象。租让期限一般为20年以上。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种种因素，租让制

在俄国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截止1925年4月1日，工业企业中有91份租让合同生效，投入租让企业的资金共3200万卢布，租让企业的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不足1%。

租赁制是指国家把一部分中小企业出租给私人或合作社经营，承租人也可以是原业主或原承租人。1921年7月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出租条例》，条例规定，对于已经倒闭或暂时无力经营的国营企业，均可租给合作社、协作社及公民个人经营；承租人有权接受私人定货，生产的商品可以到自由市场销售，可以同私人或国家机关订立承包和供货合同等。租赁企业的期限最长为6年。到1922年底，出租的工业企业约4000个，工人总数为7万人，租赁企业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3%左右。租赁企业主要是食品加工工业和轻工业部门的一些小企业。

1921年7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手工业和小工业》的法令，允许苏俄公民可以自由从事手工业和开办雇佣工人不超过20人的小企业。同年12月10日法令又规定，将已经国有化而雇工在20人以内的小企业发还给原业主。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从1922年到1925年，注册的私人工业企业从856个增加到1786个，这些企业的工人人数从20400人增加到60500人。

租让制、租赁制和私人企业的发展，有助于苏维埃国家从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

实行新经济政策，在流通方面，由国家垄断贸易改为自由贸易，允许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自由贸

易，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杠杆。

当个体小农在缴纳粮食税以后，既然国家允许他们自由支配自己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些粮食和农产品中的一大部分便立即变成商品，不可阻挡地涌入市场。因此，开放自由贸易，促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是建立工农之间正确关系的客观要求，也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一开始，苏维埃政府打算，通过粮食税和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这种"商品交换"，是国家以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及农产品，是进行实物交换，不通过市场，不需用货币，不经过私商和中介人，而"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地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但不久，实践生活证明这种直接的"商品交换"是行不通的，列宁指出，"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业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①。

苏维埃政府重新研究了商品交换的性质和形式，纠正了对商品货币关系的狭隘认识，跨出了新的步伐。1921年8月，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指出，为了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尤其要恢复货币流通，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实行货币交换方式，以全面恢复商品货币关系。1922年12月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决定，把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党的"基本任务"。

苏维埃政府随即取消了商品交换的地区限制，并使商品、工资、税务等货币化。改组了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商业体制，成立了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对国内贸易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整，在商业中也运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这样就把整个商业由商品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页。

换制转上货币交换制的自由贸易的正常轨道。经过国家大力调节商业，商品货币关系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21年10月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重建国家银行，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让国家银行至迟在11月15日前开业。公私商业网点也迅速扩大。1922年下半年，全国公私零售商业(不包括小商贩)已达47万多家。商业的全面恢复和人民购买力的迅速提高，也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显著成就。

列宁探求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实践证明，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大转变，也进一步证明了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曾经持有的"直接过渡"的思想是错误的。列宁的伟大，不在于他永远不犯错误，而在于他能够体察民意，审时度势，尊重客观规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中，列宁一方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行反思和总结，另一方面又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不断探索。从1921年4月他写的《论粮食税》到逝世前口授的《论合作制》等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正是通过新经济政策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1922年初写道："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① 虽然，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久，列宁就卧病不起，过早地去世了。但是，就在这2—3年内，他始终致力于探索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的"方法和形式。他的主要思想有以下几方面：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82页。

第一，寻找一条无产阶级国家同千百万小农之间联系的纽带。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农民必然占人口的多数，而农民又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因此，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对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仅实行余粮收集制，而且力图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农村去，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和农业公社。集体农庄数从1918年的1400个发展到1920年的10500个，少数县甚至宣布要立即实现全盘集体化。这些集体农庄和农业公社办得松松垮垮，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列宁于1920年12月就尖锐地批评集体农庄"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并认为"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①。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国家鼓励农民个体经营，允许贸易自由，国家通过商业进行调节，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把分散的小农联合起来。列宁认为，这样做就找到了无产阶级国家对农民的私人利益检查监督的尺度，找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②。

第二，寻找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中间环节。1918年初，列宁曾提出过"间接过渡"的思想，并试图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思想"。所以当遇到严酷的战争和极度的贫困，使商品市场经济的作用大大减弱以后，就误以为可以越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由一个小农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逐渐觉察到这种认识的空想性质，逐渐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页。

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避免地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①。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共产党人必须懂得并紧紧抓住商业这个"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②。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列宁向全党发出"学会经商"的号召。

第三，国家资本主义可以作为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不同，它是一种"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③。在大工业基础薄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从生产力方面说，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同机器大生产相联系，它比个体的分散的手工小生产要优越得多；从生产关系方面说，它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它比起小生产经济、宗法式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来，是一种更先进的经济形式。因此，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高于现时经济，而在政治上并不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感到可怕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长处，更不应该简单地加以抛弃，而应充分利用这些长处，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重视对本国国情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各级检察监督机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新经济政策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8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27页。

实施后不久，就取得许多令人注目的成就，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①。

第三节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

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民族政策

在十月武装起义时同时召开的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就明确宣布，苏维埃政权保障俄国境内各民族拥有真正的自决权。11月2日(俄历)，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一著名文件庄严宣布，在俄国消灭民族压迫，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直至实行民族自决。它指出，在沙皇专制时代，俄国各族人民不断地被唆使互相残杀，又遭受共同的民族奴役。现在这种时代结束了，俄国各族人民应当友好相处，实行民族自愿和真诚联盟的政策。宣言宣布了苏维埃共和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则：(1)俄国各民族的平等和主权；(2)俄国各民族的自由自决，直至分立和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3)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4)居住在俄国领土内的各少数民族与民族集团的自由发展。11月20日，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这一文件宣布，穆斯林人民的信仰、风俗、民族和文化制度今后是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苏维埃政权将全力保卫和维护俄国各族人民的权利。并宣布苏维埃政府完全废除沙皇政府签订的、又被临时政府确认的关于强占君士坦丁堡、瓜分波斯和土耳其的各种秘密条约，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02页。

东方各族人民应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立即承认了波兰的独立和自决的权利。12月，应芬兰政府的要求，承认了芬兰的独立。同时，苏维埃政府承认乌克兰独立，同意它分离或者与苏维埃俄国建立联邦关系。

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宪法把俄国各民族之间新型的相互关系的原则从法律上固定了下来。

1918年7月、1920年9月、1923年9月，苏维埃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的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的所有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从中国夺得的一切无偿地永久地全部归还中国。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维埃政府的这项政策只是部分得以实现。

到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存的，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5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同其他共和国之间分别缔结了条约，形成了军事、经济上的同盟关系。此外，俄国无产阶级竭力帮助自己境内的少数民族组织自己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从1919年到1922年年初，参加俄罗斯联邦的有巴什基尔、鞑靼、吉尔吉斯等19个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

在新的形势下，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统一成一个联盟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鉴于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各民族人民又受到沙皇专制制度和大俄罗斯民族的奴役和蹂躏，所以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不是轻易能够消除的。列宁一开始就提醒全党注意

防止和克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针对某些共产党员不尊重各民族的独立权利，在诸如领土归属等问题上不愿向少数民族共和国作丝毫让步。对此，列宁尖锐地指出："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在我看来，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斗争"①。

根据列宁和俄共(布)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苏维埃政府先后承认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独立，这些国家原先都是沙皇俄国的附属国。1917年12月31日，列宁签署了苏俄人民委员会关于承认芬兰共和国独立的决议。1918年8月，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沙皇政府有关瓜分波兰的条约，承认波兰独立。但直至1920年苏俄与波兰的战争结束后，两国才签订和约。1920年，苏俄又分别同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缔结了和约。

格鲁吉亚问题

1922年，各苏维埃共和国酝酿成立一个联合的整体——苏联。8月俄共(布)中央成立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拟定共和国联合的原则和方案。斯大林随即提出一个《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草案，即所谓"自治化"方案。按照这个方案的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换句话说，由俄罗斯联邦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去领导和管理其他自治共和国。这个带有明显的大民族主义倾向的草案受到大多数民族国家党政领导人不同程度的反对和提出异议，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66—167页。

其中以格鲁吉亚最为激烈。然而，在9月下旬召开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仍以多数票基本上通过了"自治化"方案。

遂后，这一方案送交正在哥尔克村养病的列宁。列宁对这一方案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方案第一条中"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批评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操之过急"。

根据列宁的建议，斯大林表示愿意修改方案。但新草案提出由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结成联盟。这就是说，新草案中以"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代替原先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三个南高加索的民族国家，这三个国家必须先联合成为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然后才能同俄罗斯等结成联盟。这一修改未告诉列宁。10月初，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列宁因病未能出席。他预感到成立苏联的问题上大俄罗斯主义的干扰严重，特地写了一张便条交给全会，他写道："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要绝对坚持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绝对！"① 然而，十月中央全会以后，问题没有解决，症结在于格鲁吉亚等国家要不要通过先加入南高加索联邦再联合成为苏联。列宁对这一点未表示明确意见，斯大林和以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俄共（布）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坚持要求格鲁吉亚等国先加入南高加索联邦，而以穆迪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则要求他们也要象乌克兰、白俄罗斯那样作为平等的独立共和国联合成为苏联。这种情况下，格鲁吉亚领导人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16页。

义"，并以此分别给予党纪处分。穆迪瓦尼等人不服，便不断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申诉。这便是格鲁吉亚问题的来由。

11月下旬，俄共(布)中央派出一个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前往梯弗里斯调查格鲁吉亚问题。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有很大的倾向性，他们偏听偏信，认为奥尔忠尼启泽和党的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做法完全正确，而穆迪瓦尼等人则犯了"民族主义"的错误。正在这时，又发生了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问题，使得围绕格鲁吉亚问题的争论更趋激烈。

12月中旬，列宁接见了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捷尔任斯基并听取了他的汇报，这次谈话使列宁对格鲁吉亚问题深感忧虑和不安，然而由于第二次中风，使他未能对这一问题立即进行干预。直至病情略有好转时，于12月30、31日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阐述了共产党执政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主要原则，批评了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泽在处理格鲁吉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错误。列宁强调指出，大民族即从前的压迫民族对少数民族要"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①。

可是，由于列宁的上述信件当时未送交俄共(布)中央。1923年1月，政治局仍然批准了捷尔任斯基的报告，并同意撤换格鲁吉亚党政领导人。问题仍未解决，反而更加棘手。此时，苏联已告成立，穆迪瓦尼等人被调离格鲁吉亚。1月下旬，病中的列宁要求调阅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材料。3月初，列宁在弄清格鲁吉亚问题的事实真相后，打算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写信给托洛茨基，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3页。

寻求托洛茨基对自己提案的支持，并写信给穆迪瓦尼等人表示对他们处境的关注。然而，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这一信件成了列宁生前的最后一封信。此后，列宁再也不能过问国家大事，格鲁吉亚问题就不了了之了。

苏联的建立和苏联第一部宪法的制定

1922年10—12月间，各加盟共和国普遍举行了省、县、乡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讨论了各共和国联合成联盟的问题。

11月30日前，俄共(布)中央的专门委员会拟订出了苏联宪法的主要条款。这些条款在得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赞同后，分发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内进行讨论。12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草案，并建议召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此期间，乌克兰、南高加索、白俄罗斯分别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工农群众大会，一致拥护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2月30日上午，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团开会并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上签字。当天晚上，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2215名，代表名额按各共和国的人口比例确定，俄罗斯联邦的代表有1727名，乌兰克的代表364名，南高加索联邦的代表91名，白俄罗斯的代表33名。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他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

代表大会基本上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决定提交各加盟共和国审查。大会责成联盟中央执

行委员会在听取所有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最后意见后，即可以批准宣言和条约并立即生效，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批准宣言和条约的最后全文。宣言指出，只有统一的联盟国家才能保证对外安全和国内经济繁荣，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自由。它宣布联盟国家的组织原则是，在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苏联各族人民的自愿、平等和兄弟般的合作。无论是现已存在的，还是将来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随时都可以加入苏联。条约规定了各共和国加入联盟的手续和宣布了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大会还选出了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加里宁、彼得罗夫斯基、切尔维亚科夫、纳利马诺夫等4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苏联的国家组织纲领。这一纲领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和对联盟中央权力机关的关系上，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

1923年7月，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苏联宪法草案，决定批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根本法（宪法)并立即生效。会议批准了第一届联盟政府——以列宁为首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开始工作。7月13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布《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告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政府书》，向世界各国宣告了苏联的正式成立。1924年1月，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第一部宪法，它用宪法形式确定统一的联盟国家是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联邦结构的最高形式。

苏联宪法明文规定了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的成果，确认了各族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条件地承认各族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宪法确定了各平等民族联合的自愿原则，各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现有的或将来成立的各苏维

埃共和国可以随时加入联盟。

联盟的权限包括对外政策、对外贸易、建设武装力量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其他方面则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范围。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两个平等的院组成，即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联盟院和由各共和国和民族州的代表选举产生的民族院。每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各选出5名代表，每个民族自治区域选出1名代表组成民族院。实行两院制，使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找到了一种保证调动各民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的适当的机构形式。

1925年，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又接纳土库曼共和国和乌兹别克共和国加入苏联。截止1925年底，加入苏联的共有6个加盟共和国、15个自治共和国和16个自治州。

第四节　列宁逝世前的国内政治生活

列宁的"遗嘱"问题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极端复杂的斗争和艰苦的生活，长年累月的紧张和劳累，以及1918年遇刺留下的枪伤，严重地损害了列宁的健康。从1921年年底起，他就经常患病和休养。1922年5月下旬，列宁第一次中风，开始时半身瘫痪并丧失说话能力。不久以后病情有所好转。10月初重返克里姆林宫工作。然而，病魔一直缠着他。12月中旬，第二次中风，整个半身瘫痪，丧失独立工作能力。由于列宁的力争，政治局会同医生商量后，同意给列宁每天5—10分钟口授时间。从12月中旬至1923年3月上旬，列宁口授了《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论文以及一批书信。其中最重要的信件，便是12

月下旬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即著名的"遗嘱"。

列宁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遗嘱"。所谓列宁"遗嘱"，是后人对他患病期间提出的一些思想和主张的称呼。所谓"遗嘱"，从广义上讲，是指这一期间列宁所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今后应遵循的路线和政策，其主要之点在于正确处理对构成俄国居民80%的农民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从狭义上说，是关于执行路线政策的干部问题，其中主要是党的领导人的继承问题。被通常称作列宁"遗嘱"的是指12月23、24、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对12月24日的信的补充。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中风后，列宁确实考虑过，他一旦去世，国内将出现什么样的政局？党和国家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据他看来，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很可能是由于党的领袖人物之间的冲突而酿成。对于党的领袖集团中各个成员的个性及品质，列宁是谙熟的。他在世时，也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调节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同心协力，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可是他去世后，领袖集团中因不同的个人性格和品质而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很可能导致党的分裂。列宁提出保持党的稳定性的问题，他尖锐指出："问题基本在于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①

接着，列宁对6个最高领袖人物作了评述，其中主要是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评述。列宁认为，斯大林、托洛茨基是当时中央最有能力的两个人，但是，列宁担心："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② 信中列宁告诫人们对托洛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8—3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要过于纠缠历史旧帐。信中列宁称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①] 从信中对6个人的评语可以看出，列宁对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在肯定他们主要方面的优点、才能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他们的弱点和缺点，但没有全盘否定其中某个人的意思。列宁在信中没有指定个人接班人的意思或暗示，当时俄共(布)党内的领袖制度也不容许指定个人接班人。后来有人把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标志，托洛茨基也曾自称列宁曾有意让他当继承人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列宁1923年1月4日补充信中提出要求，由于斯大林"太粗暴"，他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另选更合适的人担任总书记，这也只是列宁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的一条建议，而不是对党组织发出的一项指示。列宁是遵守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在个人与组织关系问题上，他从不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

列宁的"遗嘱"中，他对自己去世后的党的领导人问题确实有所考虑。但他考虑的出发点是，如何防止党的分裂，保持党的集体领导的稳定性，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接班人问题。列宁的着眼点不是放在个人交接班上，而是寄希望于集体领导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检察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他指望通过这些，使领袖集团能够经受风浪的考验，不因他本人的去世而陷于混乱，也不因日后领袖人物之间的某些分歧和冲突而造成党的分裂。

可是，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争论双方都竭力求助于列宁的权威。反对派指责斯大林隐瞒列宁的"遗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嘱”，斯大林则利用“遗嘱”的某些话来回击反对派。因此，“遗嘱”的主要内容，在20年代后期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在苏共二十大以前，“遗嘱”始终没有公布。

列宁对改革国家机关的构想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一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关心党政各部门的工作，从事繁重的国务活动。早在苏维埃建国之初，列宁就强烈地感受到官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侵蚀。国内战争结束后，国家机关的工作日趋正常，但列宁敏锐地觉察到党和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现象日益滋长，对此，他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忧虑。他尖锐地指出，在苏维埃国家机关里，存在着严重的“旧机关的残余”，存在着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等等弊端。列宁认为克服这些弊端是关系党和国家盛衰兴亡的大事。1923年初，列宁在病中为改组工农检查院而口授的一系列文章，就是他为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而作出的重要步骤。

列宁为什么对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亦称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予以极大的重视和关注？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国家管理机构，其职责是对国家机关的各部门工作实行监督和检查。列宁认为，这个部与其他国家机关不同，它应当充分依靠工农群众，直接吸收工人农民参加这一部门的工作，使工农群众在实践中培养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提高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它应当是工农群众学习管理的学校，成为检查和改善整个国家管理的机构。

可是，原先这个专为反对官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机关，在短短几年内，它本身变成了一个臃肿不堪的、官僚主义严重的机构，它拥有12000名职员，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工人。列

宁认为，苏维埃国家机关“整个说来受旧的精神的束缚和渗透最严重”，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尤为严重，“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①列宁的这个批评主要是针对斯大林的，因为自1919年3月至1922年4月，斯大林一直担任这个部的人民委员。

在列宁看来，只有从根本上采取坚决措施来改革国家机关，才能担负起无产阶级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任务。而工农检查院在这方面应当发挥特殊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设想，改组工农检查院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精简人员，二是合并机构。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应当有力地维护党的统一，它“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②

列宁十分强调改革国家机关的必要性，但他郑重地告诫人们，从事这项工作“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材，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③因为要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材，除了必须具有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品质以外，还必须使他们具备必需的知识和文化，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列宁病重期间，对防止党的分裂，保持党的稳定性，对吸引千百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对改革国家机关，克服官僚主义，对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遗憾的是，他已无法亲自实践

① 参见《列宁文稿》第4卷第449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70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0页。

去解决这些问题，况且有些设想本身还不完善。例如他看到了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但还没有从如何建立完备的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制度方面加以考察和分析，由于健康原因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是带着许多思想上的困惑和忧虑离开了人世。他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理论遗产，也留给后人许多党和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解决。

托洛茨基的“新方针”和全党争论

列宁1922年12月第二次中风后，基本上已退出政治活动的舞台。1923年3月上旬第三次中风以后，完全失去了知觉和工作能力。党中央形成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两派由于政治见解和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以及权力斗争的因素，导致了列宁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第一次全党争论。

实行新经济政策两年多后，国民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1923年秋又遇到新的困难。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加上卢布继续贬值，严重影响了工人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购买力水平。工业品并不丰富，但由于价格昂贵，许多人购买不起，反而形成积压，产生所谓“销售危机”。在政治生活方面也出现一些问题，党内民主缺乏，官僚化现象日趋严重。广大党员和干部要求改善党内生活状况，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呼声相当强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研究如何改进党内制度并提出建议。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向党中央发出一封批评中央工作的信件，信中指责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10月15

日，由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萨普龙诺夫等46名党的负责干部联合签署了一份给中央政治局的声明。声明中说："我们看到党正在日益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由上层选定的党的职业官员和不参加他们派别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了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① 10月25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扩大的联席全会，全会认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中央决定不公开发表党内分歧的任何材料，以避免在这困难的时刻引起新的争论。

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党的新任务》一文，明确表示要活跃党内生活，克服停滞状态，使党内的民主制在更大程度上更加具体地体现出来。12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并在12月7日的《真理报》上全文发表。决议是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致通过的，它表明中央愿意接受批评，扩大党内民主，健全和活跃党内生活。

就在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公布后第二天，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给党的公开信》，信中用自己的观点解释党中央的决议精神，并要求《真理报》予以刊载。《真理报》编辑部不同意这封信提出的观点，但仍于12月11日全文刊载。接着，托洛茨基又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写了10篇争论性文章，《真理报》刊载了其中3篇，其余均收入《新方针》为题的小册子中。托洛茨基的新发动，使党内争论公开化并且激烈起来。

---

① 《共产主义史料》1960年纽约英文版第239—240页。

托洛茨基在《新方针》中说，"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只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军这一革命因素。否则，老一辈就会僵化，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①。托洛茨基的这些言论中对防止和克服党的机关产生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出一些阐述和分析，包含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他提出所谓"老近卫军蜕化"，影射老布尔什维克蜕化，又无原则地吹捧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这样就把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对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十月革命前夕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托洛茨基，把自己置于同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相对立的地位，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的愤慨。所以，这篇题为"新方针"的信一发表，立即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引起激烈的争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支持托洛茨基观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等人驳斥和批判托洛茨基的观点。《真理报》先后发表所有这些人的文章。

12月28日起，《真理报》连续5天用大量版面连载了题为《肃清派别活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答托洛茨基同志)》的长文，系统地揭露了这场争论的实质以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批判托洛茨基在《新方针》中提出的错误观点。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也都支持党中央多数派的路线。

1924年1月16—18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会上由斯大林作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正在

① 参见《真理报》1923年12月11日。

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历时四个月的关于“新方针”的争论，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失败而告终。

列宁逝世

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郊外哥尔克村逝世，当天深夜，俄共(布)中央为列宁逝世举行全会。1月23—27日，莫斯科成千上万名工人、农民、红军士兵满怀悲痛的心情，冒着严寒，列队前往圆柱大厅向自己的领袖告别。1月26日在苏维埃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的追悼会上，加里宁、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蔡特金和加米涅夫先后发表悼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先后在报纸上发表悼文。为了表示对列宁的怀念，党中央决定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并决定出版《列宁全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年4月22日生于俄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投身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行列。90年代起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就矢志不渝地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以无比的毅力和特有的胆略，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时机，适时制订了武装起义方针，率领全党和革命群众一举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列宁的一大贡献。

列宁更伟大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现实的社会主义却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了胜利。书本不等于现实，落后的俄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带来更多的新问题，要求人们去解答，去探索。由于完全缺乏经验，列宁相

当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设想，并注意在实践中运用和检验。然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按图索骥，到书本上去寻找社会主义模式，还是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人们认识上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没有把目光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十分注重实践，尊重群众的创造，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因此，他能经常地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以便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列宁提出了许多新鲜见解，抛弃了某些陈旧的观念，使他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如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有些问题，他虽然敏锐地觉察到了，但已来不及去解决了；如经济建设中的有些问题，则由于实践还没有提上日程，他也无法清晰地预料和提出具体的见解。列宁没有完成自己的探索，过早地逝世了。但是他那种勇于实践，重视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列宁的理论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在时代、革命、专政、政党、民族、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据新的形势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尽管人们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各异，但整体上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这是无疑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观念的束缚，列宁在理论阐发中也难免带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他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也有估计不足之处，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一度过于乐观，等等。当然，所有这些，后人是不应苛求于前人的。

列宁的一生，是伟大的革命家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

第四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成就和问题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状况

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

革命胜利后，宣布了土地国有化，经过土地改革和国内战争，消灭了地主阶级，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富农的经济力量，富农使用的土地锐减，2000多万户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并在这些土地上耕种，在农村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农化"的现象。这些农户平均播种面积为2—3俄亩，拥有一匹马和一头母牛，当时俄国农村最典型的"中农"，大体上都拥有这些生产资料。新经济政策时期，中农约占农户总数的60%左右。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21年底，列宁在谈到这点时说："粮食税减轻了全体农民的负担。这是用不着证明的。问题不在于拿了农民多少粮食，而是在于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觉得心里更有数了，经营的兴趣也提高了。实行了粮食税，勤劳的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是大有可为的。"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40页。

然而，实行粮食税不能解决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全部问题。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还在于广大农民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和大批劳动力的流散。除土地以外，约有25%的农户没有耕畜，60%的农户只有一头耕畜，农具缺乏，农业机器极其罕见；而当土地分散给贫农、中农使用以后，大批农户家中劳动力出现剩余，出现大量"闲散劳动力"，这批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造成农业生产中强壮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在这种情况下，当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繁重任务摆到每一家农户面前时，农村中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户由于缺乏生产资料或缺乏劳动力而不能很好地经营自己的土地。于是，农村中自发地出现了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力的现象。

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和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分别提出了新形势下土地政策的指导原则和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毫不动摇地保持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巩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给农村居民以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以保证农民得以正确经营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①。苏维埃代表大会还委托农业人民委员部制定土地法典。

为了尽快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农村中普遍出现的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力问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922年5月22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土地劳动使用法》。这一法令首次明确规定，准予土地的劳动出租(土地使用权的临时转让)和劳动农户中辅助性地使用雇佣劳动。

《土地劳动使用法》规定，对于因遭受自然灾害(歉收、火灾、牲畜倒毙等)或因死亡、临时外出、应征入伍、被选举担任社会职

①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文件集》第1卷第185页，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

务而造成劳动力不足的劳动农户，准予出租全部或部分土地，收取货币、产品或其他形式的报酬作为租金。出租期限不得多于三年。并规定承租人不得把土地转租给其他人。法令规定，农户以自己的劳动力或者农具不能及时完成所必需的农活时，准予在劳动农户中使用辅助性雇佣劳动，条件是雇主家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必须同雇工平等地劳动。法令还分别规定不同农户雇佣工人的数额。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允许出租土地和使用雇佣劳动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掘和利用有剩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的农户的力量，来扩大耕地面积，使广大贫苦农民迅速摆脱贫困状态，使农业生产得以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允许土地出租和使用雇佣劳动，是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一项重要决策和法令，是保障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措施。

在《土地劳动使用法》的基础上，1922年10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土地法典》。两项文件基本精神相同，后者只是进一步放宽了出租土地的期限和使用雇佣劳动的范围。

1922年上述法令公布以后，土地租佃和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户逐年增加。1922年，发生土地租佃关系的农户占总农户的2.8%，1923年为3.3%，1924年为4.2%，1925年为6.1%，1926年为17.4%，1927年为14.2%；出租土地数额1923年为300万俄亩，1924年为450万俄亩，1925年为700万俄亩，1926年为1090万俄亩，1927年为1330万俄亩；1922、1923年，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户占总农户的1%，1924年为1.7%，1925年为1.9%。① 上述情况表明，革命胜利以后，起初主要靠行政措施来调整农村的土地关系和社会结构，而今逐步以准予自由选择土地使用形式为

① 转引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463页，1980年三联书店版。

主的经济调整措施来进行了。这是符合当时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提高了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的积极性，也提高了殷实的农民阶层的积极性。

1925年4月，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农村经济贫困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特别需要切实清除一切阻碍农民经济(其中包括富裕的农民阶层)发展和巩固的行政上的障碍，同时需要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措施，向那些在农村中放高利贷和对贫农进行奴役性剥削的富农进行斗争。决议明确提出，允许农民根据土地法典更广泛地享有出租土地的权利。出租期可延长至12年。并准予在承租土地上使用雇佣劳动，改变了原先只允许在自己份地上使用雇工的规定。此后，1926年又对《土地法典》作了补充和修改，重申不仅可以在份地上，而且可以在承租地上使用雇佣劳动外，还明确规定，既可以在各个农忙期间，也可以在整个农业年度内使用雇佣劳动力。

农村经济政策的逐步放宽，反映了随着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农村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了不断调整，而新经济政策本身所拥有的较大的灵活性，就能够易于适应这种调整。因此，总的说来，土地租佃和雇工政策的颁布和修订，是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

20年代中期的农村阶级状况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

20年代，俄国农村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有3条：占有耕地的面积；占有生产资料状况；年平均收入的多少。在那个年代里，农村的阶级状况，主要有三个阶层的农民所构成。

其一，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缺乏生产资料、没有耕畜的经济力

量单薄的农户。这批农户的出现，是由于连年的内战以及由内战造成的严重的经济破坏所造成的，在恢复时期内又遇到几年的歉收，使缺乏农具和耕畜的农户陷入困境。有一户贫农在给苏维埃政府的信中说："我们由于遭受战祸，现在除了农具以外，连一头牲畜也没有。我们这些天生的农民没有马匹就象鱼没有水一样不能生活。请你们来看看我们的困苦生活吧，别让我们到春天还没有耕马；如果我们有马匹，那就可以保障我们全家的生活并为国家做出贡献。"往往就是这些农户，他们不得不出租土地或受雇于人。党和政府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建立合作社等方法来帮助这些农户摆脱贫困，然而，在短时期内，国家还无法从根本上帮助这些农户改变境况。解决这个问题，在个体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出路是扩大农产品的商品率，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从农村经济的现实出发，采取合法地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动力的政策，虽然使一部分富裕农户从中得利，同样也使缺乏生产资料和劳力过剩的贫农得利，这样做富裕户和富农就不能任意压低租价和克扣工价了。更重要的是，可以搞活经济，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苏维埃政府实行这些政策，"并不是想向富农让步，而是由于无法帮助贫农马上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经济。贫苦农民由于无法从国家和合作社得到必要的帮助，而宁愿受雇"①。

其二，农村进一步中农化，中农成了农村的中心人物。中农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是发展商品流转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中农的经济活动，对发展农村经济和活跃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中农政治态度的向背，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工农联盟的根本问题，就是支持贫农，跟中农

① 《李可夫文选》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结成巩固的联盟，同富农作斗争。而要团结中农，就要制订对中农的正确政策。苏维埃政府允许土地租佃，但禁止土地买卖，这不但是因为土地是国有财产，而且这样做，就能有效地防止中农的分化，保持中农的稳定。又如对富农不再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种打击和剥夺的方法，这也是使中农保持稳定，积极经营的良策，因为中农在经济上更易于接近富农。总之，谨慎地制定农村经济政策，决不侵犯中农利益，才能有效地使中农脱离富农的影响，同贫农结成联盟，一起同富农作斗争。

其三，区别对待富裕农户和富农。关于富裕农户和富农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因而在党内外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俄国富农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受到过严厉的打击，富农户数减少，他们的经济力量大为削弱。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一部分中农由于政策放宽，善于经营，成了富裕户；也有一部分殷实农民和富农，利用原有的生产资料的优势，通过租用耕地及使用雇工，使其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当然，也有一些富裕农户和富农，通过控制合作社，从事放高利贷活动及其他剥削手段，获得发财致富的机会。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业生产力得到普遍的恢复和发展，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一大批贫农上升成为中农，一部分中农变成了富裕农户和富农，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但又是难以准确划分的，党和政府一时难以制订在新经济政策下重新划分阶级的标准。因此，1925年前后，对什么是富农，界限不清；对富农危险性的估计，认识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农村政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构成斯大林、布哈林和“新反对派”之间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不少人把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富裕起来的农民一概称之为“富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例如，在一些地区，有的农民精耕细作，勤于轮作，

每俄亩土地上可收获40普特谷物，而邻近的农民每俄亩只收获2普特，这种收益上的差异可不可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呢？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在一个报告中明确地说，那些由于在耕作方面的先进和革新，由于同农民经济自发性作斗争，由于实行了种种改革而变得富裕的农民，"是优秀的苏维埃农民"，"我们的最亲密的朋友"，"是我们苏维埃的优秀助手，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列为富农"。只有那些用某种手段剥削其他的农户，靠农民的贫困、愚昧和无组织而发财致富的人，靠剥削其他农民而生活兴旺起来的人，才能"列为富农"①。

十分明显，20年代中期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党和政府没有采取反对派所要求的严厉打击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而是采取从实际出发，谨慎对待的政策，促进和保护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农业生产。城乡粮食供应的紧缺和恢复工业对农产品的需求，都必须从恢复农业生产，尤其是从恢复粮食生产入手。农业生产的恢复面临着许多巨大的困难：首先，连年的战祸使耕地面积大为缩减。1913年，全国总播种面积为1.05亿公顷，1920年只有0.97亿公顷，比战前减少7.4%，粮食播种面积比战前减少7.8%。其次，各种农作物产值和产量全面下降。1917—1920年整个农业总产值只相等于1913年的60%左右，其中农业为55%，畜牧业为67%。粮食总产量比战前减少40.9%，造成国内粮食严重不足。棉花、甜菜、亚麻等技术作物产量均缩减90%以上，直接影响了工业原料的来

① 《李可夫文选》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源。最后，战争使农民主要用于牵引力的马匹锐减，1921年比1916年减少 550 万匹，即减少总头数的16.1%。

党和苏维埃政府为恢复农业经济，以新经济政策为杠杆，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减轻农民负担，准许自由贸易。实行粮食税制以后，1921—1922年度征收的粮食税税额比上一年度规定的粮食征集数减少约2亿普特。为了进一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商品流转的发展，以后又多次进行税制改革。1923年将农民负担的各种税务合并为单一农业税，总税额下降1亿卢布，并将其一半左右的实物税改征货币税，1924年又改为单一的货币税，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一律通过市场收购。农民对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有了自由支配和自由经营的更多权利，大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业又成为大工业和千百万小农联系起来的纽带。

第二，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1922年秋天开始，一些机构利用农业好转的形势，任意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使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日趋脱节。这种状况在1923年秋天达到了顶点。据统计，工业品价格指数与总商品指数的比例，1922年8月1日为0.85，1923年10月1日上升为1.24；同时期内，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与总商品指数的比例，却从1.03，下降为0.45。战前，农民购买1普特铁钉需出卖3—3.5普特小麦，购买1张犁需出卖20普特谷物，而今，购买1普特铁钉或1张犁均需要出卖50普特谷物。这种价格脱节现象破坏了城乡商品流转和工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造成农民商品经济的萎缩和工业品的销售危机。党和政府及时发现了问题，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降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缩小50%以上。这样，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活跃

了城乡的商品流转，也使工业品销售危机迅速得到克服。

第三，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活跃农村经济。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人们对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当时，主要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1．供销合作社，负责向农民供应生产资料和推销农产品。合作社向农民供应国家所拥有的农业机器、种子、肥料、五金制品等，这几类商品销售额1925/1926年度高达3600万卢布，比1923/1924年度增长2.7倍。同时，合作社又成立各种农产品销售和加工中心，帮助国家完成农产品的收购计划。2．信贷合作社。内战结束后，信贷业务恢复，农村通过合作社开展信贷活动日益扩大，1923年初参加信贷活动的社员仅18万人，1926年已达360万人。3．建立了一批直接为农民的生产服务的合作社，当时称作"副业合作社"。1927年有此类合作社2800个，其中一半是机器合作社，专门向社员提供农机服务。合作社吸收了大量农民社员入股，使合作社成为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5年，农业生产已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以粮食生产为例：

项目 \ 年份	1913年	1921年	1923年	1925年
粮食作物耕种面积（万公顷）	9446	6620	7860	8730
粮食作物产量（亿普特）	39.79	22.13	34.55	44.24

经济技术作物和大牲畜的恢复情况也较良好。

项目 \ 年份	棉花（万公担）		甜菜（万公担）		亚麻（万公担）		大牲畜（万头）	
	1913	1925	1913	1925	1913	1925	1916	1926
总产量	740	540	10860	9070	330	300	8590	8090

1925—1927年间，苏联农村出现十月革命以来最好的形势。生产稳步发展，农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经济活跃，秩序安定，这是新经济政策给农村生活带来的新面貌。

无需讳言，个体农民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农村的分化也有所增长。但这种分化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它并未使大批农民破产和贫困，而是中农更加扩大，贫农减少，一部分农户上升为富裕农户。这本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却使一部分人感到不安，尤其是党内左翼反对派，他们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因素滋长的危险信号，并指责党中央的农村政策具有"富农倾向"。因此，围绕党的农村政策的不同看法，一直是党内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一方面正确地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农村新气象，指出不应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民经济发展作简单的比较，并强调合作社是联合农民发挥农民主动性创造性的最好形式。另一方面，决议强调要依靠贫农中农向富农展开进攻，要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并决定土地租佃期限从12年缩短到最长不超过6年，严格限制独家农场和独立农庄的建立，对雇佣劳动力也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这一切，预示着已出现收缩农村政策的某些征兆。1928年以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允许土地租佃和使用雇佣劳动的政策再次被指责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实践中严加限制直至最后被完全禁止，农村政策在20年代末发生了一次大转折。

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业生产

工业生产的恢复

国内战争结束时，国民经济陷于崩溃，工业生产极度萎缩，恢复工业生产的任务同样十分艰巨地摆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面前。

由于战争的破坏，重工业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1920年的生铁生产仅 11.6 万吨，只等于 1913 年的 2.5 %，铁矿石的开采量仅达到战前水平的 1.7 %，石油开采量降低了一半以上，整个金属加工工业（包括机器制造业）的产值仅为1913年水平的7%。轻工业的破坏也相当严重，食品工业的产量仅为1913年的16%，纺织品生产仅为战前的10%。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在工业部门同样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由于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不大，私营工业企业一般均为中小企业，大工业基本上属国家所有和国家经营，因此，恢复工业的主要内容，要看国营大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恢复工业生产，首先是从恢复重工业入手的。战争期间工业固定资产的损坏特别严重，更新固定资产需要大量投资，而当时国家的财力十分有限。所以，1921—1923年，固定资金进一步减少，这一时期的基本建设勉强补上当前的损耗；1924—1925年间，投资和损耗基本保持平衡和稳定；直到 1925—1926 年度，国营工业的投资额才超过损耗额 2 倍，开始了增添固定资金的时期。

恢复重工业的重点应放在何处？这个问题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应把重点放在恢复和发展运输业上，

因为运输业的订货决定着金属工业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命运。捷尔任斯基明确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在1923年11月17日的一次发言中说："如果我国现在是乡村的、文化落后的俄罗斯，那么，我国应变为金属的俄罗斯。冶金工业是我们的整个未来……"① 中央接纳了捷尔任斯基的建议，1924年2月，他被任命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兼任金属工业问题最高政府委员会主席。

1924年以前，由于资金短缺，销售呆滞，金属工业很不景气，计划一再缩减。但从1925年起，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一再对金属工业追加计划，从1923/24年度的1.9亿卢布增加到1925/26年度的6.5亿卢布，尽管计划超额完成，但仍无法满足各工业部门对金属及其制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国家进入了"整个经济战线缺乏金属的时期"。以金属工业为重点，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恢复和发展。

在恢复时期，国家还注意创办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工业部门，其中主要的是汽车、拖拉机及机器制造工业。1922年3月，成立了国营的汽车制造厂联合公司。同年10月，在一家制造装甲坦克的军工厂里制造出苏联第一辆国产汽车，它被当作一个重大节日来庆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参加庆祝集会并讲了话。会后，加里宁乘坐这辆汽车穿过莫斯科到达红场。1923年4月，劳动国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制造拖拉机的命令，确定了拖拉机制造的计划和任务，计划三年内生产拖拉机共6000台。此外，纺织机械制造业、动力机械制造业、农业机械制造业都有比较大的发展。

从1924年起，特别是1925年，报纸上经常刊登关于工厂

① 转引自〔苏〕根基那：《论苏联工业恢复时期的特点》，载《苏联历史》1962年第2期(俄文版)。

投产、工厂新建和改建、新建设计划和项目等等消息，第一批苏联自已生产的汽车、拖拉机、电站、飞机、工业建设工程的宏伟计划实施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人们面向未来，准备去迎接更新更伟大的任务——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1925—1926年间，苏联工业已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标志着恢复时期结束，工业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项目 \ 年份		1913	1921	1923	1925	1926
工业总产量指数		100	19.5	39.1	75.5	108.1
大工业产品的比重	生产资料生产	40.7	43.7	48.1	43.4	43.9
	消费资料生产	59.3	56.3	51.9	56.6	55.1

工业的恢复，是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进行的。改变领导工业的形式，取消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联合企业等等，尤为重要的是，国营大工业在工业恢复中起着主导作用，计划化决定着社会主义工业的整个恢复过程。在后期，开始运用新技术，出现了新的生产部门，从而大大加速了工业恢复的进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同时，新经济政策下农业的迅速恢复和高涨，也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在恢复时期内，工业的总产量水平基本达到战前水平，但战前俄国仍是一个大工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达到战前水平的工业对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工业结构仍保持轻工业高于重工业的比例。1922/23年度，重工业增长略高于轻工业，1924/25年度轻工业的恢复发展

速度加快了，所以，1926年重、轻工业的比重仍为43.9:56.1。据1923年统计，在注册工业中，工人人数平均每个企业有239人，其中纺织工业企业平均为1264人，亚麻工业为1015人，采矿工业和采煤工业为906人，机器制造业为393人，金属加工工业为160人。这一切说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把农业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任务依然是十分艰巨的。

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组织大生产，目的是为了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更有效地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

租让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1922—1924年间，苏联政府共收到外国企业主1200多份意向性承租提议，但其中绝大多数是试探性的。在此期间，正式签订租让合同的共91份，而实际开工的企业更少，到1925年，森林工业仅6家，木材加工企业5家，采矿企业3家。在这些租让企业中的就业工人约6000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0.4%。森林租让企业在租让企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恢复时期，欧俄北部6个森林及木材加工租让企业的木材产量，占北部地区全部木材出口量的25%左右；在1926年以前，森林租让企业采伐了价值约3500万卢布的木材，其中77%用于出口。1926—1929年，租让制企业发展为60多家，就业工人为15000多人，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0.6%。租让制企业自1929年以后开始减少和衰落。1930年初，苏联政府决定按照双方同意的方式，废除租让合同，提前收回租让企业。1930—1932年间，共收回租让企业36家，只有极少数租让企业还保留了一段时间。

除租让制以外，租赁制也在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根据1921年12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令，凡工人人数在5人以下、拥有发动机的小型企业，或者工人人数10人以下、没有发动机的小型企业一律解除国有化（在某些情况下，对拥有20名工人以下的稍大的企业也是如此），由私人企业主来承租。承租的最长期限为6年，一般情况下租期为5年。据1923年统计，租赁企业约5000家，工人人数为7.5—7.8万人。租赁工业同国营工业在企业数量上几乎相等，而在工人人数上租赁工业仅占8.5%左右。租赁企业在生产部门的分布特征方面与纯私人资本主义近似，也是以轻工业为主，以工人人数计算，80%以上的租赁企业工人在轻工业部门工作，其中尤以在食品工业部门中的比重最大。1926年，租赁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可见，租赁制是由私人承租的一大批中小企业所构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形式。1927年以后，租赁企业急速下降。1929年，租赁企业的工人人数和产值的比重均降为全部工业的0.1%，1930年租赁企业基本消失。

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租让制和租赁制，在苏联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1930年以后在苏联已不复存在。在恢复时期和改造时期，租让制和租赁制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比较微小的。当苏联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过早地匆忙地取消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成分，这乃是新经济政策于20年代末中止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所以不能得到较大较长期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列宁逝世后，在党的领袖人物中，很少有人象列宁那样高瞻远瞩，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环节。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害怕

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会危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他们在小心谨慎地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千方百计地限制其发展，一旦时机成熟，就打算将其消灭，建立起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有较大发展并过早消灭的主要原因。其次，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主不敢大胆投资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加上资本家所固有的一些本性，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双方常常发生一些摩擦，也是提前取消租让制和租赁制的原因之一。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除了国家资本主义以外，还出现一批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1921年7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法令，准许开办雇佣工人10—20人的小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在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登记核准。开办100名以上工人的较大的企业，需经上级国家机构准许。1921年下半年和1922年全年，私营企业有较大增加。1924/25年度私营工业企业约2000家，占工业产值的3%，就业工人35000人，占工人总人数的4.5%。在商业中，批发商以国营为主，零售商品则绝大部分属私营商人，1922年下半年，领取私人经商执照54.71万张，除去肩挑商贩，当时全国有零售商业网点43.75万个，其中国营0.93万个，合作社营2.26万个，私营达40.46万个，占全部零售商的92%。几年内，随着工农业的恢复，公营（包括国营及合作社营）和私营商业的商品流转额都有较大提高，但两者比重却有很大变化，1922年，公营商业商品流转额为8.8亿卢布，私营商业为26.8亿卢布，1926年，公营企业为76.08亿卢布，私营商业为52.15亿卢布。两者在全部零售商品流转额中所占的比重，公营商业由原先的24.7%上升为59.3%，私营商业则从75.3%下降为40.7%。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在不断

壮大。

实行新经济政策，适当恢复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沟通城乡经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消费品的需求。一般说来，私营工商业规模较小，主要从事消费品的生产和经营，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私营工商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26年以后，私营工商业趋于衰落，至1929年，私营工业企业只剩下300余家，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0.3%，1930年私营工商业归于消灭。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私营工商业中，出现了一批"耐普曼"。所谓"耐普曼"，按照列宁的解释，是指那些在新经济政策下"繁荣起来的商业的代表"，"这种新经济政策的人或代表"①。所以，自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出现和发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者均可称作"耐普曼"。1922年以后，私营商业活跃，商人增多，有人担心，新经济政策是否对资本主义让步过多?耐普曼是否已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一个新的阶级?耐普曼经济力量的加强是否会导致国营经济力量的削弱?对于这些问题，列宁都曾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存在着国营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有可能对耐普曼进行有效的利用、调节和监督，因此，耐普曼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也没有迹象表明可能发展成为政治力量。

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国家加强了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耐普曼成了一切投机商人和业主的特定代名词。20年代中期不断升级的党内争论，双方都把富农和耐普曼看作是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正确看待和分析富农和耐普曼的言论，往往被指责为新的剥削阶级辩护，充当新的剥削阶级的代理人和代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62页。

言人。因此，随着经济不断趋于好转，对耐普曼的政策却越来越严厉。1926年以后，耐普曼成了新生的反动阶级的同义词，对其实行"全面排挤和彻底消灭"的政策。不久，耐普曼在苏联就销声匿迹了。

20年代末，苏联对所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消灭，于是，新经济政策就在实际上被废止了。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财政金融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结束时，国家的财政状况极度混乱。实物交换，免费供给成了普遍的形式。财政收入极少，货币失去自己应有的职能，纸币大幅度贬值，国家银行有待于恢复。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商品流转和市场贸易关系迅速恢复和活跃起来，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信贷的新体系。1921年10月重建国家银行，开始组织信贷系统。国家银行执行以下职能：对大型国营工业、合作社及其他组织、私营企业、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信贷；收受和支付货币存款；收购和出售外国有价证券、汇票、外汇及贵重金属；预算出纳业务；组织和办理各机关、企业、合作社之间的结算。

1922年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财政政策》的专门决议。决议指出了恢复和发展财政体系的任务和步骤：提高工农业生产力，扩大市场销售量，在一切部门以货币流通代替实物交换，在农村中部分地实行以现款交税代替实物税，等等，这一切，对健全苏联财政制度具有决定的作用。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财政金融，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

1. 在各工业企业首先是在国营大工业企业中建立经济核算制。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厂企业靠国家无偿调拨原料、燃料和机器设备，产品由国家统一支配。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一部分

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国家取消了对企业的经费预算拨款，企业所拥有的物资和货币基金，作为企业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保留下来，并根据"准确的经济核算制原则"进行管理。根据1921年8月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只有那些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和国防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企业，以及有能力维持自己生存，能严格遵守经济核算制的企业，留归国家直接管理，其余企业进行出租或关闭。

2. 制止通货膨胀，进行币制改革。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许多人认为不通过货币进行货物交换和分配的时代已经到来，曾设想种种代替货币的方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生活不但要求重建银行，恢复信贷活动，更要求有稳定的货币。可是，由于物资匮乏，局势不稳，卢布以惊人的速度贬值。1922年，1个战前戈比相等于当时发行的纸卢布10万元，两者相差1000万倍。党和苏维埃政府寻求过各种稳定货币的办法，但收效甚微。1922年7月，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单位——切尔文。切尔文以黄金作后备，按照稳定的货币投入流通。于是市场上同时存在两种货币，切尔文信用高，需求量大，但发行量少，票面价值高，只能用于大宗贸易；对广大群众来说，纸卢布仍是合法货币，可是它越来越变得没有价值，农村交易中仍普遍用多少普特谷物作为通行的计价单位。人们对纸币越来越失去信任，1923年发行的纸币1卢布相当于1921年发行的纸币100万卢布，而1卢布切尔文又等于1923年版纸币的5万卢布。货币贬值给恢复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两种货币不协调地并存了将近两年时间，1924年2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发行面值1、3、5金卢布的切尔文，接着又发行银辅币和铜辅币，以此作为唯一流通的货币，并规定了收回纸币的期限和办法。同年10月，纸币停止流通，通货膨胀被制止，币制改革取得了成功。

3. 建立税收制度和发行公债。国内战争结束后，国家经济

处于被破坏的境地，建立苏维埃税收制度，保证国家的税收，就成为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1921年7月起首先对非农业居民征收直接税，其中主要是向非国有化商业、工业企业和个体手工业征收营业税，1922年初，营业税推广到国营、合作社营的所有企业；1922年11月起实行所得税，后又增加财产税，这两项税制主要用于新时期的私营工商业，对实行经济核算后的国营企业及合作社营企业也征收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区别等级征收；1921—1923年间还对许多日用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非农业居民的税收从一开始就采用货币形式。农村则有所不同，在初期农业税大多以实物缴纳，1923年春改为部分货币缴纳。同年把粮食税、劳动畜力税、挨户货币税、公民税等合并为单一农业税，并降低农业税总额1亿卢布。1924年农业税停止实物征收，改用单一的货币税。在新经济政策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税收逐年增加，一般占总预算收入的50%左右。

为克服财政困难，1922年起苏维埃国家开始发行公债。1922—1925年间，共发行了10种国家公债，其中3种实物公债，5种向居民推销的货币公债，2种特种用途的公债。几年内共发行公债5.42亿卢布。1923年又建立国家劳动储金局。发行公债和建立信贷机关吸收资金，成了组织居民的闲置资金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

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管理体制，是完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的。因此，必须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逐步完善。

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在完成了土地和银行的国有化以后，于1917年12月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直属人民委员会领导，并相应建立各级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经济管理的最高机关；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则是地方苏维埃的经济管理机关，它同时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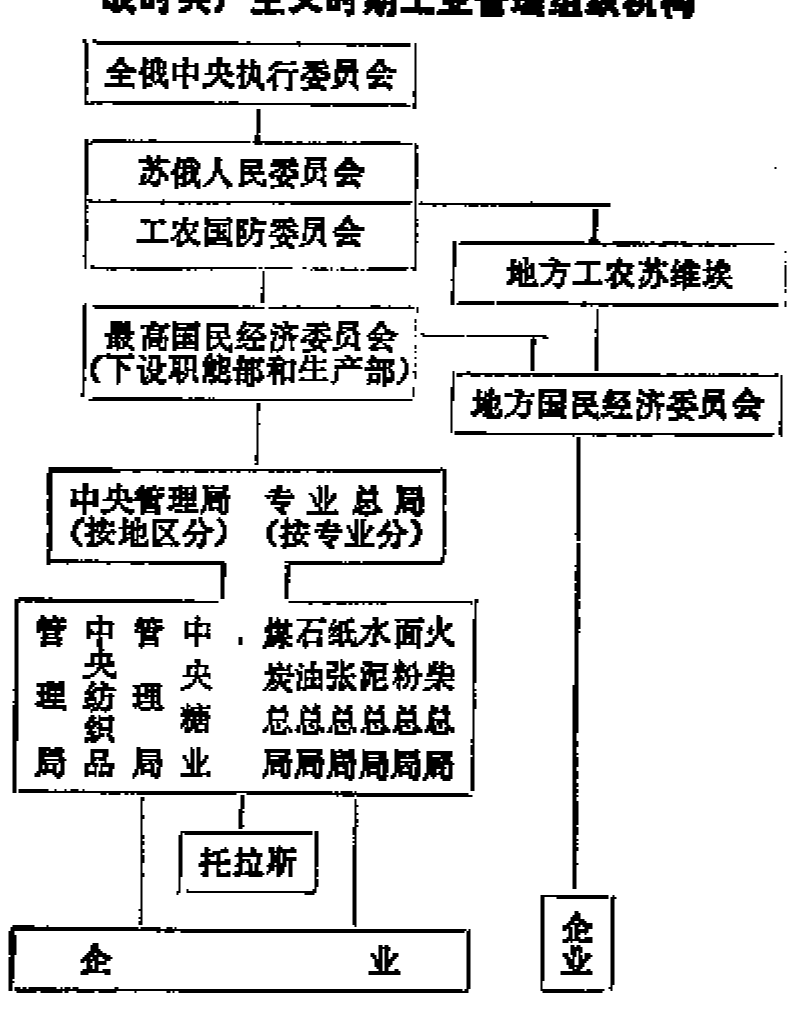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是：掌握工业国有化的进程；组织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制定全国的经济调节计划；统一中央和地方各种调节机关（如燃料、五金、运输等专业会议、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有关人民委员部）、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及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有关活动；有权没收、征用、管制工商业和其他部门的企业，有权强制这些企业联合成辛迪加，等等。

为了加强对国有化企业的集中领导，1918年3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出规定，按工业部门设立中央管理局，中央管理局有权向大型国有化企业委派厂长，并在企业中开始贯彻"一长制"的原则。这样，在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实现大工业国有化以后，苏维埃国家的国有企业通常实行三级管理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中央管理局——州管理局——企业。直属于中央管理局的企业则实行两级管理制：中央管理局——企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切经济工作都转入战时轨道，1918年11月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它是当时苏维埃国家的最高经济、政治、军事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业生产。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业的管理和计划工作都集中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管理总局、各中央委员会和各生产部的手中。1920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52个管理总局、13个生产

部和8个混合性的部；在地方，成立了86个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县也相应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一时期，全部工业都服从于战时任务的集中计划进行工作。管理总局实际上掌握了企业的包括产、供、销在内的一切经营活动，因而它成了工业管理的中心环节，所以，人们称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为"管理总局制度"。见附表。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业管理组织机构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对于击败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保证前线和后方最必需的生产和供给，无疑是必要的。然而，这种体制不是一种适合生产发展需要的科学的经济管理体制。因此，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必须改变这种经济管理体制。

新经济政策时期应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管理体制，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人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习惯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种管理体制，他们主张继续实行"管理总局制度"，沿用军事命令方式，依靠强化集中和纪律来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这种意见被列宁和党内大多数人所否定。为了壮大国营经济，发展商品生产，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苏维埃国家放弃了高度集中的"管理总局制度"，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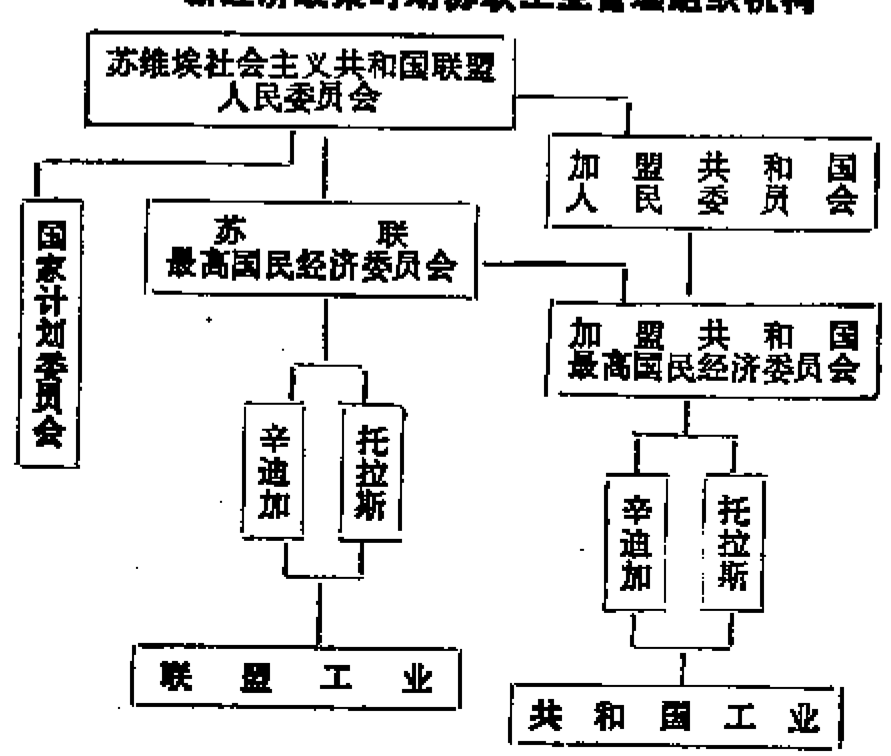
第一，改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管理总局独揽一切企业领导权的局面。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整个国民经济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前身是工农国防委员会，1920年4月改名）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际上已成为工业人民委员部。放弃了管理总局体制以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两个管理局：一是国营工业中央管理局，负责领导具有全国性的工业；一是经济总管理局，负责领导其余工业。随后，规定了企业管理的地方分权原则，整个工业明确分为联盟工业和共和国工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集中领导所有联盟工业，共和国工业则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这样，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拥有较广泛的经济权力。

第二，推行工业企业托拉斯化。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联开始大规模地推行工业托拉斯化，并使托拉斯代替管理总局，成为国营大工业的基本组织形式。国营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后，托拉斯成了基本核算单位。当时，托拉斯具有广泛的权力，它有权独立地组织所属企业的生产，并具有通过市场实现供销活动的完整的业务独立性。根据1922年颁布的第一个托拉斯法令的规定，托拉斯具有法人资格，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固定给它的国家财产，有权建立后备基金、折旧基金和社会福利基金。法令

还规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得干预托拉斯在采购材料、燃料以及销售产品方面的业务活动，它的职责只是对托拉斯进行总的计划领导和监督。在托拉斯建立初期，它兼有生产和贸易两方面的职能，后来，为了使托拉斯集中领导企业的生产活动，又成立了充当国营工业供销机构的辛迪加。托拉斯成了工业管理的基本环节，它是行政管理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一的机构，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革命胜利后，党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战争，直至1920年2月才建立全俄电气化委员会并编制"全俄电气化计划"。在此基础上，内战结束后，于1921年2月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国民经济计划机构，即隶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编制统一的全国经济计划，监督计划的执行，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和主管机关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工业管理组织机构



的计划机构，地方国家机关的计划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刚成立时，规模很小，只有中央一级机构，没有下属机构，全部人员仅40人，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所以实际上只是一个咨询机关，而不是执行机关。1923年经过改组，工作人员扩展到300人，要求这个机构起经济参谋部的作用，制订全国性的统一经济计划。但开始时，只能在个别部门制订计划，如编制粮食计划，农业恢复计划，燃料、运输、冶金、纺织、制糖等工业部门的年度计划。192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但没有执行。1926年起，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主持编制三个五年计划方案，被认为编得保守而未被采纳。

处理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问题的探索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经济管理的权限高度集中，在当时颁布的法令、条例中，十分强调部门管理的作用。例如，按照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石油管理总局是"掌管一切与石油及石油产品的开采、炼制、运输、分配和消费等有关问题的唯一机构"。对各企业的具体领导集中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关部的总局手中。当时，冶金部就有10个冶金和机械工业总局；食品部有面粉、罐头、奶品、茶叶、糖果等总局，随着国有化和经济管理集中化的发展，部门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总局的设置也逐渐增加。在此期间，虽然还保留着各级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但它们所管辖的企业很少，绝大部分企业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总局领导和管理。因此，这种"管理总局体制"表现为：1.高度集权，自上而下的"条条"管理；2.依靠行政手段，以军事命令和纪律的方式来领导和组织生产；3.实行"一长制"和委派制；4.浓厚的"产品经济"、"自然经济"的特征。

由于管理总局体制过于集中而使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经济政策实施后，改变这种体制就在所难免，势在必行了。

第一，改变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的局面，寻找经济管理上集中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好形式。把原先由管理总局管理的企业大部分下放给地方，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23年，又划定了联盟工业企业和共和国工业企业，前者主要是重工业大型企业，直接由全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一些重要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由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其余的工业企业则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这样，基本上打破了"条条"，力图做到"条块结合"，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这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第二，改变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力图使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大部分企业实现了国有化，但在战争环境下靠行政手段指挥生产，管理经济，计划管理还无从谈起。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逐步建立和完善计划管理体制，但一方面计划工作缺乏经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开放了市场，无法纳入统一的计划管理。因此这一时期比较重视商品流通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比较注重以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经济计划很少带有强制性，力图使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可是，当时苏联还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工业中主要是恢复和扩建原有旧企业，很少建立新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还缺少全面形成适合于大生产需要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客观条件。加上人们对商品货币关系还存在种种偏见，计划工作处于初创阶段，因此，这一时期未能形成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

第三，扩大企业自主权。由于"管理总局制度"严重束缚了

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撤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管理总局，将大部分国营企业联合组成托拉斯，1921年8月起在托拉斯和大型国营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至1923年4月，苏维埃政府正式公布了经济核算制托拉斯的法令，标志着以托拉斯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企业经济核算制的创立。实行经济核算制后，托拉斯获得了较广泛的经营自主权，它有权按照批准的章程独立地组织所属企业的生产，有权支配国家拨给的资源，自主地经营供销业务，等等，这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这一时期对企业自主权问题还认识不足，没有真正获得解决，因此，当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确立以后，企业的大部分自主权又丧失了。

第五章 “新反对派”与托季联盟的形成及其失败

第一节 列宁逝世后的党内状况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联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然而，正当列宁循着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过早地逝世了。列宁去世后，俄共(布)面临着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本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作为执政党，必须提出如何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此，党内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第二，列宁的逝世造成党内领袖地位的空缺，谁能够成为党的实际领袖，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1924 年以后苏联的党内斗争所以十分频繁和激烈，就是因为这两个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缘故。

1924年 5 月 23—31 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报告列举了党和苏维埃政权在恢复国民经济事业中的重大成就。报告在评述国内政治形势时认为，人们习惯于说苏维埃国家存在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已经不确切了。不论在城市还是

农村，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正在滋长和发展，看来它非常富有生命力。报告说："新生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事实，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伴随着新经济政策而来的政治现实之一"。季诺维也夫没有明确阐述党对新生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要求人们注意其发展趋势，对其提高警惕，不能作过多的让步。关于党内状况，季诺维也夫认为，必须对 1923 年底的党内争论作出总结，因为不论在哪个问题上，反对派都大错特错了。他提出，"反对派分子应当走上讲台并向全党承认：党是正确的，而我错了！"①

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争论的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大会发言中对这一决议表示异议，但不打算挑起新的争论。克鲁普斯卡娅呼吁不要在大会上重提争论的问题，她说："我认为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要求'你就在这个讲台上说你错了'。反对派声明愿意共同工作，这就够了。这样的声明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中已有所体现。……党目前的任务是那么伟大，那么重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争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下去呢。"②

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克鲁普斯卡娅将列宁"遗嘱"，即列宁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交给中央政治局。在 5 月 21 日召开的紧急中央全会上，加米涅夫主持开会并宣读列宁的信。由于列宁在信中建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向全会提出辞职。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表示，"我们满意地看到，伊里奇（列宁）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所指的是，对于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危险的担心并没有发生。"因此，他提议再次选举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全会通过了这一提议，并决定不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07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25页。

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只是由各代表团团长分别把信的内容传达一下。代表大会主席团没有按照列宁的要求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信，在当时没有引起风波。但由于向全党隐瞒了这一"遗嘱"，给日后的党内斗争留下了不利的因素。

托洛茨基的《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

列宁逝世后，人们纷纷著书写文章，缅怀列宁的伟大功绩，并试图对列宁的理论贡献作一个完整的表述和概括。这一时期，托洛茨基也在《真理报》上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并于4月间汇集成《论列宁》一书出版。由于托洛茨基在苏联党、政、军内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与列宁有较多的来往和工作上的联系，也同列宁有过分歧和争论。所以，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总的说来，托洛茨基在书中对列宁是尊敬的，但也有某些吹捧自己、抬高自己的地方。

1924年9月，托洛茨基又将早年的文章和讲话汇编成一本书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题为《十月的教训》的"序言"。

《十月的教训》主要是阐述在革命高涨时期（即1917年2—10月）党的策略运用中的经验教训。托洛茨基强调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策略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他认为，1923年秋天的保加利亚和德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均已成熟，"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托洛茨基强调，革命时期党的正确领导集中表现在党要有一条正确的策略路线。他追述了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策略分歧：在革命初期，即列宁回国前，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当时的《真理报》犯有护国主义立场的错误。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列宁主张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外世界革命的纲领，而党内右派

则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来完成民主革命。在对待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问题上，党内右派又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迷恋于议会道路，主张把苏维埃引向资产阶级议会。在武装起义直接提上日程以后，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先后于10月11日写了封《论时局》的信和10月18日在《新生活报》上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并将有关起义计划泄漏出去。托洛茨基在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犯的叛卖性的严重错误之后，谈到列宁和他本人在十月期间的策略运用。他说："在准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掩护下，并且在保卫这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来准备和举行起义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好处。自从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执行克伦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命令时起，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未能估计到这件事实的全部意义。据我的记忆，在他当时所有的信件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没有提到一个字。可是，当我们反对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16日），向所有部队和机关派出自己的委员，从而不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时候，10月25日起义的结局已经预先决定了至少四分之三。……10月25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进行得才很顺利。……我们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①

---

① 《托洛茨基言论》(下)第584—586页。

《十月的教训》所以立即在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文章直接指名批评了十月革命时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严重错误，又不指名地批评了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虽然所举的事例基本属实，虽然托洛茨基在文章中声明决不是为了"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的教训，但此刻旧事重提，人们普遍认为托洛茨基是别有用心的。尤其是在不久前的党内争论中，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执，更令人感到托洛茨基动机不纯。其次，文章中有些地方不适当地抬高和夸大了他自己在十月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时甚至把自己描绘成比列宁更加高明，这是人们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最后，在列宁患病不能视事以后，党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人领导集团，托洛茨基的言行被看作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表现和怀有领袖欲野心的明证。

党的最高领导层内的裂痕越来越大，无法弥合，一场新的党内争论就难以避免了。托洛茨基《论列宁》的小册子和《十月的教训》这篇文章，成了引发一场新的激烈的党内争论的导火线。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党内争论

列宁逝世后，谁能继任列宁的职位，成为党的最高领袖，尚属未知的因素。因此，这场争论必然带有浓烈的权力斗争的色彩，争论一方首先要把列宁主义的旗帜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在斗争中稳操胜券。

1924年10月18日，加米涅夫首先对托洛茨基的言论进行批判。他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为题，在有积极分子参加的莫斯科市委会议上作报告。在报告中，加米涅夫历数了从1903

年到十月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同列宁之间的分歧，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远非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一般历史潮流的典型表现”，“是孟什维主义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为了影响工人阶级的这个或那个阶层而利用的工具，是孟什维主义的奴仆”①。

11月19日，斯大林以同样的标题——《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指责了托洛茨基关于十月起义、关于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等问题上的“奇谈”，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思想体系”；又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是“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的，在这种情形下，托洛茨基不得不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而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托洛茨基“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些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恰好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出现，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列宁在世时，它是不敢采取这个冒险步骤的。”最后，斯大林提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②。

11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他认为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是十分公开地企图修正（或者甚至是直接的消灭）列宁主义基础。它的特点是，利用列宁的名义，根据所谓“战略”的理由来修正列宁主义，正如当年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手法一样。因此，他说，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里，“有多少论断几乎就有多少错误的论断”。季诺维也夫承认自己在十月变革中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但他说几天之内就承认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因此，不久之后，列宁也认为这些意见分歧完全消除了。

---

① 1924年11月20日《真理报》。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309页。

自1924年11月至1925年1月，在党的报刊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布哈林、布勃诺夫、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米高扬、基洛夫、奥里明斯基、古谢夫、伏龙芝、库西宁等布尔什维克党的著名活动家都先后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声讨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惟有克鲁普斯卡娅的调子与众不同。她写道："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是应对所有指控他的死罪负责，对此不是没有激烈争论的。"①

这次争论是由《十月的教训》一文引起的，然而争论并没有围绕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运用问题展开，而演变成一场全面清算托洛茨基主义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从11月19日起，《真理报》上发表的均是批判和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各地党组织也纷纷集会，通过决议，发表声明，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在此期间，报纸上还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给齐赫泽和乌里茨基的两封信。在那个年代，托洛茨基和列宁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双方都以尖刻的语言指责对方。在争论的时刻，公布这些档案材料，等于公布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罪证，加深了人们对托洛茨基的愤慨。总之，由于把"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尖锐地对立起来，托洛茨基在争论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共(布)历史上有过多次大的党内争论，然而这次争论与前几次争论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第一，争论成了单方面的大批判。历来的党内争论，双方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论据，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尽管在争论中难免言词激烈，但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然而，在这次争论中，一开始就定下调子，清算托洛茨基主义，保卫列宁主义，这就在实

① 转引自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中译本第377页。

际上剥夺了反对派辩驳的权利，争论变成了对反对派的清算和大批判。

第二，教条主义气息浓重。批判托洛茨基主义，往往不是仔细地去辨认理论观点的是非，而是大量引用列宁语录，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各个时期的分歧简单加以罗列，然后一一加以否定和批判，从而更加助长了教条化的倾向。

第三，开始动用组织处理的手段来解决思想上理论上的分歧。列宁在世时几次党内争论，他从不主张轻易用组织处理方法来压服对方，解决党内矛盾。然而，在这场争论中，开创了用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对待反对派的先例。

托洛茨基被解职

1924年年底，一些党组织就提出要对托洛茨基给予严厉的处分。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党组织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中央没有接受这项要求。不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名要求解除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也被中央多数同志所否决。

在如何处置托洛茨基的问题上，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发生意见分歧。对此，斯大林后来说："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①当时，斯大林虽然反对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但他并不反对给托洛茨基必要的组织处分。

1925年1月15日，托洛茨基给即将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7页。

会写信。信中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说我执行一条特殊的路线（"托洛茨基主义"）和企图修正列宁主义的指责。仿佛不是我走向了布尔什维主义，而是布尔什维主义走向了我，这种凭空加在我头上的说法简直是奇怪之至。我在《十月的教训》序言中坦率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同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而且同'调和主义'这种曾包括我在内的思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从而为完成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好了准备。近八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想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去看待某个问题，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在政治上早已消除了。这些年来，从没有人向我说过，我的某些思想或建议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只是在就我的《1917年》一书进行争论时这个名词才出现，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托洛茨基为自己的言行作了几点辩解，最后提出："事业的利益要求尽快解除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①

1月17—2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托洛茨基称病没有出席，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在党内和在党的周围，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言论使他的名字成了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一切非共产主义的和反无产阶级的倾向和派别的旗帜。……实质上，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按照近似'欧洲'式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按照'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伪造共产主义。"联席全会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并认为"托洛茨基不能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②。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① 1925年1月20日《真理报》。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26、534页。

第二节　“新反对派”的形成及党内争论

“新反对派”的出现

1925年初托洛茨基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暂时退出政治斗争舞台以后，党内斗争并没有止息。不久，党中央三人联盟发生了分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新的”反对派，同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相对峙。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年生于乌克兰一个小牧场主家庭。90年代末，未满20岁的季诺维也夫便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以后，先后在柏林、巴黎、伯尔尼等地从事国际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前，他一直站在布尔什维克立场上开展活动，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和列宁合著《战争与社会主义》一书。革命胜利后，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省委书记、共产国际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

列甫·波利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工程师家庭。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积极投身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行列。民主革命期间，他曾担任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及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领导工作，其间曾多次被捕、流放和流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他先后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重要领导职务。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两人是俄国党内最早的党员之一，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党内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他们在历史上有过严重错误（反对十月武装起义），他们也缺乏领袖

人物应具有的一些气质，如动摇、缺乏原则性等。在列宁逝世前后，他们同斯大林结盟，共同对付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初次失败后，他们又顾虑斯大林的权力膨胀会危及他们的地位。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早在1923年列宁患病时期就有所显露，列宁去世后又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处理托洛茨基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

1924年8月，格鲁吉亚发生农民暴动。酿成暴动的重要原因，是由于部分农民的收入减少，工业品价格昂贵，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不满而引发的。暴动平息后，全国范围内进行农村苏维埃改选。这次改选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选举的现象，个别地方前往投票的农民只占选民的7—10%，这种情况反映了共产党和苏维埃在农民中威望的严重下降。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政治局内部发生了分歧。季诺维也夫主张给农民在苏维埃中更多的实际管理权，布哈林等人主张给农民以优惠政策，放弃对富裕农民的敌视和限制，斯大林倾向于赞成布哈林的主张，但他比较谨慎，避免公开承担责任。由于当时正在开展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斗争，他们之间的分歧才没有表面化。

1925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充分体现了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和灵活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从他们的僵化立场出发，坚决反对党中央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但没有提出公开的责难和批评。

同年秋天，加米涅夫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指责党中央存在忽视富农危险的倾向。季诺维也夫也在《真理报》撰文，提出"防止党的蜕化"的口号，向中央多数派发起挑战。接着，季诺维也夫写的《列宁主义》一书问世，书中申述了自己对列宁主义及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这本书为新反对派提供了

理论基础。书中除了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外，还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而是连续不断的退却，"走向一个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

1925年10月召开中央全会。会上，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科夫和克鲁普斯卡娅联合署名向党中央发出一封《四人信件》，要求重新审查和讨论党的有关重要政策，这是新反对派直接提出的开展党内争论的要求，也是新反对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在中央全会上，多数人拒绝新反对派的要求，拒绝进行新的党内争论。

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但在一个国家内是无法建成的，尤其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俄国革命的胜利可以成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而由欧洲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俄国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下来并取得最终胜利。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虽然始终没有抛弃指望世界革命胜利的信念，但他已经不把世界革命看作唯一依靠，而把眼光转到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只是他未对这个问题作详细的论述。

1925年，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国内，工农业生产已分别达到或接近战前水平，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新的世界革命的高潮在可以预期的将来难以盼望。于是，出现一种新的国际格局，资本主义国家已暂时不可能凭借其武力或其他手段来颠覆苏维埃国家，而苏联也不能盼望依靠世界革命来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苏联将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

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视线从国外移到国内，提出了一系列紧迫而又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一个国家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如何?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能否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大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人数较少的情况下，能否克服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反抗，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归根结底，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了斯大林、布哈林与新反对派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国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说法也不一致。例如，1922年，托洛茨基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认为在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①。同样，直至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中也说，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②。当时，人们既没有把托洛茨基的言论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批判，也没有把斯大林言论与托洛茨基言论相提并论。这些言论被普遍接受，并未引起争议，只能说明人们还普遍拘泥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把一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寄托在世界革命的命运上面。

1924年12月，在批判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过程中，斯大林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次年5月，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斯大林就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苏联正面临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

① 《托洛茨基言论》(上)第177页。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①

1925年底，即党的十四大召开的时候，"一国社会主义"的论争才明朗起来。季诺维也夫向大会所作的副报告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认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说："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到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② 布哈林反驳了季诺维也夫的这一论点，认为季诺维也夫根本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只是重复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论调。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引述了斯大林一年多前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里的那段话来答辩，并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是一种充满"民族狭隘性气味"的"胡说"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这一问题表示沉默，争论也没有深入开展下去。

1926年1月，斯大林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他承认一年多前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那段话是有缺点的，"缺点就在于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成一个问题"。他指出，应当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作为两个问题区分开来，给予不同的回答。斯大林说，社会主义能够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1、101页。
② 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③ 1925年12月30日《真理报》。

在一个国家内建成，“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①至此，斯大林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已经有了完整而又明确的表述。

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的“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区分开来的论述，着重论证了不仅可以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这种建设是能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这样，就明确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成员尽管不否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他们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途是持怀疑态度的。总的看来，他们之间分歧和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此。

关于“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虽然继续了一段时间，但双方的观点在此后都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由于这场争论与当时党内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方面的分歧和争论掺合在一起，致使争论中没有充分运用说理的方式正常地开展，争论的结局也没有完全从理论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而是以反对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农村政策的争论

怎样看待新经济政策及实施这一政策后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是同新反对派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季诺维也夫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新经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4—65页。

济政策只是克服经济困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不能把它当作现实的社会主义加以颂扬。加米涅夫也说，目前党内形成一种歪曲党的路线、掩饰新经济政策消极面的错误倾向，他认为，危险就在于过分地强调了新经济政策。在他们的心目中，新经济政策根本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单纯的让步和退却，是一种必须随时加以警惕和遏制的临时政策。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们主张采取一系列打击私人资本主义势力和排挤富农的严厉政策。

1924—1925年间，党和苏维埃政府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减收农业税，降低工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并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放宽对租佃土地和雇佣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借以提高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新反对派竭力攻击上述农村政策，指责中央对富农作了过多的让步，反对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分地依靠农业，忽视工业的发展。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新反对派一方面夸大富农的危险性，责难党中央对这一危险性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又忽视同中农结成联盟的意义，仍然坚持"中立中农"的口号。这些主张，使新反对派在农村政策上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关于"发财吧"的口号。在进一步贯彻新经济政策，调整农村政策之后，农村经济趋于活跃，富农和富裕农民的经济实力也得以增长，这是事实。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有人表示担心和不满，有人则认为是正常的，应给予保护和适当的鼓励。1925年4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前夕，布哈林在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应该摆脱和消灭阻挠富农和富裕农民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应当告诉全体农民，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有人会压制你们"①。李可夫还要求取消对富农和对

① 1925年4月25日《真理报》。

城市私人资本施加压力的任何行政措施。克鲁普斯卡娅著文尖锐批评布哈林提出的这一口号，布哈林则写文章为自己辩解。中央不同意公开发表这两篇文章，而是建议布哈林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承认"发财吧"这一口号是错误的。后来布哈林接受这一意见，在报纸上认了错。可是，在党的第十四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仍不放过这个问题，他警告说，贫农占农村人口的40—45%，而今富农正在成长并企图剥光和掠夺贫农，这是党所不容许的。因此，布哈林"发财吧"的口号，只能期望富农的孙辈去感谢他。他们还对禁止发表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表示愤慨。布哈林在会上再次发表声明，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他愿意收回"发财吧"的口号。然而，克鲁普斯卡娅在大会发言中继续批判布哈林的这一口号。为此，斯大林在作政治报告的结论时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为布哈林辩解。他也认为这一口号是错误的，但"只是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犯过的错误相比较，"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①。

"新反对派"的失败

党的十月中央全会上没有展开争论，新反对派决定将自己的主张诉诸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中央多数派也深知一场争论在所难免，也打算在党代表大会上击溃新反对派的挑战。为此，双方都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当时，季诺维也夫的地位还十分显赫，他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省委书记。由于季诺维也夫长期兼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职务，所以他在列宁格勒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他还利用《列宁

---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1页。

格勒真理报》宣传他的一系列主张，并利用这一舆论工具同党中央和莫斯科省委的舆论工具相抗衡。季诺维也夫的主张还取得了列宁格勒党代表会议的支持。新反对派常以列宁格勒为活动基地，故又名“列宁格勒反对派”。

中央原先决定党的十四大在列宁格勒举行。鉴于新反对派在列宁格勒活动频繁，遂改变决定，代表大会仍在莫斯科举行。中央还否决了列宁格勒代表团提出的一名大会主席团委员候选人。因此，在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气氛已相当紧张。

大会前夕，即 12 月 15 日，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等人就保持党的统一问题向新反对派发出一封信。信中指责新反对派和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活动是同党中央的路线背道而驰的，“为了党的统一，为了党内的和平，为了防止俄国共产党最优秀组织之一的列宁格勒组织有可能离开党中央的危险，在下面署名的中央委员认为，在代表大会确认中央明确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可以实行一些让步”①。他们共提出 8 条建议，其中主要的是：(1)在起草中央总结报告的决议时，应以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决议为基础，只是个别条文的措词可以稍微缓和一些；(2) 认为在报纸上继续发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代表会议的不同观点是不合适的；(3)政治局委员不得在代表大会上互相攻击；(4)改组《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撤换一名主编，作为对等条件，中央同意吸收两名列宁格勒人分别参加党的书记处和《真理报》编委会。季诺维也夫拒绝了这些协议条件，认为这不是“协议”和“妥协”，而是要求反对派全面投降。

12月18—31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他在总结同托洛茨基主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5—326页。

义的争论后说，现在又进入了"新的争论时期"，他提到"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和"莫斯科的同志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为了"不预决事变的进程和不刺激人"，他表示不在报告中谈论它，他相信"党一定能在这次争论中很快地取得胜利，决不会发生什么特别事故"①。列宁格勒代表团不赞成中央的政治报告，他们推举季诺维也夫向大会作副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出现两个对立的政治报告，争论的帷幕拉开了。

除了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争论外，在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尖锐地提出加强党内民主和改组党的领导机构的问题。加米涅夫在大会发言中要求限制和削弱书记处和总书记所拥有的权力，使中央政治局拥有政治上和组织上领导的全权，改组书记处，使书记处服从政治局，完成政治局作出的决议的技术方面的任务。这一建议的实质是要削减斯大林手中日益膨胀的政治权力，但此时力量对比已不利于反对派方面。斯大林驳斥了加米涅夫的这些主张。这时，新反对派成员虽然还可以在大会上发言和进行辩论，但他们发言受到一部分代表的起哄、嘲笑和诘问。他们唯有得到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例如，加米涅夫在发言中呼吁"回到列宁(时代)去！"又说："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斯大林同志本人，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一些列宁主义者同志们，所以我今天在大会上重复说，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此时，全场上一片骚动。许多代表发出"不对！""胡说！""他摊牌了！"等喧哗声，唯有列宁格勒代表团报以掌声。加米涅夫在发言结束时说："我们反对个人统治的理论，反对制造'领袖'"。许多代表则高呼："要斯大林！要斯大林！！要斯大林！！！""向斯大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8页。

林同志致敬！"①

12月23日，代表大会以556∶65票通过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它标志着新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失败。12月28日，大会又通过了有关新反对派的几项决议：向列宁格勒党组织呼吁，谴责列宁格勒代表团犯下的错误；由中央派人改组《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撤销加米涅夫向大会作关于当前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当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委派《消息报》主编改任《列宁格勒真理报》主编。12月31日，代表大会闭幕。斯大林重申不用"割除"的办法对付新反对派。选举结果，季诺维也夫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为政治局委员），索柯里尼科夫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克鲁普斯卡娅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原为主席团委员）。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均告失败。

鉴于新反对派在列宁格勒有较大的影响和势力，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中央派出了以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得烈也夫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列宁格勒，向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大会通过的决议和路线。中央代表团成员先后出席了717个工厂党组织召开的会议，向63000名（占该地区党员的82%）党员作了报告，绝大多数党员表示拥护中央的路线，谴责新反对派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1926年2月10—12日，列宁格勒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报告人布哈林在会上阐述了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指责新反对派没有认识这一时期的特征和鼓吹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调。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新反对派的错误，并决定改组党的列宁格勒省委，基洛夫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和西北局书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

词。新反对派遂失去了在列宁格勒的影响和势力。

第三节　托季联盟的形成及其失败

托季联合反对派的出现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表现沉默，在斯大林同新反对派的争论中采取旁观的态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讨和批判言犹在耳，他们也不敢贸然去争取托洛茨基的支持。但事实上，他们在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方面是相当类似的。

新反对派失败后，主要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使党内新老反对派开始接近起来。

其一，他们有相近的理论观点。新反对派宣扬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可以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找到理论依据。托洛茨基教条式地接受某些传统的结论，担心汪洋大海般的小农——小私有者将是社会主义改造不可逾越的障碍。俄国的经济文化落后，工人阶级将会遇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敌对的冲突"。这种冲突意味着工农联盟的破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这一前景是极其可怖的。因此，他们都采取"左"的立场和主张，强调新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的危险性，攻击斯大林和党中央实行了"右倾"政策。

其二，同样的失败使他们处于相似的地位和命运。他们都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削弱和孤单，眼看斯大林在党内地位日益巩固，权力不断扩大，他们的不满和恐惧也与日俱增，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获得群众的信任，于是就走上党内派别活动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

上越走越远。

1926年4月初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李可夫作了关于经济任务的报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对这个报告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他们主张扩大日用品的生产，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提高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富裕农民加征税收，等等。这些主张虽然还不是以联合方案的形式提出来的，但已表明两个反对派的政策主张非常接近，他们同中央多数派的政策分歧也十分明显。因此，可以认为，在四月中央全会上，是新老反对派联合，即托季联盟形成的开端。

1926年春夏之交，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别连基出面，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树林里召开反对派的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按照秘密活动的规则进行。新反对派骨干分子、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拉舍维奇在会上作报告，他号召建立反对派的派别组织，来同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相抗衡。这次秘密集会被中央发觉后，就将其称为"拉舍维奇事件"提交7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专门予以讨论。会议认为这一事件实际上是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反对派建立"第二党"的活动，并利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来达到这一目的。为此，会议决定解除拉舍维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给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解除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由布哈林继任。

就在7月中央联席全会上，反对派联名提出一份《十三人声明》，在上面署名的有：巴卡也夫、皮达可夫、利兹金、阿夫杰也夫、拉舍维奇、季诺维也夫、穆拉洛夫、克鲁普斯卡娅、彼得松、托洛茨基、索洛维约夫、加米涅夫和叶夫多基莫夫。声明对当前党内外重大问题均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它的发表，是托季联盟正式形成的标志。

《十三人声明》是托季联盟的第一份纲领，它的主要内容有：(1) 关于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蜕化。声明认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危机日益深重，党的最高领导层日趋脱离群众、离开正确路线。党内产生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在列宁逝世后的这段时期内，官僚主义骇人听闻地发展起来了，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党员不敢公开表达他们出自内心深处的思想、希望和要求"，"一切讨论都是由上往下贯彻，基层的党员只能洗耳恭听，他们只能单独地、偷偷地思考问题。"(2)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政策。声明认为，只有当工业得到高速度的发展，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这是一切都必须服从的"至关紧要的目标"。然而，目前的工资政策、经济政策、税收政策和农村政策都是错误的。声明提出加快工业化速度，对富农加征税收，从秋天起提高工人工资等要求。(3)关于派别活动。声明认为，前两年中，存在着一个由六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组成的"七人"宗派集团，"这个处于最高领导阶层的宗派集团背着党，事先决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议事日程上的每一个问题，并且独立决定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把它们提交政治局讨论。"而这个宗派集团还在那里进行一场反对"派别"和"小集团"的斗争。声明要求使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能完全按照党的传统加以解决，恢复党内民主，健全集体领导。(4)关于"拉舍维奇事件"。声明说，在中央七月全会前夕，所谓"拉舍维奇事件"突然变成了"季诺维也夫事件"，这是斯大林派别集团蓄意制造的，是一种"明显的脱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

《十三人声明》上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签名，表明她也属于这个"联合"反对派的行列。但当年(1926)秋天，她就宣布同反对派脱离关系，因为"反对派走得太远了……同志式的批

评变成了派别活动"①。

以《十三人声明》发表为标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派正式结盟。这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他们都在不同场合表示，愿意在双方之间消除分歧，互相谅解。6月26日，季诺维也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有那么一段悲惨的时期，我们两派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本应团结起来，以反对正在蜕化变质的斯大林以及他的朋友们，但因为对党内的一些情况的本质不清楚，我们在两年期间互相攻讦。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并希望今后不再重演。"② 托洛茨基在七月中央联席全会期间也发表声明说："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我无疑是把党的政策的一些机会主义动向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名字联在一起。中央内部思想斗争的经验表明，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不可能了解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并及时断定机会主义动向是来自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斯大林为首的那一派。"③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互相"宽恕"和"赦免"，表明新老反对派的结盟是无原则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然而，托季联盟的形成，矛头是针对"斯大林为首的那一派"，这点是明白无误的，因此，它的出现，预示着党内将有一场新的严重的较量。斯大林严密地注视着反对派联盟的形成，并予以尖锐的揭露。他指出："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④

争论不断升级

托季联盟形成以后，党中央就向他们发出警告，不要挑起全

① 1927年5月20日《真理报》。

② 《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1927年俄文版。

③ 《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9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6页。

国规模的公开争论和制造分裂。但反对派成员不顾中央的警告，他们四出活动，奔走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一些大城市的工厂基层党组织之间，从一个支部到另一个支部，他们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宣传反对派联盟的纲领。双方的争论往往十分激烈，会场上常常出现种种骚乱。这不能不引起一些党组织的关注，有些党组织则动用行政和组织手段予以压制。党中央再次给予警告，加上反对派在实际活动中不断碰壁，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10月16日，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科夫、托洛茨基、叶夫多基莫夫等六人签名发表一份声明。声明表示，他们现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但他们承认曾"多次采取了违犯党纪，超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范围而走上派别活动道路的步骤"。他们表示承认错误，放弃派别活动。

10月23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严厉批评了托季联盟的错误言行。斯大林警告反对派不仅要承认组织方面的错误，而且要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反对派拒绝承认自己的观点错误。中央联席全会决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提出警告，并决定免除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11月初，在联共(布)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反对派继续受到谴责。斯大林作了题为《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他认为反对派联盟只是"无原则的联盟"、"机会主义的联盟"，他嘲笑反对派联盟"加在一起是一些被阉割者的力量"，因而它不能长久存在，正在走向崩溃。① 斯大林的演说表明，党中央对反对派联盟的斗争将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手段。

1927年春天，国际上出现一股反苏反共的潮流。4月，蒋介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3页。

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屠杀，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濒临失败。5月，伦敦发生袭击苏联商务代办处的事件，英苏断交。6月，一名波兰籍的白卫分子在华沙刺死了苏联大使。同年夏天，在柏林、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连续发生袭击苏联使馆和商务代办处的事件。随着国际局势趋于紧张，一度比较平静的党内斗争又紧张起来。

5月26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加等八十四人上书联共(布)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史称《八十四人声明》(一称《八十三人声明》)。声明从最近期间中国革命受挫和同英国断交的事件中，追究中央多数派执行了一条对外政策方面的右倾错误路线，使苏联又面临一场新的反苏战争的危险境地。反对派声称要给党寻找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以使党得救。他们认为，对外政策方面的错误是"国内政策上的错误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反对派列举了中央多数派在工业、农业以及党内生活方面的错误政策之后说，"党和苏维埃的整个官方机构在向左开火，却对真正的即来自右边的阶级危险大开方便之门"。声明指责多数派破坏党内制度，损害党内民主，遏制党内争论，对党和工人阶级隐瞒分歧的真实内容，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党面前都被说成是妄图破坏党的团结，这一切，使官僚主义严重滋长，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遭到削弱，党也被削弱了。声明呼吁："我们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铁的纪律，我们也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党内民主。"声明提出了克服党内分歧加强党内团结的八项建议，其主旨是要求恢复列宁在世时对党内分歧和争论的一贯做法。由于这份文件是向党中央递交的，又要征集大家的签名(据称共征集到3000人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名)，因而没有十分激烈的言词，但斯大林和中央多数派认为它是反对派联盟向党进攻的一个新的步骤，予以密切的注意和反击。

斗争继续在升级。6月，反对派骨干分子、中央委员斯米尔加被派遣往远东工作，托季联盟认为这是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迫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数百名群众来到雅罗斯拉夫车站送行，托洛茨基还发表现场讲话。这一事件被看作是对党中央的一次示威。7月11日，托洛茨基在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信中，提出所谓"克列孟梭实验"①。托洛茨基声称，战争一旦爆发，当敌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反对派要象克列孟梭那样采取行动，更换现今的领导人。反对派联盟自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指责斯大林和中央多数派走上了"热月化"②的道路。这一切都表明，反对派联盟已不限于对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不同看法，也不限于对党中央多数派提出批评，而是直接号召推翻中央多数派的领导，进行公开的分裂活动了。

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上提出了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问题。8月5日，斯大林在联席全会上发表演说，他向反对派提出三项条件：1.放弃关于"热月化"的无稽之谈和关于克列孟梭式的实验的荒谬口号；2.公开斥责分裂共产国际的政策；3.放弃一切派别活动，放弃一切用以建立第二党，在联共(布)党内建立新党的手段。斯大林警告说："如果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容许他们留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③在这种情况下，8月8日，托季联盟的13名头面人物发表声明，表示接受三项条件，表示"无条件地和无保留地赞成在现在的中央领导之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现在的领导之下保卫苏联"。他们否认关于"热月化"的

① 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军攻入法国离巴黎80公里时，仍对当时法国政府激烈斗争，终于更换了政府。

② 指1794年7月27日法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称为"热月政变"。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6、77页。

言论是针对现今的党中央的，并表示坚决谴责任何成立第二党的企图，说"我们准备竭尽全力消除一切派别因素，这些派别因素是由于党内制度被曲解的条件下我们曾不得不争取让党知道我们真正的观点而形成的"①。8月中央联席全会决定暂时不讨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而给他们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托季联盟崩溃

8月中央联席全会决定于1927年12月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章的规定，党的生活中的一切争论问题，在决议未通过之前，党内可以自由地进行讨论。按照惯例，通常在党的代表大会前2、3个月，中央委员会应公布大会主要报告的提纲，同时公布不同意现行政策的共产党员集体或个人的反提纲。托季联盟利用这一规定，又拟定了一份冗长而详尽的反提纲——《反对派政纲》，送交中央委员会并要求给予印发。

9月8日，中央政治局拒绝印发《反对派政纲》。斯大林说明了拒绝发表的理由。首先，因为中央不愿意也没有权利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其次，如果发表了反对派的政纲，就意味着不但不去解散，反而去帮助组织集团和派别；最后，反对派政纲中包含着对党的诬蔑，这种诬蔑如果发表出来，给党和国家的损害是无限的。②在这种情况下，托季联盟在自己操纵的一个印刷所印制并散发这份《反对派政纲》。国家政治保安局以这个印刷所里安插有原先的白卫分子为名，将印刷所封闭，并逮捕了几名工作人员。围绕着《反对派政纲》事件，党内斗争再度紧张起来。

---

① 1927年8月11日《真理报》。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6页。

《反对派政纲》就其内容来说，只是重申了《十三人声明》和《八十四人声明》中已提出的观点和政策，然而它最全面而又详尽地提出了反对派同中央多数派之间在内外政策方面的种种分歧。它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是，资本主义势力在增长，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力量在增长，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地位在削弱；在国外，苏联的国际威信在下降，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反苏战争的威胁。反对派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中央多数派执行了"一条时而稍稍向左，然后大大向右摇摆的路线"。接着反对派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它可以归结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前提的工业化必须有一个确定的高速度；反对富农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增长；及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在党内、工会和苏维埃内实行民主。

从《反对派政纲》中可以看出，托季联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工农业方针、经济工作、军事建设、外交政策、党和苏维埃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带有左的倾向，而且都是直接针对斯大林和中央多数派的。除了政见分歧以外，反对派联盟虽然一再表白不搞"第二党"，但他们的派别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实际上已形成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宗派组织。此外，反对派不但有言论，而且进行了大量的派别活动。这样，就使得党内矛盾极度尖锐起来。

10月 21—23 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鉴于 8 月以来托季联盟的派别活动有增无已，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把他们的问题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审理。为了揭露托季联盟的派别活动，联席全会还决定进行全党公开争论，将中央委员会几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发给几十万党员阅读，在《真理报》上开辟争论专页，并于 11 月 5 日、17日在专页上发表了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农村工作的提纲，以供广大党员进行比较和

鉴别。

经过全党大辩论，联共(布)党内大多数党员投票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反对托季联盟的机会主义路线；赞成托季联盟路线的只有少数党员，托季联盟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纪念节日。托季联盟头目组织一伙支持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他们手里拿着标语、漫画，他们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喊着"回到列宁去！""斯大林派正在欺骗工人阶级！""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等口号，抬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把他们奉为"世界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这支示威队伍会见，并企图发表演说，但这支零落的反对派示威队伍很快被声势浩大的庆祝节日的群众游行队伍所驱散。托季联盟把党内矛盾诉诸街头，试图通过街头示威挽回他们的败局，这就使矛盾的性质从党内争论转化为公开对抗党中央的行动，变成一次反党的政治事件。

11月11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要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停止召开非法的反党会议，不要把党内争论扩大到党外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退出会场。数小时后，他们提出书面答复，拒绝中央的要求。在此情况下，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11月16日，苏联著名外交家、托洛茨基的密友越飞自杀身亡，送葬的人很多，反对派又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活动。他们唱起内战时期有颂扬托洛茨基词句的歌曲，企图激起人们对托洛茨基的怀念。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相继在葬仪上讲了话。然而，当有人向列队的红军士兵发出呼吁，要他们向托洛茨基欢呼致敬、高喊"乌拉"的时候，红军士兵们都纹丝不动。

这显然不能用红军战士已经不熟悉托洛茨基来加以说明，恰恰表明托季联盟在红军和广大群众中已十分孤立。

随着党内斗争的不断加剧，中央对反对派分子的处置措施也越来越严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追查参加反对派活动的分子。在12月2—12日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还有加米涅夫、巴卡也夫、叶夫多基莫夫、拉柯夫斯基等反对派分子在大会发言。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发言都被喧闹声、咒骂声打断几十次，甚至连发言内容都听不清。这说明党内越来越缺乏正常的民主气氛。最后，大会作出决议，认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是不相容的"，决定把包括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斯米尔加、拉舍维奇等75名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并将23名萨普龙诺夫集团分子开除出党。决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努力纯洁自己的队伍，清除"一切不可救药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

至此，托季联盟在政治上组织上宣告失败。1928年1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下令将托洛茨基流放至中亚的阿拉木图。一年以后，即1929年1月，苏联政府又宣布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国。1940年8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身亡。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是苏联历史上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1879年他生于南俄一个犹太富农家庭。1896年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他早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他既不属于布尔什维克，也不追随孟什维克，而是自拉山头，自成一派。1905年革命时他曾一度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反对沙皇统治的坚强战士，是党内持中派立场的代表人物和首领。1917年夏天，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他拥护列宁

提出的武装起义方针，直接参与了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国内战争期间，他作为军事人民委员，经常在前线指挥和巡视，为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他的思想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轨道，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组织上加强了派别活动，终于在党内斗争中遭到失败。但他和斯大林等人争论的性质，总的说来仍属于怎样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仍属于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问题。只是由于反对派的活动不断升级，斯大林也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组织手段对付反对派，致使这场党内斗争及其结果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至于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再次流亡的11年间，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组织，但他是以斯大林政敌的身份在国外积极活动，客观上适应帝国主义反苏活动的需要，尤其是1938年他建立"第四国际"以后，托洛茨基越来越走向极端，走向没落。

第六章　20年代的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

第一节　文化教育事业建设

苏维埃教育体制的确立

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教育体制陈旧、腐朽。根据1897年俄国第一次人口调查材料，9—49岁的居民中，识字的只占28%，妇女识字的只占16%。4/5的少年儿童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全国的中学生不满25万人。学校分属国民教育部、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玛利亚皇后教养机关管理委员会管理，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学校。

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更为严重。俄国境内有71个民族，其中48个民族没有文字。吉尔吉斯人识字的只占0.6%，塔吉克人识字的只占0.5%。劳动人民几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列宁在1913年写道："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①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列宁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6页。

认为，发展教育事业不仅是使人民群众获得文化知识，而且是提高民族素质、建设共产主义的基本要素。列宁说："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们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样的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列宁的铭言是："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①

1917年11月，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受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委托，提出苏维埃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实施免费的普及义务小学教育，学校绝对的非宗教性，国民教育民主化，吸收教师讨论有关新学校的建设问题，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同年12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关于把教育和教养工作从宗教事务院移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所有教区学校、教会学校、教会中学、外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神学院，连同在编人员、财产、资金，将全部归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

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法令规定，在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和举行宗教仪式，教会不得干涉学校事务。苏维埃政府的最初法令，实现了学校教育和教会彻底分离。这是革新旧教育体制的重大措施。

基本方针、管理体制确定以后，苏维埃政府进而研究和解决学制和教学体制问题。1920年，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了苏维埃学校的第一个教学计划。废除了过去把学校分为初等学校、文科中学、实科中学等旧体制，把学校分为第一级学校和第二级学校两类。第一级学校学制为五年(相当于小学)，第二级学校学制为四年(相当于中学)。教学计划对小学、中学的课程设置、周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0、357页。

教学时数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1920年底至1921年初举行的国民教育会议上，对全国的学制也作了统一规定。全国的两级学校制改称七年制学校和九年制学校。七年制学校的第一环节为四年，第二环节为三年。九年制学校的第一环节为四年，第二环节为三年，第三环节为二年。相应的专业学校是：初等专业学校招收第一环节毕业生，中等专业学校招收第二环节毕业生，高等学校招收第三环节毕业生。

1923—1924学年，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了学校必须执行的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是：学校的教学工作和教育工作必须和社会及工农群众的劳动生产斗争结合起来。教学大纲提出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

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学校中的体育教育。1925年7月，俄共(布)中央通过体育工作的决定，指出体育工作不仅是为了增进健康，更重要的是通过体育运动对群众进行文化训练和军事训练，吸引群众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

20年代，教育界还开始了对苏维埃教育和教学理论的探讨。卢那察尔斯基根据列宁的有关意见，反复论证在阶级社会里，学校都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苏维埃学校应当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教育界对怎样形成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生逻辑思维的特点等等问题，都开始了探讨。在教学中，十分强调科学性原则，强调苏维埃学校最重要的任务是用真正的科学知识武装新的一代。

20年代，苏联的中、小学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27—1928学年，全国各类中、小学的总数(包括特殊学校)达到118558所。1928—1929学年的在校中、小学生达到1200余万人。少数民族地区入学儿童增加得更快。1932年，已有70个

民族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高等教育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十月革命前，俄国有高等学校105所，集中分布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喀赞等16个大城市，在校学生127400人。莫斯科大学是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校，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但是整个说来，俄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是比较落后的，学校的布局也很不合理。整个高加索地区只有一所梯弗利斯女子高等讲习所，远东地区也只有一所高等学校。沙皇专制制度压制科学研究事业，镇压和迫害进步教授和学生，劳动人民的子女根本进不了大学的校门。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专门人才作为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把招收劳动人民子女入学作为改革招生制度的重点。1918年8月，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议，指出："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

为了让劳动人民子女在短期内就有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教育人民委员部决定在莫斯科开办13个工农高等学校预备班。1920年9月，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在全国所有高等学校都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工农速成中学招收年龄在16岁以上的干部及生产岗位上的工农群众，学制为3—4年。

国内战争结束后，高等教育开始了有计划的发展。1927—1928学年，全国有高等学校148所，在校学生16.8万人。1928年高等学校毕业生28700人。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高等学校急速发展。1929—1930学年，全国已有高校190所；1930—1931学年，全国高校已达579所了。

科学研究事业和知识分子问题

十月革命前，俄国约有300个科研机构。连同高等学校里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大约有1.1万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部门都由国家直接管辖。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处于优越的地位（教授或科学院研究员的平均工资比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30倍左右）。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和部分主管官员的愚昧，常常发生压制和埋没科学研究发明的现象。科学家的政治态度一般都反对专制制度，向往资产阶级民主，欢迎二月革命，倾向于立宪民主党或孟什维克。

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持消极态度。衷心欢迎这一革命的也有，如植物生理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土壤学家威廉士，是极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不理解、不欢迎，甚至抱有敌意。知识阶层中不同职业的人，包括政府部门和银行的职员、科学家、教师、医生都拒绝同布尔什维克党合作。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复杂的、矛盾的：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受了过去整个生活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范畴，是无产阶级的异己力量；另一方面，又觉得无产阶级政权离不开知识分子，感到"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反映在政策上，党和政府在实施"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总方针时，不免扩展到一些知识分子身上。

无庸讳言，在知识分子中，确有少数人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但是，"红色恐怖"的影响所及，也镇压了不少无辜的知识分子，并造成人才外流。例如，1921年6月，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工艺工程师、制糖工业专家纳兹万诺夫被控和彼得格勒反革命

武装集团有联系而被捕，并被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判处死刑。其父亲不顾一切写信向列宁申诉。列宁向各方面调查了纳兹万诺夫一案真相后，写信给政治局，要求"暂缓执行纳兹万诺夫的判决并把问题转交政治局。"① 此案经重新侦查，否决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判决，纳兹万诺夫于 12 月 17 日获释。不可否认，这类冤案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决不是个别的。

苏维埃政权初期，大批知识分子移居国外，其中有的是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或者在以后有杰出成就的人。1913年在世界上最先设计多引擎飞机的航空工程师西科尔斯基，1919年出走，在美国定居，成为设计直升飞机的航空技术专家。生物学家柯连谢夫斯基移居英国，从事老年问题研究，被誉为"老年医学之父"。

生理学家、动物和人类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立者巴甫洛夫，十月革命后一度生活窘迫，研究工作难以继续。1920 年 11 月，瑞典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列宁，请求准许巴甫洛夫去瑞典，"那里可以为他从事自己伟大的研究工作提供良好和安静的环境。"接此信后，列宁写信给人民委员会，说："这件事很丢人。"1921年 1 月，苏维埃政府通过专门决议，创造最良好的条件以保证巴甫洛夫院士和他的同事们能从事科学工作，出版他的科学著作。

苏维埃政权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列宁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列宁不顾实行高薪制所招来的党内外激烈反对，坚持说："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来把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时，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②

① 《列宁文稿》第9卷，第488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784页。

此时，列宁重视知识分子的出发点是要知识分子工作。列宁认为，知识分子的有效工作是苏维埃政权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他一面指责知识分子"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一面又指出，"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会工作。想用棍子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很好的经验"。①

新经济政策时期，科学研究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25年，巴甫洛夫领导的实验室发展成生理研究所。科学院还设立了地震学研究所、土壤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实用矿物学和冶金学研究所、物理技术和放射学研究所、镭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物理化学分析研究所，等等。1925年7月，俄罗斯科学院被作为全苏科学院，成为全国的科学中心。1927年6月，人民委员会审查并批准了苏联科学院新章程，规定科学研究要与工业和文化经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1930年5月，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苏联科学院修改章程，确定科学院为苏联最高科学研究机关。

20年代，在外汇短缺的困难条件下，科学院派到国外考察研究的学者仍然逐年增多。1920年出国考察的学者只有10人，1922年为17人，1924年为25人，1926年增加到44人。科学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瓦维洛夫对植物品种演化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改善了苏联农作物的品质。巴甫洛夫在条件反射方面进行了新的实验，开拓了神经系统生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约费的研究奠定了晶体物理的基础。宇宙火箭飞行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科学地论证了实现人类宇宙飞行的可能性。在原子结构和相对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85页。

论、合成橡胶、无线电技术、土壤学、农业化学等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面，都取得很大成果。

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图波列夫设计局制造出第一架全金属飞机。军事科学研究部门设计出自动武器的各种样品，研制出各种新型的火炮和迫击炮。

20年代苏联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进展，缩短了苏联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第二节　20年代的文坛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成立及其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联合会的简称，它是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业余文艺活动自由结合的群众性组织，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市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成立大会。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归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无产阶级文化司领导。1918年，它的会员约8万人，在各省都设有地方分会，出版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文化》，同时发行《熔铁炉》、《未来》、《创作》等近20种定期刊物。1920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时，它的地方分会已有100多个，参加它举办的各种讲习所和俱乐部活动的近40万人。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是瓦·普列特尼奥夫，协会的灵魂是亚·波格丹诺夫。1922年9月27日，普列特尼奥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在思想战线上》一文，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文艺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主要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称由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来独立地创造"纯粹无产阶级文化"。他们认为，他们进行的不是文化教育工作，而是文化创造工作。根据波格丹诺夫的"纯粹经验"哲学，否认艺术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定反映形式，使艺术脱离生活。实际上他们是在排斥人类文化的精华，把粗俗的、形式主义的、简单化的标点符号当作艺术珍品奉献给群众。

普列特尼奥夫创作的剧本《连纳》对这一理论作了最具体的注释。《连纳》是反映1912年4月西伯利亚连纳金矿工人，为抗议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举行罢工而遭到枪杀的悲壮一幕。剧本的内容是不容否定的。但是，舞台上的人群始终没有变成戏剧中的主人公。五个人同时发出呜呜……声。演出是以宣读当年的新闻大事记来代替悲剧的艺术创造；没有舞台技巧，用"反映群众运动"来代替舞台艺术的个性化。

第二、认为可以从生产方式中简单地得出艺术规律，领导生产的方法、甚至指挥国内战争的方法，也可以搬来作为建设新文化的方法。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竭力鼓吹他们的"新论"、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智力上已发展和提高到足以能够立即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精神文化。他们力图越过积累知识和吸收古代文化成就的必经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文化王国。

第三、抹煞艺术的特殊性，以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观点看待艺术和艺术创作。他们企图直接从物质生产过程的技术中归纳出无产阶级艺术的特点，波格丹诺夫说：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实际原则的研究，不是基于"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和武装斗争的理论"，而是根据"机器生产的劳动技术"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

① 《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第280页。

思想家们根据这一观点来评判文艺作品的阶级性，认为只有拿铁锤的工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反过来说，只要是工人自己创作的，就一定是无产阶级艺术。对于这种庸俗的形而上学理论，列宁在旁边批注着四个字："一派胡言！"克鲁普斯卡娅也批评说："艺术作品并不因为其创作者是无产者出身，就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因为它渗透着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是每一个无产者都很自觉，也不是每一个都体现无产阶级心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有些无产者渗透了小市民的思想意识，有些无产者同无产阶级的理想、无产阶级的纪律和坚毅精神格格不入。"①

俄共(布)中央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评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立以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十分重视这一组织及其活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成立，反映了无产阶级渴望获得文化知识、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迫切愿望；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活动的人，是希望登上文艺舞台的劳动人民。为了不致使劳动人民堕入文化歧途，必须澄清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文艺理论。

1920年12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严肃地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的错误思想，指出："知识分子团体和小团体，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把自己本身的半资产阶级的哲学'体系'和杜撰，强加给先进工人。"信中还说："到目前为止，我党没有干预这件事，是因为我党忙于前线的战事，未能经常对这类迫切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现在，党有可能比较认真地抓文化教育，

① 《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第157页。

党应当更多地注意国民教育的一般问题，其中也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

党中央的信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震动很大。开始时一般群众还认为党中央的信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打击过于严厉。经过各方面的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各级组织，逐渐领会了党中央的信的精神，并解除了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担任的职务。但是，波格丹诺夫的拥护者们仍然试图在文艺舞台上一显身手。

1921年11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决议要求全党更加重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希望它能成为党的为满足无产阶级文化需求的机构之一。决议要求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清除小资产阶级市侩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毒害，在思想上对一切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波格丹诺夫等)赝品代替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企图进行反击。”①

为了有说服力地批驳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文艺理论，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亚·雅可夫列夫根据列宁的建议，写了《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文，批驳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克鲁普斯卡娅在《真理报》上发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文，着重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宗派主义、虚无主义和左倾冒进等错误。卢那察尔斯基在《消息报》上发表《再论关于文化问题》一文，阐述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虚无主义错误。

俄共(布)中央在苏联建国初期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错误理

① 《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第137页。

论的批评，阐述了俄共(布)中央对文化革命的基本理论，以及工人阶级在建设新文化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当时的混乱思想。到1923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以及它所设立的各种组织，就逐渐停止了活动。1932年正式宣布解散。

“拉普”的成立及其活动

“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俄文缩写的音译。

1922年11月7日，由一批转业军人、青年知识分子主办的《青年近卫军》文学杂志，联合“工人之春”文学小组，组成“十月”文学组织。“十月”文学组织就成为“拉普”的前身。

1923年3月，根据“十月”文学组织的提议，在莫斯科召开第一届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成立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莫普”）。“十月”文学组织的负责人罗多夫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的思想纲领及艺术纲领》，作为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纲领。纲领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要“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理和意识组织起来，使其适应于作为世界改造者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无产阶级文学“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创作基础，把当代的现实生活（无产阶级就是这个生活的创造者），把无产阶级过去生活和斗争的革命浪漫精神以及它在未来可能取得的胜利作为创作材料”。①

会议把阿赫玛托娃等人列为“公开的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斥之为“无产阶级阶级敌人的支队”；把“谢拉皮翁兄弟”等列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团体”，说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不可能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会议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文学领域的主

① 《“拉普”资料汇编》上，第3页，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要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文学；为了瓦解敌人的意识，"同路人"文学作为一种辅助力量可以利用，但同时要经常揭露他们的小资产阶级面目；经常不断地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学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产生了理事会，成员有罗多夫、列列维奇、叶夫连莫夫-李别津斯基等。1923年6月，创办《在岗位上》，作为"莫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5年1月，以"莫普"为中心，召开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会议，成立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这次会议根据瓦尔金的报告，通过了《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会议决议》。决议更加发展了1923年《纲领》中关于坚持文学的阶级性的左倾思想，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文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对中间分子的领导权而进行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最后场所之一。认为在文学领域内不同的文学思想流派可以和平合作与和平竞赛的谈论是反动的空想，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贯坚持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调和、不可容忍的。①

决议发表以后，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纷纷对决议所表述的宗派主义和"左"的思想提出激烈批评。

俄共(布)中央十分重视"拉普"的成立以及当时所出现的形势。1925年6月，俄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决议。决议阐明，党将根据新的形势来确定文学政策，"党应当主张文学领域中的不同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赛。任何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只是官僚主义的官样文章，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同样，不允许用一纸命令或党的决议来使某个集团或文学组织对

① 参见《"拉普"资料汇编》第170、171页。

文学出版事业的垄断合法化"①。

党的决议发表后，瓦尔金、罗多夫、列列维奇坚持原有观点，成为"左"翼少数派。1926年2月的非常会议，谴责了他们的错误，撤销他们在理事会中的职务，由表示拥护党中央决议的阿维尔巴赫接替"拉普"的领导职务。

1928年，召开了第一届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以"拉普"为核心，逐步联合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组织，成立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联盟。这样，苏联全国作家组织形成三级形式：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联盟（简称"伐阿普"）、"拉普"和"莫普"，三级组织的核心仍然是"拉普"。

"拉普"存在和活动的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十分活跃的时期。风云激荡的革命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沃野。国内战争结束后，各方面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加入作家的行列，和旧时代相比，文学确是从原来狭窄的天地里解放出来了。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的作家，纷纷组成自己的文学团体，提出不同的主张，发表各自的纲领和作品，进行炽烈的争论和竞赛，构成苏联文学史上独特的一页。当时的文学团体和派别主要有："谢拉皮翁兄弟社"、"左翼艺术阵线"、"岗位派"、"锻冶场派"、"山隘派"等。

这些文学流派组织和团体，发表过众多的宣言和纲领。由于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上的分歧，彼此之间多年展开论战，有时言辞甚为激烈，不免有失偏颇。这种局面，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思想还处在自身发展的探索时期。

20年代的文艺创作，题材广泛，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卡巴耶夫》（1923），塑造了一个被革命唤醒的

① 《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第141—142页。

人民英雄的典型。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描写历尽千辛万苦、经过革命熔炉锻炼的人民群众的觉醒。革拉特科夫的《水泥》(1925)，反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人阶级解放了的劳动热情。法捷耶夫的《毁灭》(1926)，描写在革命洪流中大浪淘沙，人们自我改造的过程。1921年，高尔基到国外养病，在国外完成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左琴科则以他那短小精悍、富有情趣、针砭时弊的讽刺小说风靡20年代。

费定的《城与年》(1924)是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家以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在整个欧洲社会广阔的背景上，展开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政治、两种道德原则的斗争。在如此广阔的画面上揭示现实生活的重大变革，体现出作家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才华。列昂节夫的小说《獾》通过农民之子巴维尔和谢苗兄弟的不同生活道路，展现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的剧变，以及农民走向新生活的艰苦历程。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农民终于觉悟过来，不再象自私的动物獾那样躲在洞穴中生活。

在诗歌创作方面，马雅可夫斯基象一颗新星升起来。十月革命初期，马雅可夫斯基很快摆脱未来派影响，成为革命的号手。叶赛宁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终于站到新时代歌手的行列里来。他以意新语工、韵律优美的诗歌，“把那简称为‘俄罗斯’的六分之一的地球歌唱”①。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用词绮丽典雅，结构小巧玲珑，被称为“俄罗斯的萨福”②。

随着文艺创作的繁荣，作家们对文艺创作的一些重大理论

---

① 《叶赛宁评价及诗选》第134页，198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萨福是公元前七——前六世纪古希腊女诗人，以写爱情抒情诗著称。

问题也展开讨论。关于文艺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问题，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们提出众多的主张和口号，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红色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等等。尽管口号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都力图寻找一种反映现实发展的新型的现实主义。

20年代后期，"拉普"中居领导地位的理论家们提出"为文学和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斗争"的口号。他们认为，文学家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先得研究马列主义哲学，要先从共产主义高等学校毕业，然后才能在创作中加以运用，才能从事写作。"拉普"的理论家们还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只有"拉普"这些无产阶级作家才能掌握，其他人因为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只能望文兴叹。"拉普"领导层中的这种文艺理论，遭到一大批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们的反对，并展开激烈争论。

第三节　哲学领域的争论

"机械论"的兴起及活跃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哲学领域里占了优势。意识形态固然需要行政权力的保护，但是最终取得统治地位还取决于意识形态领域自身的斗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1918年5月，人民委员会决定创办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923年改名为共产主义学院)。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是：科学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中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并培养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干部。1921年1月，俄共(布)中央决定在莫斯科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院。同时，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红色教授学院。从此，苏联开始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培养有较高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员。

20年代初，有些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的哲学相比，它的新东西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他们还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功绩只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并同费尔巴哈的认识论结合起来，至于在认识问题上，没有超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范围。

1922年是费尔巴哈逝世五十周年，苏联举行盛大的纪念会，出版纪念文集。哲学家谢姆科夫斯基在一篇论文中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唯物主义的基础说来就是同一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不过它得到了充实并被提高到了新的阶段”①。另一名哲学家罗赫金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辩证法的高度结合。他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借以建立科学共产主义大厦的基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实践先于理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融洽、科学和生活的密切结合、无神论——这些就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成分。这些成分完全保留在现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中，即马克思主义中。”② 这种观点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领域里的革命，被一部分哲学家认为是机械论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

1922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1—12期，发表彼得格勒大学校长米宁题为《把哲学抛开》的文章。文中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应用一些旧名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

---

①② 转引《哲学译丛》1978年第3期第55页。

科学的哲学涵义'，等等。这些被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应用的名词，只不过是一些笔误，此外一无所有。为了装备和整顿这只大船，我们必须注意不仅把宗教，而且也把整个哲学抛开"①。米宁的文章发表后，在自然科学界和哲学界，一些抱有相似观点的人，纷纷发表文章，支持、补充米宁的意见。影响最大的是斯捷潘诺夫和季米里亚捷夫。

斯捷潘诺夫于1924年发表《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讲稿。讲稿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的方法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并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这篇讲稿提交给国立季米里亚捷夫自然科学研究院讨论时，得到很高的评价。研究院还以决议的形式，拥护斯捷潘诺夫的观点。

1925年，俄共(布）中央为了加强全国理论工作者队伍的思想建设，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斯捷潘诺夫针对该书的出版，写了《恩格斯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一文，说恩格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已改变了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态度，并说恩格斯曾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精密科学才能继续存在。

米宁和斯捷潘诺夫等人，实际上是反对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代表和反映了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德波林学派和"机械论"者之间的争论

正当斯捷潘诺夫等人十分活跃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德波林站出来反驳。德波林接连发表了《恩格斯和

① 转引《苏联两次哲学论战述评》，见《外国哲学与哲学史》复印报刊资料，1983年第9期第67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

辩证法的自然观》、《唯物主义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我们的分歧》等论文，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1927年，德波林又写了《恩格斯和生物学中的辩证法》一文，批评生物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在解释生命起源问题上"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拥护德波林学说的一批哲学家被称作德波林学派，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机械论"。争论日趋激烈。1928年，斯捷潘诺夫发表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德波林学派》，指责德波林学派"信奉活力论和唯心主义"，说德波林的哲学思想"在现代科学最尖锐的问题面前无能为力，它既不是工人阶级的理论，也不是科学活动的指南，而是空洞的直观"①。

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唯物辩证法是不是科学？研究自然科学要不要以唯物辩论法为指导？

斯捷潘诺夫等人认为，唯物辩证法只是一种方法。他们否认唯物辩证法是全新的科学，进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他们提出"丢掉哲学"、"科学本身就是哲学"等口号。斯捷潘诺夫曾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某种单独的、独立于科学之外的"哲学研究"领域是不存在的，唯物主义哲学就是现代自然科学最新的和最一般的结论。对此，德波林反驳说，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化趋势同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得自然科学理论出现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为现代自然科学提供方法论的迫切任务。德波林说，"现代自然科学的危机是它的方法论基础的危机"，"摆脱现代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②。

① 见《外国哲学与哲学史》复印报刊资料1983年第9期第68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

② 见《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第446页，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德波林对斯捷潘诺夫等人的反驳，反映了苏维埃政权和俄共(布)中央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统率社会思想意识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因此，反驳缺乏说服力，更不具备实践的意义。

第二，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斯捷潘诺夫等人把因果律、连续律看作物质世界存在的最基本原则，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世上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他们一方面把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绝对化，并以此来否认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片面强调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否认事物发展中的质的差别和质的飞跃。季米里亚捷夫把偶然性归纳为"我们所未知的东西"，并把质的多样性归结为纯粹量的差别。这种观点是进化论和不可知论的一种反映。

德波林反驳说：对立统一规律才是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因果律与统计律、必然性与偶然性、连续性与间断性、质与量，都只能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得到解释。他针对论战对方把偶然性归结为"未知"，反驳说：1.偶然的东西之所以是偶然，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原因未为我们所知；2.偶然现象本身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不是无缘无故的；3.偶然现象是客观的。

德波林在20年代的哲学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不过德波林在论战中也表现出黑格尔唯心主义倾向。这点，德波林自己也有所觉察。他在事后回顾这段论战时说："我个人因为主要努力于阐明费尔巴哈、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近点，而忽视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尖锐地矛盾着的东西。因此不可避免地使我偏向于费尔巴哈、黑格尔，偏向于费尔巴哈及黑格尔之过高的评价"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第372页，1953年人民出版社。

在论战中，德波林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有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德波林学派在论战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几乎是人类社会哲学论战历史的普遍性问题。某一唯物主义学派并不意味着它的学说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它在对待论战的对方时往往也带有过激的片面的成分。德波林学派的缺陷除了德波林本人思想上的缺陷之外，也有时代的局限。

1929年4月，召开了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机构第二次代表会议，对20年代哲学论战进行总结。德波林在会上作了题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报告。会上通过的决议指出，机械论学派"以庸俗进化论偷换革命的辩证法，以实证主义偷换唯物主义，它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是一种"积极的修正主义派别"。决议也批评德波林学派"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①。

德波林学派还来不及总结与回味这场论战，一场新的批判运动就降临到他们头上。

第四节　经济学领域的争论

20年代初期的经济学

1920年初，布哈林写了《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作者在序言中说："我在本书中想分析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② 此书是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探讨苏联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经济范畴，展示城乡关系的变化，

① 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1辑，第208页，1984年人民出版社。

② 《过渡时期经济学》第6页，1981年三联书店。

考察国家政权的作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布哈林最先以科学的态度从理论上探讨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

本书成书于1920年，不可避免地带有"战时共产主义"的烙印，如否认商品经济在过渡时期的作用，赞扬强制（甚至赞扬对无产阶级自身的强制）。此外，由于缺少正常状态下的过渡时期的实际经验，书中常常是抽象论述和逻辑推论多于实际经验的总结。作者自己说，这是"从理论化的横断面去描绘事物和过程"。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各种经济思想也活跃起来。

20年代初，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热烈的讨论。

1923年，经济学教授索恩采夫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导言·对象和方法》一书。该书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在自发势力占统治地位和经济关系偶然化的社会里才有必要作为科学存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还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只是商品资本主义生产，只研究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一般也只有资本主义部分，只讲述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积累、再生产等题目。

1925年1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举行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会，波克罗夫斯基主持了这次讨论会。斯切潘诺夫在会上作了题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提供的不是某一个别经济发展时代的理论，而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和交替的理论。他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主张"把眼界向两方面扩

大：既向前又向后——既向社会主义又向封建主义"①。他批评把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仅仅是交换社会的理论"、"关于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是一种"著名的成见"。

有10多人在讨论会上发言，其中只有波格丹诺夫和波克罗夫斯基两人支持斯切潘诺夫的意见。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德沃拉伊茨基、奥新斯基、克里茨曼等人在发言中都不赞成斯切潘诺夫的意见。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了。会后，列昂节夫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关于理论经济学的历史范畴问题》一文，认为政治经济学公认的对象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经济学界还就生产力的概念问题作过讨论。有的经济学家把生产力等同于技术，还有的则把生产力等同于生产率。1922年，米隆诺夫在《技术中的革命》一书中说："技术和生产力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不同的名称"②。1925年，叶菲莫夫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13期上发表《生产力》一文，摘引和评论了有关著作使用生产力一词的不同含义。作者概括说："生产力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实际的总和，而是理论的抽象……生产力不是物的范畴，而是职能的范畴。"③可见作者自己对生产力的理解也是模糊的。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争论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接近完成，苏联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就突出起来，不仅一般的经济学家关心它，党和国家的经

① 见章良猷编《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第116—117页，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

② 同上书，第178页。

③ 同上书，第179页。

济政策决策层更加关心它，使积累和消费问题的争论越出了经济学界的范围，牵连着党内派别斗争。

财政人民委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8期上发表《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并以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货币和利润的作用、工业化道路和资金来源、过渡时期工农关系等问题。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引起了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一场新的讨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战的主要对手是布哈林。布哈林除了在具体经济政策方面进行驳斥外，在理论方面，他在批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的同时，提出以"劳动消耗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布哈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计划性也增长，因此，作为商品经济自发调节者的价值规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失去作用，但是，价值规律就其物质内容来说，不只是私人商品生产的调节者，而是社会劳动的按比例的分配的一般规律的特殊的具体历史表现形式，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形式改变了，但物质内容仍然存在。他的论据是建立在马克思的一段话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

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①

布哈林在解释马克思这段话时，把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说成是"劳动消耗规律"，他认为这是经济平衡的一般条件，是经济生活的万能调节者，这个规律在商品经济中是通过市场的自发波动，是通过物的关系实现的，所以给自己穿上了价值规律的拜物教的外衣。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工的自发的形式被自觉的有计划的形式所代替，计划可以在事先就考虑到社会劳动分配的比例，事先就达到社会劳动分配的平衡，而不象资本主义市场那样通过不断破坏平衡来实现平衡，所以价值规律就转化为普通的劳动消耗规律，或者说，劳动消耗规律"脱去了价值规律的罪恶的外衣"。

根据以上论据，布哈林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对立起来。他认为，社会计划因素同市场斗争是有的，但这只是社会形式的对抗，而就其物质内容来说，是不存在对抗的，就是说，虽然存在着国营经济和小农经济这种形式的对立，但是，不应该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去搞不等价交换，而应该按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物质内容——劳动消耗规律办事。布哈林认为，如果在工农业之间搞不等价交换，就会破坏工农业再生产的比例。布哈林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恰恰由于不懂得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这个道理，所以提出了用不等价交换的办法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以保证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的办法。布哈林认为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我们才能持续地保持最大的速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才会打破纪录。然而，这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1—282页。

而远不是以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为前提。"① 布哈林认为，强调平衡，并不就是要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比例，也不是意味着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反而可以使经济发展更快些。他设想把计划变成实现价值规律内容的手段，不要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形式，而要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内容。因此，他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同，不是偏重于高积累和采用行政手段，而是偏重于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平衡的投资增长，考虑市场的需求，在中央集中管理下适当分散。他的主张是："我们必须把那些为社会主义工作的经济成分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这就要求把个人的、集团的、群众的、社会的和国家的主动精神错综地配合起来。"②

可见，布哈林已经注意到集中和分散、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问题。当然，布哈林的理论也并不彻底，他通常把市场的存在同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联系在一起。

20年代后期的经济学

过渡时期经济基本特征问题，是2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1926年，共产主义科学院举行"苏维埃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经济学家认为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时期，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和交换关系联系在一起。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还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存在着计划性和价值规律两个调节者。

1926年，列昂节夫和赫麦尔尼茨卡娅在《苏维埃经济》一书中也表述了计划性和自发性相结合是过渡时期经济基本特征的观点。作者认为，过渡时期经济一方面是自发性和计划性两者

① 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年9月30日《真理报》。
② 同上。

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自发性和计划性的一定方式的结合。该书还说，应当明确区分两个方面，在苏维埃经济中有非社会主义成分的商品范畴；也存在新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的商品货币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人们所接触到的是“掩盖着经济结构的社会主义内容的商品资本主义范畴的外壳，事物的本质与表现形式在这里是不一致的①”。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问题，当时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期之后将是一个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时期。尤罗夫斯基在1926年第12期《财政通报》上撰文《论苏维埃经济制度中的计划和平衡问题》，以及1928年出版的《苏维埃政权的货币政策》一书，都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是介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战时共产主义”模式之间的一种模式。他认为苏联过渡时期的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商品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出现的一个通常阶段。

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再回复到更高级的社会主义自然经济。

20年代末，随着批判布哈林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经济学领域里着重批判右倾的“机械论”，鲁宾被作为“机械论”的代表者。1928年，鲁宾的《马克思价值论概论》第三版出版。别索诺夫、科恩等人撰文激烈批评鲁宾割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有机联系，把政治经济学分割成社会技术学和理论政治经济学两门科学。1929年8月，《真理报》发表布塔耶夫的书评文章，又激烈批判机械论。鲁宾观点的支持者又起来反驳，争论十分

① 参见《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第369页。

激烈。

1929年10月10日,《真理报》编辑部发表声明:1.编辑部认为,关于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鲁宾著作的讨论远没有结束;2.争论双方的理论都有错误,这些错误应当由共产党人经济学家用集体的科学思想来纠正;3.把鲁宾的有争议的著作说成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掩盖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立场是错误的;4.对别索诺夫和科恩的不同意见,可以在书刊评论中加以分析。声明表示,编辑部希望经济学方面的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辩证法的基础上联合起来①。

《真理报》的声明表达了联共(布)中央的意愿,即要求经济学领域里的学术讨论服从反右倾斗争的政治需要。紧接着,红色教授学院经济学家会议通过决议,强调理论经济学方面的讨论应当服从反右倾斗争的任务,警告机械论如果继续滑下去,"有可能同布哈林及其学派的非马克思主义、非辩证法的立场合流"。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也通过了相似的决议。经济学领域里的争论遂告一段落。

---

① 见1929年10月10日《真理报》。

第七章　20年代苏联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转变

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俄国处于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孤立境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对外关系上，苏维埃政府的战略任务是要创造一个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维护国家独立的外部环境。为了实现这个战略任务，苏俄政府立足于自立更生，努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重视争取国际援助。从传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出发，苏俄曾对世界革命的援助寄予莫大的期望。列宁一再强调，"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①。并指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在列宁看来，如果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不立即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俄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8页。

革命“非失败不可”①。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政府把唤起世界革命作为外交战略的重要方针，在对外活动中采取了某种进攻性的立场。从颁布《和平法令》起，就把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进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它号召“实行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宣称要“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效地进行到底”，“解放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这一时期苏维埃政府发出的大量外交函件，大多是越过各国政府，直接向各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发出呼吁，建立革命联盟，联合反帝。此外，还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影响，激励世界人民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但是，1917年底到1918年春，世界革命并不如人们想象那样迅速到来，欧洲无产阶级没有立即行动起来，进行革命发动，从而阻止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在依靠世界革命来改善国际环境的希望不可能迅即实现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采取比较冷静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主动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进行接触，并作出较大的让步和牺牲。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进行，苏俄处在同德奥等同盟国交战的状态。德军占领着俄国西北部大片土地，随时存在对苏俄发动军事进攻的危险。而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民心等方面都难以进行自卫战争，一旦遭到德军的进攻，就有灭亡的危险。因此，结束同德奥集团的交战状态，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成了苏俄最紧迫的外交任务。1917年11月8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各交战国政府发出照会，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进行和平谈判，缔结普遍的公正的民主和约，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当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0页。

时英、法、美、意等国以为胜利在握，反对和平谈判，对苏俄的和平建议置之不理。但德奥等同盟国为了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腾出力量集中对付西线，愿意在东线媾和。苏维埃政府在一再遭到协约国各政府的拒绝后，为了早日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喘息时机来巩固政权，聚集力量，作好反侵略准备，决定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单独同德国进行谈判，并于1918年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和约使苏维埃俄国赢得了可贵的和平时机，这是苏维埃政府"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第一次在很大的范围里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①。

1918年11月11日，德奥同盟国集团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此时，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俄又面临新的困难处境。帝国主义结束了互相厮杀的状态。战争中获胜的协约国有可能进一步支持俄国的反革命势力，并发动直接的武装干涉。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国际地位孤立无援的不利条件下，苏维埃政府力图继续使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的斗争策略，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准备用割地赔款等让步、牺牲以求得同协约国媾和。1918年11月23日，苏维埃政府向英、法、美、意、日各国政府发出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书。12月间又多次向西方各大国政府呼吁进行和平谈判，实行媾和，缔结和约。1919年2月4日，苏维埃政府通电英、法、美、意、日政府，表示为了谋求和平，准备作出让步。指出只要协约国不干涉苏俄内政，苏俄可承认以前各届政府的债务，同意偿付旧债利息，提供矿山、森林的租让权，同时准备商谈有关领土问题。当时巴黎和会正在召开。2月18日，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秘密指示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驻俄大使布利特前往莫斯科去进一步了解苏俄的媾和条件，并带去了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59页。

英美和平条件的建议书。2月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同布利特以英美方案为基础开始了谈判。3月 11 日，列宁亲自参加了谈判。次日，双方就媾和的 7 项条款达成协议，并在草约上签了字。其主要内容是：在一切外国军队撤离俄国，协约国停止对苏俄国内一切反政府的军事援助，恢复外交关系，撤销对俄国的经济封锁等前提下，苏维埃政府允许保留实际上存在的白卫政权，允许各协约国臣民自由进入苏俄，赦免双方全部政治犯，遣送各国战俘回国，恢复同外国的贸易关系，实现和平后解决对协约国的债务，复员超员的军队，交出或销毁多余的武器。这是类似布列斯特和约一样的"条件极为苛刻的和约"，但是，为了免受战争的苦难，减少人民的痛苦，苏维埃政府毅然决定"交纳沉重的贡款来换取和平"①。不久，英美政府突然变卦，收回了自己提出的条件，撕毁了草签的协议，中断了刚开始的谈判。1919年3月，协约国发动了第一次武装干涉。

第一次外国武装干涉开始后，苏俄政府一方面领导人民浴血奋战，英勇抗击外来侵略，另一方面，仍争取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同协约国的关系，在外交战线上发动了强大的和平攻势。1919年5月，苏俄政府对协约国提出新的和平建议。1919年 9 月，列宁在《致美国工人》的信中再次表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②。1919年 10 月 5 日，列宁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同布利特先生共同拟订的我国的和平条件"③。同一时期，列宁在同其他外国记者谈话中多次声明，1919年 3 月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85页。
② 同上书，188页。
③ 同上书，200页。

与布利特拟定的和平谈判协定草案中提出的一切建议继续有效。但是苏俄的和平努力均遭协约国的拒绝。

1919年11月底，红军粉碎了协约国第一次武装干涉，在新形势下，苏俄仍不放弃和平的努力。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再次向英、法、美、意、日各协约国发出立即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并责成苏维埃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由于当时红军已取得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重大胜利，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苏俄对协约国的外交策略及时地作了调整，决定不再单方面作出任何重大牺牲，不再以重大的领土让步和政治的经济的让步为代价求得同协约国签订不平等的和约，而是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协商谈判，在双方互相让步的基础上实行妥协，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这时，协约国各国政府仍迷信于武力征服，顽固拒绝苏俄的和平努力。从1918年夏到1919年底的一年半时间内，苏俄的和平外交虽然没有促成和约的签订，但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在战场的流血斗争。

在国内战争期间，苏俄在外交战线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推进世界革命，努力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前线后方阻止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进攻，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对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给苏俄的支持一向十分重视，一再强调"全世界工农劳动群众，甚至最敌视我们的强国中的工农劳动群众都支持和同情我们，正是这一点成了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使敌人对我们的一切侵犯归于失败"①。"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都寄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22页。

托在世界革命上"①。1918年底到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荡下，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掀起了革命风暴，并且发动了"不许干涉苏俄"的群众运动。这时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对世界革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又升起了希望。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国际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共产国际。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满怀激情地宣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②。共产国际成立初期，为推进世界革命，声援苏俄反武装干涉积极开展活动。

在国际工人阶级的声援下，苏俄人民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在同国际帝国主义第一轮大规模军事对抗中赢得了胜利。从此，苏俄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关系的初步形成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由于多种原因，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的主要大国之间经历了一段尖锐对立，激烈对抗的时期，经过几年的较量，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才从武装冲突转为和平共处的关系。

1920年初，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出现某种"相对的均势"，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

由于武装干涉苏俄已基本失败，经济危机的困扰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各大国统治集团在对待苏俄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一部分顽固派坚持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武装干涉的旧政策，但是相当一部分当权者被迫正视现实，要求同苏俄恢复经济和政治关系。1920年1月1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宣布解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503页。

除对苏俄的经济封锁，接着，重利务实的英国统治集团率先同苏俄进行了经济谈判。

20年代初，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相继失败，期望在短期内爆发"国际革命"，在世界上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已无实际可能。与此同时，国内战争结束后，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切要求苏维埃俄国改善外部环境，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联系。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①。苏维埃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从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到具体政策措施作了及时的调整，坚决奉行和平、开放的外交路线。1920年2月18日，列宁宣布苏维埃俄国愿"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愿同所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建立经济联系。为了推进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1920年初决定成立全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负责对外贸易事宜。同时为了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让外国资本家直接到苏俄开办工矿企业，同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实行经济合作，1920年1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租让法令。

20年代，苏俄虽不象革命胜利初期那样把维护民族独立寄托于世界革命之上，但仍然视自己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把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国际主义的义务，同时把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为改善自己国际地位和增强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外交实践上努力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同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革命立场有效地结合起来。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20年代，苏俄同一大批资本主义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67页。

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加强了经济联系，进入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新时期。

第二节　20年代初苏俄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同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关系

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建立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对保障苏俄安全具有特殊的意义。为拆除西方列强进攻苏俄的桥头堡，堵塞反苏十字军的进军通道，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就致力于改善同邻国的关系，建立一个防护性的安全圈。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成了苏联推行睦邻政策的首要目标。十月革命后，芬兰（1917年12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1918年12月25日）先后脱离俄国而独立。协约国力图将它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联成一线，在苏俄西部边界构筑反苏的"防疫带"。在国内战争期间，其中有些国家曾追随协约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为了瓦解反苏联盟，苏俄作出了重大让步，同上述国家先后签订了睦邻和约。1920年2月2日，苏俄首先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和约规定双方不得允许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和驻留敌视对方的组织和集团，并确定了两国的国界线。这是苏俄签订的第一个国际和约，列宁指出，"这项和约是一扇通欧洲的窗户。它使我们有可能同西方各国进行商品交换"①。同年7月12日和8月11日又先后和立陶宛、拉脱维亚签订了内容与爱沙尼亚和约相同的和约。10月14日，苏俄又同芬兰签订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9页。

和约，划定了两国边界和芬兰湾的领水宽度。12月 31 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波兰是苏俄西部的重要邻国。1918年8月29日，波兰脱离俄国而独立。在协约国的支持下，1919年8月波兰军队占领明斯克。1920年4月25日，波兰向苏俄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侵占了基辅。6月，红军收复了明斯克和基辅。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照会苏俄政府，要求苏俄红军在格罗德诺—布列斯特—普热米什尔到喀尔巴阡山一线以东 50 公里处停止前进，并举行苏波谈判，以上述一线(即所谓"寇松线")划定两国边界。7月 17 日，苏俄政府照会英国政府，表示同意举行苏波和平谈判。但当时，苏俄政府被前线的一时胜利所迷惑，未同波兰立即举行谈判，却命令红军越过寇松线，直捣华沙城。红军在华沙战斗中受挫，被迫退出波兰国土。同年9月，苏俄和波兰在里加举行和谈，10月1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1921年3月18日签订了《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约规定以寇松线以东 150 英里处为国界线，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归并入波兰版图，双方彼此尊重国家主权，保证不支持任何针对另一方的敌对行为。

土耳其、波斯(伊朗)和阿富汗是苏俄的西南邻国，苏俄政府先后于 1921 年 2—3 月间与上述各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波斯(1935年国名更改为伊朗)于 1905 年和 1915 年两次被帝俄和英国划分为两国的势力范围。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对波斯奉行民族平等政策。1920年10月，苏俄政府建议波斯举行谈判，建立睦邻友好关系。11月，波斯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1921年2月26日，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宣布废除沙俄同波斯以及同第三国签订的涉及波斯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波斯所欠沙俄的一切债务，互不干涉内政，保证禁止在各自领土上

建立和驻留旨在反对对方的组织和集团。如遇帝国主义外来武装干涉，双方将采取共同措施。条约巩固了和波斯的睦邻关系。

阿富汗在1919年2月28日宣布政治独立。不久，英国为扼杀阿富汗自由独立对阿富汗发动了侵略战争。为了争取苏俄的支持，阿富汗政府在4月7日致函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加强两国的团结和互相支持。苏俄政府积极响应阿富汗政府的倡议，并立即互派代表在双方的首都进行谈判。1920年9月13日，在喀布尔签订了苏俄—阿富汗初步条约。1921年2月28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俄和阿富汗友好条约，相互承认对方独立，保证不与第三国缔结有损于对方的一切军事或政治协定。苏俄还同意向阿富汗提供财政和物资援助。友好条约的签订促进了两国睦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土耳其于1918年10月掀起了反帝武装斗争，但在同年11月遭到了协约国的武装干涉，面临民族危亡的威胁。为了争取外援，凯末尔领导的国民政府于1920年春致函苏俄政府和列宁，表示土耳其愿与苏俄并肩战斗，并希望得到苏俄的援助。苏俄政府复电欢迎凯末尔政府的声明。同年6月，苏俄政府第一个承认凯末尔政府，并于1921年3月16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俄土两国友好条约。条约规定相互尊重两国人民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政体的权利，建立两国持久的友好关系，在反帝斗争中加强团结。条约还宣布废除帝俄强加于土耳其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土耳其对沙俄的一切债务。此后，苏俄对土耳其提供了军事和物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土耳其的反帝斗争，也使得帝国主义将土耳其作为侵苏跳板的企图成为泡影。

中国是苏维埃俄国最大的邻邦。当时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境地，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的重要据点。因此，苏俄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既重要又艰巨。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一再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同时还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和在北京的北洋政府进行了接触和联系。1918年7月，苏俄政府通知北京政府表示愿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取消沙俄在华一切特权、领土和租界，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进行谈判，但遭北洋政府的拒绝。1919年5月，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7月25日，苏俄政府公开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史称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重申废除沙俄时期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和赔款；并要求同中国人民的代表就其他一切问题进行谈判。北洋政府对此严加封锁，置之不理。1920年8月底，苏俄政府派遣外交使团到北京访问，受到北京政府非正式接待。通过谈判，9月23日，北京政府宣布中止对前沙俄驻华使节的承认。同时派遣使团前往莫斯科访问，该使团受到了列宁的接见。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除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内容外，还强调迅速建立两国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的条约，并要求中国政府不给一切俄国反革命势力以任何支持，禁止他们在中国境内活动。在帝国主义的干预下，这个宣言仍然未得到北洋政府的响应。1921年12月，苏俄又派使团来华进行谈判，但仍未达成协议。1922年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均开始同苏俄建立贸易关系，并进行外交谈判。在新的国际背景下，苏俄同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有了重大的进展。1922年8月底，苏俄派遣以越飞为首的代表团访华，同北京政府进行全面谈判。双方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苏俄政府改变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诺言，强调中东

铁路系由俄国出资建造，并关系到苏俄的国防安全，故要求中俄共管中东铁路。北京政府反对共管，要求苏俄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在外蒙古问题上，北京要求苏俄放弃支持蒙古独立的立场、并从蒙古撤军①。苏俄政府拒绝了北京政府的要求，谈判遂告中断。1923年9月2日，苏俄政府派遣外交副人民委员加拉罕来华进行建交谈判。北京政府指派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负责谈判事务。在谈判中，苏俄主张先恢复邦交，再讨论悬案，答应废除沙俄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不取消1921年签订的苏蒙友好条约，同意撤退驻蒙苏军，但要在外蒙的帝俄白卫军被肃清以后再实现。通过反复协商，1924年3月14日，两国签订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等草案。同年5月31日，正式签订了《中苏协定》，宣布两国互相承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协定包括《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7个声明书和2件公函。其主要内容为，废除帝俄时期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租界地和其它特权，苏俄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尊重在其领土内中国的主权，中东铁路纯属商业性管理机构，只能统辖本身经营业务，凡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收、地亩等涉及中国主权的事务均由中国政府办理。《中苏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立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有助于改善中苏两国的关系，对一贯阻挠和破坏中苏友好关系的国际反动势力予沉重打击。

苏英贸易协定的签订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苏俄开始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由于反

① 1921年3月13日，蒙古人民临时政府成立，7月6日苏军进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同年11月5日，签订《苏蒙友好条约》，规定苏俄政府"承认蒙古人民政府为蒙古唯一合法政府。"

苏武装干涉刚结束，要求刚刚收起屠刀的西方列强立即在政治上承认苏俄不太现实，因此，苏俄政府决定以贸易为突破口，首先恢复经济联系，然后促成政治关系正常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苏俄政府把英国作为打开对外贸易大门的首要对象。战前，英俄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1921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对外贸易锐减1/2，迫切需要重新获取俄国的传统市场。苏俄政府敏锐地觉察国际形势的新动向，及时抓住时机，果断采取行动，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1920年1月1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宣布撤销对苏俄的经济封锁后，苏俄政府就加强了和英国的接触。2月12日签订了英苏互换战俘协定。5月26日苏俄政府又以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名义派出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英国进行谈判。苏俄代表在谈判中要求停止战争状态，取消经济封锁，相互建立商务代表处，并要求英国停止支持正在进行反苏战争的波兰。英国代表要求苏俄政府放弃支持东方各国敌视英国的态度，并承认沙俄时期的债务。谈判时断时续，直到1921年3月16日两国才正式签订了《英俄的通商协定及关于承认赔偿宣言》，即英苏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两国恢复贸易关系，互相消除任何形式的封锁，互设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放弃针对另一方的敌对行动和宣传，两国侨民有权返回祖国。在附属宣言中，苏俄表示对曾为俄国提供商品和劳务的私人给予应有的补偿，但这些问题将留在和约签订之后再解决。英苏贸易协定不限于单纯的贸易关系，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它意味着英国"对苏维埃俄国事实上的承认"。这是苏俄同资本主义大国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双边关系，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21年5月6日，苏德签订了恢复贸易关系的临时协定和关于交换战俘和被俘人员的补充协定。德国比英国更超前一步，承

认苏俄驻德商务代表为苏俄驻德的唯一合法代表，享有外交特权。1921年中，苏俄还同奥地利、挪威、意大利、丹麦、捷克斯洛伐克等12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这些贸易协定结束了苏俄外交孤立的状态，大大改善了苏俄的国际环境。

热那亚会议和拉巴洛条约

在1921年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苏俄政府在1922年继续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参加热那亚欧洲经济会议和签订拉巴洛条约。

1921年苏俄发生严重灾荒，10月6—8日，19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援助苏俄度过饥荒"的会议，表示在苏俄偿还旧债和发还国有化的原外国企业的前提下，各国将考虑给苏俄发放贷款和救援。10月28日，苏俄政府照会英、法、意、美、日等国，表示如承认苏维埃政权，对苏俄提供优惠贷款并缔结和约，可以考虑各国所提要求，并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问题。1922年1月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法国戛纳集会讨论苏俄建议问题，最后决定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包括苏俄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会议。戛纳会议还拟定了与会各国共同遵守的原则，其中包括任何国家均无权将本国的所有制、国家经济体制及管理制度强加于别国，每个国家有权为自己选择它所喜欢的制度，保障外国资本、外侨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承认一切外债，归还一切被没收的外国人的财产，保证金融货币流通，不得进行敌视别国的宣传，保证不对邻国发动武装进攻。声明如苏俄接受上述原则，协约国可正式承认苏俄政府。同年1月7日，意大利政府受戛纳会议委托，向苏俄政府发出了出席热那亚会议的邀请书，并希望列宁率领代表团出席会议。1月8日，苏俄政府复照，表示接受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发出的出席热那亚会议的邀请，并表示

即使列宁因工作繁忙不能出席会议，代表团仍具有列宁亲自参加一样的权威。1月 27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决定组成以列宁为团长、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并责令如列宁不能赴约，契切林享有团长的一切权力。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代表团为出席会议作了周密的准备。列宁亲自主持制定了谈判原则和具体策略，审阅和修改了契切林准备在会议上作的各项发言稿。根据列宁指示，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基本任务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贸易和经济合作。列宁强调："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并寻求发展贸易的最有利的形式"。列宁要求代表团提高斗争艺术，指出"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到热那亚去。我们要作生意，他们也要作生意；我们希望作有利于我们的生意，他们希望作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怎样展开，这就要看我们外交人员的艺术了"①。列宁还强调要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扩大它们的裂痕，继续执行让步政策，减少斗争的阻力。为了扩大同盟者，苏俄倡议邀请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政府派代表出席热那亚会议，并尽力争取协约国集团中的中小国家和战败国的支持。列宁还指出，如果在热那亚会议上不能达到达成协议的目的，就在会外达到目的，先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协议。

1922年 3 月底，以契切林为首的苏俄代表团前往热那亚出席会议。代表团在途中同许多国家进行了谈判。3月 29 日，代表团同拉脱维亚、波兰、爱沙尼亚举行会谈，达成了彼此在热那亚会议上一致行动的协议。三国还声明，为了复兴东欧，必须在法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70、72页。

律上承认苏维埃政府。为了瓦解帝国主义反苏同盟，苏俄决定利用战败国同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力争同德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这时，德国为了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提高国际地位，也力图和苏俄接近。4月 4 日，苏俄代表团在柏林同德国总理维尔特和外交部长拉特瑙进行了谈判，双方保证在热那亚会议上保持密切的联系。4月 10 日，热那亚会议在圣乔治宫开幕。有 34 个国家的代表和大财团、大公司的代表共 2000 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分政治、经济、财政和运输 4 个专门委员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外交部长巴尔都、德国总理维尔特等亲自率代表团参加会议。美国派驻意大利大使以观察员的身分列席会议。意大利首相法克塔担任会议主席。法克塔和劳合·乔治在发言中强调，会议要以戛纳会议的决议为基础，共同努力克服经济困难，"医治欧洲"。巴尔都在发言中强调不允许讨论任何修改凡尔赛条约的问题。维尔特则强调德国处境艰难，希望得到国际援助。契切林在发言中强调各国应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共同合作，以复兴欧洲经济。他指出，"俄国代表团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观点，承认在当前这个旧制度和正在生长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同时并存的历史时代，为了普遍的经济恢复，代表着这两种所有制体系的国家之间实行经济合作，是绝对必要的"。他强调俄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俄国的经济恢复是世界普遍经济恢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加强经济合作，苏俄准备提供森林、煤矿和矿石的租让权，并愿将大片可耕地租让出去。契切林强调和平对于恢复经济的重要意义，指出只要欧洲和全世界的上空还笼罩着战争威胁的时候，恢复世界经济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表示苏俄在会上将提出一项全面裁减军备的建议，要求普遍裁军、降低军备、禁止采用毒气、空战和毁灭性武器。契切林还要求在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召开世界大会，大会应设

立若干委员会，拟定全世界恢复经济的计划。契切林声明支持修改国际联盟章程的要求，努力消除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区别，铲除一些国家统治另一些国家的现象。并表示原则上承认戛纳决议的条款，但保留修改、补充的权力。苏俄代表团的建议遭到西方大国的抵制，特别是法国代表坚决反对讨论裁军和修改凡尔赛条约问题。劳合·乔治在政治小组委员会的会议上提议以1922年3月20—28日在伦敦举行的专家会议所拟定的备忘录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备忘录要求苏俄承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债务和财政义务，在苏俄成立债务委员会及仲裁法庭，苏俄应缴付180亿卢布以偿还这些债务，将已国有化的企业一律归还外国原主，取消对外贸易垄断权，给外国臣民享有治外法权，停止在一切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苏俄代表团要求政治小组委员会休会，以便研究专家委员会报告的内容。4月14日，苏俄代表团应英、法、比等国代表之请，在阿尔伯蒂别墅举行非正式会晤。苏俄代表断然斥责了专家会议方案中提出的奴役性要求，主张将战前债务与战时债款相区别，苏俄只准备在协约国承认苏俄并给予贷款的条件下偿还俄国战前的债款，战时债款一律不还，已实行国有化的原外国企业拒绝归还，但愿在遵守对等原则的条件下作一定的赔偿。契切林表示要继续研究专家会议的建议，然后提出反建议。4月15日上午。苏俄代表团在专家会议上提出反建议，要求协约国列强赔偿在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时期给苏俄造成的损失，总计390亿金卢布。15日下午，各国代表团又在阿尔伯蒂别墅举行会晤。劳合·乔治代表西方国家提出新建议，拒绝苏俄提出的反赔款要求，但在讨论战时债务时可考虑俄国的处境。至于私人债务和赔偿损失问题协约国决不作让步，并强调债务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无法讨论。西方国家代表要求苏俄代表立即表态。契切林坚持原来立场，但表示

要向莫斯科作进一步请示。

在阿尔伯蒂别墅会谈期间，德国主动和苏俄代表团进行接触。4月 15 日，契切林提议继续进行在柏林已开始的谈判。4月16日双方在热那亚近郊拉巴洛举行会谈，并签订了苏德协定，即"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立即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并按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双方同意放弃对战争费用以及因战争损失而索求的赔款，彼此停止战俘给养费，德国放弃由于德国私人企业被国有化而提出的要求，但以苏俄不得满足其他国家类似的要求为条件。此外还规定该条约不涉及缔约国双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条约的签订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已第一次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了苏维埃俄国，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当时协约国一致拒绝苏俄建议的情况下，拉巴洛条约的签订，无疑是苏俄外交突破性的胜利。它既冲击了凡尔赛体系，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苏战线，使苏德两国摆脱了孤立状态，开始了长达 10 年(1922—1932年)之久的苏德合作的"拉巴洛时代"。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给热那亚会议予巨大冲击。为了打开僵局，4月 20 日，苏俄代表团致函劳合·乔治，表示苏俄愿作若干让步，撤回要协约国向苏俄赔偿损失 390 亿金卢布的反要求，向协约国偿还战前债务，并用租让制满足原外国企业主的要求，但要求协约国取消战债，给苏俄提供优惠贷款，并在法律上承认苏俄。西方国家对此未作答复。由于协约国坚持原有立场，热那亚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会议决定在海牙召开"俄罗斯"和"非俄罗斯"两个专家委员会来研究解决分歧的方案，然后由各国政府再协商决定。5月 19 日热那亚会议宣布结束。

同年 6 月 15 日，海牙会议开始举行。首先是由 26 个国家的代表组成的"非俄罗斯"(即没有苏俄代表参加)的专家委员会

开始工作。委员会分债务、贷款和私有财产3个小组，具体研究拟向苏俄提出的先决条件。6月26日，李维诺夫率苏俄代表团赴海牙参加"俄罗斯委员会"的工作。6月27日债务、贷款和私有财产3个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主席宣布专家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问题而不是为了作出任何决定。西方国家的代表强调，在被苏俄国有化的原外国私有财产未解决前不能谈贷款问题。苏俄代表强调，首先要研究解决贷款问题，并要求西方给予32.24亿金卢布的贷款，同时说明了贷款的用途和向西方租让企业的清单。关于国有化的原外国企业声明不能归还，只能根据情况给予一定补偿。专家委员会的代表各执一词，争论不休。7月20日海牙会议未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终。

热那亚会议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由军事对抗到和平共处的转变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始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和争端。热那亚会议也表明西方国家已承认苏俄是解决欧洲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此，苏俄开始出现于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924年各国同苏联的建交热

热那亚会议后，苏俄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日益好转，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22年12月各苏维埃共和国正式结成统一的联盟国家。联盟国家的成立大大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增强了对西方国家的吸引力。此后，苏联进一步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24年各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经济复苏阶段，需要扩大同苏联的联系。同时，英、法等国的国内政局也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同苏联建交。1923年底英国保守

党政府连同寇松被迫下台，次年1月英国工党第一次组阁执政。1924年5月，法国普恩加来右翼政府倒台，成立了由主张改善苏法关系的赫里欧左翼联盟政府。在上述国际背景下，1924年有一系列国家先后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所谓“建交热”。

1924年2月1日，英国麦克唐纳工党政府在广大舆论的压力下，率先宣布承认苏联。并邀请苏俄代表团前往伦敦进行谈判。4月14日英苏谈判在伦敦举行，经过艰苦努力，8月8日签订了英苏条约。条约规定，英国政府保证给苏联提供贷款，苏联同意部分地满足英国对战前债务的要求，双方在贸易上给予最惠国待遇。英苏条约是苏联同协约国中的大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

1924年2月到3月，意大利、挪威、希腊、奥地利和瑞典相继与苏联建交。5月31日，苏联与中国建交。之后，苏联又与丹麦、阿尔巴尼亚、墨西哥建立外交关系。10月28日苏联与另一个欧洲大国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25年1月与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在资本主义大国中只剩下美国坚持不承认苏联。

1924年苏联在外交战线上的胜利，结束了十月革命以来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赢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较长时期和平共处的外部环境。

第三节　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

继续增进同德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1924年到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战后经济、政治危机的泥沼，经济上

获得恢复和发展，政治上趋于稳定，人民革命斗争由高潮转入低潮。同一时期，苏联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相对稳定时期，整个世界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矛盾和斗争仍十分尖锐复杂。战胜国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互相关联，交叉进行。各大国之间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

在20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德国问题和德苏关系问题是引人注目的两大问题。维护凡尔赛体系所确立的国际秩序，阻止和破坏自拉巴洛条约后苏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20年代上半期英、法、美等战胜国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1924年8月拟定的道威斯赔款计划，1925年10月签订的罗加诺公约，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持凡尔赛体系，同时也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倾向。英国倡导签订罗加诺公约的动机之一便是阻止德国进一步和苏联接近，极力离间苏德关系，把德国拉入反苏阵线。对协约国的反苏意图，苏联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并密切注视其动向，迅速采取对策。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大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罗加诺公约是为新战争配置力量的计划"，它"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①，及时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

当时，处于战败地位的德国在协约国和苏联之间施展"灵活"外交。一方面利用协约国集团内部及协约国与苏联的矛盾改善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对苏联继续奉行"拉巴洛路线"，保持友好关系，不愿公开参加反苏阵线。苏联政府针对当时国际斗争的新情况，充分利用帝国主义矛盾，阻止德国倒向英法一边。苏联政府在各种场合下，揭露协约国通过凡尔赛条约和道威斯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29、227页。

计划奴役和压榨德国，使德国经济破产，"变为协约国的殖民地。"指出罗加诺公约是为了"维持德国是战败国而协约国是战胜国这样的现状"，强调"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①。斯大林的这些言论既流露了对德国的同情，同时也包含着挑开德国与战胜国的矛盾，拉开它们距离的用心。

在外交实践上，苏联在罗加诺会议前后加强了对德国的外交活动。在罗加诺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同德国进行了贸易谈判。罗加诺会议期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赴柏林和德国外交部长斯特莱斯曼就扩大两国全面合作进行谈判。契切林提出，德国一旦加入国联，就将承担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规定的义务，必须参加被国联宣布为侵略而采取的制裁行动，亦即参加英法可能发动的反苏冒险，因此建议签订政治协定以保证两国关系的稳定。德国担心当时立即缔结政治协定会影响罗加诺会议的进展，故要求先进行1924年开始的商务谈判，政治谈判留待日后进行。同时表示，德国现在没有武装力量，不可能进行任何军事和经济制裁活动，也不会与英国结盟。

在罗加诺会议讨论德国加入国联问题时，德国表示只有在对盟约第16条持保留意见的条件下才能参加国联，理由是德国被解除武装，不可能与其他全副武装的国家一样执行盟约第16条。英、法等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免除德国对盟约第16条的义务。

1925年10月12日，即罗加诺公约签订前4天，苏德签订了《苏德经济贸易协定》、《苏德领事专约》和《苏德关于民事案件司法协助的协定》，上述协定确定了两国在经济等广泛领域中享受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26页。

最惠国待遇及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政治地位。同时，德国国家银行同苏联签订了提供短期贷款的协定。

苏德经济条约和德国拒绝承担"制裁"苏联义务的立场是苏联外交的重大胜利。但苏德政治关系的稳定尚无条约的保证，因此罗加诺会议后，契切林再次访问柏林，进一步和德国商谈签订政治条约。苏俄政府巧妙利用英法同德国在参加国联问题上的矛盾，终于在1926年4月24日和德国签订了《苏德友好中立条约》，规定两国在拉巴洛条约的基础上保持友好关系，缔约一方如遇第三国进攻时，缔约另一方应保持中立，不参加任何以经济财政抵制缔约另一方为宗旨的联盟。在换文中德国再次声明，参加国际联盟不会构成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障碍，德国保证不会根据国联的意志去参加针对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制裁。中立条约钝挫了罗加诺公约的反苏锋芒，给西方列强企图把德国拉入反苏联盟的计划予沉重打击。

苏联在与德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也尽量避免恶化同德国对立的法国的关系。苏德中立条约签订后，契切林即指示苏联驻德大使，要他告知法国驻德大使，"目前德国人民是压迫的牺牲品，我们要支持被压迫人民这一思想推动着我们站在德国一边"，"如果将来出现别的情况，复活起来的德国军国主义企图击溃和彻底消灭实力较弱的法国，那时我们将同样站在被欺侮的受威胁的法国一边"。这一行动充分体现了苏联外交活动的原则精神和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

20年代中期，苏联进一步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同一系列邻近国家签订了调整双边关系的友好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十分重视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关系。1922年8月日本从苏俄远东地区撤兵后，苏联政府曾多次要求日本政府举行谈判，讨论归还库页岛北部和恢复日苏正常关系问题，但遭日本政府

拒绝。在苏联的不断努力下，1924年3月，苏日恢复谈判，经过反复磋商，1925年1月20日在中国北京签订了《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简称"苏日北京条约")。条约宣布两国相互承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不干涉内政，停止敌对宣传，苏联同意向日本提供库页岛北部及该地区50%油田开采的租让权，日本在1925年5月15日前从库页岛北部撤走军队。苏日北京条约大大增进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此后，苏联又先后和有关国家签订了《苏联和土耳其友好中立条约》(1925年12月17日)、《苏联和立陶宛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1926年9月28日)、《苏联和阿富汗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1926年8月31日)、《苏联和波斯保证中立条约》(1927年10月1日)、《苏联和也门友好通商条约》(1928年11月1日)。

总之，经过艰苦努力，20年代中，苏联的国际威望有了很大提高，战略地位有了较大改善。

警惕新战争危险，坚持和平外交政策

20年代中期，苏联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开始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新战争的危险，认为当时正"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①。据斯大林分析，当时存在有两种战争危险。一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危险。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由于各国生产能力不断增长与市场相对固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国间彼此争夺市场和霸权的斗争不断激化，上次帝国主义战争所确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配情况已经过时，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武力、军事冲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4页。

突、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①。从而"使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②。苏联还认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英美矛盾是主要矛盾，"英美争夺世界霸权……很可能蕴藏着战争"③，成为新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另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反苏战争的危险。1926年夏起，英国对苏联发起了一系列反苏挑衅，英苏关系骤然恶化。1926年6月12日，英国保守党鲍尔温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抗议苏联干涉英国内部事务，指责苏联政府准允苏联工会捐款援助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6月24日英国政府又公布"蓝皮书"，指责苏联支持英共进行反英活动。6月25日，英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下院指责苏联给英国工人的汇款是为了"煽动革命"。1927年2月23日，英国政府照会苏联，以废除贸易协定和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5月12日，英国政府违背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下令警察搜查苏联驻英商务代表处和俄英贸易公司。4月6日，英国还唆使中国北洋政府袭击苏联驻北京、天津、上海的外交代表。5月27日，英国政府悍然宣布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斯大林根据英国挑起的一系列反苏行动指出："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肯定说，'和平共居'的时期正在过去，而让位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袭击和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时期"。④苏联面临着"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⑤。

基于上述认识，为了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捍卫国家安全，苏联党和政府在努力加速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壮大国防实力，肃清"异己力量"的同时，在对外关系方面制定了总的战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5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③ 同上书，第172页。
④ 同上书，第246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1页。

略方针，那就是充分估计和利用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推迟战争，并采取一切办法来保持与各国的和平关系。为此，相应地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大力揭露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阴谋，提高世界人民防止和制止战争的警惕性。苏联特别注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废除军备的宣传进行揭露批判，指出这类空谈目的是"麻醉工人阶级并使他们脱离反战争危险的斗争"，并强调"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①。同时指出罗加诺体系"是准备新战争和为未来的军事冲突部署力量的体系"，"'罗加诺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战争精神'"②。

第二，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政策，努力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斯大林一再强调，"维护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以我们所希望的速度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③。为此，必须利用帝国主义矛盾，把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推迟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候，或者推迟到殖民地革命充分成熟的时候，或者推迟到资本家因瓜分殖民地而互相厮杀的时候"④。在实践中，苏联谨慎小心地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反苏事件持冷静态度，不因挑衅的刺激失去耐心，冒险行动，必要时乃作出某些让步和妥协，其中包括忍受某些物质上的牺牲，偿还战前的借款。此外，苏联政府还积极利用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不愿卷入对苏战争、愿意和苏联保持和平关系的趋向，阻止帝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
③ 同上书，第172页。
④ 同上书，第246页。

国主义反苏战争的爆发。苏联对1927年英国的反苏挑衅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在苏联有理有节的斗争下，英国保守党发动的反苏事端很快平息。1929年10月3日，苏联和英国政府签订了两国关于解决悬案程序的议定书。10月20—21日签署了复交换文，正式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第三，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积极参与国际裁军和反战斗争。20年代中期后，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加紧扩张军备。为了达到武装自己、削弱别人的目的，帝国主义各国演出了一幕幕裁军骗局。从1925年起国际联盟开始着手筹备召开裁军会议。1926年5月，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会议。苏联被邀参加会议，但由于当时苏联外交人员沃罗夫斯基在洛桑被刺，苏联与瑞士断交，故没有参加前3次筹备会。1927年11月30日，以李维诺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参加了筹备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会上，苏联代表提出了彻底裁军的计划，建议立即彻底全面遣散陆海军的全体人员，销毁一切武器和所有的军舰和军用飞机，拆除军用工厂，取消军事预算，禁止军事训练，解散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禁止战争宣传等。苏联彻底裁军的提议曲高和寡，未获与会者响应。1928年3月，国联召开了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鉴于彻底裁军方案未获与会者赞同，苏联代表团遂提出局部裁军的计划，建议区分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裁减轰炸机和大型坦克等进攻性武器，大国应实行累进裁军。这一方案在列强的反对下也未被接受。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各怀鬼胎，矛盾重重，久久没有达成协议。直到1930年，在筹备会的第六次会议上才勉强通过了一个对谁都无严格约束力的裁军公约草案。苏联在筹委会上所提出的裁军计划虽未被各国所接受，但是，苏联政府为裁军进行的努力，却扩大了苏联的国

际影响，给英法等帝国主义假裁军、真扩军的阴谋以沉重的打击。

1928年8月27日，在美国和法国的倡议下，美、法、英、意、日等15个国家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公约》。条约规定各缔约国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废弃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只能用和平的方法处理或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或冲突。条约从国际法上规定了战争的非法性，但由于英、法、美等国都抱着各自的政治目的参与签约，同时都提出了为保护本国利益各国政府有权诉诸武力、进行战争的保留条件，因此公约对缔约国并无实际的约束作用。《非战公约》的发起者对苏联怀有敌意，在长达一年四个多月的筹划过程中把苏联排除在外。1928年8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责英、法、美等国孤立和反对苏联的企图，迫使它们邀请苏联参加公约的签字。苏联同意参加公约，但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对条约所玩弄的花招，苏联政府在加入非战公约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条件，即不承认别国对该公约所提出的任何保留条件。

第四，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

20年代中期后，苏联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和世界革命的前景作了新的估计。认为帝国主义为了准备新战争，除了扩张军备和组织新的联盟以外，还必须巩固后方，制服"自己的"工人和"自己的"殖民地，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压迫和控制，而这种残暴的压榨必然引起各宗主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斯大林认为当时"欧洲正进入革命高潮的新时期"，"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预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强调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乃是制止、推迟战争，保卫苏联的重要因素。斯大林认为，1927年英国反苏挑衅

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欧洲工人阶级表示反对，帝国主义者害怕一旦对苏联开战会在自己家里爆发革命"。[1] 因此，苏联当时对世界革命运动采取了新的方针，就是在不恶化同资本主义国家正常关系的前提下，积极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并且把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纳入保卫苏联的轨道。斯大林曾明确指出，保卫苏联是区分各种各样集团、派别和政党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2]

20年代，苏联奉行和平、开放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和周边邻国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恢复了正常的政治联系和经济往来，这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威望，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处于战略守势，争取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摆脱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是苏联基本的对外战略方针。与此同时，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继续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尤其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联共(布)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对资本主义危机和世界革命形势作出了"左"的错误的估计，对各国共产党人制订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及进一步改善苏联的外部环境，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3、242、246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第八章　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一节 工业化方针的确定

党的十四大通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

1925年底，工农业生产基本上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以大工业为例：①

产品种类	计算单位	1913年	1920年	1925/26年度	1925年为1913年的%
大工业总产值	亿卢布	102.51	14.10	77.39	75.5
其中：电力	亿度	19.4		29	149.4
煤炭	百万吨	29.1	8.7	25.77	88.5
石油	百万吨	9.2	3.7	8.3	90
生铁	百万吨	4.2	0.11	2.2	52
钢	百万吨	4.2	0.19	2.91	69
纸	万吨	19.7		21.7	110
砂糖	万吨	134.6	5.1	106.4	79
纺织工业产值	亿卢布	28.86	2.71	20.99	72.7

从表中可以看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工业经济的恢复取

① 本表根据《苏联工业史纲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有关资料制成。

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除了钢铁生产还比较薄弱以外，大多数工业部门均已达到或基本达到战前水平。但是，战前水准的俄国只是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准，所以，当恢复时期结束的时候，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低于农业。在工业生产中，突出的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重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矿山、冶金、运输机械和机器制造业等重要工业部门数量少，生产技术落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很少，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都带来困难。2.现有工厂设备陈旧落后，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3.由于恢复时期首先着眼于振兴农业，尽可能疏通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满足广大农村对工业品的需要，使轻工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工业内部的结构上，轻重工业的比例为 56.6∶43.4 。在国民经济趋于好转，工业基本得到恢复以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就成为摆在苏联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前的一项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确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而奋斗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为此，"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的经济单位"。① 这就是联共（布）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苏联摈弃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西方先进国家的工业化一般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经过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才相继进入产业革命阶段，逐步实现了工业化。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这条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这是因为：第一，苏联当时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同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据估计，苏联比西方先进国家落后约50—100年。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用掠夺殖民地，发动侵略战争，向战败国索取赔款的办法来积累资金，实现工业化。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能用上述办法来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第三，国际环境也不容许苏联以缓慢的速度来实现工业化。当时苏联还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帝国主义经常掀起一股股反苏浪潮，包括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军备战和战争叫嚣，都要求苏联加速扩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己迅速成为一个具有牢固基础的工业强国。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苏联当时的国内外条件而确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过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泉源和基础。他认为，只有重工业的发展，才能为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提供进行技术改造的基础，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在生产力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

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提供基础。在农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城市工商业中资本主义成分还占相当比重的条件下，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有助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改造一切非社会主义成分提供强大的物质手段。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迫切需

要巩固国防，保障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重工业的发展，包括大力发展国防工业，有助于加强本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

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重工业的投资又往往不能在短期内收回成本和实现利润。所以，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开展全民的节约运动。1926年4月25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党内外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养成极大的责任感，节约每一个苏维埃卢布和戈比，来支援工业化建设。苏维埃国家尽量设法增加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发行公债，努力吸收居民的游资，并要求合理地精打细算地使用建设资金，杜绝一切浪费现象。当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是节约运动的有力倡导者。

苏联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广泛开展节约运动，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竭力为国家工业化事业贡献力量。1927年10月1日，苏联政府首次发行工业化公债2亿卢布，仅30多天，即被广大群众全部认购完毕。这一切，都有利于筹集工业建设所必需的资金。1926—1927年度工业投资原定为10亿卢布，实际投资总额增加到11亿卢布。

1926—1927年间，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着手拟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人民面前展现了一幅幅工业建设的美好蓝图。1926年，报纸上公布了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远景规划，并于1927年11月举行电站奠基典礼，这个电站竣工后，不仅是苏联国内最大的水电站，而且将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水电站。1927年，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开始动工，这条铁路联结中亚细亚的产棉区、西伯利亚的工业区、哈萨克斯坦的采矿区和有色金属

区，它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最大的工程之一。此外，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乌拉尔—库兹涅茨钢铁联合工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工厂、莫斯科汽车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重型机器制造厂等一批大型企业都在着手设计和筹建。人们已经从这里听到了工业化建设雄伟的脚步声。

关于工业化资金来源的争论

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上日程的时候，如何筹集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建设资金，这是当时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而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都会遇到资金来源问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工业建设是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分散地自发地进行工业建设完全不同，建设资金要由国家统一筹集，资金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前人所未曾遇到过的问题。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在1924年《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8期上发表《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一文，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不能依靠掠夺殖民地，只能把小生产当作"殖民地"。他说："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资金的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他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愈小，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发展愈不依赖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由此，他提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经济资源

而自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的东西，而是……拿得更多”。除了向小生产者征收高额税金进行积累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反对通过正常的市场关系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主张用超经济强制的行政手段来积累资金。如国家利用垄断地位提高工业品价格以及铁路运价，等等。他说：“通过相应的价格政策进行积累，比起向小生产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其他形式更优越，最主要的优越性是征收非常方便，不需要在专门的税收机关上花一个戈比”。他还认为可以通过国家银行的垄断地位，向农民发放高利贷，发行纸币，他说：“当国家既是管理全国的机构，又是极其庞大的经济综合体的主人的时候，发行纸币是社会主义积累的直接渠道”①。

布哈林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提法。同年12月，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撰文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理论上的一个基本错误，在于把农民小生产者看作剥削对象，看作“殖民地”，这就把工农两个基本阶级的关系看作剥削关系，无产阶级成了剥削阶级，而且，据说，完成社会主义变革的国家愈落后，无产阶级的剥削性质就愈明显。布哈林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确实存在小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充当积累资金，存在着一个阶级创造的价值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手中的情形，但决不能据此得出结论，称无产阶级为剥削阶级，称工业化时期的工农关系为剥削关系。布哈林说，这决不是因为“剥削”这个名词“很难听”，而是因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客观实际。从历史上看，剥削关系的存在，通过积累，都会“经常再生产出剥削关系。价值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46、47、78页，1984年三联书店版。

个阶级手中，这就会经常扩大阶级对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价值从小生产者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工业手中表现了什么呢？布哈林回答说：“表现了截然相反的趋向，也就是克服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之间的对立的趋向。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要去巩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去消灭这些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及其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外围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对立的消灭也就进行得愈快”①。

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需要小生产者提供积累，但不能对小生产者实行剥夺，不能通过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办法来排挤农民经济，如果听任原始积累的骑士去同小生产打交道，就会损害工农联盟。如果对农民实行剥夺和“吞没”的方针，就会使农业衰败，使农民收入降低，而农民的市场容量，是直接决定轻工业、部分地是决定其他工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必须同农民经济中的积累问题相联系。如果农民需求缩减，就会出现销售危机，社会再生产过程就会减慢，而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经济的“函数”，而采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张，无异于“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②。

针对布哈林的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又写了《再论社会主义积累(答布哈林)》一文进行反批评。1926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自己观点汇编成《新经济学》一书出版。同年7月，布哈林在《真理报》上连载长文对该书提出批评意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加以反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场论战没有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继续下去,《新经济学》出版第1分册后未能继续出版。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上日程的时候，资金来源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因此，出现这场关于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的争论,是不奇怪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尽管存在许多偏颇和错误，但他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期引起全党的重视,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笼统地指责他的观点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是不恰当的。在争论中,布哈林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见解,然而，由于争论半途而废,他的理论没有被全党所理解,也没有变成指导实践的政策。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错误理论后来改头换面地被运用了。

第二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征。制订一份比较完备的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地方。

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如何编制计划,是编制长期计划,还是短期计划,是制定区域性的计划，还是按不同行业制定计划，如何使各种计划协调和结合起来，合成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所有这些,都是在毫无经验和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编制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常常出现不同意见、不同方案的比较、选择和争论。

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从1925年就已经开始，至1929年才告完成。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持下，1925—1927年间制定了最初几个五年计划草案——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目标，也是拟定正式的计划草案的准备阶段。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不一致，编制计划工作常常遇到困难。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发布"关于拟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国家计委正式着手编制五年计划草案。可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党内又出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使编制计划工作遇到新的障碍和困难。至1928年底，五年计划草案才基本完成。

在编制五年计划的时候，贯彻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此，党内外有人存在疑虑。针对这一情况，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1926年捷尔任斯基病逝后接任此职)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了必须坚持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在提请党的十五大审议的关于制定五年计划的提纲中，明确提出，根据国家工业化的方针，首先应当加强生产资料的生产，应当使"重工业生产部门获得最快的发展速度，即他们能在最短期间提高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能于遭受经济封锁时保证我国发展的可能，能减轻我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赖性，能在较高的技术和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的改造"。对轻重工业的比重，提纲认为必须使二者达到最完满的结合。将重点放到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是正确的，但必须估计到把国家资金过多地积压存在的危险；而轻工业生产中资金周转较快，可以在适当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利用其资金从事工业建设①。可见，编

① 参见《苏联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文件汇编（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69页。

制五年计划的提纲中所反映的上述思想是比较全面的正确的。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同时提出两个方案，即初步方案（也称一般方案、最低方案）和最佳方案（也称最高方案）。两个方案均以党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为出发点。两个方案的区别在于，与初步方案相比较，最佳方案要求在计划时期内不发生任何严重的歉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比较广泛和稳定，质量指标（成本、单位面积产量）有显著好转，国防开支比重较小。就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来说，初步方案与最佳方案的区别是各项主要指标一般相差20%，这就是说，如果以初步方案的速度来执行最佳方案，需用六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1928年12月，发展工业的五年计划控制数字在报纸上公

表一①：最主要工业部门的基本任务

（草拟的五年计划最后一年）

项目	生铁（百万吨）	铁矿石（百万吨）	煤（百万吨）	石油（百万吨）	水泥（百万桶）	砖（十亿块）
初步方案	8.0	15.0	63.0	19.0	35.0	7.7
最佳方案	10.0	19.4	75.0	21.7	41.0	9.3

表二②：国营工业总产值年增长速度

（对上年的%）

项目＼年度	1928/29	1929/30	1930/31	1931/32	1932/33
初步方案	21.4	18.8	17.5	18.1	17.4
最佳方案	21.4	21.5	22.1	23.6	25.2

①② 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20—21页三联书店1977年版。

布，供广大人民群众和专家学者讨论和研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时，联共（布）党内正在开展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1929年3月26日—4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五年计划草案，大多数代表赞成通过五年计划草案中的最佳方案。4月23—29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了五年计划草案，通过决议，同意以最佳方案为五年计划草案的正式文本。1929年5月20—28日，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经过审议和讨论，最后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批准的《苏联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中，仍然同时公布了两种方案的各项指标，并对此作了说明："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必须有两个方案。在分析有关方案的问题时，首先应切实地着重指出两个方案的经济方针和经济纲领是一致的。……在统一的经济计划中，应将初步方案看作是最佳方案的某种最低限度的保障"①。在编制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提出两种方案，经过审议和比较，选择一种方案作为正式计划，本来，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较好做法。在讨论中，有人主张采用最佳方案，有人则主张采用初步方案，在计划指标和建设速度问题上，也产生一些不同的主张和意见分歧，所有这些都是难免的。可是，1929年春天以后，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逐步明朗化，"初步方案"就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予以揭露和批判。

在编制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把建设速度的快慢和计划指标的高低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任意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其后果是极其有害的。它只能使计划服从某种"长官意志"，并为高指

① 《苏联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文件汇编（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第103页。

标和盲目冒进的建设方针大开绿灯。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28年10月起实行（计划年度从10月至次年9月底），1932年底以4年零3个月提前完成。

按照计划的规定，五年内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为646亿卢布，其中对工业（包括电力）建设的基本投资为195亿卢布。在计划时期内，工业建设实际投资为248亿卢布，超额完成原计划的29.8%。工业建设投资主要用于重工业部门，约占3/4。在此期间，计划新建成的大型工厂1500多个，工业固定资金增长1.2倍。

工业建设的投资，在五年计划的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在前期，投资主要用于改建和扩建老企业，提高老企业的生产能力；在后期，投资主要用于新建企业。改建、扩建原有企业，能利用比较少的资金，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较快地提高生产能力。对原先大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据苏联著名的"狄那莫工厂"、"红色普梯洛夫人工厂"、"公社社员工厂"、"镰刀和锤子工厂"等23家机器制造厂的统计，由于改建了这些企业，固定资金从五年计划开始时的2.58亿卢布增加到完成计划时的4.94亿卢布；同期这些企业的工人人数从5.48万人增加到13.97万人；总产值则从2.84亿卢布增加到12.95亿卢布。这就是说，固定资产增长不足1倍，总产值增长了3.5倍。

五年计划期间的新建企业大多是用最新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工厂，如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莫斯科、高尔基市的汽车制造厂，莫斯科轴承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大型钢铁联合基地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的冶金工厂；还有

143个新煤井、33根管道和24个裂化装置开始使用。这些新工厂和新工程项目的完成，为重新装备整个国民经济建立了基础，也奠定了苏联工业的强大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首先表现在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计划指标。在此期间，工业总产值从1928年的158亿卢布增加到1932年底的368亿卢布，增长1.3倍；国民收入从244亿卢布增加到455亿卢布，增长86%；劳动生产率提高约38%，稍低于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在五年计划期间，建起了沙俄时代没有或十分薄弱的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拖拉机制造业、化学工业、仪表制造、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业，新建了举世闻名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库兹涅茨克钢铁联合基地和第聂伯河巨型水电站，修筑了几千公里铁路和开凿了运河等大型工程，在从前荒僻的东部地区建立了新的工业区，初步改变了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失业现象已经消灭。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全国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7%。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也由1928年的60.5:39.5，变为46.6:53.4。说明苏联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

在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中曾出现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的情况，许多重要的工业部门也没有很好完成计划。1930年6月，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说，当前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全线总进攻"，必须按照这一精神修改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指标：生铁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预定1000万吨，提高到1700万吨；拖拉机产量原定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为5.5万台，提高到17万台；汽车产量原定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为10万辆，提高到20万辆；在有色金属工业及农业机器制造业等部门也都提出了新的高指标。斯大林在报告中强调说：

“有人会说，中央把五年计划初定数字改动得这样厉害，这是在破坏计划工作的原则并损害计划机关的威信。但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这样说”①。

本来，通过的五年计划接受最佳方案的指标已经是相当高的。而这个计划刚通过一年，又大幅度地修改计划，提高指标，这不能不是一种冒进。第一个五年计划几项重要产品指标的完成情况的证明，倒是原先的初步方案更接近于实际。见附表。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几项重要产品指标完成情况②

产品项目＼年份	1913年	1928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方案	第一个五年计划最佳方案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追加数	实际完成数(1932年)
煤(万吨)	2910	3550	6800	7500		6440
石油(万吨)	920	1160	1900	2200		2140
生铁(万吨)	420	338	800	1000	1700	616
钢(万吨)	420	430	830	1040		592
汽车(万辆)	——	0.07		10	20	2.39
拖拉机(万台)	——	0.13		5.5	17	4.89
铁路(万公里)	5.85	7.69	8.8	9		8.18
棉织品(亿米)	25.82	26.78	57	62		26.94

由此可见，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失误。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苏联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0页。

② 本表资料来源：苏联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1956年莫斯科版；《苏联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文件汇编(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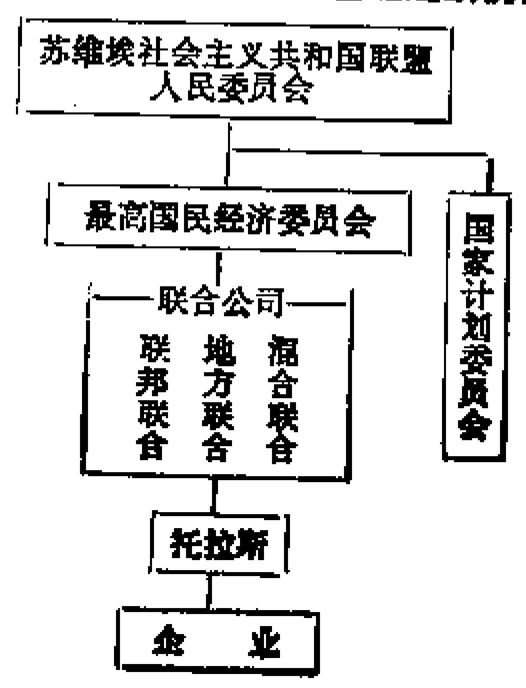
运动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企业的数目日益增多，规模不断扩大。1930年以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基本上已经消失，多种所有制形式被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所代替。所有这些，都需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根据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指出，必须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管理机构。同年12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定。1930年，党的十六大决议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要解决工业面临的任务，就必须最快地完成工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管理体制主要向集中化、计划化、行政化方向发展。

首先，在所有企业（包括车间和工段）中实行经济核算制，给予企业一定的独立性。经过1930—1932年管理改组和在以后几年中采取一些扩大企业权限的补充性措施以后，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有权彼此间缔结供应必要产品的经济合同，有权自由支配自有流动资金，有权在计划范围内灵活运用物资，有权建立奖励基金和特别经理基金，等等。但是，根据《关于改组工业管理》决议的规定，企业只有“在严格遵守生产财务计划纪律的条件下，在规定的限度内是独立的，企业行政对计划执行情况承担全部责任”。而随着企业技术生产财务计划内容的不断充实，计划指标不断增加，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实际上越来越小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实现了以托拉斯为基本核算单位向企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然而，企业并没有获得当年托拉斯所享有的经营自主权。1929年以前，企业经理有权招聘或解雇职工，在托拉斯领导人的委托下，企业有权转让闲置不用的厂房、设备等等，这些权限也相继被取消了。

其次，改组工业管理机构。最重要的措施是撤销了管理总局和辛迪加，成立了一系列单独经济核算的联合公司。联合公司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它的主要职能是：编制各该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设计并管理基本建设，进行技术领导，组织企业物资技术供应和产品销售，领导企业的财务活动，培训和分配干部，任免企业和托拉斯的领导人，等等。联合公司有三种类型：联邦联合公司（包括具有全联盟性的企业和托拉斯）、地方联合公司（仅限于隶属加盟共和国的或地方性的企业和托拉斯）、混合联合公司（同时包括上述两类企业和托拉斯）。由于联合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往往包括数百个企业，造成领导工作上的困难。因此，后来又按地区和按工种划小，于是每个工业部门中又形成了许多联合公司，各工业部门只得重新建立领导联合公司的总管理局。1932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同时还成立了轻工业、木材工业、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所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形成了四级工业管理制：人民委员部的总管理局——联合公司——托拉斯——企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管理组织机构



联合公司在苏联的存在时间不长，但它是按专业部门设立集中的管理机构管理工业的初步实践，是走向人民委员部管理体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后来，随着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不断建立新的人民委员部，撤销了联合公司，最终形成了以垂直（条条）管理为主的，由人民委员部进行部门经济管理的体制。

部门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是与当时苏联所处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为了在最短时期内高速度实现工业化，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基础工业和发展新兴工业部门，强化部门管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强调部门垂直领导，造成自上而下地规定企业活动的重要指标，而且这些指标都是指令性的；企业大部分资金由国家财政无偿拨给，企业收入几乎全部上缴，企业所需重要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产品由国家统一包销，产品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形成"产品经济"的模式。这种管理体制必然强调行政管理职能，造成管理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助长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妨碍不同经济部门的联系和协作，限制和削弱地方工业的发展，也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性。

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装备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许多陈旧的设备需要更新，大批新的工程项目需要建设。在此期间，正值 1929—1933 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总危机。这就形成了一个有利时机：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各自的经济危机，竞相出售过剩产品及机器设备；苏联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引进了一大批工业化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有力地促进了五年计划的完成。

1929年5月，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专设了外国咨询中央局，负责领导外国技术力量的引进和利用。同年年底，苏联已同外国资本家签订了70多项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的协议，这些项目涉及冶金、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等许多重要经济部门和工程项目。到1931年初，苏联已接受外国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项，投资总值达8300万卢布。在此期间，1930年苏联尽管取消了租让制，但并没有中断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相反，直接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装备，较之吸收外资来经营租让企业，能够以较为有利的条件把西方的资金、技术、设备和技术人员一起引进，以便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对引进项目实行有效的管理。不但如此，苏联还十分注意利用危机期间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尽量择优择贱购买工业化所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

在工业化时期苏联所接受的技术援助的项目中，70%以上是美、德两国提供的。1931年，苏联向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设备出口总量的1/3，1932年上升到1/2左右。与此同时，苏联用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和技工，1932年在苏联各地工作的外国技术人员约2万人。1929—1931年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遣2000多人出国考察、实习和留学，还订购了大量外国技术书刊。

30年代，苏联3个大型钢铁厂，即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和扎波罗钢铁厂都是美国和德国帮助建造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由美国麦基公司帮助设计和建造，它实际上是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格里工厂为蓝图进行设计的。1931年下半年该钢铁厂建设高潮时，共有250名美国人在那里工作，单在高炉建设部位就有27名美国工程师。美国人还在该厂工地上举办短期训练

班，帮助苏联工程师掌握工程技术经验。

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在美国近80家工厂的帮助下建成的，该厂拥有年产5万台履带式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它的设备先在美国组装，然后拆卸后运到苏联重新安装。这家工厂在和平时期制造拖拉机，在战时就可以制造坦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工程浩大的第聂伯水电站，主要设备也是由美国两家大公司提供的，一些美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工地上同苏联建设者并肩劳动，作出了贡献。据此，有6名美国工程师获得了苏联政府颁发的劳动红旗勋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成功地利用了西方国家大量先进技术装备，不仅较快地获得了规模巨大的先进的生产能力，而且学会和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为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苏联在利用西方先进技术装备方面，在指导思想上还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主要是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截然对立起来，因此，尽管在实际上引进众多的建设项目，但在理论上始终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开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对外开放的坚定政策。

第三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1932年1月30日—2月4日，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指示，规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方针。第二

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政治任务是：彻底消灭国内的资本主义成分，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差别和剥削的根源，使苏联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而又积极的建设者。基本经济任务是：继续保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寄生阶级和国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迅速增进工农群众的物质福利，注意改善居住条件，发展公用事业，增加各种消费品。代表会议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编制新的五年计划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使计划更加完善，更加切合实际。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过程中，充满了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在提交联共（布）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审议的方案中，规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速度不低于 20%，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增长 19.4% 还要高，一些重要产品产量指标，到 1937 年，发电量增加到 1000 亿千瓦时，采煤量达到 2.5 亿吨，生铁产量达 2200 万吨。很明显，这些指标仍是相当冒进的。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总结。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某些教训，建议把工业年增长速度减为 13—14%。根据这一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修改了五年计划草案，规定工业年增长速度为 18.9%。这个草案提交 1934 年 1 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审议，又把年增长速度降为16.5%。

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所以有这些反复，主要原因是在过去的几年内，曾把主张采取较缓慢、平稳的经济发展速度的主张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加上工业建设中取得的某些成就助长了一些人的盲目热情，使得过高速度过高指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苏联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一贯注重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因此，轻工业严重落后，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比例失调，也影响了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党和政府希望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加快发展轻工业的步伐。据此，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1933—1937年间，轻工业增长率将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3.2%提高到18.5%，农业由－2.6%提高到14.9%，重工业则由40.1%降低到14.5%。这就是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速度最快的将是轻工业，其次是农业，最后是重工业。这表明，在建设速度和各部门发展比例问题上，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吸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些经验教训，指导思想有所转变，作了力求符合实际的调整。

1934年1月，联共(布）举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这个五年计划，各工业部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末(1937年)
主要产品指标①

产品项目	单　位	数　额	增长率(以1932年为100)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4	267
拖拉机	万台	16.7	323
汽　车	万辆	20	837
煤	万吨	15250	296
石　油	万吨	4680	210
生　铁	万吨	1600	260
钢	万吨	1700	289
棉织品	亿米	51	188

① 本表资料来源：《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

门仍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通过五年计划的实施，竭力想使苏联变成一个技术上、经济上完全独立的国家，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

"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需要建设者具有高度的文化知识水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前夕，城乡居民中文盲半文盲人数仍占41.6%。这种状况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很不适应。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维埃政府重视教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智力投资。首先，掀起群众性的扫盲运动。1928年秋，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响应党的号召，倡议掀起一场反对文盲，反对酗酒的向文化教育进军的运动，得到各阶层人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广泛响应。连续几年的扫盲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接受扫盲的人数达4500万人，识字人数的比例上升到80%。其二，广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批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工厂艺徒学校是培养训练青年工人的最重要形式。青年工人在这里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接受职业培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类学校就培养了45万名熟练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在不脱产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其三，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具有专门知识和熟练技能的专门人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了工业技术教育制度，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五年期间，共培养了17万名受过高等教育和30万名受过中等教育的专门人材。

当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全面展开，大量先进装备和技术不断从国外引进的时候，掌握各项新技术显得格外重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新工厂建造起来了，新的

机器设备安装好了，却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去掌握它，运用它。熟练工人缺乏，各行业的技术专家缺乏，党员专家更是寥寥无几。针对这种状况，1931年2月，斯大林作了题为《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他说：“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①。

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但要求对工业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和建立一批新的工业部门，更需要培养一支工业化事业的骨干队伍，包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在内的一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经过几年的努力，当人们学习文化、掌握技术掀起高潮以后，当新的工厂和机器设备已经大量涌现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迫切。1935年5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时，又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作为对“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的补充。他说：“渡过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新的时期，进入我认为是十分缺乏人材、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够驾驭技术并推进技术的工作者的时期”。据此，斯大林认为，当前要用“干部决定一切”的新口号来代替原先的旧口号了。斯大林解释说：“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②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作为解决某一时期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策略口号，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两个口号对动员苏联全党和全体人民学习文化、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9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上）第34页。

掌握技术，培养人才，爱惜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在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是两句具有积极意义的策略口号。

斯达汉诺夫运动

为了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广大苏联工人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1929年8月6日，根据列宁格勒工人斯洛鲍德奇科的倡议，各地都举行了第一个"工业化日"，千百万工人星期日集体自愿工作，将这一天工资献给国家，作为工业化的资金。同年10月27日，报纸上登载了"红色索尔莫沃"工厂的工人向全国工人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明确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几天之后，著名的莫斯科"阿莫"汽车制造厂、列宁格勒的"红色普梯洛夫"和"红色维堡人"等工厂工人响应这一口号，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信。于是，这句口号很快被全国工人所接受，在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的节日到来的时候，工人们普遍地把这一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变成工人自觉的行动口号。

1929年12月5日，全苏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对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作了总结。大会认为，突击队是社会主义竞赛的基本形式。当时，全国约有90万人参加竞赛，30万人获得突击手的光荣称号。社会主义竞赛焕发了工人的智慧和热情，对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后，社会主义竞赛出现了新的形式，形成了新的高潮，这就是1935年8月开始掀起的斯达汉诺夫运动。8月31日，顿巴斯中央依尔明诺矿井年轻的掘煤手斯达汉诺夫在一个工作班6小时内，用风镐挖煤102吨。超过原技术定额13倍。3天以后，即9月3日，该工段党小组长迪尤卡诺夫挖煤115吨。继后，共青团员康采达诺夫创造了一个工作班挖煤

125吨的新纪录。9月8日，斯达汉诺夫刷新了自己的纪录，挖煤175吨。挖煤工人的先进纪录，促使挖煤和电力机车的司机突破旧定额，创造新纪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矿井中涌现了第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场以突破旧定额，创造新纪录，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得到响应。在很短时间内，从重工业到轻工业、运输业，从工矿企业到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商业部门，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潮。锻工布塞根、铣工古多夫、制鞋工人斯美坦宁、纺织女工叶·维诺格拉多娃和玛·维诺格拉多娃、火车司机克里沃诺斯，农业战线上的杰姆钦科、安格琳娜、保林等人，是这个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知名人物。

苏联各企业原先的生产定额，是以工厂设备陈旧落后，大多数工人文化技术水平低下为前提的。随着五年计划的实施，工业各部门不断由先进技术装备起来，工人的觉悟水平和技术知识水平也不断提高，这就在客观上为突破旧定额，创立新定额提供可能性。所以，斯达汉诺夫一带头，各行各业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就汹涌澎湃地在全国开展起来。许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提高劳动效率，向旧的生产定额和旧的生产秩序冲击，带动了各部门效率的普遍提高。斯大林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以打破当前的技术定额，超过现有的设计能力，突破现行的生产计划和平衡表为目的的男女工人运动。"① 打破旧的生产定额，怎样制定新的先进的定额呢？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既要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又不是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所达到的定额作为全体工人的新定额，而应制定一种介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46页。

乎现有定额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所达到的定额之间的定额。这种定额，才能成为一种调节力量，把广大工人群众团结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周围。此外，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普遍实行计件工资制，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并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实行重奖，给予应有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这也大大地激励人们学习先进，克服落后状态的积极性 。

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1935年 11 月 14 日，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 3000 名先进工作者。斯大林在会上讲了话。12月 8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43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列宁勋章，授予 97 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劳动红旗勋章。此后，斯达汉诺夫运动日益开展，先进工作者队伍不断扩大，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各部门中已有 280 万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突击手。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蓬勃兴起，是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总结

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于 1937 年 4 月 1 日，即用了 4 年 3 个月提前完成。总的说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好。见附表①。

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总产值看，苏联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此期间，有 4500 个新工业企业建成和投产，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1937年，工业总产值比 1932 年增长 1.2.倍，农业总产值增长 0.5 倍，国民收入增长1

① 本表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文件汇编（第二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

项目	单位	1932年	1937年		1937年比1932年增长比例	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情况比例
			计划	总结		
国民收入	亿卢布	455	1002	955	209	95
工业总产值	亿卢布	433	927	955	220	103
其中：生产资料生产	亿卢布	231	435	552	239	126
消费资料生产	亿卢布	202	472	403	200	85
农业总产值	亿卢布	130	262	201	154	76
煤	万吨	6436	15250	12797	198	83
石油	万吨	2227	4680	3048	136	62
电力	亿瓩/时	135	380	364	269	95
生铁	万吨	620	1600	1450	234	90
钢	万吨	430	1300	1300	303	100
汽车	万辆	2.39	20	20	837	100
拖拉机	万台	5.16	16.70	17.64	341	106
棉织品	亿米	26.94	51	34.47	128	68

倍以上，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资料的生产继续以高速度发展，平均年增长17.1％，而按计划要求为16.5％。机器制造业大大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的指标，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长1.9倍，大大超过原定计划指标的1.1倍，从而加强了机器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中的作用，并基本上克服了冶金工业的落后状况。由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兴起，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计划增长率为63％，实际增长了82％。

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曾决定调整轻重工业比重，增加对轻工业的投资，使轻工业增长速度略高于重工业。但是，这一

调整计划未能实现。同1932年相比，1937年轻工业产值增长1倍，农业增长54%，重工业则增长1.4倍。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轻工业只完成85.4%，农业完成76.9%，重工业则完成121.3%。轻工业年增长速度为14.8%，重工业年增长速度仍高达19%。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1932年为26.9:73.1，1937年为27.1:72.9，消费基金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减少。与原先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时的指导方针相反，轻工业未得到优先发展。这样，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现象更趋严重。

轻重工业比例所以未能调整过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是由于国际局势恶化，法西斯势力猖獗，战争危机迫近，使得苏联不得不缩减轻工业的投资，增加国防工业的投资，以增强国防力量。从主观上说，长期以来过分强调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一时难以转变，有人认为发展重工业是困难的，发展轻工业则是轻而易举的，于是不屑把较多的资金投入轻工业。

尽管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四节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实现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1936年上半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酝酿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鉴于苏联此时已宣布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草拟新的五年计划时，将苏联国民经济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进行了广泛的比较。

1937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基础上，苏联政府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各加盟共和国提交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并在报纸上公布，以便广泛展开讨论和征询意见。1938年5—6月间，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完成。1939年3月，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审议并批准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而且提出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是：要在10—15年时间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的这些思想，带有较多的冒进因素和空想色彩，然而，它是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

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规定要继续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五年间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将从1937年的1147亿卢布增加到1942年的1920亿卢布，增长67%；国民收入由960亿卢布增加到1740亿卢布，增长80%；工业总产值由955亿卢布增加到1840亿卢布，增长92%，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107%，消费资料生产增长72%；农业总产值由201亿卢布增加到305亿卢布，增长52%。

五年计划结束时，按计划规定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指标为：电力750亿瓩时，煤2.43亿吨，石油5400万吨，生铁2200万吨，钢2800万吨，钢材2100万吨。

在30年代末国际形势日趋险恶的情况下，第三个五年计划十分关注合理配置生产力和巩固国防。规定在国家东部地区大规模扩建工业基地：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之间建立新的石油基地——"第二巴库"，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兴建发电站，机器制造厂，黑色和有色金属企业，以及各种同类型的第二套企业，以备中心地区企业停工时使用。并规定在东部建立粮食基地，加

强粮食储备。

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三年半后，因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然而，在战争爆发前，苏联国民经济又有了新的增长。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必须把大量资金用于加强国防，因此战前的工业发展速度略有缓慢，国防工业则增长较快。1938—1940 年，国防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 1.8 倍，而整个工业的产量只增加45%；这一时期工业产值的年增长速度，国防工业为39%，整个工业为13.2%，略低于五年计划规定的14%。

到 1940 年底，电力已达到 486 亿瓩时，达到计划指标的64.8%；煤1.66亿吨，达到68.3%；石油 3110 万吨，达到57.6%；生铁1490万吨，达到67.7%；钢 1830 万吨，达到65.3%，钢材 1310 万吨，达到 62.4%。重工业生产完成计划状况是良好的。

在备战的气氛下，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1938—1940年，这一部门的产品产量增长为33%。其中食糖产量减少11%，捕鱼量下降12%，唯有棉纺织品产量完成了计划，达到80.7%。其余轻工业及食品工业只达到20—40%。

为了适应备战的需要，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半中，军事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1/4以上。1939年 1 月，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划分成 4 个人民委员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武器和弹药工业人民委员部。航空工业部决定在 1941 年前建造 9 个新的飞机制造厂，改造 9 个老的飞机制造厂，新厂主要建在东部地区。1940 年下半年，政府将 60 多个不同企业从其他工业部门转交由航空工业部管辖。1940 年至 1941 年上半年，飞机制造能力增长 0.5 倍。单 1941 年上半年就生产了各种类型的飞机 6000 架，其中2000架新型歼击机，490 架轰炸机和250 架强击机。1935—1937 年间，苏联年产坦克 3000 辆，但

这些坦克战术技术性能较差，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1940年，政府决定除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和哈尔科夫工厂外，将斯大林格勒和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厂也转入坦克生产。1940年，这些厂生产了 246 辆KB型、115辆T-34型新型坦克，1941年上半年，又生产了 393 辆KB型、1110辆T-34 型坦克，半年内总产量超过 1940 年全年的产量 3 倍多。此外，枪炮弹药的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第三个五年计划不得不中止实施。即使在战前的和平时期内，为了服从备战的需要，已经不能按部就班地根据原计划加以实施了。总的说来，战前几年的工业生产状况基本上是好的，它巩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及其经验教训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它用了 20 年的时间，经历了国内战争、经济恢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社会发展速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完成，是两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成果和主要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大工业和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资本主义成分被全部排挤出工业部门，农业全盘集体化以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成了农业中的统治力量。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完全消灭了苏联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了苏联唯一的生产方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大机器生产，已遍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它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是巨大

的，它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践证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实现了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种优越性的体现。苏联在编制和实施头两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尽管还存在种种问题，出现过许多重大的失误，但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个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应该说，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是相当高的，但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完成了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工业生产持续以15%左右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更加激化，一些国家走上了穷兵黩武的法西斯道路，最后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两种制度，两个世界，一个是埋头建设，蓬勃向上，一个是矛盾重重，相互争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但需要集中巨大的财力物力，新建和改建一大批工矿企业，而且需要动员和组织千千万万普通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工业化事业作出贡献。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财力和物力都是不充裕的，但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依靠计划管理，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使用，保证了重点项目的建设，取得良好的收效。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经久不衰。成千上万的突击手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创造性的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创造精神和主人翁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加快工业化过程的重要原

困。

第三.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高速度，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在20—30年代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在思想认识上和具体执行中，又存在相当大的片面性。斯大林在1931年一次演说中说：苏联比西方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要用10年时间跑完人家一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定计划时和在实施过程中，争取一个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增长指标，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然而，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如果盲目追求高速度，单凭主观愿望制订无法达到的高指标，其结果只能助长经济生活中的浮夸、冒进、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阻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展。

在苏联经济建设中，根据当时国内外环境，提出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应当遵循它固有的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如果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排挤轻工业，牺牲农业，其结果，只能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失调，使资金、原材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人民生活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到头来还是影响整个工业化的进程。

第四，自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起，苏联就逐步取消了新经济政策时期比较灵活的管理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调高速度，必然要求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干部管理制度，等等。这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也有其必要性。但是，苏联在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央集权过多，不注意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加上在思想认识上否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致使管理体制上越来越陷于僵化。

总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内外历史

环境中实现的。一方面，应该看到，苏联走的这条工业化道路基本上是成功的，是基本上适合其本国国情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条工业化道路并非尽善尽美，并非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而是以人民群众付出较大的牺牲和代价而取得的。应该看到，在一段时间内，苏联依靠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管理等条件，在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一个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是难以在短时期内靠突击方式提高的，它必须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协调配合，人民群众和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都是密切相联系的，而苏联社会恰恰就是缺少一种充满活力的发展机制，致使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失衡状态，而由于体制的僵化，越来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不能把这条工业化道路教条化和神圣化，它的成就、失误和经验教训，都应当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第九章　布哈林与斯大林的争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布哈林的社会主义观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以后，布哈林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克服了原先那些左的片面观点，依据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性论述，阐发了许多列宁尚来不及论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布哈林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一整套相当激进的社会主义措施，主张把大小工厂全部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取消市场，立即实行计划经济。他的这些主张集中表现在1920年他所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1921年以后，布哈林对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我们幻想的破灭。……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破灭了，是军事共产主义思想破灭了。"其实，这也是布哈林本人思想认识转变的写照，在此基础上，布哈林开始认真分析俄国的国情，并提出自己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

革命前的俄国，既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大企业，也存在着农奴制的残余和极其落后的农村经济，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俄国的基本国情。据此，布哈林认为，原先资本主义大企业国有化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国营工业，构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经济命脉，因此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物质保证的。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经济技术极端落后，因此，俄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起来的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要集中注意力解决农民问题，吸引广大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25年，布哈林在同“新反对派”争论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会由于国内的阶级差别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灭亡，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乌龟速度”一时流传开来，成了一句名言。

布哈林认为，落后型社会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类型上的差别将会缩小以至消失。

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应建设一个“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并以此为出发点制订各项计划和政策。布哈林的这个看法是很有胆识和独创性的。

关于“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

早在1919年，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小册子中，就说明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特殊形式。俄国在过渡时期之所以需要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是因为工人阶级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牢固的、无所不包的国家组织；为了对付国际

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必须有一个武装起来的专政制度；苏维埃是直接的阶级组织、是群众本身的组织。布哈林还说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而且还是一种群众的自治制度。群众的主动精神，应当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后来，布哈林还强调民主、直接选举、群众自治，是苏维埃政权的中心内容。他认为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特征是：不容许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国家机关的选举；限制资产阶级的自由；真正实行工人阶级的组织自由；直接联系和依靠劳动人民的各种各样组织网；吸引人民参加实实在在的管理国家的工作。

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布哈林一再说明，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情况下，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的、激烈的，但是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逐渐缩小与缓和，直至国家消亡。布哈林依据阶级斗争的这一总趋势，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总路线是炸毁整个社会、分裂社会、摧毁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就是巩固整个社会，反对分裂，加强国家。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对付资产阶级的职能，除了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残余势力的反抗，镇压新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利用新资产阶级的一面，用经济排挤的办法战胜它。

布哈林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出发，提出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就是说，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个国家内部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通过进化的道路实现的。"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方面。

"长入社会主义"的实际内容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对非社会主义经济，不采取剥夺的方式，而是采用经济斗争的手段，使之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和平的经济改造，使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多种经济转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经

济。布哈林认为，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可以通过合作制的形式长入社会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通过合作制的特殊形式长入社会主义。在当时的苏联，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富农经济。苏维埃政权对富农实行限制和排挤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包括国家用立法的形式限制富农剥削、用固定价格收购富农的农副产品、由国家信贷系统控制市场周转、把富农组织成销售和信贷等形式的合作社，等等。这样，富农经济也可以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农村形式，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指出："长入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牢牢地把握国家政权，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为害。他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幻想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是宣传机会主义；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资本主义经济长入社会主义经济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对无产阶级国家更为有利的。

布哈林还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就从以利润为准则的经济类型转变成以满足群众需要为准则的经济类型。这样，工人、农民、广大群众的压力就成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保障在于使生产越来越廉价、日益满足群众的需求。

关于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理论

在苏联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过渡时期的根本问题在于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布哈林明确指出，过渡时期的工农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坚持列宁的合作制思想，认为苏联过渡时期的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把个体农民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劳动者的历史

过程。

布哈林强调，过渡时期不是"吞没"农民，而是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不是直接从生产过程开始，而是从流通过程开始，即吸引农民参加在经济上依赖无产阶级国家的合作社。这是一条迂回的道路。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是农民易于接受的形式。旧习惯、旧经济方式在农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想急剧地打破这些习惯是不可能的。"农民从自己的私有经济即单个的小农户的利益出发，必然会走上自身联合的道路，从而越来越和睦地同无产阶级的国营工业结合起来。"[①] 布哈林说，合作社道路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布哈林还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要依赖农民市场，工业生产力的增长也取决于农民市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要受农民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所制约。农民的需求有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需求是互为提高的条件，是辩证的统一。农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是由农民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条件制约的。当消费需求提高时，必将使农民采用日益增多的优良农具，提高经济技术和耕作方法；当生产需求提高时又会有力地促进消费需求的发展。布哈林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开发和扩展农村市场方面，不能一开始就把眼睛盯住农民的生产需求，而应当看到，消费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带来农民生产需求的增加。据此，他认为开拓农村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让农民经济有一个积累过程，要让农民手里有所积余。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布哈林认为无产阶

---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14页，1981年人民出版社。

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决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瓜分现有的国民收入，而是要千方百计提高、增加国民收入的现有数量。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应当是整个国民经济积累的总问题中的一部分。

关于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理论

布哈林认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协调发展；制定投资计划要考虑后备。他强调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都要保持综合平衡。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比重方面，布哈林要求两者达到最完满的结合，反对片面重工业化。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固然需要把重心放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但是这类建设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出产货品，而轻工业的周转快，可以在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利用轻工业赚回的资金来从事重工业建设。关于工业化的速度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要有高速度，可是只有在农业也迅速地增长的基础上，工业的发展才能保持最快的速度，工业的发展才能破纪录。布哈林列举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来说明，只有农业发展起来，农村富裕起来，农村经济商品化了，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了，工业的发展才有较快的速度。布哈林反对扩大"剪刀差"，反对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上去。

布哈林认为，不仅工农业之间要保持平衡，而且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都有平衡问题。

由于工业化进展的需要，许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上马，这对扩大再生产和保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布哈林指出，不能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这里有一个积累和投资的最大界限问题。制订基本建设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后备状况，

包括外汇后备、货币后备、粮食及商品后备的情况，不能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好。他认为制订计划时必须有供求平衡表，光有货币还不够，还必须保证建筑材料的供应。不能把基本建设的弦绷得太紧，投资不能搞得过于紧张，否则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最终减慢发展速度。布哈林把那种不顾实际情况而一味主张多搞基本建设的做法叫做"疯人的政策"，他指出，这种政策会引起连锁反应：加剧商品荒，商品荒又引起粮食荒。

在农业内部也要保持平衡。要使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的生产保持平衡发展，就需要国家调整政策，在价格、税收等方面鼓励谷物生产。同时扶植个体农户，因为此时的粮食极大多数是个体农户提供的，农村居民的大多数也是由这些中农和贫农组成的，他们生活得愈好，生产粮食愈多，出售的粮食也愈多，对苏维埃国家就愈好。因此，要关心个体农民，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但改善的办法不是立即把他们组织进集体农庄。布哈林认为，要根本改造农业，真正广泛地过渡到集体大经济，需要有大量农业机械和新技术。

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主张和设想，就是从他的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理出发的。

第二节　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

粮食收购危机和争论的开始

1927年底至1928年春，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

1927年11、12月，国家收购到的粮食急剧减少，只相当于1926年同期收购量的一半。到1927年底，全国只勉强收购到3亿

普特粮食。而1926年全国收购的商品粮是4.28亿普特。1927年是全国连续第三个丰收年，工业化的进展，使国家对商品粮的需求大大增加，而粮食收购量却比上一年减少四分之一以上。这是一个严重的危机信号。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中央政治局就开始研究如何解决粮食收购危机问题。苏联政府既不能向农村提供足够数量的商品，以便把农民的粮食吸引到市场上来，也不能担保不久的将来会增加农村市场的供应，同时也不能为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变更工业投资计划。经过研究，政治局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收购粮食。"非常措施"是指实施1926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投机倒把分子送交法庭判罪，粮食由国家没收。为了在春天解冻后的泥泞时期到来以前，填平粮食收购量方面的缺额，联共(布)中央于1927年12月14日、24日、1928年1月6日，接连向地方党组织发出三个十万火急的指示，限令完成粮食收购计划，语气和要求都一个比一个严厉。

实行非常措施收购粮食，虽然是经政治局全体委员讨论，一致同意的，但是对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非常措施使用的范围、限度、作用等等，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布哈林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缩小，谷物(指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玉蜀黍等5种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导致谷物生产下降的原因是国家计划领导失误，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布哈林指出，国家计划领导失误的表现之一是，农产品的比价不合理，技术作物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偏高，谷物的收购价格太低。他举例说：如果以战前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924—1925年度谷物产品的价格指数是129，畜产品和技术作物的价格指数是135；1925—1926年度谷物价格指数降为123，畜

产品和技术作物价格指数上升为140；1926—1927年度谷物产品价格指数再降为106，畜产品和技术作物价格指数再升为145；1927—1928年度的第一季度，谷物产品价格指数回升为109，而畜产品和技术作物的价格指数达到151。布哈林说："在最近几年，谷物产品同畜产品和技术作物比价上的剪刀差不断扩大了。粮食在农民可能出卖的一切物品中成为最无利可图的东西了。"① 这种剪刀差越大，对粮食生产越不利。农民不仅缩小粮食播种面积，而且即使有剩余粮食，也不愿卖给国家，而用出卖畜产品和技术作物换来的钱缴纳赋税或购买工业品。农民有时甚至用粮食饲养牲畜，然后再出卖牲畜，而不肯出卖粮食。

国家计划领导失误的表现之二是：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太快、太多。农民的副业收入增加，农民手里的货币增多，农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也提高了。但是，由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增加得太多，使得供应农村市场的商品反而减少了，这样就破坏了原来的城乡平衡。

1927年秋，为了缓和城市的商品荒，停止了对农村市场的商品供应，把本应供应农村市场的商品也调拨给城市；到了冬季，农村市场商品奇缺，农民因买不到商品更不肯出卖粮食。于是又停止城市供应，把本应供应城市的商品也调拨到农村。这种先是只顾城市不顾农村，继之又只顾农村不顾城市的做法，都是由于商品奇缺，无法满足城乡市场的需要，不得不采用行政办法，其结果是破坏了市场的平衡，并动摇了群众对市场的信念。

国家计划领导失误的表现之三是：苏维埃的货币还没有稳定到使农民可以安心地把它作为积累手段的地步。商品供应不足，币值不稳定，增加了农民的不安心理，使得农民只把货币作

---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16页。

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不肯把货币当作可信赖的积累手段。由于信贷系统还不稳固，所以农民手里一有货币就直接投入市场。当市场上商品供应不足时，农民就不肯出卖粮食，而把粮食直接作为积累手段。

关于富农在造成粮食收购危机中的作用，布哈林指出：富农只是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兴风作浪，富农的投机行为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不是重要原因。富农手里的粮食并不多，不足以影响国家粮食收购计划的能否完成。而且，富农之所以能够更方便地进行投机活动，就是因为基本的市场比例遭到破坏。问题的经济方面固然不可能离开社会阶级方面，但是更主要的是，社会阶级方面不可能离开经济方面。布哈林总结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说，不应诿过于人，应该直截了当地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计划经济机关的过错所造成的。我们的计划编制得不好。我们被争论缠住，造成了许多错误，误了事。

关于非常措施，布哈林争辩说，采取非常措施是迫不得已的、临时性的；即使采取非常措施，也只能按照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 107 条，“有秩序地、有限度地对富农中的投机倒把分子实行经济制裁”，不能普遍使用，不能撇开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随心所欲地使用。布哈林批评在使用非常措施时搞过火斗争，例如：不按照司法手续没收余粮或者一概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取缔粮食自由市场，建立阻截队，任意进行各种搜查，强行摊派公债，用钱买不到工业品、只有用粮食才换给工业品，等等，凡此种种“近似余粮收集制方法”，不仅打击了富农，而且也打击了中农，只会加剧粮食收购的困难和危机。

斯大林的看法和布哈林大相径庭。他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有三条：一是工业发展速度太慢，社会主义积累太少，

致使农村商品供应不足；二是苏联农村不仅从粮食总产量来看，而且从商品粮的产量来看，都已经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而小农经济是提供商品粮极少的一种经济成分。三是因为富农已经成长起来了，积累了粮食，投机倒把，操纵粮价，破坏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斯大林不赞成把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归之于国家计划失当，认为这是一种"太不值钱的解释"。斯大林说：初看起来，粮食困难的原因是由于计划得不好，由于经济平衡工作中发生错误。可是以拿计划得不好和偶然的错误来解释一切，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斯大林斩钉截铁地回答布哈林：绝对不可以减缓工业发展的速度，绝对不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因为"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①

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出路何在呢？斯大林说："出路在于从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有机器供应的、用科学成就武装起来的、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食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出路在于在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② 斯大林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

从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分歧远不止于对粮食收购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等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是对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着原则分歧。综合地看，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

1. 关于国家工业化问题。斯大林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解为重工业化，并把重工业化作为区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的根本标志之一。斯大林在强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80页。
② 同上，第77页。

调重工业化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强调要有"布尔什维克的速度"。为了高速度地实现重工业化，并要求农民为工业化缴纳"额外税"。

布哈林认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他指出：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经济计划制定得不好或者执行得不好，也会产生经济危机。苏联出现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周期性危机性质不同。苏联的危机是因为经济平衡的各种条件遭到破坏时才出现的，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也正好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形式的颠倒。布哈林认为苏联的危机表现为"商品荒"，它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环节遭到破坏的表现。

2.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斯大林要求尽速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尽速改变整个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保证国家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粮。对富农阶级的政策也要求从限制和排挤富农剥削的政策立即转变为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

布哈林认为解决谷物问题固然是要通过日益增长的集体化，把个体农业生产改造为大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但是解决这个问题远不是以忽视劳动农民的个体经济为前提的，相反，必须在个体经济也同时增长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因此，他坚决反对搞全盘集体化运动。

3.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并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成就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1928年后，斯大林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他要求以加紧开展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建设。

布哈林反对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认为群众消费的增长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布哈林也反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的基本

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

显然，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是带根本性的：斯大林的方针是要结束新经济政策，根据国家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计划，确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而布哈林要求坚持新经济政策，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

这样，以粮食收购危机为契机，联共(布)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上的新的大争论，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政治局内部，支持布哈林的有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支持斯大林的有莫洛托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另外三名政治局委员加里宁、鲁祖塔克、古比雪夫态度不明朗。在地方上，坚决支持布哈林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兰诺夫。争论双方的阵线是分明的。

1928年3月10日，顿巴斯工业联合企业的沙赫特矿区发生了矿井爆炸事件。苏联政府保安部门宣布在该矿区破获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组织，该组织按照国际资本反苏维埃组织的指示进行破坏活动。保安部门说：他们不合理地在井下进行开采，以减少采煤量；毁坏机器和通风设备，设法使矿井崩塌；焚烧矿井、电站；故意阻挠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违反苏维埃劳动保护法。有55人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叛国罪，11人被判处死刑。对沙赫特事件的性质，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看法也很不一致。

事情已经到了必须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争论问题的地步了。

1928年的两次中央联席全会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

员会举行联席全会，讨论粮食收购工作和沙赫特事件等问题。政治局候补委员米高扬向四月联席全会作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报告，他认为不实行非常措施，粮食收购计划是难以完成的；为了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今后也不能放弃采用非常措施。

政治局就粮食收购工作向联席全会作了报告。关于粮食收购危机，政治局的报告调和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等双方的观点，但是批评了“过火行为”，要求按照司法程序执行非常措施，并且随着粮食收购困难的消除，停止使用非常措施。斯大林布哈林也在联席全会上讲话。争论的结果，斯大林作了较大的让步。这反映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委员偏向布哈林的意见。

4月11日，中央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本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关于粮食收购危机发生的原因，决议说：富农对经济情况的利用，工业品分配计划中的错误，整个计划工作的错误，工业品增长暂时落后，机关的组织性不强和积极性不高，所有这些，造成了经济困难。决议强调：“必须绝对制止某些地方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的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党应当同它们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会造成长期的不良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决议要求“随着粮食收购中的困难的消除，应该取消党的措施中带有非常性质的部分。”①

四月联席全会没有弥合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相反，他们按各自的观点来理解四月联席全会的决议。4月13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同一天分别向联共（布）最大的两个地方组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作四月联席全会的报告，但所讲的内容却是对立的。

斯大林在报告中说，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工业发展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27、429页，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

速度太慢、小农经济生产的商品粮太少、富农从事投机破坏。他指责布哈林是想在农村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关于沙赫特事件，斯大林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革命组织那里领取经费进行暗害活动，是西欧资本主义反苏组织对苏联工业的经济干涉。斯大林总结说："收购危机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的进攻"。"沙赫特事件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进攻"。① 在斯大林看来，1927年底、1928年初苏联所处的局势如同国内战争时期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当时是国内的反革命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军互相勾结，向苏维埃共和国发动军事武装干涉；当前是国内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互相配合，向苏维埃发动联合经济干涉。

布哈林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是国家计划领导的失误造成的，富农的投机行为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不是重要原因。而且，当苏维埃政府在政策执行方面发生错误时，富农才会构成危险的力量。布哈林说，党的计划领导之所以发生错误，是因为党的领导机关近年来一直处于和反对派的争论之中，把精力过多地消耗在争论中，忽略了计划领导。关于党的农村政策，布哈林强调在坚持合作化的同时，不能取消个体农民的劳动积累，不能否认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能用征集的办法组建集体经济。关于沙赫特事件，布哈林强调这是向党敲响了警钟，提醒党加强无产阶级民主，开展自我批评，制止官僚主义弊病的发展。

由于各自发表这样的公开讲话，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分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4页。

歧实际上在党内公开化了。5月，布哈林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提请政治局注意：粮食收购运动正在迫使不仅仅是富农而且使中农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这种形势不仅破坏了党的工业化纲领，也威胁到党的政治生活；集体农庄不能拯救一切。他在信中敦促中央切实贯彻四月联席全会的决议，停止执行非常措施，并使市场恢复正常。

5月28日，斯大林来到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作《在粮食战线上》的报告，这是对布哈林的回答。斯大林说：粮食困难的根源在于商品粮产量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小农经济才是造成粮食困难的根源。斯大林批评布哈林是想用恢复富农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斯大林的讲话，把他和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提到革命和反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从而使争论也升级了。

7月4—12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布哈林把意见集中在两点上：1. 必须停止在农村用非常措施征购粮食；2. 斯大林在实施非常措施中采用过火手段，违背了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联席全会的决议精神，他应当对农村出现的严重局势负主要责任。

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在讲话中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积累源泉除了工人之外就是农民，农民必须为实现工业化而缴纳"贡税"，即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化缴纳"额外税"。斯大林说："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做，要不然"我们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了"[①]。斯大林的"贡税论"是结束新经济政策，确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关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基点。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0页。

布哈林在全会上作了题为《论农民政策》的讲话。布哈林对斯大林提出"贡税论"感到惊讶，他激烈反对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并要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妥善处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工农结合问题。

经过争论，7月10日，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议要求在粮食收购运动中"立刻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以及任何破坏革命法制的行为。立刻制止各种各样重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行为和任何封闭集市的企图，同时保证由国家机关充分灵活地调节商业。根据不同的地区和谷物种类，酌量把粮价提高一些"①。全会的决议通过之后次日，即7月11日，斯大林又在会上发表演说，着重说明农民缴纳"贡税"是国家工业化的必然要求，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对农民的要求。斯大林强调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城乡结合的内容就是：农民缴纳"贡税"；工人阶级建设工业化的国家。斯大林说，昨天布哈林反对让农民缴纳"贡税"，要求立即消灭剪刀差，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他表示，"这个要求在目前是违反国家工业化的利益的，因而也是违反我们国家的利益的。"

在七月中央全会激烈的争论中，布哈林的意见虽然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但是斯大林的"贡税论"对于迫切希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各方面实际领导人来说，提供了一条现实的捷径，因此更具有进取的鼓动性。多数中央委员虽然对农村自实行非常措施以来出现的不稳定形势感到担忧，但是也不愿意为了向农民让步而缩减工业投资、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因此在双方的争论中大多数不明确表态，看政治局的形势而决定自己的向背。在政治局委员中，加里宁、古比雪夫、鲁祖塔克都接受了斯大林的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51页。

"贡税论"。这样，布哈林原来一心想获得多数中央委员支持的指望落空了。全会通过的决议只是一般地表示要坚持新经济政策、一般地说要停止过火行为，实际上是接受了斯大林的"贡税论"。特别是当决议通过之后斯大林再就贡税问题发表演说，更使本来就模棱两可的决议的实际作用化为乌有。七月全会是布哈林从理论上占优势转而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发表

七月全会以后，对农村的非常措施没有停止。情况表明，全国正在改变新经济政策，以斯大林的"贡税论"作为经济建设的政策指导。布哈林敏感到，苏联正在转向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布哈林不愿再沉默了。

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激烈批评斯大林的"贡税论"，并阐述他的经济建设主张。

布哈林在文章中对斯大林的"贡税论"表示出极大的义愤，他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那么多新情况、新问题，群众迫切需要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不满老掉牙的、死板的空话。而斯大林的"贡税论"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两者比较起来，"这些空谈简单得象一块木头，而且千篇一律，就象一粒豌豆和另一粒豌豆相似一样。"① 他认为当农业还相当落后的时候，就大量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这是无视工业的根本基础，后果将招致整个工业的危机。他批评斯大林和古比雪夫修订的五年计划，是每年把资金最大限度地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上去，以保证高速度，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计划。

---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70页。

布哈林在文章中还猛烈地批评除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短缺之外，工业也已经落后于它本身的已经扩大了的需求，造成严重的原料短缺和广泛出现的各种短缺，说明工业发展速度也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就是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相应的比例，工业的增长应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成比例。布哈林指出："每个共产党人都懂得，应该尽可能快地前进。自然我们极不愿意减缓已经达到的速度，需要记住，这个速度我们是以预算的极端紧张、后备短缺、削减消费部分等等为代价达到的。我们是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前进的。"① 布哈林呼吁改变和调整不正常的状态达到正常的协调。

布哈林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党和全国都引起很大震动。斯大林称这篇文章是一篇反党的折衷主义文章，它指望减缓工业发展的速度来改变我们党的农村政策。

莫斯科市委的被改组，是布哈林失败的正式开始。倔强的乌格兰诺夫不仅抵制斯大林的理论和方针，而且不断地给他的下级们以鼓励，说：不要怕"偏向"这个词；现在散布"右倾危险"只是某些人的造谣生事。布哈林的文章发表以后，斯大林立即对以乌格兰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市委进行了严厉批判。10月1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表题为《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演说，他严厉斥责乌格兰诺夫"和中央的政策进行斗争"。随后，中央改组了莫斯科市委，组成了以巴乌曼为首的新的莫斯科市委。对莫斯科市委的处理，敲响了布哈林模式的丧钟，也把这场争论推到最后关头。

---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97页。

第三节 “反右倾斗争”

“和解方案”的破灭

随着1929年的到来，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除了没有指名道姓之外，统统都公开了。1月底至2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在会上发表声明：1.党在七月全会以后的政策是根据斯大林在全会演说中提出的“贡税”口号，即“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而制定的，这是由国家对全国农民实行合法的掠夺，是搞新的“战时共产主义”；2. 外汇情况已经无法挽救，应当减少设备进口，降低工业发展速度；3.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在官僚主义化，没有选举产生的书记，只有上级机关任免的政治委员，苏维埃只能起党的机关的附属机构作用；4.斯大林的政策和工作作风使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涣散和分裂。布哈林等人要求把他们的声明印发给中央委员，并召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们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斯大林称这个声明为“彻头彻尾反对中央及其总路线的宣言”，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布哈林、托姆斯基要求立即辞职，也被斯大林所拒绝。

在联席会议期间，斯大林抓住1928年7月11日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谈话纪要这件事大加渲染。原来布哈林在七月中央全会上遭到挫折之后，曾拜访了前反对派首领之一的加米涅夫。布哈林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斯大林的“贡税论”正是过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张；他自己在全会上之所以成为少数派是由于中央委员们不理解分歧的深刻程度、害怕争论会导致党的分裂。从谈话的内容来看，只涉及布哈林对七月全会、对斯大林的方针

政策的看法，没有涉及他对加米涅夫有什么希望或者要求。不过秘密会见这件事本身确实反映了布哈林对自己的挫折感到沮丧，想在昔日的反对派中寻觅支持。斯大林斥责布哈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组织"派别集团"；并说"布哈林集团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主张"保护富农"，让城乡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斯大林进而抨击布哈林进行"反党派别活动"，对布哈林及其支持者们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不过斯大林仍然不希望用解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方式来解决和布哈林的分歧。

2月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提出一个"和解方案"。要求布哈林承认和加米涅夫谈判是政治错误，承认他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在激烈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据此，布哈林必须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不再辞职，并收回1月30日的声明。接受"和解"方案，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建议联席会议收回现有一切文件，并为布哈林在《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①

布哈林不仅不同意"和解方案"，还起草了一份批驳斯大林政策的声明，由李可夫在2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宣读。声明说：斯大林用个人决定代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斯大林称这份声明是"厚颜无耻地对党进行粗暴的诬蔑"。"和解方案"破灭了。

---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9页。

2月9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认定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组织派别联盟，谴责他们对党中央委员会、它的内外政策、它的公认的领导进行不可容忍的诬蔑。决议说：“一、认定布哈林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二、责成布哈林在国内政策方面坚决同弗鲁姆金路线划清界限，在共产国际政策方面同洪别尔—德罗路线划清界限；三、不同意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辞职；四、责成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忠诚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党和党中央的一切决议。”① 从此，斯大林在全党和全国开始了一场“反右倾斗争”。

1929年的两次中央全会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批评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联席全会批准了2月9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4月22日，斯大林在联席全会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宣布党内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② 斯大林在演说中称布哈林是“厚颜无耻的假仁假义”、“真正不知羞耻的人”、“伪君子”，等等。

布哈林也在联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他否认和李可夫、托姆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51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页。

斯基等人反对党的路线。他说："正是斯大林自己，由于推行那些同新经济政策原则水火不相容的政策而违背了已为全党所批准的路线"，斯大林的路线"已经使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布哈林声明，他们支持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斯大林的计划却象一架没有发动机的飞机那样注定会栽下来的，因为斯大林的计划建立在农业衰退和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非常措施和新经济政策是互相矛盾的东西，坚持非常措施意味着结束新经济政策。"①

4月23日，中央联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确认"布哈林集团已经开始向党的领导进行派别斗争"。联席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担任的职务，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再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及其各机关的决议的情形，就将被当做破坏党纪的分子而立即开除出政治局②。

随着"反右倾斗争"的深入，对布哈林的处分也随之升级。1929年11月中旬，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批判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全会通过《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决定取消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资格；警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如有丝毫反对中央路线和决议的企图，党就立即对他们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11月25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人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承认有错误。声明说："我们有义务声明：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在一系列政治和策略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在这场争论中党和中央委员会是正确的。"③

这场争论最后以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布哈林关于社会

---

① 转引自《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10—311页。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98页。
③ 1929年11月26日《真理报》。

主义建设的理论和设想被宣布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全党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而告终。

布哈林在争论中失败的原因

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比较忠实于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计划，也是比较符合苏联的国情的。布哈林长期从事苏联的宣传、舆论工作，在党内有相当威望，从中央到地方都拥有一大批强有力的支持者。可是，他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为什么失败了？在和斯大林争论的近两年时间里，他的处境几乎是直线下降，从优势到均势，从均势到劣势，最后被作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的首领，开除出政治局，他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计划"而彻底否定。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

布哈林生活的那个年代，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狂热的年代。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了，但是，革命的冲击波还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来回激荡，全党、全国还没有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激情中冷静下来。

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轻视科学，崇尚脱离实际的远大目标和幻想下的实践。本来，科学和幻想并不是绝对互不相容的，幻想有时甚至是科学的必要先导，不过幻想绝不能指导实践。可是那个年代，谁要是指出幻想下实践的是非得失，谁就被认为是"右倾"。

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二是不尚理智而崇尚激情。理智和激情在一定限度内和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为补充的，可惜这个时代把一定限度和一定条件当作"反党"言论。谁要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谁要是敢于力排众议，就会被认为是"革命意志衰退"。

布哈林生活在那个狂热的时代，革命胜利之初，他自己也曾

经是狂热的，甚至比一般狂热还狂热。由于布哈林从小受知识和科学的熏陶，酷爱科学，以钻研理论作为职业和享受，终于使他从狂热中走了出来。作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放弃了狂热和空想，成为一名清醒的革命家，而这是那个时代所不相容的。

20年代的苏联，整个社会的科学和文化水平还很低。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愈低，整个社会对布哈林的理论体系就愈是不理解。国内战争时期，企图从分配领域入手寻找到达共产主义捷径的尝试失败了，但是要求不顾一切、甚至采取极端办法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心理、习惯、愿望，是不可能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束而消失的。小生产者的习惯和心理，人民大众文化科学水平普遍低下，是斯大林采用极端的行政措施建设社会主义能够被接受的社会基础，也是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失败的客观条件。

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实施，有赖于求得一个较长的不发生严重危机的国际、国内安定环境。但是，苏联当时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始终面临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威胁，国际上的安定局面不是苏联一国所能求得的。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国防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构成对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巨大压力。建设独立的国防工业，是必须以雄厚的重工业作基础、要以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作为配套的。这些政策实践方面的特殊性是布哈林所忽视的。他太偏重于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部署处于特殊环境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了！

国内环境也不安定。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几年中，不断受到种种因素的冲击，干扰新经济政策的贯彻。频繁而又激烈的党内争论，经济领域内的危机，都是干扰。当粮食收购危机发生

时，布哈林也只得同意采取非常措施，从而在粮食市场，即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关键渠道，取消了新经济政策。

这些就是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失败的客观原因。

从主观上说，布哈林的观点、情绪，也有片面性。

首先，他断定斯大林的政策会激起中农的普遍反抗，从而使工农联盟破裂。他预言："斯大林的路线是使整个革命毁灭的路线。我们会因此被推翻。"① 事实是，斯大林的计划不管如何激烈，不管采取何等极端手段，斯大林追求国家工业化、追求农业集体化、追求强大的国防，所有这一切，也是包括布哈林在内的苏联共产党人追求的共同目标。布哈林对斯大林的政策的片面看法，使他在争论中情绪也是越来越激烈。

其次，布哈林对苏联农民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下的忍受力估计过低，即对苏联农民为了实现工业化而甘愿忍受消费品不足的困难的觉悟估计过低。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太注重研究和运用经济手段了，以致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意识的作用估计不足。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长期落后，受制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恰当地把人民群众这种因长期受压制而产生的改变现状的迫切性鼓动起来，转化成以革命名义的含辛茹苦的忍受力。这种忍受力如同激情一样，不能持久，但是在一定时间里是能起很大作用的。布哈林却看不到这点。

再次，布哈林对斯大林提出的"贡税论"没有认真分析研究，而是以一种轻视的态度对待。当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贡税论"后，布哈林未能认真研究"贡税论"的依据是什么，也不认真分析"贡税论"在当时有没有相对合理成分，以及这一理论在

---

① 《布哈林言论》第323—324页，1976年三联书店。

工人、农民和干部中的反响怎样，只是用一句激烈的语言"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予以全盘否定。他以为只要一点穿"贡税论"的实质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贡税论"就会不攻自垮了。实际上，两者在把农民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主要对象这点上是相同的，但是"贡税论"并不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的简单重复，"贡税论"有着坚固得多的政治背景和实用价值。布哈林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使他在争论中失去说服力，失去一批本来可以争取的支持者，最终导致自己的失败。

"反右倾斗争"的后果和教训

"反右倾斗争"是苏联政治、经济生活的阶段性转折的大事。这场斗争使新经济政策阶段实际上终止，并开始了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的新阶段。1929年12月27日，"反右倾斗争"刚刚告一段落，斯大林就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①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们要求斯大林解释一下这句话的确切意思，即为什么要把新经济政策抛开？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对此作如下解释："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② 可见，"右倾"是指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思想，以及坚持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的人；"反右倾"实际上是反对新经济政策，以及要求继续贯彻新经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3页。

济政策的人。

抛弃新经济政策，尤其是用"反右倾斗争"的方式来结束新经济政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许多消极后果。

"反右倾斗争"助长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左倾，确认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有一种模式，这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不良后果。

从1926年11月到1929年4月，斯大林连续作了《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八篇长篇报告，把争论中的一种比较稳重的意见作为"右倾投降主义"来批判。在此期间，他没有作过一次反对左倾的报告。斯大林认为，反对"左"倾的任务已经解决了。他说："对'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几年中，党学会了许多东西，要用'左的'词句来欺骗党已经不是容易的了。"①甚至在反对托洛茨基倾向时，也把托洛茨基作为右派来反，说托洛茨基已经"退到阿克雪里罗德那里去了"，"已经演变到孟什维主义和自由主义那方面去了"，"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反右倾斗争"告一段落以后，1930年，斯大林明确说："我们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右倾危险还是'左'倾危险？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右倾危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② 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又说："我们一向都说，'左派'就是右派，不过用左的词句掩饰了右的实质。"③

实践表明，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那么严重的、全局性的"过火行动"，刮起那么猛烈的共产风，是和"反右倾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由于农业集体化运动和消灭富农阶级是以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0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0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20页。

"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理论指导，因此，城乡所有制改革中的左倾，又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互为条件。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在政治上给苏联造成极大损害。

20年代后期，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客观上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和变革管理体制的迫切任务。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工农业比例问题、轻重工业的关系问题、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关于中央集权与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问题，等等，都因粮食收购危机而尖锐地提到党和政府的领导面前，要求作出调整和选择。由于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仅不能博采众长，研究经济规律，反而把原来的某些片面性和弊病引向极端，终于把国家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方针，作为长期的、根本的经济路线固定下来，加以程式化，作为唯一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日后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使一些希望变革这一模式的有识之士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同时"反右倾斗争"损害了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盛行起来。

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在中央联席全会和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和声明，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这些活动是正常的。斯大林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直认为布哈林只是"思想右倾"，没有组织"派别集团"，没有违犯中央的有关决议，对布哈林主要是开展思想斗争。1928年11月19日，斯大林说："虽然右倾正在党内增长，但是目前还不能把它看做一种已经形成和定型的东西。它仅仅是在定型和形成中。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

因此结论是：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①12月9日，斯大林还说布哈林等人无疑是忠顺地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的。可是到1929年2月7日布哈林拒绝“和解方案”以后，斯大林立即斥责布哈林组织“反党三人团”，说这个集团“有自己的、和党的政策相对抗的特殊政纲。”这样，斯大林实际上是把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某种一致，作为“反党派别活动”的罪证，这在实际上是禁止任何反对斯大林的意见。“反右倾斗争”就这样堵塞了党的政治生活的毛孔，并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在党内蔓延开来。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46页。

第十章　农业集体化运动

第一节　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开展

党的十五大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决议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认为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他认为农业生产落后的原因是：1.农业技术过分落后和农村文化水平太低；2.农业生产零星、分散，没有国有化工业所具有的那种计划经营的优越性。他提出："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①

莫洛托夫在会上作"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苏联，农村分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分化是根本不同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1页。

的。资本主义社会农村分化的特点是中农被冲刷掉，农村两极分化；在苏联，由于得到党和国家的帮助，农村中的中农阶层有所增加和加强，贫农有所缩减。在谈到改造小农的方法时，莫洛托夫引用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提出的思想：党应当"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莫洛托夫认为工人阶级的任务在于："支持和帮助农民开展合作事业，支持和帮助农民从合作制过渡到群众性集体化的主动精神。"①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的政治报告和莫洛托夫的农村工作报告，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决议对农村形势、改造小农的方针和途径、党的任务和政策，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规定。

决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的发展是以形成一种使基本中农群众破产，使他们由于无产阶级化而解体的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市场的成长是依靠中农和贫农物质福利的增长。苏联农村发展的特点正好和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现象相反：中农集团加强、富农集团有某种程度的增大、贫农集团缩小。"我国分化过程的特点使中农阶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再一次证实了列宁同志关于中农是'农业的中心人物'的著名原理。"②

决议认为，苏联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已有了显著的发展；农业总产量已超过战前水平，但是谷物产量未达到战前水平；单位面积产量还很低，对自然因素的依赖性很大；商品粮和需要量差距很远，严重影响农产品出口。决议认为农村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农业人口过剩；很大一部分耕地未加整理，力量单薄的农

① 1927年12月22日《真理报》。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00页，1956年人民出版社。

民阶层不能充分利用耕地；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很大。社会主义城市要领导农村逐步向集体经济过渡，但是个体私有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整个农业的基础。

根据以上分析，决议指出："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当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党明确地指出，这一过渡只有在劳动农民的同意下才能进行，因而认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向农民广泛宣传逐步过渡到大规模的公有化农业经济的好处和必要性，并以各种实际办法来鼓励农村中现有的正在显著增长起来的大规模的集体经济成分。"①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基本精神是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集体化"不是集体农庄化，而是坚持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加快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发展农村的互助合作事业，经过流通领域和生产过程的联合，再逐步过渡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联合。

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理论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从 1928 年开始，斯大林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斯大林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否定商品经济、市场流转作为联结工农联盟的纽带，而把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联结工农联盟的纽带，把重工业作为改造农民的杠杆。这样，就部分地否定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农经济联盟。

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分为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02页。

"金属的结合"和"纺织品的结合"两个方面，说只有"金属的结合"才对改造农民具有决定的意义。

斯大林认为，农民的经济生活由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活动两方面构成。农民的日常生活活动需要生活工具和能满足生活需要的物品，纺织品在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新经济政策就是从这方面开始和农民建立结合的。斯大林指出，要是把城乡结合停留在纺织品结合上，就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他说，农民的生产活动需要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需要金属制品，需要城市供给各种机器、种籽、铁犁、肥料，等等，只有这些东西才对提高农民经济和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决定意义。"纺织品方面的结合主要关系到农民的个人需要，没有触及或较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而金属制品方面的结合则主要关系到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能改善农民经济，使它机械化，使它赢利更多，并为分散的小农经济联合成公共大经济打下基础。"①

斯大林还强调，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目的不是要保存农民阶级，而是要消灭阶级。纺织品的结合不可能以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农民和消灭阶级，只有金属制品方面的结合才能逐渐改造农民，逐渐消灭阶级，包括消灭农民阶级。

第二、斯大林把从振兴农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变为从建设重工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把尽可能多地生产商品粮作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把尽可能多地提供商品粮作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应尽义务。

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分为两个时期：从1921年春到1926年春是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从首先发展农业的角度来对待建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2页。

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从农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1926年春开始了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要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应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并以发展重工业为归宿。

斯大林认为，农业中的大经济，不论是地主经济，富农经济，还是集体经济，都有可能采用机器、利用科学成就、使用化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生产更多的商品粮。斯大林举例说：十月革命前，地主经济粮食生产的商品率是47%，富农经济的商品率是34%，中农和贫农的商品率是14.7%；1926—1927年度，富农经济粮食生产的商品率是20%，中农和贫农的商品率是11.2%，而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商品率达到47.2%。所以斯大林多次强调，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生产商品最少的经济"，是"生产商品最少、赢利最小、自给自足的程度最高的消费经济，它的产品的商品率只占12%到15%"①。斯大林认为，个体农民经济即使发展生产，也无法使农村经济商品化，因此，必须把改造个体农民经济的着眼点从实现生产劳动过程的社会化，转向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化。

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从宏观上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从微观上来说却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理论适应了苏联在特定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首先，这种理论适应了迅速建设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防止和抵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迫切需要；其次，它适应了苏联国内迫切要求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但这种农业集体化理论脱离了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大多数农民的觉悟水平，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6、179页。

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开展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年代里，广大农村沿着列宁制定的合作化计划的道路发展。至1928年底，参加各类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1/3以上。但是，集体农庄的发展并不快。1927年底，全国只有14800个集体农庄，包括农业公社、劳动组合、共耕社等三种集体经济形式①。参加集体农庄的共有20万农户，在全国总农户中仅占0.8%。

在这些集体农庄中，农业公社有1400个，占9.4%；劳动组合有7200个，占48.6%；共耕社有6200个，占42%。在这些形式的集体经济中，究竟以何种形式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形式，也尚未选定。1928年6月，加里宁在全苏集体农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集体化的主要困难不在物质方面。尽管我们还很穷，政府拨给集体农庄的资金和它们的需要之间距离还很大。但关键不在这里。关键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集体经济的最好形式，这种形式既能把生产联合起来，使生产合作化；又不必让每个人都过军营式生活。"②

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告一段落。斯大林用政治运动这把铁扫帚，扫清了在集体化的方针、步骤、形式、速度等问题上的分歧意见，随即把注意力转向大规模推进集体化运动。同年夏，在各主要产粮区都开始大规模组建集体农庄，并且出现了某些实现了集体化的村、乡、甚至区。7月底，中伏尔加边区恰巴耶夫区发出倡仪，要把全区变为全盘集体化的区。中伏尔加边区集体农庄联盟讨论了恰巴耶夫区的

① 俄文колхоз系колектив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的缩写，意为集体经济。колхоз原是农业公社、劳动组合、共耕社的统称，以后逐渐专指劳动组合。

② 转引自波古金《苏联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编纂学》第122页，1975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倡议，并决定支持这个倡议。1929年8月，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专门会议，赞同一些区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思想。9月，中伏尔加边区已组织起500个集体农庄(461个共耕社、34个劳动组合、5个农业公社)，联合了6441户农户(总农户为10275户)，集体化的耕地面积接近全区耕地面积的一半。① 全国集体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929年11月，全国已成立了67400个集体农庄，集体化的农户有191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7.6%，集体化的耕地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3.6%②。不过，就全国范围来说，集体农庄仍然是个体农民经济海洋中零星散布的一些小岛。

斯大林把个别村、乡、区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事例作为典型，推广到全国，要求在全国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说："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③ 以斯大林的文章为分界线，个别村、乡、区的集体化发展成规模宏大的全盘集体化运动。

同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集体农庄建设问题。会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过高估计中农的觉悟程度，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不顾机械化可能提供的条件，要求迅速实现全盘集体化。莫洛托夫说："在目前的条件下，谈论

---

① 见伊夫尼茨基《农村阶级斗争和消灭富农阶级》第75—76页，1972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② 见瓦加诺夫《农业的改造》，载《共产党人》杂志1966年第3期，第95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8页。

集体化的五年计划，就意味着干不必要的事。对主要的农业区和省来说，不管他们集体化的速度如何不同，现在应当考虑不是五年，而是在最近一年内完成集体化。"①

全会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认为，"苏联已进入了对农村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时期。"②决议要求必须在最近几个月内至少派遣2.5万名具有相当组织才能和政治经验的工人到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联合社等岗位去工作。

斯大林的文章、莫洛托夫的报告、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给各级农村干部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承担大规模吸引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方面不切实际的义务。霍泊尔州、阿特卡尔州、普卡乔夫州在1929年夏还只有5—10％的农户参加集体农庄，而这几个州的州委都决定在1930年初完成集体化。北高加索边区在1929年秋只有30％的农户参加集体农庄，边区党委在12月17日通过决议，要在1930年春完成主要产粮州的集体化。下伏尔加边区党委决定，1930年春天以前集体化水平达到80％，当年秋天实现百分之百集体化。某些非产粮区也竞相效法产粮区，各地都想更早地跨进社会主义。

1929年12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农业人民委员雅·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通称特设委员会），研究集体化的速度和制订推动各地建设集体农庄的具体办法。特设委员会几经讨论，几次加码，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

决议规定了不同地区集体化的速度，要求伏尔加河下游、伏

---

① 载《布尔什维克》杂志，1929年第22期，第12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87页。

尔加河中游和北高加索这些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在1930年秋季或至迟在1931年春季就基本上完成；其他产粮区的集体化，在1931年秋季或至迟在1932年春季基本上完成。这就是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绝大部分地区和绝大多数农户将实现集体化①。

决议还指出：在集体农庄发展的现阶段上，农业劳动组合是最普遍的集体农庄形式。

斯大林的文章，党中央的决议，使地方干部感到突然。他们对要求如此急速地实现集体化缺乏思想准备，农民群众，尤其是中农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各地干部和集体化工作队员面对新政策，很自然地把它理解为加快集体化速度的纯行政措施，竞相提前完成全盘集体化。例如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内，把集体化农户的百分比提高了一倍，达到53.9%。但当他们向全苏集体农庄中央管理委员会汇报集体农庄建设进程时，全苏集体农庄中央管理委员会指示：还要提高集体化速度②。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都不管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实际准备程度怎样，大多计划到1930年夏，基本上实现集体化。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3月1日，集体化的农户数从占总农户数的7.6%增加到56%。特别是1930年1月20日到2月1日这十天里，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数增加了一倍。有些地方甚至从10%一下子增加到90%。这实际上已发展成大冒进。

左倾冒进的严重后果

农业集体化运动是苏联党和政府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调整农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13页。

② 见鲍克挞柯《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初始阶段的历史》，载《历史问题》1963年第5期，第27页。

业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运动。当这场运动到1929年冬转变为轰轰烈烈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时，就变成了用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推进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集体化运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偏差和错误。

第一、违反了改造农民的自愿原则，用行政命令或变相暴力强迫农民立即加入集体农庄。

1930年1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要求各基层苏维埃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发挥新作用，警告村苏维埃如果不改正自己的工作，使其适合于在大规模集体化方面的新要求，就会事实上是一个富农苏维埃。在来自上级领导的严令督促下，各地基层苏维埃及集体化工作队员，为了提前完成全盘集体化的任务，纷纷采取各种行政措施。

下伏尔加边区的霍泊尔州的很多地方，用剥夺土地来恐吓农民，当农民本人不在场时就为他登记加入集体农庄等手段实现农业集体化。这个边区的恰巴耶夫区是全国第一批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区之一。1929年底，全区已有一半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了。但是区委领导还不满意，竟严令下乡的工作队员："不完成百分之百的集体化不得回区"。莫斯科州的领导人要求农村的共产党员必须在1930年春天实现集体化。还有的地区的苏维埃机关，干脆规定农民一律加入集体农庄，凡拒绝加入者就没收土地，并剥夺选举权。土尔克斯坦的某些地区，有人用武力威胁，有的用不供给灌溉用水和工业品相威胁，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以赶上和超过各集体化先进地区。

由于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消极怠工、损坏劳动工具、忍痛挥霍多年的积蓄，几乎成为普遍现象。某地区有家酒店，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内，卖了4万卢布左右的酒。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20台拖拉机。另

据报道：在不少集体农庄中，收获粮食时损失的粮食达全部粮食的20—40%。

第二、严重侵犯中农利益。

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始前，在全国2450万农户中，贫农约850万户，占34%；中农约有1500万户，占60%以上。中农是苏联20年代的典型小商品生产者，是农村的中心人物。1929年秋，当大规模集体化运动高涨起来时，中农的态度基本上还处于观望、等待状态，中农对待集体化运动的这种态度并没有发生什么深刻的、普遍的变化。到1929年底，全国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也只有50万户左右，占全国中农户总数的3.3%。只有在个别集体化基础比较好的地区，才有更多的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例如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主要产粮州，集体化的中农户为16.1%；中伏尔加边区，集体化的中农户为39.9%；乌拉尔州，集体化的中农户为36.2%。①

由于斯大林仓促作出"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的普遍结论，于是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就强迫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侵犯中农的利益。有的州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许多地区由向中农征税进而剥夺选举权，再由剥夺选举权进而没收中农财产。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赫尔赞斯克村苏维埃规定，只要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就要被没收财产：卖给同村人十把长柄镰刀；出卖自己多余的粮食；买进小块宅旁园地；二年前卖过牛，卖过鞋掌；1927年卖粮食给合作社，等等。1930年2月12日，《联合报》报道：谢缅哥斯克村苏维埃由贫农代表作出决定，成立没收富农和中农财产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该委员会决

① 参见《苏联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编纂学》第107—108页。

定；登记没收缝纫机、大衣镜、带镜子的床，以及一切"奢侈品"。1930年3月12日斯摩棱斯克《工人之路报》报道，巴图林区的某村没收了34户农户的财产，其中只有3户是富农。

第三、不少地区贪大求公，不仅否定了共耕社，而且越过劳动组合，直接建立农业公社。

1929年秋天，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工作人员，出现了一种立即推行集体农庄高级形式的倾向。1929年12月底，全苏集体农庄中央管理委员会发出一个《春季农村运动中的集体化计划》的指示，要求在集体农庄里实行牲畜和家禽最大限度的公有化。这个指示已越出了劳动组合的范围，要求建立农业公社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又提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集体农庄"和"发达的集体农庄"的模糊概念，更加搞乱了干部的思想。各地干部直观地把"发达的集体农庄"理解为公有化程度更高，实际上是当作农业公社。1930年初，下伏尔加的霍泊尔州，农业公社已占全部集体农庄数的25%。其中的阿列克谢耶夫区，所有的集体农庄全部采用农业公社的章程。

在全盘集体化高潮中，普遍将农民的住宅、小家畜、家禽、非商品乳畜等，统统加以公有化。一下子将家畜、家禽集中饲养，各集体农庄既来不及准备必要的设备和建筑物，也没有技术力量，经过一个冬天的折腾，牲畜大批死亡。此外，牲畜转交集体农庄时作价过低。普通市场上价值100卢布的一匹马，交给集体农庄只作价25—30卢布。于是，各地农民因惧怕牲畜被集体化而滥宰滥屠。1930年2、3两个月内，屠宰掉的大牲畜约1400万头；猪被屠宰掉1/3；羊被屠宰掉1/4①。

还有的地方，一味贪大，在办公室里规划建设"巨型农庄"。下伏尔加边区阿特卡尔区计划每个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为6万

① 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49页，1981年人民出版社。

公顷，巴拉科夫区和萨莫伊洛夫区计划建立"区集体农庄"。

1930年3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评了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违反农民自愿原则，威胁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等错误。斯大林在文章中还指出：在目前时期，农业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斯大林认为，产生这些"歪曲"的原因是"一部分党员产生了鲁莽情绪"，"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暂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眼光"①。

全国的大小报纸都转载了斯大林的文章。几百万册单行本也迅速发行到全国。农民特地骑马到城里，不惜用高价购买最后尚能买到的一本。农民不了解全国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是怎样组织和高涨起来的，他们把斯大林当作支持他们反对地方上过火行为的旗手。

3月2日，全国还公布了修改过的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章程规定：从公共土地中，划给每个集体农户一小块宅旁园地，供他们个人使用；住宅、农户自有的家畜、家禽，以及饲养此项畜禽所必需的建筑物，留归农户自用，不实行公有化。

1930年3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决议指出：歪曲党的路线的事实表现有，破坏自愿原则，用清算、剥夺选举权等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强制实行住宅、小牲畜、家禽、自用产乳牲畜等的公有化；用行政手段封闭教堂，市场和集市。决议要求坚决制止这些行为。

4月3日，《真理报》又公布了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文章指出，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错误是：违背了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忽视各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结构和文化水平，用行政压力和行政热情来弥补快速发展集体农庄所缺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73页。

少的因素；跳过农业劳动组合而径直成立农业公社。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是胜利冲昏头脑，“我指的不仅是地方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别省委工作人员和个别中央委员”①。

斯大林的两篇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的发表，表明联共(布)中央纠正错误的决心是很大的。以后，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错误，大多得到纠正。1930年7月1日，留在集体农庄中的农户大约只有6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3.6%。有些州在年初成立的集体农庄几乎都解散了。

第二节 消灭富农阶级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状况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府实际执行的确定为富农户的标准大体是这样的：拥有价值1600卢布以上生产资料并出租生产资料，一年中雇工50天以上的农户；拥有价值800卢布以上生产资料，并在一年中雇工75天以上的农户；拥有价值400卢布以上生产资料，并在一年中雇工150天以上的农户。1927年统计，全国拥有1600卢布以上生产资料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2%；拥有201—1600卢布之间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0.7%；不足200卢布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6.1%②。根据上述标准测算，20年代末，富农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5%。全国富农户的经济规模平均如下：全家有7.3口人、4—5个劳动力、11公顷份地、9.4公顷播种地、1.7公顷刈草地、2.3匹耕马、2.5头母牛、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86页。

② 见维·彼·达尼洛夫《集体化前的苏联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第45页，1979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一定数量的牲畜，并拥有自己的农具。63.8%的富农户拥有机器，生产资料的价值在1600卢布以上①。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富农阶级的活动有如下一些特点：

1. 在政治上，富农阶级基本上服从无产阶级国家的统治，接受苏维埃政府对其实行限制和排挤的政策。在国内战争时期，参与反革命叛乱活动的富农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无情镇压。到国内战争结束时，富农户数和十月革命前相比，减少了2/3以上，全国尚留60万户富农。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和富农阶级之间、农村贫农和富农之间存在矛盾和斗争，但不十分尖锐，整个农村社会是稳定的。

2. 租赁土地、使用雇工和出租生产工具，是富农剥削的主要手段；善于在生产领域里经营，是富农剥削的主要途径。

根据《土地法令》，一切土地成为全民财产并交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不准买卖。1927年，全国每户富农平均播种面积为7.9公顷，1929年为6.8公顷。富农在土地的使用量上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限制，不能兼并、不能扩大。

在流通领域和信贷领域中，富农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家留给富农活动的范围是，在国家尚无力帮助贫农、中农改变原始耕作技术、提供充分的生产工具的条件下，允许富农利用农村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发挥技术和经营的优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富农的经营是多方面的。他们利用农、牧业产品的不同比价，经营最能获利的品种。西伯利亚的富农热衷于繁殖绵羊；在伏尔加河中游养猪较为有利，富农竞相养猪；在北高加索，富农则竞相养蜂。

富农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出租农业

---

① 见《集体化前的苏联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第329—330页。

机器，剥削雇工。在主要产粮区，富农拥有全部农业机器的1/3。富农在收获季节出租一台脱谷机，一般可获利400卢布。在西伯利亚，有60.1%的农民要租用比较复杂的农业机器。1929年，有65.6%的农民要租用不同类型的农业机器。

3. 农村普遍富裕化，富农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尚有一定可资利用的因素。苏维埃国家把富农的剥削活动，限制在生产领域里，使苏联的富农从事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活动。

直到1929年底，苏联政府对富农阶级实行限制和排挤政策，即限制富农阶级的剥削趋向，排挤那些经不起税收压力、受不住苏维埃政府的种种限制办法而破产的富农。限制和排挤政策的实质是使用经济手段，通过渐进的过程，把富农经济逐个逐个地吃掉，达到最终改造富农阶级的目的。斯大林曾解释说，限制政策和排挤政策既是同一政策，排挤政策又是限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分①。

党的十五大以后，加紧了对富农的限制和排挤，对土地出租和使用雇佣劳动都作了更严格的限制。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定，占农户总数4—5%的富农，必须负担全部农业税的30—40%。富农如果拖欠国家债务，地方苏维埃政府有权没收其财产，进行拍卖。富农如果逾期不缴纳税金，地方苏维埃政府有权课以罚金。1929年，在采购粮食过程中，被判罪和被数度课以罚金的富农，在伏尔加河中游有17000户，在伏尔加河下游有13500户；在乌克兰有33000户富农被剥夺财产。抽样调查材料表明，有2%的富农户完全破产；有1.1%的富农户合并；有14.9%的富农户分家，以躲避负担不起的税收，从而失去剥削能力；还有2.5%的富农户自愿加入集体农庄，将生产资料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6页。

交给集体农庄。就是说，有20.5%的富农户被排挤掉了。

富农政策的急剧转变

随着集体农庄运动的高涨和加紧执行限制和排挤富农阶级政策，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就成为实践问题提了出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处置基本上有两种意见。

以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批领导人，主张有条件地吸收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把允许富农参加集体农庄作为改造富农的手段。支持这种意见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全苏集体农庄中心主席卡明斯基、出席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的斯摩棱斯克省代表格雷齐娜。他们认为在那些集体经济巩固、有拖拉机站支持、富农在实践中表明服从集体农庄劳动纪律的条件下，应当把富农留在集体农庄里，这样也可以把富农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劳动力来使用。《真理报》编委、经济学博士卡尔宾斯基在1929年第11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论集体农庄和富农》，批评绝对拒绝吸收富农进集体农庄的人是有年轻人的激奋、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千篇一律的教条，缺少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另一种意见主张绝对拒绝富农参加集体农庄。持这种激烈意见的有中部黑土区党委书记瓦列伊基斯、中伏尔加边区党委书记赫达耶维奇等。他们援引大量事实来说明，富农在集体农庄内部瓦解集体经济的教训，提出绝不能允许富农踏进集体农庄的大门，集体农庄不允许联合两个敌对的阶级，不许把阶级敌人引进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

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曾就是否允许富农参加集体农庄问题开展过讨论，但是并没有得出统一的意见。会后，有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吸收老实的富农参加集体农庄，有些

地区禁止富农参加集体农庄。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呢？斯大林回答说："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① 斯大林的讲话是对能不能让富农参加集体农庄问题讨论的最终裁决，标志着从限制和排挤富农阶级政策到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急剧转变。

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发表《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说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②

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最新讲话的精神，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月26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月30日，政治局用电报将决议发给各地党组织。决议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立即废除关于租佃土地、使用雇佣劳动等法律，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包括牲畜、经营用建筑物、农产品加工企业、种子储备，等等。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0页。

决议关于具体处置富农的规定是：1．反革命富农的活动分子、恐怖活动和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属于第一类，应立即逮捕，押入劳改营，其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应处以极刑；2．反对集体化运动的大富农、从前的半地主属于第二类，应当从全盘集体化地区搬迁到国家的边远地区及北方地区；3．把大多数属于第三类的富农户分别迁到本地区专门划出来的、在集体农庄以外的地段。

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又作出《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立法程序上确认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2月4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用电报发给各地苏维埃政府。指令估计：第一类富农为6万多户；第二类富农为15万户；第三类富农约80万户。

于是，对富农阶级实行"扫地出门"的消灭措施，在全国掀起一场暴风骤雨般地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消灭富农阶级

1930年1月20日，联共(布)中伏尔加边区委员会就通过决议，要求在2月5日以前消灭反苏维埃政权的富农活动分子；2月5—15日完成驱逐属于第二类富农1万户的任务。为了贯彻边区党委的这项决议，在各州和各区的党委会下面设立"战斗司令部"，以指挥消灭富农阶级的"战斗"行动。其他地区的党委会也都通过了消灭富农阶级的类似决议。

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而且都把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行政措施：先消灭富农阶级，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萨拉日斯克的梁比尔斯克村苏维埃对农村全盘集体化问题的精神并没有领会，可是村苏维

埃主席团就在1930年1月底决定，没收本村八户富农的财产。2月初召开村苏维埃扩大会，就没收这八户富农财产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在这以后，才在全村大会上提出全盘集体化问题。麦尔查平斯克村苏维埃也是先在小范围的贫农会议上研究了没收富农财产问题，并立即作出决定："没收富农财产，归将来的集体农庄所有。"当作出没收富农财产的决定时，全盘集体化尚未着手进行①。

揭露和打击第一类富农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执行。驱逐第二类富农由所在的村苏维埃提出名单，由所在的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并委托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执行没收富农财产的义务。安顿第三类富农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确定。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定在4个月内再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2500名党的负责工作者下乡。

1930年春天，在西伯利亚有51900户富农被剥夺财产，被划为第一类富农的有9000户；在北高加索有39700户富农被剥夺财产，被划为第一类富农的有8400户；在伏尔加河中游有28000户富农被剥夺财产，被划为第一类富农的有5000户②。

在1930年的一年内，全国有4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有近8万户富农被迁往北部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有近20—25万户富农逃亡到工业中心和城市里去"自我消灭"。到1930年年底，估计全国的富农户已不超过35万户③。

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在以后继续执行。到1931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15万户。到1932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

① 见A·阿加洛夫《村苏维埃和消灭富农阶级》，载《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6期，第19页。
② 见鲍克捷柯《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初始阶段的历史》，载《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第5期，第34页。
③ 见《农村阶级斗争和消灭富农阶级》第245页。

消费区大约还有6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在1930、1931年的两年里，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有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到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村"，实际上是变相的劳动集中营，直到卫国战争结束以后才陆续撤除武装看管。

急风暴雨式的消灭富农阶级，不可避免地造成扩大化。苏联政府估计，第一类富农为6万多户，实际执行的有24万户，超过原估计的4倍。党中央曾估计全国将作为富农经济被消灭的农户，不能超过总农户数的3—5%。实际上这个界限被惊人地超过了。一些地区被清算者达15%，被剥夺选举权者达15—20%[①]。被剥夺的富农的财产构成集体农庄不可分割基金的15%，在贫困地区达22.3%[②]。

20年代末苏联解决富农问题的方式，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人为地加剧社会动荡，人为地激化阶级斗争，人为地造成社会经济的破坏。剥夺富农财产，对富农"扫地出门"的政策，不是体现无产阶级建设新社会的远大战略眼光和改造全社会的宽广胸怀，而是表现了俄国农民小生产者的短浅目光，以及狭隘性、简单的报复心、平均主义等等意识。

第三节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

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17页。

② 见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上册，第314页，1965年商务印书馆。

极大打击，使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已经活跃和恢复起来的农村经济一下子萎缩和倒退了许多年，并使已经融洽起来的工农关系又紧张起来。工农联盟又一次遇到危机。

1930年夏，集体农庄普遍进行了整顿，不许强迫命令。6—7月间，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重申："集体农庄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任何企图使用强迫命令手段迫使贫中农群众参加集体农庄的行为都是严重破坏党的路线和滥用职权。"① 决议还警告不准损害个体农民，不得轻视个体贫中农的合作社。

1930年秋，集体农庄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到年末，又有100万农户加入集体农庄。此时，要求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必须由自己提出书面申请，经农庄管理委员会讨论，并经庄员大会通过，方得加入。有些地方还规定，要有3个月的考察期。此后，集体农庄运动才比较健康地发展起来。

1931年8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加快集体化速度和巩固集体农庄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68—70%的农户，75—80%的播种面积加入集体农庄，是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的标准。决议指出：北高加索(民族区除外)、下伏尔加、中伏尔加、乌克兰产粮区、克里木地区、摩尔达维亚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集体化。决议要求上述地区应把在经营和组织上加强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要求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加快集体农庄建设的速度，争取在1932年基本完成集体化。

截至1933年，全国已建立了224500个集体农庄，包括1520万户农户，集体化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65%。斯大林说："今后集体化的过程将是集体农庄逐渐吸收和改造个体农户残余的过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72页。

程。这就是说，集体农庄已经最终地永远地取得了胜利。”①

1933年2月15—1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讨论了有关巩固集体农庄的问题。2月19日，斯大林在会上发表演说。斯大林说：党和政府“现在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诚实地劳动，按劳动分配集体农庄的收入，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爱护拖拉机和机器，好好照料马匹，完成你们的工农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巩固集体农庄，把钻进集体农庄的富农和富农走狗驱逐出去。”② 斯大林提出的近期奋斗目标是：要使所有庄员每户有一头奶牛。

1935年2月，举行了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规定集体农庄的全部耕地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1935年7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由国家发给农业劳动组合无限期（永久）使用土地证书》的决议。决议规定，由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发给农业劳动组合永久使用土地的证书。证书必须载明使用土地的面积和四至，一式两份，一份发给农庄管理委员会；一份由区执行委员会保存。

到1937年底，苏联全国共有243700个集体农庄，联合了1850万农户，集体化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3%，集体化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99.1%③。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以集体农庄为组织形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也完成了。

集体农庄的管理

1930年3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批准的农业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8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9页。
③ 见萨姆索诺夫主编《苏联简史》第2卷上册，第348页。

劳动组合标准章程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农业劳动组合是劳动人民自愿联合起来、使用共有的生产资料和有组织的共同劳动的集体经济。劳动组合所使用的土地是全民的国有财产，它归劳动组合永久使用，但不得买卖或出租。劳动组合的整块土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减少，退出劳动组合的人只能从国家的未分配土地中另行取得土地。章程还规定，从公共土地中划给每个集体农户一小块宅旁园地，供他们个人使用。

章程规定，实行公有化的生产资料是全部役畜、大农具、种籽、饲养公有牲畜所必需的饲料、劳动组合经营上所必需的建筑物和全部农产品加工企业；不实行公有化而留归集体农户自用的生产资料是住宅、农户自有的家畜、家禽和饲养此项畜禽所必需的建筑物。

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问题，章程规定将劳动组合的成员编成若干田间工作队和畜牧工作队；农业工作都采用计件工作制，用劳动日计算报酬率。

30年代，一般集体农庄拥有70户左右农户；在欧洲部分的主要产粮区，一般有100农户，1000公顷耕地。集体农庄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庄员大会。庄员大会选举主席1名，委员若干名，组成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在庄员大会休会期间，行使庄员大会的职权。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再任命副主席、会计、田间工作队队长、畜牧工作队队长、饲养场经理等。集体农庄占首位的任务是完成国家安排的计划，集体农庄主席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家计划在该农庄的贯彻和完成。这样，实际上造成了农庄主席只对上级负责。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很多集体农庄主席是来自上级委派的工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共有25万名工人被派往农村，其中的大多数都成了集体农庄的领导人。

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在1930年以前十分混乱。1928年，对全国集体农庄组织劳动的情况调查的结果是：18.7%的农庄实行将庄员固定在某一生产部门；10.4%的农庄按庄员志愿分配劳动；45.5%的农庄实行每户都分配不同劳动的办法；还有些是无定型分配劳动。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同作为劳动者的庄员分离了，国家给集体农庄所规定的任务同作为劳动者的庄员的个人利益有矛盾，于是，生产无人负责、对所承担的工作不负责任、随意毁坏工具和财物等现象极其严重。

1929年开始萌芽了工作队制，即将庄员编成固定的生产工作队，每队50人左右，配有固定的耕畜、农具、劳动的地块。联共(布)中央肯定了这种组织劳动的形式，并在劳动组合标准章程中明文规定。1932年2月4日，联共(布)中央《关于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紧急措施》的决议中，也肯定"工作队应成为集体农庄中劳动组织的最重要环节"。1932年以后，工作队制成为集体农庄运动的普遍劳动组织制度。

田间工作队或畜牧工作队是集体农庄的生产单位。每个田间工作队一经编定，至少在一个轮作周期内不准更动；畜牧工作队一经编定，至少3年不准更动。农庄管理委员会分拨给各田间工作队必需的农具和役畜。各田间工作队所使用的农具、役畜，必须编造清册。清册一式两份，一份交农庄管理委员会；一份由工作队长保存。工作队在接收或移交时，清册必须由农庄主席、副主席、工作队队长正式签署生效。毁坏农庄财产须负刑事责任。

工作队设队长1名，全面负责工作队内的劳动组织事项。工作队队长每天登记庄员完成工作的记录，5天一次报农庄管理委员会。工作队长可根据生产要求，将庄员分成若干劳动小组，负责固定的劳动。

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平均主义，部分地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的过程。

1930年以前，分配劳动报酬的方式也很混乱，有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有把庄员分成老年、成年、少年、儿童等年龄段，按年龄段分配的；有按劳动天数计日分配的；还有参照庄员加入农庄时的股金、牲畜等的多少，结合劳动时间来分配劳动报酬。

"劳动日"这一术语最早是1927年出现的，它作为一种假定的劳动单位来衡量各种劳动消耗，把庄员的收入分配和劳动消耗联系起来。全盘集体化高潮中，各地都追求农庄建设数量上的高指标，收入分配问题搁在一边，结果使劳动生产率直线下降。1930年3月公布的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劳动组合中农业工作的报酬都采用计件工作制，以劳动日计算报酬率。1930年6月，全苏集体农庄中心要求全国的集体农庄按劳动日来计算庄员的劳动，以劳动日作为计算庄员收入分配的标准。1931年3月17日，苏联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关于集体农庄的建设》的决议中，正式批准以劳动日作为所有集体农庄共同的和统一的劳动计量尺度和分配计量尺度。

劳动日不是以每个庄员在一天中的劳动时间计算，而是按照各种农业工作的生产定额和劳动日单位的计酬率来计算。生产定额是庄员在一个工作日中根据耕畜、机器和土壤等情况所应当完成的工作量；劳动日单位的计酬率则是按照各种农业工作的繁简、难易程度，及其对集体农庄的重要性等不同情况而规定的某一定额的计酬标准。集体农庄一般实行九级计酬标准，最低级是0.5个劳动日，每级递增0.25个劳动日，最高级为2.5个劳动日。

各工作队长或记工员每天将庄员所完成的工作折算成劳动日数，记入劳动日登记表，每周至少一次将该周的劳动日数登记

在庄员的劳动手册上。年终结算时，按劳动手册上的劳动日总数领取实物报酬和现金。

田间工作队制和劳动日，是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两项创造。

机器拖拉机站的建立

一定的生产工具和一定的生产组织形式是有联系的。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并不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而是机械化和集体化同步进行，以机械化来巩固集体化。

1927年，乌克兰敖德萨州别列佐夫卡区舍夫琴科国营农场成立了一个拖拉机队，以签订合同的形式为周围的农民进行生产服务。拖拉机队向农民说明：只有把零星的地块连成一片，拖拉机队才能耕作。于是，农民铲平地界，成立集体农庄。这一做法，得到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充分肯定。1928年春，舍夫琴科国营农场的机器拖拉机队发展到14个。3月，又将拖拉机队改建成机器拖拉机站，这是全苏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被称为"村际机器拖拉机站"。

机器拖拉机队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出现，在农民中引起很大反响。1928—1929年，有9684份农民申请拖拉机队给予帮助的报告，送到联共(布)中央。1929年春播时，全国已成立了70个拖拉机队。

拖拉机是向农民宣传集体化的最好的宣传工具。拖拉机犁开土层，也翻松了农民小生产者传统思想意识的"土层"，使农村近乎凝固的思想活跃起来。千百年来，农业劳动都是手工劳动，手工劳动的生产率受到人类肌体能量资源的限制，同时还受到人类工作器官的数量的限制，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拖拉机开到农村，使农业生产从凭借牲畜和人的筋肉的力量转而采用机械动力，这也是生产力的大解放。

拖拉机开到农村，还使农民实际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为农村打开了一个新的生产天地。中部黑土州的一个贫农这样说："我当了一辈子雇农。十月革命给了我土地。我每年得到贷款，自己养一匹瘦马。尽管如此，我仍无法摆脱一个穷字。马吃掉许多东西，农具也弄不到，无法耕种土地。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尽管有苏维埃政权的援助，还是无法提高生产。现在看来出路只有一条：找拖拉机队，要它支持，事情就好办了①。"

拖拉机队和拖拉机站就是这样应运而生，并点燃了最初的全盘集体化的火花。

但是，在1929年，机器拖拉机队和机器拖拉机站在苏联广大农村仍然是几个零星散布的小岛。斯大林不适当地高估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把个别有机器拖拉机站服务的村庄的农民的愿望，当作全国农民的普遍要求，立即在全国推广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集体化的决议甚至这样说："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借口缺乏拖拉机和复杂机器而阻碍集体化运动的发展的企图。"② 这种不顾主客观条件，打乱了变革生产工具和变革生产组织形式之间的辨证关系的冒险做法，引起了生产和管理的全面混乱。

在巩固集体农庄的过程中，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以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发展农业机器的生产，以机械化来巩固集体化。1930年6月1日，全国已建立了158个机器拖拉机站，拥有各种拖拉机31100台。1930年，由机器拖拉机站播种的集体农庄的土地约200万公顷。全国新建的大型拖拉机制造厂相继投产。1930年6月，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开始投产，设计指标

① 见《农村阶级斗争和消灭富农阶级》第79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15页。

年产5万台拖拉机。1931年10月，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到1937年全国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时，拖拉机站已发展到5818个，拥有各种拖拉机366300多台。当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也同时基本上实现了大田作物种植业的机械化。翻种休闲地的83%、秋耕的71%、谷物播种的56%、收获谷类作物的43%是以机械化劳动来完成的。

在30年代，每个机器拖拉机站一般拥有60台拖拉机，为周围的30多个集体农庄耕作，在亚麻产区则有为100来个集体农庄耕作。机器拖拉机站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都是按各自的生产计划经营业务的独立企业。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关系是协作关系，协作关系的基础是合同原则和双方都必须履行的合同规定的义务。作为国营企业的机器拖拉机站不仅在技术上为集体农庄提供机械服务，更重要的是作为对集体农庄的生产进行计划经营管理的组织者，作为整顿集体农庄劳动纪律的组织者而发挥作用。

1933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决议，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设立政治部。决议说："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的首要任务，是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按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同集体农庄中抗拒执行党和政府的粮食收购和肉类收购措施的现象作斗争。"① 1933—1934年间，1.7万名共产党员从城市和工厂派往机器拖拉机站，担任各种职务。1934年11月，将政治部同党的区委员会合并，政治部主任改为负责政治工作的副站长，职责仍然照旧。

机器拖拉机站是苏联30年代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形式。

---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41—342页。

对农业集体化的评价

农业集体化运动是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场政治经济改造运动，它的发起、开展和完成，是由苏联历史的多种因素促成，并且对苏联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深远的作用。对这场运动不能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

1。闯出了农村社会改造的新道路。

在此之前，世界上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用资本主义方式、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改变了农村自然经济的面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了农村较之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刻的改变。斯大林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农业集体大生产、实现大机器生产这一方向和前途，通过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使苏联的农业从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实现了耕种机械化，农村生活也开始摆脱自然经济状态，农村的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农村面貌的改观是社会面貌改变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取得胜利时，广大农村基本上仍然是自然经济状态。改变农村面貌的任务，斯大林终于以集体化的形式，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是苏联社会今后发展的基础。

2。农业集体化支持了工业化计划的实现，成为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组成内容。

苏联的经济从1928年开始，对计划经济的编制与执行，从指导性计划转向指令性计划。国家计划被宣布为法律。实行指令性的国家计划，是苏联经济体制的核心。

工业企业可以执行国家统一编制的指令性计划，人为地排斥市场经济的调节；而对农民的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就无法用指令性计划去指挥和要求。执行指令性的国家统一计

划，必然要求改变农业体制，使农业也能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轨道。斯大林说过："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① 1927—1928年间，国家实行非常措施收购粮食，一年的商品粮也只有5亿普特左右。实现集体化以后，实行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1933年国家得到11亿3千万普特商品粮。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没有增加，而商品粮却成倍增加，国家通过按计划下达给集体农庄的粮食征购任务而得到计划所需要的商品粮。

通过义务交售制的方式征购粮食，对农民来说，是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来实现的。1933年4月，作家肖洛霍夫愤于粮食征购人员对集体农庄庄员的横暴做法，写信向斯大林反映粮食征购队员普遍使用刑逼、体罚和打骂等恶劣手段来强行收购粮食。肖洛霍夫要求斯大林"过问一下顿河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并调查一下那些直接采取这些不能允许的做法的人的事情，并请求调查一下那些指示粮食征购队员这样做的人的事情。"斯大林给肖洛霍夫写了一封回信，其中说："你们的区里（而且不仅是你们的区）可敬的农民实行'意大利式的罢工'（怠工！），不惜使工人和红军挨饿。尽管这种怠工是无声的、表面上不伤人的（不流血的），但是它并不改变这一实质，即可敬的农民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无声的'战争。这是把对方搞垮的疲劳战，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② 这就是斯大林要求农民缴纳的"贡税"，它支撑了国家工业化计划。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8页。

② 转引自《赫鲁晓夫在苏联党政领导人会见文艺工作者的谈话》，载《真理报》1963年3月10日。

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所实行的办法，它在苏联一定时期内解决粮食收购困难，改造农村经济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集体农庄体制本身存在种种问题，不应无限制地夸大它的普遍意义。

第十一章　30年代的苏联国内政治生活

第一节　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

1936年宪法的制定

30年代中期的苏联，富农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除了边远农村还有近100万户个体农户之外，全国都是国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农庄农民的集体所有制。

和十月革命前相比，生产发展了，城乡面貌有了重大的变化。

1935年，全国发电量为260亿千瓦时。1937年，全国的生铁产量为1450万吨；钢产量为1770万吨；全国的国民收入为963亿卢布。当时，全国人口约1.9亿。人均收入约506卢布。每一万个居民平均有7.9名医生，居民的平均寿命为47岁。

为使已经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36年苏联公布了新宪法。

在此以前，苏联曾经公布过两部宪法：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1924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十多年里，苏联从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政治、经济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变，需要制定新的宪法。

1935年2月，全苏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根据已

经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对宪法作相应补充、修改的特别决议，并成立了由31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斯大林任宪法委员会主席。布哈林〔联共(布)十七大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34年2月任命他为《消息报》主编〕也是宪法委员会委员，并且是新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1936年6月，完成了苏联宪法草案。联共(布)中央全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这一草案。6月12日，新宪法草案在报刊上公布，供全民讨论。

1936年11月25日，为审查和通过新宪法，召开了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在1924--1936年这一时期内，苏联经济生活方面的根本变化就是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取得了完全胜利。从工业生产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已经从我国工业范围中完全驱逐出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现在是在我国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在农业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于无数技术落后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富农到处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而是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即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新的苏维埃商业，没有投机者参加的商业，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业，已经产生而且发展了。因此，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①

斯大林在报告中还指出，1924—1936年这一时期内，苏联政治生活方面的根本变化就是阶级结构变化了：所有的剥削阶级消灭了，剩下完全新的、摆脱了剥削的工人阶级；剩下了摆脱了剥削的集体农庄农民；剩下了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阶级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84页。

结构方面的变化说明：工农两个阶级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的界线正在消除，它们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灭；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

斯大林在报告中还概括了苏联宪法的六个基本特点：1. 苏联新宪法的基础是"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2.新宪法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被消灭这一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这一事实"；3.新宪法的依据是社会上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4. 新宪法具有国际主义性质，一切民族和种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等权利；5.信守民主主义；6. 把重点放在保障公民的权利平等上。

经过讨论，12月1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1.同意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宪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苏联宪法草案，并采纳它为宪法的基础；2.为了审查所提出的修正和补充，并确定苏联宪法的最终全文，成立由220人组成的编纂委员会；3. 委托编纂委员会参考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结果和代表大会本身讨论的情况，在3天内将宪法的最终全文提交代表大会审查。

1936年12月5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新宪法。代表大会决定宣布这一天为全民的节日。

新宪法把业已形成的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以立法手续固定下来。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的经济基础。各级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治基础。宪法以直接选举代替多级选举，各级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选举。每个苏联公民在苏维埃选举中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按照新宪法的规定，南高加索联邦被撤销了，亚美尼亚、阿

塞拜疆、格鲁吉亚共和国作为加盟共和国，直接加入苏联。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两个自治共和国改变为加盟共和国。这样，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原来的7个增加到11个。

新宪法还规定，苏联共产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1937年初，苏联党和苏维埃就开始筹备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工作。同年7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条例。最高苏维埃的选举第一次按公民的居住地点进行。

1937年12月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告全体选民书，其中说："每个非党的代表都是共产党人的代表，同样每个共产党的代表都是非党群众的代表。"

12月12日，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9100万人(占选民总数的96.8%)参加选举。1938年1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第一届常会。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联席会议选出由24人组成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加里宁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肯定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新宪法诞生了，经过全民讨论、宣传，最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施行。为斯大林模式的确立完成了国家立法手续。苏联新宪法的制定，也标志着斯大林模式的正式确立。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历史条件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本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它特具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从客观上说，因为苏联是个农民国家，是经济发展落后型的

社会主义国家。小生产者正处于被改造的过程中，它们的思想影响还广泛存在。30年代，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农民意识、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仍然在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生活。

农民小生产者的特性使得整个社会都急于求成。当斯大林提出要在10年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用50年和100年所走过的发展路程时，全党和全国都被鼓动起来，寻找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的捷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寻找进入社会主义的捷径的思想又抬起头来。由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文化水平低，缺少科学分析的头脑，凭主观愿望、长官意志、政治热情办事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强烈地表现出来，有时候甚至鄙视、抵制科学分析，把科学分析误作"右倾"，严加批判。

苏联是在封建专制主义很强固的基础上实行无产阶级集中制的，也就是说，它是从封建集权制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集中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跳跃过去了。它跳过了一个历史的否定阶段，直接进入否定之否定的阶段。这种跳跃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不过正是这种跳跃又使极权主义的传统影响，仍然严重地存在。它在反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时候，往往把民主制也等同于资本主义，一起反掉。

资本主义包围下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造成苏联党和国家的一种"非常感"。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切要求建设独立的国防工业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他们在制定各种计划和推行各种政策时，都把应付战争这根弦绷得很紧。"非常感"是种种超正常政策能够推行的重要社会因素。

俄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传统也在无形中产生影响。从欧洲来说，俄国是一个带有东方型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皇权主义思

想严重。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历史传统和民族传统是不可能一刀两断的。十月革命可以结束临时政府的统治，却不可能斩断历史的联系。历史传统和民族传统都有一种延续的、衔接性、渗透性，这些特性是客观地发生作用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从主观上说，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在个人品性中的某些特点，也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继承者，在个人的品性中有优良的一面，如具有革命坚定性、政治敏锐性、刚强而有毅力、有高超的组织工作能力；但是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他也有妒贤忌能、粗暴任性、主观片面等缺陷。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长达30年之久，他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也犯过严重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重大的危害。

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当时，总书记的职务并不是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中央书记处也只管党内事务，并不干涉国家管理的主要领域。20年代末期，书记处实际上凌驾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上。斯大林往往不经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讨论，擅自决定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直接向人民委员会发指示。党政不分，实际上取消了政府部门的决策权。

斯大林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往往表现出绝对化，否认渐变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否认中间状态的积极意义。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看法上，部分地接受英雄史观，认为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是能够创造历史的。

斯大林的个人品性在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中也起相当大作

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也有许多十字路口，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斯大林的个人品性在斯大林模式形成中的作用，表现为在几种可能选择中的主宰选择。几种可供选择的机会都是以某些客观社会条件为依据的，即有着某种必然性。在几种可供选择的机会中如何选择，则是由主观决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和领导人的主观因素相结合，才成为历史的现实。在选择的关键时刻，领导人的主观条件起决定性作用。

苏联20—30年代的社会现实、国际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传统，通过斯大林的个人主观因素的加工、选择，在苏联形成了具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高度集中"、"高度集权"，即把全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科学事业的所有决策权统统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形成一种僵化的体制，使社会生活缺少生机和活力。

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主要表现为：

1. 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方面的高度集中就是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全部集中于中央，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实行以部门管理为主的集中管理体制。

2. 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国家计划机关每年都提出计划控制数字，这类计划控制数字基本上是指导性的。1928年起形成比较定型的计划经济。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确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令性质。这种计划的特点，一是指令性，国家计划具有法律效力；二是排斥市场调节，把市场调节完全看作是资本主

义的。

3. 主要以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管理经济主要通过由党和国家机关发布命令、决议的办法，或者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经济组织、企业发生关系，组织经济生活。

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主要表现为：

1. 全国建立高度集中的党领导体制。按照斯大林的提法，工会、共青团、合作社、苏维埃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于它们都是党联系群众的"引带"。党和国家融合为一，国家完全隶属于党，党包揽一切。斯大林把党的领导看作是由共产党机关直接管理国家。

2. 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国内战争时期的非常环境，曾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但是列宁并没有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固定的干部制度。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布哈林都曾经反对干部委派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制。可是斯大林把这类意见都当作"反党言论"，予以批判，强行贯彻委派制。到30年代，干部委派制更加固定化了，由此形成实际上的干部任职终身制。

3. 缺少有效的人民监督机制。列宁逝世以后，各级党组织虽设有监察委员会，但监督的权限日益缩小，1934年党的十七大以后，党的监察机构置于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独立性也很小。

1936年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但是宪法并没有规定必要的制度来保证人民有效地监督国家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宪法也没有规定人民有罢免权（固定的干部委派制事实上取消了人民的罢免权）。

4. 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精神生活上盛行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斯大林模式的特征之一，个人崇拜是斯大林模式的必然产

物。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无论是在苏联的历史上，或者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都有着不容抹煞的意义。

斯大林模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建成的社会主义，并使苏联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了世界上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为防止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当帝国主义武装侵犯真的发生时，确实显示出这种模式比较适应战争非常环境的需要。

斯大林模式比较有利于实行宏观经济规划。30—40年代，苏联对全国经济实行部署和规划，重点开发了薄弱部门、急需部门和落后地区，显示了宏观经济规划上的优越性。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特殊环境、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它自然不具有普遍意义，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的缺陷。

斯大林模式具有强制性。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领导干部易于脱离群众。个人崇拜也是强制性的必然产物。斯大林模式具有封闭性。它对苏联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有封闭性，就是在苏联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大小领域，都有各自的封闭性。斯大林模式还具有保守性。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都程式化、固定化，造成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表现出严重的保守性。

斯大林模式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如果说30年代它的积极意义正在显示出来，那末卫国战争结束后，它的消极影响就愈来愈突出起来了。

第二节　个人崇拜的盛行

个人崇拜开始蔓延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个人崇拜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对君主的崇拜是个人崇拜的核心，专制主义和愚昧迷信是个人崇拜盛行的两大支柱。

苏联30年代流行的现代个人崇拜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简单地对某一领袖人物的过分颂扬。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这是个人崇拜得以流行的前提条件；二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是形成个人崇拜的物质基础；三是领袖人物本身也有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这是形成个人崇拜的主观条件。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才能把无产阶级领袖说成"无往不胜"、"无坚不摧"，才能把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引向盲目崇拜。只有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才能运用国家机器的各个部分来推行个人崇拜，并运用国家的行政和司法力量来取缔和个人崇拜相抵触的思想行为。只有当领袖人物也存在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时，才会默认、接受个人崇拜。只有到斯大林当政时的苏联，才开始具备上述这些条件。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20年代末开始流行起来的。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五十寿辰。在斯大林的默认下，报纸上连篇累牍刊登文章，把斯大林吹捧成是列宁的唯一助手，是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者，是活着的列宁。许多党政领导人，还有从前的反对派人物都在文章中一味对斯大林歌功颂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从30年代开始，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有一段对斯大林的称颂。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个人崇拜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每个代表发言时几乎都要有大段赞扬斯大林的套话。古比雪夫在会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说："在确定我国国民经济唯一正确的和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发展方向时，在确定预示着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将获得空前胜利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时，起着主要和基本作用的是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正是他的天才的预见以及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卓越领导，保证了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各种宏伟的、人类史上划时代的任务。"①

从30年代开始，斯大林逐渐抛弃了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把集权制作为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召开都随心所欲，很不正常。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相隔5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相隔13年。斯大林实际上置身于党的批评和监督之外，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国家保安机关畸形发展，形成特殊的地位。保安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不受同级党和苏维埃机关的监督和检查，实际上成为国中之国、党中之党。

就这样，个人崇拜愈演愈烈。

个人崇拜在苏联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是矛盾的。斯大林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的人，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人。因此，斯大林也带有时代的烙

① 《古比雪夫文集》第334页。

印和苏联社会的烙印。也就是说，斯大林既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阶级的局限性。

斯大林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这个时期，苏联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占人口80%以上的小农摆脱文盲、半文盲、半自然经济状态，进入现代社会的生活圈。苏联在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之后，斯大林只看到个体农民成为集体农民这一变化，放松了对社会上农民小生产者思想影响的注意。实际上，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并不能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而立即消失。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世界观等方面，都带有农民小生产者的烙印，甚至有俄罗斯封建残余的影响。

斯大林本人的革命经历及成长过程，也使他不易摆脱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他不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是带着俄罗斯农民的意识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本人较少接触资本主义民主思想，他对当时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是陌生的。这样，农民意识自然地、必然地要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表现出来。

个人崇拜是农民意识的一种反映。农民阶级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获得土地的农民，本能地把无产阶级领袖奉为自己的救世主。斯大林虽然曾经反对别人对他所作的无原则颂扬，但是他本人也有英雄史观的影响，终于和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产生共鸣。

斯大林也有阶级的局限性。斯大林是苏联工人阶级的代表，苏联工人阶级的某些特性自然地要反映在斯大林身上。

俄国工人阶级较少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和农民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俄国工人阶级也有文化水平低，带有手工业行

会习气，残存皇权主义的思想影响等缺点。俄国工人阶级的这种特性，也自然地反映在斯大林身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作为具体的人总是有个性的、多层次的、有变化的。把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神圣化、抽象化、纯粹化，正是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是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有超脱历史、超脱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苏联在本世纪30年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里的产物。

第三节　肃反运动

基洛夫被害和肃反运动的开始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遭暗杀。这一事件发生后，苏联在全国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先后牵连的人在500万以上，其中40多万人被处决，成为苏联30年代国内政治生活中突出的大事。

当天下午4时许，基洛夫来到列宁格勒州委机关办公地斯莫尔尼宫。在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他竟惨遭暗杀。凶手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抓获。

基洛夫被暗杀的当天，斯大林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就赶到列宁格勒，亲自处理这一严重凶杀案件。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说尼古拉耶夫是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恐怖组织是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名

为"列宁格勒总部"。12月27日，苏联政府又公布了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说谋害基洛夫只是这个恐怖组织长远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暗杀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

1934年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原反对派10多名成员被捕。季诺维也夫等人在审讯中断然否认同基洛夫的暗害事件有任何牵连，并且当庭谴责了恐怖行动。在法庭上，他们承认过去对斯大林的批评，可能在客观上助长目前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促使犯罪者堕落。这样，他们对尼古拉耶夫的罪行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这种承认"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当然不能构成"暗杀活动的后台"的罪证。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被告，仍被判处10年、5年及其他不同期限的监禁。尼古拉耶夫被执行枪决。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暗杀的秘密信，警告各地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的泰然自若和庸俗的粗心大意"。秘密信说："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①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反革命巢穴。在这前后，对被控和"列宁格勒总部"以及"莫斯科总部"有牵连的干部，进行急速逮捕。在列宁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个高潮，被称作"基洛夫激流。"

基洛夫被暗杀，触发了苏联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

① 见《斯大林文选》（上），第114页。

大 清 洗

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原党内反对派成员的重新公开审讯，把肃反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36年夏，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原反对派领导人重新侦查。在侦查过程中，斯大林和苏联内务部采用各种野蛮的手段，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被告，迫使被告承认自己犯有所谓"组织恐怖集团、阴谋杀害基洛夫和苏联其他党政领导人"的"罪行。"被告哥尔茨曼在酷刑折磨下，招认自己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德国柏林时，曾秘密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为布利斯托里的饭店里，"当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完成这件事。"苏联政府把哥尔茨曼的上述供词作为"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罪证予以公布之后，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立即发布一条消息，说："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苏联政府却说什么哥尔茨曼1932年在该饭店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纯属虚构。"接着，全世界各大新闻社都转载了《社会民主》报的这一消息。对此，苏联当局只好不再作声。

为了逼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招认"组织恐怖集团"，进行"恐怖暗杀活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也采用非人的残酷手段。1936年7月，季诺维也夫被折磨得实在忍受不住了，只好劝加米涅夫一起屈服，条件是斯大林应当当着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害他们。1936年7月29日，即在取得"犯人"的招供以后，联共（布）中央发出一封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间谍恐怖活动的秘密信，再一次号召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秘密信说："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挑拨离间分子、破坏分子、白匪、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了。"[①] 在这封秘密信中，斯大林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人民的敌人"是个没有具体犯罪内容，而又可以任意外延的概念。"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的提出，为大规模镇压制造法律根据。

1936年8月19—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进行公开审判。这是肃反运动中的第一次公开审判。公开审判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举行。被告不允许有辩护律师，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所有被告都拒绝请律师。"坐在旁听席上的人，几乎都是经过挑选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国家公诉人读完起诉书之后，在持续三天的"法庭调查"中，被告们先后按照原样重复了各自预先拟好的"供词"，供认"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

8月23日晚上7时30分，法庭成员离庭进入合议室。到8月24日凌晨2时30分，审判长乌尔利赫宣读早已拟好了的判决书：法庭确认季诺维也夫等人，"根据托洛茨基匪徒在苏联的秘密组织领导人斯米尔诺夫所得的托洛茨基的指令"，组织了"联合总部。""联合总部曾主使和领导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分子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秘密暗杀团，于1934年12月1日凶恶地暗杀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基洛夫同志。"[②]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加等16名被告，全被判处死刑。

---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114页。

② 见《托洛茨基叛国集团案、布哈林叛国集团案、贝利亚叛国集团案资料选辑》第2页，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是公开的，但是法庭没有提出任何物证或文献来证实被告确实有罪。所有的控告都建立在诸被告的"交待"和"承认"上。被告则一概被剥夺辩护的权利。许多外国律师提出自愿担任被告的辩护，但是均遭拒绝。根据苏联法律，死刑犯在72小时之内有权提出上诉。然而，8月 25 日，即死刑判决后不到 24 小时，莫斯科各报就刊出消息：死刑已经执行，16 名"罪犯"已被处决。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及处决16名被告，导致了新的、扩展到全国的镇压浪潮。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成员，以及被认为是和他们有联系的人，先后遭到无端逮捕和镇压。"人民的敌人"被具体扩大为"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庇护者"、"思想战线上的托洛茨基分子"、"科学领域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等等，都成为"深挖"的对象。

根据"托—季联合总部"案的被告在预审中的交待，说他们和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科夫等都有"罪恶的联系"。1936年8月21日，苏联报纸发表了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命令，宣布开始对上述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的人进行侦查。拉狄克发表了斥责季诺维也夫诬陷别人的文章，但是毫无用处，他们都被捕了。

为了推进镇压的浪潮，斯大林下令以叶若夫代替雅哥达，充任内务人民委员，使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斯大林扩大肃反运动更忠顺的工具。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休养地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政治局其他委员，声称绝对必须和紧急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以取代雅哥达。次日，叶若夫接替雅哥达任内务人民委员。在叶若夫任内，形成了肃反运动的高潮。

叶若夫走马上任，就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清洗。雅哥

达时期的几个副内务人民委员、几个主要分局的局长、参加和知道莫斯科公开审判内幕的一大批人，成为第一批清洗的对象。1937年一年里，被处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就有3000多人。叶若夫抓人、杀人常在夜间或"出席会议"时进行。于是，在莫斯科造成一种恐怖气氛。

1937年1月23—30日，审判"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件，是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17人，被指控"背叛祖国，从事侦探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为了逼使皮达可夫供认所谓"接受托洛茨基指示，将乌克兰出卖给德国"的"罪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按斯大林的指示，逼皮达可夫供认："1935年12月，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乘飞机秘密前往奥斯陆，在赫列尔机场着陆，与居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谈"。1937年1月23日，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交待"了这一"罪行"，1月25日，挪威《晚邮报》发表一条通告："赫列尔机场官员肯定地声明，1935年12月间没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皮达可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能相信。"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1月29日刊登消息：根据官方的航空日志记载，1935年12月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该机场着陆。尽管如此，皮达可夫等13人仍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被判处10年监禁。

拉狄克在受审时又"交待"，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布哈林、李可夫的问题被提到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讨论。布哈林、李可夫提出有说服力的事实为自己申辩，托姆斯基自杀。

1937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在家里自杀，奥

尔忠尼启泽不仅是斯大林模式的有力贯彻者，还是斯大林的挚友。在肃反问题上，他和斯大林产生了严重分歧。奥尔忠尼启泽激烈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滥捕滥杀。他拒绝批准逮捕许多工厂的领导人。他还派人检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执行的逮捕是否确有根据。2月17日早晨，他和斯大林发生激烈争吵，他抗议逮捕和杀害干部。第二天，他愤而自杀，以示对肃反运动的抗议。他的死也没有唤起人们的清醒。苏联政府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公布说：奥尔忠尼启泽因心脏破裂而猝死。

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以后，镇压的浪潮波及了军队系统。内务人民委员部说军队里存在一个"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为首的是苏联红军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同时被指控的还有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曾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的埃德曼、曾任远东渤海军队集群司令的普特纳、红军中央机关部长费尔德曼等高级将领。同年6月17日，他们一起被枪决。红军元帅、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则在行将被捕时自杀。

1937年6月，斯大林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主题是"揭露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此后，对军队干部的大规模镇压愈来愈凶。国防人民委员部总部机关、红军政治部、莫斯科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基辅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各军事院校、其他军和师部队，都遭到特别惨重的损失。总参谋长叶戈罗夫、空军司令员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员哈列普斯基、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勃留赫尔、军区司令别洛夫等一大批高级将领都遭到镇压。

共产国际各国党在苏联的领导人也难逃肃反运动的厄运。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大多遭到镇压。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1919年匈牙利苏维

埃共和国的实际领导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库恩·贝拉也于1937年6月29日深夜被捕，1939年11月30日被杀。

地方党政干部也被大批大批地杀害。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书记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泽尔恩，州苏维埃和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三名正、副主席，州工会理事会主席、共青团州委书记、各个区党委书记、重要党组书记，几乎都遭杀害。

1938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编造出来的所谓"布哈林右派和托派联盟阴谋集团"进行公开审判。这是肃反运动中的第三次公开审判。

还在1937年1月23日，因"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而受审判的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和布哈林有联系，苏联各大报立即刊登种种"报导"，要求审判"人民的敌人"布哈林。1937年2月19日，布哈林接到要他"出席中央全会"的通知。2月25日，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上，宣读了皮达可夫的"供词"。布哈林申辩说："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不能用谎言来欺骗自己"。散会后，布哈林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他写了一份遗书，要求妻子背熟，记在脑子里，然后把遗书烧掉。遗书表达了布哈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不移信念，指责斯大林体制的国家暴力机器的专横，最后对妻子说："不要悲伤，历史也同样会犯悲剧性的错误。我只希望能把我的儿子培养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① 第二天，布哈林再次出席中央全会时，就被投进了监狱。

第三次公开审判也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举行。审判开始后，布哈林承认自己是"右派和托派联盟"的首领；"联盟"的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将"借助苏维埃政权在

① 《布哈林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见《书林》1989年第8期。

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其中包括利用预计未来爆发的战争，把苏联的领土出卖给德国、日本、英国”。总检察长维辛斯基问布哈林同杀害基洛夫有什么关系？布哈林回答说：“我一无所知”。维辛斯基又问布哈林同杀害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有什么关系？布哈林回答：“绝对没有”。这样，关于“谋杀”问题的审问就陷于窘境。

维辛斯基想在“间谍”问题上有所突破，问布哈林“为什么这样容易就组成了从事间谍工作的联盟？”布哈林说：“关于间谍工作，我毫无所知。”公开审讯的结果是：布哈林是一个不从事间谍活动的“间谍”；没有背叛行为的“叛徒”；没有谋杀行动的“凶手”；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整个审讯过程破绽百出。目击这次公开审判全过程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查尔斯·波伦评论说：“审讯的过程逐字逐句都公布了，你却无法断定孰真孰假。永远不可能断定某个声明或某个事件纯粹是捏造的，还是同背后的事实有几分近似之处。总的来说，我认为那些策划和从事审讯的人在每个案件中都试图从某件真事着手，然后将它渲染扩大到面目全非的程度，以构成被告的罪状。”①

3月12日，布哈林在法庭上作了最后陈述。布哈林坚决否认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的活动；否认企图谋害列宁。布哈林以确凿的事实光明磊落的革命活动，说：“我坚决否认，说我与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说它们是我的主子，说我是按照它们的旨意行事。”②据目击者说，布哈林把“案件”驳得体无完肤。

尽管如此，3月13日，军事法庭判处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

①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第66页，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1938年3月12日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布哈林专辑)。

廷斯基等18名被告死刑，其余3名被告被判处15至25年监禁。

3月15日，布哈林等人被执行枪决。

在肃反运动中，苏联政府只举行过三次公开审讯，其余所有"案件"都是秘密审讯，甚至根本没有正式审讯。苏联政府举行公开审讯的原意是想向全世界公开被告的犯罪"事实"，以证明苏联司法程序的严密，结果是适得其反，暴露了肃反运动中所揭露的"案件"，全是不可靠的。

至此，全国的"间谍"越肃越多、越杀越多。党内党外普遍的是不信任感、不安全感，不知道谁是忠诚的、谁是不可靠的，人人自危，明哲保身，整个国家出现一种危机。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1938年视察各地时，发现干部、群众普遍意志消沉。他们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时也希望停止肃反运动。

1938年7月，叶若夫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职务，调贝利亚充任此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才逐渐平息下来。

叶若夫先是调任航运人民委员。1940年4月1日愚人节，叶若夫被苏联政府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罪，执行枪决。叶若夫成了肃反运动中大量冤假错案的替罪羊。

肃反运动的后果和教训

30年代苏联的肃反运动，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

1．肃反运动冤枉了成千成万的好人，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打击。肃反运动所造成的创伤整整一代人都难以消除，直到几十年后，还可觉察到这种伤痕及其影响。

在肃反运动中枉杀无辜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也属罕见。1934年初，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斯大林、基洛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泽、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

德烈也夫、古比雪夫、加里宁、科西奥尔、楚巴尔等11人，奥尔忠尼启泽愤而自杀，科西奥尔和楚巴尔被杀。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什维尔尼克、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埃赫等6人，其中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埃赫等3人被杀。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有51名被处决，2名被迫自杀；68名候补中央委员，有47名被处决。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连列宁在内共15名委员，有8名被处决或瘐死狱中，1名被驱逐出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前6名元帅中，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叶戈罗夫、勃留赫尔等4名被处决，只留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在195名师长中杀掉110名，220名旅长中杀掉186名，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1名。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

工业建设领域，经济和文化科学领域杀戮干部的情况也是极为痛心的。很多领导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干部，都被当作间谍而被处决。象全国闻名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厂长斯维斯童，曾被誉为共产党员厂长的榜样，也在1937年含冤而死。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厂长奥西波夫·施米特，也被处决。

2. 肃反运动在苏联造成一种恐怖气氛，严重伤害社会主义民主，扼杀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创造性和积极性。

肃反运动中只举行过三次公开审讯，其余几乎都是秘密逮捕、秘密审讯、秘密处决。内务人民委员部种种破坏法制的胡作非为，使全国蔓延缺乏安全感的情绪，并在全世界损伤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3. 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之间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

苏联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中心和根据地。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苏联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活动有过特殊的贡献，欧洲各国共

产党的领导人和苏联关系极为密切。在肃反运动中，欧洲各国，尤其是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许多被镇压掉了，严重损害了苏联党和各国党之间的关系，伤害了各国党的感情。

肃反运动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也是深刻的。

1. 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犯罪问题。

斯大林是以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一切现象。但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犯罪问题，既和阶级斗争问题有关系，更是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当苏联宣布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之后，犯罪问题就更成为具体的法治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可以用行政手段"消灭剥削阶级"，但是苏维埃国家不可能用行政手段消灭犯罪。苏维埃国家可能通过种种途径来尽量减少犯罪，但是不可能杜绝侵犯他人利益和安全的人和行为。当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苏维埃国家可以把它当作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意识的表现，但是思想意识上的联系和具体组织联系毕竟是两回事，思想意识上的根源和具体的组织指令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处理具体的犯罪行为，要依靠、使用法律手段和严密的司法程序。

基洛夫被暗杀事件是一起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它的背景非常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斯大林在寻找犯罪的阶级根源时，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定性分析取代了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分析。因而，斯大林提出了"人民的敌人"这一概念；在和犯罪行为作斗争时，不是依靠司法手段，而是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犯罪行为作斗争，采用大规模政治运动这种方式，历史证明已使苏联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2. 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健全法制可以防止个人独裁，健全法制可以防止冤屈，这是人类社会自身不断总结出来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独裁，进行民主革命时期，用很大的力气搞资

产阶级立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种种立法，健全资产阶级法制。在司法程序方面，建立了人身不可侵犯、陪审制度，比封建社会要民主得多、文明得多、进步得多了。

无产阶级革命理应建立比资产阶级的司法程序更民主、更文明、更科学的司法程序，使劳动人民都能同等享受。可是，俄国是在资产阶级司法程序还没有完备的时候就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暴力手段来开路，并以暴力手段来保护的。在革命年代，确实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法律以外的工具来保卫革命。全俄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契卡"）就诞生了，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出鞘宝剑。

全国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都要求缩小肃反委员会的权限，并改组肃反委员会。1921年11月，加米涅夫把缩小肃反委员会权限的条例草案报送列宁审阅，并附上一封信。加米涅夫在信中说："我坚持的最高要求是：1.缩减肃反委员会的权限，最多由它负责打击政治犯罪、间谍活动、土匪活动和警卫道路、库房，不能再多。其余工作交司法人民委员部负责。2.把肃反委员会的侦查机关并入司法人民委员部，划归革命法庭。"列宁看了加米涅夫报送的材料及信件，于11月29日写信给加米涅夫说："在您的意见和捷尔任斯基的意见之中，我更倾向于您的意见。我劝您不要让步，要提到政治局去讨论。到那时让我们坚持到最大最大的限度。"① 12月1日，列宁把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其活动范围的建议提交政治局讨论。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

1921年12月23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共和国的对内政策报告中说："必须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规定

① 《列宁文稿》第9卷，第691页。

它的职能和权限，使它只限于执行政治任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①

1922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实行搜查、没收与逮捕条例》的法令。法令决定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实施这一改组是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力量和权限无限扩大，并在党内斗争中使用这一工具，无形中把它变成斯大林手中的宝剑。1936年，苏联公布了新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被人民、政府部门和普通法院引为自豪，而政治保卫局却不屑一顾。内务人民委员部、政治保卫局既不尊重宪法，也不尊重任何法律，它是国中之国。当斯大林对客观形势、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的分析发生偏差时，这些部门便起了恶劣的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也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作为民主制和法制的具体形式，还有它们自己的完善过程，单靠领袖人物个人意志，是不能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也要靠社会主义的立法来保障。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53页。

第十二章　30年代的文化科学和意识形态

第一节　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0年代是苏联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年代。苏联开始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整顿高等学校的教学秩序。

1929年9月，布勃诺夫接替卢那察尔斯基，任教育人民委员以后，立即为改进师资培养工作和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工作而尽力。

1930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第二次国民教育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注意师资的培养工作。布勃诺夫在会上作了《论国民教育制度》的报告。他说："我们现在需要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我们之所以需要它，不仅是因为我们在城乡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而且还因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①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实施普及义务教育

① 转引帕纳钦：《苏联的教育管理》第88页，1982年文化教育出版社。

的决定。代表大会把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作为最近期间的主要任务。1930年8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公布了关于在全国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决议。决议规定：儿童从八岁开始入学，至少要读完四年小学；在工业城市、工人镇、工厂区，从1930—1931学年起，为男女儿童实施普及义务七年制教育，市、区苏维埃负责监督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由于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学校数量大大增加起来。全国的中学（完全中学）从1929—1930学年的1914所，增加到1938—1939学年的12469所；七年制学校从7834所增加到36261所。

在此期间，学制也进行了改革。从1932—1933学年起，全国所有中学改组为十年制中学（完全中学）。普通学校的结构是：小学为一至四年级；不完全中学为一至七年级；中学为一至十年级。为了适应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需要，全国统一设立几种类型的师范学校，即中等师范学校（1936年改称师范学校）、两年制师范专科学校和四年制师范学院。

1931年，全国普通学校实施根据学科制定的新的教学大纲。1933年2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定，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写出版稳定的教科书，禁止使用"活页课本"、"杂志课本"、"地方课本"。

在学校的教育工作内容方面，确定了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四大基本要素。智育是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和形成学生科学世界观的基础，由各科教学来完成。德育包括：形成学生的道德概念和道德信念；形成学生的共产主义行为技巧和习惯；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锻炼学生的坚强意志性格；克服行为中的缺点。体育教育在继1931年实施"准备劳动与卫国"综合体育制度第一级以后，1932年又实施"劳卫制"第二级，1934年又实施劳卫制少年级。美育教育强调美和道德的一致性，除了对自然和

艺术的欣赏之外，还体现在生活习惯和劳动、休息中，陶冶情操。

在学校教育思想方面，提出了在集体中进行教育；教育的实效性；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对学生的尊重相结合；教育同教学和生活相结合等原则。在集体中进行教育原则强调教育是集体进行的，强调教育体系各个环节的协同一致。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主张学校应培养出有政治觉悟、有高度责任感和荣誉感、遵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成员。教育的实效性强调教育过程必须有学生的活动和具体工作。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对学生的尊重相结合原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它强调教师要相信学生的能力，信任他们，在评定他们的行为时不抱成见。教育同教学和生活相结合原则强调教育的社会性。

30年代，在教育领域里开展了对“儿童学”的批判。“儿童学”强调遗传因素和社会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儿童学”研究者往往根据儿童的表现，把一些正常的、可以教育的儿童列入“智力落后”、“难教养”、“有缺陷”一类，送入特殊学校，打击了儿童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心。“儿童学”过分强调遗传因素的作用，形而上学地看待内因和外界条件的关系，不把教育建立在启发受教育者自觉要求的基础上，有反科学的一面。不过联共(布)中央1936年7月作出的决议中，指责儿童学是彻底的伪科学，禁止儿童学者进行各种活动，停办儿童学系和儿童学研究室，禁止出版有关儿童学的书籍，用行政命令禁止了一种学派，陷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和片面性。

30年代，斯大林相继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在高等教育中得到有力的贯彻。1932—1933学年，全国高等学校已有832所。为了加强对高等学校的管理，1932年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了高等技术

教育委员会，其职责是：批准高等专业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批准学校网并检查高等技术学校教学工作进度。高等技术教育委员会1946年改组为高等教育部。

为了整顿高等学校的教学秩序，1933年8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定，鉴于在高等学校、高等技术学校和技术学校中，学生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各种会议上，此类会议往往准备得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各种集会都占用上课时间，学生为了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技术性的社会工作而不去上课，决定规定：绝对禁止在上课时间举行各种社会活动和集会，同时禁止学生在学习时间从事社会工作；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每人以一种为限，活动时间每周不得超过4小时，其中包括参加非学习性的会议和集会；党、青年团、职工会不得在休假日举行集会和会议，不得在休假日加重学生的社会活动。①

由于党和政府重视抓教育，使苏联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大批人才，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共培养了95.3万名专门人员。苏联在抓教育方面成就是显著的，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某些环节管得太死、太琐细，这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教育领域里的反映。

科学事业发展中的成就和失误

30年代苏联科学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发展迅速，取得很大成绩；另一方面问题也十分突出。

科研机构大大增加了。到1935年，在原有机构之外，又建立了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外高加索分院、阿塞拜疆分院、亚美尼亚分院、格鲁吉亚分院、哈萨克分院、乌拉尔分院，此外还有全

① 参见《苏联的高等教育》第147—148页，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白俄罗斯共和国科学院、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科学工作者的人数也从1929年的22600人增加到1932年的47900人。①

为了适应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工作的要求，苏联科学院在1932年组成140支勘探队，进行了45项综合性勘察。勘察队分别对地质、地质化学、古生物研究、土壤、农业化学等进行全面勘察，为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提供科学资料。1934年，苏联科学院由列宁格勒迁来首都莫斯科。1937年实行新的学位和学衔制度，学位分科学副博士、科学博士；学衔分助教、副教授、教授。

苏联科学家在原子核结构、量子电动力学、晶体物理学、电介质物理、分子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成绩；在化学肥料、合成橡胶等方面也有进展。1937年，物理学家塔姆和弗兰克对伽马线照射某些液体所产生的荧光现象，提出了解释。这项发现后来证明对激光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塔姆和弗兰克因此项贡献而在1958年获诺贝尔奖金。1937年，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提出几篇关于诱导放射性的重要论文，在他的领导下，在1937年建成欧洲第一座回旋加速器。1939年，库尔恰托夫的两名助手彼得恰克和弗罗洛夫发现了铀的核裂变。

在工业生产的实际中，新兴的化学工业部门建设起来了，设计了氨、橡胶、甲醇的合成工艺，建立了高度辛烷值汽油、塑料、人造纤维、硫酸、过磷酸钙等生产工艺。机电工业制造出大功率发电机组。1937年制造出5万千瓦、带有工业调节抽汽装置的高速涡轮机，以及15000千瓦的水力涡轮机。

1937年夏季，苏联飞行员把北极探险队送到了北极。以巴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674页，1982年人民出版社。

巴宁为首的北极探险队在北极的漂流的冰山上进行9个月的科学考察，完成艰巨而有意义的考察工作。斯大林赞扬巴巴宁和他的探险队"没费特别工夫，就顺便把关于北极地带的旧观念作为陈腐观念加以推翻，而确立了适合于真正的科学要求的新观念"。①

30年代科学领域里的重大失误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科学研究领域内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对某些学派采取粗暴的行政手段，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沙赫特事件发生后，1928年7月，斯大林虽然也说，今后要继续用一切办法、尽一切力量吸收那些在建设我国工业方面愿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非党专家。但他紧接着就强调："问题在于这些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共进的旧专家是相对地愈来愈少了"②。在斯大林的心目中，旧知识分子专家都是不可靠的。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上更明确地说："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③。此后，全国都发动抓"沙赫特分子"，使很多科学家无辜受屈，有的甚至丧命。其中著名的有历史学家格鲁谢夫斯基、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叶弗列莫夫、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热处理工程研究所所长拉姆津。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又审判了"工业党"，声言"工业党"是"资产阶级技术知识界上层反革命分子集团"，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机构"，

---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175页，1962年人民出版社。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86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页。

"企图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间谍破坏活动"。这一新的间谍案件，又使大批知识分子受牵连，恶化了知识分子领域里的气氛。

基洛夫事件后开始的肃反运动更使大批科学家惨遭厄运，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是科学家们不幸遭遇的缩影。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是从事军事工业研究的保密设计局的一种，它的正式名称是第29号中央设计局。该设计局下设3个独立的设计局，从事高空歼击机、远程高空轰炸机、俯冲轰炸机的设计。这里集中了图波列夫、彼得利亚科夫、米亚西谢夫、涅曼等6名科学院院士、17名总设计师、12名教授和科学博士，整个俄国航空界的精英都集中在这里，他们都是丧失了自由的囚徒，从事航空设计。

对某些学科用发布行政命令的办法加以禁止，也伤害了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此类事例除了对儿童学之外，对待遗传学的态度也是比较典型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遗传学被宣布为唯心主义、种族主义的"伪科学"，被当作科学界的批判靶子。1929年，遗传学派的创建人切特维利科夫被流放乌拉尔，剥夺了一切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和条件。直到斯大林死后，1955年才恢复他的原来的工作。但此时的切特维利科夫已是一名垂暮的老人了。1959年，切特维利科夫获联邦德国自然科学院为纪念《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而颁发的达尔文特别奖。此时，这位科学家已双目失明，奄奄一息，几天后就去世了。象切特维利科夫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年月却不能从事他所献身的事业，只能抱憾终天。其他几位遗传学家，如柯尔特佐夫、谢列勃罗夫斯基等人，也被反复声讨。与此相对照的是把李森科的"春化理论"作了不切实际的宣扬。此后，李森科学派独霸苏联生物学界达1/4世纪以上，使苏联在遗传工程和生物化学

领域的研究方面受到很大的损害。

2.轻视理论科学研究，不适当地强调实践的意义，造成在某些理论科学研究上的落后。

沙赫特事件的发生和五年建设计划在实际上的需要，使苏联党和政府把科学研究的重点过分放在实际效用上面，对科研人员要求快出实际成果，造成轻视理论研究的偏向。

斯大林严厉批评苏联高等教育"很少和生产联系"。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议，高等学校的工作，必须大大扩大生产实习并改进其质量，延长生产实习的期限，使生产教育的时间占40—50%；建立理论学习与企业生产实习的相互更替制，对个别生产部门规定较长的生产实习期限(1个月理论学习，1个月生产实习；3个月理论学习，3个月生产实习)。过分强调接触生产实践，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理论研究薄弱。

第二节 30年代的文坛

高度集中统一的文艺组织的形成

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和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文艺界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局面。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决议。决议认为，在新经济政策年代，异己分子在文学界的影响还相当大，无产阶级文学的骨干队伍尚很微弱，党曾用各种方法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帮助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现在，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已经成长起来了，现有的无产阶级文艺组织(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莫普)正在妨碍文艺创作的大规模发展。为此，联共(布)中央决定：1.取消无产阶级作家

联合会(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2.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并且乐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联合到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中去,在协会中设立共产党的党团①。《消息报》主编伊凡·格隆斯基任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会主席,高尔基任名誉主席。"拉普"的命运至此告终。

1932年5月9日的《真理报》社论,批评"拉普"培植宗派主义和采取粗暴的管理方法控制文学。社论还批评"拉普"的文学理论是突出个人心理。

尤金也先后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批评"拉普"的文艺理论是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文艺翻版,"起源于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作家法捷耶夫不赞成全盘否定"拉普"。他在《文学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为"拉普"的工作辩护。他认为,"拉普"基本上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文化革命时期所创造的是社会主义文化;"拉普"活动的每一重大方面总是与这一革命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联系在一起②。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确立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问题,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热烈的讨论。"拉普"的理论家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使文艺创作原则问题的讨论,带上文艺界派别争论的色彩。"拉普"解散以后,确立统一的创作原则,就成为确立斯大林模式的政治需要了。

1932年5月,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会主席

---

① 参见《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第145—146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 参见《"拉普"资料汇编》上,第423页。

格隆斯基，在莫斯科文学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批评"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他提出："我们对作家的基本要求是：写真实，真实地描写我们的现实，现实本身就是辩证的。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① 5月29日，《文学报》发表社论，肯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

1932年10月26日，在高尔基的寓所，举行了一次文学家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45名当时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斯大林也出席了座谈会，并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真实等问题讲了话。斯大林说："艺术家首先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如果他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那末他在生活中就不可能不觉察到、不可能不反映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艺术，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②

自从斯大林在这次座谈会上讲话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终于被作为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文艺创作的根本方法。原先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们都纷纷表示，放弃原来的主张。如法捷耶夫表示："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真诚的、真实的、艺术地表现思想的文学。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③

1934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苏联作家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章程中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

① 转引自《苏联文学》1981年第1期，第101页。
② 转引自《苏联文学》1981年第1期，第102页。
③ 转引自《苏联文学》1981年第1期，第103页。

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被以文件的形式正式规定下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20—30年代由苏联一批优秀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共同创造的文艺理论。梅特钦柯在《继往开来》一书中，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富尔曼诺夫、列昂诺夫、阿·托尔斯泰、费定等人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始人"。②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初的本意是指"写真实"，指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当作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之后，它的含义也更深入、更明确了：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有闻必录地摄制生活中的一切，而是要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真实，它要求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把握和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反映社会中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要求反映生活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和本质；3. 艺术作品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这是检验艺术效果的尺度。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在于以后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一种文艺创作的模式，加以绝对化，难免引向教条主义的僵化程式。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苏联文坛涌现出一批成熟的作家，创作了一批在文学史上有永久地位的作品。肖洛霍夫和他的作品具有这方面的代表性。

肖洛霍夫生于1905年，1922年开始创作尝试。20年代，他发表了几篇反映顿河地区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引起文坛的注

---

① 转引自《五十——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第149—150页，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参见梅特钦柯《继往开来》第308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意。1928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从此名噪文坛。到1940年，他终于写完这部共有4部8卷的长篇小说，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巨匠地位。

《静静的顿河》描写顿河哥萨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生活，揭示顿河哥萨克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革命风暴中所发生的变化，展现出被卷进生活漩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小说涉及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作家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敏锐，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高超风格，都显示了肖洛霍夫作品悲剧史诗的特点。1928年，当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发表时，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称肖洛霍夫是"一只年轻的黄喙小鹰，但却展翅高翔了"。

1932年，肖洛霍夫发表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关于这部小说，肖洛霍夫说："1930年，当发生在农村的、使农村彻底翻了一个身的那些事件——消灭富农阶级、全盘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等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按照生活的鲜明的足迹写了《被开垦的处女地》。"① 的确，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按照生活的鲜明的足迹"，描写了1930年苏联农村急风暴雨般开展的激烈场面。作家以他特有的社会洞察力，摄取了斯大林模式确立过程中的一组农村镜头。

肖洛霍夫的作品和成就，可以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硕果。

此外，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20—1941)，描写旧时代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变化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壮阔的群众运动场面。法捷耶夫的《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描写少数民族的觉醒过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

① 转引《苏联文学史论文集》第252页，198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成的》，描写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小说以火热的语言和炽热的生活激起人们对革命的追求。

第三节 哲学领域的批判运动

声势浩大地批判德波林学派

德波林学派还来不及总结和机械论者论战的意义，由斯大林发动的对德波林学派的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就开始了。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是这场批判运动的动员令。斯大林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但是，"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①。斯大林还严厉批评理论战线的糟糕情况是，它不能给实际工作以指导，却纵容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流行。

米丁等人迅速领会了斯大林讲话的政治含义，敏锐感到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即将开始，于是立即向德波林学派发起攻击。米丁等人首先在红色教授学院从政治上抨击德波林等人在大转变的年代不了解社会形势，没有感到哲学任务的严重，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不以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为中心，反而忙于解释哲学史，搞经院哲学。米丁等人还批评德波林主编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不加按语地刊登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实际上是同意错误观点。

接着，米丁等人就把批判运动推向全国。1930年6月7日，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6页。

米丁、尤金、拉尔采维奇联名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一文，抨击哲学领域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实质上导致唯心主义的危险"。文章还点了德波林学派主要成员卡列夫的名。8月8日，米丁又在《真理报》上发表《真实地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一文，点名批判德波林"对列宁的哲学遗产的错误态度"。文章还指责德波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形式主义的歪曲"。拉尔采维奇也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14期上发表文章，猛烈批评德波林等人"以高傲的、老爷式的轻蔑态度，对待哲学问题上进行改革的人们"。

批判运动开始后，德波林等人还没有领会它的政治实质，因而从学术上进行反批评。1930年上半年，批判运动还局限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内。莫斯科各高等院校哲学教研室的教师，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纷纷前来参加辩论，有时还得动员民警前来维持交通。在这些辩论会上，德波林等人声辩：哲学界的形势是好的、正常的；反机械论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同意斯大林对哲学界形势的总估计。在历次辩论会上，德波林等人还常常质问对方，使辩论的对方在理论上陷于被动。1930年7月出版的第5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刊出德波林等10人的署名文章，反驳米丁等人的批评。

形势表明，米丁等人不可能从学术上批倒德波林。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出面了。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以向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成员发表谈话的形式，从政治上向德波林学派及全国哲学界施加行政压力。

斯大林这次谈话的内容至今没有发表过，只是由米丁和尤金作过片段转述。

米丁转述斯大林的这次谈话中强调了批判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哲学观点的必要性，尖锐地提出了研究和掌握列宁的理论遗

产的问题。关于德波林问题，斯大林说："必须清扫和铲除堆积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界的全部垃圾，清查德波林派的一切著述和哲学界的一切错误。""在着重揭露德波林派观点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之后，斯大林同志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德波林式修正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即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斯大林还说："在德波林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有害的政治派别，它是深深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的代理人，必须把它彻底铲除。"①

据尤金转述的斯大林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德波林集团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因为这个集团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宣传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歪曲。他们的特点是在宣传唯心主义观点时，总是引证马克思的话作掩饰。他们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撇开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们不想研究这些问题，即使研究也加以曲解。他们拒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哲学战线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根据并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研究理论问题。"②

根据米丁和尤金的披露，可以看出斯大林在谈话中确定了这样几点：1.德波林学派是拥护德波林学说的人所组成的一个集团，是最有害的政治派别之一；2.德波林集团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集团，是孟什维克在新时期的代理人；3.德波林集团的特点是避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并以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来贬低列宁主义；4.必须在全国清扫和铲除哲学领域里的德波林哲学垃圾。

斯大林的谈话是授予米丁等人的一把尚方宝剑。斯大林的

---

① 转引自《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第442—443页，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 转引自《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第430—431页。

谈话也是从政治上把德波林及德波林学派一棍子打死。以斯大林的谈话为分界线，米丁等人和德波林学派的哲学思想论战，转变为在哲学领域里对德波林等人的审判式政治批判运动。

1930年12月29日，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通过了关于德波林学派的决议。决议认为德波林派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表现在：理论与实际分离；曲解列宁主义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抬高普列汉诺夫、贬低列宁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决议的这些内容，正是斯大林的谈话所要求的。

1931年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其中说：领导该杂志的德波林等人，"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把该杂志变成自己集团的刊物，使杂志的工作既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也脱离了国际革命运动的任务。"决议还说："德波林派在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上滚到了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立场。"① 决议宣布，改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委会，此时，德波林仍然包括在新的编委会内。

30年代中期以后，批判德波林的调子越来越高，越来越带有政治镇压的倾向。1936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发表文章，纪念联共（布）中央关于该杂志的决议发表五周年。这篇文章说："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明，孟什维克或唯心主义……变成了直接的反革命和法西斯主义。"② 随着肃反运动象野火一样在蔓延，德波林学派又被和反革命联系起来。1938年苏联出版的《大百科全书》称"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是德波林派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唯心主义歪曲"，"是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激烈反抗的反映，是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间谍、叛徒和哲学战线上的托洛茨

① 见《外国哲学与哲学史》复印报刊资料，1983年第9期，第71页。

② 转引《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第462页。

基代理人的思想掩护。"① 至此，德波林学派被当成反革命思想。许多德波林学派有才华的哲学家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惨遭厄运。

斯大林哲学论著的发表

实际上，对德波林学派的政治批判和强制镇压，目的就是要造成斯大林哲学思想的一统天下。对此，米丁有一个很好的说明。米丁在他编辑出版的一本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论文集序言中写道：这本论文集"贯串着一个意图、一个心思、一个愿望，就是怎样更好地领会斯大林同志关于哲学问题的著名的历史性谈话中发出的指示，并把它体现到生活中去"。米丁还说：他的指导思想就是"怎样更好地理解我们亲爱的导师斯大林同志的每个词和每个思想，并把它们体现和运用到哲学问题的解决中去。"②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的谈话，不是一篇哲学论著，要全国的哲学家都围着它转，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在哲学界实行高度统制，有必要写一篇哲学论著。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也需要从哲学思想上把这种体制固定下来。1938年9月，斯大林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长篇论文。此文也成为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节。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宗明义地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① 转引自《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第462页。

② 转引自《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第462—463页。

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①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归纳为4个基本特征，即：自然界是有联系的统一体，其中的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制约；自然界是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衰颓；自然界发展的过程是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根本的、质的变化，质变是迅速地、突然地、有规律地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自然界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就是自然界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归纳为3个基本特征，即：认为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唯物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是感觉、观念、意识的来源，意识是第二性的，人脑是思维的器官，思维是人脑的产物；认为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世界上只存在没有被认识的东西，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归纳成这样：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并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

斯大林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简明的概括。但是斯大林的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固定化、概念化，导致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177页，1962年人民出版社。

事物的同一性，只强调执行不调和的阶级政策，完全否定改良的积极作用。俄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依靠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更要依靠农民。但是斯大林为了要农民缴纳"贡税"，就强调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农民则是一个日趋瓦解的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指靠无产阶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苏联哲学界的任务只限于解释斯大林的哲学思想，空气是沉闷的、凝固的。在那种政治气候和环境下，当然出不了开创性的哲学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四节 30年代的经济学领域

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

30年代，新经济政策已告中止。全国实行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计划被提到法律的高度。沃兹涅辛斯基说："社会主义计划是由无产阶级国家制定的苏维埃经济的经济法律。任何想用无组织性和闹独立性来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的企图，想把它当成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文件的企图，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最恶劣的表现。"①

1930年初，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信贷改革和普遍实行经济核算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苏联政府取消了商业信用，把国家银行变为全国统一的结算中心，加强国家银行同经济的联系。国家银行凭企业的计划，而不是按计划完成情况发放贷款，这实际上是不加控制地满足企业要求得到贷款的一切申请。根据决议，国家银行在进行企业与企业间的经营结算中取消了承付，这

①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第24页，1983年人民出版社。

实际上是不管消费单位是否同意就支付供货单位所有一切帐单。这样做的结果，国家银行发出的贷款很快就超出了实有的贷款资金，而不足的部分资金就只好靠急剧增加发行货币来弥补。由于放弃承付结算形式，出现了产品质量下降、产品成本提高、供货不配套等现象。

凡此种种，对货币流通和企业间的经济核算制度的贯彻，造成了不良后果。1931年1月，苏联政府决定，取消企业间的自动结算。3月20日，又决定不凭计划，而按照计划完成的实际情况发放贷款。1931年7月，苏联政府又规定，国家银行拨给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国家银行的贷款是有期限的，并且是必须归还的。

国家经济体制的改变，要求经济学家研究、说明新体制下的经济理论问题。于是，苏联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沃兹涅辛斯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31年第23—24期、1932年第1—2期上发表长篇论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正式提出了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构。文中认为，英国资产阶级还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我们这个正在领导一个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的党，更应该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①。

沃兹涅辛斯基在文中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从理论上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关于苏维埃商品流转和货币流通；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劳动社会化和劳动生产率；生产费用和社会主义积累；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比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布局和联合制；消灭阶级和分

①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第46页，1983年人民出版社。

工；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而斗争。这位刚刚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的28岁年轻人的宏论，很快使他成为30年代经济学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引起了整个经济学界、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30年代，苏联经济学界就众多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有：

1．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问题。

沃兹涅辛斯基认为，苏联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工农业产品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商品了，而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产品"，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产品"，因此也就不再具有原来的商品的性质了。他给"苏维埃商品"下的定义："它主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上是通过有组织的苏维埃市场进入消费领域的产品。"① 他把苏联的商品交换看作是仅仅保留了商品交换的旧形式，跟价值规律已经毫无联系。他以磁铁矿交换库兹煤矿、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交换劳动为例说，这种交换都不通过旧意义上的市场，"在这里，产品的旧商品形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②

沃兹涅辛斯基所阐述的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在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说：决不能把苏维埃商业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商业相提并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商业容许资本主义活跃，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在商品流转方面活动，而苏维埃商业却以不许资本主义活跃，不许私人资本主义在商品流转方面活动为出发点。这是因为，苏维埃商业是没有大小资本家参加的商业，是没有大小投机分子参加的商业。这是特种商业，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只有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制度发

① 见《布尔什维克》杂志，1935年第2期，第35页。
②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第162页。

展条件下才实行的商业。沃兹涅辛斯基把斯大林想说而没有明白说出来的意思点了出来：苏维埃商业就是排斥价值规律、不受价值规律调节的商业。

30年代，苏联的经济学界普遍持这种观点。加托夫斯基认为价值规律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商业，"社会主义企业中生产的商品转变为货币和货币转变为商品，在无危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民经济计划的职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要求社会产品的流通，要求社会产品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的更替"①。

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

沃兹涅辛斯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是有计划的规律，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觉地确定的规律"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是由无产阶级政党主观制定的思想，在那个年代相当流行。经济学界把无产阶级国家制定的经济计划，误认为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波里林在1937年第1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说："在苏维埃经济实际中，除了从经济实际中产生出来的规律，除了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中产生出来的规律，或者与经济政策作用直接有关的规律以外，不存在其他的规律"③。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创造的。

其他象加托夫斯基、布达耶夫、列昂节夫等也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不可能支配革命阶级的意志；相反，经济规律是无产阶级活动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1940

① 见《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第395页，1982年三联书店。

②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第123页。

③ 《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第240页。

年，列昂节夫编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的社会主义部分，根本不提经济规律。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上述观点。帕什科夫认为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是错误的。他在1934年第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改变的只是规律的内容和规律作用的性质，但是经济规律无论在过渡经济中、在社会主义中、在纯粹共产主义中，都会存在①。

3。关于货币的作用。

沃兹涅辛斯基认为，苏联已经实现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货币已不再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了。"货币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建设强有力的手段，是对积累、生产和流通过程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手段，是工业同集体农庄农业联系的手段"②。

"货币监督说"在30年代十分流行，加托夫斯基也认为："当劳动还未变成生活第一需要的时候，就必须有监督劳动量和消费量的货币形式"。"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首先是社会主义劳动和社会主义产品的一般尺度。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一切职能，正是由此产生的"③。

"货币监督说"和"计算分配说"实际上也是阐述斯大林的思想。斯大林承认货币在苏联还会长期存在，直到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完成的时候为止，不能取消货币。但是斯大林认为"货币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工具"，苏维埃政权把这种工具掌握过来，是"为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准备条件"。他认为到苏维埃商业办得尽善

① 参见《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第278页。

②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集》第216页。

③ 《论苏维埃卢布和苏维埃商业》，《苏联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论文选集》第2页，1958年科学出版社。

尽美的时候，就要用产品交换取代商业，货币也随之取消了①。

30年代，经济学界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基础必须向直接计算劳动消耗、废除货币、取消市场过渡，货币"已经变成简单的计算符号"。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还设立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从市场商品流转过渡到有计划的产品交换的各个阶段的消费、交换、分配等问题。这种观点仍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一种不存在商品、货币、商业的经济，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高级的自然经济状态。在那些年里，不少经济学家都片面强调计划经济的意义，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范畴本身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30年代后期，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少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苏维埃经济的"运动规律"。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1937年第1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社会主义工农国家本身所创造的……这种规律性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身所创造和改变的。"②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讨论

为了从理论上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40年，在联共(布)中央的倡议和领导下，开始编写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41年1月，联共(布)中央和有关经济学家参加，讨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

教科书未定稿反映了当时经济学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局限性。未定稿也否认价值规律在社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04页。

② 转引自《经济学译丛》1979年第4期，第71页。

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某种自然经济状态。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之一，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后来写道："未定稿的作者根据已形成的传统观点分析苏联商品关系的特点时，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①

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讨论仍然有积极成果的。经过讨论，终于肯定苏联仍然存在着商品、货币、价格、工资、利润、地租、经济核算，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并且证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起着作用。讨论会指出：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观点，对苏联经济生活的实践是有害的。这是苏联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经济学领域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结论。

① 转引自《经济学译丛》1979年第9期，第37页。

第十三章　30年代的苏联外交

第一节　争取集体安全的外交方针和行动

外交战略方针的转变

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走上了公开扩军备战道路，蓄谋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夺取世界霸权。30年代上半叶，在欧洲和亚洲先后形成了以德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两个战争策源地，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严重。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稳定国际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对制止和推迟新战争的爆发负有重大的责任。苏联又位于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东西夹击的威胁下，处境十分险恶，斗争十分艰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党和政府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作出了新的判断，并对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实行相应的调整。法西斯侵略国的战争计划和扩张行动，不仅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且也构成了对英法等国霸权地位的严重威胁，直接损害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促使帝国主义营垒发生分化和对立。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当时处于战略守势，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比较关心世界各国经

济关系的稳定，比较倾向于巩固现状，维持国际和平局面，力求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它们和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存在着直接而尖锐的利害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比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和斗争更直接、更尖锐。因此，在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这一点上它们与苏联和世界人民客观上有某种共同利益。

苏联认为，由于法西斯奉行奴役全世界的侵略战争政策，世界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敌人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国正日益成为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它们同以世界人民为主体的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势力之间的矛盾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联合起来，坚决挫败法西斯国家扩军备战的行动，扑灭法西斯国家不断点燃的战争火焰，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护世界和平。苏联认为，在当前世界力量的对比中，和平因素占据优势，只要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联合战线，就有可能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下，苏联的外交战略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反对和防止英、法、美策划反苏新武装干涉，维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关系，转变为争取联合英、法、美等非侵略国共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制止新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与此同时，苏联外交策略也作了新的变动。20年代，苏联强调经济上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联系，政治上贯彻慎重灵活方针，以保持对外和平关系，避免卷入英法挑动的战争中去。30年代初，苏联则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强调利用帝国主义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力量反对法西斯侵略势力。为此，苏联大力调整对英、法、美等国的关系，把维护苏联本国的和平安全纳入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的轨道。

30年代初，苏联提出了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口号，积极倡导世界各国集体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并且提出了具体实施集体安全的构想，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体系。联共(布)中央郑重研究了集体安全的方针和构想，于1933年12月12日通过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的决议。决议强调，为了防止战争，保卫和平，苏联考虑参加国际联盟，并和广大的欧洲国家缔结区域性的共同防御侵略协定。决议的通过标志着苏联外交战略进入了新的阶段。

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建交

为贯彻执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外交方针，增进国际反战力量的联合，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苏联在30年代初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同愿意维护和平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苏美建交是当时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事件。迄至30年代初，美国是唯一拒不承认苏联的资本主义大国，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出于各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苏联和美国都为改善两国关系采取了积极的立场和行动。1933年5月，新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参加裁军会议和世界经济会议的53个国家首脑发出一份呼吁书，建议共同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和有关政治经济关系的公约。呼吁书打破惯例送给了与美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这一行动实际上是美国准备承认苏联的信号。苏联反应积极，加里宁立即复函表示完全赞同。同年6月，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布利特和副国务卿莫利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举行了"私人会晤"，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了意见。此后，苏美建交谈判加快进行，罗斯福决定将谈判活动"从厨房移到客厅"。

10月 10 日，罗斯福再函加里宁，建议苏联派代表赴美正式举行谈判，以结束令人遗憾的两国“不正常关系”。10月 17 日加里宁在复函中申述了苏美建交的迫切性，表示同意派李维诺夫前往华盛顿进行谈判。11月 8 日，李维诺夫在华盛顿同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开始了建交谈判。16日罗斯福和李维诺夫互相交换了11件函文和一项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双方表示永远保持正常而友好的关系，为了相互的利益，为了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合作。此外两国还就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主要内容是：1.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2.决不采用任何方式破坏对方国家的安宁、繁荣、秩序，以及本土及属地的领土完整；3.两国政府互不允许在本国领土内筹组或设置敌视和破坏对方政府或政治社会秩序的任何组织和团体（包括它们的代表），决不采用任何方式资助或容忍它们进行武力或其他敌对活动。苏美建交对增进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都有重要意义。斯大林指出“这件事在新旧两个时期之间立下了标界：在旧时期中，各国把美国当做一切反苏趋向的堡垒，而在新时期中，这座堡垒已经自愿拆除以适应两国双方的利益。”①

在苏美建交前后期间，苏联还同下列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西班牙（1933年 7 月）、匈牙利（1934年 2 月）、罗马尼亚（6月）、捷克斯洛伐克（6 月）、保加利亚（7 月）、阿尔巴尼亚（9 月）、哥伦比亚（1935 年 6 月）、比利时（7 月）、卢森堡（8 月）。此外，1933年 9 月苏联同意大利缔结了友好、互不侵犯中立条约，1933年 7 月同阿富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斯、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 7 个邻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公约。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8—269页。

参加国际联盟

参加国际联盟是苏联在30年代初为实施新外交战略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由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从成立以来，苏联对它一直采取谴责和反对的立场，认为国联是"强盗的联盟"、"反苏联盟"，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中心和掩盖新战争准备的工具。1927年11月斯大林明确宣布苏联决不参加国联，"不愿意成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帷幕的组成部分"①。

1933年3月、10月日本和德国相继退出国际联盟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希望苏联参加国联以增强它的威力。1933年11月，法国外长向苏联驻法大使提议，希望苏联参加国联。随着形势变化，苏联对国际联盟的立场和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国际联盟虽然软弱，不掌握彻底消除战争的手段，但是总还可以作为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场所，在阻碍新战争爆发上起一定作用。1933年12月1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外交人民委员会关于苏联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国际联盟的决定。25日，斯大林在和美国记者谈话时指出："尽管德国和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国际联盟才能够成为制止或阻碍军事行动发生的一种因素。如果真是这样，如果国际联盟能够起微小的作用，哪怕只是使战争受一点阻难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和平事业，那么我们也不反对国际联盟"②。

在法国的倡议下，1934年9月15日国联30个成员国联名向苏联发出邀请书，18日，国联大会以38票的多数赞成苏联加入国联并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苏联表示同意参加国联，但声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49页。

明反对国联推行的殖民主义的委任统治制度，并对国联以往的有关决议和没有苏联签字的条约不承担责任。由于英法等国政府的操纵，苏联在国联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苏联参加国联的事实却表明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缔结东方公约的谈判和苏法、苏捷互助条约的签订

30年代初，苏联就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制定了具体实施计划，主张在以往双边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缔结区域性多边互助条约，以此将受到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所有国家联合起来，结成集体安全体系。

苏联认为，在欧洲安全体系中苏联和法国是核心力量。法国是苏联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中主要争取对象，因为法国是欧洲第一陆军强国，是抗衡德国的重要力量，同时法国受德国的威胁最直接，为了对抗德国，要求与苏联接近。1933年下半年开始，法国出现了联苏抗德的倾向。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埃里欧强调，4000万人口的法国决不能单独与拥有6000万人口的工业发达的德国抗衡，认为“只有一个国家是我们所需要的平衡力量，它能够在战时建立第二战线，这就是苏联。”并声言，“希特勒执政后，我比任何时候更坚定地认为法国必须与俄国结盟。”苏联敏锐地觉察到法国外交的动向，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33年7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声明中指出，苏联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和法国没有利害冲突，在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接近，不存在任何障碍。8～9月间，埃里欧应邀访苏，苏联建议缔结苏法互助条约，埃里欧表示赞同。随后，苏法两国的高级外交和军事领导人进行会晤。12月中旬，苏联外交部表示，除同意参加国际联盟外，还愿意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缔结反对德国侵略的地区性共同防御协定。一旦遭到军事进攻，各缔

约国应不受限制地保证相互提供外交、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将有关建议照会英法政府。

苏联的建议受到了法国的响应。12月28日，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法国外长邦库进行会谈，双方同意把反侵略的互助义务补充到1932年11月签订的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去。由于法国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关于苏法互助条约的谈判被推迟了。1934年2月，法国成立新政府，新任外交部长巴尔都积极奉行对抗希特勒德国侵略威胁的"大联盟"外交方针，主张强化国际联盟，加强欧陆同盟体系，创建由东方公约、地中海公约、洛加诺公约和法苏互助条约等区域性防御公约和互助条约构成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1934年5月，法苏两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谈判，共同商议签订一个相互保证边界安全，集体反击侵略的条约，即所谓东方公约。5月29日，巴尔都建议签订一个东方洛加诺公约，作为1925年10月签订的洛加诺公约的补充。条约由苏联、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芬兰参加。缔约国中任何一国受到侵略时，其它签约国应自动向被侵略国提供军事援助。法国不直接参加东方洛加诺公约，但担任保证国，保证条约的履行。同时由苏联担任洛加诺公约的保证国。法国的建议强调由法苏两国在东、西洛加诺公约中发挥主导作用。苏联从国际大局出发，支持巴尔都的建议，同意在以前坚决反对的洛加诺公约基础上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经过多次会谈，法苏两国相互承担相当于洛加诺公约和东方公约参加国的义务。

1935年3月，德国公开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这给法国以极大震动，联苏抗德的舆论在法国重又高涨。苏联利用有利形势推进苏法谈判。在东方公约一时无法缔结的情况下，3月29日苏联政府向法国正式建议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缔结

双边互助条约。4月15日，苏联向法国提交了条约草案，5月2日苏法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条约规定缔约一方在遭到某一欧洲国家侵略威胁和侵略危险时，彼此保证相互立即进行协商，并立即给予支援和协助。条约有效期为5年。

5月16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签订了《苏捷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遭到某一欧洲国家进攻侵略威胁和侵略危险时，彼此立即进行协商，立即给予支援和协助。在附加议定书中还规定，只有在法国对被侵略国提供援助时，苏捷双方才有义务互相援助。

苏联政府对法苏、苏捷条约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奠基石，并力图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5月13—15日，法外长赖伐尔访问莫斯科，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党政领导人的接见。会谈达成协议，两国继续为缔结区域性多边互助条约进行努力。苏联要求进一步缔结军事协定和经济协定以保证政治协定的实现。事后苏联还向法国递交了具体军事援助的设想。但法国对此却拖延搪塞，不了了之。

法国政府对法苏互助条约缺乏诚意。赖伐尔曾透露，法苏条约与其说是为了共同反对侵略，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德苏接近。条约签订后，围绕条约的批准问题，法国内部斗争十分激烈。针对法国议会迟迟不予批准的情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对法国提出警告。1936年2月27日，法国议会批准《法苏互助条约》，条约正式生效。3月7日，德国借口《法苏互助条约》违背洛加诺公约精神，通知英、法、比、意四国废止洛加诺公约，并悍然将军队开进莱因非军事区。苏联忠于《法苏互助条约》，严正抗议德国的侵略行径，并声明如果法国因为维护和平而受到德国侵犯，苏联将履行条约义务，准备向法国提供一切援助。

法苏和法捷条约在签订之初，在战略上对德国的扩张形成

了东西南三面钳制的态势，本来可以在阻遏德国扩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希特勒曾十分害怕同盟的力量会“击中德国的心脏”。可惜法国的软弱使法、苏、捷的互助条约在国际危机的第一次考验中没有发生实际效用。

30年代初，英国虽然继续奉行扶德、抑法、遏苏的政策，但是苏联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外交活动中，仍然没有放弃对英国的争取工作，并且通过多种形式对其施加影响。

1935年3月下旬，苏联邀请英国政府中强硬派的代表人物掌玺大臣艾登访苏。斯大林接见了艾登。在谈话中斯大林强调国际局势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来自日本和德国，表示苏联“不可能闭着眼睛让德国武装起来去进行侵略，因此，当前我们要采取措施来阻止德国武装起来。”① 斯大林强调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是维护和平的切实保证，针对希特勒“声东击西”和西方某些政客“祸水东引”的幻想，苏联领导人在会谈中对英国的对德政策一再表示忧虑，呼吁英国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中发挥作用。艾登访苏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仅仅彼此交换了对两国关系和国际问题的看法，并在外交上作出了苏英接近的姿态。

30年代苏联的东亚外交

30年代初，苏联面临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严重威胁，环境十分险恶。苏联外交战略重点在欧洲，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法西斯德国是主要危险，但在当时，最现实的直接危险则来自东方的日本。如何防止日本的武装进攻，有效地捍卫东部边境的安全，是30年代初苏联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任务。在当时的形势下，苏联党和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和平外交，努力改善同日本的关

①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565页。

系，竭力避免卷入同日本的武装冲突。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后，苏联对日本采取了慎重的立场，一方面庄严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但同时继续谋求改善苏日关系。同年10月28日，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访问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希望苏联不要在中东铁路沿线屯兵，不要给予中国军事援助，以免引起严重事态。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苏联采取的乃是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为了避免触怒日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反复强调，苏联要求日本只有一件事：尊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商业利益，因为苏联在中国没有别的利益。为了"消除互相间的猜疑"，稳定两国关系，苏联政府曾先后于1931年12月、1932年11月，1933年1月多次建议日本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但都被日本政府以"时机还不成熟"为由加以拒绝。

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苏联曾倡导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1933年11月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罗斯福建议缔结太平洋公约，公约由美、苏、中、日参加，缔约国将承担互不侵犯的义务。但未获美国的响应。

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对此，《消息报》发表社论，宣称苏联将毫不改变与"和平政策相联的绝对不干涉政策"。鉴于中东铁路事实上已沦于日本控制下，无法正常活动，为了消除日本制造反苏挑衅的借口，1933年5月2日苏联提议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但日本以中东铁路在"满洲国"境内为由，要求苏联与满洲国交涉出售路权问题，以此使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经过一年多的谈判。1935年3月23日，苏联同伪满洲国签订了《满洲国和苏联关于将北满铁路（中东铁路）苏联的权益让渡给满洲国的协定》，以14000万日元将苏联在中东铁路的权益出售给伪

满洲国。同时，苏联还在库页岛石油开采和渔业协定上也作出了让步。

苏联的忍让立场并未得到日本的响应。关东军不断挑起边境冲突。1935年就发生80次武装冲突。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苏联远东军从1931年的6个师增加到1936年的16个师，并在苏满边境全线构筑防御工事。1936年苏日关系日趋紧张，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策，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下，对苏联构成包围的态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进"的声浪日高，1938年7月，日本朝鲜驻屯军在临近朝鲜的中苏边界的张鼓峰对苏联发动武装进攻。1939年5月到8月，日本关东军在中蒙边境又制造了诺门坎事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军事挑衅。苏联对日军的两次大规模武装进攻给予毁灭性反击，捍卫了东部边境的安全。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苏联开始加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以牵制日本的"北进"。1937年8月，苏联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在物资、财政和军事人员等方面扩大了对中国的援助。1939年6月，在莫斯科与中国政府代表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1937—1939年苏联先后给中国4.5亿美元的贷款(比同时期的美国贷款多6倍多)和价值3亿多美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约有2000名苏联飞行员参加了保卫中国的空战。

但是，这时期苏联对日本仍然奉行避免冲突，力争和平相处的方针，拒绝在美英不参加集体行动的条件下单独对日进行制裁。李维诺夫宣称"苏联不可能也不会独自加入中国一边，只有作为集体安排，获得其它大国的支持下，才会采取行动"。

1939年秋，苏日关系发生新的转机，开始由紧张对峙转向缓和妥协。诺门坎战斗的惨败和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给日本的北进政策予沉重打击。8月28日，日本内阁改组。9月1日，德国发动对波兰的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新形势下日本战略重点开始转向南方，"北守南进"论成为基本国策。1939年12月，日本《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明确指出，停止北进，对苏暂时不诉诸武力，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以确保日苏间"平静无事"。同年12月31日，苏日签订协定，日本保证向苏联付清中东铁路最后一笔欠款。苏联抓住时机，努力改善苏日关系，《真理报》评论苏日协定时指出，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十分重视苏日关系正常化，苏联方面愿意促进它的实现，表达了苏联对改善苏日关系的热情。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的苏联外交

慕尼黑会议后苏联外交的新动向

30年代初中期，苏联为保障欧洲集体安全，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在重大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中，始终站在世界人民一边，努力争取英法等国共同反对法西斯国家的扩军备战和侵略扩张，保卫世界和平。当1935—1936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1936—1939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苏联都伸张正义，呼吁和力促英法等国联合制裁法西斯侵略，并且从道义上、物质上给被侵略国人民予声援，苏联的志愿军事人员还直接到西班牙和中国与法西斯侵略者展开了浴血奋战。

1938年3月，希特勒德国悍然出兵侵占奥地利，苏联坚决反

对德国兼并奥地利。3月 17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德国的侵略行径，并再次呼吁英法等国给侵略者以集体反击，指出这次侵略行动不是发生在远离欧洲或欧洲边缘地区，而是发生在欧洲中部地区，不仅危及与侵略者毗邻的11个国家，而且危及全部欧洲国家，苏联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在集体拯救和平问题上采取果断的、毫不含糊的立场，并表示苏联政府准备“参加同苏联共同商定的集体行动”，以“制止侵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并消除一切严重的新的世界大屠杀的危险”。苏联的建议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支持和赞同，但是英法政府害怕集体制裁会触怒希特勒，认为苏联的建议会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拒绝苏联的建议，英国于 4 月 2 日正式承认德国兼并奥地利。特别是 1937 年 5 月张伯伦上台后，全面推行以妥协退让、嫁祸于人为特征的绥靖政策，这种纵虎为患的绥靖政策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发展到顶峰。

奥地利被兼并后，希特勒便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利用捷国内民族矛盾，策划德意志人集中居住的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完全“自治”。1938年 5 月 19 日，德国出动4个摩托化师集结德捷边境，进行武力威胁。在捷“五月危机”期间，苏联明确表示坚决履行苏捷互助条约的义务，支持捷政府的自卫立场。5月 11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宣布只要接到请求，苏联将彻底履行对法、捷的条约义务。随后，李维诺夫和苏驻法、捷的使节都一再声明，苏将同法、捷同盟国站在一起抵抗德国侵略。斯大林还通过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转告捷总统贝奈斯，如果德国侵入捷境，只要捷决心抵抗，即使法国不采取援助立场，苏联也准备单独给予援助。9月，希特勒再度支持苏台德区德意志党徒制造骚乱，叫嚷要用武力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面对希特勒的战争威胁，英法统治集团的绥靖立

场充分暴露。9月 15 日，英国首相张伯伦亲往德国同希特勒进行会谈，卑躬屈膝地屈服于希特勒的侵略要求。9月 19 日英法政府联合照会捷政府，要求捷同意不经公民投票就把德意志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割让给德国，并废除捷与其他国家首先是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在捷政府被左右夹攻的危急关头，苏联政府忠于条约义务，坚持援捷的立场。9月 2 日，李维诺夫在回答法国驻苏代办关于当捷受到德国侵略时苏联将给予什么援助的询问时表示，苏联决意履行条约义务，但指出由于罗马尼亚和波兰不同意苏军过境，建议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德国为侵略国，捷为被侵略国，以便使罗波同意苏军过境，此外还倡议苏法捷三国参谋部立即举行会谈讨论援助的方法和措施。9月19日，捷总统约见苏联驻捷代表，探询如果捷遭到侵略、法国履行条约义务时，苏联是否也愿意履行。次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再次作了肯定的回答。9月20日，捷政府复照英法政府，拒绝了英法 9 月19日联合照会中提出的要求。次日，英法公使 5 次会见捷总统贝奈斯进行威胁。同一天，李维诺夫则在国联大会上再次声明，苏联愿意履行条约义务，和法国联合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并准备立即与法捷的军事部门具体磋商应采取的实际措施。但是，捷不愿单独接受苏联的援助，并表示捷将永远追随西欧。9月 21 日，捷政府宣布“以沉痛的心情接受英法的建议”，并声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被抛弃了”。9月 22 日，英德两国举行第二次会谈，希特勒提出了新的更苛刻的侵略要求。23日，苏联政府重申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心。在整个“捷克危机”时期，苏联在实行军事援助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截止 9 月底，苏联 30 个步兵师和骑兵师已在西部边境集结，决定动员 246 架轰炸机和302架歼击机，作好随时出动援捷的准备。

但是，英法政府继续对捷政府施加压力，9 月 27 日，张伯伦

政府照会捷政府，提议举行捷、德、英三国会议来划定新国界，并由英、德、法、捷以中立保证条约代替捷同其它国家的条约体系。同一天，张伯伦还请求墨索里尼出面斡旋，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捷领土的割让问题。1938年10月29—30日，英、法、意、德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开会，会议达成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同时还签署了《英德宣言》，双方保证用和平协商手段来解决两国间一切争端，消除一切可能引起纠纷的根源。

慕尼黑阴谋酿成了危害世界和平的灾难性恶果。

《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使苏联、法国的同盟关系趋于瓦解，苏法和法捷互助条约名存实亡，苏法捷之间的反法西斯互助关系已失去效用。许多欧洲中小国家被捷克斯洛伐克的悲惨结局所震惊。它们既无力单独抗击侵略，又不能指望西方大国的援助，出于安全求存的愿望，纷纷倾向德国，或脚踩两只船，或投入希特勒的怀抱，东南欧日趋纳粹化。

慕尼黑阴谋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是对欧洲集体安全运动的一种反动。1938年的捷苏台德危机，本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实行大联合和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一次极为宝贵的大好时机。但是，英法统治集团不仅抵制和反对苏联关于集体制裁侵略者的努力，而且排斥苏联，和德意一起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慕尼黑会议后，又极力散布"俄国军队软弱无力"，德国"要东进夺取乌克兰"的流言，鼓动德国进攻苏联，恶化苏德关系。慕尼黑会议前后的种种活动，加深了苏联与英法的分歧与猜疑。苏联从慕尼黑协定和英德宣言的字里行间警觉到祸水东引的现实危险，战争有可能首先落到自己的头上，因此不能不对自身安全予特别注意。

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努力一再受挫，英法统治集团竭力

把希特勒的侵略矛头转向东方的情况下，为了摆脱慕尼黑会议后某种孤立挨打的局面，苏联对外交战略作了必要的调整，在坚持力争集体安全、联合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略方针的前提下，把防止反苏战争、确保自身安全作为首要的战略任务和一切外交活动的指导方针。对英法非侵略国既要争取，又要揭露，对法西斯侵略国既要反对，又要缓和，充分利用帝国主义矛盾，挫败帝国主义祸水东引的阴谋，确保本国安全。1939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阐述新形势下苏联外交方针政策时指出："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种关系，只要他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并强调苏联要继续支援被侵略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准备用双倍打击去回答进犯苏联国界的进攻。同时"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们国家卷入冲突中去"。①

英法苏三国谈判

1939年，国际形势空前紧张，险象环生，世界已到了濒临大战的关头。

英法等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而德国的战略目标是攫取欧洲和全世界，它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绥靖政策改变不了列强间争霸斗争愈演愈烈的趋势，慕尼黑协定并未给欧洲带来和平，相反，加快了希特勒的侵略步伐。1939年3月15日，德国出兵占领布拉格，鲸吞了捷克斯洛伐克。3月21日，德国向波兰再次提出但泽和波兰走廊的领土要求；23日，德军又武装占领立陶宛的梅梅尔，同时积极向巴尔干诸国加紧

① 《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9—220页。

扩张。4月 12 日，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5月 22 日德意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钢铁公约》。这一连串侵略行动，彻底破坏了整个欧洲的均势，使国际政治关系发生新的变动。

在大战日益逼近的形势下，各大国出自各自的需要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彼此利用矛盾，力图使形势朝自己有利方向发展。1939年夏秋间，几乎同时间出现了英法苏之间、苏德之间、英德之间及德意日之间四种谈判交叉进行，相互作用的复杂局面。其中英法苏三国谈判具有全局性的关键意义。

德国吞并捷克，进逼波兰的行动对英法霸权地位构成了直接威胁。英法统治集团感到希特勒并没有按照慕尼黑会议中达成的默契"东攻西和"，而是在搞"声东击西" 的把戏，条顿剑的寒光使英法统治者意识到一味妥协退让、屈膝投降已不能有效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被迫对其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作某些调整。一方面继续对德意奉行绥靖政策，另一方面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对德国的扩张采取某些阻遏和威慑的强硬措施。3 月 23 日，英法正式结成同盟，3 月 29 日英法举行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对德作战的共同战略。3月到 5 月间，英法共同或单独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士、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从北海到黑海、爱琴海构筑了阻遏德国进一步扩张的篱笆。同时为了借助苏联加强对德国的威慑作用，英法政府被迫改变以往不与苏联进行任何合作的僵硬立场，主动和苏联接触，把谈判之手伸向苏联。

慕尼黑会议后，苏联对英法"祸水东引" 的绥靖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但是在捷克灭亡后出现的新形势下，苏联从联合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大局出发，捐弃前嫌，对英法联苏抗德表示持欢迎立场，以积极的态度与英法进行谈判，争取结成反法西斯联盟。

英法苏三国谈判历时4个多月，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3月17日到4月1日为前奏性的第一阶段。谈判围绕“罗马尼亚危机”而展开。3月16日和17日，罗马尼亚政府多次通报英国外交部，罗已接到德国的“最后通牒”，有可能几天内立即遭到德国的进攻，要求英国给予援助。3月17日，英国外交部首席顾问范西塔得接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指出，能够制止德国扩张的只有英法和苏联与包括一切受德国侵略威胁的其他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迅速结成同盟，“为此第一步应当是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之间的接近，及早拟定共同的行动计划，而不要等到危机到来之时”①。3月18日，英国外长哈里法克斯指示驻苏大使西兹会见李维诺夫，并同时召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表示希望苏联在罗马尼亚遭受侵略时给予援助的意向。当天晚上苏联政府作了答复，建议立即召开苏、英、法、波、罗、土等6国会议，共同商议集体安全问题。次日，英国以召开此种会议为时尚早为由拒绝了苏联的建议。3月21日，英国建议英法苏波4国发表共同宣言，宣告一旦欧洲某一国家遭受侵略时，4国将立即讨论共同抵抗侵略而应采取的步骤。次日，苏联表示同意英国的建议。但英国政府又出尔反尔，4月1日借口波兰拒绝而宣称“关于宣言的问题已经过去了”。这样由罗马尼亚危机而引起的关于联合抗击侵略就不了了之。

从4月15日到7月底，英法苏三国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其主要内容是缔结三国互助条约。3月31日，英国宣布对波兰提供安全保证后，英国朝野要求联苏抗德的呼声日益高涨。前首相劳合·乔治强调指出“在缺乏同苏联建立可靠协议的情况下”，宣布对波兰的安全保证，“有把英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如果我

① 苏联外交部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1年版，注释第83页。

们没有苏联的援助而参加战争的话，我们就是自投罗网"。4月，英国报纸举行民意测验。92%的人都赞成同苏联结成同盟。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张伯伦政府被迫进一步同苏联进行谈判。4月17日苏联向英法提出缔结互助条约的8项建议。主要内容为：三国缔结为期5—10年的盟约，一旦欧洲发生对任何一个缔约国的侵略时，相互给予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援助；当发生针对从波罗的海到黑海间的同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的侵略时，英法苏应给这些国家以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援助；英法苏三国在最短时间内商讨确定给上述国家援助的规模和方式。英法政府对苏联的建议迟不作复。直到5月8日苏联才收到英国的复文。复文提出，当英法履行对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国的义务而卷入战争时，苏联应立即给予对方愿意接受的一切援助，但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遭受侵略时，英法是否给予援助仍缄口不谈。5月14日，苏联复照英国政府，指出英国的建议缺乏互惠精神，置苏联于不平等地位，并重申必须以4月17日苏联建议为基础缔结三国互助条约。这时，国际局势进一步紧张化、复杂化。5月22日德意签订《钢铁同盟》条约。同时，"德国在莫斯科伸出触角"的消息不胫而走。英国国内的强硬派对张伯伦拖延谈判的态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强烈要求接受苏联的建议，立即同苏联结成反德联盟。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5月27日，英法政府向苏联提出新建议，承认三国互助的原则，但仍然没有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列入三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范围内，也没有对三国间相互援助的规模和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6月2日，苏联向英法提出新的互助条约的草案，对英国5月27日的建议作了修正和补充。明确规定，三国为下列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比利时、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等8个国家，并规定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遭受侵略时，

只要被侵略国提出要求，都将给予援助。三国要尽快就提供援助的规模和方式缔结军事协定，与互助条约同时生效。这时，为了加速谈判的步伐，英法苏三国决定将“远距离交换照会”的方式，改为派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直接的“圆桌会谈”。苏联曾邀请英国外长哈里法克斯亲往莫斯科参加谈判，但英国只派了外交部中欧司司长斯特朗前往。6月12日斯特朗抵达莫斯科。6月15日英法苏莫斯科谈判正式开始。7月1日英法代表提出了一份关于三国条约的修正案。英法同意承担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及芬兰提供安全保证，但是拒绝在这些国家遭受“间接侵略”时向他们提供援助。鉴于侵略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教训及上述各国的现实情况（当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已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军总参谋长正在访问芬兰），间接侵略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因此，苏联坚持要求在发生间接侵略时英法必须履行援助义务，以免英法借故临阵脱逃。7月3日，苏联提出新的修正案，要求明确规定侵略行为包括直接侵略和间接侵略。但是，双方在间接侵略问题上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8月4日斯特朗奉召返英，三国政治谈判至此结束。

从8月12日到21日，英法苏三国谈判进入第三阶段。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三国军事行动的方案。苏联认为仅仅发表一般性的互助声明，结成不承担明确军事义务的松散同盟是不能制止法西斯侵略的，相反会招来战祸，只有结成包含具体军事义务的可靠有力的同盟才能保卫世界和平。这时，波兰危机日益尖锐，欧洲战争一触即发，苏德谈判已进入抉择性的关键时刻，苏联决定为争取英法联合抗德作出最后的努力。7月23日，苏联政府提出，在政治谈判难以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三国可举行军事谈判，就相互间的军事援助的规模和方式进行协商。当时英法也获悉德国将进攻波兰，因此同意举行军事谈判，但仍然没

有采取积极认真的态度。苏联派出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为首的具有签约全权的代表团，而英国代表团团长仅是一名没有全权证书的退休海军上将，法国代表团团长是一名中将衔的兵团司令。英法代表团不顾形势紧迫，不乘飞机而搭海轮，花了一个星期于8月11日才到达莫斯科。8月12日军事谈判开始。苏军总参谋长提出了一项关于三国共同抗击侵略的联合军事行动方案。具体规定了相互实行军事援助的内容和方式。英法代表团根据本国政府指示，只空谈军事合作的目标和原则，不提具体方案，不愿承担任何具体的军事义务。在苏联代表的一再追问下，英国代表表示英国只能派出5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参加共同抗德作战。在讨论相互援助的方式上，苏联提出苏德之间无共同的边界，苏联要援助英法必须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国土，因此要求英法政府敦促波、罗两国同意苏军过境。对此，英法政府久久不作答复。苏联认为英法在"过境权"问题上的推诿态度以及英德在幕后进行的秘密谈判已证明它们没有同苏联进行有效的军事合作的真诚愿望。因此，对英法的怀疑和不满大为增加，以至丧失了结盟的信心，终于下决心中断同英法的谈判，转而接受德国的要求，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伏罗希洛夫宣布，由于谈判中的基本问题得不到答复，苏联被迫决定无限期地休会。至此，延续5月余的英法苏三国谈判以失败而告终。

英法苏三国谈判的失败主要责任在英法两国。谈判的失败严重恶化了国际局势，瓦解了欧洲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使当时唯一可能制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及时建立起来。希特勒利用此种形势，终于悍然发动了世界大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在极其复杂的背景下缔结的。

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后，苏联的国际环境十分微妙。它既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又存在着难得的转机。一方面，希特勒的侵略矛头指向苏联的近邻波兰，战火即将蔓延到苏联的边境，形势十分严峻。另一方面，1939年春，希特勒德国和张伯伦英国从各自的战略需要出发都有求于苏联，竞相争取苏联。苏联的战略地位有所改善，一改被孤立的窘境，而居于欧洲外交舞台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左右逢源，颇为主动。但其中隐伏着严重的危险，弄得不好，可能中人奸计，引火烧身，卷入冲突的漩涡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审时度势作出了外交决策：从世界总的基本战略格局出发，仍努力争取同英法等国结成同盟，以制止或推迟世界大战；从英法没有完全放弃绥靖政策的现实出发，为了击破祸水东引的阴谋，苏联对德国主动改善两国关系的外交试探不加拒绝，以便一旦与英法结盟不成，仍能在确保自身安全上保留主动的余地。于是在几乎同一时期苏联同英法以及同德国分别进行了双重谈判。

和英法苏三国谈判公开举行、大造声势相反，苏德谈判则是秘密进行，不露声色。由于苏德双方长期相互敌视对立，接触初始，彼此都小心翼翼，不敢迈出大步，而且首先在经济贸易领域中起步。1939年4月17日，苏联驻德大使梅利卡洛夫前往德国外交部会见外交国务秘书威兹萨克时，表示"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几乎没有影响同意大利的关系，它也不应该成为苏德关系的绊脚石"，"对苏联来说，不存在不能和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且由此出发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5月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同

月20日，莫洛托夫接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在谈到两国经济谈判进展不快时强调指出，只有建立"必要的政治基础"，经济合作才能顺利进行。舒伦堡则表示，德国的东欧政策，"压根儿不是针对苏联的"。5月26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向苏联政府明确表示，"德苏之间在外交事务方面并不存在实际的利害冲突"，"德苏两国外交关系缓和与正常化的时候已经到来"。并保证，第一，"向乌克兰扩张的任何企图是同我们的想法完全不相容的"，第二，"德波问题不管怎样解决，我们对俄国的利益将给予尽可能多的考虑" 。由于当时英法苏三国谈判正在进行，苏联对德国发出的和解信号未作出积极反应。苏德两国的接触一度中断。6月以后，情况发生新变化，英德开始进行秘密谈判，6月7日德国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7月，英法苏三国谈判因"间接侵略"问题而遭搁浅。在上述背景下，7月22日，苏联宣布恢复苏德经济谈判，但进展仍不快。7月23日，苏联建议举行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这对已决定8月底进攻波兰的希特勒无疑是严重警告。为避免两线作战，希特勒决心对苏联作出重大让步。此后，苏德谈判加速进行，时有突破性发展。7月26日，德国外交部东欧经济政治司司长、苏德经济谈判的德方代表施努尔奉命向苏联驻德临时代办阿斯塔霍夫和商务代表巴巴林表示"根本不存在威胁苏联的问题"，德国愿让苏联"中立并置身于可能的欧洲冲突之外"，"苏德还可以对相互的利益达成谅解。"阿斯塔霍夫表示苏联关切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安全。7月29日，舒伦堡向苏联政府表示，在波兰问题上，德国准备"保全苏联的一切利益，并同莫斯科达成谅解"，亦"将调整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以尊重苏联在波罗的海的重大利益"。8月2日，里宾特洛甫向阿斯塔霍夫声明，苏德两国在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整个地区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并

建议就签订一份“划分两国利益的议定书”进行谈判。8月12日，阿斯塔霍夫通知德方，同意在莫斯科进行苏德谈判。8月14日，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通知苏联政府，他准备亲自到莫斯科进行会谈。8月17日，苏联政府复照德国，建议首先缔结商业和贷款协定，然后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共同保障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并要求德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以改善日苏关系。8月18日德国表示全部接受苏联的建议，但要求立即接待里宾特洛甫访苏。8月19日，苏德代表在柏林签订了贸易贷款协定。同日，苏联表示同意一周后接待里宾特洛甫访苏，并提交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当时发动侵波战争的日子已临近，谈判不容拖延，心急火燎的希特勒于8月20日亲自致电斯大林，表示愿意接受苏联提出的条约草案，但强烈要求苏联同意至迟于8月23日接待里宾特洛甫。

这时，英法苏军事谈判因“过境权”问题陷入僵局，三国结盟前景渺茫，而德国却表示愿在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下签订协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感到，如果拒绝德国建议，有可能形势发生逆转，既激怒了希特勒，又不能与英法结盟，从而可能跌入绥靖主义者挑动的苏德战争陷阱。如果接受德国建议，从积极方面来说可推迟战争，赢得时间作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从消极来看可瓦解帝国主义可能结成的反苏联合，把祸水推向西方，显然，在苏联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前者是险棋，前途难卜，后者是稳棋，效应立验。权衡得失，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选择了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决策。8月21日，断然宣布英法苏军事谈判无限期休会，并于当晚复电希特勒同意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到莫斯科谈判。8月23日中午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晚上即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

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将对他们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交换情报进行协商。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缔约双方应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条约有效期为10年。根据西方国家公布，条约还附有“秘密附加议定书”，对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界线作了规定：当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属苏联势力范围，德国和苏联在波兰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一线为界。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只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宣布它对该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二次大战全面爆发前夕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苏联是在战火逼近而同英法结盟又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出于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带有某种不得已的因素。苏联利用帝国主义矛盾，消除了一直担心的祸水东引的忧虑，把祸水推回西方，暂时置身于德国与英法等国的战事之外，何尝不是外交上的有限成功。但是，苏联中断与英法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努力以及条约签订后的一些不当措置，模糊了世界政治阵线和主要打击对象，有损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总斗争，也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影响。仅仅1年又10个月后，德国便在横扫西欧后，又掉过头来全力进攻苏联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英法等国以沉重的打击，它不仅使英德勾结、祸水东引的迷梦归于破灭，而且使英法失去抗衡德国的强大同盟者而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希特勒是条约的最大得利者，德国的战略地位因此大为改善，条约破坏了最使希特勒害怕的英法苏反德联盟，排除了最令德国寒心的两线作战的危险。

希特勒在8月22日送里宾特洛甫赴莫斯科后，立即召开军事首脑会议，下令如期实施进攻波兰的“白色计划”，并不无得意地扬言“我已经完成了政治上的准备，底下的路要由军人来走了”。①

第三节　卫国战争前夕的外交行动

东方战线的建立

二次大战全面爆发后，苏联为防止战火东延，巩固西部边境的安全，从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间，用各种方法把国境线向西推进，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构筑了一条所谓“东方战线”的防御带。

建立东方战线的第一步是出兵占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据1921年苏波“里加条约”规定，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1932年签订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重申了这一边界划定。1939年9月17日，波兰政府流亡国外，当天，苏联政府声称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苏波之间缔结的条约已归无效，波兰的局势对苏联的安全已形成威胁，因此苏联不能再保持中立态度，不能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同胞漠不关心，任人摆布。苏联政府命令红军越过边界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9月28日，苏德签订《苏德边界友好条约》，确定大致以寇松线作为苏德两国的“最终国界”。11月1日和2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成立苏维埃政权，并分别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的波兰地区面积为20

① 《纽伦堡审判》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630页。

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300万。

建立东方战线的另一重要行动是与芬兰的领土交涉。从1938年4月起，苏联以加强北方防务需要为由，多次要求获得租借芬兰和在芬兰湾的某些芬兰所属的岛上设防的权利。芬兰政府表示坚持中立政策，拒绝苏联建议，但保证不允许任何外国利用芬兰领土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在苏联的倡议下，1938年12月苏联和芬兰在莫斯科举行秘密谈判。1938年10月，苏联向芬兰提交一份备忘录，指出为了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要求靠近列宁格勒的芬兰边界向北推后20—30公里，并把卡累利阿地峡南部等地区2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割给苏联，苏联将2倍于此的东卡累利阿的地区作为交换。此外还要求每年以800万芬兰马克租借汉科半岛30年，并割让芬兰湾的一些岛屿。芬兰拒绝租借海军基地汉科港，但答应调整边界，割让芬兰湾的一些岛屿。苏联坚持原来要求，两国谈判破裂。11月28日，苏联政府声明，由于芬兰对苏联采取"极端敌视和挑衅态度"，已经走上了直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道路，宣布废止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联宣布断绝两国外交关系，并向芬兰提出最后通牒。11月30日，苏芬爆发战争。12月初芬兰政府要求恢复谈判，遭苏联拒绝。同时国际联盟秘书长邀请苏芬两国派代表到日内瓦讨论两国军事冲突问题，也遭苏联严词拒绝。在英法策动下，国际联盟将苏联开除出国联。当时世界许多国家对芬兰进行各种声援。经过3个多月的激战，苏军取得了军事胜利。1940年3月12日，苏芬在莫斯科签订和约。和约规定将整个曼纳海姆防线地区划给苏联，靠近列宁格勒地区的芬兰国界向北移动150公里，苏联共取得4.1万平方公里土地。此外，芬兰将汉科半岛及附近岛屿租给苏联，为期30年。3月31日，苏联在从芬兰取得的地区成立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

波罗的海东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一直被苏联视为德国进攻苏联的主要通道之一，因此，苏联在建立东方战线时十分重视这三个国家。1939年9月28日，10月5日和10日，苏联先后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了互助条约，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拥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不得损害三国的主权，不改变经济和政治制度。1940年6月，德军大举进攻西欧，法国面临崩溃。苏联决定对立陶宛等国进一步采取行动。6月14日，即德军进入巴黎的当天，苏联对立陶宛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限当天答复。通牒指控立陶宛政府破坏《苏立互助条约》，进行反苏活动，并要求立即法办向苏军挑衅的直接祸首，成立保证履行苏立互助条约政府，允许苏军在立陶宛境内自由通行，在战略要地驻军。立陶宛政府表示接受通牒提出的要求。6月15日苏军占领立陶宛。6月16日，苏联又强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接受了同样的要求。6月17日到21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成立了新政府。7月14日和15日，三国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8月3日到5日三国正式加入苏联。苏联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86万人口。

建立东方战线的最后一次行动是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比萨拉比亚的归属问题自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一直存在争议。1940年6月26日，苏联照会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归还被强行夺去的原苏联领土比萨拉比亚，并以民族成分的共同性为由，要求将布科维那北部移交苏联，作为罗马尼亚占领比萨拉比亚22年的赔偿。次日，罗马尼亚政府委婉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当天，苏联对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4天内，罗马尼亚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撤军。罗马尼亚在向英国、德国、意大利求援无望后，于6月28日复照苏联，答应苏联提出的要求。6月30日，苏军占领了上述两地区，

面积为 5.1 万平方公里，人口 400 万。8 月 2 日，在比萨拉比亚成立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北布科维那并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

苏联通过建立东方战线把西部国界向西推移了150—400公里，它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了防御空间，增加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以迎战姿态向德国作出警告，在卫国战争初期多少也起了一点阻挡作用。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东方战线在战争实践中未取得苏联预期的作用。而且苏联在建立东方战线中表现的大国沙文主义及暴露出来的弱点，在政治上军事上道义上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1940年 6 月法国败降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不断朝有利于法西斯方向逆转。苏联的战略地位严重恶化，企图让德国与英法互相搏斗，苏联能较长时间置身事外进行备战的希望已成泡影，苏联已被推到与德意法西斯国家直接对抗的地位。希特勒在横扫西欧大陆后，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同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1941年春，大量德军东调，对苏战争已箭在弦上，苏联西部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最危险的敌人希特勒德国，苏联急切希望改善苏日关系，稳住日本，以便一旦与德国开战，不致陷入东西两线作战。为此，苏联当时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大力支援中国抗日斗争，依靠中国战场尽可能拖住日本的手脚，使之无力北上进攻苏联。二是利用日本急于南进，要求和苏联搞缓和的心理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

1940年夏，法国、比利时、荷兰相继败亡，大英帝国岌岌可危，一向为英法荷等老牌帝国主义霸占的南洋地区成了防御虚

弱的"真空地带"，日本乘机加快南进步伐，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全力推行"从中国事变走向大东亚战争"的新政策。为了解除南下的后顾之虑，1940年7月成立的第二届近卫内阁，把调整苏日关系，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作为重要的外交方针。

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苏联和日本出自各自的战略需要，终于使自1931年就开始商议的中立条约宣告成功。缔结苏日中立条约谈判是由日方主动提议而展开的。1940年7月2日，日本政府向苏联提交了苏日中立条约的一份草案，并建议就缔结中立条约进行谈判。8月14日，苏联对日本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要求撤销1925年日苏条约规定的日本在北库页岛建立的石油、煤炭租让企业。日本对苏联的意见大为不满，决定暂不举行谈判。10月30日，日本政府又向苏联提交了新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日本要求将中立条约升格为互不侵犯条约，建议将其它一切有关的争议问题放到缔结条约后再协商解决。苏联迅速作出反应，表示必须把解决北库页岛的有关权益问题作为先决条件，而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予明确表态。11月18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提出了苏日中立条约的草案，表示不收复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不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以签订中立条约为好。并再次坚持要求解除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石油和煤炭开采权。日本否定了苏联的要求，并进一步要求购买北库页岛，对此，苏联立即严加拒绝。苏日谈判陷入僵局。

1941年春，日本南下心切，此时日美谈判也已拉开帷幕，从战略考虑，日本决定打开苏日谈判的僵局。1941年2月，日本决定派松冈外相出访德意苏三国，企图借助德意促进苏日关系的改善。3月12日松冈从东京起程。23日抵达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等举行了初步的谈判。3月26日，松冈抵达柏林，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举行了会谈。4月7日松冈一行重返莫斯科。4月7

日到11日，松冈同莫洛托夫举行了3次会谈，双方在北库页岛问题上各不相让，谈判几乎濒于破裂，松冈垂头丧气地准备提前回国。但是形势突然出现转机。4月12日下午5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松冈。经过一番争执后，斯大林作出让步决定，同意暂不签订有关北库页岛权利转让的附属议定书，有关问题留待以后协商解决，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次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字仪式，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政领导全部出席。4月25日，苏日双方宣布中立条约正式生效。苏日中立条约共有4个条款，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缔约的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5年。同时，苏联和日本政府同时发表声明，宣称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双方还交换信件，规定日本应在6个月内撤销在北库页岛的租让企业。

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外交斗争的重大胜利。它巧妙地利用德、日之间和日、美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分化敌人，有助于摆脱东西两线作战的威胁，巩固了东部边境的安全，改善了苏联的战略地位。苏联并未被中立条约束缚自己的手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便和正在同日本交战的英、美、中国等国家结成同盟关系。1943年11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保证，在取得对德战争胜利后，不管苏日中立条约是否逾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苏联政府关于满洲国的声明，违反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款的规定，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感情。1941年4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满洲国是

非法的，中国决不承认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共同声明对中国无效。但是，苏联在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后，并未改变对中国抗战的支援。4月 16 日，莫洛托夫对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说："此约完全与中国无关，对华政策更无改变。"

第十四章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

第一节　战前的准备

斯大林的战备思想

1939年8月23日，苏联虽然与纳粹德国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斯大林和苏联政府都意识到，苏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可惜他们对法国战败投降后德军的进攻方向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特别是当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德国，探明了英德两国并未达成妥协协议之后，更加确信德国在打败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相信，在1943年或者1942年以前，苏德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基于这种估计，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把备战时刻表推迟了，甚至害怕过早地备战会刺激德国，引火烧身。

斯大林希望保持和平，哪怕几年也好，认为这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他认为处于严重军事形势下的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为了避免本身的覆灭，非常希望德国进攻苏联。这使得斯大林对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包括本国情报机关获得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均持怀疑态度。

斯大林的战略思想仍然局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象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还象第一次世界

大战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之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斯大林设想，红军的第一线部队能够在边界地区顶住敌人，然后再把预备队开往前线，增援第一线作战部队，把敌人赶出苏联领土。红军总参谋部判断，战争爆发后，苏军掩护部队能够完成抗击敌人首次突击的任务，为反击部队的集中和展开做好准备。红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相信，德国军队在集中和展开的时间方面将和苏联相当。他们还根据情报作出判断，希特勒统帅部将要在西方和被占领的国家保持50%的陆军和空军。

对于德军的战略主攻方向，斯大林认为最危险的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1941年春修订作战计划时，斯大林和红军总参谋部认为：希特勒德国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河流域，以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①

斯大林和红军总参谋部还把战争取胜的希望，寄托在进攻战上，相信只有进攻才能粉碎侵略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于其他作战方案，如遭遇战、不得已的退却行动、被合围时的战斗等，都没有作认真的研究。1940年12月，红军在斯大林主持下举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作为战略情况基础而假设的事件是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结果是进攻的兰方取胜，防守的红方失败。红军平时训练也是重进攻、轻防御。

由于斯大林的威望，以及已经形成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红军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中，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当然，斯大林的战略思想

① 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上，第368页，1972年三联书店出版。

和各种论断并非毫无现实根据，问题在于他的战略思想陈旧，排斥了 20、30 年代突起的机动武器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德国进攻波兰、进攻法国、席卷西欧的战争，已经显示了闪击战的威势，而斯大林却缺乏敏锐的战略头脑，没有估计到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闪击战的计划。对于德军一下子就把预先展开在各重要战略方向上的全部兵力，投入大规模的突然进攻；对于德军集中这么多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第一天就以强大而密集的部署投到各个战略方向上，实施毁灭性的分割突击，无论是斯大林、红军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几乎全没有思想准备。

斯大林对德军战略主攻方向的估计也不正确。1941年6月，德国统帅部正是在苏联西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战争爆发后，苏联不得不把原先集结在乌克兰的一部分军队转移到西部方向，使得几十万军队处于在行进间投入交战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对德军兵力部署的估计也不正确。德国发动对苏突然袭击时，德国统帅部留在西方的兵力，不到总兵力的1/3，而且还是一些次等部队。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和红军总参谋部还提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必须使物质技术器材更加靠近部队、靠近使用者。一般说来，这种思想是正确的，可是，他们没有重视闪击战、快速分割突击战略所带来的种种新问题，让德军在战争开始后，很快就夺取了苏军第一线器材储备品，给自己的军队供应和组建预备部队平添了很大困难。

应付战争的物质准备

苏联自从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脉搏跳动得更急促了。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一些大工厂，转为生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新的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工生产。斯

大林亲自部署国防工业生产。他经常同几十个国防工厂的经理、党委书记和总工程师见面，并以他固有的严峻精神要求他们完成预定的计划。1939年军事拨款占国家预算的25.6%，1941年占43.4%。

苏联加速在东部地区发展重工业，建立机器制造业、石油加工工业和化学工业等部门的第二套企业方针。东部地区建设的高炉占全部新建高炉的3/4。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之间建立了第二个石油工业基地。在外贝加尔、乌拉尔和远东黑龙江苏联一侧地区，建立了新的冶金工厂。在中亚细亚建立了大型有色金属冶炼厂。远东地区建立了新的汽车装配厂、制铝联合厂、轧管厂和水电站。为了保证一旦战争爆发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使国民经济在转换过程中能保证军需供给，苏联政府有计划地增加战前物资储备。从1940年到1941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国家物资储备总值从40亿卢布增加到76亿卢布。物资储备包括生产设备、燃料、原材料、动力装备、各种金属、粮食，等等。

在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延长了劳动者的工作日。1940年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改行每天工作8小时、实行7日工作周和禁止企业、机关职工任意旷工的命令》，《关于工业企业应对生产劣质产品和不遵守标准规格负责的命令》。这两项命令的执行，取消了劳动者的休息日，并以法律措施来巩固劳动纪律，加强责任心和维持秩序。

国家机关和工业领导部门也进行了调整：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划分成航空工业、造船工业、弹药、军械等4个人民委员部；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划分成重型机器制造、中型机器制造、通用机器制造等3个人民委员部；增设了汽车运输、建筑工程等与国防有直接关系的新人民委员部。进行这些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在与日俱增的战争威胁下，作好突变的准备。

1939年9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新兵役法，应征年龄从原来的21岁降为19岁，中学毕业生的服役年龄为18岁。服役期限也相应延长，陆、空军的初级指挥人员由2年延为3年，空军士兵、边防部队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延为4年，海军部队和舰艇人员延为5年。根据实行《普遍义务兵役法》的需要，在各自治共和国、各州、各边区增设了军事人民委员部。实行新兵役法后，苏联武装部队人数从1939年1月1日的194万增加到1941年1月1日的420多万，在这期间新建了125个师。1941年3月底，经斯大林批准，征召50万预备役士兵和军士，派往边境地区，补充步兵师。4月，步兵部队实行战时编制，要求每个步兵师配置14500人、相当数量的重武器和机动武器，使一个满员的步兵师能成为有足够机动能力的独立作战兵团。可惜这个计划来不及贯彻到各步兵部队，战争就爆发了。

1940年6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和红军总参谋部决定重新组建机械化军、坦克师和摩托化师。这年，新建了9个机械化军。（苏联机械化部队的组建走了一段"之"字形的路。1929年7月，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决议，在莫斯科军区组建第一个试验性机械化团，1930年5月扩编为机械化旅。1934年，红军已组建了4个机械化军。1938年8月，机械化军被撤销）。1941年2月，红军总参谋部提出扩建20个机械化军，并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为了装备新组建的机械化军，需要3.2万辆坦克，包括16600辆新式坦克，这至少需要4—5年时间。可是，到战争爆发时，红军所能装备起来的机械化军还不足计划编组的一半。

苏联还在西部边境地区加紧修筑工事和飞机场。随着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红军总参谋部以野营训练为名，1941年春夏，接连从内地抽调5个集团军、1个步兵军，增强西部边境的防御

力量。可惜多数部队尚未到达指定地域，战争就爆发了。

1941年6月，苏联在西部边境地区共有5个军区，自北至南分别为：列宁格勒军区、辖第14、7、23集团军，共21个师又一个旅；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辖第8、11、27集团军，共25个师又1个旅；西部特别军区，辖第3、4、10、13集团军，共44个师；基辅特别军区，辖第5、6、12、26集团军，共58个师；敖德萨军区，辖第9集团军、第9独立步兵军，共22个师。苏联防御的重点放在基辅特别军区。加上红海军，西部的兵力共有170个师又2个旅，近290万人、1540架飞机、1800辆坦克。

应当说，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于战争是有认真准备的。可惜，由于斯大林、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和红军总参谋部在战略决策上和战争可能发生的时间判断上的失误，湮灭了这些物质准备在战争爆发后应起的实际效能。西部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的主力分别配置在比亚威斯托克和利沃夫两个突出部上，苏军准备在德军发起进攻后，便向其侧后实施反突击，将战争推到国境线以外。其实，这样的部署是重大的失误，因为一旦两翼掩护部队被突破，主力将遭被合围而陷于绝境。不幸，以后战争的实际进程正是这样。苏军在西部战线，1/3的兵力部署在离国境线8—20公里的地方，其余兵力部署在离国境线80—400公里的地方，这是按斯大林的战略思想所作的兵力部署。由于缺乏纵深次第配置，战争爆发后，完全抵挡不住德军的密集分割突击。

第二节　卫国战争初期的严峻局势

战争的爆发

纳粹德国在灭亡了法国之后，就着手准备对苏战争。1940

年7月21日，希特勒要求德军总司令着手拟订对苏作战计划。12月5日，希特勒主持德军总参谋部会议，审订对苏作战计划。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了对苏作战的第21号命令，定名为“巴巴罗萨计划”①。“巴巴罗萨计划”总结了德军自全面发动战争以来实施“闪击战”的经验，决定分北、中、南三路向苏联腹地实施高速度、大纵深的果敢突击，聚歼苏军主力于苏联西部地区。战役的最终目的是在1941年入冬前占领列宁格勒、莫斯科、顿巴斯，推进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一线，以便德国空军在必要时能够摧毁苏联最后的乌拉尔工业区。

为了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德国从各方面作了积极准备。军费猛增，武装部队总人数达到850万，坦克5639辆，飞机1万余架。从1941年5月25日开始，德国统帅部急速向东部大规模运兵。到6月中旬，已有47个师，其中包括28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运到苏德边境，并于21日展开完毕。为了巩固南北侧翼，1941年春，德军开进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并派兵在芬兰的土库港登陆。5月，德国与芬兰制定“蓝色北极狐”计划，胁迫芬兰参加未来的对苏作战。至此，沿苏联西部国境线，德国加上其仆从国家，共部署了190个师，550万官兵，3712辆坦克，4950架飞机，47260门火炮。1941年上半年，德国飞机324次侵犯苏联领空，进行侦察活动。

德军的进攻部队分为3个集团军群：由勒勃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辖第16、第18集团军、坦克第4集群，共29个师，由第1航空队1070架飞机支援，任务是从东普鲁士出发，进攻列宁格勒；由包克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作为进攻的主力，辖第

① “巴巴罗萨”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1123—1190)的绰号“红胡子”的音译。腓特烈一世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希特勒起此名是想给侵苏战争染上“圣战”的色彩。

4、第9集团军、坦克第2、坦克第3集群，共50个师又2个旅，由第2航空队1600架飞机支援，其任务是由华沙地区出发，经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进攻莫斯科；由龙德斯泰特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辖第6、第17、第11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匈牙利快速军，坦克第1集群，共57个师又13个旅，由第4航空队和罗马尼亚空军共1300架飞机支援，任务是由卢布林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出发，经日托米尔进攻基辅，进而向顿巴斯推进。

为了掩盖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战役准备工作，希特勒指示德军总参谋部情报处和反间谍处，有意散布种种流言，策划假情报，以造成德国要继续实施"海狮作战计划"的假象。如大量印发英国地图；军队中配备英语翻译；在英吉利海峡沿岸集结许多渡海船只；海岸上配置假火箭；甚至散布"大规模军队东调是为了隐蔽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而采取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佯动"，等等。

德国即将大规模入侵苏联的种种迹象，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是一无所闻。当时，西方国家政府和苏联情报部门不断地将这类确凿消息报送斯大林。1941年3月20日，苏军情报部长戈里科夫将军报送斯大林的情报，实际上就是"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内容。4月底，丘吉尔写信给斯大林，以准确的事实提请注意德军的行动方向。5月6日，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呈报斯大林，说据可靠情报，德军将于5月14日大举进攻苏联。可是，斯大林固执地认为，德国在结束对英作战之前不会进攻苏联。他把所获得的这些情报，看作是西方国家在用苏联人吓唬德国人，用德国人吓唬苏联人，唆使苏联和德国互相敌对，因而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斯大林的这种情绪自然影响到他周围的人及下属，连报送情报的人都要在报告上拖个尾巴，说情报可能是西方国家有意制造的谣传。斯大林希望尽量延长和平时

间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因此而形成一种偏见，并以这种偏见来指导苏联的临战部署，结果导致苏联为此而付出无谓的惨痛牺牲，不能不说是沉痛的教训。

6月13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红军总参谋长朱可夫，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和危急的形势，要求斯大林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斯大林仍旧害怕这会刺激德国提前发动战争，犹豫不决，以至延误了最后的时间。6月 21 日晚，基辅特别军区报告：已有 2 名德军投奔苏军，带来了德军正在进入出发地域，将于 22 日 4 时发动进攻的情报。至此，斯大林才同意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等到苏军总参谋部于 6 月 22 日零时 30 分下达命令完毕，为时已太晚了。

1941年 6 月 22 日凌晨 4 时，德军在经过飞机猛烈轰炸、炮火准备之后，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之间宽约 1500 公里的正面上，发起全线进攻。1小时后，德国才向苏联宣战。芬兰和罗马尼亚军队随同德军入侵苏联，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也跟着对苏宣战，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战争开始后的几小时内，800 多架苏联飞机被摧毁在机场上。第一天，苏军各边境军区共损失飞机 1200 多架，这使得德军暂时掌握了制空权。德军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步兵象潮涌般地冲向苏联各边防哨所和居民点。苏军在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储备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手中。苏联军人虽然拚死奋战，但是无法阻挡德军的推进。

战争初期的严重局势

战争爆发后，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改组为西北方面军，西部特别军区改组为西方方面军，基辅特别军区改组为西南方面

军，敖德萨军区编为第9集团军，列宁格勒军区改组为北方方面军。另外组建南方方面军，在普鲁特河一线展开。

苏联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领导全国军民投入反对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卫国战争。6月22日中午，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受党和政府的委托，发表广播演说，号召苏联军民把入侵的德军赶出苏联领土。23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成立了统帅部，负责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29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指示前线各州把全部工作转入战争轨道，撤退时将所有无法运走的财物销毁，在敌占区成立游击队和破坏小组，开展全民游击战争。30日，成立了以斯大林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这是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国防机构，民政组织，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都必须执行国防委员会的所有决定和命令。

7月3日，斯大林发表广播演说。斯大林告诉人民：不要相信"德国军队无敌"之类的吹嘘，也不要埋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要正视苏联所面临的危险程度，把全国的一切转入战争轨道，"为保卫祖国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①。斯大林的演说，没有豪言壮语，却体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进一步向人民发出紧急动员，给处于慌乱中的全国军民以指导。7月19日，为了指挥战争的需要，斯大林兼任国防人民委员。8月8日，斯大林亲自担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统帅部也相应地改名为最高统帅部。

战争初期，德军的推进十分迅速。德军进攻的主力中央集团军群分北、南两路，分别从东普鲁士的苏瓦乌基地区和布列斯特地区出发，向苏军实施大纵深两翼钳形突击。6月28日，德军在明斯克完成合围，苏军43个师又3个旅被围歼于明斯克、比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267页。

亚威斯托克地域。7月1日，西方方面军除政治委员之外，自司令员帕伏洛夫大将以下的主要指挥员，都被送交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铁木辛哥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帕伏洛夫指挥西方方面军前后一个星期，在战役指挥上他当然要对苏军的惨败负有相当责任，但是在那样的态势下，纵然是子牙再世，也无回天之术。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在取得明斯克合围胜利后，立即扑向斯摩棱斯克。7月16日，南路德军第2坦克集群攻进了斯摩棱斯克，北翼的第3坦克集群也急速向斯摩棱斯克楔入，使50万苏军陷入被包围的危境。苏军最高统帅部从预备队方面军急调20个步兵师，加强西方方面军。7月下旬，开始了斯摩棱斯克会战。铁木辛哥指挥下的西方方面军拚命奋战，使得包围圈中的第16、第20集团军，得以突出重围，苏军终于顶住了中路德军的攻势。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德军损失官兵25万。7月30日，德军统帅部下令中央集团军群转入防御。苏军在维利基卢基、亚尔策沃、克里切夫、日洛宾一线巩固下来。

德军北方集团军群于7月12日沿列宁格勒公路向卢加挺进，从金吉谢朴、伊万诺夫斯卡亚地区突破苏军防线，向列宁格勒进击。沿线苏军顽强狙击，使德军进攻多次受阻。8月29日，德军终于攻入列宁格勒以东20公里的筑垒区。9月8日，德军又攻占拉多加湖畔的什利谢利堡。这样，列宁格勒就陷入德军的地面包围，仅拉多加湖水域维持着对外联系。列宁格勒军民开始了坚持500天的保卫战。对这座孤城，德军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从利沃夫突击部出发向基辅方向突击。由于苏军的防御重点在西南方，德军的进攻在基辅筑垒地域遇到顽强抵抗而受阻。斯大林也当面命令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

波诺斯上将："采取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措施保卫基辅。……在两周之内您必须不惜一切守住基辅。"① 德军在基辅接近地的进攻受阻，于是转向南方，从基辅的南侧迂回向东，向西南方面军的侧翼伸展。此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多次不愿将苏军基辅集团撤回德涅伯河东岸，而坚持防守基辅。结果，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坦克集群南下突击，9月14日和南方集团军群在基辅以东200公里处完成合围。9月19日，基辅陷落。被围苏军拚杀至9月26日，基尔波诺斯上将战死，苏军被围歼60—70万。

战争的头5个月，苏军损失惨重，局势极为险恶。截至1941年11月，德军深入苏联腹地850—1200公里，占领了150多万平方公里苏联领土。在那里，战前居住着7450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工农业产值几乎占全国总产值的2/3；铁路长度44200公里，占全国铁路网总里程数的41%。在军事上，截至1941年12月1日，苏军损失700万人以上，坦克2.4万辆，飞机1.6万架。

德军虽然取得了如此的胜利，但是远没有完成"巴巴罗萨计划"的战略目标，德军人员损失也超过80万，"闪击战"没有奏效。苏军的主力还保存着，并且迅速得到补充。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坚定地领导全国军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潜力正在迅速地发挥出来。

国民经济战时体制的建立

战争的头5个月，苏联在经济上也损失惨重。从1941年6月至11月，整个工业产量缩减了52.4%。1941年12月，熔铁量比6月份减少75%，钢产量减少64.3%，黑色金属轧材减少66.7%，滚珠轴承减少95.2%。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不仅是

① 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上，第512页。

军事力的较量，更是经济力的较量。要赢得现代战争的胜利，必须保证战争物资的供应，组织协调的战时经济体制。在这方面，苏联党和政府进行了有力的工作，及时地、彻底地把国民经济转入军事轨道，建立协调而迅速发展的战时经济，以保证战争的需要。

军事工业是整个战时经济的中心，按照军事工业各部门生产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形成了整个战时经济结构，苏联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第一、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军事轨道，有计划地将工业转为生产军用品，为前线提供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

战争爆发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动员各种力量，采用各种办法，将工厂、甚至整个工业部门，从即将被德军占领，以及遭受德军侵略威胁的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1941年6月24日，成立了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什维尔尼克为首的疏散委员会，具体领导搬迁工作。6月30日，又成立了劳动力登记和分配委员会，直接安排被疏散企业的布局和保证尽速投入生产。从7月至11月，共有1523个工厂企业转移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从战争爆发到1942年2月，经铁路运送的搬迁企业设备就有150万车皮，1千多万人随同转移。

各级地方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及社会团体的重要任务，是安置好转移来的工厂企业尽快投入生产，接待疏散来的居民。由于全国各级都为同一个任务而行动，疏散的企业很快就在新址组织生产。当乌拉尔进入严冬季节，在尚未盖上屋顶的厂房里已开始制造坦克了。1941年11月，第一批带有基洛夫工厂商标的重型坦克已开赴前线。

党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对建立和发展苏联战时经济实

行全局性的集中领导。几乎3/4的中央委员和1/2的中央候补委员，都作为国防委员会的特派全权代表，参加组织战时经济工作。至于国防委员会在各地方的全权代表，通常由各州、民族州、边区党委员会的书记兼任。各州、民族州、边区党委会都新设国防工业专业部，直接负责本地区的国防工业生产与建设。这样，党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和计划，直接落实为基层单位的任务，转化为工厂企业的生产计划。在卫国战争期间，全国共生产了49万门大炮、10.4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3.7万架飞机，对卫国战争的胜利，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第二、对物力、财力和劳力进行大调整，以利于战时经济的发展。

战争初期，在工厂企业东移、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军工企业、发电站、燃料、冶金、化学工业企业，被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突击工程项目。国家规定，除以上企业工程项目外，所有战前已动工的工程一律停止，腾出资金用于施建突击工程项目。所有新建工程和现有企业的空余建筑物、非生产性建筑物（仓库、剧院、部分商店），用于安置疏散企业。在基本建设的物资方面，国家也作了根本性的调整。卫国战争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79.08亿卢布，其中甲类重工业部门为73.80亿卢布，占93.32%；乙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为5.28亿卢布，占6.68%。

战争爆发后，国民经济部门职工人数从1940年的3120万减少到1942年的1840万。为了保证国防和军事工业生产不断增加，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力进行了再分配。1941年下半年，有12.8万职工从食品工业和轻工企业转入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部门。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再分配是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进行。战争期间，国家有计划地将30万男女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劳动中去。

粮食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物质保证。战争开始后，大批农村青壮年应征入伍，劳动力锐减。1942年，后方地区集体农庄中的成年男子有530万补充红军部队，2/3的集体农庄主席应征奔赴前线。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不致因劳动力的不足而减产，1942年4月13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规定：战争期间，有劳动能力的庄员每年必须完成的劳动定额，产棉区为150个劳动日，产粮区和畜牧区为100—120个劳动日。在农忙期间，各级苏维埃都动员城市居民下乡义务参加田间劳动。

第三、对运输业实行军事改组，一切服从前线的需要。

战争爆发后，交通运输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燃料供应恶化。所有这些，给运输业造成极大困难。在现代战争中，交通运输是战争机体运转的动脉。对交通运输实行军事改组，以保证战争的需要，苏联党和政府将此项工作当作建立国民经济战时体制的大事来抓。

战争一爆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指示各类运输都转入战时状态。从1941年6月24日起，铁路运输业按特别的战时运行图工作。1942年2月，建立了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的运输委员会，直接领导运输量的计划和调整，运输工作的协调，以及物质技术的供应工作。1943年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全体铁路员工为动员入伍人员，执行新的铁路员工纪律条例，使铁路运输完全服从军事需要。接着，海上与内河运输业也执行类似的条例。

苏联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以及高度集中统一的、实行指令性计划的斯大林体制，在使国民经济转入战争轨道、建立战争体制方面，显示了它的长处。庞大的国民经济战争体制，大约经过一年时间就比较协调地运转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也面临从西部边境地区向东部疏散工业企业的问题。当

时，从企业开始拆迁，到在新址开始生产，差不多耗时两年。当德军占领了西部地区后，那里还留着几百家大型工厂。

德国法西斯完全低估了苏联在使国民经济转入战争状态方面的巨大潜力，满以为在苏联战争体制没有形成以前，就能彻底打败苏联，摧毁苏联的工业。德国法西斯失算了。

第三节 卫国战争的胜利

莫斯科会战

德军统帅部因没有实现"巴巴罗萨计划"的战略目标，显得焦躁不安。经过短暂的调整，1941年9月6日，希特勒发布第35号指令，命令以中央集团军群为主，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一部分部队配合，实施"台风"作战计划。德国统帅部集中了80个师，包括14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占投入苏德战场上的1/3以上步兵，近2/3的坦克和摩托化师，在莫斯科方向上发动集中突击。德军的战役意图是消灭苏西方方面军，占领莫斯科，进而迫使苏联投降。于是，从1941年9月30日至1942年4月20日，苏、德军队展开了莫斯科会战，战役的胜败对双方来说都非同一般。

担任莫斯科防御的苏军主力部队是科涅夫上将指挥的西方方面军，此外还有布琼尼元帅指挥的预备队方面军和叶廖缅科中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苏军的总兵力约80万人、782辆坦克、6808门火炮、545架飞机，兵力比当面德军少1/4、坦克少1.2倍、火炮少1.1倍、飞机少70%。莫斯科会战按苏军的行动性质，分为防御、反攻和总攻三个阶段。

1941年9月30日至12月5日为苏军防御阶段。9月30日，

德军在南路首先向茹科夫卡至朔斯特卡地段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发起攻击。10月2日，德军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实施猛烈突击。德军的战术方案仍然是钳形突击。当时苏军错误地判断了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兵力使用失当。战斗激烈以后，苏军行动迟缓，加上缺乏必要的预备队，无法堵截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防线被德军突破。10月6日，西方方面军的第19、20集团军和鲍尔金集群，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32集团军，共60万人，被合围在维亚兹马地区。

10月6日，斯大林召回在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战斗的朱可夫，10月10日，任命朱可夫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被合围在维亚兹马地区的苏军几次突围失败，于10日前后覆没。10月13日，德军离莫斯科已不到100公里，通往莫斯科的所有重要方向上，都开始了激烈的战斗。10月16日，苏联政府和各国驻苏外交使团都迁往古比雪夫，各高等学校、科研机关、重要工厂也紧急向东疏散。

联共(布)中央、苏联国防委员会和斯大林均留在莫斯科。国防委员会决定，从10月20日起，莫斯科实行特别戒严。苏联全国、全世界都注视着莫斯科。在保卫莫斯科的决定性日子里，在战局最险恶的时刻，斯大林和苏联军民决死保卫莫斯科。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告军队书："同志们！在我国面临危险的严酷时刻，每一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发扬英勇顽强、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莫斯科的道路。"

斯大林决定在十月革命节照常举行庆祝大会和阅兵式。11月6日，在马雅可夫斯基地下铁道车站举行十月革命24周年庆祝集会。11月7日，在红场举行传统的阅兵式，斯大林发表了演

说，受检阅部队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留在莫斯科的青壮年，组成12个民兵师，每天劳动12个小时以上，劳动之余还紧张地军事训练。50万市民在莫斯科接近地挖掘战壕和反坦克壕。西方方面军在十几天里补充了10万名官兵、300辆坦克、2000门火炮。

11月15日，德军再次向莫斯科发动进攻。16—18日，德军不顾一切、不惜任何代价，用坦克在先头开路，企图冲进莫斯科。先头部队进抵离莫斯科20公里的地方，指挥官从望远镜里已经看到克里姆林宫顶端的红星了。希特勒命令德国报纸空出头版重要版面，以便刊登攻占莫斯科的消息。斯大林打电话问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朱可夫回答："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斯大林说："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2个集团军从预备队中调集，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① 苏军英勇抗击，迫使德军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

1941年12月5日至1942年1月7日为苏军反攻阶段。11月初，苏军统帅部在后方组建了10个预备队集团军。经过部署，11月5日、6日，加里宁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先后转入进攻，粉碎了包围莫斯科的德军突击集团，将德军向西击退100—250公里，重创德军38个师。德军的"台风"作战计划失败了。希特勒暴跳如雷，将陆军司令布劳希契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包克元帅、坦克第2集群司令古德里安上将和其他十几名将军统统撤职，由他自任陆军总司令，企图挽回战场上的颓势。1942年1月3日，希特勒给前线的命令说："要死守住每一个居民地，绝不许后退一步，要一直防守到最后一颗子弹和最后一枚手

① 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上，第593—594页。

榴弹，这就是当前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但是，无论希特勒怎样咆哮，德军在莫斯科城郊的溃退已不可避免了。

1942年1月8日至4月20日为苏军总攻阶段。1月5日，斯大林主持最高统帅部会议，制定了总攻计划，向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主要突击。斯大林计划总攻的战役目标是消灭列宁格勒附近、莫斯科以西和苏联西南部地区的德军，消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显然，这个总攻战役目标低估了德军尚拥有的作战能力，忽视了苏军的兵力、兵器不足，雄心太大，犯了急性病。沃兹涅辛斯基比较实事求是地在会上承认，还没有掌握足以保障各个方面军同时进攻用的物资。经过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虽然未能歼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苏军毕竟将德军从莫斯科向西击退了150—300公里，使德军共损失兵员50多万、坦克1300辆、火炮2500门、汽车15000辆。德军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遭到惨重失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当天，美、英对日宣战。接着，荷兰、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哥斯达黎加、古巴、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等国，相继对日、德、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更扩大了。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加、澳、印度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一致同意不和德、日、意单独媾和或签订停战协定。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形成。形势对法西斯国家越来越不利。

1942年春末，苏德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寂，双方都转入防御。苏军统帅部、总参谋部对战争进行了总结，探讨苏军自开战以来的失败和成功，研究德军的军事战略、强点和弱点。全国顺利地将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苏军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新式坦克、飞机、火炮、火箭炮和弹药的补充。后方正在组建新的诸

兵种战略预备队，组建由新式技术兵器装备的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苏军的作战兵力达到550万、坦克 4065 辆、火炮43642门、飞机 3164 架。

1942年 5 月，德国和其仆从国在苏德战场上的总兵力仍然有 217 个师又 20 个旅、600余万人(其中仆从军81万)、3230辆坦克、43000 门火炮、3400 架飞机。德军坦克在数量上虽处劣势，但在质量上仍占优势。希特勒决定趁欧洲尚未开辟第二战场的有利时机，再次对苏联发动进攻。希特勒计划在莫斯科方向上实施局部进攻战役，以改善德军的战役态势，并吸引苏军统帅部对南方战略方向的注意力，而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南方。

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2年 4 月 5 日，希特勒发布第41号训令，集中兵力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抢夺苏联富足的工农业区，进而沿伏尔加河北上，西向迂回莫斯科。为此，德军在南部方向集中了 97 个师、90万人、1200辆坦克、1640架飞机，和苏军展开了斯大林格勒争夺战。斯大林格勒战役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持续到1943年2月2日。在 200 个日日夜夜里，按苏军的行动性质，分为两个阶段。

1942年7月17日至11月18日的4个月是苏军防御阶段。

1942年 7 月 17 日，德军首先在契尔河一线发起进攻。经过一个月的艰苦防御战，苏军被迫退守斯大林格勒外层围廓。8月19日，德军第 6 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群共 16 个师，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群，对斯大林格勒实施向心突击。8月25 日，苏军宣布斯大林格勒实行特别戒严，作好城市巷战的种种准备。德军统帅部在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投入地面进攻的同时，还把整个第4航空队投入战斗，出动飞机 2000 多架次，把斯大林格勒埋入火海，到处是炸弹爆炸和建筑物崩塌的轰隆声。全城自来水管道

被炸裂，供电设备也遭破坏。

由斯大林格勒州委、市委书记丘亚诺夫领导的城防委员会，组织全市人民与军队并肩投入城市保卫战。1万多民兵直接参加战斗，留下的市民在火海硝烟中，在残垣断壁的车间内，每天劳动 14—18 小时，坚持修理坦克、制造武器弹药。整个斯大林格勒，已分不清前线和后方、军人与百姓了。

9月13日，德军第 6 集团军 17 万人向市区发动猛烈攻击，苏军将第62、第 64 集团军 8 个齐装满员的师投入城市保卫战。14日，德军 4 个师攻进了马马也夫高地和 1 号火车站，把市区的苏军分割成 3 块。于是，双方在市区内开始逐条街道、逐个工厂、逐幢建筑物的反复争夺，往往几易其手，战斗之惨烈，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苏军在劣势情况下绝不后退，终于守住了这座英雄城市。11月，草原上的寒风刮起来了，穿着夏装的德军仍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泥尘中翻滚。

苏军最高统帅部抓住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与德军鏖战的时机，向战线两翼隐蔽地调集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共14个集团军、110.6 万人、1463 辆坦克、1350 架作战飞机，捕捉有利战机，围歼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主力。

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 2 月 2 日为苏军反攻阶段。11月19日拂晓，苏军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首先突破了城西北的德军防线，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转入反攻。翌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突破城南的德军防线，转入进攻。经过4天激战，南、北两路苏军于 11 月 23 日在苏维埃农庄地域完成合围，包围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群的一部分，共 22 个师、33 万人。11 月底，苏军先对被围德军展开攻击，将其压缩到东西30—40公里、南北70—80公里的地域里。

德军统帅部为了救援被困德军，从苏德战场的其他地域调

集部队，组建成由曼施泰因元帅指挥的顿河集团军群，向斯大林格勒方面突击。曼施泰因的部队不顾伤亡地向斯大林格勒突进，11月23日，推进到离斯大林格勒40公里的地方。苏军最高统帅部一面命令围敌部队巩固合围圈的对外正面，一面调集部队猛攻曼施泰因部队的侧后，迫使曼施泰因调转突击方向，对付翼侧和后方的苏军，挫败了德军的突围计划。在被围德军拒绝投降后，1943年1月10日和22日，苏军两次向合围圈内的德军发起歼击战。至2月2日，战斗全部结束，全歼被围德军，生俘第6集团军司令官鲍罗斯元帅以下24名将军。

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区总共损失150万人、3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3000架飞机。在此期间，1943年1月，苏军在北方粉碎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歼灭列宁格勒近郊的德军，被困500天的列宁格勒解围了。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失败，以及兵力和兵器的损失，严重地削弱了德军的力量，彻底动摇了它的整个战争机器，迫使它在主要进攻方向上转入战略防御。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是建立在进攻战略上面的，一旦转入战略防御，其失败的命运就不可挽救了。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胜利，鼓舞了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各国人民，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在法西斯阵营内部，也由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惨败而动摇。1943年2月，希特勒正式宣布在全国为阵亡将士举行哀悼，丧钟使法西斯内部惊惶失措。日本和土耳其被迫放弃了对苏作战计划；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对德国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想退出法西斯轴心集团，探求向盟国投降的条件。在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则出现了倒希特勒的运动。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不

仅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协调对法西斯国家的作战行动商讨世界在战后的安排问题，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曾举行了三次国际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是战争尚在欧洲战场进行中举行的。

经过1943年夏季反攻后，1943年11月6日，苏军已解放了基辅等162座城市，把战线向西推进了400—450公里，在苏德战场上，苏军已取得了明显的战略优势。1943年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并于10月13日宣布退出法西斯集团，并对德宣战。为了商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战后处置德国的方案，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大体上达成了协议：

1. 三国政府经过交涉，美、英政府同意于1944年5月在法国南部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2. 三国政府同意分割德国，美、英政府主张"分而治之"，苏联主张分割占领，究竟如何实施待日后进一步具体研究；

3. 苏联政府同意在欧洲战事结束后的半年左右对日宣战；

4. 三国政府同意战后要重建独立的波兰，波兰领土大体上在奥德河线与"寇松线"之间；

5. 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

会议期间，三国首脑之间互相有交易、有分歧、有矛盾。苏联要求将哥尼斯堡（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划归苏联版图，归还整个库页岛，并获得千岛群岛，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等要求，并未得到美、英政府的明确承诺；英国要求苏联承认波兰流亡政

府，苏联也没有明确表示接受。会上，美、英政府对苏联作了更多的让步。12月1日，三国政府发表了《德黑兰宣言》，表示无论是战时或在战争结束以后，都将共同协作。

1944年，苏军连续发动10次打击，共歼敌160万人，基本上收复了苏联国土。

1944年6月5日，盟军动员288万人、900余艘各类舰艇、13700架飞机，实施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作战。到冬天，盟军将战线推进到德国西部边境。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日军也连遭惨重失败，已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战争已到最后围歼德、日法西斯的阶段了。

1945年2月4—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战时第二次三国政府首脑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了处置德国问题。三国政府同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由于丘吉尔的一再坚持，苏、美政府也同意，由苏、美、英三国分区占领扩大为吸收法国参加的四国分区占领。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原则上同意按战胜国贡献的大小和损失的多少进行分配，具体数额由日后的三国赔偿委员会进一步协商。

波兰问题是会议激烈争论的问题。领土问题基本上承认德黑兰会议已达成的协议。在未来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斯大林坚持要由得到苏联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执政；美、英则打算让长期在伦敦活动的波兰流亡政府回国执政。经过僵持和争论，美、英政府作了让步。三国同意，波兰临时政府要容纳国内外民主领袖，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自由选举。对于波兰的前途，美、英政府是鞭长莫及。

关于对日作战问题，苏联政府再次肯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3个月内，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是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

东铁路、南满铁路由苏、中联合经营，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联合国组织和托管制问题。

雅尔塔会议表明，大国之间虽就战后世界的安排达成某些协议和谅解，但它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已越来越趋于明朗。

德国无条件投降和卫国战争的胜利结束

1945年1月，苏军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彼得罗夫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特里布茨海军上将指挥的波罗的海舰队，分南北两路发起进攻，并于4月相继攻占东普鲁士的最大要塞哥尼斯堡、西里西亚工业区，以及奥地利，打开了冲击柏林的道路。西线盟军也于1945年4月1日包围了鲁尔地区的德军18个师、32.5万人，并立即组织突击力量，继续向东推进，想与苏军一起攻击柏林。

1945年4月25日，苏军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同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易北河上与美军第1集团军会师。

德军在柏林地域尚有100万兵力、10400门火炮、1500辆坦克、3300架作战飞机，还不包括市内的20万守备部队。全城到处张贴希特勒的命令："凡建议削弱抵抗者或仅表示同意者均为叛徒，应立即枪决或绞死。"德军统帅部将900平方公里的大柏林区按其所辖范围划分成8个防御地区。另外再设9个特别防御地区，负责掩护政府各办公大楼、帝国办公厅、秘密警察总部和国会大厦所在的柏林市中心区。

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共250万人，实施柏林战役，使用42000

门大炮、6250辆坦克、7500架飞机。在德军统帅部拒绝了关于投降的最后通牒后，苏军展开了突击柏林的战斗。27日，苏军突入市中心区。28日，希特勒眼看末日已到，即口授政治遗嘱：号召全体德国人"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和国际犹太人"；指定海军上将邓尼茨担任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担任总理。30日，希特勒在帝国办公厅的地下室大本营中开枪自杀。

苏军攻击柏林战斗的最后时刻到了。4月30日下午，苏军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79军的部队，经过激烈争夺之后，终于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5月2日，柏林的残敌投降。5月7日，德军元帅约德尔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签署德国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书。为了表明德军向盟国投降，在苏联政府的坚决要求下，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在柏林近郊卡尔斯霍斯特向苏、美、英、法4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文件。苏德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以苏联和盟国的胜利而结束。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会议后期为新任首相艾德礼），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第3次战时盟国首脑会议，讨论了占领德国的基本原则、波兰西部疆界、审判战争罪犯、对日作战、赔偿等等问题。会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调了三大国的立场，维持了战时的联盟。但是会议也表明，随着战争的临近结束，美、英同苏联的矛盾日益激化。

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苏联政府就于8月8日对日本宣战。

早在1945年2月，苏联即已着手准备对日作战。1945年4月5日，日苏中立条约期满时，苏联政府即通知日本驻苏大使：在当前情况下，日苏中立条约已失去意义，延长是不可能的。在这期间，苏联从欧洲战场秘密调运75万军队到远东地区，使该地

区的兵力增加到158万，5500余辆坦克，5300余架飞机。驻守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为97万人，160辆坦克，1800架飞机。苏军在兵力和技术装备上已占压倒优势，何况还是得胜之师，士气昂扬。波茨坦会议期间，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曾说：苏联将于8月下旬完成对日作战准备，而作战的确切日期将取决于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谈判的结果。显然，苏联是在等待对日作战的政治时机。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扔下第1枚原子弹，日本政府已考虑求降意向了。苏军如再等下去，势将影响它在战胜日本法西斯中的地位。8月9日凌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外贝加尔方面军穿越内蒙草原，攻占海拉尔、张家口方向的筑垒地域，向沈阳、长春、齐齐哈尔进击；苏军元帅梅列茨科夫指挥的远东第1方面军（刚于8月5日组建）向哈尔滨方向出击；苏军大将普尔卡耶夫指挥的远东第2方面军（刚于8月5日组建）进击库页岛和松花江一线；以及苏蒙联军，分4路全面攻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集结地。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了投降诏书。18日，关东军总司令下令部队向当地苏军洽降。在10天作战中，苏军共歼灭日军8.4万人，受降60万人。

1945年9月2日上午，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政府，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大本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巡洋舰"密苏里号"上，向美、中、苏、英等同盟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第十五章　战后初期的苏联政治经济

第一节 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恢复战争创伤的努力

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国内的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使苏联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曾被德国侵略者占领的领土与卫国战争前夕的苏联领土相比，人口占45%，工业总产量占33%，播种面积占47%，铁路长度占55%。全国有2千多万人死于战争。德国侵略军占领和破坏了1710座城市和居民点，7万多个村庄；毁坏了31853家工矿企业。德军还破坏了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65000公里的铁路和4100个车站被毁。战争期间，苏联国民经济的直接损失估计达25690亿卢布。①

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开始了和平经济建设的新时期。

1945年8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就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着手编制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新五年计划（1946—1950）。这项工作到1945年11月完成。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1946—1950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

① 鲍拉耶夫主编《苏联通史》第3卷，第361页，1983年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五年计划法令》，即第四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使我国受害地区得到恢复，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这个水平"。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演说时说："新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我国遭受灾难的区域恢复起来，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比较多地超过这个水平。"斯大林还要求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到60年代初)，达到每年能生产5000万吨生铁、6000万吨钢、5亿吨煤、6000万吨石油[①]。

要使国民经济从战时体制转变到和平生产体制，象苏联这样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国家，就要求计划和经济机关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有：有计划地复员军队，编入生产大军，组织他们学习新技术；将疏散到东部地区的居民遣返原地，安排好住房、生产劳动和学习；恢复和重建德军占领区内的工矿企业，更新生产设备；全面组织好商业供应，等等。这些工作，都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顺利地执行，显示出斯大林模式在大规模经济转折中，国家政权所拥有的直接指挥作用。

1945年1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恢复斯摩棱斯克、库尔斯克、奥勒尔、沃龙涅什、布良斯克、加里宁、顿河岸的罗斯托夫等15座古老的俄国城市。苏联政府在其他城市也着意维修和保护文化古迹。

到1950年初，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195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战前的1940年增长73%，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计划规定应比战前增长48%）。1950年，生铁产量为1920万吨、钢2730万

---

① 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52—453页。

吨、采煤量 26100 万吨、原油 3800 万吨、发电量910亿度。至此，苏联在工业产量上，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国家在工业产量上超过了战前水平；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国家的威力越居欧亚大陆之首，开始和美国分庭抗礼。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资本主义对苏联一国包围的形势消失了，苏联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孤岛了。这样，苏联的国家发展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新发动

30年代确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在管理上实行过份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使地方和企业缺乏主动性，缺乏活力。这种状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更加突出了。1947年 9 月 25 日，《真理报》刊登托尔库诺夫的文章，批评国家砂糖工业管理总局，长年累月把各种宝贵的合理化建议丢在一边，把本单位的小团体利益放在首位，使国家损失了大量财富。文章强调指出，当这种本位主义受到舆论的批评之后，国家砂糖工业管理总局仍置若罔闻，照样我行我素。文章所批评的事实，反映了指令性计划经济弊端的一个突出事例。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为了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工业生产第一线，苏联政府主要靠政治鼓动来激发工人的劳动热情，主要手段是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运动。

战后，苏联在工矿企业仍然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1950年 8 月，苏联举国庆祝斯达汉诺夫运动 15 周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奥希波夫发表讲话，要求继续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库兹涅佐夫也在《真理报》上撰文，说："斯达汉诺夫运动已引起苏联工业革命，并为生产的

不断增长创造了广泛的条件。"

除了广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之外，还开展"超计划积累"运动。1948年夏，莫斯科35家工厂联合发起"超计划积累"运动。35家工厂联合召开大会，并写信给斯大林，表示要在1948年内超计划积累10亿卢布。于是，列宁格勒、基辅、乌拉尔工业区和其他各大城市的工矿企业，也纷纷响应。使"超计划积累"运动变成全国性的竞赛运动，成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一种补充。

实际上，战后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已变成某种类似美国在本世纪初所盛行的泰罗制的苏维埃形式。如莫斯科"无产者胜利"毛纺厂厂长柯瓦廖夫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做法是：1. 研究和分析各个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操作，把各人好的经验集中起来，得出完成某一道工序的最佳方案。该厂的3名女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柯兹洛娃、安尼西莫娃、齐金娜工作情况分别如下：换梭的标准时间为2.8秒，柯兹洛娃用2.5秒、安尼西莫娃用3.2秒、齐金娜用3.0秒。柯瓦廖夫厂长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都集中在一起，进行考核，分析每人的动作，得出最佳操作方案和标准时间，作为经验加以推广。2.为实施斯达汉诺夫工作法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如为织机准备好充足的梭，不能由于缺少梭而影响织机的工作，余此类推。3.推广规范的斯达汉诺夫工作法，在全厂开展教、学，以及示范操作。

可见此时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在政治口号的鼓动下，已经引进了泰罗制的真实内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已30年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激情已经淡化，靠着卫国战争胜利、医治战争创伤的鼓动，才给了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以新的动力。

币制改革和降低物价

战后初期，苏联国内金融市场比较混乱。造成金融市场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当局在其所侵占的地区内，发行大量货币，掠夺苏联的财富；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为了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得不增发货币，货币的增加量大大超过投放市场商品的增加量；战后，市场上仍然流通多种货币，币制混乱，货币量猛增，商品供应不足，出现通货膨胀；各种商品都有国家计划供应价格和市场流通价格等两种价格，导致黑市贸易猖獗，投机倒把盛行，严重冲击着计划经济和一般职工生活。

当国民经济稍有恢复之后，苏联政府即着手整顿金融市场。1946年12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① 和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和取消粮食、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的决议。决议指出：自 1947 年 12 月 16 日起发行新币。旧币限于 16—22 日的一周内兑换成新币，边远地区可延至 29 日，过期作废。旧币与新币的兑换率，凡市场流通和人民手中持有的现金，按 10:1 兑换成新币。这一法令的执行，对拥有大量货币者是很大的打击；对国家来说则是用行政强制手段，一下子压缩了市场的货币流通量，抑制了对商品的需求。

由于用行政强制手段平抑商品供需矛盾，苏联政府有可能考虑取消商品的配售制，取消商品两种价格的双轨制。法令规定，从 1947 年 12 月 16 日开始，一切食品和日用必需品都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无需配给证。全国实行由政府统一规定的零售价格，取消国家配给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轨价格体系。新的统

① 1946年3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各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各部。

一价格，一般高于原国家配给价格，但是比原商业价格低3倍左右。

币制改革是苏联政府战后采取的一项重大经济措施。这一措施对于普通的低工资的广大职工来说，虽有所损失，却保证了稳定的基本生活。由于取消了双轨价格体系，黑市贸易也随之大受抑制。币制改革对于稳定金融市场，安定国内群众的基本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稳定了金融以后，从1947年到1952年，苏联政府连续5次减低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减低物价分两个阶段进行：1947年是降价的第一阶段；1949年3月1日开始第二阶段，全面减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每次降价的幅度在10—30%之间。

为了稳定低工资群众的生活水平，苏联政府宁愿一次次地降低物价，而不愿普遍提高工资，这显然是在贯彻斯大林关于限制并逐步缩小商品活动范围的方针，其意图是使商品经济逐步向产品经济过渡。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①

第二节　农业体制改革尝试的失败

农业生产的困境

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也是极为严重的。1945年，农业拖拉机的总数比战前减少1/4，马匹减少了一半。战争期间，大批

①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26页。

强壮男子应征入伍和转入工业生产部门，使农村劳动力锐减。1946年初，农村的男劳力比战前减少了60％。1945年，粮食的总收获量只有4730万吨。1946年，全国发生严重干旱。农业生产除了承受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之外，又被恶劣的气候所折磨。这一年，粮食总收获量降到3960万吨①。

战争期间，党和政府对集体农庄的管理放松了。农庄庄员乘机扩大自留地，圈占集体耕地，不少地区的集体农庄甚至处于半瘫痪状态。

苏联党和政府决定用强化集体农庄行政管理体制的办法来解决农业生产上出现的困境。1946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消灭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的现象的办法》的决议。决议批评了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普遍出现的浪费劳动日、侵占集体农庄公有土地、盗窃集体农庄财物、违反民主管理等种种坏现象。决议指出：违反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的现象表现为"不正确地支出劳动日，侵占集体农庄的公有土地，盗窃集体农庄的财产，地区和其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违背集体农庄管理事务的民主原则，侵犯庄员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和农庄主席的民主权利，农庄主席不向庄员大会作会务报告。"

为了贯彻这一决议，苏联政府采取了极为强硬的行政措施。从1947年1月1日开始，在当时全部22.2万个集体农庄中，对19.8万个农庄重新丈量公有土地和宅旁园地，查明侵占集体农庄土地的事件有225.2万起，查出侵占公有土地470万公顷。清查出来的被侵占的公有土地全部没收，归还集体农庄。此外，还

① 参见艾丽斯·诺弗《苏联经济史》第298页，1982年大不列颠黑塞尔·沃森．文内有限公司出版。

取消集体农庄中的多余行政职务，清理出 45.6 万名闲职工作人员。还有18.2万名与集体农庄没有生产联系的人，被取消依照劳动日付酬，这些人所占用的 14 万头牲畜和 1500 万卢布现金宣布为非法，全部归还集体农庄①。此外，国家重新规定了每个庄员每年的最低劳动日。

以上措施强化了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体制，对于维持农庄生产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集体农庄体制的根本矛盾。斯大林所采用的强制办法，实际上是在加深集体农庄体制的矛盾，使农业生产关系得不到调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不可能调动。直到 1950 年，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庄员的劳动日平均还未达到 1940 年的水平。1950年，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1940年的99%②。

承包到组的试行与被批判

在苏联，虽然自30年代初就把农民的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把农民全部组织进集体农庄，编成集体进行的简单劳动大军，但是农民对这种集体生产劳动和集体平均分配劳动报酬的体制，几乎具有某种天然的抗体。苏联政府在强化集体农庄体制方面的种种行政手段，虽然可以使集体农庄不致散架，把农民圈在集体农庄的范围内，但是终究激发不起农民内心对劳动的热爱，以及对经营土地的执着追求。少数面对现实的干部，便在既不偏离集体农庄的道路，又能刺激农民劳动生产的内在动力方面，进行小心翼翼的试探。承包到组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开始的。承包到组的基本精神是使农庄庄员的

---

① 《苏联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发展》第 122 页，1953年中华书局出版。

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148页，1986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劳动好坏和个人的收益靠拢。

承包到组的做法，各地农庄都在零星地、悄悄地做，而大规模地、正式地推行起来是在乌克兰共和国。战争期间乌克兰全境曾被德军占领，破坏极为惨重，农村劳动力、耕畜锐减，田间劳动的、甚至拉犁的，比比皆是穿花衣裙的妇女。1945年冬到1946年春，又出现严重干旱，农业生产在天灾人祸的横行下，极度艰难。可是，在斯大林的脑子里，乌克兰永远是"粮仓"。斯大林规定，1946年乌克兰必须完成4亿普特粮食的征购任务。当时，主持乌克兰工作的赫鲁晓夫竭尽全力，只完成2亿普特的征购任务，而乌克兰农村已普遍发生饥荒。赫鲁晓夫请求中央在饥荒严重地区建立施粥所，以应急需。这一请求不仅得不到中央的理解，反而遭到斯大林的严词申斥。1947年3月，赫鲁晓夫被解除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由卡冈诺维奇接任此职)，赫鲁晓夫只担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形势逼使赫鲁晓夫和乌克兰不能僵硬地死守着集体农庄体制一成不变。承包到组的做法就这样被逼了出来。

1947年春，乌克兰的库尔斯克地区为了克服饥荒，调动农民的劳动热情，就大面积地实行承包到组。赫鲁晓夫暗中支持这一做法，但他害怕承担政治责任而留有余地，尽管从实际工作中看到承包到组对刺激农民劳动热情的作用，却自己不出面，而是由库尔斯克州委来总结、宣传、推广这一做法。1947年春，库尔斯克州委正式把承包到组作为反对平均主义、贯彻多劳多得原则的好经验予以支持和推广。库尔斯克州委作出决定：集体农庄的耕地、农具和牲畜，在一年或一个轮作期内，固定承包给劳动小组。劳动小组负责承包土地上的成套农活，单独向国家采购站交售粮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劳动小组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乌克兰农业部及时肯定了库尔斯克州

的经验，并在共和国内推广。乌克兰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茨凯维奇成为赫鲁晓夫的得力助手，有效地推广承包到组的做法。由于推广承包到组，1947年乌克兰的农业获得了好收成，1948年又获得比1947年更大的丰收。1948年，乌克兰上交给国家的粮食比1947年多11500万普特，比战前的1940年多3300万普特；全年粮食收购计划比1947年提前五个星期完成①。

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也夫也积极支持承包到组的改革。1947年9月25日，《真理报》刊登多尔库诺夫的文章，赞扬乌克兰农村划小经济核算单位的做法。文章指出：几年以前，库尔斯克州的某些集体农庄将田间作业队划小为劳动小组。州委的领导人经常深入实际，倾听集体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州委把庄员的零星意见集中起来，认真、仔细地研究了劳动组织的劳动小组制。文章肯定这种劳动组织"使每个劳动小组固定劳动地块、农具、牲畜，固定管理农作物。这样，劳动报酬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变成按各个小组的收获进行分配，以劳动小组为核算单位。"文章赞扬库尔斯克州委之所以有这样的创造性工作，是因为他们深入实际的结果。州委不止一次地写信给集体农庄主席、支部书记，告诉他们如何正确地组织劳动、如何实行计件工资制、如何消灭平均主义和无人负责现象。文章感慨地说："创造热情是党的工作人员的本色。每个党的工作人员应当经常地对照自己，是否适应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②

承包到组的改革受到农庄和农庄庄员的普遍欢迎，带给他们以新的希望和鼓舞，调动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和经营的积极性。《真理报》的文章发表后，承包到组的改革在全国农村推广起来。

① 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第174页，196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② 1947年9月25日《真理报》。

1948年4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善集体农庄组织、提高生产率以及调整劳动报酬的措施》的决议，要求克服劳动组织上的缺点和消除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建议集体农庄在分配收入时要考虑到生产组的收获量。

承包到组的做法虽然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很好的刺激作用，但是却违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传统观念。自30年代以来，苏联形成了一套社会主义模式概念，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不仅要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且集体化的程度和规模越高、越大，就越是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和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战后，斯大林还把此看作是改造人的意识，最终消灭工农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之一。这样，一旦违背这个程式，就被认为是搞修正主义，是倒退。从这种僵化的教条出发，承包到组的改革仅仅搞了一年就受到严厉批判。1950年2月19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反对集体农庄劳动组织中的偏向》，指名批判安德烈也夫。文章说，"以劳动小组代替作业队意味着把统一的大型集体经济分散成小生产单位，分散了劳动组合的力量和资金，从先进的技术和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倒退到手工的、分散的劳动，这意味着损害大型的集体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基础。"文章严厉地警告，承包到组是违反从经济上、组织上巩固集体农庄利益的，会使农业工作误入歧途，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意见。

《布尔什维克》杂志1950年第10期也发表社论，批判库尔斯克州委的原领导"不注意新的先进的东西，不分析研究集体农庄的真实情况，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用孤立的劳动小组代替集体农庄的作业队。"社论批判承包到组的做法阻碍了农业中大规模机械化；忽视了机器拖拉机站的政治工作；以地区性的农村党组织代替集体农庄党组织；向落后的方向倒退，等等。

这场试探性改革就此夭折，安德烈也夫被撤职；联共(布)库尔斯克州委被改组；承包到组的做法全面流产。这实际上是对谨慎的农业体制改革的死刑宣判。

合并集体农庄运动

合并集体农庄运动，迁并小村庄、建设集体农庄城镇，也是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最早从乌克兰搞起来的。战后初期的几场试探性改革表明，赫鲁晓夫是位面对现实、讲求实际、政治上勇于探索的人物。而他能在试探性改革屡遭碰壁的情况下躲过灾难，正是赫鲁晓夫在政治舞台上工于心计，善于自我保护的结果。回顾赫鲁晓夫前半生的历史，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起，他从一个矿工到一所技术学院的党委书记，战后已成为显赫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乌克兰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了。在无数次的政治灾难和清洗中，他没有入地狱，反而在政治阶梯上步步登高，进入苏联社会和国家机构的最高层。他跟随斯大林，在口头上也喊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行动上却保持一定距离，没有直接卷入那层出不穷、变幻莫测的肃反运动。当承包到组的改革被批判以后，赫鲁晓夫被调入莫斯科接替安德烈也夫主管农业工作，他变换了方法，顺着斯大林的理论杆子往上爬，搞合并集体农庄运动。

合并集体农庄运动是1949年底开始的。这年的12月21日，乌克兰共和国刻松州狄聂恰斯基区有15个村的集体农庄庄员，在斯大林70寿辰那天，合并成一个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大型集体农庄。这个新成立的斯大林集体农庄，拥有1000多户农户、12500公顷耕地，成为全国最大的超级集体农庄。随着，该农庄开始新的、统一的生产规划和生活、工作规划，将原来的15个分散村庄迁并在一起，新建农业城。新的农业城由乌克兰建筑学

院设计，其中有能容纳1000户农户的住宅群，每户农户要有2—4个房间、厨房和卫生设备。与居民区配套的有托儿所、十年制学校、大医院、澡堂、邮电局、百货商店、饭馆、疗养院，以及70—80处公共文化建筑。在生产设施方面，农业城要修建200多座生产建筑。农业城在总体规划上要实现电气化、无线电化，安装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街道绿树成行。在远离农业城的地方，要建造多所农忙季节供庄员临时歇息的住宅。建造农业城由集体农庄自己生产砖瓦，自己组织建筑队施工，国家给予补助和支援建筑材料。

苏联报纸开始广泛宣传合并集体农庄、建设农业城的优越性：能更充分地利用农业机器和先进的农业科学；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使畜牧业劳动进一步机械化；扩大和巩固了作业队在生产中的作用；减少了行政管理机关的层次，精减了非生产人员，加强了领导。1950年，全国开始了合并集体农庄运动。经过合并，全国集体农庄数由1950年1月的25.4万多个，减少到1952年9月的9.7万多个。梁赞州原有集体农庄3925个，合并后变成1639个。

1951年3月4日，《真理报》刊出已调任莫斯科州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关于集体农庄的建筑和公共设施》的文章，提出要在全莫斯科州建设农业城镇。文章指出：集体农庄的合并为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新的更加巨大的高涨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又将使人们的富裕生活、人们的文化进一步提高。赫鲁晓夫认为，在组织经营方面巩固合并起来的集体农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把小村庄迁到一起，建设新的集体农庄城镇，建立这些村镇的公共设施。”他还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巨大工作是迁移小村子和建设新的集体农庄村镇。”① 至于合并小村庄后的农村大居民区应当称之为什么，赫鲁晓夫认为乌克兰的“农业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第270页。

城”这个名称不是很合适，“在这方面应该朴实一些，不应该追求响亮的名称。我认为叫‘集体农庄村镇’是最合适的”①。

斯大林看到这篇文章很生气，他不赞成迁并小村庄、建设农业城镇，《真理报》编辑部因此挨了批评。第二天，《真理报》编辑部刊登了一则更正，说：“由于编辑部的疏忽，昨天的《真理报》在刊登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集体农庄的建筑和公共设施》一文时，漏登了编辑部的附注，即：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仅供讨论。特此更正。”② 此后，合并集体农庄的工作降温了，建造集体农庄村镇则被紧急刹车。

合并集体农庄、建设农业城镇的做法，使大量资金耗费在生活设施上，使原来就贫困的集体农庄在财政上更加拮据，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要农民全面拆迁并村，和农民固有的恋土观念也发生矛盾。加上搬迁进农业城镇后的个体经济、包括宅旁园地等一连串问题没有落实，引起农民的疑虑。合并集体农庄、建造农业城镇，本来是农民要求改善生活的一种反映。由于赫鲁晓夫把某些农民要求个体自由发展的愿望，装进斯大林追求公有制求大求纯的模式框框里，结果是既违反了斯大林要求农民紧缩消费、支援国家建设的要求，也不符合农民传统意识的愿望。1952年夏，这一运动被公开批判。1952年10月，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在工作总结报告中，再次批评建造农业城镇是“头脑发热的盲动主义”，“用生活来冲击生产”，“耗竭集体农庄的生产资金。”

从根本上说，集体农庄体制、义务交售制，是苏联国家把农民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来源的基本形式。赫鲁晓夫想在这个体制内，缓和农民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两次尝试都以失败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第279页。
② 1951年3月5日《真理报》，见《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

告终。但是，赫鲁晓夫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它为日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

农业体制改革的接连碰壁，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无法调动。自全盘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实际上一直处于某种慢性危机之中，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1948年1月1日统计，在集体农庄收获的粮食和豆类作物中，能够用于庄员劳动日分配的部分，只占16.3%，在中央黑土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只占10.2%。1950年，全国一半以上集体农庄，发给庄员每个劳动日的粮食不足1公斤。[①]直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还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这个统计数字虽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但它确是对30多年苏联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无情总结。

第三节 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

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决议

自从30年代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含义也被教条化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30—40年代的苏联文坛，确实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是复杂的，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也应当多方位地、多层次地反映社会的全貌。光明与黑暗、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以及大量充斥的中间状态，都是社会的存在。在反映光明面的同时，有选择地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也应当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题材之一。由于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文艺创作的固定模式，对文艺创作实行过多的行政干预，窒息了文艺创作。战争期间，对文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146页。

艺创作领域的行政干预有所放松。在隙缝中，小花和莠草都长出来了。

《星》和《列宁格勒》是苏联有影响的两家大型综合性文学杂志，均在列宁格勒出版。列宁格勒在俄国历史上是以受西方影响的俄国欧洲城市而著称，这两家文学杂志也体现了这种气息。1946年第5、6期《星》杂志，发表了左琴科的讽刺小说《猴子奇遇记》。

擅长写讽刺小说的作家米·米·左琴科在30年代就饮誉文坛。左琴科的讽刺幽默故事，巧妙地继承了民间传说的讲故事形式，在结构上一般只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短小精悍，没有冗长的铺陈。左琴科的讽刺小说不是单纯逗乐，或者插科打诨，而是把经过高度概括而又打成碎片的小故事加以有效的放大，使读者对这类习气及现象感到震惊，同时又不失其坚实的生活基础，引起读者的思考。因此，左琴科作品中的笑，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教育意义。左琴科的作品是苏联的畅销书，也是30年代有争议的书，被认为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猴子奇遇记》中，作者通过猴子在苏联各地的旅行，对苏联社会的一些丑陋现象进行评议和嘲讽。最后，猴子看到在苏联城市里生活是那么困难，决定回到原来生活的森林中去。这篇小说，不是没有缺点的，但认定它就是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小说，似也值得商榷。

《星》和《列宁格勒》杂志，还经常刊登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安·安·阿赫玛托娃在十月革命前就出版了《黄昏》、《念珠》、《白色的云朵》等诗集，蜚声文坛。十月革命后，阿赫玛托娃对苏维埃政权是不理解的，并因其丈夫被苏维埃政权镇压，更加耿耿于怀。30年代，她沉浸在对古典诗歌的研究之中。卫国战争结束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不论是主题内容或是抒情形式，都回到

了原来的道路。当时，文艺创作的主题，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应当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领袖、抒发卫国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之情。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仿佛是有意退居一旁，独自沉浸在对祖国、对历史、对个人命运的思考里。这种感情，也有必要予以教育和提高，但是，因此就把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作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批判的靶子，显然是把思想教育问题，扩大成政治批判运动。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决议谴责两杂志刊登渗透着崇拜一切外来事物精神的作品，以及反苏维埃的异己作品。决议责令停办《列宁格勒》杂志；改组《星》杂志编辑部，任命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耶哥林为主编。决议批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的"失职行为"；批评列宁格勒市委对两杂志的错误"包庇纵容"，把左琴科塞进《星》杂志编辑部；批评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自由主义。"

决议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两人也作了极其粗暴的斥责和讨伐。决议称左琴科为"文学的无赖和渣滓"，并于9月将他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禁止发表他的作品。左琴科曾写信给斯大林，说明自己从1918年自愿参加红军，1921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总是怀着满腔热情，希望以自己的创作来造福于人民，从来不曾反对苏维埃。左琴科在信中说："我讽刺的是遗留在人们身上的不良品质。如果说，有时在我的作品中能审查出一些观点模糊和不明确的地方，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我本人并不怀有恶意。"最后，左琴科表示写信的目的是想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如果您把我看作一个文痞流氓、一个卑微的小丑或是地主财阀的走狗，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这样看待我是不公正的。"对一个作家的真诚表白，斯大林却不屑一顾。斯大林死后，1953年6月，苏联

作家协会才恢复了左琴科的会籍。阿赫玛托娃也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斯大林死后也恢复了她的名誉。

文学领域里的这场政治讨伐，封闭了文学创作的繁荣道路，扼杀了作家的思想和灵魂，使得文学创作上的无冲突论盛行起来。按照无冲突论，认为苏维埃文学创作只能表现好和不够好的矛盾。

1946年8月26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关于剧场上演剧目及改进办法》的决议。决议谴责1945—1946年间上演的戏剧，把苏维埃人描绘成丑陋的漫画形象，落后、缺乏文化、低级趣味、庸俗；而反面人物却赋有性格、有表现力、意志坚强、有能力。决议还批评许多剧作家对现代生活的一些根本问题无动于衷，既不了解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又不善于表现苏维埃人的优良品质和特性。决议的精神实际上是不准在戏剧舞台上反映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人的落后面。

1946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了《关于电影〈灿烂的生活〉》的决议，谴责这一电影剧本的作者和导演"丑化"苏联社会，对自己的职责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

文学领域批判运动的持续开展

194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几个决议发表以后，在文学领域里，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开展。这种激烈斗争的局面，一方面说明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注意到在这个领域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未雨稠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早在30年代即已采用的那种以行政命令手段对付思想意识方面矛盾的简单、粗暴做法，不仅没有改进，反而变本加厉了。

1948年，文学杂志《旗帜》陆续发表了麦尔尼柯夫的中篇小

说《编辑部》，卡察科维奇的中篇小说《草原伙伴》，雅塔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医生的心》、《盲目的幸福》等。这些小说，都受到严厉的批判。《编辑部》被指责为"歪曲前线新闻工作者的形象，美化战争罪犯"；《草原伙伴》被指责为"在感情上为怕死鬼、为将部队引向毁灭的罪恶思想辩护"；《医生的心》、《盲目的幸福》被指责为"脱离生活的真实，纯粹是抄袭资产阶级颓废文学样本，传播资产阶级穷途末路的哀思。"文学领域又开始了新的批判运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有意将对《编辑部》等小说的批判，扩展成全国性的思想整刷运动，整顿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某些混乱状况。

1948年岁末，联共（布）中央以检查文学领域对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决议的执行情况为名，召开全国各主要杂志编辑部会议。在听取了各主要杂志编辑部的汇报之后，联共(布)中央严厉批评《旗帜》杂志编辑部"没有完成所应当担负的任务，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责成《旗帜》杂志编委会和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纠正《旗帜》杂志编辑部的错误。

1949年1月15日，《文学报》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党性的伟大原则》的社论，批判《旗帜》杂志的"自由化错误。"社论说："并不是所有杂志都能从党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旗帜》杂志就是其中之一。"社论批评《旗帜》杂志接连发表思想上有缺陷、艺术上拙劣的作品；编辑部"离开了文学的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忘记了文学是苏维埃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强大思想武器，忽视了生活的真实性。"社论还批评《旗帜》杂志编辑委员会"依靠少数批评家，随心所欲地校改手稿。"①

在这样的批判浪潮的不断冲击下，苏联的文坛暂时沉寂了。

---

① 见1949年3月20日《东北日报》。

很多作家心怀不满，但是不敢直抒己见。老作家爱伦堡在1948年写成《谈作家的工作》长篇论文，抒发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系列不同看法。但是，他认为眼下不是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时候，在苏联根本没有讨论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他把文章深藏在书斋里，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公诸于世。

斯大林执政时代的后期，苏联文坛不仅没有解决思想意识方面的是非问题，反而把局面弄得更加复杂了。

关于《西欧哲学史》的讨论

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是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批判运动的先导。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几个决议公布之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很快就全面铺开。哲学领域的批判运动是围绕着对《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而展开的。对《西欧哲学史》一书，联共(布)中央名为召开“讨论会”，实际上是政治讨伐会，是哲学领域批判运动的动员会。

《西欧哲学史》一书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撰写的哲学史教科书，这是作者长期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成果。此书在叙述西欧哲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学术思想和历史地位，作了应有的肯定，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哲学史。此书被哲学界推荐给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希望获得1947年斯大林科学奖金。联共(布)中央认为，此书对资产阶级哲学家顶礼膜拜，是有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既然是一本有如此严重错误的书，不仅被哲学界选作教科书，还被推荐为斯大林奖金的获奖候选著作，这就反映了哲学界的死水一潭和严重病态。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决定亲自出面干预，扭转哲学界的局势，并借此推动整个理论界开展批判运动。

1947年6月，联共（布）中央主持，召开了大型哲学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100多名哲学家，批判亚历山大洛夫的"错误"。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作总结发言，批判亚历山大洛夫"把资产阶级哲学家捧上了天"，"对声名越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就恭维得越厉害。所有这一切就使得亚历山大洛夫同志成为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俘虏。"日丹诺夫还批评亚历山大洛夫把研究哲学史的全部事业当作消极的、旁观性的经院式研究。日丹诺夫还指出，由于亚历山大洛夫本人的严重错误，把整个哲学界变成一潭死水，变成一个远离战场的、无声无息的宿营地。日丹诺夫要求哲学界立即改变这种"没有战斗性的拖沓习气，去掉颓废作风，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地去工作"①。

会后，亚历山大洛夫被撤销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职务。为了加强哲学战线的工作，联共（布）中央创办了《哲学问题》杂志，组成以凯德洛夫任主编的编委会。凯德洛夫在主持《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工作时，发表了卡明斯基的《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俄国唯物主义哲学中的传统问题》、马尔科夫的《论物理认识的本质》等文章，使整个编辑部和哲学界又一次遭了灾。上述文章被指责为"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看法"，"反对米丘林的生物学理论"，"犯了严重的世界主义的错误"，等等。凯德洛夫也因此受到严厉批判，说他"未能令人满意地完成在自己面前提出的任务"，并被撤销《哲学问题》杂志主编的职务。联共（布）中央出面改组了《哲学问题》杂志编委会，组成以切斯诺科夫为主编的新编委会，直到斯大林逝世。

为了推动哲学界开展全面批判运动，1949年7月8—15日，

① 见日丹诺夫等著《苏联哲学问题》第4页，1950年5月新华书店编辑部编辑发行。

由苏联高等教育部在莫斯科召开苏联高等学校马列主义与哲学讲座主任会议。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卡夫坦诺夫在会上批评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工作“极其精糕”,“脱离实际，不关心大学思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等等。会后，全国开始了整顿高等学校的哲学教学工作。

哲学领域的批判运动表明,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竭力想把苏联哲学界圍禁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的框框内,让哲学界一心一意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挖掘和阐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决心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几条教义来统率全国的哲学思想,对哲学界任何一点创造热情都横加摧残，使哲学界也出现荒漠时期。

经济学领域的批判运动

战后,经济学领域的批判运动,是围绕着对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瓦尔加的批判而展开的。瓦尔加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专心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在国际经济学界也享有声誉。1946年,瓦尔加出版了他的新著《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在这本书中，瓦尔加阐述了这样一些基本观点:资产阶级国家是全体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全体垄断资本的利益，也有可能限制某些垄断资本的利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然不可能实行如同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计划经济,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实行某种类型的计划经济。

瓦尔加的观点虽然是经过几十年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精心研究之后提出来的,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并且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但是违背了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模式,很快

就受到批判。1947年5月，苏联科学团体和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部，批判瓦尔加的“改良主义错误”。瓦尔加被撤销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职务，该研究所被“并入”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来由瓦尔加任主编的《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杂志，被责令停刊。

1948年11月中旬，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4天会议，在更大范围内猛烈批判瓦尔加的“改良主义”。瓦尔加被指责的罪名有：顽固地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也可以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可以缓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低估各人民民主国家中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并且轻视各人民民主国家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只有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瓦尔加终于检讨了。1949年第3期《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他的《批判有关帝国主义著作中的改良主义路线》一文，检讨自己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中所犯的“改良主义路线错误”。瓦尔加说：“我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以及战后出版的有关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在党的各种刊物和讨论会上均受到严厉批评。这些批评都是必要的、正确的。我的更大的错误还在于未能认识这些批评的正确性。悬崖勒马毕竟强于执迷不悟。我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构成我的改良主义理论总链条的一环，背离了列宁、斯大林对现代帝国主义的分析。改良主义路线为资本主义粉饰太平。在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上的改良主义错误，在我的著作里几乎俯拾皆是。”①

经济学领域的批判运动，意图在于进一步确立斯大林关于

① 1949年8月11—12日《东北日报》。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把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作为认识资本主义、认识世界的法则。

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真正造成了死水一潭的局面，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创新意识，使教条主义和八股习气充塞各个角落。苏联社会陷入举步艰难的困境之中。

第十六章　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外关系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外战略

战时联盟的瓦解和苏联对外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国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一场浩劫。战争期间，苏联同美国、英国结成了反法西斯的战时同盟。这一同盟通过苏、美、英三国首脑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得以加强和调整。因此，当大战结束时，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格局。

从力量对比方面看。苏联虽然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的代价，承受极大的民族牺牲，但它终究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苏军不但解放了自己的全部国土，而且在追击法西斯军队的过程中，帮助了一系列国家获得解放。根据波茨坦协定，苏军占领了德国的东部地区。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并同苏联连成一片，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支政治力量。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德、意、日在战争中被打败了，法国和英国的国力遭到严重削弱，惟独美国在战争中发了财，成为战后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美国已把拉丁美洲变为自己的后院，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均踞世界第一位，它的几百个军

事基地几乎遍布全世界。

早在战争前期，美国和英国就酝酿要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和安全体系，以保障欧洲和世界和平。1943年苏联表示支持这一计划，并在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重申了这一点。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国首脑一致同意于同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一次联合国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按照这个宪章的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通过有效的集体措施，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为此，所有会员国必须保证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纠纷，而“决不使用威胁或武力”。鉴于苏联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的创伤，亟需恢复经济和保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它曾对联合国和战后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寄予很大的希望。与此同时，苏联竭力维护雅尔塔等会议上同美英达成的战后处理德国、波兰及划分欧洲及远东势力范围的协议。所以，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各国能够采用协商的和平的解决办法，那也许可以避免战祸，“但这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展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斯大林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恢复经济，发展基础工业，增强国防力量，用大概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苏联拥有防止任何意外事故的保障①。斯大林的这篇演说在美英等国政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① 参见《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1—453页。

1946年3月5日，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进行“冷战”的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国家和人民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根本没有“民主”和“自由”。丘吉尔表示，他“不相信苏俄希望战争”，但认为苏联“所希望的是得到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①。

8天以后，即3月13日，斯大林就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斯大林说，“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斯大林谴责丘吉尔和他的朋友非常象希特勒及其同伴那样散布种族优越的理论，企图得出这样的结论：“讲英语的民族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斯大林指出，丘吉尔先生是在进行反苏战争宣传，推行反苏战争方针。②

尽管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发出了“冷战”的讯号，苏联政府还是竭力维持战时同盟国之间的和平共处。1946年底，斯大林在接见罗斯福之子时表示，美苏两国的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③。

然而，1947年初，美国相继提出了“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使得西欧国家在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同时，结成以美国

---

① 转引自〔美〕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第2卷，英文版。

② 《斯大林文选》（下）第462—463页。

③ 《斯大林文选》（下）第484页。

为首的在全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阵营。针对这种情况，苏联也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它在东欧各国改组政府，清除亲西方的政治势力，加快革命转变的步伐，形成社会主义阵营。这样，从1947年起，战时同盟已趋瓦解。苏美之间的"冷战"日渐剧烈，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开始形成。

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思想

战后，由于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首脑，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给予较多的关注。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1953年病逝，斯大林的对外战略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关于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战后初期，斯大林认为苏联应尽量维持战时同盟，争取同美英等国和平共处。1945年4月，当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表示极大的悲痛，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唁电中强调，"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之间的合作政策，今后仍将加强"。在打垮德国法西斯之后，斯大林在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时也强调，苏英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成效地发展"。这不但表明苏联在经受世界大战浩劫以后要求和平的迫切愿望，而且希望通过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和平共处，换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以保障国内经济恢复的顺利进行，保证既成的世界格局的稳定。因此，斯大林不但在言论中一再强调同美英维持和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的必要性，而且当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端时，苏联尽量采取克制的态度，寻求妥协和谅解，防止事态的扩大，对西欧国家共产党人的活动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即使在"冷战"讯号已经发出，杜鲁门主义已经出笼以后，1947年4月，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的谈话中，重申了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然而它们彼此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他强调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①

关于原子弹和新的世界大战危险。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先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杀害了大批无辜居民。在战后初期，美国凭借这种威力强大的新型武器，以核垄断进行核讹诈，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之一。对此，各国人民对原子弹给世界局势带来的影响，出现种种疑虑和恐惧。1946年9月，斯大林在回答《星期日时报》记者时明确指出，他并不认为原子弹象某些政治家所想象的那样厉害，"原子弹能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斯大林进而指出，垄断原子弹秘密会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但这种垄断不会继续很久了，而且原子弹的使用将被禁止②。1949年9月，苏联塔斯社奉命就苏联原子爆炸问题发布声明，强调苏联政府信守而且今后仍然信守其原来立场，坚持主张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并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对此，斯大林在回答记者时指出，美国想保持原子弹生产的垄断地位，使它拥有恫吓和讹诈其他国家的无限手段。但是，正是维护和平的利益首先需要打破这种垄断，因为"只有鼓吹原子弹的人看到他们已不再是垄断者的时候，他们才会同意禁止原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491—493页。
② 参见《斯大林文选》(下)第478页。

子武器。”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美一些政治家煽起“冷战”之风，随着战时同盟趋于瓦解，许多地方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议论纷纷。如何看待新战争的危险？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避免？对此，斯大林认为，“必须把现时所进行的‘新战争’叫嚣，同目前并不存在的‘新战争’的实际危险区别开来”。他表示不相信存在“新战争”的实际危险，因为任何一个大国，在目前不可能派出大量军队去反对另一个大国，尤其是由于“人民已经疲于战争”，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而“新战争”的叫嚣所以日益猖狂，是另有一番原因的，根据斯大林的分析，其一，是以战争的怪影来恐吓缔约国某些天真的政治家，以便从别国获得更多的让步；其二是为了阻挠本国缩减军事预算；其三，阻止军队复员，以防止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1948年以后，“冷战”愈演愈烈，斯大林才开始揭露英、美、法统治集团推行着发动新战争的政策。美国假借联合国名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斯大林指责联合国正在变为侵略战争的工具，变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工具，认为联合国“走上了国际联盟的不光彩的道路”。但即使此时，他还明确表示，不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②。在斯大林晚年的最后一篇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驳斥了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尖锐化，美苏必战的说法。斯大林说：从表面上看，或从理论上讲，似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但在实践上，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比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苏美必战是缺乏根据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由此可见，“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568页。

② 参见《斯大林文选》（下）第476、486、564、565页。

帝国主义”①。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十分明显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代替苏美英三国的战时同盟。当“冷战”局面形成，美国一手策划和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则加紧了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控制。40年代后期，尤其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以后，连结欧亚两洲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形成。世界上两个对立阵营的形成，是战时同盟破裂的标志，也是几个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结果。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美英等大国结成联盟，对战胜共同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些国家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所达成的协议中，带有浓重的大国主义色彩，在欧洲及远东地区划分势力范围，便是大国政治的集中表现。因此，在战后的地区摩擦中，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对这一点，斯大林是十分警惕的。所以，他在强调和平共处、防止新战争的同时，十分注意和防止西方帝国主义对其势力范围的干预和侵夺。两大阵营的形成，实际上使这种新的势力范围的划分明朗化和固定化。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既可以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而在阵营内部苏联必然推行其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产生种种消极的影响。斯大林还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的这个结论，显然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自我封闭的消极后果。

---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597—599页。

第二节　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抵制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继丘吉尔在富尔敦讲演一个月后，1946年4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芝加哥的讲话中公开声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两个月后，当时任共和党外交政策顾问的杜勒斯挑衅性地指责"苏联政策的范围是世界性的"，它的目标是完成"苏维埃帝国统治下的和平"。1947年2月，新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次演说中说，要充分认识"美国现时在全世界所占据的地理上、财政上、军事上和科学上的特殊地位及其所涉的含义"①。这些言论，表现出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咄咄逼人的架势。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他以防止"极权主义制度"蔓延为名，要求国会批准给予希腊和土耳其4亿美元的援助。后来，杜鲁门声称"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②。显然，杜鲁门主义是直接针对苏联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凋敝，1946年底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西欧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英国1946年财政赤字高达4.5亿英镑，法国许多重要工矿企业和铁路干线陷于瘫痪，许多国家政府在经济上无力摆脱困境，在政治上也动荡不定。美国就乘虚而入，打出"援助欧洲"

①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7、13页。
②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50页。

的旗号。在1947年3月苏、美、英、法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失败以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就着手制订“援欧”计划。同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中，正式提出了“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得到英法政府的积极响应。6月，英法两国邀请苏联商讨欧洲响应马歇尔建议的预备会议。原先，西方国家以为苏联会拒绝参加，这样，它们就有正当借口把苏联排除在外，并对东欧各国施加影响。但苏联表示接受英法的邀请，使得美国感到不安。本来，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使美国控制欧洲。苏联的参与，无疑会打乱美国的如意算盘，于是美国加紧对英国施加压力，想方设法遏制苏联。1947年6月 27 日，英法苏三国外长在巴黎开会，讨论马歇尔的建议。莫洛托夫 率领了一个由 89 名经济专家和顾问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出席会议。莫洛托夫在发言中阐述了苏联政府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他说，美国由于面临经济危机，需要扩大国外市场；当然，美国的经济援助能使欧洲各国较容易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莫洛托夫对英法建议制订欧洲统一经济计划表示“严重的怀疑”。他认为，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的国家可分为盟国、中立国和前敌国三类，分别情况予以研究①。英法外长对莫洛托夫的建议表示保留，并制造舆论，暗示苏联给会议设置障碍。7月2日，莫洛托夫奉本国政府指示在会上发表声明，谴责西方国家在制订欧洲统一经济计划的名义下，可以任意强迫波兰多出产煤炭，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多出产农产品而缩小机器制造业。声明最后说，这样做不是要欧洲各国在经济恢复方面彼此合作，“它的结果将不是欧洲的统一和重建，而是把欧洲分裂为两个集团”②。英国外长贝文声称苏联政

① 参见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中译本1950年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401—403页。

②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5—136页。

府的声明是一种“威胁”，英国决不因此“退缩”。随后，莫洛托夫即宣布退出会议。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宣告破裂。

7月12日，巴黎经济会议开幕。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芬兰均未派代表出席。鉴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度曾表示要参加马歇尔计划，苏联立即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仅7—8月间，就先后和保、捷、匈、波、罗等国签约，进一步扩大了苏联与东欧的经济联系，西方国家把这些协定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

美国坚持要利用马歇尔计划控制受援国，英法又竭力排斥苏联的加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不能让东欧国家加入马歇尔计划。苏联与东欧各国建立并加强了广泛的经济联系，并于1949年1月成立了由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于是，两个阵营形成了两个世界市场，两个世界市场又加剧了两个阵营政治上的对立。

“柏林危机”

根据波茨坦协定，德国由苏、美、英、法4国分区占领，实行管制。对德管制的主要政治原则是：解除德国的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一切可以用于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废除纳粹法律，严惩战犯；暂不设立中央行政部门，行政管理事务以政治结构分散及发展地方权限为原则。对德管制的主要经济原则是：德国经济应早日分散，消灭卡特尔等垄断组织；在占领期间德国应被视为一个经济单位；在德国保持一个不超过欧洲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并使德国人民不依靠国外援助而生活。1945年7月1日，4国军队分别进驻各自的占领区。

在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地区，解散了党卫军等纳粹军事组织，清洗了纳粹分子，到1948年3月，有52万名纳粹分子被革除各种职务。在苏占区逐步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1946年4月，苏占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由于苏联在大战中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所以对战后德国实行严厉的索赔政策，苏占区大批工厂和设备被拆卸后运往苏联，600多个企业被没收，无偿使用德国专家、技术人员及战俘。而西方三国占领区里实行的政策与苏占区有很大不同。这就为后来两个德国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1947年1月，美占区和英占区达成经济合并的协定，实际上这个合并不只是经济性质的，也是政治性质的。美国抛出马歇尔计划后，更加积极地策划把德国西占区纳入美国的全面控制之下。1948年1月，法国政府同意把法占区与美英占领区合并，这就为美国设计的建立西德政府铺平了道路。1948年2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伦敦举行六国会议，商谈成立西德政府事宜。3月20日，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上，要求西方三国将伦敦会议所达成的关于西德问题的全部协议通知他，但遭到拒绝。对此，苏联提出强烈抗议，谴责西方国家阻挠对德管制工作。从4月1日起，苏联宣布实施为期10天的西德和柏林之间的交通限制。

6月7日，六国伦敦会议的"议定书"正式公布，西方国家公开了它们分裂德国的计划。6月18日，美、英、法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单独的币制改革。次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大柏林在苏联占领区之内，经济上为苏占区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区的经济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路实行交通管制，即中断西占区和苏占

区、柏林之间水陆交通运输。与此同时，苏联决定在苏占区和大柏林相应地实行币制改革。

6月23日清晨，柏林市民面对着两种对立的币制改革，一时无所适从，陷入混乱。24日，西德和柏林之间水陆运输中断，只保留了柏林通往汉堡、汉诺威和法兰克福的三条“空中走廊”。从苏联方面说，这是对西方国家试图分裂德国的一个强烈反响，措施是严厉的；同时，没有全面断绝西占区与苏占区、柏林之间的交通运输，保留了三条航空线，也表明留有余地的。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来说，一方面不惜任何代价，调动大批飞机进行空运，态度也很强硬；另一方面，利用这一形势大肆渲染紧张气氛，煽动战争情绪。“柏林危机”拉开了帷幕。

7月初，美、英、法三国政府分别发出照会，抗议苏联对柏林的封锁，但声明愿意就柏林管制问题上的分歧进行四国谈判。与此同时，西占区也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双方关系日趋紧张，西方三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的谈判时断时续，收效甚微。在此期间，美、英、法政府在西占区加紧筹建西德国家，苏联则在苏占区酝酿建立民主德国，德国分裂的局面已难以逆转。

1949年1月，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史密斯向斯大林提出四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如果美、英、法政府同意把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推迟到研究整个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是否愿意取消对柏林同德国西部各区之间的交通所实行的限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遵守第三个问题中所说明的条件，苏联政府不认为取消运输限制有什么障碍，但是，同时要取消三国所实施的运输和贸易的限制。”① 斯大林不再把柏林问题和币制改革问题联结在一起，使双方的僵局出现了转机。经过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谈判，苏美双方首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514页。

先达成谅解。5月初，四国政府最终达成协议。5月5日，莫斯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同时发表关于解除德国各占领区和柏林之间限制的公报，宣布在5月12日结束"封锁"。

根据四国协议，5月23日在巴黎举行四国外长会议。通过这次外长会议，苏美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的剑拔弩张的对抗局面暂告平息，但冷战仍在继续，并正式出现了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1949年8月14日，西德议会举行选举，9月12日，阿登纳出任西德政府总理，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3日，苏占区统一社会党举行中央全会，决定单独建立起一个国家。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10日，苏联驻东德军政府把行政职权正式移交给民主德国政府。

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反应

1948年2—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5国代表在布鲁塞尔开会商谈建立西方联盟的问题。比、荷、卢三国不满意英国提出的条约草案，要求在政治条约以外，另外签订军事协议。条约经各与会国政府批准后，于3月17日签字生效。布鲁塞尔条约有效期为50年。条约规定，在任何缔约国遭到侵略时，其他缔约国应自动给予援助；在大陆发生侵略行为或出现德国威胁时，所有缔约国应立即协商。

布鲁塞尔条约签订后，美国就力图插手其间，以便使西方联盟扩展为控制西欧，对抗苏联的工具。经过一系列的活动，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范登堡决议案"，同意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和美洲大陆以外的国家签订同盟条约。7月，美国、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五国（卢森堡未单独派代表）正式在华盛顿会谈。六国华盛顿会议一直延续到1949年3月15日。其间，与会国通过了一个关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备忘录"，通称"华盛顿文

件”，提交各国政府讨论。“文件”的引言中说：“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清楚地表明，迫切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对北大西洋区域安全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应协同为该地区作出区域性或集体的防务安排。”文件接着猛烈攻击苏联对欧洲的扩张：“战争削弱了西欧国家，在德国造成了真空，它使苏联力量超过了西欧力量。这就造成了一种使这个地区的安全立即受到威胁的局面，北美的安全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苏联与非苏联世界之间的和平共处，不可能有任何永久性的基础”，“苏联力量的向西扩展，使苏联在战略上有可能在目前使用武力统治欧洲大陆。”为此，要建立一个包括北美、西欧、北欧的“北大西洋安全体系”①。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49年4月4日，美、加、布鲁塞尔条约5国及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等12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北约第5条规定：“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如果此种武装攻击发生，缔约国可以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并“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武力的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②。

显而易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冷战的产物，其矛头是针对苏联的。对此，苏联立即作出强硬的反应。

1949年1月29日，苏联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北约”是“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推行侵略政策的主要工具”，通过它“对尽可能多的国家实行驾驭”，使这些国家不能行使“独立国家的对外对内政策”。

---

① 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5—76页。

② 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8页。

3月18日“北约”文本正式发表后，苏联政府于3月31日向美、加、英、法、比、荷、卢等7国政府提交一份抗议照会，指出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个纯粹侵略性的、反对苏联的条约，它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是和1942年英苏互助友好条约、1944年法苏互助友好条约以及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波茨坦和历次国际会议的协定相矛盾的。

8月24日“北约”正式生效后，苏联政府在不同场合严厉谴责北大西洋联盟的侵略性质以及准备新战争的危险性。

1954年10月，美、英、法等国在巴黎会议上签署吸收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文件后，苏联政府于11月照会西欧各国和美国政府，建议举行全欧会议讨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遭到拒绝。同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八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宣布：一旦巴黎协定被批准，八国将在组织武装力量方面采取共同措施。1955年5月，巴黎协定批准生效，苏联等8国在华沙举行第二次会议，缔结了华沙条约，以与北约相抗衡。

第三节 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

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初期政策

大战后期，东欧和巴尔干一些国家都曾在苏联军队的直接或间接帮助下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根据苏、美、英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和一系列双边会谈中达成的协议，这些国家战后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东欧各国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苏联，从大量的历史经验、尤其从二次大战的教训中，苏联深刻地认识到，东欧是苏联防止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武装进攻的一个缓冲地带，

是苏联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的走廊。这个地区是苏联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战略地区。

二次大战前，除德国东部外，其余东欧国家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准不高，封建势力有着深厚基础，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备受剥削，农民的土地问题相当突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这些国家或者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对象，或者成为某个强国的附庸，每个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依附于某个大国或受几个大国的共同控制。在二次大战中，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统治阶级成了法西斯德国的附庸，直接参加了侵略战争，其余国家均受到德、意法西斯的蹂躏。因此，战争期间，东欧国家人民普遍面临着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任务，但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幼弱。

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严酷考验，根据苏美英达成的协议，在苏联的帮助下，战后初期东欧各国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一般都是联合政府。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都有代表参加政府。这些人民民主国家建国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有两项：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权。

1944—1946年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普遍颁布了土地法令，自上而下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庄园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农业工人和移民。获得土地一般不是无偿的，分得土地的农民需付出一定的款项。分得的土地不得出卖、抵押、赠送或出租给他人。这种依靠国家命令来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虽然不足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取消了众多的封建义务，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泛的工农联盟，为日后同资产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民主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废除君主政

体。战前，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些国家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一般都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建立联合阵线，进行民主选举，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并在国家机构中清除遗留下来的亲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由于有苏联为后盾，这些国家的第一阶段民主改革开展得比较顺利。

冷战伊始，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控制。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都曾表示准备参加，其中捷、波两国尤为积极。6月初，当马歇尔刚发表他的援助欧洲经济复兴计划的演说不久，捷政府就对此计划表示浓厚的兴趣，决定设立一个关于马歇尔计划的专门小组加以研究，并指派捷驻法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于7月12日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国家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波兰政府也打算派代表出席巴黎会议。可是，由于英法苏三国外长在6月底巴黎会谈的破裂，苏联已决心揭露马歇尔计划的侵略实质，并不许东欧国家加入马歇尔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较快领悟苏联的意图，仍打算出席巴黎会议。7月9日，由哥特瓦尔德总理率领捷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启程前几小时得知波、罗、南等国政府均已撤销参加巴黎会议的打算，心中颇感不安。当晚苏联领导人接见捷政府代表团时又明确指出，马歇尔计划是直接针对苏联的，参加马歇尔计划就是对苏联采取敌对立场。在苏联的压力下，哥特瓦尔德连夜打电话到布拉格，撤销了捷政府派员出席巴黎会议的决定。

随着苏美冷战的加剧，东欧国家内部的亲西方势力活跃起来。为加强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控制，苏联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亲西方政治势力从政府中排除出去，支持东欧国

家的共产党改组了政府。

1946年12月，由匈牙利共产党掌管的国家保安机关宣布，破获了一起"颠覆共和国的阴谋案"，指责小农党头目、政府总理纳吉·费伦茨和议长瓦尔加·贝洛神甫是该案的两名"主谋"，说他们保持着与美国及逃亡国外的反革命势力的联系。1947年5月，匈政府要求正在瑞士度假的纳吉·费伦茨回国受审，纳吉·费伦茨遂提出辞职，瓦尔加神甫则逃往奥地利的美占区。此后，小农党逐渐失势，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于1948年6月合并成为劳动人民党。在苏联的支持下，经过一系列改组，劳动人民党成为匈牙利的执政党。

在此期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波兰国内也发生一系列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苏联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并通过这些事件，清除了这些国家政府内部的亲西方势力，实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中以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最为突出。

二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以原流亡政府总统、无党派人士贝奈斯为首的，由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人民党、国家社会党等组成的联合政府。在1946年5月的全国大选中，共产党成为国内第一大党，议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均由共产党人担任。苏美冷战开始以后，捷国内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活动加剧起来，加上1947年国内遭到严重旱灾而造成农业歉收，引起了政府的危机。1948年初，贝奈斯总统在对一位外国大使的谈话中认为，共产党将在春天的选举中遭到失败，他们将丧失10%的选票，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将赢得这些选票，这样就会导致力量平衡①。

---

① 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4卷第24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48年2月10日，参加政府的资产阶级人士以多数票通过了给公务人员增加工资的建议，以换取公务员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并给当时面临经济状况困难的共产党领导人出难题。接着，在2月13日的政府例会上，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突然对共产党发动攻击，指责共产党人、内政部长诺塞克擅自用共产党人代替布拉格地区的8名警官，并纠合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官员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让内政部长撤销调换警官的命令，并需在17日政府会议上汇报执行情况。局势骤然严重起来，国家社会党伙同人民党和民主党协商，决定采取一致行动，他们奔走于西方国家驻捷使馆之间，进行频繁的活动；捷共也同苏联驻捷使馆和驻情报局的苏联代表保持密切联系。17日政府会议不欢而散。布拉格气氛紧张。

2月19日，返美休假的美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同一天飞抵布拉格。斯坦哈特一下飞机，就声称美国政府愿意向捷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并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共产党人统治政府的丧钟敲响了。当晚，他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会面并对他们表示支持。佐林到达布拉格后就拜访捷外交部长马萨里克，提请他注意当前事态的发展，并表示苏联政府决不能消极地听任资产阶级政党的放肆行为。20日的政府会议上，12名资产阶级政党的部长拒绝出席，他们声言如果不执行13日决议，他们将退出政府。当天下午，他们向总统提出辞职。贝奈斯不打算接受这些部长辞职，总理哥特瓦尔德与总统会谈时则要求总统接受12名部长辞职。

在局势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捷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全国武装力量处于戒备状态；严密监视资产阶级政党总部和辞职部长的行动；控制电台和印刷厂；清洗地方政权的反动分子。20日深夜，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告全体捷克斯

洛伐克人民书》。21日，在布拉格广场10万人集会，并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24日中午，全国250万劳动者举行一小时总罢工。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贝奈斯总统被迫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一批新的共产党人部长参加了政府，进一步改变了政府内部的力量对比。5月，捷通过新宪法，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将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6月，贝奈斯总统辞职，哥特瓦尔德被议会选举为总统。同月，捷共与社会民主党合并，进一步壮大了捷共的力量。至此，二月事件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独掌政权而告终。

共产党情报局和苏南冲突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战时大国联盟破裂，苏美冷战升级的产物。1947年，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人被排除出政府内阁，一些亲西方的政治集团和个人也被排除出东欧各国政府。东西方关系日趋紧张。苏联为加强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联系，同西方国家集团相对抗，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建立一个欧洲九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

早在1945年，铁托曾向斯大林建议，成立一个各国共产党之间协商性质的国际会议，斯大林表示赞成，但未付诸实现。1946年铁托访问苏联，又同斯大林商谈了关于成立情报局的事宜，并取得一致意见。当时斯大林表示，完全没有必要去复活任何形式的第三国际，只是建立一种情报机构，以便经常开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和交流经验，但仍未立即付诸实施。在国际形势变化后，1947年夏，联共(布)中央写信给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要波党出面发起召开欧洲一些党的会议。同年9月22—27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

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九个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各派两名代表，在波兰西南的一个小温泉场举行秘密会议。

会议在听取并讨论了苏联党的代表日丹诺夫所作《论国际形势》的报告后，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指出，战后世界已形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要确立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统治权和摧毁民主制度；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势力，巩固民主制度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宣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指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只是美国在全球侵略扩张总计划中的一部分。宣言严厉谴责右翼社会党的叛卖政策，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同谋犯。宣言最后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任务。

会议根据哥穆尔卡所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交流经验和配合行动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由参加会议的九国党的中央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情报局。情报局设在贝尔格莱德，它的任务是组织经验交流，必要时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党的活动，并决定出版一份机关刊物。联共(布)代表在会上建议建立常设委员会，遭到波、南、法、意、捷等国代表的反对。他们反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中心，这一建议未被通过。

情报局成立后，斯大林再次强调，情报局"不是共产国际的复活"，对各国党没有约束力，成立情报局的目的是"一面在改善劳工阶级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条件，一面在谋求保卫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然而，在实际上，情报局后来通过的决议不但所有参加国的党都要执行，其他国家的党也要表示支持和拥护。由于苏联党凭着在国际共运中已经形成的特殊地位，粗暴干涉

别国党的内部事务，要求别国党无条件地服从它的指挥，加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日见严重，导致情报局变为苏联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工具，其突出表现就是1948年作出的制裁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错误决议。

苏南两党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在给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物质援助和建立人民政权的问题上，双方就发生一些重大分歧。战争结束后，苏联曾给南斯拉夫以援助，并于1945年签订苏南友好互助与合作条约，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分歧主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1. 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该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大战末期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一地区，英法主张该地区归属意大利，并致电斯大林希望他对南斯拉夫施加影响。苏联竟擅自与西方大国就的里雅斯特归属问题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南斯拉夫对这种做法十分不满，严厉批评苏联这种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做法。苏联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对南斯拉夫提出警告，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2.战后初期，苏联在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中，提出种种不平等的条款，苏联还企图通过合营公司控制南斯拉夫的经济命脉，南斯拉夫决定除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外，拒绝成立其他合营公司。对此，苏联表示严重不满。3. 在酝酿成立巴尔干联邦、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关系、两国贸易、军事专家待遇等问题上，苏南双方也存在分歧意见。

1948年1月21日，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季米特洛夫访问罗马尼亚时对记者发表谈话中说，一俟条件成熟，保、南、罗、捷、阿、波、匈等人民民主国家将和希腊一起，考虑建立联邦或邦联的问题。这一谈话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28日，苏联发表声明表示反对。2月8日，苏联召集南、保两国领导人去莫斯科磋商。斯大林批评季米特洛夫做事象个青年团员那样乱来一气，批评南

斯拉夫在外交上没有养成同苏联政府磋商的习惯。为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事件，苏联要求南斯拉夫以政府名义同苏联签订一项关于相互就外交政策进行磋商的协定，并要求南斯拉夫代表在他们没有参加起草的协定上签字。苏联这种无视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颐指气使的大国主义做法，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强烈不满。然而苏联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的意图是要使南斯拉夫和铁托就范，以便牢固地控制东欧各国，防止任何离心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苏南两国两党关系急剧恶化，走向破裂。

1948年2月底，苏联通知南斯拉夫取消贸易谈判，这意味着两国贸易中断。3月18、19日，苏联决定从南斯拉夫撤走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此后，苏南两党中央交换了七次信件，但分歧并没有消弭。联共(布)中央5月4日信中提出，建议在情报局会议上对南共情况进行讨论，南共回信明确表示反对。

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于6月20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鉴于这次会议将按照苏联党的旨意讨论南共问题，南共拒绝派代表出席。会上，八国党的代表专门讨论了南共问题，并于28日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决议指出，情报局赞同苏联党对南共的批评，指责南共在内外政策中推行反苏反马列主义路线，认为"南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将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于共产主义统一战线之外，从而也将自己处于情报局之外了。"①这实际上是宣布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决议还指责南共背弃国际主义，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将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决议还号召南共党内"健康分子"起来撤换现有党的领导人。苏联党操纵情报局通过制裁南共的决议后，还利用自己的影响，驱使

① 《南苏关系》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5页。

8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发表声明和文章，支持情报局的决议，谴责和批判南共。处于十分困难境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屈服。南共中央作出决议，发表声明，逐点驳斥情报局决议对南共的不公正指责，并在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刊登南共中央声明的同时，全文刊登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并公布了苏南两党的往来信件，让广大群众了解真相，评判是非。

情报局通过关于南共决议以后，苏联党又在东欧各国党内开展了一场所谓"反对铁托分子"的运动，对这些党内具有某种独立自主倾向的领导人进行清洗和整肃。在阿尔巴尼亚，处决了原党中央组织书记、政府内务部长科奇·佐泽等人；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批判了总书记哥穆尔卡的右倾民族主义的错误，决定撤销哥穆尔卡的总书记职务，并将他开除出党；在罗马尼亚，先后有20万名党员被清除出党；在匈牙利，进行了对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拉伊克为首"叛国案"的审判，并处决了拉伊克等5人；在保加利亚处决了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在捷克斯洛伐克，对原总书记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国家中心"进行公审，并以"勾结帝国主义、支持铁托集团"的罪名处决了一批人。在大规模清洗的背景下，情报局于1949年11月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共的第二个决议《南共在刽子手和特务的掌握中》，这个决议进一步对南共进行猛烈攻击和恶意诬陷。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是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在美苏冷战的总背景下，苏联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控制的加强。正是在1948年苏南冲突公开化，情报局对南共进行制裁的时刻，"社会主义阵营"才以相对固定的形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以表明苏联与东欧国家结成一个彼此

完全一致的、有共同信念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不仅意味着这些国家具有共同的社会制度，相互间进行广泛的互助合作，而且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与苏联步调一致。不仅如此，在处理阵营内部关系时，也必须听从苏联的统一指挥，包含加强阵营内聚力的色彩。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情报局成立为开端。以后，随着阵营成员从欧洲逐步扩大到亚洲国家以后，阵营才最终形成。可见，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活动，是同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华政策

早在苏美英三国雅尔塔会议上，为使苏联在欧洲战场结束以后，早日对日本宣战，三国首脑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同意将中国的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对该港拥有优先权，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海军基地，并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这些条件，后来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分4路进军日本关东军盘踞的中国东北各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后，苏联把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欧洲，而美国则把远东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对这一政策，苏联官方曾多次向美使节表示确认。斯大林在同美使节赫尔利的谈话中曾经表示，苏联政府愿意与英美合作，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他还表示无条件地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斯大林在接见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时再次表示，他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他还表示，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

完成中国的统一。”①

由于苏联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冷淡态度，使美国放手大胆地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曾使苏联感到忧虑和不安。第一，耽心中国内战打乱雅尔塔协定划分的势力范围，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危及苏联的和平建设。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斯大林曾派人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苏联代表曾劝说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实际上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两个中国②。第二，斯大林耽心中国共产党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会走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铁托道路，反抗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才打消了苏联的疑虑。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恰当干预，斯大林曾作过自我批评。他说，“在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形势。那时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当时，中国同志在这里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是，他们回到中国后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他们集中力量，组织了军队，而现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拿中国的例子来说，现在我们承

---

① 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4卷)第359—36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学术界也有人认为米高扬没有来华、也没有可能向中共中央提出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的建议，参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余湛、张光裕：《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一文。

认我们错了。事实证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我们。”①1949年7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时，斯大林也作了类似的自我批评，表示为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而“感到内疚”②。

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苏联是热烈欢迎的。因为这是促使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同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在接见毛泽东时又一次说："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③1950年1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访苏，并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

鉴于新中国成立后远东局势发生的根本变化，中苏两国签订协定，规定在1952年底以前，将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的苏军基地及一切设施全部移交给中国。苏联决定给中国贷款3亿美元，首批援建中国50个大型企业，帮助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一方面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苏联对远东政策的变化，在对华援助中体现了它的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在具体谈判的过程中，苏联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倾向。

① 转引自杰吉耶尔：《铁托传》第118页，三联书店1977年版。
② 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8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同上。

第十七章　斯大林的晚年思想和苏联社会

第一节　斯大林的晚年思想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发表

1950年6月20日至8月2日，斯大林接连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答同志们》等三篇文章。后来，这三篇文章汇编成小册子，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的著作，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批判了马尔的语言学理论，阐明了自己的思想。

尼·雅·马尔(1864—1934）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专门从事高加索地区的语言研究。他倡导的语言新学说，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也是有阶级性的。他还认为，一切语言都是由сал、бер、ион、рош等四要素发展出来的。马尔把他的语言学理论称作“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说”。马尔逝世以后，他的语言学说仍然统治着苏联语言学界。马尔的语言学理论，某种程度上是和30年代苏联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斯大林的思想也出现了矛盾。斯大林感觉到了苏联社会存在种种矛盾，如不正视这些矛盾，既不现实，而且还会激化社会上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阻碍苏联社会的前进。斯大林晚年的思想比30年代进步的地方，在于承认苏联社会存在矛盾。这是自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来，社会现实对斯大林教育的结果。这是斯大林写《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思想前提。批判马尔的语言学理论，表明斯大林不赞成把所有科学都贴上"阶级性"的标签。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集中说明了以下几点思想：

第一、斯大林明确回答：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斯大林指出，语言根本不同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旧基础的被消灭、新基础的产生而被消灭和新产生。语言却不是这样。拿俄语来说，50年代初的俄语基本上同十月革命前一样。

斯大林解释说，语言之所以不同于上层建筑，因为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的各个阶级，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创造语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因此，语言是属于全社会的。创造语言、以及语言的发展，是为了社会的人们交际的需要。语言如同生产工具一样，是全社会统一的东西。

当然也不能把语言列为基础，因为语言是社会所有的人交流思想、进行各种交际活动的工具，它调整人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中的共同工作。

第二、斯大林明确回答：语言没有阶级性。斯大林指出，语言一视同仁地为社会的一切成员服务，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语言是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而产生的，并不是到阶级产生才产生。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

来，使人们可以借此开展思想交流。语言和阶级没有联系。

第三、斯大林指出，《真理报》开展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目的在于支持、提倡科学领域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马尔的语言学说，把语言看作是上层建筑，把语言当作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错误的语言学说，限制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再也不能任其存在下去了。

斯大林对马尔语言学错误内容的批评是必要的。批评马尔语言学说的错误，更深刻的内容在于阐述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在讲哲学问题。

自从1938年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以来，苏联的哲学界基本上是在斯大林的文章上翻滚，以致一些基本的、本来是明白的问题，也弄糊涂了，其中包括把语言当作上层建筑，把语言说成是属于特定的阶级的。马尔的语言学中的错误内容，是哲学中的教条主义，充塞全社会的阶级斗争政治学说在语言学中的反映。这点，语言学大师马尔本人也有所觉察。集马尔语言学中错误思想之大成的《巴库教材》，即马尔在巴库讲授语言学的讲义，马尔生前就已废弃，并且不许别人翻印。不幸的是马尔死后，他的学生们却发展了马尔语言学说中的错误内容，并且依仗某些权势，压制不同意见。斯大林所批评的，更多的不是马尔的过错，而是马尔的学生们的错误。语言学领域的这种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斯大林体制的折射反映。

马尔和马尔的学生们所坚持的是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对它的批评具有很高的政治难度。在斯大林发表此书以前，对马尔的遗著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不是被降职，就是被撤职。而一些无原则地尊奉马尔学说的不学无术的钻营者，却得到提升。直至斯大林本人出马批评马尔学说后，局面才有所改变。本来是一个

具体的学术争论问题，一定要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面，又是写信，又是发表文章，错误的内容才能得以澄清，这本身正好反映了斯大林体制所造成的学术领域的不正常现象。

斯大林在批评马尔的错误思想的同时，也表述了自己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思想。斯大林在阐明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这一思想时说："上层建筑是某一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① 当然，上层建筑是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上层建筑还有连续性的一面，即使是道德、民主制等，也有继承性。当基础改变之后，上层建筑并不是全部消灭和立即消失的，而只是部分地改变，另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被继承和延续下去。实际上，即使是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全部被消灭。"全部消灭"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一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在政策实践上导致盲动和蛮干。斯大林在批评左的错误思想时，又宣传了新的左的观点。

语言学中的一个具体学术争论问题，由斯大林这位处于苏联最高领袖人物出来表态，于是，语言学领域由原来的马尔学派的独家统治，如今倒向了另一个片面，即由斯大林语言学派对其他不同学派的独家统治。当然，斯大林也说："马尔的著作并不完全是错误。……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采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野心，诚实地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某些语言。"② 但是，斯大林对马尔的结论是：马尔学派是和"无产阶级文化派"、"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派"一样，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马尔给语言学带来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妄自尊大的腔调，这种腔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523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下)第549页。

调轻率地空口否定马尔以前语言学中的一切成就。"①实际上斯大林是全盘否定了马尔在语言学上的有价值的东西，并把马尔学派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政治体制和斯大林的做法，是造成苏联学术领域各学派不能自由讨论、互相推动，只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重要原因。

斯大林的著作发表以后，苏联的语言学家立即按斯大林的观点重新组织全部工作。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按照斯大林的思想，修订语文教学计划和课程表。语言学家根据斯大林的思想撰写、编纂俄语词典和各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也按斯大林的思想，修订各种著作。

1950年6月29日—7月5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所务委员会和党组及科学工作者积极分子会议，学习并讨论如何贯彻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的精神。7月18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全国科学家协会和哲学工作者积极分子会议，由亚历山大洛夫在会上作主报告。他说："斯大林同志的著作是语言科学上的真正革命。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问题，都丰富并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斯大林同志在其新作中特别详细而又深刻地解答了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②报告还指出：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对所有科学都有伟大意义。

1951年6月10日，全国学术界都开展纪念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发表一周年活动。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说，斯大林的天才著作不仅使语言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而且为哲学、历史学、文学、国家学说、法学等等，都指出了发展道路。涅斯米扬诺夫还称颂斯大林的著作，使历史学、考古学、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542页。

② 见《哲学问题》(苏)杂志，1950年第1期。

人类学获得新的研究方法，并帮助科学家同各种知识领域里的唯心主义的反科学观念展开斗争。

这样，即使是斯大林对马尔和马尔学派的必要批评，由于采用高压和全面政治覆盖手段，也造成消极后果多于积极意义。斯大林的著作成为苏联科学发展的新极限。苏联的学术只好跟在斯大林的身后，踩着斯大林的脚印，艰难地挪动自己的脚步。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发表

1952年2月1日，斯大林写了《对于和1951年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十个问题，并对这十个问题发表了看法。1952年4月21日，斯大林又写了《答亚历山大·诺特金同志》。5月22日，又写了《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9月28日，又写了《答阿·符·萨宁娜和符·格·温什尔两同志》。这四篇文章都是阐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问题，统称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是斯大林生前最后的理论著作。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经济建设问题，对计划经济、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等问题都作了研究，它是苏联经过30多年的实践之后才有的经验总结。这本小册子对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问题，学习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学说史，都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它不仅代表斯大林的认识，也是苏联共产党在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所有的认识。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本小册子在很长的时间里，曾经被各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经典和社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不管怎样，这本小册子是在本世纪50—60年代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

苏联的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着在革命名义下的唯意志论，即夸大无产阶级的认识作用和能动作用，实际上是夸大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是个人崇拜在经济学理论领域的反映之一。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消灭旧的经济规律，也可以创造新的经济规律，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斯大林在书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某些人，或者领导人的主观愿望和主观意志的创造，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①

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就可以说明苏联政府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制定社会生产和消费的计划，但是可能并不等于现实，计划经济并不是万能的，计划经济甚至可能造成在价值规律自然调节下不可能发生的严重失误。

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②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不失为是一个大胆的和令人惊叹的尝试。但是，斯大林所总结的，并没有反映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下，社会经济运动过程的本质内在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的主观意志和主观愿望。苏联的社会实践表明，计划常常同社会的需求脱节。这样，企业为完成指令性计划而生产时，就和用户或顾客的社会需求脱节了。斯大林的总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577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下)第602页。

结还表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容纳不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换句话说，指令性计划经济是不可能“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的”。

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还需要继续总结。资本主义制度是1640年英国革命后出现的。经过二百多年以后，马克思才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从1917年到1952年只有35年，要总结基本经济规律，尚缺乏时间的跨度。斯大林模式也仅仅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总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斯大林来说，也缺乏地域的跨度。总之，总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还需要时间和多方面的实践。斯大林的总结，只能看作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苏联的总结。

第三，肯定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也仍然要起作用。

斯大林指出：苏联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应当作为苏联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积极的因素而保存。由于有商品和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仍然发生作用。斯大林肯定价值规律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是：使经济工作人员合理地进行生产，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现实事物，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实行经济核算，使企业赢利。

尽管斯大林不承认价值规律对苏联社会实际上存在的调节生产的作用，但是他能够肯定商品生产的存在和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比30年代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他的不足是只从存在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上去寻找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没有从国家所有制本身去分析商品生产的原因。而且，斯大林只承认消费品是商品，说：“无论如何不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生产资料看作商品。”他认为价值规律只在消费品生产领域里起作用，在生产资料生产领域里只是有些“影响”。因此，斯大林是半截子的商品论者。

第四、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仍然有矛盾。斯大林不是直率地肯定苏联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矛盾，而是在批评诺特金的“完全适合论”时，隐晦地、半遮半掩地承认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仍然存在矛盾。其实，诺特金的“完全适合论”正是斯大林在30年代后期所倡导的“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理论中派生出来的。1952年的斯大林能够批评1936年斯大林理论的不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可惜由于斯大林过分强调生产关系总是落后于生产力，因此要求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不断革命，使这点进步在实践上也产生消极作用。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的著作，但是也反映了苏联党和国家在当时对社会主义根本经济问题的新认识，在苏联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由处于国家政治权力巅峰的人来裁决经济理论问题的正确与否，对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作出最终定音，这是斯大林体制造成的必然现象，其结果是使理论贫困化和僵化，扼杀了真正的理论研究。

第二节　斯大林晚年的苏联国内政治生活

改革之风的拂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苏联国防、军事力量的增强，

战后初期苏联已有一定的实力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战争期间，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各方面的交往都扩大了，苏联人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西方社会生活的一斑。封闭性社会的缺口打开以后，苏联社会就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和法治秩序的严重挑战。再加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已30年了，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了，政治鼓动的因素已逐渐淡化，种种因素，促使苏联社会出现了缓和国际对峙局势、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更加向前发展的改革思想。

30年代形成的斯大林体制，它的种种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卫国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缓和了这些矛盾。战争胜利后，苏联社会要继续前进，必然要求解决这些矛盾。可是，斯大林晚年不仅无视这个体制的矛盾，反而把这一体制当作凝固的模式，并且凭借自己的权势，强制往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移植。这样，就使苏联社会的潜在矛盾日益显现出来。

在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内部，有一批干部反映了苏联社会中要求提高消费水平、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愿望，开始了隐晦的、谨慎的行动。他们的具体主张是：

在国际局势中，希望造成一种有利于苏联和平建设的缓和格局。他们希望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相对友好的局面，以防止和避免发生新战争。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也有某种可能，实行某种限度的计划经济，对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正确性打上问号。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主张废除死刑。1947年5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废除死刑的命令。命令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在和平条件下已没有判处死刑的必要。当天，《劳动报》以《历史性的文件》为题发表社论认为，真正的民

主制度已经在苏联如此巩固和坚强，我们已经无需用死刑这种最严厉的惩罚来对付我们的敌手了。显然，废除死刑的命令是间接地、曲折地对 30 年代肃反运动重演的预防和纠偏，也是对斯大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理论事实上的修正。1947年6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加强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这一命令的意义，除了确认公民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外，更在于借这一命令来维护宪法的权威性。

为了满足人民对消费品的需求，1946年2月，日丹诺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时讲话中说到：我们已经进入到和平发展时期，工业正在转移到和平时期产品的生产上来；苏联人民长期以来作出了巨大牺牲，现在理应要求迅速地改善生活条件。日丹诺夫强调，国家必须用同样的布尔什维克热情，着手扩大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们不主张强制推行斯大林模式，对东欧各国要求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表示某种谅解和同情，对南斯拉夫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友好和热情。

他们反对以行政命令干预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和争论。早在30年代，米丘林学派和遗传学派就开展争论，米丘林学派一直受到斯大林的有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被贬入冷宫的遗传学派又活跃起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和各高等院校，都建立了遗传学研究室和实验室；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众多的遗传学著作。此时，李森科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不存在种内竞争的论文，使生物学界的争论重新激烈起来。

1947年夏，李森科向联共（布）中央负责思想文化工作的日丹诺夫提出一份长篇备忘录，说明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伪科学”，要求日丹诺夫支持他对遗传学开展大批判。日丹诺

夫一生的思想和行动是矛盾的。30年代，他协助斯大林开展肃反运动，主持了列宁格勒地区的肃反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主持了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政治讨伐。但与此同时，他的思想和行动，更多受沃兹涅辛斯基的影响，逐渐面对现实。日丹诺夫讨厌李森科以米丘林学派大师自居的学阀作风，并且认为遗传学也是一门应当研究的科学，就断然拒绝了李森科的要求。日丹诺夫还表示，不能拿他作为党的化身去干预科学研究。1948年春，日丹诺夫还曾建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将李森科调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岗位。这一连串的事情震怒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受到斯大林的申斥。结果，有关遗传学的所有研究机构被解散，所有关于遗传学的著作被禁止出版，遗传学遭到扫荡。

遗传学的结局成了改革动向的结局。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逐渐觉察了日丹诺夫、沃兹涅辛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人的意向，对改革思潮发起了严厉打击。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猝然而死。

"列宁格勒案件"

1949年秋，苏联内务部部长贝利亚和苏联国家保安部部长阿巴库莫夫掌握下的保安部门，在马林科夫的协助下，经过密谋策划，诈取伪证，并征得斯大林的同意之后，突然逮捕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辛斯基，苏共中央负责国家保安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列宁格勒州委、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委副书记格布斯金等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接着，又在干部队伍中进行清洗，尤其是在列宁格勒地区和高尔基州地区。这批干部，大

多是日丹诺夫任列宁格勒州委、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时提拔起来的，并且长期在日丹诺夫领导下的列宁格勒地区任职，这一事件被称作“列宁格勒案件”，它是继30年代肃反运动以后的又一大冤案，是苏联历史上的又一严重创伤。

对“列宁格勒案件”的审讯是极其神秘的。斯大林在接获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材料”之后，没有认真研究这些“材料”的可靠程度，更没有征询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也没有通过正常的司法手续，立即指示逮捕“人犯”。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对被捕的干部进行惨绝人寰的刑讯逼供，迫使他们在承认自己犯有“叛国罪”的供词上签字画押。1950年1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对祖国叛徒、间谍和怠工破坏者施用死刑》的命令，表明苏联政府要重开杀戒。同年9月20日，这一案件的主要人员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9月30日和10月1日先后枪决。

苏联政府至今没有透露过对“列宁格勒案件”的“起诉书”，或者“判决书”，因此只能从各种现象来判断斯大林杀戮沃兹涅辛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一大批干部的真正原因。当波普科夫等人被捕后，最初的传闻是说他们犯有“贪污腐化罪”，并且受到已调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库兹涅佐夫的包庇。不久，又传出“案件”的主要人犯是犯有“叛国罪”，他们向1948年1月访问苏联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提供了“情报”。实际上，他们都是以虚构的“叛国罪”被处决的。

沃兹涅辛斯基(1903—1950年)是一名具有科学头脑的经济学家，长期主持国家计划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经济建设工作。他看到指令性计划有相对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他更看到指令性计划已不能适应战后和平经济建设工作的需要，要求调整计划工作。这样，他就和斯大林发生了分歧。特别是沃兹

涅辛斯基几次要求削减由贝利亚把持的那些军事工业和特种重工业部门的拨款，压缩这些部门的原材料供应，使国民经济得以综合平衡发展。他甚至敢于当面顶撞贝利亚，凛然申述自己的理由。沃兹涅辛斯基在这样做的时候，显然没有考虑到，不顾一切地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特种重工业，正是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从沃兹涅辛斯基身上，看到了当年布哈林的影子。1949年3月，他和库兹涅佐夫等人一起被突然免职。几天以后，根据斯大林签署的命令，他们被清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0月，贝利亚在马林科夫的支持下，捏造了一个"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机密文件失窃"的奇闻，逮捕并处决了沃兹涅辛斯基和有关人员。

"列宁格勒案件"是贝利亚为首的内务部，在马林科夫的协助下制造出来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是想同时打倒作为政治权力舞台上竞争者的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一批竞争者。自从"列宁格勒案件"发生以后，马林科夫的地位明显地突出起来，俨然成了斯大林的接班人。1952年1月8日，马林科夫50岁生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贺电，称他为"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伟大导师列宁和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马林科夫列宁勋章。1952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向党代表大会作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在贝利亚的有力支持下，接替斯大林生前的职务，担任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

联共（布）十九大的召开

1952年10月5日，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厅开幕。此时，距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闭幕已整整13年

了。大会由莫洛托夫致开幕词，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作《关于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萨布罗夫作《关于1951—1955年苏联发展五年计划（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作《对苏联共产党(布)党章的修正案》报告，伏罗希洛夫致闭幕词。斯大林在大会上只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

大会通过了《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决议说，我们党的双重名称"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是由于在历史上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而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与孟什维主义划清界限，现在已失去意义了。因此，党决定更改名称，把原来的全联盟共产党(布)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由联共(布)改为苏共)。

马林科夫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是大会的中心内容。报告中对国际形势作了新的估计：政治上形成了两个阵营，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中心；经济上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形成了平行的两个世界市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实际上已在瓦解，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在加深。

关于国内形势，报告中指出：苏联的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工业高涨。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现有可能性还远未加以充分利用，许多企业没有很好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许多企业没有很好地利用现有的机械化工具，对装备不够爱护，许多企业和建筑工地劳动组织不能令人满意；企业经营不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具和其他贵重物品严重浪费，生产中大量出废品。马林科夫严肃指出，1951年，在联盟企业中的损失和非生产开支达49亿卢布，其中30亿卢布是由于废品造成的损失。马林科夫当然不会承认这些现象都和指令性计划有关，但也无法回避严酷的现实。

关于农业生产，马林科夫在报告中指出：全国集体农庄从1950年的254000个合并为十九大召开前夕的97000个。"1952年粮食总收获量为80亿普特，而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麦——的总收获量比1950年增加48%。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① 实际上，农村的矛盾十分尖锐，农业生产长期处于某种慢性危机的状态。马林科夫在报告中的浮夸，突出地反映了斯大林体制下各级机关的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等恶劣作风。

马林科夫在报告中承认，在许多州内，亚麻和蔬菜的产量仍未达到战前水平。马林科夫批评某些工作人员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利用职权侵占公有土地；强迫庄员免费供应谷物、肉类、乳类等物品；劳动组织得不好，生产资料无人负责，机器不到时候就坏了。

马林科夫的报告，对合并集体农庄的工作给予肯定，因为这一工作符合斯大林对集体农庄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逐步过渡的要求；对建设农业城镇的工作却进行了正式的谴责。马林科夫严正指出：有些领导干部在合并小农庄的工作中搞大集体农庄镇，拆毁旧的集体农庄建筑和庄员的房屋，在新的地址上建立大的"集体农庄镇"、"集体农庄城"、"农业城"，这是忘记了集体农庄面前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任务，却错误地把消费任务、安排庄员生活的任务放在第一位。

关于党的工作是马林科夫报告中最严厉的部分。马林科夫指出：党内自我批评、自下而上的批评远没有充分地展开，官僚主义、腐化、个别环节发生瓦解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人甚至把

① 见《新华月报》1952年第11期第79—80页。

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还有的人把他们掌管的企业变成私人的世袭领地。马林科夫在报告中严厉批评在一些党组织中，组成家族集团，特别突出的是乌里雅诺夫斯克的党组织。

大会选举出125名中央委员会委员。10月14日，大会闭幕。十九大以后，政治局改称主席团，主席团委员从原来的11名扩大为25名。原有的政治局委员虽然继续留任，但是新的主席团人数扩大了144%，这可以看作是为大换班所作的准备。

"医生间谍案件"

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发表了关于逮捕一批医生——破坏者的消息。这是根据前几天一名犹太女医生季马舒克的揭发而采取的行动。季马舒克揭发说：维诺格拉多夫、沃西夫等15名医生，用有害的治疗，使病人逐渐死亡的方法来谋害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15名医生都是苏联知名的医学权威，其中的大多数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是专门负责克里姆林宫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的。苏联保安机关对被捕的医生严刑逼供，迫使他们供认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实际上，"医生间谍案件"是有预谋的。据当时任苏联卫生部长的叶·斯米尔诺夫回忆，就在1953年1月13日的前几天，斯米尔诺夫到索契附近的别墅看望斯大林时已露端倪。

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克里姆林宫的主治大夫之一维诺格拉多夫发现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就在病历中写下自己的意见："病人需要绝对的休息，建议停止一切活动。"这个建议被认为是图谋中止斯大林的政治活动。当贝利亚把这一建议转告斯大林时，斯大林大发雷霆，喊道："给他戴上镣铐，给他戴上

镣铐！”① 接着就发生了“医生间谍案件”。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发表《披着教授和医生外衣的卑鄙的间谍和杀人犯》的社论。社论指出，这个恐怖集团是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是被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招募去，从事卑鄙的间谍活动。

社论再次批评了“持阶级斗争熄灭观点”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说：“我们的成功不会使斗争熄灭，而会使斗争尖锐，我们向前发展得越是顺利，那么注定灭亡的、陷于绝望的人民之敌的斗争就越加激烈。”社论强调：“这一事件说明，苏联的一些机关和它们的领导者失去了警惕性，感染了马马虎虎的作风。”②

1953年1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由于协助政府揭露披着医生外衣的间谍杀人犯案件有功，决定奖励季马舒克医生列宁勋章。给告密者发列宁勋章，这在苏联还是第一次。诬告有功，季马舒克一下子成了英雄！新任的苏联国家保安部部长伊格纳捷夫在审讯此案时，查遍所有关于此案的卷宗，除了季马舒克的一纸“检举信”之外，没有任何材料足以证明“医生恐怖集团”的存在。

第三节　斯大林逝世

斯大林突然病逝

斯大林晚年，一直住在莫斯科西北30公里的孔策沃别墅，生活的圈子相当狭小。莫洛托夫是斯大林长期倚为得力助手的。

① 参见《“医生案件”的结束》，见《苏联大清洗内幕》第4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转引自《新华月报》1953年第2期，第78页。

1948 年莫洛托夫的妻子被诬陷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者间谍活动”，被斯大林下令逮捕。莫洛托夫因“态度不明朗”被斯大林冷落。1949年 3 月 14 日，莫洛托夫被解除苏联外交部长职务，由维辛斯基继承。常来孔策沃的客人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等寥寥几人。

斯大林经常在深夜请这几位客人来孔策沃用晚餐，在餐桌上商谈、决定党和国家的，甚至是国际性的大事。晚餐既是斯大林的社交活动，也是斯大林的重要办公形式。斯大林的工作日是把白天和黑夜颠倒过来。他的工作方式是奇特的，他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于一般人。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由于健康的原因，斯大林曾两度向党中央提出辞职，希望退休。虽然斯大林在世时没有公开报导过这个消息，也没有关于斯大林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报导，但是，自十九大以后，斯大林已不再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了。

晚年斯大林虽然得了高血压症，仍然是健康的，还在处理和决定苏联党和国家的方针、大事。但是 3 月 1 日警卫人员发现斯大林因脑溢血躺倒在地上，经抢救无效，于 3 月 5 日逝世。

斯大林的历史地位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生于 1879 年格鲁吉亚一个鞋匠家庭。中学读书时，参加了革命。1898年他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一直以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从事各项革命活动，多次受到沙皇政府的逮捕和流放。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

斯大林从 1922 年 4 月开始，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1941年5月6日又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列宁逝世以后，经过一系列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的30年里，苏联从相对落后的、农村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跃进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苏联是本世纪上半期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而苏联的一切都和斯大林的作用分不开，都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斯大林不愧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

斯大林的一生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生都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俄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比理论原则要复杂得多，斯大林在历史舞台上演过有声有色的一幕。和俄国历史上的所有杰出人物相比，斯大林做的事情最多，犯下的错误也最严重。

斯大林的一生有两大主要功绩，足以彪炳史册。

第一、在他当政的30年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苏联从落后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变成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国家。

俄国自从农奴制改革后，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俄国受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的严重束缚，经济发展方面无法起飞。沙皇俄国也竭力效法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榜样，对外发动掠夺战争、建立地区霸权，以求发展。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在日俄战争中被更小、更后起的日本打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尚看不到结果，就已耗竭了国内的人力、财力、物力。现实对半个世纪来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出了历史结论。

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20—30年代，斯大林大体上遵循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原则，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使苏联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世界各大国的工业产值序列中跃进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后

来居上。斯大林以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可能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尽管有严重缺陷，毕竟是人类社会第一个实践了的社会主义模式，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斯大林是建设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

第二，领导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为打败法西斯主义侵略、早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和侵略，是人类社会民主和独裁、文明和野蛮的大较量、大搏斗。它的结果将影响人类社会一个时期的发展。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民主和文明，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繁荣。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有：在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势头上，顶住了德军的闪击战，击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以极大的精神鼓舞；斯大林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导人，并且最终促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苏联是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斯大林则是这支主力军的统帅。

斯大林一生的错误也同他的功绩一样，都是不能忽视的。他一生中的严重错误有三方面：

第一，斯大林在个人品格上有权力欲、猜疑等缺陷；在工作作风上有粗暴的毛病；在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绝对化等片面性。当他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无限权力以后，这些本属于个人品格上的缺点，就和俄国的历史传统、俄罗斯民族性中的落后、消极因素相互作用，变成影响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人民大众能否正常生活的大问题。由于斯大林是在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他的每一项重要做法无形中成为一种先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后来者。他的错误做法不

仅给苏联，而且给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损害。

第二，苏联形成个人崇拜，是因为斯大林的政治体制的需要。过分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家长制、以党代政、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自上而下的委派制，个人崇拜就应运而生，并且反过来又巩固这种体制。个人崇拜不是斯大林个人的罪过，但是个人崇拜的蔓延，斯大林本人负有不可推诿的重要责任。

第三，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作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地动荡不安，戕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损害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

在实践上，斯大林按照这种理论不断地、人为地开展阶级斗争，反复发动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斯大林晚年，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了。斯大林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斯大林逝世本身，为解决斯大林体制本身所造成的矛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十八章　马林科夫执政时期的苏联

第一节　马林科夫的内外政策方针

马林科夫就任部长会议主席

1953年3月6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全体会议，改组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把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合并为一个机构，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由部长会议主席和四名第一副主席组成部长会议主席团。联席会议任命伏罗希洛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解除了什维尔尼克的这一职务。

联席会议对国家行政机构方面的重大改组，是把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合并为内务部，任命贝利亚为新的内务部部长。联席会议还任命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布尔加宁为军事部长。

联席会议对党中央领导机构也作了重大变动。决定撤销原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局，成立新的主席团，新主席团由10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10名主席团委员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4名候补委员：什维尔尼

克、波诺马连科、麦尔尼洛夫、巴克罗夫。联席全会还选举伊格纳捷夫、波斯佰洛夫、夏塔林为苏共中央书记。

联席会议把 1952 年 10 月苏共中央全会选出的 25 名主席团委员缩减为10名，把 11 名候补委员缩减为 4 名，把 10 名书记处书记缩减为3名。改组后的主席团委员，除两人外，都是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时陪同斯大林走上主席台的老领导人。其余新当选不久的主席团委员，都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而被排除出主席团。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的安排是出于大换班的考虑，3 月 6 日联席会议的安排则是从稳定局势的需要出发的。

3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追悼会和葬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在追悼会上讲话，对国内外政策提出了新的构思。他说：在国内政策方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不断地更加增进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苏联全体人民的物质福利。必须不懈地关心人民的福利、关心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法律"。在对外政策方面，马林科夫说："我们最关心的是制止新战争，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认为，最正确、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有效的、以事实为根据并为事实所证明了的一切国家人民间的和平政策。"①

马林科夫的讲话表明，他的国内政策将从抓阶级斗争转向关心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他的对外政策将从同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国激烈对抗，转向缓和。

"医生间谍案"平反

1953年 4 月 4 日，即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月，塔斯社报道苏

① 转引自《新华月报》1953年第4期，第4页。

联内务部对"医生间谍案件"重新做了缜密检查，确定前国家保安部对被告的逮捕是不正确的，是没有任何合理根据的，那些供词"是前国家保安部侦讯部门的工作人员用苏维埃法律所不允许并极严厉地禁止的侦讯方法获得的。"① 苏联内务部宣布释放该案所牵涉的一切人，完全恢复他们的名誉。

当天，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发布一项命令，追回已发给季马舒克医生的列宁勋章。追回列宁勋章，这在苏联还是第一次。

内务部通告宣布，沃西夫等15名医生以及因此案牵连而含冤受屈的人已被释放。实际上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已因残酷折磨而死。

4月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论，强调任何人不得破坏苏维埃法律，保卫着苏联宪法所保证的苏联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律，是苏维埃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高原则。

不久前，当"医生间谍案件"被揭露时，《真理报》在2月8日、9日、11日、12日、16日、18日、19日、20日、22日、23日、26日、27日所发表的文章和通讯，都是关于提高警惕，揭露"杀人犯"、"暗害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内容；现在强调"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这反映出苏联新领导在明显地改变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气氛。

当时，对发生和制造如此重大冤案的原因归结为前国家保安部的领导人的失职，前国家保安部部长斯·伊格纳捷夫和副部长柳明成了替罪羊。伊格纳捷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柳明被枪决。

① 转引自《新华月报》1953年第5期，第116页。

为"医生间谍案件"平反，表明苏联开始从理论上否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公式。

贝利亚事件

1953年7月10日，塔斯社报道：几天以前，苏共中央举行了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贝利亚罪行的报告，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放在党和政府之上，进行反党反国家的罪恶活动，决定将贝利亚清洗出中央委员会，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开除出苏联共产党。全会决议第一次触及了保安机关实行垂直领导这种不正常现象，要求采取措施，加强党对国家机关一切环节，包括对保安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七月全会决议指出：只有全党的集体政治经验，依靠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才能保证对党和国家实行正确的领导。

当天，莫斯科各报还同时刊载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解除贝利亚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并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庭审理。

7月10日，《真理报》还发表社论。社论列举贝利亚的罪行有：1.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来反对党和它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2.千方百计地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切问题的解决；3.企图在苏联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并唆使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活动。

7月13日，《真理报》发表题为《最严格地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的社论，强调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领导的集体性。一个人的决定，从来是或者几乎从来是片面的决定。社论认为不论领导人员是怎样有经验，他们不能代替集体的经验和知识。这表明

贝利亚事件的出现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党内不正常的领导体制。

1953年12月23日，塔斯社宣布，苏联最高法院在12月18—23日秘密审理了贝利亚等人的刑事案件，根据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对贝利亚处以死刑。同时处决的还有原国家监察部部长麦尔库洛夫、格鲁吉亚共和国原内务部部长德卡诺佐夫等人。

关于贝利亚的罪行，苏联的出版物说法并不完全一致。1959年由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强调贝利亚是党和人民的死敌，是政治冒险家，是阶级敌人的代理人。1972年，仍由波诺马廖夫主编的修订版《苏联共产党历史》则强调贝利亚企图利用内务部篡党夺权。

其实，贝利亚的真正罪行，在于他企图利用内务部建立个人的独裁政权。斯大林在世时，为了集权的需要，不适当地扩大内务部的机构和权力，畸形地强化国家的警察力量。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包揽了从逮捕、审讯、处决等司法程序的全过程，成为苏联党、政、军干部都谈虎色变的专政机关。由于贝利亚的坚持，3月 6 日联席全会决定将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合并为内务部，并由贝利亚出任合并后的内务部部长。贝利亚把保安系统的力量和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并且很快对这个系统进行改组，只任用效忠于他个人的人。他还直接控制了苏联的原子能工业、冶金工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莫斯科军区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处在党和国家的最高层的人，都如芒刺背，害怕来自贝利亚的威胁。清除贝利亚是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的共同愿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有 30 多年了，在斯大林死后不再容许警察统治了。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贝利亚自己造成的：他愈是把镇压手段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解决他的问题也只能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密谋方式。

逮捕贝利亚的密谋确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一事件之所以带有宫廷政变的色彩，是由于长期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所造成的，甚至可以说，当时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发动的时间之所以安排在夏季，是因为苏军要在莫斯科举行夏季军事演习，莫斯科军区举行军事演习，借机调动西伯利亚的部队进莫斯科，以迷惑贝利亚的警觉。从种种迹象来看，逮捕贝利亚的时间是6月26日。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撤销贝利亚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职务，并将他的案件提交法院审理。将贝利亚及其主要亲信逮捕之后，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宣布贝利亚的罪行，这种做法当然不符合正常的司法程序，但是对贝利亚来说，是自食其果。中央全会结束以后，7月9日晚上，全国各地方的党、政、军干部分别参加干部会议，听取传达关于逮捕贝利亚和剥夺贝利亚一切党、政职务的通告。全国政局稳定。

逮捕贝利亚的策划者和第一发起人是赫鲁晓夫。1953年3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马林科夫辞去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改变了斯大林时期党政最高领导权集于一身的局面。中央全会组成了新的书记处，赫鲁晓夫是书记处中唯一的主席团成员，成为实际上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之后，步步感到贝利亚的威胁。赫鲁晓夫说服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依靠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苏军高级将领，一举解决了贝利亚的问题。

马林科夫的缓和方针

马林科夫在3月9日斯大林葬礼上的讲话，只是原则性地提及国内外政策的趋向。马林科夫执政后为医生间谍案件平反和处理了贝利亚事件。1953年7月30日，为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五十周年，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苏共中央

马恩列斯学院特发表专文。文章在阐述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同时，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两点：1. 苏联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遵循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有可能长期共处和进行和平竞赛的原则；2. 苏联共产党要无条件地、严格地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从党的宣传工作实践中铲除不正确地、非马克思主义地阐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即表现在宣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个人崇拜的唯心理论。"① 文章表明，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在对内、外方针的决策上有了转折性的变化。

同年8月5—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五次会议，马林科夫在8日的闭幕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马林科夫的演说，可以看作是内、外方针的施政演说。

关于工业发展方针，马林科夫说："我们的任务是在人民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作急剧的转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马林科夫回顾了苏联工业发展的历史，指出苏联共产党是以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国家工业化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终于解决了发展重工业的任务，使苏联拥有了强大的、技术上完备的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总产量中，生产资料的产量1953年已占70%。马林科夫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我们能够因而也必须为了保证更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用一切方法来加速轻工业的发展。"马林科夫提出：迫切的任务是要在2—3年内大大地增加供应给人民的食品和制成品——肉类、肉类产品、鱼类产品、动物油、糖、糖果点心、织物、服装、鞋类、食器、家具和其他家用什物以及文化上和生活上

① 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8期，第80—81页。

需要的物品，大大增加供应居民的各种人民消费品①。

马林科夫提出增加消费品生产的任务，有相当大的针对性。长期以来，苏联的日用消费品质量差，消费者宁愿买外国货而不愿买"通常都以经久耐用著称"的本国货，他说："工业部门的工作者应该以这个事实为耻。"

关于农业，马林科夫承认，不少的集体农庄、甚至整个地区的农业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集体农庄的实物和现金收入很少；畜牧业发展不顺利；马铃薯和蔬菜方面生产落后。马林科夫认为要从组织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庄，以便生产充足的粮食和生产充足的轻工业原料。为了提高农业生产，马林科夫提出，政府将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肉类、奶类、羊毛、马铃薯、蔬菜的收购价格；高价收购农民完成义务交售以外的剩余农副产品；降低农民个人副业义务交售的标准；减低农业税额；国家预算拨款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水平。

关于对外政策，马林科夫认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主要是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个和平阵营在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了争取和平和制止新的世界大战而作的斗争中，获得了重大的成就。马林科夫特别指出：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使蕴藏着极其严重的国际纠纷的威胁的流血惨剧停止了；苏联已经打破了美国在氢弹生产方面的垄断。马林科夫强调说："对苏联政府，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说来，巩固和平和保卫各国人民安全的事业不是一个策略或外交手腕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总路线。"②

马林科夫的演说，阐述了他执政的内、外基本方针。他看到了苏联社会的一些矛盾，认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是管理方

① 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9期，第72—73页。
② 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9期，第79—80页。

面的问题。他想用合并政府各部，大大增加部长的职权，缩减行政机构的经费等办法来解决。对于苏联的整个体制，马林科夫认为应当不断加强。他说，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知道把人民领导到那里去和如何领导他们，因为他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针，"高高举起这面科学理论的旗帜的，是我们的父亲和导师，天才的列宁及其事业的继承者伟大的斯大林。"①

8月20日，苏联各报刊登了苏联政府关于氢弹试验成功的公告。马林科夫满怀信心地想有一番作为。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针上的争论

农业问题的提出

1953年9月3—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

1952年，苏联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了。集体农庄谷物播种工作机械化程度达87%，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谷物达70%，休耕地犁耕工作机械化程度达96%，秋耕的机械化程度达97%，棉花种植业的机械化程度达98%，甜菜种植业的机械化程度达95%②。农村已经实现全盘集体化。可是，粮食产量仍然在40年前1913年的水平上摇摆。这种状况引起赫鲁晓夫的严重忧虑。赫鲁晓夫敢于承认这一事实，并从苏联的实际出发，研究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对策。

9月3日，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赫鲁晓夫以绝大多数的篇幅揭露农

① 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9期，第81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3年9月20日。

业生产方面的落后，并说："根源是在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在于农业领导中的缺点的原因，即我们自己所造成的原因。在这些原因之中，首先是在许多农业部门中违反了物质利益的原则。企业和每个工作人员因付出劳动而得到物质利益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其次，许多集体农庄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最重要的规定"，"违反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的原则"①。赫鲁晓夫还批评技术设备利用得不能令人满意；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缺乏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农村的政治工作和经济任务脱节。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大大增加食品供应；把全体集体农民的物质福利提到更高的水平；提高农、畜产品的国家征购和收购价格；降低集体农民、工人、职员的畜产品义务交售定额。赫鲁晓夫要求根本改革现行的收购制度，"必须从现行的收购制度转变到合同制度"，"使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有售出产品的保障，能预支现款，并以相互买卖的方式获得必需的工业品。"②

赫鲁晓夫的报告，要求按商品经济原则重新确定国家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关系，对自 30 年代以来实行的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提出了疑问。赫鲁晓夫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这对于长期苦于物质匮乏的苏联人民，对于缴纳了 20 年"贡税"的集体农民，具有很大的刺激和鼓舞作用。

9月6日，苏共中央全会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决议说，苏联农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农业。"但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第320页，196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② 《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第324页。

是，农业生产水平没有充分满足居民对于粮食、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对于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农业生产水平与农业的技术设备和集体农庄制度中的潜力还不相称。”①

决议还批评大部分农学家、工程师、牲畜饲养家、兽医都分布在各个机关内，而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则缺乏技术干部。当时，在农业部门中，共有35万名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的专家，其中只有5万名在各机器拖拉机站工作，18500名在各集体农庄工作，将近80%的技术专家都在机关里工作。

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9月15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就赫鲁晓夫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是“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纲领”，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整个农业生产水平不够高以及某些重要的农业部门落后的原因。10月17日，苏联共青团中央也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及苏共中央决议，要求共青团干部都必须熟悉农业生产、熟悉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作。苏联全国各地都开始贯彻苏共中央的决议。至10月20日，仅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已有2076名工程师、机械师、农艺师等技术干部重返农村。其中举出：多夫里科夫由于改良细毛绵羊而获斯大林奖金。此后，就上调到边疆区农业局机关工作，现在又返回一个机器拖拉机站当饲畜师。

垦荒运动

为解决粮食问题，赫鲁晓夫于1954年1月22日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垦荒计划。

① 见1953年9月17日《人民日报》。

赫鲁晓夫在信的一开头就说，马林科夫在联共(布)十九大工作总结报告中关于苏联谷物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说法，"是不完全符合国家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他说：1940年国家收购粮食22亿2千5百万普特，1953年只收购到18亿5千万普特。赫鲁晓夫在信中提出：增产粮食的一个重要的、而且完全现实的来源，就是今后几年内在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地区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以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赫鲁晓夫展示垦荒的前景说，他完全有把握指望每公顷至少收获14—15公担粮食，这样，苏联全国的粮食总收获量就将达到72亿普特。据他测算，开垦这些荒地的基本建设费用约为55—60亿卢布，而所获得的收益，单是1955—1956年度的国家预算收入，即可增加260—280亿卢布。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为既能立即增产粮食，又让农民停止缴纳"贡税"独辟了一条蹊径，赢得了国内苦于长期缴纳"贡税"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拥护，得到一大批干部的支持。

1954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除了重述1月22日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中写的内容之外，又着重指出垦荒的意义。他说："开垦新地的计划是一件辉煌的事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按照这个当前工作的规模及其对全国的意义来说，可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最巨大的事业相媲美。"①

3月2日，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规定1954—1955年至少开垦1300万公顷荒地，要从这些土地上收获11—12亿普特粮食，其中要有8—9亿普特商品粮。为了保证开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3集，第157页。

垦荒地计划的实现，1954年将把12万台拖拉机(每台以十五匹马力计算)、1万台联合收割机、相当数量的其他农业机械运到新垦区去。为了解决技术力量和劳动力问题，要动员10万名机器操纵者到新垦区去。为此规定了有吸引力的物质待遇：去垦荒地的人一律一次发给相当于3个月原薪的补助金；支付旅费；工资增加15%；新播种的土地，凡超过计划规定的单位面积收获量所收割的粮食，其中30%作为额外报酬；每出售100卢布谷物，全苏消费合作社就必须供应价值50卢布的计划商品，等等。

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不是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所作出的决定。他曾担任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书记11年，对农业生产状况和领导农业工作有实际经验。1949年，他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工作。他主管农业工作期间，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的实际产量之间矛盾已经很大。他明白，如果采用提高农产品义务交售指标、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来增加粮食征购量，将会引起农村的不安定，并使农业生产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他曾采用合并小农庄、建设农业城、提高农民生活设施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受到斯大林的斥责。实践也表明此路不通。不过，失败的实践也为他寻求解决农业问题的蹊径积累了经验。开垦荒地是赫鲁晓夫经过调查研究，比较了各种措施的利弊之后所决定的办法。

大规模开垦荒地也只有到50年代才有可能。开垦荒地要有雄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力量。30年代并不具备这种条件。

赫鲁晓夫贯彻垦荒计划的决心很大，采取的措施也很有力，垦荒确实取得很大成绩。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470万吨(合80亿普特)，其中垦荒区生产了5850万吨，占40%以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是1953年的156%。

当然，大规模垦荒工作也有错误：有些地方开垦荒地没有注意水土保持，破坏了生态平衡；新垦区投入了过多的人力、财力和技术力量，影响了原有农业区的投资和生产。不过大规模垦荒确实为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是，权衡一下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估计一下所花的费用和产生的错误，开垦荒地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国家增加了数千万吨粮食，并在短期内建立了极为富庶的新谷仓。当年的垦区现在已经成为苏联稳产的粮食生产基地。

马林科夫坚决反对垦荒计划及其实施。他认为垦荒会使哈萨克斯坦的新地变成一洼灰土；花那么多基本建设投资去冒这种风险是不值得的。他还和卡冈诺维奇一起力图阻止垦荒计划的实施。卡冈诺维奇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拒绝把钱和物资调拨到新垦区去。

马林科夫了解农业生产的落后，但是墨守成规。他想用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资的办法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但是不愿改变要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的基本体制结构。因此，马林科夫的计划，对于农业和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来说，远没有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有吸引力。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固定体制是党指挥政府，当赫鲁晓夫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开展垦荒运动时，马林科夫只能消极对抗。这种消极对抗策略使他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他的计划不能兑现，落得说大话的罪名；不支持垦荒工作，又落得对抗中央决议的罪名。马林科夫的处境十分狼狈。

赫鲁晓夫在几年里集中抓农业生产，在工业生产方面就有意拆马林科夫的台，指责马林科夫的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方针"违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鉴于农业政策上的教训，马林科夫在工业方针上组织了一

点防御性反击。1954年，经济学硕士叶·卡西莫夫斯基在莫斯科财经学院作题为《论社会生产两个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的报告。另一名经济学硕士德·库兹涅佐夫发表《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进程中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专题论文。经济学硕士普·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都来阐明这样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目的是人和他们的需要，生产是为了消费。既然人和人们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重工业，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律。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只有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苏联还处在落后的阶段时才是必要的。这些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年月，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发展轻工业、发展日用品生产上来的时候了。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文中更明确地提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比例应当彻底改变，确定新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①

但是，马林科夫要遵守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方针，又要增加消费品生产。马林科夫企图在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范围内寻找增加消费品生产的理论根据，是十分困难的。1954年12月21日，马林科夫又组织康斯坦丁诺夫撰文纪念斯大林诞生七十五周年的文章，为马林科夫调整工业方针呐喊。文章说："加速人民的消费品生产的纲领将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和苏联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党制定的正在付诸实施的，在经常关心重工业的继续发展的同时，迅速提高人民消费品的生产和进一步加速发展农业的政策，是共产主义建设纲领的一

① 参见1955年1月24日《真理报》。

个组成部分。这一政策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①

3天以后，赫鲁晓夫批驳了马林科夫的论点。12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3个月之前，赫鲁晓夫答英国科学家贝尔纳教授问。关于工业方针，赫鲁晓夫说，"在将来，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重工业上。"② 1955年1月5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告诫地方党委不要"机械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决议"，"各种类型的吹牛大王，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没有研究技术进步中的棘手问题"。1月24日，《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发表署名文章。文章气势汹汹地说："试问究竟为什么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生产不应该高速度地发展呢？为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比消费品工业生产的速度快些呢？"谢皮洛夫称马林科夫宣传的观点是"会葬送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下降曲线论"。文章声言："只有在全面发展和重工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保障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以及农业各部门的持续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这一原则，即使是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不容置疑的。"谢皮洛夫指桑骂槐地称马林科夫为"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分子"，说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可怜又可笑"的③。赫鲁晓夫也嘲笑马林科夫，说："口红不能代替车床"；还说马林科夫的错误政策减缓了工业的发展，"只是给人们可以在街上搞到一块巧克力糖"。

1955年1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报告，说有些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了，这些人企图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就要让位于发

① 见1954年12月21日《消息报》。
② 《赫鲁晓夫言论》第3集，第325页。
③ 见1955年1月24日《真理报》。

展轻工业。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地说："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伙人就曾宣传过这种观点。"①

马林科夫关于"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的方针"，也因受到全面批评而无法执行。实际上，那几年苏联的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国民经济的最落后部门农业上，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解决工农矛盾上。形势很清楚，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不能求得一个突破性的解决，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也很难有大的改变。赫鲁晓夫抓住这一时机，抓住马林科夫全面继续贯彻斯大林模式的矛盾，使其在工业方面的缓和政策无法执行，还给马林科夫戴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帽子。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综合分析，在工业发展方针问题上对马林科夫的批判，并非赫鲁晓夫的由衷之言。工业发展方针问题上的斗争只不过是赫鲁晓夫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和策略，这是一种带有赫鲁晓夫个人色彩的政治斗争策略。

马林科夫在工业方针问题上又遭到失败，只好承认"继续发展重工业，并且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为一切必需消费品的真正高涨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三节　马林科夫辞职

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等人的分歧

1955年初，敏感的西方报纸就开始议论赫鲁晓夫和马林科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第11页，196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夫之间的分歧。2月5日，美国记者赫斯特和史密斯直接向赫鲁晓夫提问："在西方报纸上，例如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有不少关于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发生分歧的言论"，要赫鲁晓夫表示看法。赫鲁晓夫回答："这些报纸可能在把他们的愿望当作事实看待。"史密斯进一步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自己有权利引用赫鲁晓夫回答的话?"赫鲁晓夫回答："这在于你们自己。"① 赫鲁晓夫这是向全世界放风：马林科夫的去职只是个时日问题了。

1955年2月3—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2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宣布，两院联席会议主席收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关于请求解除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申请书。马林科夫在辞呈中说："我清楚地看到，由于我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我没有在部里或任何经济机关中直接管理过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这就对我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复杂和责任重大的职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特别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和对农业中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状况所要负的责任，因为在这以前的好几年中，我一直负责监督和领导中央农业机关的工作，以及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在农业方面的工作。"此外，在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纲领方面，马林科夫也承认："继续发展重工业，并且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为一切必需消费品生产的真正高涨创造必要的条件。"②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马林科夫的申请书，并解除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他为苏联电站部部长。

接着，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任

---

① 见《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第90页，196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② 195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命布尔加宁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命朱可夫为苏联国防部部长。

2月8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国际局势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报告。莫洛托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十年了，十年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苏联一道，还有朝着社会主义采取了只是初步的然而十分重要的步骤的各人民民主国家。"① 莫洛托夫在报告中强调：美国的侵略政策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莫洛托夫反对改善苏南关系，他说这方面同样也取决于南斯拉夫，希望南斯拉夫改变立场。

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分歧，也是改革中不同思想的斗争。为了打击保守势力，赫鲁晓夫抓住莫洛托夫所说"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这句话做文章，迫使莫洛托夫公开检讨。1955年10月，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14期《共产党人》杂志上，刊登给编辑部的信说："我认为，1955年2月8日我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为从这一说法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建成的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这种说法之所以在政治上有害就在于：它造成思想问题上的混乱，同党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决议相矛盾，使得对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发生怀疑。"② 莫洛托夫被迫承认自己犯了悲观主义的错误。莫洛托夫的检讨是公开承认自己是个"蹩脚的理论家"，公开受辱于苏联和全世界面前。莫洛托夫的去职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① 1955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② 转引自《新华月报》1955年12期，第124—125页。

马林科夫的辞职原因

马林科夫从1953年3月6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8日辞职，前后不到两年。从马林科夫在辞职申请书中所申述的内容来看，原因有两条：对农业落后的状况负有责任；摆错了发展重工业和发展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马林科夫说是因为“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其实，这些都不是马林科夫辞职的真正原因。

马林科夫辞职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对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矛盾缺乏清醒的、恰如其分的估计，当他接任斯大林生前所担任的苏联党、政首要领导职务之后，既不具备斯大林的威望，又不愿解决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矛盾，基本照旧。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于1902年出生于奥连堡省一个小官吏家庭。1920年参加红军，投身国内战争，这年的4月加入俄共(布)。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后，马林科夫进莫斯科巴乌曼高等技术学校学习。1925年毕业后，他被选派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工作。偶然的机遇使他走上政治斗争的途程，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他开始在中央统计局工作，不久就被安排在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同时兼任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记录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机密的岗位。在这个小圈圈里，他耳闻目睹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布哈林反对派之间斗争的一切情况。他没有发言权，但是有思考和选择权。反对派的接连失败和斯大林的接连胜利，使马林科夫选择了跟定斯大林的道路。

1930年，马林科夫被提拔担任莫斯科市委人事部副部长、部长。1934年，又被提升为党中央人事部副部长。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卫国战争

前夕，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卫国战争爆发后，马林科夫是国防委员会最早的5名委员之一，领导飞机、发电机等军事工业生产。1946年3月，马林科夫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7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两次获得列宁勋章。1952年10月，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中央工作总结报告。马林科夫是斯大林晚年没有明确宣布，但却是有意安排的接班人。

综观马林科夫政治生涯的大半生，和已经先后消失、曾经有资格当接班人的基洛夫、沃兹涅辛斯基、日丹诺夫等相比，他既没有地方工作的根基，也缺乏敏锐的思想；既没有出众的才华，也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马林科夫各方面都平庸，是斯大林一手培养起来、深受斯大林思想熏陶、唯斯大林话是听的人。马林科夫被斯大林选中作为接班人的条件，正是马林科夫垮台的条件。斯大林死后，他一方面要崇奉和坚持斯大林模式；另一方面又想缓和由于推行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尖锐矛盾，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农业方面，马林科夫要维持斯大林确定的"贡税"体制，同时又提出要消除畜牧业、马铃薯和蔬菜方面的落后现象，多方发展技术作物的生产，保证谷物生产更迅速地发展。为了解决这一任务，马林科夫许诺要提高国家的收购价格，降低农民的义务交售指标，增加农业拨款、提高机械化程度。当赫鲁晓夫提出垦荒计划以后，马林科夫就陷于被动的局面。在工业发展方针上也是一事无成。

除了工农业政策上的失败之外，由于马林科夫要维护斯大林这尊偶象，使得他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也疑虑重重，造成政治上孤立。马林科夫的经历决定了他必然要维护斯大林的偶象

地位。马林科夫一方面看到干部和群众由于肃反运动而遭受迫害，积怨极深，因而也强调增强社会主义法制；但是，他自己背的包袱太重了，当大量的问题涉及他本人时，他就站到平反冤狱的对立面去了。1937年，他曾和叶若夫一起主持过白俄罗斯的肃反工作；他还曾主管过亚美尼亚的肃反工作。1954年12月14日，赫鲁晓夫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并且逮捕和枪毙了前国家保安部副部长阿巴库莫夫。对“列宁格勒案件”的复查证实，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起曾经制造“列宁格勒案件”的伪证，因而力图阻挠这一案件的平反工作。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在制造“列宁格勒案件”中负有重大责任，使得马林科夫本来就不高的威信更加扫地，也不敢为阿巴库莫夫的判决申辩半句。

至此，马林科夫只能辞职了。

第十九章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政治经济

第一节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行进，构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在清除贝利亚、垦荒运动、恢复苏南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赫鲁晓夫表现出他的魄力和才能，他成了政治舞台上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生于乌克兰一个矿工之家。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4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30年代末，这个矿工出身的政治活动家进入了苏联最高领导层，1938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即成为政治局委员，先后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联共(布)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等职，是斯大林晚年仅有的几名受到信任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赫鲁晓夫的才能在斯大林时期就有所显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充分发挥，他以一种较为精明的政治手腕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斯大林死后，他在政治舞台上很快地崭露头

角，表现出他比周围一些领导人更高的智慧、才能和个性。到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赫鲁晓夫已被国内外公认为苏联政坛的中心人物。

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此时，苏共已拥有7215505名党员。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以及来自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代表们注意到，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悬挂斯大林的画像。大会通过的主要议程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苏共二十大对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指示；党中央机构的选举。

2月14日，赫鲁晓夫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接着，他向代表大会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苏联的国际形势"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理论问题，并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构成赫鲁晓夫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联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为理论基础的。赫鲁晓夫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对现实，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三和"的理论和路线，表明赫鲁晓夫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战略指导思想，作根本性的调整。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苏联的国内状况"中，赫鲁晓夫除了重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垦荒地的方针外，还强调加强苏维埃法制。他说："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法制稍微削弱一点，就会使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乘机进行他们卑鄙的破坏活动。"报告特别列举"列宁格勒事件"这样的冤案，并说中央委员会决心采取恢复正

义的措施，恢复那些被无辜判罪的人们的名誉。

在报告的第三个部分关于“党”的论述中，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① 不过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只是一般地阐述反对个人崇拜。

2月17日下午，米高扬在大会发言中激烈地批判了个人崇拜。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米高扬还具体地批评斯大林的这种观点，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的时候，有一些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家知道的论点，这些论点未必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② 这是自20年代末布哈林被批判以后，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斯大林。

2月18日，莫洛托夫在大会上发言。莫洛托夫没有讲和平共处，也没有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是强调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处心积虑地制定各种“威慑”计划，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侵略气息的“解放”计划③。很明显，莫洛托夫的发言是和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的调子完全不同，他仍坚持斯大林所确定的外交体制和格局。

---

① 转引自《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6号第32—33页。
② 转引自1956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③ 参见1956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2月24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它的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和结论。这是以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肯定以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2月25日，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二十大的闭幕会议。在闭幕会议上，代表们通过了关于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代表大会选出133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54名是新当选的）；选出122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其中72名是新当选的）。代表大会选出63名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2月2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里钦柯、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穆希金诺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为主席团候补委员；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波斯伯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谢皮洛夫为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还选举什维尔尼克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选举莫斯卡托夫为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在全世界引起最大的震动莫过于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内部会议上作的。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共中央最高层内部很多成员反对赫

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绝对地反对把个人崇拜时期滥用权力问题提到二十大上来。赫鲁晓夫坚持要向大会提出这个问题。直至二十大召开前夕，这一争论仍不能统一。经过协商，最后双方都作了妥协。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不在正式大会上，而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专门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不公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二个报告。

2月24日深夜11时至25日凌晨，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举行了一次未列入议程的内部会议，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总书记贝鲁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被邀请参加，这是例外）。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有100名在30年代遭受迫害，业已恢复名誉、重返工作岗位的早年党的活动分子。这份名单经过赫鲁晓夫亲自审定。内部会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是因为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选举出来，选举结果尚未宣布；旧的中央委员会已经结束工作。大会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并以第一书记的身分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后统称"秘密报告"。

"秘密报告"的内容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手里拿着的仅仅是一份提纲，尚未最后形成文字。报告的材料是由波斯伯洛夫领导的委员会提供的。此外，在1954、1955年的两年里，赫鲁晓夫曾亲自找过许多过去被逮捕、现已恢复名誉的干部谈话，在他的头脑里也有许多感性的认识和材料。因此，严格说来，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有许多即兴发

挥的内容。

赫鲁晓夫的报告长达4个多小时，松散、冗沓，表现出他惯常那种即兴发挥的特点，实际上他讲了5个问题。

第一、集体领导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原则。赫鲁晓夫指出：集体领导是列宁为党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斯大林与列宁不同。他不是耐心地对人们进行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依靠集体从思想上影响的办法，而是用强迫的办法。他抛开了列宁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从思想斗争走上强迫命令的道路，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道路。”①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不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第二、个人崇拜的最大危害是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们遭受迫害。赫鲁晓夫说，当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剥削阶级基本上消灭，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斯大林采用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凡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或者只是被怀疑有敌对打算的人，或者仅是受到诬蔑的人，都可以加上这个罪名，对他横施镇压，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

赫鲁晓夫追述了30年代肃反运动的过程，指出：大规模恐怖行为的高潮是1937年，被诬告犯有反革命罪而遭逮捕的人数，1937年比1936年增加了9倍多。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名遭到逮捕和枪决，占70%；出席十七大的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有1108名遭逮捕，占一大半。赫鲁晓夫谴责国家保安机关使用严

① 引自《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第51—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秘密报告”引文均见上书)。

刑逼供，以猎取虚假的"招供"；国家保安机关之所以敢于为非作歹，就是因为有斯大林的支持。"最最粗暴地破坏苏维埃法制，对无罪的人实行严刑拷打，以追逼他们招供，乃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第三、个人崇拜使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受到不应有的严重损失。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独一无二的权力给卫国战争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战争爆发前，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不少非常重要的信息，斯大林都主观地予以否定，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希特勒开始军事行动前夕，斯大林又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忽视了德国逃兵的口供，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结果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数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歼灭了大量空军、炮兵、其他军事设施，歼灭了我们大量军事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使我们处于无法防止敌军深入国境的局面。"肃反运动摧残了各级有指挥经验的军事干部。

第四、个人崇拜阻碍了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赫鲁晓夫指出，战后时期，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他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将许多个民族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地迁移走。所谓"列宁格勒案件"是伪造出来的。至于格鲁吉亚的明格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件也未经政治局讨论，中央决议是斯大林独自作出的。"南斯拉夫事件"是斯大林臆造和扩大起来的。"医生间谍案件"实际上什么"案件"也没有，只有季马舒克医生的一封诬告信。

第五、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是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赫鲁晓夫说："个人崇拜达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百般地鼓励和支持对其个人的颂扬。"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个人不良品质归纳为：任性、专横、粗暴、傲慢、滥用职权、病态的猜疑、自我吹嘘和缺乏最基本的谦虚精神，等等。这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由于列宁的严

肃批评，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还稍加检点，以后就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到他晚年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最后，赫鲁晓夫说：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有害方法，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而斯大林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所应当做的。

赫鲁晓夫在内部会议上的报告并没有保密多久。其实，按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挑开反对个人崇拜的帷幕。二十大闭幕后几天，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即指示将报告内容在全国的积极分子范围内传达。接着又在工厂、商业机关、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党员会议上传达。最后，全国都家喻户晓。

对于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内部报告，有些人在感情上一下子接受不了。1956年3月，斯大林的故乡梯比利斯爆发了群众示威游行，反对二十大的决议，反对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游行队伍高喊："打倒赫鲁晓夫！""打倒布尔加宁！""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①

赫鲁晓夫的内部报告在国外也很快传播开来。6月初，美国《纽约时报》在世界上最先刊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又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发行。

于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也广为流传了。

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改变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

① 见罗·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们》。第59页，美国查理兹出版公司1984年俄文版。

越来越尖锐”这一战略指导思想；苏共二十大提出三个理论问题，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改变了自共产国际建立以来的战略思想。苏共二十大可以说是结束了一个阶段，开始了一个阶段。

1．赫鲁晓夫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推倒了斯大林这尊偶象，使个人崇拜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生活中作为一种生活准则结束了，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了斯大林某些教条、僵化思想的束缚，开始了各自探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中心发展阶段。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到的内容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如今出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口，在全世界仍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美国报刊公布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要求苏共中央就报告是否属实作出公开回答；如果属实，他们还要求说明，报告中谴责的那些事情是怎么会发生的。

瑞典共产党机关报《新日报》6月20日发表社论说：“即使这是令人痛心的，也比保持沉默好，因为沉默就使得有可能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形容和诬蔑。但是，我们无法判断，苏共为什么决定全世界仍然不能得到赫鲁晓夫的演说的权威文本。”①

英国共产党中央在4月1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问题发表一个公开声明。6月22日，英国《工人日报》又刊登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声明，对苏共中央没有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问题发表公开声明表示遗憾，说：“发表公开声明本可以使所有各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忠实朋友充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所牵涉到的一切。我党

---

①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46—47页，1956年人民出版社。

没有收到关于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任何正式稿本。"①

美国共产党也于1956年6月25日发表声明说："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自己原是应该发表这篇演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所谈到的问题，不管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恶，完全是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我们不能同意把犯这样严重错误的原因完全归于一个人。"把所有的错误和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行为都归于一个人是同把苏联社会主义进展中的一切成就和伟大成绩归于一个人一样错误的。"②

除了抱怨苏联共产党以外，不少共产党也正式表示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要以苏联为中心，主张各国共产党要根据本国的特点，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应有多中心。

1956年6月17日，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意大利要规划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续探求和实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陶里亚蒂还说："由于制度的复杂产生了不止一个中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再也不能谈论唯一的方向，而应该谈论根据不同道路而实现的进展。"③对于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陶里亚蒂说："苏联的模式已经不能并且也不应该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了。在共产党统治的每一个国家，必须使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和传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运动的组织形式中发生它们的影响。"6月24日，陶里亚蒂在意共中央会议上再次强调：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经验，不能解决其他国家共产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以斯大林模式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以苏联共产党为世

---

①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48页。
② 同上，第55页。
③ 同上，第27页。

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

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作了较为严谨的阐述，同时也默认了赫鲁晓夫作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内部报告确是事实。决议指出，苏联共产党批判个人崇拜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的。决议估价了斯大林一生的功绩；解释了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并且回答了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不揭发这个问题。"斯大林在苏联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他在这一斗争中有时采用了不适当的方法，破坏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个人勇气不够。显然，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斯大林，他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①

2。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各自独立探索和建设的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一段时间里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多异性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二十大促成了它的瓦解。

苏共二十大承认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建设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在事实上取消了把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规范，客观上推动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坚定地走上改革和探索的新阶段。

---

①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168—169页。

苏联是斯大林模式的故乡，也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故乡。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一冲击只能由苏联共产党发动。在苏联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赫鲁晓夫肩上。不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内部会议上的报告，过分强调斯大林个人的责任，过分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忽略了苏联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思想根源，这种认识不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另一个窠臼。

此外还应看到，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牵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党内生活。对于牵涉面这样大的问题，赫鲁晓夫事先没有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协商，只从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矛盾的角度来处理，这是不慎重的，给各国共产党，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本来可以避免或减轻的混乱。

第二节 农业体制的改革

取消义务交售制

自1933年实行义务交售制以来，国家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严重抑制了集体农庄、农民的经营主动性和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已成为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成为苏联农业慢性危机的重要原因。

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提出"使集体农庄庄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公有经济发展的原则"①。在坚持集体农庄集体所有制的范围内，重新提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改革农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8集，第319页，196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副产品的收购制度，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1953年9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决议规定，降低私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畜产品定额。自1953年下半年起免除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羊皮；免除城市居民和工人村居民应义务交售牛奶，一律免除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乳酪；取消1953年1月1日以前历年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积欠部分；免除公职人员应向国家交售肉、蜜、毛、猪皮的义务。

1954年6月24日，苏共中央全会又通过决议：免除集体农庄庄员、工人、职员、渔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社员的私人副业向国家交售谷物的义务；勾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个体交售者的私人副业在谷物义务交售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实物报酬方面的全部积欠。

在作了这些准备和试验以后，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市召开的俄罗斯联邦西北地区各州和自治共和国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国家停止收购集体农庄庄员私人产品的时刻已经来到。

1958年6月1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取消义务交售制的报告。他说：在过去那些年代，"党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在食品生产不足的条件下，收购制度的任务在于动员尽量多的粮食和其他食品，以满足国家的需要"。现在，"收购制度的任务不仅要保证国家拥有必要数量的粮食，而且要给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前提，促进更广泛地发挥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公共经济方面的主动精神"①。赫鲁晓夫建议取消义务交售制，实行集体农庄按国家为各个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价格把产品卖给国家的制度。

---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9集，第227页，196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二天，苏共中央全会决定：认为从1958年起，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以及取消原先规定的对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和集体农庄中的专业站所完成的工作以实物支付报酬的制度是适宜的；从1958年起，国家向集体农庄采购农产品将通过收购的方式进行。

6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从1958年7月1日起，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粮食、油料、马铃薯、蔬菜、肉、奶、蛋、羊毛、饲草的制度，同时取消向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专业站交纳实物报酬的制度。从1958年7月1日起，国家实行统一的农产品收购办法。

实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终于取消了。斯大林给农民规定的"贡税"，终于由赫鲁晓夫予以废止。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

1957年，苏联全国共有7903个机器拖拉机站，拥有60多万台拖拉机。每个拖拉机站约有80台拖拉机，230名左右职工。

机器拖拉机站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它耕种的是集体农庄的土地。它根据耕种面积、而不是按土地的实际收获量向集体农庄收取实物报酬。机器拖拉机站对改进耕地和增加产量不关心，因为农业收成的好坏和它的收益没有直接关系。集体农庄作为农业生产的经营者，主要生产工具却不属它所有，这种现象是苏联30年代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不正常体制。属于不同所有制的两个独立企业参加统一的生产过程，主要生产工具由机器拖拉机站掌握，生产活动成果的责任则完全由集体农庄承担，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赫鲁晓夫形象地称这种农业生产格局为"一块土地上有两个主人"。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研究如何解决集体农庄和

机器拖拉机站之间的矛盾，不要让农业生产资料长期分属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不要使农民长期和生产工具分离。1952年、经济学家萨宁娜和温什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但是，斯大林批评他们的建议"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①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单位的规模越大越是社会主义，这种僵化的固定观念，阻碍了斯大林认识的发展，也使改革不合理的生产体制无从着手。但是不解决这个矛盾，农业生产是难以发展的。

1955年，有人提出，鉴于集体农庄主席和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往往互相牵制，互相扯皮，应当让集体农庄主席兼任机器拖拉机站站长。1957 年开始了这种合并 的试验。在斯 塔克罗 彼尔地区，对 12 个机器拖拉机站作了试验性的合并。合并以后，集体农庄主席同时担任机器拖拉机站站长。

1957年 12 月 26 日，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技术装备和土地要归一个主人》的讲话。他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机器拖 拉机站 的技术装 备卖给某些 集体农庄了呢？我认为这是对的。只要土地和技术装备掌握在一个主人手里，所有的机器就一定会利用得更为有效。这样我们就更能发挥集体农庄庄员的主动性。"②

1958年 2 月 26 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议说：在目前条件下，通过机器拖拉机站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服务的形式，已不再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决议提出：把农业机器直接转卖给集体农庄，分期地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

---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646页。
② 《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第398页。

1958年3月27日，在第五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回顾了集体化和机器拖拉机站建设的历史，指出在30年代工业还不能保证供应集体农庄以拖拉机，集体农庄也没有足够的技术人才，农民还没有抛弃小私有者的习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机器拖拉机站，是以集体主义精神、以全民利益精神教育劳动农民的重要工具。"① 机器拖拉机站也是国家一个重要的粮食储备来源。赫鲁晓夫指出：现在，客观情况已经改变了，一块土地上有两个主人，就产生无人负责的现象，就不能很好地利用技术和土地，在利用技术上也发生一些不正常现象，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被迫要维持两个管理机构来完成同一项任务。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把拖拉机站和其他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赫鲁晓夫设想，通过2—3年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

1958年4月18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定：自1958年起，把农业机械自由地卖给集体农庄，农庄可以分两三年还清贷款。考虑到农庄的经济力量有限，自1958年7月1日起，国家按照新的降低了的价格，向农庄出售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

但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实际上却是赶浪潮式地进行。苏联历史发展的惯性运动使改组拖拉机站工作又违背了赫鲁晓夫的初衷，以"一窝蜂"的方式进行。到1959年1月，全国原有的近8000个机器拖拉机站，只剩下345个了。到1959年底，只剩下34个了。

建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体制

30年代初实行的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过分强调国家利益，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8集，第324页。

大大地损害了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的利益。当时，国家规定的每公斤小麦的收购价格是 3.2—9.4 戈比；每公斤面粉的零售价凭购粮卡的标准价格是 35—60 戈比，不凭购粮卡的商业价格是 4—5 卢布。1935年 1 月 1 日起，苏联政府废除了面包和其他食品配给制和凭购粮卡购买粮食的制度，标准价格和商业价格并存的办法也随之取消。由国家规定统一的固定牌价每公斤面粉是3.4卢布，比小麦收购价高 30—40 倍。

国家规定的购、销价格，直到斯大林逝世都没有改变。1952年，国家的收购价格是：小麦每公斤 9.7 戈比、马铃薯每公斤4.7戈比、蔬菜每公斤 19.2 戈比、牛肉每公斤 20.3 戈比、猪肉每公斤 67.2 戈比、牛奶每公斤 25.2 戈比、蛋每 4 个 2 卢布①。集体农庄就是根据国家规定的这个价格，交售粮食总收获量的20％以及几乎全部畜产品。此外，粮食总收获量的1/3又要作为实物报酬付给机器拖拉机站。

取消了义务交售制，苏联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从原来的"贡税"关系回到了商品经济关系上来。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联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到 1921 年春的工农政治军事联盟。这个联盟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封建皇室、贵族、寺庙、大地产者的土地，领导农民进行国内战争，防止地主贵族和资本家卷土重来；农民则以自己生产的粮食几乎是无偿地支援工人阶级，供应城市和供养军队。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是建立在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战争获胜的利害关系上。这种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是在国内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它是正确地分配现有储备的非常形式。

---

①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 521 页，1986年东方出版社。

第二阶段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农经济联盟。这个阶段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商品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导下，以商品市场作为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结合点。由于以经济杠杆来调节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使苏联国民经济得以均衡地稳步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 1930 年初到 1953 年春斯大林逝世。这个阶段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的"贡税论"，它的内容是：在国家统一的指令性计划下，以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作为农民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农业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现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保证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有计划地缴纳"贡税"；苏维埃国家以农民提供的"贡税"，作为资金的重要来源，集中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个阶段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建立在苏维埃国家用行政力量来平衡国民经济，把有限的资金超限度地集中起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使工业生产超速度地增长，在十几年内赶上和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执政以后，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从"贡税"关系的轨道重新拉回到物质利益的经济轨道上来，开始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扩大和加深了商品经济关系，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工农和城乡间的经济关系，它适应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的需要。

如同"贡税"关系阶段不是"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工农关系的简单重复一样，赫鲁晓夫时期的工农关系也不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工农关系的简单重复。"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在小农个体经济占优势时期的工农关系；"贡税"关系和"工农物质利益关系"阶段是在农业集体化完成以后的工农关系。赫鲁

晓夫时期所确立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体制，为苏联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工业体制的改革

下放管理权和扩大企业权限

赫鲁晓夫在工业体制方面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下放一部分企业管理权，改变管理权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主动权，以调动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工人的劳动热情。

管理权过份集中，势必缩小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建设中的权力。1953年，69%的工业产值是由全联盟管辖的企业中生产的；归各加盟共和国管辖的企业只生产31%。

管理权的过份集中，造成部门结构重叠，层次太多，部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环节过多，平行的、重复的机构过多，管理机关编制庞大，工作效率很低。

管理权过份集中，使得企业制订技术生产财务计划时，审批层次太多，手续繁杂，迁延时日，使企业没有活力。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是为了依靠国家的行政权力，按照国家的意志发展急需的生产。到50年代，过份集中的管理体制已成为工业生产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1954年，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有关决议，裁撤了部分管理机构，缩编管理人员。全联盟46个部和主管部门撤销了200个管理总局和处、147个托拉斯、93个地方管理局。全联盟各部只负责批准以价值和实物表示的产量指标、使用原料和设备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职工人数、工资基金，等等。象编制

计划(批准企业的技术生产财务计划各项指标)、企业的基本建设和改造、销售物资、确定在批准的编制和工资基金范围内的工资等，可由企业自行决定。

1955年5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规定工业和建筑业的总产值、商品产值、基建工作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任务、职工人数、工资基金指标等等，在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只给各加盟共和国规定总额，不再细分。各共和国部长会议自行确定本共和国各部门一切工程项目的项目表、设计任务、财务计算书的批准程序。

同年7月11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指出：目前管理机构庞大，层次重叠、行政人员编制过大。管理机构过于集中妨碍了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具体领导，并降低了各共和国对工业建设所负的责任。决议要求撤销部和企业间多余的组织环节，撤销工厂管理和生产中的多余环节，把一部分设在各共和国境内的全联盟工业企业移交给各共和国管辖①。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又通过《关于扩大厂长权限》的决议。决议说：为了提高厂长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心，消除多余的集中，保证企业有更多的独立性和机动性，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扩大厂长在计划管理、基建投资管理、物资处理、人员编制、工资基金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权限。决议的重要规定有：在不影响完成原批准的产品计划的条件下，企业可以自由接受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订货；有权规定一部分产品的价格；可在企业工资基金总额范围内调整职工的工资。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如食品工业、肉品和奶制品、纺织品、鱼制品、造纸等工业部门的企业和机构，都划归加盟共和国管辖。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

---

① 见《真理报》1955年7月14日。

议通过决议，宣布把一大批原由全联盟各部管辖的企业和组织，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管辖，以加强各共和国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的作用，并更有效地管理企业。1957年3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又通过决议，将工艺方法、技术条件、标准、食品及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批准权限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这样做既可消除过份集中，又可加强各共和国部长会议的职责。

1954—1956年间转交给共和国管辖的企业约有1.5万个。这样，各共和国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31%上升到1957年的64%。很大部分企业管理权分散给各共和国，提高了各共和国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与此同时，开始改变垂直管理，发展按地区联系和经济联系的横向管理。1957年开始了由专业部的部门工业管理制向按地区原则管理的试验。50年代，这一措施并未得到有力的贯彻和有效的推广。

加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赫鲁晓夫执政年代，在指导工业生产中，加强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在这方面重要的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改革国家银行及其信贷结算机构的工作方法。

原先的制度是国家银行及其信贷结算机构对所有的企业，不管经营好坏，都一视同仁地提供贷款。这种制度在30年代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期，对于保证较长时间不能赢利企业的建设和发展生产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它不可能利用贷款对经营不善的企业施加积极的影响，以便促使其改进经营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1954年8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联国家银行的作用与任务》的决议，规定在信贷和结算方面，对

工作好的和工作差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办法，对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实行特殊的信贷和结算方法。这种办法是：只有在上级经济机关保证欠款将按时偿还的条件下才给予贷款；实行特殊结算办法后六个月内仍未完成积累计划或造成超计划亏损的企业，国家银行有权宣布它们为"无支付能力企业"，国家银行将中断对它们的贷款。国家银行给予经营管理良好的企业享受优惠贷款的权利，它们可以利用贷款来支付材料和劳务、发放工资等。

新的国家银行信贷原则，使国家银行的作用不局限于监督所发放贷款使用是否正确，还要通过信贷和结算工作对企业的积累过程和流动资金的完善保管施加积极的影响。

1955年，国家银行对5500个企业实行特殊的信贷办法，其中3750个企业在改善了经营管理以后恢复通常的信贷办法[①]。

第二、调整工资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技术发展迅速，流水作业生产线广泛采用，生产综合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提高，劳动的集体性在深化。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整个集体工作的最终成果来评定生产效率才更加科学，30年代广泛采用的个人计件工资制越来越不适应了，于是普遍改为计时工资制或集体计件工资制，即按某一生产工段生产的最终产品计算参加该工段生产的所有工人的工资。采用计时工资制和集体计件工资制辅以完成高质量指标的奖励办法，对刺激工人的劳动热情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技术的进步，非熟练劳动的工种和工人的比重减少。这样，也有必要调整30年代确定的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从原来的2.5—3倍缩小到

---

① 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347页。

0.8—1倍。

此外，取消工资制度中的部门差别，制定各生产部门统一的国家标准工资。

根据这些原则，1956年第4季度开始，全国实行大面积工资改革。结果，使每月工资在60卢布以下的低工资工人比原来减少了2/3，每月工资在100—160卢布之间的职工比原来增加1倍[1]。实行工资制度改革以后，增加了工资对劳动生产的刺激作用。

对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奖励条件也作了改变。上述人员实行奖励的主要指标是：在生产品名表所规定的产品的条件下，完成和超额完成降低产品成本计划，完成劳动生产率计划，完成对其他经济区的协作供应任务和全国需要的供应任务。上述人员的最高奖金额不得超过本人月工资的40%—60%。生产老式机器或质量低劣的滞销产品的企业，不得授予竞赛优胜者称号和发给奖金。实行新的奖励制度提高了物质刺激在生产中的效率。

第四节　1957年的"反党集团事件"

"6.18"主席团会议

斯大林逝世以后，经过3年多的调整，已经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核心，推行新的改革政策。在最高层领导核心中，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在苏联的内、外政策上，和赫鲁晓夫存在许多带根本性的分歧。苏共二

---

[1] 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352页。

十大以后，分歧更为加深了。

1956年6月9日，卡冈诺维奇辞去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9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他为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6月初，莫洛托夫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11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他为国家监察部部长。至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都只保留了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头衔，兼任一个次要的部长职务。赫鲁晓夫决心改变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而马林科夫等人从思想感情到政策实践，都要维护和继续贯彻斯大林时期的体制。因此，他们秘密地、积极地联合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反对赫鲁晓夫的人，寻找机会，准备在主席团内部发动一次突然袭击，把赫鲁晓夫赶下台。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核心，争取到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的支持，形成了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的多数优势。这个秘密的反赫鲁晓夫小圈圈的关键人物是莫洛托夫。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6），1906年入党。十月革命前他多次被捕，革命意志也锻炼得越来越坚强，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之一，直接领导国内的革命斗争。1921年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年起成为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他是斯大林的重要助手。1939年开始，莫洛托夫任外交人民委员。"固执"是莫洛托夫性格的特点。在外交谈判中，他以刻板闻名于各大国外交界，西方称他为"涅脱"（HeT）①。

莫洛托夫身上有俄罗斯农民纯朴、忠实的一面；也有保守、偏狭的一面。他的这种性格非常适合于在斯大林领导下成为执

① "涅脱" HeT俄语的意思是"不"。在外交谈判中，莫洛托夫对西方的提案几乎都持否定态度，故名。

行者。他习惯在旧体制下工作、生活，反对变革。他仿效斯大林的政治斗争手法，但做起来笨拙得多。

1957年6月5—14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芬兰。莫洛托夫等人利用赫鲁晓夫不在国内的时机，将撤换赫鲁晓夫的行动计划部署定当。

6月14日，赫鲁晓夫结束对芬兰的访问，回到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处成员都前往火车站迎接。在车站上，莫洛托夫告诉赫鲁晓夫，拟于18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的庆典安排事宜，赫鲁晓夫深信不疑。

6月18日，由莫洛托夫主持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开始后，并没有讨论什么列宁格勒建城纪念活动问题，而是由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轮流作长篇发言，批判赫鲁晓夫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在经济政策上是"唯意志论"和一意孤行。对于垦荒运动，他们认为是"冒险"，"把力量不适当地集中于具有冒险性的农业计划上，打乱经济上的平衡，并且妨碍工业进步。"他们称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是"右倾的农民路线"，并说马克思主义者一向以工业化为出发点，而现行的农业政策会使苏联人民对发展工业失去兴趣。他们还指责赫鲁晓夫过分揭露斯大林，动摇了党在共产主义运动和一般运动中的权威地位。他们要求重新考虑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和内外政策。①最后，他们提出，如果赫鲁晓夫承认错误，将保留一个较低的职位，例如农业部长；否则的话，并不排除逮捕的可能性。总之，赫鲁晓夫和中央书记处必须辞职，由莫洛托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马林科夫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由谢皮洛夫

① 参见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第116—117页，英国巴兹尔·布兰克书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

重新出任外交部长。

赫鲁晓夫断然拒绝对他的指控。他以经济和外交上的种种成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在主席团委员中，有7人发言谴责赫鲁晓夫；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3人。在主席团候补委员中情况相反，除谢皮洛夫之外，其余的都支持赫鲁晓夫。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故意作长达6小时的发言，以拖延主席团会议的时间。

主席团会议经过3天的激烈辩论，最后通过表决：赞成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提案的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伏罗希洛夫；反对这一提案、支持赫鲁晓夫的有赫鲁晓夫、米高扬、基里钦科、苏斯洛夫，主席团表决的结果是7：4。主席团候补委员谢皮洛夫受委托起草了撤换赫鲁晓夫、改组党中央书记处的决议。莫洛托夫等人要求将决议立即交塔斯社广播，并且在《真理报》上刊出。

赫鲁晓夫拒绝接受主席团的决定，他提出理由说，第一书记是由党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主席团选举的，因此撤换第一书记必须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决定，而不能由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的这一要求当然是合法的。莫洛托夫等人反驳说，我们对中央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并不担心，但是主席团应当首先作出决定。他们拒绝召开中央全会。

此时，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长时间的秘密会议，以及会议的目的不断被泄露出去。在莫斯科的21名中央委员来到克里姆林宫，拥到主席团会议室外面，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他们还向主席团递交了一封信。其中说：

"我们，苏共中央委员得知中央主席团一直在开会。我们也知道你们在讨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书记处的领导问题。

对我们全党来说这样重要的问题，是不能撇开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为此，我们作为苏共中央委员，请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并把主席团讨论的问题拿到中央全会上来讨论。我们，中央委员们，不能对决定我党领导人选的问题袖手旁观。”①

这样一来，主席团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就由是否撤换赫鲁晓夫、改组中央书记处，转到争论要不要把这一决定提交中央全会来讨论，主席团会议的主题也变了。主席团被迫接见中央委员会代表。不过，主席团认为，赫鲁晓夫已经被撤职了，决定由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出面接见中央委员会代表。赫鲁晓夫坚持说：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有权接见中央委员。最后，达成妥协，由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为一方；由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为另一方，会见中央委员。

在那两天里，在京的中央委员们急速地把散居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集中到莫斯科来，有些人是朱可夫动用军用飞机把他们接来的。可以作为朱可夫这一行动的佐证是：苏联每年6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一年一度的航空表演，1957年说是因为“气候恶劣”而突然取消，实际上是因为政治气候的原因而取消的。这样，到21日，已有107名中央委员集中到莫斯科。中央委员代表谢罗夫威胁说：如果主席团反对召开中央全会，那么他们将撇开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

6月中央全会

苏共中央全会已经是非召开不可了。6月22—29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苏斯洛夫被推为会议主

① 见伊格纳托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报告，《真理报》1961年10月25日。

席，向中央全会报告主席团会议讨论的情况。

第一次会议连续开了35个小时。全会听取了赫鲁晓夫《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全会也为莫洛托夫安排了讲话，使他有机会发表他的观点。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的国际地位》的报告。

赫鲁晓夫的报告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中央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的领导人都不愿意恢复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的领导。新提拔的年轻领导人，更害怕恢复昔日的集权体制。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的计划已经完全失败了。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在会上检讨各自的错误，马林科夫也承认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想自己收篷，要求收回原先的提案和决定。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们都不同意，他们提出要揭露"反党集团"。

6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完全转到揭露、批判"反党集团"问题上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被改组。全会撤除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除了谢皮洛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全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由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朱可夫、伊格纳托夫、基里钦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等15人组成。

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责他们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形成"反党集团"。决议列举他们的错误是：反对党的路线，力图更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来的党的领导机构；反对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以及在立法方面的权力，并且反对加强地方苏维埃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的作用；在农业

方面不承认有必要增加集体农民在扩大农产品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顽固地反对为消除个人崇拜后果、消除以前违反革命法制的行为以及防止再发生这种事情提供条件的措施。

在外交政策方面，莫洛托夫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决议谴责莫洛托夫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改善苏南关系，反对缔结对奥地利和约，反对关于目前条件下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反对和平过渡，反对和其他国家政治领导人建立个人接触，等等。谢皮洛夫在会上被斥为"政治娼妓"。

接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也作出决定：撤除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电站部部长职务，撤除莫洛托夫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监察部部长的职务。

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大半生都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翻滚，他们熟知斯大林时代对待"反党集团"的办法。当他们自己终于落到这个境地时，内心充满恐惧。中央全会闭会的第二天，卡冈诺维奇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你已经多年了。我请求你不要让我遭到斯大林时代用来迫害人的那种待遇。"赫鲁晓夫给他回答："卡冈诺维奇同志！你的话再一次证实，你们曾经想用甚么样的方法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你们曾经想把国家拉回到个人崇拜时存在的秩序上去，你们想镇压人们。你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别人。可是你们错了。我们坚定地遵守并将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如果你们能象全体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劳动的话，你们将得到工作，你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生活。"①

果然，莫洛托夫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大使。马林科夫被任命为哈萨克共和国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站长。卡冈诺

① 见1961年10月28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发言，载《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1日。

维奇被派到彼尔姆州索利卡斯克著名的乌拉尔钾矿联合企业任经理。而谢皮洛夫则被派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1958年3月27—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布尔加宁"交出"政府首脑的职权，由赫鲁晓夫自任部长会议主席。1960年5月，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解除伏罗希洛夫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任命勃列日涅夫担任这一职务。至此，完成了领导权的转移。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在六月事件中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他们不顾苏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看不到人心思变的历史潮流，坚持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经济体制；他们思想保守，丧失了革命者应有的敏锐，站到时代发展潮流的对立面；他们反对给千百万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更失去了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他们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矛盾，不少是属于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上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影响矛盾的根本点是继续维持斯大林模式，还是改革斯大林模式。

1957年六月事件中，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指望在主席团会议室里解决问题，就象斯大林时代解决重大问题一样。他们只看见在主席团里拥有的表决上的优势，看不到他们的悖背时代发展，脱离干部和群众，是几个孤家寡人。他们被作为"反党集团"揭露以后，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他们已经不能继续担当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角色了，终于因跟不上苏联社会前进的步伐而被抛弃。赫鲁晓夫给他们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这是苏联党内斗争不正常的遗风的反映，也是历史惯性运动的一种表现。但是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处理，比起斯大林时代对"反党集团"的处理来，要开明得多了。仅此而言，也是历史的一个大进步。

第二十章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政治经济

第一节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

1961年10月17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新建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40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405名；另有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截至大会前夕，苏联共产党拥有9716005名党员。参加大会的还有各国外交使节、世界各国各大通讯社和各大报纸的记者，这在苏共代表大会的历史上尚属第一次。

赫鲁晓夫主持了开幕式，并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他再次肯定"两个体系的竞赛成了历史现阶段世界发展的枢纽和基础"。关于垦荒工作，赫鲁晓夫说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东部其他地区已开垦了4180万公顷荒地，新垦区提供的粮食占国家全部收购粮食的40%，1961年可以采购33亿普特。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用很大的篇幅强调要丰富物质生活，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他说："党认为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相结合是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正在把我们引向、并且必然会导致建

立富裕和实行按需分配，导致共产主义劳动的胜利。"他又说："只要劳动者对许多物品的个人所有权，作为个人消费的形式，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不变成目的本身，它同共产主义建设是不矛盾的。但是，过广的个人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而且往往变成社会进步的障碍，变成私有风气的温床，会导致小资产阶级蜕化。"

赫鲁晓夫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他说："党的政策贯穿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苏联的阶级关系也进入了新时期，"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一方面把发展国家机构、将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改造为社会自治机构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将继续执行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交给社会团体的方针。"①

10月18日，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的报告。赫鲁晓夫说：苏共二十二大将作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赫鲁晓夫说，苏共历史上的三个纲领好比一枚三级火箭：第一级使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级使国家上升到社会主义，第三级的任务则是使国家进入共产主义轨道。赫鲁晓夫说："谁要想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我们可以自豪地对他说：请读读我们党的纲领吧。"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说：苏联将从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为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道路上的极重要的里程碑。"②

10月26日，赫鲁晓夫又在二十二大上作长篇的总结发

① 1961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② 1961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言。

10月 31 日，宣布党中央机构的选举结果。苏共二十二大选举产生 175 名中央委员、155名中央候补委员、65名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10月 31 日，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科兹洛夫、柯西金、库西宁、米高扬、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等 11 人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格里申等 5 人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对苏共二十二大的评价

1961年 10 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距苏共二十大已有五年半（1959年 1 月 27 日——2月 5 日举行的苏共二十一大只讨论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是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这五年半时间里，赫鲁晓夫基本上实现了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苏联的人造卫星飞上天，载人宇宙飞船两次遨游太空，并且成功地返回地面。苏联在和美国的空间技术竞赛和热核武器竞赛中，在某些方面还居于领先地位。苏联的工业、农业在这几年里都有长足的发展。所有这一切，使得赫鲁晓夫的头脑也发热、膨胀。赫鲁晓夫想以召开苏共二十二大来放一颗政治卫星，但是实际情况却走向赫鲁晓夫愿望的反面。苏共二十二大和二十大相比，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内容：

第一、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提出了当代国际局势发展的三个理论问题；而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宣布苏联要在 20 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并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上超过美国。这种脱离实际、想入非非的计划，只会给赫鲁晓夫留下将共产主义庸俗化和说大话的丑名。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赫鲁晓夫称之为"一个具体的、科学地论证了的建设共产主义纲领"。"计算表明，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上，赫鲁晓夫说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道路上的极重要的里程碑。"① 关于全民民主问题，在1960年7月7—8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就提出来了。这次讨论会是由苏共莫斯科市委、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会上，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提出，在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阶级被消灭以后，苏维埃民主就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民主变成全体人民的民主。这是最先提出全民民主问题。按费多谢耶夫的意思，早在30年代苏联就变成全民民主国家了。关于赫鲁晓夫所说的这种"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是什么？从无产阶级民主发展到"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性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连赫鲁晓夫自己也是一笔糊涂账。

实际上，赫鲁晓夫当时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让苏联人吃得好些、穿得好些，即所谓"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赫鲁晓夫这个人物的另一方面特点，他理论知识修养浅薄，但是喜欢猎奇和别出心裁。

第二、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及后来的总结发言中，再次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斯大林的"罪行"作了十分具体的揭露，而

① 1961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且对基洛夫的被害事件又一次提出怀疑。到此时，赫鲁晓夫还把个人崇拜这一具有深刻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严肃现象，统统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这使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时的严肃性消失了，把那时已有的片面性引向极端。

关于基洛夫被害事件的疑问，赫鲁晓夫作了细致的描述。他说："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死亡的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他在报告中提出三点疑问：为什么凶手曾被抓获过并给予释放？基洛夫的警卫人员为什么远离被保卫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为什么突然死于"交通事故"？其实，这三点疑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早已提出来了。现今又更详细地提出这些疑问，对于下文又毫无进展。这只能作这样的解释：或者他根本没有认真去调查；或者他是有意散播毫无根据的对斯大林的怀疑，把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引向个人意气攻击。

赫鲁晓夫的报告是有意把大会的注意力引向清算斯大林的"罪行"，并借死人打击"反党集团"里的活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严厉批判卡冈诺维奇是一个"堕落的人"，早就该开除出党了。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则批判马林科夫，也要求把他开除出党。政治局委员福尔采娃发言也是批判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罪行"。其他代表发言都同声揭发30年代滥用职权的"罪行"。随后，"反党集团"的人物都被撤职、开除出党，回家过"领养老金生活"，使1957年处理党内不同政见问题的一点民主气氛消散了。

把斯大林的灵柩搬出列宁墓是事情发展的逻辑结果。10月30日上午，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斯皮里多诺夫在大会发言中，建议在最短时间内把斯大林的灵柩从红场的陵墓中迁到另外的地方去。于是，大会决议，认为斯大林的水晶棺继续保留在墓中

是不适宜的。10月31日晚，斯大林的灵柩被移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坟墓前面竖立一块花岗石墓碑，刻着"约·维·斯大林"。

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为共产党人如何安排后事作出了榜样，保存遗体的做法，不是共产党人应当仿效的。问题在于赫鲁晓夫的做法，导致苏联在全国到处拆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就连伏尔加—顿河运河上的斯大林青铜塑像也被轧碎送去熔化掉。这种有意的矫枉过正，导致历史的可以避免的反复，显然在政治上也不是明智的做法。

第三、苏共二十二大使社会主义阵营悲剧式地分裂，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骂式地公开争论。

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谴责的内容涉及阿尔巴尼亚的内政。

各国有不同的具体困难，各国共产党也有不同的处境，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同强迫推行斯大林模式的不正确一样，强迫在同一时间、用同一方式开展反对个人崇拜也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斯大林时期的错误，采用的方式也是强加于人。这种做法，加速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分裂。

苏共二十二大表明：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出现的分裂和争论，虽然经过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协商，虽然发表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也无法消弥。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了。这样的分裂方式，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意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导致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经济、文化、体育、卫生等各方面联系的中断，导致国家关系的决裂。这种昔日兄弟今朝仇的分裂方式，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

展都不利，对宏观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也不利。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是和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行径密切相关的。

第二节　工农业生产的起落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问题

大规模开垦荒地给苏联的农业生产带来奇迹般的成果。1954—1956年，苏联的播种面积增加了29%。1954—1958年与1949—1953年的四年相比，粮食每年平均收购量增长37.6%①。

但是，农业生产也存在着新的问题。赫鲁晓夫原想经过4—5年之后，新垦区就可以在正常情况下从事管理和生产，国家只要每年追加适当投资就能使农业生产稳定下来。实际上，赫鲁晓夫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气象观测表明，东部垦荒地地区的气候条件，5年中只有2年适合小麦的生长。大规模垦荒是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全面铺开的，破坏了原来的自然生态平衡。1960年3、4月间，"黑风暴"使新垦区受灾耕地面积达400万公顷以上。1963年哈萨克斯坦又有2000万公顷的耕地受黑风暴侵害。中亚地区4500万公顷耕地受大风的侵蚀。由于大规模开垦荒地，破坏了水土保持，伏尔加河、顿河、马拉尔河下游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积泥沙12500吨。有些地方的水库由于泥沙的淤积五年内储水量减少了85%。1962年干旱的夏季，风化侵袭波及几百万公顷。仅在巴夫洛达州，就有150万公顷沃土被风刮走了。

---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488—489页，1986年东方出版社。

1960年12月，马茨凯维奇被解除农业部部长的职务。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奥利尚斯基继任农业部部长。马茨凯维奇被派到哈萨克共和国一个新建制的边疆区任苏维埃主席。当天的《文学报》还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题，发表了一篇小品文，指名批评马茨凯维奇隐瞒农业生产的真实情况。

1961年1月中旬，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承认，农业生产"没有做到步调一致地共同前进"，"七年计划的头两年对农业是不顺利的年头"。赫鲁晓夫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各地方领导人弄虚作假，"非常轻率地提出很高的保证"，骂他们是"败家子"。

2月20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根据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改组了苏联部长会议农业部，并且成立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具有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的权力。

进入60年代以后，苏联从上到下都明白，农业生产无法达到七年计划中极度浮夸的指标。赫鲁晓夫把原因归咎于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劳动的时间太少，花在宅旁园地上的时间太多。赫鲁晓夫又严格限制宅旁园地，以便用强制性措施把农庄庄员的主要精力用于集体劳动。于是，全国舆论开始了对宅旁园地的讨伐，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残余"；称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庄员为"投机倒把者"。但是根据统计，50年代末，宅旁园地产品的80%是农民家庭自己消费，只有20%拿到市场上出售。而这20%构成城市市场上出售的新鲜蔬菜的50%、新鲜水果的30%左右①。这些限制和谴责，立刻导致农庄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市场价格随之上涨。

---

① 参见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151页。

1962年3月上旬，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党对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农业生产状况表现严重不安。他说："如果我们保持目前这种播种面积的结构、饲料作物的安排和单位面积产量，那末非但今天，就是明天也不会有饲料、肉和奶，有的只是决议、号召、呼吁和恳求"。赫鲁晓夫再次谴责草田轮作制。1962年夏天，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全国大面积取消休耕地，约1200万公顷的休耕地种上了玉米、向日葵等作物。这一不顾苏联气象、水文、土壤条件的瞎指挥，使1963年的干旱变得极其严重。1963年，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农业灾难年。

1963年收获季节刚刚开始，全国不得不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为了解救国内的困境，苏联外贸部门向国外大量采购粮食。国家没有足够的硬通货储备来支付巨额的粮食进口。赫鲁晓夫被迫动用国家的黄金储备。第一次就有500吨金锭运到伦敦的黄金市场上抛售。这一年，苏联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和南美进口肉类，从新西兰进口黄油，从北欧国家进口家禽。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并且宣布正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在农业上要依靠资本主义各国进口来维持国内生活，这对赫鲁晓夫来说，除了经济困难之外，在政治上的打击也是致命的。

"玉米热"及其失败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增加饲料粮，使饲养牲畜从原来的以青饲料为主改为以精饲料为主，赫鲁晓夫提出，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扩大玉米播种面积。赫鲁晓夫看到，玉米是美国的主要饲料，美国的畜牧业是由于玉米的高产而兴旺起来的。赫鲁晓夫当政以后，在大使馆中设立农业随员，搜集农业生

产的情报，供苏共中央研究时参考。赫鲁晓夫还不断派出农业代表团、访问美国和其他国家。赫鲁晓夫通过这些渠道，将搜集到的情报和苏联的农业生产状况作横向比较，急于想赶上美国，以至只根据一些表面数据，在缺少论证的情况下，盲目要求扩大玉米播种面积。

赫鲁晓夫指出，1953年美国玉米的播种面积占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35%，相当于小麦的播种面积；玉米的产量达45亿普特，占全部谷物产量的55%。美国的玉米几乎全部用作饲料，美国正是靠着玉米才得以使畜牧业高度发展的。1953年，苏联的玉米播种面积只占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3.3%，收获量只有2.3亿普特。"增加谷物生产的最大潜力就是扩大我国玉米的播种面积。……玉米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同时可以解决两个任务：既可以补充谷物来源，它的秸秆又可以做成很好的青贮饲料。"[1]赫鲁晓夫在1954年2月底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就大声疾呼：改变墨守陈规的草田轮作制，扩大玉米播种面积。在赫鲁晓夫看来，玉米将拯救苏联的农业，为农民开辟致富之路，"能够开辟富裕道路的不是草田轮作制，而是玉米。……我现在主张，将来也要主张，现在争取，将来也要争取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2]

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推广种植玉米也遇到很大的阻力。苏联传统的小农经济观念，把用粮食喂牲口看成是浪费粮食的行为而受到谴责。此外，很多人一向把草田轮作制看作是唯一的科学的耕作制度，认为改变草田轮作制，会降低土地的肥力，破坏土壤结构，最终破坏耕地，导致地力衰竭。有些科学家还提

---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第20页。

② 同上，第127页。

出，单靠玉米是喂不好牲口的。沃龙涅什畜牧兽医学院副教授兹房科维奇挖苦说，"难道因为玉米就得改造牛的胃吗？我们被这玉米搞糊涂了"①。推广种植玉米也遭到当时的苏联农学泰斗、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激烈反对。李森科甚至说：以玉米为主食会严重损害人的健康。一批国营农场场长也抵制种植玉米。扎列奇耶国营农场场长在沃洛格达州的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刻薄地说，要慎重对待种玉米的决议，"否则我们要把整个行星都种上玉米了。"

推广种植玉米中出现的反对意见，有的是偏见，有的确有合理、科学成分。赫鲁晓夫没有作具体分析，一概斥之为"陈腐、保守观念"，用行政手段加以压制。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也没有作小范围试验的情况下，就由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强行要求大规模扩大玉米播种面积。1955年，玉米的播种面积达到1800万公顷。此后，机械制造部门加紧设计和制造机械化种植玉米的专门设备。科研部门也加强玉米的育种和其他研究。乌克兰专门成立了玉米研究所。莫斯科的展览馆专门开辟了一个玉米展览厅，苏联农业部还创办了一本新的科学杂志《玉米》。食品生产部门也研制和增加了用玉米制作的食品的种类。50年代末，形成了"玉米热"。

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苏联的自然条件确实不适宜种植玉米。种植玉米要求集约经营，投资多，这也是苏联所不具备的。以玉米的秸秆作青贮饲料，比苏联传统的多年生青贮饲料三叶草、牧场草等，成本高出两倍以上，而产量反而低，是一件赔本买卖。"玉米热"终于冷下来。到60年代初，"玉米热"变成赫鲁晓夫的政治笑柄，使他狼狈不堪。"玉米热"作为一场闹剧，随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第141页。

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收场。

工业党、农业党的划分及矛盾

1962年11月，苏共中央举行了讨论国民经济领导体制问题的中央全会，决定按生产原则自上而下地改组党组织领导体制，将党组织分为领导工业的党委和领导农业的党委两套班子。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原想解决干部专业化方面的矛盾，但是实际实施的结果不仅不能解决原有干部专业化方面的矛盾，反而造成新的更大的混乱，成为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又一重要原因。

1962年11月19—2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经济发展和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问题。赫鲁晓夫在全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经济发展和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报告。他指出，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从组织上改组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必要性已经成熟。党兼管工农业生产给挑选干部造成困难，必须把生产原则作为自上而下地建立党机关的基础。赫鲁晓夫要求取消现有的区党委，建立分管农业和工业的两个平行的党委。

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苏联共产党的领导管理方式和体制将作很大的变动。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内，设立领导工业生产的苏共中央局和领导农业生产的苏共中央局。在苏联现有的边疆区、州的范围内一般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即：成立包括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学校和科学研究所、计划机构、设计机构和其他为工业生产和建筑业服务的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边疆区、州党组织；以及成立包括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试验站、农业学校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原料加工企业、采购机构和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机关和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边疆区、州党组织。与此相应的是，各级苏维埃及其执委会也分成两

套班子。

11月2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决议。决议要求按照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关，认为党以往领导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使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出现空喊和忙乱现象，妨碍正确地安排党的干部，不能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生产原则。"①

根据上述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工业和建筑业局以及苏共中央农业局。接着，各加盟共和国及莫斯科、列宁格勒、阿尔泰等州和边疆区的党委会，分别成立了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导局。为了协调这两个局，原先没有主席团建制的都选举成立了主席团。共青团和工会也作了类似的划分。新建立的领导工业生产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组织，各自遵照苏共章程，开展自己的活动。

这样，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会分成了工业和农业两个委员会。一个边疆区或州的党委会分成彼此独立的工业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相应地作了这样的划分。原来一直按行政区划管理的原则，变成按生产的类别进行管理。各加盟共和国和全联盟的党中央机构也作了分工，分别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工业生产领导局和中央委员会农业生产领导局，党的组织机构分成了在工作上互相独立的两个部分。基层区一级的组织、管理机构也跟着作相应的改组。

随着这一改组，昔日的州委第一书记，在地方上是令行禁止的权威，如今变成工业书记、农业书记的"二元体制"。这种"二

① 1962年11月24日《真理报》。

元体制"从一开始就反映出政令不能统一、指挥失灵的矛盾。例如农业州委奉命不仅要负责管理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及其他与农业相关的行政机关里工作的共产党员，而且还要负责管理在为农场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但是，培养教师的师范院校、为粮食服务的修配站却由工业州委管理。农业州委书记想在州里组织一次农业工作者会议，就必须与工业州委书记商量；同样，如果工业州委书记想增加城市的蔬菜供应，也必须与农业州委书记进行协商。每个州都组成两个州执行委员会，因此就要建立两个公共卫生部门、两个教育部门、两个财政部门、两个文化部门、两个民警部门，等等。机构更加臃肿、重叠，办事效率更低，助长官僚主义。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分清究竟是工业书记、还是农业书记主管一个州？他们都各自行使职权，都直接向中央委员会工业局或中央委员会农业局报告工作，接受指示。赫鲁晓夫的这一措施，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是苏联的一党制体制不能容忍的。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几乎招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的不满。这一改革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结束。

第三节　赫鲁晓夫下台

10月中央全会

1964年10月，在一次宫廷政变式的事件中，赫鲁晓夫被迫"辞职"。

1964年9月，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在策划撤换赫鲁晓夫，并且决定由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0月初，赫鲁

晓夫离开莫斯科，前往南方黑海之滨度假。乘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的时机，主席团布置好撤换赫鲁晓夫的计划。10月12日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这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等22人，演出"逼宫"一剧。

当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13日上午，才由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远在南方度假的赫鲁晓夫，告诉他主席团已就他提出的改革农业的建议进行讨论，请他立即回莫斯科参加会议。起初，赫鲁晓夫加以拒绝。他说："这个问题不急于讨论。况且，我在休假。我需要时间休息"。勃列日涅夫坚持说："如果赫鲁晓夫不返回莫斯科的话，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愤愤地说："那好，派飞机来接我"①。

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后，甚至没有被允许回家就来到主席团会议室。赫鲁晓夫坚决地为自己辩护，但是除了米高扬外，几乎全都反对赫鲁晓夫。主席团会议一直继续到13日深夜，赫鲁晓夫看到大势已去，终于表示愿意递交"自愿退休"的声明。

10月14日下午，苏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苏斯洛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撤换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苏斯洛夫列举赫鲁晓夫的"罪状"主要有：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随心所欲，藐视主席团的意见；把成绩都归为己有，自我吹嘘，任人唯亲；成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造成管理混乱，助长两党制的形成；外交场合讲话不慎重，对兄弟国家态度傲慢；对科研及其他问题都喜欢瞎指挥；对外援助乱许诺、乱挥霍。

从苏斯洛夫所列举的"罪状"来看，多数是属于具体工作上

---

① 参见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第236页。

的问题，并不涉及党和国家的根本方针决策问题。赫鲁晓夫也出席了这次中央全会，他一直保持沉默。只有米高扬认为这样指控赫鲁晓夫是不公平的，赫鲁晓夫毕竟使苏联从斯大林模式的严重束缚下解脱出来。苏斯洛夫的报告未经讨论，中央委员会就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决定，并且通过了取消他的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

就这样，赫鲁晓夫在"逼宫"式的投票中下台。14日晚上，他回到家里，把皮包扔到一角说："好了，就这样。我现在退休了。他们可以用简单的投票方式把我赶下台，这也许是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要是斯大林肯定会把他们统统抓起来。"①

从此，赫鲁晓夫就退出了苏联政坛，成为一名"荣誉退休者"，过着领特殊养老金的生活，直至1971年去世。

赫鲁晓夫改革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联，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从1954年到1964年的10年是赫鲁晓夫的生命中最具特色的10年。在这一时期里，赫鲁晓夫从反对个人崇拜、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入手，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改革。他对斯大林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作了改革。但是，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观仍然没有超出斯大林模式的范围。所以，他对斯大林终究是继承多于批判，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延续多于改革。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政治体制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自上而下委派制的选拔干部；对各级领导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都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变。在经济体制上，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体制没有

① 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第245页。

改变；刚刚开始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来探讨价值规律的作用和意义；生产规模和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从观念到实际，都没有改变。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总体上说，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范围内，对斯大林模式的明显不适应部分进行改革。从宏观上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继承者，而不是斯大林的叛逆者。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改革已使苏联社会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不变的框框，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挣脱了斯大林某些教条的束缚，把苏联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政治体制上，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触及到一党制的苏维埃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制衡问题；在经济体制上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进而触及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要求重视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赫鲁晓夫以他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之所在，否则的话，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赛中就要落伍。

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从苏联社会发展的最迫切的实际需要开始的。斯大林逝世前后，政治上最尖锐的矛盾是平反冤狱，赫鲁晓夫从这里开始揭露个人崇拜的危害；经济上最尖锐的是粮食不足，经济运行机制停滞和僵化，赫鲁晓夫从这里开始要求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赫鲁晓夫改革斯大林模式开始是不自觉的，是出于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迫切需要。10年的历史表明，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充分理论准备，并无总体规划。赫鲁晓夫的改革在初期是有声有色的，到后期则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模式的故乡改革斯大林模式，其阻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些阻力除了来自苏联国内，还有来自国外。

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的改革更显得可贵。改革斯大林模式也不可能通过赫鲁晓夫的一次改革所能完成的。赫鲁晓夫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对斯大林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一次冲击。

第二十一章　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的文化科学

第一节　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教育事业趋于稳定发展

50年代中期，普通教育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各共和国直辖市、各州、各边区和大工业中心，开始实行综合技术教育。1957年9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吸收中等普通教育学校毕业的青年参加工农业生产》的决议，要求全国各企业、工地、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应当根据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方针，接受青少年参加工作和训练，使普通中等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和就业劳动训练结合起来。这一改革，反映了苏联领导从教育体制上探索双轨制。普通中等学校的毕业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等学校，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进入劳动就业的行列。因此有必要从教育体制上提出双轨制问题。普通中等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实际上是综合职业教育。

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反映了苏联中等普通教育从着意培养专门人才转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30年代，苏联的普通中等学校十分重视和突出基础理论教育。坚实的基础理论教育，

对于升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当然十分必要和有利，但是对于立即劳动就业就显得很不适应。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说明斯大林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历史任务大体已告完成。

1958年1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法》，以八年制普及义务教育代替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八年制学校是不完全中等普通教育的劳动综合技术学校，实际上是一种准综合型职业学校，它既有基础理论教育，又进行综合职业训练，和今后一面工作、一面进行业务专门职业训练学校相衔接。这反映了苏联社会已发展到需要大量的熟练劳动力的水平了。

50年代后期，高等教育事业又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全国有765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186万7千人。50年代末，有些高等学校进行合并，高等学校的绝对数有所缩减，而在校学生数仍然增加了。1961年全国有739所高等学校，分布在全国247个城市，在校学生达到260万。全国还有3300所中等专业学校，22万4千所普通学校，在校的中、小学生共3620万。苏联已建立起完备的教育配置和教育网。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61年，各类学校共培养了480万名高等专业人才和770万名中等专业人才。

苏联的高等学校很重视招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1961年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有一半以上直接来自生产单位，且具有两年以上工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学生都有生产实习课。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普遍成立大学生科学协会、各种科学小组和技术设计局等，开展积极的课余科学实践活动。高等农业学校学生全部学习时间的一半必须实地参加观测和劳动。全国指定60个国营农场作为大学生的实习基地。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作为

一种教育思想和方针，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加以贯彻。

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科学技术事业上的成就堪称是辉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在海军装备、航空装备、防空系统、技术军事设计等方面都落后于美国。斯大林决心在这方面和美国一比高低。斯大林不仅在物质保障方面把一切为军事服务的科学技术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他甚至说："不要用政治学习讨论去打扰我们的物理学家，让他们把一切时间都用到专业上去。"①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投掷两颗原子弹后，苏联在这个领域里集中了优势力量，加紧进行研制原子弹。伊戈尔·库尔恰托夫率领了一大批物理学家，潜心从事 原子技 术的研究。1945年，在莫斯科以北80英里、伏尔加河畔的杜布纳，选址建造原子能研究中心。9月，库尔恰托夫研究组已经掌握了反应堆原理和核爆炸的各种可能方法。仅仅由于铀太少，加上其他设备一时还跟不上，使得原子能研究工作的进展发生困难。1946年12月25日，第一个大型生产钚的反应堆在杜布纳开始运行。1947年，苏联开始建造几个生产钚的大型反应堆。库尔恰托夫亲自巡视各建筑工地和工厂。1947年底，苏联政府正式声明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秘密。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是从铀块里提出纯裂变材料，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就是把纯$^{235}_{92}U$（或$^{239}_{94}PU$）集合在一起。

苏联第一次核爆炸是在 1949 年 9 月 23 日进行的。1950年苏联立即投入能用于实战的原子弹试验。1952年 11 月 1 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一个荒岛上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然而，那是

---

① 转引自罗·麦德维杰夫《苏联的科学》第46页，1981年科学出版社。

一个重65吨的庞然大物，且装置复杂，当时根本无法用火箭或飞机运载。1953年8月初，苏联在北极圈内的弗兰格尔岛爆炸了氢弹。8月8日，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宣布：美国在氢弹生产方面已不是垄断者。美国对散落的粒子进行仔细研究，证明苏联的氢弹设计运用了新的方法，那是一颗小巧的、可以运载的炸弹。半年以后，美国才改进了自己的氢弹设计。

苏联同时也在探寻和平利用原子能。1952年，苏联在奥布宁斯克兴建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1954年夏开始发电。尽管这是个试验性的小型核电站，它的试验性附属部分所消耗的电力超过它所能生产的电力，但是它对发展核动力舰和核潜艇的原子能组件有实际意义。1954年7月，苏联盛赞和平利用原子能。

1955年12月，苏联爆炸了第二颗威力巨大的热核装置。这次爆炸是在高空进行的。这次爆炸向全世界表明，苏联已经拥有可以运载的氢弹了。

实际上，苏联的运载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就开始加紧进行。领导运载技术研究的是苏联杰出的宇航工程师谢尔盖·科罗列夫（1906—1966）。1933年，科罗列夫就领导了液体燃料火箭飞行的研究。1945年开始致力于弹道导弹发射和飞行研究。1946年，苏联在离里海不远的布什基里亚荒原上，建造了火箭研究中心，主持这个研究中心的就是科罗列夫。1947年，科罗列夫在这里设计出第一枚军用弹道火箭。1955年，科罗列夫设计了可以运载核武器的洲际导弹，并在1956年进行了成功的试验。这是一枚由7枚（7级）小型火箭组合而成的庞然大物，带有一个特别的同步推助器，这枚7级火箭被称作"七重奏"。这个集簇系统，可以改造成多级火箭，它的最后一级可以加速到第一逃逸速度。

1957年8月，经过改造的多级火箭试验成功。10月4日，这枚多级火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1960年10月20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有装置火箭的核潜艇。1961年4月12日，苏联宣布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宇航员是尤里·加加林，宇宙飞行的主要设计师是科罗列夫。

以热核武器为先导的热核燃料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梯。蒸汽、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奉献物，原子能的发明和使用已有社会主义制度的贡献了。苏联的研制原子能不仅有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苏联社会也为之付出过牺牲，其中的突出事件是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埋葬废料处理场的爆炸事故。

南乌拉尔车里雅宾斯克地区是埋葬核反应堆所产生的废料的处理场。多年来，废料埋在一个简陋的地下掩体中。核科学家曾再三提出，这种原始的处理废料的方法很危险。但是，当时苏联政府急于充实核武器库，又受阻于物力和技术力量，因此一直没有改进核废料的储存和处理。果然，日积月累，由于废料埋得太浅和密封不严，废料中剩余的钚，一部分被泥土吸收，积聚起来。天然雨水冲刷，泥土湿透，残存在泥土中的钚发生核的连锁反映。1957年底，终于发生了爆炸惨祸。这场核废料处理场爆炸，把污染的泥土抛上高空，大风把放射性云吹出几十英里之外，即使是这片人烟稀少的地区，也有几万人受害。这次事故以后，苏联政府才真正重视核废料的处理。

科学技术政策的谨慎调整

苏联的科学技术政策也开始作谨慎的调整。1953年10月下旬，苏联科学院大会选举了科学院主席团。科学院主席团由

各学部秘书及李森科等12人组成。选出苏联科学院院长为涅斯米扬诺夫，副院长为巴尔金、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主席团学术秘书长为托普切夫。

1954年开始，陆续给一批科学家恢复名誉。埃夫罗姆森因从事摩尔根学说研究而三次被捕，关押了10多年。1954年出狱时已年过半百。此后，他从原来研究蚕的遗传学转向致力于研究人体遗传学。无线电电子学家别尔格也长期被关押，出狱时已60多岁了，但仍以余力从事控制论的研究，创立了苏联科学院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委员会。一些原来被禁止研究的学科领域，也都重新开放，建立新的学科研究机构。

斯大林时代，科学研究领域实行极为严格的保密制度。这对于防止外国窃取科学情报，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一味的严格保密，变成了各个科研机构的自我封闭和自我隔绝，把必要的、正常的国内外科学研究交流和信息往返全都禁止了，这就反过来阻滞了科学的发展。赫鲁晓夫时代恢复了正常的、必要的科学研究交往。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联合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苏联派遣了一个大型代表团出席。苏联在国内创办《原子能》月刊。其他象控制论问题、宇航研究等也创办了专门刊物。

1956年，有几百名科学家呼吁恢复遗传学，特别是放射遗传学的研究。1959年，苏联在奥布宁斯克建立了医疗放射研究所。

第二节　文坛的变化

“解冻”文学的出现

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苏联文坛流行“无冲突论”。这一

理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异化文艺理论。在"无冲突论"的影响下，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为政治口号作图解的作品，被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硕果，出现了一批粉饰现实矛盾的作品。"无冲突论"的政治依据是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相适应"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文艺创作中就要求表现好与更好之间的矛盾，否认社会上有好与不好之间的矛盾。有的作家，感到政治空气压抑。他们想说话，但是不敢说，也没有地方说。爱伦堡在1948年写成的论文《谈作家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在1953年10月号《旗帜》杂志上公开发表。为什么等到斯大林死后才发表这篇论文？爱伦堡说："我经过了长时期的犹豫才决定发表这些有关作家工作的意见。""我自己问自己，提出有关作家工作的问题的时候是否已经到来呢？我认为，这时候已经到来了。"①斯大林逝世，爱伦堡感到松了一口气，呼喊"解冻了！"实际上，这不仅是爱伦堡一个人的感受，而是苏联一部分人的声音。

爱伦堡在文中要求让作家写他所熟悉的人，不要强令作家写他所不了解的人。爱伦堡认为，作家是以特殊的、洞穿社会的眼光来观察社会，作家观察人要窥见人的灵魂，作家才能的主要特性就是那种对于人的灵敏的感觉。当作家看见了一些人、看见了一些事情、产生了一些感情，到非写出来不可的时候，就能产生热情洋溢的著作。作家绝对不要写他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不管作家抱什么见解，如果他描写他所不熟悉的、或者不了解的人，那么就一定失败。爱伦堡不无感慨地说：可是，"作家不可能

① 伊里亚·爱伦堡《必要的解释》第57页，198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要写谁就写谁。他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的选择上都受到限制。”①

爱伦堡强烈反对把人物脸谱化，把生活简单化。他认为作家应该更生动地、更全面地、更真实地描写决不平凡的普通人，把和人的精神成长分不开的困难，把进步和背着旧时代残余的包袱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可是，苏联小说里的正面人物都是没有缺点的先进典型：衣服穿得很漂亮，头发梳得光光的，每个人对于自己所担当的角色都排练得挺熟。作家尽量使正面人物具有种种美德和优点，越是这样就越是使人感到不真实。但是，适得其反的是，反面人物却总是比正面人物更真实、更具体，因而更可信。

如果说爱伦堡在《谈作家的工作》中，从文艺理论上发难，那么他的中篇小说《解冻》发表，就以创作实践来体现“解冻”了。1954年5月，《解冻》在《旗帜》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部，1956年又发表了第二部。《解冻》一反苏联小说的模式。小说里众多的人物群里，没有一个英雄模范人物，优良品质罕见。小说的主人公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坏事常常被认为是惯例，而好事往往是例外。《解冻》在1954年的苏联，可以说是一部离经叛道的小说。《解冻》的发表，立即在苏联文坛引起激烈争论。

《共青团真理报》率先发表专论《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认为苏联文艺界确实问题很大，广大读者对作家还有严重不满。其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并非文艺指导方针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形而上学，而是“在战后的文学中还很少有描写先进人物——苏维埃时代真正英雄形象的优秀作品。”②文

① 《必要的解释》第12—13页。

②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2页，198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章指责《解冻》"没有刻画出一个真正先进的、强有力的、朝气勃勃的苏联人的形象。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些受过创伤的、受过委曲的、'精神失常'的追名逐利者和阿谀奉承的人。"①

《共青团真理报》的专论，引起不少作家的反感。1954年6月15日，《文学报》刊登诗人苏尔科夫的文章认为：爱伦堡的小说有"一些缺点"，"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不应该是武断的、肤浅的，有如《共青团真理报》最近所作的那样。"②

1954年7月17、20日，《文学报》连载苏联作家协会书记西蒙诺夫的长篇文章《爱伦堡的新的中篇小说》，认为："《解冻》这篇小说中的很多篇页都是缺乏艺术性的断断续续的记录——在这篇作品里，观察的草率和浮浅不仅非常显著地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同样有不良的影响。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篇小说，在我看来，比起伊里亚·爱伦堡最近15年来所创造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③西蒙诺夫在文章中还批评爱伦堡对广义的艺术界的看法也是不公正的，"即使在这部小说出现以前，我们的艺术也决不是一个完全冻结了的冰娃娃。"④

1954年8月3日，爱伦堡在《文学报》上发表反批评文章《关于康·西蒙诺夫的一篇文章》，认为西蒙诺夫的文章对"我们的文学来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同年12月，爱伦堡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一个正在发展和日益巩固的社会绝不怕真实的描写；只有注定灭亡的社会才感到真理的可怕。我们文学中的真实性并不违背党性，而是和它紧密相关的。我们

---

① 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4页。
② 同上，第147页。
③ 同上，第160—161页。
④ 同上，第172页。

大家都知道，伟大的艺术一向是带有倾向性的，也就是说充满热情的。”①

关于《解冻》的争论，很快越出了作家的范围，扩展到广大读者中。他们纷纷给《文学报》写信，发表各自的看法。在50年代苏联文坛上，形成一支“解冻”文学流派。“解冻”文学是苏联社会在一个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文学流派，它的中心主题实际上是要求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内涵提出了疑义，要求允许暴露社会的阴暗面。1954年12月，召开了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对《解冻》及由此而出现的解冻文学流派进行了讨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也作了反思探讨。大会对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作了修改，即删去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语。

爱伦堡的小说《解冻》是粗糙的、不完美的，但是它在敲开文艺领域长期冰封局面方面，这位老作家确实表现了敏锐和活力。但是，在文艺领域，毕竟只有完美的、高超的珍品才能占领读者。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在表现苏维埃人品质的同时，也表现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小说拓宽了文艺作品的战争题材，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艺创作的实际运用方面跨出了新的一步。

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深沉的笔触，结合哲理的思考，着意刻划一个普通人在遭受了非人的肉体上和心灵上的折磨后仍然压不垮的精神。小说在开拓战争题材上也是一个新的突破。小说在反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

① 《必要的解释》第63页。

同时，如实地描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心灵上留下的创伤。肖洛霍夫把沉重无比的压力加在诚实的、勤劳的、与世无争的安德列·索柯洛夫身上，而且在任何地方也不想改善他的境遇。肖洛霍夫就是通过主人公的这一悲剧来表现苏联人民对生活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为争取生活的胜利而不息地努力。

小说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上是高超的。这是打破僵化的文艺思想的结果。《一个人的遭遇》以其自身的完美在苏联文坛上站住了脚跟。1957年第4期《文学问题》杂志发表谢尔宾娜《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认为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在整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创作思想，那就是人在严峻的斗争条件下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的更完善的形式，胜利地克服社会生活中的敌对条件。文章评论说："肖洛霍夫的主人公没有被命运的任何打击所摧毁。他没有颓丧，没有失去希望，没有同其他人疏远，而是以一颗饱受创伤的，然而是善良的、坦荡的心灵去迎接生活。"

1958年5月28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修改联共（布）中央1948年2月10日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全心全意》的评价。决议说：把肖斯塔科维奇等天才的作曲家说成是音乐中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代表是错误的，是个人崇拜时期突出的缺点。决议认为：上述歌剧的脚本和音乐有缺点，应当给予恰当的批评，但是1948年2月的中央决议显然是明显地夸大了，反映了斯大林对待某些艺术作品的偏见和主观态度。1959年5月18—23日，召开了全苏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要求广泛团结一切作家力量，鲜明地刻画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英雄功勋。大会认为在艺术创作上没有什么渺小的主题，只有对主题的渺小处理。生活方式、家庭关系、爱情生活，对谁也不是禁止写的主题。

60年代的文坛

批判个人崇拜在文学领域里的影响，解冻文学的流行，使文学领域里的自由化呼声越来越高，引起苏共领导人的忧虑。1962年12月17日，苏共领导人会见文艺工作者，抑制自由化的呼声。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强调，不能容许有任何脱离我国文学艺术主要发展路线的现象。他批评有人“不正确地理解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性质，有时候忘掉了我们的思想立场的不调和性和不妥协性。”伊利切夫警告说，艺术家的良好愿望也完全有可能使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为敌对力量的利益服务。他强调，党在文艺中过去和将来始终捍卫党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高标准，它的核心是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管这种真实多么严酷。

12月26日，苏共中央又召开意识形态会议，伊利切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强调文艺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不能没有舵、没有帆，他表示党在艺术领域里过去执行了、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样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反对动摇和脱离文艺发展的主要路线，为文学艺术的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性，为文学艺术同人民的生活和同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不可分的密切联系而斗争。”

60年代，文学作品是丰富多采的。柯切托夫继《茹尔宾一家》(1951年发表)之后，又发表了《叶尔绍夫兄弟》，作品表现了当代工人的生活热情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西蒙诺夫发表了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三部曲《生者与死者》，以及《军人不是天生的》。作品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战争的惨烈，以更深刻的态度，探讨获得胜利和遭受失败的原因。马尔科夫的《父与子》、奥布霍夫的《生活是阻挡不住的》等叙事小说，由于作者多半是过去

事件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他们的叙述实际上都表达了作者对过去事件的评价。

肖洛霍夫发表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小说叙述了集体农庄生活的复杂问题、农业生产的困难、以及农村的精神生活等多层次、多角度场景。小说向读者展示，不管促使达维多夫采取行政手段的意图有多么美好，不管他一看见田里游手好闲的哥萨克就冒火的动机是多么善良，也没有理由为格列米雅其农庄主席的命令式和最后通牒式的工作方法进行辩解。在经过一场由于他的辱骂和呵斥而引起与庄员不顾情面的谈话之后，达维多夫终于思考自己行为错误的程度。当初，他被派来领导农民时，深信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他明白，他不了解这些人，他不懂得他们的想法和心情！

60年代的文坛，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无冲突论"的束缚，也克服了"解冻"文学在感情上的冲动和偏颇，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了苏联社会的丰富生活。某些作家的自由化作品受到了应有的批评。诗人叶甫图申科的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丑化斯大林，遭到各方面的批评。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3年)，也受到文艺界和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

第三节　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进展

哲学研究的新趋向

1953年9月以后，苏联的哲学界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批评教条主义，认为教条主义是哲学界的主要倾向。1953年第14期《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率先批评教条主义、书呆子习气，认为这是党的宣传工

作中最根本的缺点之一。

10月19日，苏联科学院举行庆祝苏联共产党成立50周年联合学术讨论会。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开幕词中说："苏联社会科学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根除书呆子习气、教条主义和以引文的堆砌代替活生生的科学思想的企图。"

接着，1954年第2期《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社论说："苏共中央向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与科学中的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作斗争，与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作斗争。"社论指出，尽管报刊上登载了不少反对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的文章，但是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的毛病比比皆是，有时连与教条主义斗争本身也陷入了教条主义泥坑。因此，为了真正消灭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就必须根本改变科学研究工作的方法和实践。

长期以来，苏联哲学工作者仅仅局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从事研究活动，如：辩证法的4个特征和哲学唯物主义的3个特征，以及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这些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问题。而苏联一些最大、最出名的教研室，如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高级党校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莫斯科大学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列宁格勒大学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以及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组，"工作进行得毫无生气"，"表现不能令人满意"，"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工作成了最荒芜最落后的一个部门。"一些高等学校的哲学教学大纲，把辩证法弄得这样贫乏，仅限于解释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内容。一些学者提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从辩证法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方面性来研究辩证法。"

1956年，为纪念普列汉诺夫诞生100周年，各杂志、报刊发

表了各种文章。列宁致普列汉诺夫的未发表过的书信也在《共产党人》第16期上发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普列汉诺夫的5卷本《哲学著作选集》。哲学界也参加了国际交往。1956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参加了国际哲学联合会。

为了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于1958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作为苏联高等学校和相应的自学者的教材，统一使用。这本书的前言说："本书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同时，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作者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而为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问题进行斗争。"①

然而，苏联的哲学思想仍然是由政治需要所左右，在哲学领域，比其他意识形态领域枯燥得多。

直到60年代，苏联才开始注意控制论和系统论的研究。1960年7月5日，苏联《哲学杂志》编辑部与美国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诺尔伯特·维纳举行座谈。同年第8期《哲学杂志》发表列克托尔斯基和萨多夫斯基合写的文章《论研究系统的原则——有关贝塔兰菲的一般系统论》，文章全面介绍了贝塔兰菲的系统论。此时，西欧、北美国家在控制论、系统论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就，苏联哲学界才开始涉足这个新的科学领域。

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讨论

斯大林逝世以后，那种人为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分为商品生产和非商品生产的观点，立即受到经济学界的质疑。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靠行政威势来垄断学术争论，对于科学事业的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2页，1959年人民出版社。

发展是多么有害。

伊康尼科夫在1964年第2期《货币与信贷》杂志上撰文，论证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的职能是统一的。他正确地说明，确定苏维埃货币为价值尺度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消耗在产品生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论这些产品是不是商品。坚持苏维埃货币作为统一的价值形式，就为承认价值规律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同样起作用，开了很好的头。

但是，即使在60年代，在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会导致商品生产的消亡。这方面，马雷舍夫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196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社会计算和价格》一书中，认为商品生产同公有制不相容，"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互相排斥的概念。"① 马雷舍夫在1961年第8期《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坚持认为"我国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不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买卖。这是社会主义按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产品的有组织的形式和物质方式。"②

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商品生产，不同意马雷舍夫等人的观点。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以及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看法也不全相同。

有的认为，既然苏联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地位，就应当为市场关系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场所，提高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把价值范畴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者。持这种观点的以列·列昂节夫为代表。

① 见章良猷编《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第429页，1982年三联书店。
② 见同上，第447页。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解释为社会主义关系综合原因，即：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农庄庄员按劳动日分配劳动所得、农庄庄员在个人副业生产中的农副产品个人所有制、物质刺激的必要性、对外贸易等等诸种因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四版仍旧坚持这些看法，只是把农庄庄员在个人副业生产中的农副产品个人所有制扩大为社会全体成员。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决定性原因，由于生产者在社会生产中经济地位不同，劳动就产生社会经济差别，这就使得有必要借助商品价值机制、通过抽象劳动，使各种具体劳动在社会上相等，从而实现有计划地调节劳动。

从这些活跃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归根到底是这样两种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关系呢？抑或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商品货币关系？总的已逐渐趋向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产生商品货币关系，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产生的。

"利别尔曼计划"

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也产生商品货币关系，自然要扩展到研究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意义和作用。1957年，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认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关于"生产资料只保留着商品的外壳；价值规律仅仅是通过工资来影响生产"的论题，是"没有科学根据和不符合事实的论述。"① 对价值规律作用在认识上的突破，必然要探讨如何运用

① 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评丛》1957年第11期。

价值规律推进生产，刺激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问题。

1962年2月7日，《真理报》刊登马利歇夫的文章，文中说：“赢利应该看成是计划的主要指标，只有利润才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都概括地反映在利润水平上”；“物质利益，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和动力。”

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刊登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奖金、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利别尔曼在文章中提出：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企业能迫切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利别尔曼认为，只要把按品种的产量计划和交货期限计划下达到企业，就可以做到。为此，利别尔曼提出6条具体建议：1.产量和品种计划经过协调和批准后，企业的计划全部由企业自行编制；2.根据赢利率（利润与生产基金之比）规定各种物质奖励的统一基金；3.为各部门以及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各类企业统一批准随赢利率而变化的奖金比率表，作为长期使用的定额；4.控制数字只下达到国民经济委员会，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各企业间摊派任务，国民经济委员会可以检查、评价和改进各企业自行编制的计划，但不得改变作为企业奖励基础的赢利比率表；5.制定从企业利润中提取的统一奖励基金的使用方法，同时扩大企业在把奖励基金用于集体奖励和个人奖励方面的权限；6.灵活地制订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便促使企业生产更有效的，既对生产单位也对使用单位，即对整个国民经济都能赢利的产品①。利别尔曼文章的总的精神是：建议减少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权限；按赢利率高低来评价和奖励企业。

---

① 见《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1963年三联书店。

9月20日，《真理报》又刊出利别尔曼的文章。文中认为，把利润作为衡量生产的经济效率的总的（不是唯一的）指标，可以取得成效；利润应当成为衡量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企业在合同、订货、利润奖额的基础上，可以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计划。10月中旬，利别尔曼在《经济报》编辑部举行的讨论会上补充说：在我的建议中，利润并不是评价企业的"模子"，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赢利定额，以便让企业自己努力去提高利润。

利别尔曼的文章刊出后，经济学界反映强烈。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就利别尔曼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开展讨论。于是，由《真理报》编辑部发起，开展关于完善经济管理问题的讨论。讨论从"如何使企业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问题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的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工作人员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成本、劳动生产率等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全国性报刊，以及其他地方性报刊、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报都刊登文章，参加讨论。从1962年9月到1963年底，单单《真理报》编辑部就收到1000多篇讨论文章。

除了刊登文章之外，还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讨论会。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于1963年1月举行大会，对经济刺激问题、遵守"对社会有利也对每个企业有利"这一公式的途径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气氛的认真、热烈，是自列宁逝世以后所未曾有过的。这场讨论也越出了苏联国界，把东欧的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经济学界也卷了进来，成为一场"国际利别尔曼计划冲击波"，撞击了斯大林模式关于价值规律、利润、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基本理论。

这场讨论到1963年底告一段落，历时一年多。1964年1月，

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受苏共中央委托，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加托夫斯基对一年多来的讨论作总结报告。报告中说：在讨论中，"某些参加讨论的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刺激中存在的缺点，回避企业没有足够的经营主动性和经济核算的原因，贬低利润在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巩固经济核算中的重要作用。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出没有很好地考虑计划经济特点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脱离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制度。"①

加托夫斯基在总结中指出，这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企业上，这是苏联经济的基本环节。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提高计划工作的效果、创造能经常推动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产潜力从而加速我国发展速度的指标体系和刺激体系。"加托夫斯基说，委员会的立场是"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②

该委员会对一年多来的讨论作出书面总结。在总结时，委员会还和计划机关、企业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写出综合报告，并且得到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和科学院主席团的赞同。综合报告提出9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改进计划、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的价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在企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进奖励基金形成的办法，提高奖金的作用；加强对创造和加速采用新技术、科学成就、各种进步的新产品的刺激，等等。综合报告肯定：利润是工作质量的指标、

① 《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续集）第252页，1965年三联书店版。

② 同上。

生产发展和刺激基金的源泉。

这场讨论，对认识苏联计划经济下利润和奖金的作用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对计划经济下如何形成利润、如何发挥奖金的作用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不少具体办法。这是一场极有意义的讨论。

第二十二章　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的苏联对外关系

第一节　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调整和演变

苏南关系的缓解到又趋紧张

赫鲁晓夫上台后，着手调整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中，处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最先提上日程。

1954年初，赫鲁晓夫建议党中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苏南冲突的原因及研究两国和解的可能性。同年10月，《真理报》就贝尔格莱德解放10周年发表文章，开始改变过去认为南斯拉夫是"军事法西斯专政国家"的无理指责，赞颂苏南之间存在着"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1955年5月27日至6月2日，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为首的苏联代表团飞抵贝尔格莱德，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举行会谈。这是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大胆的外交行动：同一个被错误地革除出"国际共运"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由于多年来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受到了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他们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存有戒心，对苏联新领导人的诚意也有所怀疑，在机场上气氛比较冷淡。在会谈中，赫鲁晓夫表

示："我们对发生过的事件表示诚挚的遗憾，并决心铲除前一段时期所产生的一切淤积。"经过会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苏南两国政府宣言》，表明了两国进行合作的愿望，并声明以"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作为处理各项问题的原则。

《贝尔格莱德宣言》是确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正确原则的最初表述，尽管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仍时有表现，但苏联领导人亲自访南登门道歉这件事本身是意味深长的，它是对苏联一个时期来对待一个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错误态度的一种批评和自省。

1956年6月，铁托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并于6月20日发表《关于南共联盟和苏共之间的关系的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加强，并且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的见解的任何倾向。"这一文献再次表明，苏共承认南共联盟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苏南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促使苏南关系逐步得到改善。

1956年4月，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党的代表经过协商后认为，情报局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决定予以解散，机关报也随之停刊。情报局在它的整个活动中，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占着重要的地位，随着苏南关系的改善，它的活动完全陷入困境。南斯拉夫打破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控制和干涉，开辟了一国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些都表明，在二战以后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再由一个大国操纵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和解决各个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已经是

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了。

苏南关系的恢复和改善，没有使南斯拉夫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苏南会谈时，铁托就曾明确表示，要南斯拉夫参加社会主义阵营是不现实的。由这一立场出发，南斯拉夫拒绝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上签字。1958年，南共联盟又发表了联盟的纲领草案，内容中有许多不同于当时流行观点的新提法。铁托并与尼赫鲁、纳赛尔等人一起发起并倡导不结盟运动。赫鲁晓夫对铁托的难以驾驭感到十分恼怒，除在经济方面进行制裁外，又把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视作修正主义文件加以批评，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掀起对南斯拉夫的批判运动。

10月苏波会谈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破坏法制等方面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对当时的世界局势，尤其对国际共运发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它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有助于各国共产党人摆脱大党和大国的控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去决定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有利于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然而，斯大林时期大量错误事实的揭露，不能不给帝国主义者找到一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实，也使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人意志消沉和动摇。消极影响虽然是次要的，也是不可忽视的。而这两方面的影响在东欧一些国家中尤为强烈，波匈事件就是其突出表现。

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后，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不同意苏共与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采取极端措施，被撤销职务，关进监狱。此后，党的第一书记贝鲁特在经济上、政治上一味照搬"斯大林模式"，采取一系列不切合波兰实际的建设社

会主义的路线和错误的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政治上大搞阶级斗争，对宗教活动横加干预，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加上苏联控制波兰的大国主义行径，严重损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尊严，群众的不满情绪滋长。政治上的不满，思想上的混乱，经济上的困难，以及贝鲁特在苏共20大期间突然去世，使波兰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出现动荡。

1956年6月上旬，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①。事件平息后，波兰党政领导人及时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并于7月召开党的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扩大工人民主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及提高人民生活等措施，全会决定给哥穆尔卡恢复名誉，重新出来工作，这些措施使国内政治局面趋于稳定。但苏共对波兰继续施加压力。就在波兰党7月全会期间，《真理报》发表文章声称，不能忽视"在所谓民族特点的口号下，旨在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联盟的企图"，在扩大民主的幌子下，旨在破坏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企图。"这样，波苏矛盾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升级了。波兰人民对一切必须按苏联模式行事十分不满，表现出反对苏联控制和干涉，维护民族尊严和主权的强烈要求。苏联唯恐失去对波兰的控制，更怕波及其他东欧国家，并对哥穆尔卡复出表示疑虑。波苏矛盾终于在波兰党10月全会期间公开化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于10月19日召开八中全会，决定一些

---

① 波兹南是波兰西部工业城市。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轻赋税，省里无法作出决定。工人推派一个30人的代表团前往华沙，上访机械工业部部长，但要求遭到拒绝。工人闻知代表团请愿失败，于6月28日16000名工人自发上街游行，当局拒绝接见。此时有人谣传，去华沙的代表已遭逮捕，顿时群情激昂，秩序混乱，示威变为骚乱，群众高呼"要面包，要自由"、"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并冲击政府机关和监狱。政府动用保安部队镇压，当晚平息。这一事件中，5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

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人对波兰局势颇感不安，"邀请" 波党领导人前去莫斯科磋商。波党婉言谢绝。全会一开始就选举哥穆尔卡进入政治局，担任总书记，就在19日全会开幕当天，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飞抵华沙，不请自来。代表团成员包括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华沙部队司令科涅夫、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另有10名陆军上将。显然，代表团的任务是要向波党施加压力，迫使其俯首就范。

在机场上，两党代表就激烈争论。赫鲁晓夫强行要求参加波党中央全会，被波党中央严正拒绝。波党遂决定由哥穆尔卡、奥哈布、西伦凯维兹、萨瓦茨基组成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在凡尔特列宫举行会谈。与此同时，波党中央全会照常举行。会谈开始后，苏军即从驻地军营出动，向华沙进逼。赫鲁晓夫企图依仗武力，迫使波党接受苏共提出的所有条件。波党代表团不畏强暴，不屈于压力，坚持由本党自己决定党中央政治局人选，并坚持将象征苏联控制波兰的国防部长、苏籍波兰人罗科索夫斯基排除出新政治局。会谈进行了一天一夜，双方争辩激烈。波兰的工人、学生、士兵得悉波苏会谈正在进行，立即行动起来，表示坚决支持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的党中央。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使理屈的苏联领导人陷于被动地位。哥穆尔卡向苏共领导人保证，波苏友好是波兰对外政策的基础，只要苏军撤退，使波苏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波兰仍将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内。

至此，苏共领导人不得不作出让步：承认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领导体制；苏军返回兵营；同意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承认波苏贸易中的不平等行为，同意予以补偿。波苏10月会谈的结果表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听从苏联指挥、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走路的时代已经结束，苏联所奉行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行径到处碰壁，越来越不得人心。独立自主正在成为走上社会主

义道路国家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匈牙利事件

1956年10月是多事之秋。波苏会谈刚一结束，苏共领导人又面临着一个更为严重的匈牙利事件。长期以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拉科西等照搬苏联模式，推行个人崇拜，制造一连串冤假错案。苏共二十大以后，匈牙利国内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3月成立的裴多菲俱乐部在这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7月，由苏共领导人出面让拉科西下台，由格罗接任第一书记。但格罗并不能控制时局的稳定。

10月初，前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恢复他的党员权利和给他分配工作，党中央对纳吉的要求不予答复。10月中旬，哥穆尔卡重新出任波党总书记的消息传来，在匈牙利引起强烈反响。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向中央提出10点要求，布达佩斯大学生决定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向政府提出16点要求。这两份要求的共同点是：调整同苏联的关系，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干涉，争取民族平等和独立；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清算拉科西时期的错误和罪行，改组党政领导。23日，学生们带着16条要求上街游行。格罗采取了一系列失当措施，遂使事态更加扩大。当晚，党中央开会，决定由纳吉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决定请苏军出动协助恢复秩序。24日凌晨，苏军坦克开进首都街头。在苏军坦克面前，匈牙利人民感到莫大的侮辱。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部分军警也与群众站在一起反击苏军，局势急剧恶化。这一天，苏共领导派遣米高扬、苏斯洛夫到达布达佩斯，同匈党领导人讨论当前时局。此刻上台的纳吉实际上已无法行使正常的领导职责，党政机关已经瘫痪、群众自发

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民族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一类政治组织，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25日，电台宣布，格罗辞职，由卡达尔任党的第一书记，但无法控制住局势的恶化。27日，苏军控制了首都局势，但事态仍很严重。29日，米高扬、苏斯洛夫带着苏联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再次来到布达佩斯。宣言承认苏联在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错误和损害别国利益的错误，表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中，人民要求纠正以往的错误是正确的，但反革命势力混进了运动。苏军应邀帮助维持秩序，一俟匈政府认为必要，苏军立即撤走。

10月30日以后，由于反革命分子的渗入，原先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群众性自发骚动的性质有所变化，矛盾错综复杂，事态越加严重。当天，苏联政府的《宣言》正式发表，苏军撤离布达佩斯。苏军撤走后，城市秩序混乱，到处发生骚乱，并出现屠杀共产党员和干部的严重事件。纳吉政府对局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反击措施不力，致使骚乱活动弥漫全国。西方帝国主义操纵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也大肆煽风点火。奥匈边境开放，大批流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回国；监狱被打开，近万名刑事犯和3千多名政治犯被释。这些都使本来严重的局势更加严重。在此紧急时刻，纳吉政府竟然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纳吉本来打算通过此举使苏军撤退，并缓和群众的民族情绪，结果恰恰相反，骚乱更加猖獗，局势更加难以控制。11月4日，原匈党总书记卡达尔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邀请苏联出兵，平息了动乱。

匈牙利事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件，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苏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都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最初，苏

联打算通过更换匈党个别领导人来缓解矛盾；当局势日趋严重时，苏联在出兵问题上举棋不定，出尔反尔；发表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相互平等的苏联政府《宣言》也为时过晚，已难以发挥缓和矛盾的作用。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等兄弟党的促成和支持下，苏联才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动乱，但已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经历了1956年的动荡以后，有必要进行冷静的思考和总结。1957年11月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之际，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乘此机会，11月14—16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代表会议，经过多次讨论协商，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11月16—19日，又举行64个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

《莫斯科宣言》在制订过程中，苏共代表团先后两次提出宣言的草案，打算把苏共20大的观点写入宣言。于是引起了同中共代表团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在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苏共提出的草案中，只提和平过渡，不提非和平过渡，并把和平过渡单纯归结为议会道路。中共代表团提出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反对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观点。经过协商，苏中两党提出一份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经兄弟党代表团讨论后，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宣言》。

1957年莫斯科会议是当代国际共运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会议。《莫斯科宣言》是当代国际共运的一个重要文献，它总结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若干正确的原则。如强调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

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时提倡"兄弟般的相互援助"。又如在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九条共同规律的同时，指出各国党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共同规律，"不允许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并认为"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体贡献"。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已出现相当大的分歧。南共联盟拒不参加各国党的国际会议，也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宣言中则不指名地批评了南共联盟，这种批评是违背宣言所宣布的原则的。苏中矛盾已初露端倪，宣言本身是某种妥协的产物，宣言的发表并没有真正弥合各国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此外，《莫斯科宣言》本身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对时代的分析上，过分强调帝国主义的衰落，看不到西方国家正处于战后经济发展的起飞点上；宣言把苏中两党，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上升为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实际上仍把苏共经验神圣化，变成束缚别人手脚的模式；宣言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倡议，仍肯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仍维护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使苏共的大党主义作风得不到收敛。

50年代末期，苏中分歧已趋公开化。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苏中两党展开了公开的争论。1960年11月十月革命43周年之际，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了第二次莫斯科会议。苏共领导企图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中共代表团明确指出，在各国党的关系中，不适用这一原则，只能实行平等协商的原则。苏共代表团还提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所谓"单干"，反对所谓"集团活动"、"派别活动"，实际上是不许各国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消各国党关系中的平等原则。经过争论和妥协，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

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莫斯科声明只是重复了1957年宣言中的一些观点，只是在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了"共同规律"，并点名指责南共联盟为"现代修正主义"，从而压制了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导致左倾教条主义的滋长和泛滥。苏中两党的分歧日益显露，国际共运的大分化大动荡的局面就难以避免了。

苏中两党的分歧和论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苏中两国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50年代上半期，是两国关系的"蜜月时期"。在1953年开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56个大型工业企业项目，为中国的工业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国也采取"一边倒"的方针，给予全力支持。双方在这一时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在对斯大林评价问题上，中共支持苏共对个人崇拜现象的揭露和批评，但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上存在某种分歧。在发生波匈事件时，中共曾对苏共的大国主义问题提出善意的批评。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中两党间出现过争论。争论表明，苏中两党对当代局势及国际共运的根本战略上出现了重大分歧。

1958年，中共领导在国内政策指导上出现左的偏差，苏共领导曾提出过批评。鉴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纯属中国内部事务，中国方面对这些批评未加理会。同年，苏共领导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两项建议也被中国所拒绝。从1959年起，两国分歧有所扩大。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袒护印度。1960年7月，苏联

单方面突然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这样，苏中双方就由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对立，国家关系上的对立又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苏中之间的内部争论就逐渐发展为公开论战。

1961年10月，苏共举行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公开攻击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甚至号召推翻阿党的现领导。对此，中共代表团团长在致词中批评苏共领导说："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并指出："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代表大会期间，苏中两党代表曾举行会谈，但由于双方均坚持己见，会谈毫无成效。中共代表团遂于大会结束前提早回国。

二十二大后，苏中两党的分歧和争论继续升级。1962年，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苏中两国边境上相继发生事端，数万名中国公民出走苏联。苏联再次支持印度反华，并于1962年11月至1963年3月间，苏共利用保、匈、意、捷、德等5个党代表大会的讲坛，公开批判阿尔巴尼亚，影射攻击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自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国方面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8篇文章，阐明了自己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批驳了苏共领导。截至此时，双方论战实际上已经开始，但均未指名道姓直接攻击对方。

1963年初，苏共中央曾呼吁停止论战，寻找两党之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然而，又声称在原则问题上不作让步。从

这种立场出发，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兄弟党之间的公开论战。3月9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愿意停止公开论战，但要求公布这一时期双方的来往信件。经协议，双方于3月14日同时公布上述两封信件。

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由于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信中就苏共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信中还提出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的一些具体建议。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3月30日复信中，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从双方信件中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看法，明显地看出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因此，尽管苏中两党会谈即将举行，但论战的气氛丝毫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在苏联境内是否准许散发6月14日文件引起了外交纠纷，双方关系愈加紧张了。

7月5日，苏中两党代表团会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7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指责中共中央6月14日信件对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并对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大的决议和苏共纲领进行了"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公开信还对苏中分歧和当代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苏中两党会谈于7月20日结束，大论战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这些文章涉及到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时代和形势、战争与和平、革命和建设、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大论战一直持续到

1965年底。此后，毛泽东又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苏中两党之间的公开决裂，也导致了整个国际共运的大分化和大分裂，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这场大论战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来说，一方面，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分化和分裂，削弱了共同对敌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论战改变了长期形成的以苏联为中心的局面，向苏共的领导党、老子党地位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有助于建立起共产党之间平等的正常的党际关系。

第二节　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调整和演变

调整对西欧的政策

赫鲁晓夫上台后，着手改变斯大林时期比较僵硬的外交政策，力图通过谈判和协商，调整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冷战并未结束，但局势有所松动；苏美之间军备竞赛继续进行，局部对抗时有发生，但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开始形成在世界范围内苏美两国对抗和争霸的局面。

二次大战结束后，处理欧洲战败国问题一直是苏联和西方国家争执的重要问题。

战后，奥地利分别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1946年四国外长会议决定起草保证奥地利独立的对奥和约。1949年6月，四国外长会议达成对奥和约主要问题的初步协议，奥地利保持1938年1月1日时的国境线，不向奥索取赔偿，南斯拉夫有权没收奥在南境内的财产，6年内苏联将从奥得到1.5亿美元，作为苏归还德国在奥财产的补偿。会议决定指派代表拟订对奥和约草

案，并定于当年9月1日签约。由于9月间西德单独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大林认为对奥和约必须在德国问题解决后签订，于是，这个问题搁置了下来。

1954年初，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的柏林会议上，苏联代表再次提出了对奥和约的建议，要求迅速缔结和约。条件是奥地利承担义务，不参加军事集团，不把它的领土提供给外国充当军事基地。美、英、法三国虽然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冷淡，但引起奥地利的积极反响。1955年2月，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发言中，关于对奥和约的立场有所松动，并邀请奥地利政府派遣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缔结和约问题。4月12—15日，苏奥两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奥政府代表团表示接受保证奥地利中立化的建议，苏政府则表示愿意无偿地签订对奥和约，并从奥地利撤出苏军。

这表明，苏联为调整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在对奥和约问题上苏联主动作出了某些让步，终于促成了和约的签订。苏奥会谈结束后，苏联发出倡议，召开苏、美、英、法、奥五国外长会议来讨论缔结和约问题。5月15日，五国外长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并签订了《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条约于同年7月27日生效。条约承认奥地利是"一个主权、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各缔约国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条约禁止奥地利和德国合并或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经济同盟；各缔约国在条约生效后90天内，最迟不超过1955年底撤退各自驻奥的军队。同年10月，奥地利通过了宪法，宣布永久中立，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允许别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对奥和约的签订，是苏联新领导推行新的外交政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条约签订后，苏联不但获得了1.5亿美元的经济补偿，而且随着奥地利的中立，助长了西欧有的国家的独立倾

向，有的国家甚至表示要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奥和约的缔结，使苏联迈出了同西方国家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的步伐。

同联邦德国建交，是赫鲁晓夫调整同西欧国家关系的又一个步骤。

1954年底到1955年初，苏联就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交换信件，倡议召开四国首脑会议。由于在对奥和约问题上苏联作出了让步，西方国家同意召开首脑会议。1955年7月18—23日，四国首脑会议在日内瓦开幕。这是战后举行的第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对德和约、欧洲安全和裁军、加强东西方接触等问题。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了首脑会议。在德国问题上，苏联代表团认为，根据德国现存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不能把他们机械地统一成一个国家，可以先把它们看作两个具有平等权利的国家。然后通过两个德国的合作，逐步达到德国的统一。上述问题虽未达成协议，但为大国之间通过磋商解决国际问题打开了道路。

还在四国首脑会议召开以前，苏联就邀请联邦德国政府举行谈判，以实现两国间的"关系正常化"。6月底，联邦德国政府照会苏联，表示接受邀请。9月8—14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苏，并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起初，苏联方面提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以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发展。联邦德国方面则要求以德国统一和遣返战俘作为两国建交的先决条件。苏联方面认为，在苏联没有德国战俘，只扣押了一批德国战犯；关于德国统一问题，应同当前整个世界局势联系起来。赫鲁晓夫指出，由于联邦德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而民主德国不是，所以苏联政府就要尽一切力量，以免让统一了的整个德国属于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因为这是绝对违背两国人民利益的。由于要求联邦德国退出北约组织是不现实的，所以两国应先建立外交关系，发展贸易，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赫鲁晓夫在同阿登纳私下会晤时表示，他担心赤色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现在已有6亿以上人口，每年还要增加1200万。这些人都靠一把米过活，这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赫鲁晓夫请阿登纳帮助他解决中国问题。这是赫鲁晓夫发出的一个信号，苏联打算同联邦德国建交，既为了换取西方国家对民主德国的承认，又是为了对付中国在东方的崛起。

几天的会谈没有消除双方的分歧。阿登纳声称要提前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决定让步，同意释放在苏联的德国战犯，但仍不同意联邦德国“有权代表整个德国人民发言”的见解。9月13日，苏联和联邦德国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换文，双方同意互派大使。9月14日，阿登纳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邦德国是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并表示德国的东部边界不是最终的边界。9月16日，塔斯社受权发表声明，苏联政府把联邦德国看作是德国的一部分，德国的另一部分是民主德国，并指出德国的边界已由波茨坦协定解决了，联邦德国在它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上执行着自己的管辖权。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建交，为苏联调整同西欧的关系迈开重要的一步。

确立对中东的政策

从50年代起，中东在世界局势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显示出来。英、法、苏、美在这一地区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角逐。1954年7月，纳赛尔出任埃及总理，奉行中立主义政策。10月，英埃签订条约，确认英国在20个月内撤出苏伊士运河，承认运河是埃及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联对埃及的行动采取积极支

持的态度，英法则对纳赛尔政策抱敌视态度。

1956年6月，英军从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地区全部撤出，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仍由英法殖民者控制。7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停止资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这个工程将足以灌溉100万公顷土地并使成千上万户居民得益。美国的行动表示，美国不满于埃及接受来自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代化武器，并对埃及和南斯拉夫、印度共同发起的"不结盟运动"表示异议。埃及没有屈服于西方国家的压力。7月26日，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运河航道由埃及管理，埃及将用运河公司的收入来建造阿斯旺水坝。这一举动表明埃及人民要求消除"外国统治的罪恶"的决心，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为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英、法、埃及原定于10月29日举行会谈。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以色列军队在英法空军掩护下分4路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全线进攻。次日，纳赛尔下令全国总动员，反击以军的入侵。同一天，英法借口"保护"运河为名，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停火，并各自把军队撤离运河16公里。以色列表示接受，埃及则拒绝接受这一通牒。10月31日，英法成立联合司令部并开始对埃及实行军事侵略，英法空军轰炸开罗、塞得港、亚历山大等城市。英法的入侵行为由于事先未和美国磋商，美国未予支持。苏联此刻虽忙于对付匈牙利事件，仍发表了一个措词强硬的声明。苏联向英、法、以色列三国发出最后通牒，暗示苏联可能直接干预制止侵略，并暗示可能使用现代化新式武器（火箭）来攻击侵略者。苏联的最后通牒引起西方国家的震惊，美国也向英国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行动，英国则劝导法国一起让步。英法联军不得不在离塞得港24公里的地方停留了下来。11月6日，英法被迫宣布停火。11月7日联合国

通过决议，以联合国部队接替英法联军。英法武装干涉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美国和苏联替代了老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地区进行新的争夺。

苏美关系的演变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谋求同西欧国家改善关系的同时，把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同美国进行谈判和争夺。

1956年初，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条约草案中规定有发展和巩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义务；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的争端；在互利平等基础上发展和加强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

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接见《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谈话中认为，国际紧张局势归根结蒂是苏美两国关系的问题，只要苏美两国能达成协议，就不难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了。谈话中透露了苏美合作共同决定世界人类命运的意思。赫鲁晓夫还表示他非常尊重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有机会访问美国。

1958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致信美、英、法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建议举行各国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谈，并附有苏联政府《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这一建议遭到美国的拒绝。

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以"休假"为名，在美国停留了近20天。米高扬在美反复呼吁开始苏美双边会谈。在同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表示了早日结束"冷战"的愿望，并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苏联。

苏联不断发出苏美直接会谈的信息，直至1959年夏，才收

到艾森豪威尔致赫鲁晓夫(赫已于1958年3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的信，美国总统在信中邀请赫鲁晓夫正式访问美国。8月3日，苏美同时宣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9月访问美国，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秋后到苏联回访。

1959年9月15—28日，赫鲁晓夫应邀访问美国。在赫鲁晓夫访美前3天，即9月12日，苏联发射的宇宙飞船登上月球，并在月球上放置了苏联国旗和国徽，这件事为赫鲁晓夫访美增添了色彩。作为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抵达华盛顿时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隆重欢迎。赫鲁晓夫在美国总统举行的宴会上说："我相信，我们应总统先生邀请而作的这次访问以及您即将对我国进行的访问将促使国际关系的转暖；'冷战'的冰块已经不只是有了裂缝，而且已经开始破碎了。"

赫鲁晓夫访美期间，参观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衣阿华州、得梅因、匹兹堡，最后回到华盛顿。在整个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出席各种宴会、招待会，广泛接触了美国各阶层人士，他在一连串的演说和回答记者提问中，反复强调两个主题：一是苏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友好相处，共同为和平而斗争。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比你们的好，你们认为你们的制度比我们的好。那我们怎么办呢？难道把这种谁的制度好的争执一直引向战场上的互相战斗吗？难道让历史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更好些吗？"他希望通过和平竞赛来解决这个问题。二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赫鲁晓夫反复强调，苏美两国间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应当通过谈判来消除"冷战"，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人类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又掌握了核武器的时代，决不能听任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在

会谈中，双方就一些国际争端问题互施压力，讨价还价。艾森豪威尔要求赫鲁晓夫停止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威胁，收回苏联的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的强硬态度，迫使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作了让步。赫鲁晓夫提议苏美两国从其他国家撤走军队，拆除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这个建议是完全针对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则提议两国不再继续试验核武器，并为此建立国际监督。由于当时苏联核武器水平大大低于美国，这个提议是要使美国永远保持优势。在这些问题上，双方未能消除障碍，达成协议。因此，赫鲁晓夫后来大肆宣传的“戴维营精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赫鲁晓夫访美的实际效果，是使苏联获得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赫鲁晓夫也承认，在戴维营会谈期间，不管是否签订了任何具体协定，苏美两国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苏联同意收回限定其他占领国在6个月内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的声明，美国同意就柏林地位和德国统一问题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苏联还正式邀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春夏之间访问苏联。

艾森豪威尔原定在出席巴黎四国首脑会议之后，于1960年6月10—19日访苏。但在5月1日，一架美国U—2高空喷气间谍侦察机侵入苏联境内2千多公里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被苏联火箭部队击落。飞机上装有侦察和破坏的专门装置，飞行员被俘。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该飞机搜集了苏联的间谍情报。U—2间谍飞机事件给四国首脑会议蒙上了阴影。

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如期举行。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就U—2间谍飞机事件公开道歉，惩罚罪犯并保证不再作这种间谍飞行。艾森豪威尔只肯承诺在他任职

期间（他的总统任期将于1961年1月结束）停止这种飞行，不愿作更多的承诺。尽管戴高乐竭力调停，但无济于事，最高级会议不欢而散，宣告流产。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艾森豪威尔的访苏计划。苏美关系又趋于紧张。

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

1958年底，赫鲁晓夫提出，要把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限定美、英、法三国在6个月内从西柏林撤军。戴维营会谈后，苏联收回了最后通牒。U—2间谍飞机事件和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使柏林问题又经常提上日程。

1961年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赫鲁晓夫又提议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议。6月3日，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会谈议程包括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问题、苏美双边关系问题等，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均未达成任何协议。

自1961年初开始，从民主德国逃往联邦德国的人数骤增，其中大部分是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的。据西方国家估计，西柏林每天要接纳1000名左右逃亡者。到这年夏天，约有350万人逃离东柏林，其中有大量的科技人员。民主德国当局表示严重的忧虑。赫鲁晓夫决心同肯尼迪作一较量。同年8月初，华沙条约成员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发表声明说，如果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对德和约，华沙条约成员国将单独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并给予柏林以"自由城市"的地位。8月13日，民主德国沿东西柏林分界线用水泥混凝土筑起一堵墙，封锁了东西柏林边界，切断了东西柏林的人员来往，人们通称它为"柏林墙"。美国不甘示弱，肯尼迪派副总统访问西柏林，并在边界线上炫耀武力。两国又恢复核试验，进行核威慑和核军备竞赛。但苏联已不再坚持1961年底前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至此，第二次柏林危机

告一段落，德国问题暂时被搁置下来，苏美关系又趋缓和。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下半年，又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出现苏美两国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抗。

1959年1月，古巴革命在卡斯特罗领导下，推翻了长期受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建立了古巴共和国。1961年4月，美国拚凑1000多名雇佣军，在美空军掩护下在猪湾登陆，但只两天时间入侵者全部被歼。1960年，苏联和古巴恢复了邦交。古巴要依靠苏联经济和军事援助，以防御美国的威胁，苏联则利用古巴作为同美国抗衡、对峙的桥头堡。1962年7月，古巴副总理劳尔·卡斯特罗访苏。双方达成协议，以保卫古巴为由，苏联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

不久，美国U—2飞机在古巴上空侦察飞行，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发射场的情报。肯尼迪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声称美国决不会容忍进攻性武器引入加勒比地区。10月14日，美国U—2飞机获得确切的情报照片之后，肯尼迪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对古巴实行封锁。10月22日晚，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宣布封锁古巴的7项初步措施。根据总统的命令，美国海军部派遣40艘军舰、4万名士兵开始实行封锁。肯尼迪首先将封锁古巴的决定通知英、法等主要盟国，然后再通知苏联，随后又通知了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和联合国。U—2飞机拍摄的照片在全世界公布。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84%的美国人赞成封锁政策，支持肯尼迪的决定。

对肯尼迪的决定，苏联最初的反应是，加快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和伊尔—28轰炸机的速度。但美国在古巴领海周围设置严密的警戒线，由90艘舰艇组成的美国舰队，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进入阵地，拦截和搜寻正在进入隔离区的船只。

在美国的强硬态度面前，苏联被迫退却。10月26日，赫鲁晓夫写信给肯尼迪，并提出解决冲突的条件：苏联在联合国观察员监督下撤走它的导弹，并保证不再把导弹运入古巴领土。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人也应保证决不入侵古巴。10月28日，赫鲁晓夫发表声明，由于美国保证不再入侵古巴，"推动我们向古巴提供这种援助的动机也随着消失了"。于是，苏联运送导弹基地物资的船只在公开接受检查监督后驶返出发港，并答应于30天内撤走伊尔—28飞机，美国随即终止了海上封锁。至此，古巴导弹危机基本平息。

古巴导弹危机是核时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一次戏剧性事件，是赫鲁晓夫推行冒险主义外交政策的一次可耻的失败记录。

第三节　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外战略

"三和"路线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在报告中，赫鲁晓夫对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防止现代战争的可能性、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1) 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认为，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强调，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就是承认世界上有两种社会制度的存在，承认每种社会制度有存在的权利。而不同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就意味着互不干涉内政，相互让步，相互妥协，

也可以说是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实际问题在解决条件成熟时双方要迁就，从而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2）关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竞赛。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和斗争，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制度先进，未来是属于哪一个制度，这将由历史来裁决。两种制度国家的这方面分歧，并不妨碍两者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他强调，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争执，不应当用军事冲突的办法来解决，而应当用和平竞赛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说，要通过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在满足人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方面，在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方面的和平竞赛方式来解决。归根结蒂，竞赛的主要舞台是和平的经济竞赛。据赫鲁晓夫看来，这一竞赛的结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同美国的竞赛。

（3）关于防止现代战争的可能性。赫鲁晓夫认为，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便不可避免的观点，如今适应这一理论的客观前提已不存在。战争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在战争会不会发生的问题上，阶级力量即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仅仅研究帝国主义条件下爆发战争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他还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原理是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提出的，如今，不但苏联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且已拥有一个10亿多人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高涨，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等等，都说明不能机械地重复列宁几十年前的结论。在现代的条件下，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4）关于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认为，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某

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社会中稳定的多数，并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这就是说，在一些具有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取得政权，议会共和国可以成为工人阶级专政的形式或与之相应的人民政权的形式。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阐述并在日后不断发挥的概称"三和"路线的这些新观点，作为赫鲁晓夫时期对外战略的理论纲领，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它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口号煽起的扩军备战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某些战后历史遗留问题，逐步结束冷战局面，起着促进的作用。赫鲁晓夫关于现代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理论，关于发达国家存在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关于在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承认兄弟党自主探索本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思想，经受了战后几十年历史的检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

当然，赫鲁晓夫对外战略的这些理论也是有缺陷的，如过分夸大几个大国、尤其是苏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过分夸大苏联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过分夸大两个阵营的矛盾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主导性影响，过分夸大局部战争转化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在外交实践中表现出太多的随意性，时而冒险主义，时而作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但赫鲁晓夫敢于面对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理论，探索建立新的国际格局，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从这些方面看，这些理论和路线的提出，是有时代价值的。

核时代、核武器、核战略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掷了两枚原子弹。从此,人类揭开了核武器的时代,引发了一连串关于核武器、核战争的理论和政策的争论。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又引出了许多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平、革命的理论是否需要作新的论证和修正?斯大林晚年,一方面竭力贬低核武器的威力,另一方面又强调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一场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并以此作为制订"阵营对抗战略"的依据。在斯大林看来,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给战争与和平带来什么变化,在未来战争中,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文明。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调整对外战略的时候,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看待核武器的时代影响及其对策。核武器的出现是军事技术的一次革命。它不但具有常规武器所无法比拟的杀伤力、破坏力,甚至可能毁灭世界。面对这一事实,赫鲁晓夫初步意识到必须抛弃一些过时的僵化观念,需要以一种新的观念来看待它。他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不能以旧的尺度来衡量世界战争,不能以旧的范畴来思考世界战争",由于"军事技术的质变"和"战争工具的破坏力空前的增长","根本改变了人们对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后果的概念"。因此,"现在已经不能单纯从资本主义规律的作用着眼来看现时代的根本问题,例如战争与和平问题"。

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和出发点,赫鲁晓夫首先对核战争的危害性作了重新估计。他认为核战争的巨大毁灭性,使未来战争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可以设想,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一旦原子弹和氢弹在城市上空爆炸,将会产生什么情况。难道这些炸弹会知道哪儿是共产党员,哪儿不是共产党员,哪儿是无神论者,哪儿是宗教信徒,哪儿是天主教徒,哪儿是新教徒吗?

不，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这就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共同持有的"世界文明共同毁灭论"。由此，赫鲁晓夫认为决不能低估核武器的作用和影响，核武器决定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正因为在未来核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所以，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和平共处，"你活，让别人也活"。

其次，赫鲁晓夫确立了核时代的对外战略。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把"三和"路线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同对核武器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既然未来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那末核武器就成了制约核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如果战争可能避免，和平共处就可能实现，两种制度就只能通过和平竞赛来决定各自的前途和命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就必须寻找其他途径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也可寻求新的途径和方式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因此，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是必须的。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日益强大，特别是苏联拥有了核威慑力量，就"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他宣称，苏联强大的"火箭—核盾牌"是苏联的安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是"制约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强大因素"。因此，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在推行"三和"路线的同时，又以掌握和发展核武器当作威慑力量，与美国相抗衡，作为实现其外交总路线的重点物质手段。可见，赫鲁晓夫的核战略核政策是对立的矛盾的，在理论上，他努力避免核战争的爆发，推行"三和"路线及其相应的政策；在实践上，他又挥舞核大棒，使冷战气氛迟迟不能消除，造成多次危机，使和平竞赛变成军备竞赛，使核武库不断扩充，核武器制造和试验更趋频繁，不但给苏联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也给全人类造成更深的危难。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使赫鲁晓

夫陷入难以解脱的二难境地之中。这也是赫鲁晓夫核战略的局限性所在。

缓和、对抗和争夺

赫鲁晓夫执政年代，是苏联对外战略的调整时期。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从尽可能维护战时大国合作体制到两大阵营之间、尤其是苏美之间的冷战局面，形成了斯大林晚年的"阵营对抗战略"。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了理论观念的更新，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从两个主渠道调整对外关系。

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始确立平等的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独立自主的原则，改变原先咄咄逼人的大国主义态势和以损害他国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态度。但同时，赫鲁晓夫也仅从两大体系对抗的政治需要来调整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仍然表现出苏联由于力量强大(包括拥有核武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悠久的强烈优越性，加上俄国霸权主义的历史传统的影响，苏联仍处处表现出充当阵营首领，经常代表阵营或者代替阵营发表言论，采取行动，并以此压制和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别国党。这是导致苏南关系再度恶化，苏中两国、两党出现严重分歧和论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对西方国家，开始通过谈判、让步和妥协，解决或者部分解决战后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融解了冷战气氛，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赫鲁晓夫一面强调"三和"路线，推行比较灵活的对外策略，强调缓和国际局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面又强调要从实力地位出发来遏制对手，用发展核武器来制约核武器。因此，他既重视苏美两国通过谈判和合作，共同决定世界的命运；又需要不断扩军备战、增强实力来同美国相抗衡。由于苏联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苏联已经具备了超级大

国的形象，并同美国形成了相互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格局。

第二十三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改革和调整

对赫鲁晓夫时期政策的调整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苏联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放慢改革步伐，经济发展趋于停滞；国内政局稳定，保守气息浓重；国家实力加强，在国际社会中争夺霸权，气势汹汹。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年生于乌克兰一个冶金工人家庭。早年就读于农学院和冶金学院，1931年加入共产党，曾长期从事党的工作。1952年党的十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1957年6月中央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1960年5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4年10月至1966年4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起改名为苏共中央总书记，1977年6月起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会议主席，直至1982年11月逝世。

勃列日涅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达18年之久，这一时期的苏联，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64年到

70年代初，"新经济体制"出台，开始了比较认真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第二阶段，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对前阶段改革进行调整和修补，改革步伐减缓，经济发展呈现停滞和下降的趋势。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苏联的政治经济领域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使反对个人崇拜在社会生活中深入人心，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正常的政治生活得到恢复和保障。赫鲁晓夫着重进行了农业体制的改革，使苏联长期没有解决的农业问题有了转机。在工业方面的改革则成效不大。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带有他本人主观随意性的色彩，造成了一系列混乱局面。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明确表示始终不渝地贯彻由党的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集体制定的总路线。10月19日，在欢迎宇航员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发表演说，宣称前三次党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整个内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的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又表示了同样的观点。这表明，勃列日涅夫在基本的政治路线上保持着继承性和连续性，不打算作重大的变动。但另一方面，开始对赫鲁晓夫的政策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批评。苏共新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批评赫鲁晓夫在农业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在组织问题上搞"新的个人崇拜"，以及滥用职权等等。对赫鲁晓夫时期工农业方面的改革措施，他们采取审慎的态度区别对待，有的给予批评和纠正，有的则给予保护并使之完善。他们没有否定改革的必要性，但强调要克服混乱无秩序的状态，谨慎、稳重地继续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1957年，赫鲁晓夫曾提出一个改组工业、建筑业领导管理体制的方案，撤销了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绝大多数的部，建立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把中央管理的企业全部交给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这一改组是不彻底的，仅涉及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问题，仍是用一种行政管理办法取代另一种行政管理办法，国家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没有触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这次改组是失败的，它是一次"没有经过周密思虑、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①。社论还要求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这一做法，重新实行部门管理的原则。

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重新审议1962年11月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取消地区党委，建立工业和农业两个党委的决定，认为这种自上而下按行业划分的对党、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组织所实行的改组"仓促而欠考虑"，以致造成了许多困难、麻烦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组织的工作失调，机构臃肿，削弱了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上述决议，恢复统一的党组织，重新设立统一的州、边疆区党委会。此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也分别举行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统一的工会机构和共青团组织的决议。同年1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布一项法令，决定取消1963年2月成立的负责协调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共和国经济活动的中亚经济区。

1965年3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着重讨论农业问题，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全会认为，近几年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减慢了，农业发展计划没有完成，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提高很慢，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决议指出，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经济

① 1964年11月18日《真理报》。

发展规律，破坏了物质利益原则以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农产品价格过低，在组织农畜产品采购和收购方面存在着严重缺点；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提高耕作文明，许多地方破坏了轮作制，农业技术规章和畜牧业技术规章经常得不到遵守；频繁地改组农业领导机关，发布许多不切实际的有关农艺技术、牲畜饲养、播种面积结构等方面的公式化指示；农村干部工作薄弱，轻视专家以及轻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参加全会的代表还批评了赫鲁晓夫在推广种植玉米、反对草田轮作制等方面的错误，批评了在肉类、奶类生产方面按人口平均赶上和超过美国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可以说，这次中央全会，是对赫鲁晓夫时期农业政策一次全面的清理。全会还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

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从整体上说，他没有改变赫鲁晓夫时期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基本走向，而是修正了赫鲁晓夫鲁莽行动造成的偏差和失误，使经济改革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全国范围内对"利别尔曼建议"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触及了许多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建立国家和企业的正确关系、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问题等等，在理论上逐渐弄清楚这些问题，就为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可以说，赫鲁晓夫时期开展的这场讨论，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刻了。

推行"新经济体制"

1966年起，苏联正式推行"新经济体制"。

在此以前，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作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试验。1964年12月，苏联《消息报》宣布，从1965年起，利沃夫将有5个工业企业试行"利别尔曼建议"，试验方案是由利别尔曼亲

自参加制定的。方案规定，重工业企业国家只下达产量计划和赢利计划，其他各项经济指标由企业自行制定；轻工业企业的产量计划也由企业自行制定。当企业完成计划时，企业可以从利润中提取奖励基金。利润越多，奖励基金也越多。

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自 1965 年 1 月 1 日起，莫斯科、列宁格勒等 10 个大城市的全部缝纫和制鞋企业，以及哈萨克、摩尔达维亚、中亚细亚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 400 家轻工业企业和 128 家纺织、皮件厂，推行根据商业部门直接订货进行生产的试验。企业经理有权自行规定本企业产量、工资基金、工作人员人数等，产品销售量和赢利作为企业的主要计划指标。据统计，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有10—30%的服装、纺织、制革工业企业实行了这种新体制。

同年4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汽车运输企业试行完全自负盈亏的制度，过去上级给企业规定46 个指标，现在只规定 1 个指标，即上缴预算的利润提成额指标，其余产量、劳动、成本等其他计划指标均由企业负责人自行规定。

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凡进行新体制试验的工业企业实行新的奖励制度。当企业完成任务时，企业领导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可得到其职务工资一定比例的奖金。部长会议还规定对小型服务性的馆、店、社、厂的职工，实行按收益百分比计酬制，以促使他们提高服务质量。

经过一系列试验，为经济改革取得了初步经验，也为实行新体制形成一定的舆论环境，从而为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试行新体制创造了条件。1965年9月27—2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柯西金在会上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0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颁布了《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

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和《国营生产企业条例》。决定从 1966 年起，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业企业中，分期分批地推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即"新经济体制"。

苏联原先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过多地使用行政方法，很少运用经济方法，即很少利用价格、利润、信贷等经济杠杆管理经济；给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太多，束缚了企业的主动精神；企业自主权太少，经济核算流于形式；分配方式不能促使职工关心整个企业的工作成果。针对经济管理中的上述问题，有关经济改革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在不改变国家集中统一计划原则的情况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实行较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发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领导生产的方法重心要转向经济方法，仍保留某些行政方法，但要求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相结合，以经济方法为主；改变工人的物质利益单纯与工人个人劳动好坏相联系，与整个企业的工作成果无关的状况，使工人的收入同企业的最终生产成果联系起来。

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经济行政区的管理体制，虽然有利于在一个行政区范围内实现专业化和协作化，但也妨碍了部门专业化的生产发展，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并会产生严重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在推行新体制的同时，撤销了全部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原先撤销的各联盟工业部并建立若干新部，到1967年，苏联部长会议共设有62个部和9个直属机关。此时，经济管理的基本结构为：部——总管理局——企业。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是，以部门管理为主，兼顾地区管理，把政府机构的调整同经济体制的变革相结合，从而既加强了集权，又在一定范围内使地方拥有经济管理的权限。

根据经济改革的要求，凡实行新体制的企业，国家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由原先的30项减少了产品销售总额、产

量、工资总额等9项。同时，给企业在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和分配等方面以更多的自主权，努力促使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工作者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

推行"新经济体制"由于有一定的理论准备和实践试验，所以从1966年第1季度开始，第一批进行改革的有43个工业大企业，这些企业拥有30万工作人员。第2季度增加到200个企业，第3季度又增加到430个企业，到1966年末，实行新体制已有704个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1.5%，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上缴利润占工业总利润的12%。最初实行新体制的是工业企业，1966年下半年开始在汽车运输及民航企业中实行新体制，1967年起在铁路、内河和海上运输企业中全面推行新体制。

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工作进展得较为顺利。

年　度	实行新体制企业数	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占工业总产值的%
1966	704	1.5	12
1967	7248	15	37
1968	26850	54	72
1969	36049	72	84
1970	41014	83	93
1972	43000	87	94

这就是说，截止1972年，工业企业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未实行新体制的主要是地方企业和实验工厂。此外，实行新体制的国营农业企业有9000多个，占全部农业企业的50%左右。实行

新体制的建筑安装组织562个，占工程总量的25%。在商业和饮食业中，实行新体制的企业有 45000 个，占总数的18%，占商品流转总额的35%。

在推行"新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增添了一些新的改革内容和方法，主要的有：(1)谢基诺试验，即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推行的裁员试验。规定在不降低计划指标的前提下，把裁员节约的工资基金的50%留归工厂支配，刺激工人兼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方法1967年起试行，1969年10月后推广。(2)兹洛宾建筑队的包工制。规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直接取决于工程完成的期限、质量和实际造价，奖金额取决于建筑物所得的利润额，并按工程质量分配利润。这一方法在1971年首先在兹洛宾为队长的综合建筑队试行，1972年 7 月起全面推广。

"新经济体制" 的推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联自 30 年以来形成的旧的经济模式，缓解了原有管理体制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经济杠杆的刺激作用，企业自主权有所扩大，并注意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利益相互协调和结合，从而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在改革初期，收效比较明显。

1961—1970年经济增长率(年、%)

	1961—1965	1966—1970
国民收入	6.1	7.7
工业总产值	8.5	8.4
农业总产值	2.3	4.2

然而，以推行"新经济体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虽然对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的旧体制进行了冲击并有所突破，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的基本框架，对社会主义下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也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市场机制仍受到排斥，企业自主权有所扩大，但仍受到多方面的掣肘，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利益的结合仍不紧密，所以进入7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的势头已趋消减，改革也进入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

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的变化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变革，在政治生活方面也有若干变化。但总的说来，政治改革步伐远没有经济改革步伐迈得大，它过分追求稳健，致使党内和国家机关内的保守势力抬头，社会生活趋于停滞，这也是这一时期经济改革不能深入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在执政后期，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个人决定党和国家大事，政策多变，主观随意性大，造成一系列混乱现象。

1966年3月29日至4月8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勃列日涅夫当政以来第一次党代会。大会重申苏共将遵循二十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并认为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大会赞同1965年3月、9月两次中央全会关于领导经济的新方法及推行"新经济体制"所规定的原则。同时，大会对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作了部分修改，决定将中央主席团改名为中央政治局，设中央总书记以替代原先中央第一书记的名称；取消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以减少机构重叠，提高工作效率；恢复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代表会议的制度，党中央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召开党代表会议。尤为重要的是，取消了原党章第25条关于更新和更换党的

机关成员和党组织书记的比率的条款。据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 25 条规定，每届例行选举的时候，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四分之一；党的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在每届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三分之一；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及基层党组织的成员，每届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一半。本来，这个规定为了使党的领导机构经常保持新陈代谢，使新干部较快提拔起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但这种硬性规定，造成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书记由于任期已满而落选，更换率高达60%，对基层党组织的稳定产生不良的影响。二十三大重新审查了这一条款，决定在党章中只保留原则性纲领性的条款：在选举党的机构——从基层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时遵守党的机构的成员经常更新、领导干部要新陈代谢的原则，而把对这一过程作硬性规定的一些条文从党章中删掉①。党章的这一修改，增加了党的干部队伍的稳定性，但由于巨大的传统习惯，也使干部队伍和领导体制趋于凝固和老化，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不利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力图改变赫鲁晓夫过分突出个人、专断独行的形象，比较重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注意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第一，谨慎处理最高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和地位升降，尽量减轻对社会的震荡。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等人利用党内对赫鲁晓夫一些行为的不满，通过比较正常的会议程序把赫鲁晓夫撵下台，对少数几名赫鲁晓夫的积极追随者也撤销了领导职务。后来，勃列日涅夫等人曾在不同场合批评了前领导人的一些失误，纠正了某些偏差，但未追究个人责任，也没有扩大打击面，对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 109 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赫鲁晓夫本人没有追加什么罪名，让他在退出政治舞台以后，以终身养老金领取者的身份在莫斯科郊区度过其晚年。这与斯大林时期对待不同政见的领导人的处置是迥然不同的，也同赫鲁晓夫时期处理不同政见的领导人有所不同。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因政见不同被解除职务的有12人，公开报道的原因是：健康状况不佳、本人请求和本人要求退休等。这些人离开政治舞台后，仍然享有公民权利。这意味着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趋于正常化。

第二，规定了一些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针对过去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状况，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步规定了党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政治领导的一些具体内容：党负责研究和确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的远景、纲领性方针和政治路线；党在自己的有关会议上，就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具体指示和决定，提交国家有关代表机关审议；党向相应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提出各种建议；党向有关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推荐干部；党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团体执行政策、决议等情况实行监督。还明确指出，党的政治领导不是建立在强制和行政命令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进行说服和发挥思想影响的基础上。因此，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不应直接干涉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领导经济、文化和各种业务活动，不应直接干预社会团体的日常工作。这些规定虽然没有完全解决过去的问题，在实际上也未完全贯彻，但对健全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重视发挥苏维埃的作用。勃列日涅夫曾长期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对苏维埃活动的情况较为熟悉，他一上台，就陆续颁布一系列加强苏维埃工作的法令，如1968年颁布《关于村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法令，1971年颁布《关于市和市辖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关于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法令，1972年又通过《苏维埃代表地位法》。在这些法令中，进一步明确了苏维埃的职能，扩大了苏维埃的职权。最高苏维埃增强了立法职能，几年内制定了许多新的法律和法规，并开始对苏维埃现行法律进行整理和修订，着手编纂法典。最高苏维埃的监督职能也不断扩大，除了每年审议政府关于执行国家预算的报告外，它有权向部长会议、各部部长提出质询，被质询的公职人员必须在3日内作出口头或书面答复。地方苏维埃有权解决一切地方问题，在法律赋予的范围内通过一些决定，制定地方法规，有权对本地区范围内的所有企业、机构和组织实行监督。为提高苏维埃代表的地位，扩大代表的权利和职责，规定代表有权检查本地区内机关和企业的工作，有权向机关和团体提出质询，并要求给予答复，有权参加下级苏维埃会议，非经苏维埃及其执委会同意，不得给苏维埃代表以行政解雇、降职、开除集体农庄的处分，等等。同时，也规定要加强选民对代表的监督。有了比较健全的有关苏维埃的法令法规，就可以使苏维埃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节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停滞和后退

经济发展的"停滞"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承继了赫鲁晓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势头，改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失误和缺点，使"新经济体制"全面推行。经济改革也促进了经济较快的增长。然而，苏联自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基础深厚，给人们思想上心理上留下的传统习惯势力也根深蒂固，在经济理论上也受到传统教

条的严重束缚，造成很大的阻力，使经济改革难以深入开展，经济发展速度自70年代起也明显地停顿下来，甚至出现某种倒退的现象。

1971年3月30日至4月9日，苏共召开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总结报告，其中心内容是就"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一些建议和措施。柯西金在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中称，到1975年，各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行业的经济核算单位将完全改行"新经济体制"。他还说："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内容。当然，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①

同年6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在准备和实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在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时明显地暴露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倾向"。此后，一些报刊上陆续开展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并在实际生活中不再使用"改革"一词，而强调所谓"不断完善"。

70年代起，苏联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比较大的措施仅有两项：一是1973年起组建联合公司，二是1979年对新体制进行某些调整和修补。

1973年3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的决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改组工业管理机构，实行2—3级管理制，成立各种联合公司，使经济改革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成立联合公司，早在赫鲁晓夫年代已经开始。1961年9月，乌克兰的利沃夫出现两个联合公司：一是"前进"制鞋公司，它是由分布在不同城市的5个制鞋厂合并而成的；一是"曙光"皮革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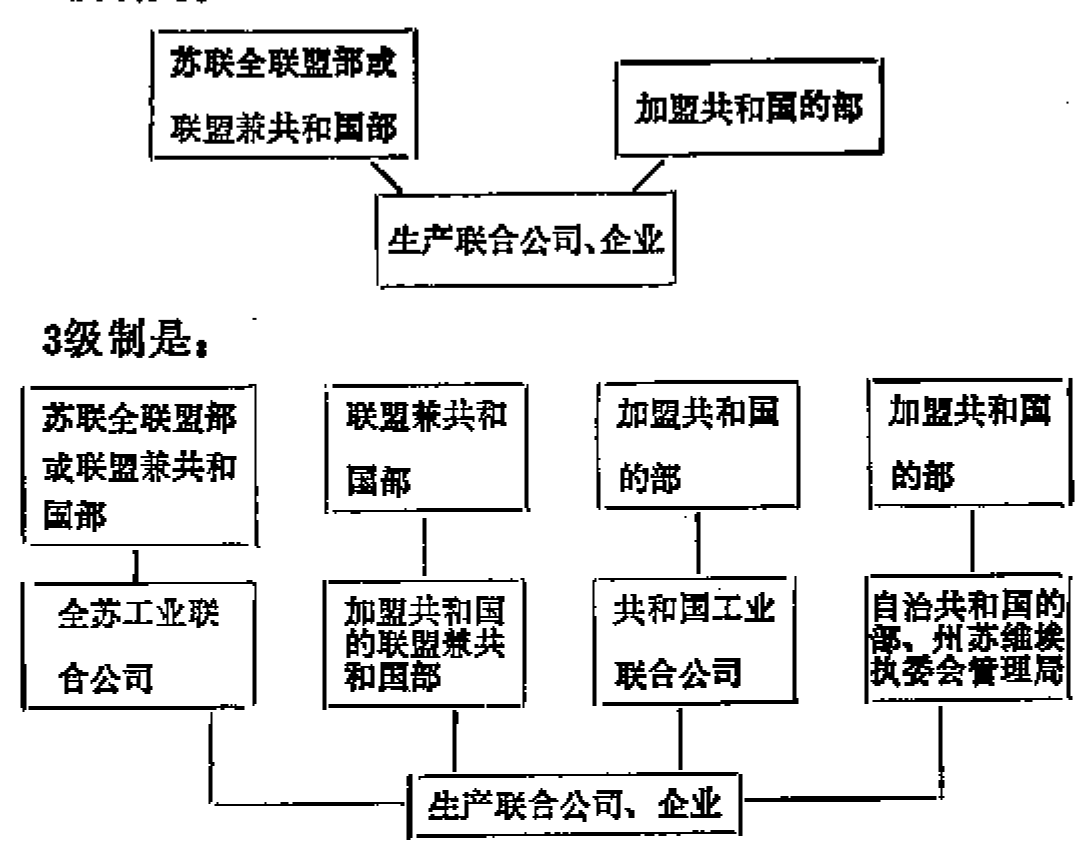
公司，是由4个皮革厂合并而成的。最初，这种联合公司是从下面自发组建的，其目的是发挥企业联合的优势并解决一些共同的生产管理问题。这些联合企业一出现，立即显示出较好的成效，引起了高层领导人的注意。赫鲁晓夫在1962年11月的中央全会上，就曾肯定成立这种生产联合公司是"一件大有前途的、经济上合算的事情"。此后，联合公司在全国许多地方得到了发展。到1964年1月，全国已建立401个联合公司，合并企业1860个。但这些联合公司主要是为了解决小型企业单独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它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一管理体制的限制，所以联合公司发展不快。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由于忙于推行"新经济体制"，直到60年代末，联合公司没有什么发展，1970年初，全国联合公司只有608个。

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以后，发现不少小型企业难以改行新体制，它们难以全面行使作为一个工业企业的职能，也不能有效地运用经济改革赋予它们的权力。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加快生产集中的过程，使小型企业走向联合。1970年8月，在列宁格勒召开了"研究生产集中经验的全苏讨论会"，总结了前一阶段联合公司发展的经验，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发展联合公司的建议。在1971年的苏共24大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报告中都肯定了成立联合公司的方向和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以后，终于在1973年3月正式在全国推行以联合公司为基础的2—3级管理制。苏联部长会议还先后批准颁布了《全苏和共和国工业联合组织总条例》和《生产联合组织(联合企业)条例》。

这次工业管理体制改组的主要内容，一是合并企业，建立生产联合公司，使经济领导机关接近生产，在部门管理的各个环节更加明确地划分权利和义务，提高管理机构工作的效能和灵活

性。二是取消工业部门管理上的多级制，撤销各部的总管理局，在建立联合公司的基础上改行2级或3级管理体制。

2级制是：



从1973年起，联合公司在苏联普遍建立。1973年建立1425个，1974年达1715个，1975年达2314个，到1979年达3947个，参加联合公司的企业共17516个。联合公司的产品占工业产品销售额的47.1%，从业人员占工业生产人员总数的48.4%。

联合公司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适合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有利于开展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有利于合理的社会分工，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有利于减少管理环节，精简管理人员，使管理接近生产。从实践来看，一些办得好的联合公司，在完成生产任务、提高效率方面确实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然而，在成立联合公司的过程中，由于高度集中的旧体制的基本框架未变，旧体制和新的管理方法之间的矛盾经常暴露出来，也影响了联合公司发挥应有的作用。

1979年7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经济机制及党和国家机关的任务》的决议。接着，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这些决议对计划工作、基本建设、经济刺激方面规定了一系列措施，被认为是完善经济机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使全部管理和计划工作服务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取得最高的国民经济成果和更充分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和个人需求。"①

当时所以需要采取一连串广泛的措施，来改进和完善经济机制，主要是因为，在推行"新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矛盾。在改革的实践中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上述决议中所提出的措施，绝大部分是把已经采用的或试行的措施加以系统化和作出明确规定；另外，70年代，苏联经济加紧向集约化方向过渡，人力、物力的不足需要通过发展科技、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来解决。这就是当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并制造一些声势来贯彻这些措施的缘由。实际上，同1966年的经济改革相比，称不上进入什么"新阶段"，只不过是针对前一阶段存在的问题采取一系列调整和修补的措施而已，没有触及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改革，它的意义仅限于对新体制进行局部的改善和完善。

综观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活动是推行"新经济体制"，力图完善新体制。但总的看来，这一时期

	1966—70	1971—75	1976—80	1982
国民收入	7.7	5.7	3.7	3.4
工业总产值	8.4	7.1	4.5	2.8
农业总产值	4.2	0.5	1.8	

① 《共产党人》1979年第12期。

的经济改革是极不彻底的，经济增长率除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外，一直处在停滞和下降状态。(见上页附表)

劳动生产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1966—70	1971—75	1976—80	1982
社会劳动生产率	6.8	4.6	3.2	2.7
工业劳动生产率	5.7	6.0	3.2	2.1
农业劳动生产率	5.4	4.1	2.8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改革没有冲破旧体制的基本模式。以部门为主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广大劳动者很少管理经济权力的状况没有改变；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严格的计划制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宰，管理的行政方法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国家、企业、劳动者之间关系仍没有处理得当，企业没有活力，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未能得到持久的发展。其次，60—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苏联却拘守于把增加传统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作为赶超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因此，苏联尽管在若干重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如钢、生铁、金属切削机床等)居世界首位，在常规武器、核武器以及航天技术方面可以同美国相抗衡，但在新兴产业领域内，尤其是微电子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都明显处于落后地位。苏联在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上未能适时调整，成了阻滞经济改革的又一重要原因。此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未动和僵化的理论教条的束缚，也是阻碍经济改革开展的不容忽视的原因。

农业体制的调整和改革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比较重视发展农业。赫鲁晓夫执政

后期，苏联农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农业增长速度减缓，农业发展计划连续多年未能完成，农作物收获量增加很少，可耕地基本开发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措施，竭力扭转农业中的困难局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理顺农业管理体制。1964年11月，原先的州和边疆区的工业党委会和农业党委会重新合并为统一的州和边疆区党委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归区党委会领导。次年初，对赫鲁晓夫改组农业部时被免职的农业部长复职，并决定把原先下放到地方的权力重新划归农业部，责成农业部领导整个农业的发展。1969年11月，召开了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这个章程的主旨是提高农业的公有化，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为使集体农庄所有制进一步接近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

第二，鼓励发展个人副业。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对个人副业限制甚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勃列日涅夫一上台，首先调整了对农村私人辅助经济的政策，决定取消对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个人副业的不合理限制，鼓励发展个人副业，并明确指出个人副业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是公有经济的延伸。据此，国家对私人经济还在财政上予以扶持，市场交易中予以保障，并适当扩大可拥有自留地的居民范围。1969年制订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中，对农庄庄员家庭副业的规模、内容都作了明确规定。1977年，勃列日涅夫在关于新宪法的报告中重申个人副业同剥削没有联系，在苏联经济中仍起着有益的作用。

第三，改进农产品收购制度，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改变过去每年制定一次收购计划的做法，实行“固定收购，超售奖励”的制度，农产品收购计划一定5年不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可根据计划，确定最合理的发展方案。

在完成计划交售之后，国家可加价收购农产品。与此同时，国家大幅度地降低谷物收购的基数，大范围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65—1979年间，农产品收购价格共提高7次，价格指数提高60%以上。此外，从1966年起，集体农庄庄员参照当地国营农场的劳动定额和工资标准，实行月工资制度，一定程度上满足庄员的现金需求，提高了庄员的生产积极性。

第四，推行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方针。农业集约化方针是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提出来的，但当时未能很好贯彻。勃列日涅夫把集约化作为整个农业发展的基本战略方针，并在党的二十三大、二十四大文件中加以肯定。其主要措施是：增加农业投资，增强发展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苏联自1950年至1963年农业投资总额为637亿卢布，1965年至1982年达4708亿卢布，提高7.39倍。增加农业投资，加强了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基本建设，赫鲁晓夫时期的农业投资大量用于垦荒，以扩大耕地面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农业投资按照集约化的方针，主要用于生产性开支，解决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土壤改良等方面。并根据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产品商品基地，促进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重视以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于发展农业。

第五，农工综合体的试验。农业集约化的进展，促使苏联从70年代开始出现农工一体化的趋势。最初出现的，是由集体农庄入股的跨农庄的企业。后来，国营农场入股的逐渐增多，又有工厂加入这种跨单位的合作，遂形成跨单位的企业或联合公司。这种农工综合体的企业主要经营建筑、建材生产、农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及复合饲料生产、社会服务业等企业，这种跨单位的农工综合体的企业，可以把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其他单位的资金和人才集中使用，能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从而提高生

产效率。1976年5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跨单位合作和农工一体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决议，指出发展农工综合体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主要方向和必要条件。到1976年，农工综合体企业已达到7000个。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农业体制和农业发展方针都有一定的调整，农村状况也有所改善，但农业体制的改革收效不明显，农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政治体制日趋僵化

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苏联国内政治舞台，由于勃列日涅夫刻意求稳，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表面上相当安稳，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许多社会矛盾被掩盖着，腐败现象在滋生，党和国家政权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各级干部队伍严重老化，整个社会生活缺乏活力，处于一片保守、僵化的凝重状态中。

重新修订苏联宪法，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较为重大的一件政治活动，也是这一时期苏联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苏联自1936年宪法问世以来，40年间尽管国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但一直未能制定出新宪法来。直到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才把制定一部新宪法作为完善和发展苏联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全国上下有150万次集会对宪法条文草案进行讨论和审议，参加讨论的有1.4亿人，占全部成年人的2/3以上。又经过从村苏维埃到最高苏维埃的各级代表的审议，最后，于1977年10月7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宪法规定，苏联是社会主义全民国家，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内各族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苏

联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方针是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全民讨论宪法草案，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

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有所扩大和完善。如加强同群众的联系，要求党政机关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为此，先后通过了8个决议，颁布了法令。1979年苏共中央成立了信访部，专门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仅苏共二十五至二十六大之间的5年内，苏共中央共收到来信300多万封，接待来访者10多万人。又如新宪法规定，人民监督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手段。1979年又通过了《人民监督法》，对人民监督机关的基本任务、设立、程序、职能、权限等作了明确规定。到1980年，全国共有4500多个监督委员会，130多万个监督小组和监督岗，近1000万名监督员。由于人民监督开展得比较广泛，收到一定的效果。1980年人民监督委员会审理了7.6万个有关执行国家计划、遵守合同等问题。1981年上半年进行了15万次检查，约有13万名公职人员因管理不善、虚报成绩等问题而受到追究，其中2400人被解除职务，27000人被罚款，另有3000多份材料移送人民检察机关。

总的说来，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改革步履蹒跚，进展不大，有些问题上还有所后退，突出地表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级干部队伍严重老化。由于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关于干部定期更换的具体规定，大小干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仍能留在领导岗位上，从而使领导班子变动极少，处于超稳定状态。特别是最高层，尤其如此。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占79.4%，大大高于二十二大的49.6%；到二十五大，连选连任的达83.4%，如果除掉去世的中央委员，连选连任高达90%。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在苏联，存在着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使干

部队伍的老化现象更趋严重。勃列日涅夫后期的 14 名政治局委员中，60岁以上的占92.9%，其中 70 岁以上竟占57.1%。

第二，机构臃肿。1965年恢复部门管理经济的原则，从上到下撤销了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1957年撤销的部基本上都予以恢复并建立若干新部。1973年进一步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合并企业，成立生产联合公司，由原来的 4—6 级管理改为 2—3 级管理制度，但许多联合公司仍承袭过去工业部门旧的管理方法，有的则"换换招牌"，实际上很少变化，收效不大。勃列日涅夫试图把部门管理原则同地区管理原则相结合，把政府机构的调整同经济体制的变革相结合，以便既加强集权，又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地方在管理经济方面的权限。但是，这样一来，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都增加很大。到 80 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 800 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 1 人，第一副部长 3 人，副部长 15 人，正副部长共 19 人。苏联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及人员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权力日趋集中，个人专断现象日益严重。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他的领袖地位已经稳固，勃列日涅夫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和树立个人威望。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指示，任意拔高现任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大问题也只有极少数人专断独行。据揭露，象1979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 4 人作出决定。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了最高苏维

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会议主席，又造成党的总书记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勃列日涅夫对熟悉经济、倡导改革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一向关系冷淡，致使柯西金最终因心力交瘁而退出政治舞台。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的时候，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却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节 “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几个提法

社会主义要经历哪些发展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马克思在有关著作中曾提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需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共产主义按照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分配方式等因素，可划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未来社会作出具体而详尽的设计，而是以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目标，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分野所在。

列宁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同样是比较谨慎的。他在十月革命前夕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中说：“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① 因此，在列宁的著作中，除了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低级阶段一般称之为社会主义阶段外，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要经历哪些阶段，他也没有进行预测。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5页。

钦定的，而是群众自己创造的，因此，"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① 不错，列宁曾在1920年使用过"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术语，但他对此未作任何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斯大林执政的整个时期也未使用过这个术语。

不过，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时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② 既然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那社会向何处发展呢？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称，"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渐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③ 在1939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又发出"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号召。他认为，苏联工业在技术装备和增长速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在工业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方面也赶上并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据斯大林估计，达到这一目标大约需要10—15年时间④。

社会主义刚一建成就已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将不会再有别的阶段，这就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基本点。

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但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一建成可以立即向共产主义过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70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上)第90页。
③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8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④ 参见《斯大林文选》(上)第225、256页。

渡的观点，却没有人提出异议。相反，在1957年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通过和平竞赛“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目标。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在10年左右，即1970年苏联在按人口计算方面的产品产量赶上和超过美国，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还提出各社会主义国家“要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目标。接着，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明确提出，苏联已经获得了社会主义的“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已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提出要用20年时间，即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急于过渡的理论，必然在事实面前遭到失败，并在国内外受到普遍的嘲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196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的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正式宣称，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的大会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又重申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接着，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又着重论述了这一观点。此后，苏联国内理论界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面对“发达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论述，先后举行了一系列国内和国际的学术讨论会。不少人认为，“发达的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上的一个客观必然的重要阶段”，是一个“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要求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写入新宪法。197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载明，“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

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①

苏联学者依据党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需经过以下几个基本发展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用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和社会对抗，这一时期苏联用了大约20年；从1936年到60年代初，苏联处于不发达或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被称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时期；此后，苏联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等所有社会生活方面都具有了成熟的形式，即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是所谓先进政权同与之不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之间的矛盾，发达社会主义长入共产主义就是依靠发展生产力，广泛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坚持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国民经济达到无比高度的水平。在这个社会阶段里，已经建立起成熟的、技术装备优良的城乡经济体系，可以最充分地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生产仍是一个重要特点，推行“新经济体制”，强调利润是“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物质刺激是“基本经济杠杆”，从而促使国民经济向集约化发展，奠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政治方面，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社会上已不再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各阶级、集团逐渐接近，克服它们之间的差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已经巩固，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单一的社会”；成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合作，是各阶级利益的一致；无产阶

① 《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资料选编》第124—125页。

级专政国家已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的全民国家”。“全民国家”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共产党成了全体人民的“政治先锋队”。

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苏维埃人民的团结日益巩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日益提高和加强，劳动人民的教育程度、技能和文化水平大大提高，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使共产主义类型的一代新人不断涌现出来。

在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方面，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后，苏联各族人民有了不分民族的“统一经济体”，有了没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随着异族通婚的增加，语言文字的扩大交流，产生了一个“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中，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高度国际化，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国际分工”等，都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特征。

“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种新的认识。这种理论试图探求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进程，改正过去过急过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并为“新经济体制”的推行提供理论依据。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一理论并没有给改革提供应有的思想武器。相反，理论的研究和讨论只局限于少数领导干部和学者，就无法深入下去，也无法从纯理论讨论中伸展开来，付诸实践，这反过来又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之一。

第二十四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

第一节　苏联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勃列日涅夫外交政策的继承性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继续推行赫晓鲁夫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维持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外政策，总体上仍然奉行赫鲁晓夫制定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同其前任相比，勃列日涅夫注重增强物质基础，扩充军事力量，增加国防实力。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美在经济、军事实力上的对比，出现了有利于苏联的巨大变化，这就促使勃列日涅夫调整苏联外交政策，修正赫鲁晓夫制定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走上了公开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赫鲁晓夫时代，由于苏联经济、军事实力同美国相比，基本上处于劣势。苏联尚不具备同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资格，因此，赫鲁晓夫只是全力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主张“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加之赫鲁晓夫执政年代，正值世界跨入核时代，对于核威力危及人类的共同命运，他再也不能象斯大林那样漠然处之。为此，赫鲁晓夫提出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并将它视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不可动摇

的原则和解决当代一切问题的最高原则。经过赫鲁晓夫一系列外交努力，苏美关系以及整个东西方关系均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还留有诸如欧洲边界、东西德国、柏林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所受的西部威胁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因此，"和平共处"不过是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一厢情愿而已。通过何种外交途径，达到东西方关系的实质性缓和，是赫鲁晓夫遗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外交难题。鉴于只有消除东西方紧张气氛，实现真正的缓和，才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达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目标，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便宣布将继续执行二十大、二十二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总路线，认为这一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直到 1971 年苏共召开二十四大时，勃列日涅夫才逐步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外交政策，通过实施一系列"缓和物质化"的措施，在全世界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

调整对外战略的条件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上升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苏联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从 60 年代末期开始，苏美经济实力的对比便开始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变化。勃列日涅夫当政前期，推行了"新经济体制"，使得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同美国相比，1965年苏联国民收入只占美国的60%，到 1981 年，苏联国民收入总值开始占美国国民收入总值的67%；苏联的工业总产值 1981 年为美国的 80% 以上，雄居世界第二。1965—1981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 2.42 倍；社会生产总值增长 1.46 倍；国民收入增长 1.44 倍，平均每年递增6.1%，超过西方所有国家，在西方所有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工业产值增长 1.77 倍，苏联的工业产量占世界

工业总产量的1/5；农业年均产值，"十·五"期间较"七·五"期间增长50%多。因此，从经济实力来看，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有长足的发展，苏联同美国的差距从70年代前期便逐步开始缩小，苏联20几种主要工业品，尤其是能源方面，如，电力、原油、原煤、天燃气、钢等项产品的产量，均大幅度超过了美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经济实力的上升，为勃列日涅夫调整外交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后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关注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对军事实力、军事科技的发展予以特别的注意，他一直将拥有强大的军备和核威慑力量看作是推行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将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十分强调发展战略核武器和远洋海军。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军费逐年增加，从1965年的326亿卢布增至1981年的1550亿卢布，前后增长3.75倍，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军事实力的迅猛增长，逐步改变了美苏军事实力的对比。60年代，美苏军事实力对比，苏联还处于全面劣势；70年代起两国大体上相当，苏联利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不可自拔之机，加快了扩军步伐。一方面加紧常备军备，特别是把海军从一支近海防御力量，迅速变为一支相当强大的远洋作战力量；另一方面，全力发展战略核力量，仅用了3年时间(1966—1969)，就在洲际导弹、潜艇发射的导弹的数量从占美国的1/3，达到同美国大致相等，并在以后几年里，在数量方面超过美国50%以上，只是在核弹头数量、命中率方面稍逊于美国。此外，苏联的潜艇导弹的数量也在70年代前半期赶上了美国，并于70年代中期以后大大超过了美国。

形成这一态势的直接原因是，苏联领导人一向将取得军事优势，作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为此，苏联不惜一切代

价，动用自己的经济、科技能力，以求达到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占有数量和质量的优势。勃列日涅夫十分注重实力原则，公开表示要在苏美竞争中谋求优势。因此，在国防实力的增长中，苏联给予了常规力量、海军力量，尤其是战略核力量以特有的重视，以实现苏联"依靠战略核进攻，尽可能多地摧毁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依靠战略防御体系，把自己的损失缩小到最低程度"的目标。正是由于苏联军事实力、特别是核武器数量和质量的迅速增长，才使得苏联最终同美国并驾齐驱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使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最终在世界上确立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的调整，正是基于苏联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而进行的战略性调整。

另外，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始，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缓和"的势头，出现了新的国际格局，这些因素，也是促使勃列日涅夫修正赫鲁晓夫外交，调整苏联对外战略的重要因素。

60、70年代之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优势开始丧失，侵越战争的沉重负担，使美国经济开始呈现萎缩。尽管战后西方技术革命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但这种推动作用在各国所产生的效果却迥然不同。日本、联邦德国等国由于受战争的破坏比较严重，战后固定资产更新较快，新兴的工业部门较多，较少受到传统的"夕阳工业"的困扰。由于现代新科技在生产中运用得相对充分，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而同期的美、英等国，由于技术革命影响的相对较弱，经济发展速度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到6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美、日、西欧"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取代了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家独霸"局面。美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了新的挑战。

鉴于越南战争使美国深陷泥潭，国内因越战引起的反战运

动愈演愈烈。尼克松入主白宫以后，主动对美国战后以"冷战"为主要标志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所谓"持久和平大厦"的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对苏联实行致力"缓和"的所谓"新国际战略"，以"核均势"取代"核优势"，以"一个半战争"理论取代"两个半战争"理论①。

此外，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是战后世界最重大的事件，特别是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新兴政治力量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以及广大第三世界为争取民族独立、捍卫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苏联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旗号，援助第三世界进行的反帝、反殖斗争，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苏联的局面。

总之，由于国际国内的多种因素，使得勃列日涅夫逐步将苏联外交调整到了自己的轨道上来，开始在全球推行进攻战略，使得60—70年代的苏美竞争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和扩张

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从60年代开始，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总产值不断出现"滑坡"，到1967年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国内政治、经济改革成为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捷共内部改革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1968年3月，在捷共中央全会上，诺沃提尼被迫辞去党

① "一个半战争"是指美国与盟国一起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保存部分力量应付其他地区的小规模武装冲突的一种战略构想。这就是说，美国的对手只有一个，指苏联。

的第一书记职务，由改革派代表人物杜布切克接任，此后，斯沃博达又取代了诺沃提尼，担任了总统。这样在党内和国内，主张改革的势力都占了上风。从而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局面。

1968年4月5日，改组后的捷共中央举行全会，公布了推行改革方针的《行动纲领》。《纲领》指出：“我们将进行试验，给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纲领》要求改革整个政治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政治权利，逐步改变工业结构和布局，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实现生产结构的多样化，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并要求继续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所有国家发展双边互利关系。

《行动纲领》的发表，无疑是公开向世人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将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通过实践寻找出一条适合其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捷克斯洛伐克地处欧洲心脏，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的任何举措，苏联都极目关注。

早在捷共中央4月全会之前召开的华沙条约国家德累斯顿首脑会议上，杜布切克曾为本国的改革意图向与会者作过说明。他说改革受到人民最广泛的支持，改革是为了社会主义利益，而且对各党都有好处。杜布切克想以此求得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的谅解和认可。但是，从4月12日开始，苏《真理报》便开始影射捷共4月全会。5月3—4日，苏共中央电邀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前往莫斯科进行磋商。此次会谈后不几天，苏《文学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相继载文影射和批判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5月17日，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抵捷，要求将一个师的苏军驻留在捷西部

边境，以“共同防御联邦德国”。这一要求被捷当局所拒绝。之后，苏联又提出要在捷境内进行一次“参谋人员训练的军事演习”，得到了捷当局的同意，但演习之后苏军却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滞留不走。

面对此种形势，捷国内有识之士担心改革受挫，于6月27日共同签署发表了《两千字声明》，婉转而又坚决地要求拒绝外来干涉，并表明将“拿起武器”同政府站在一起。声明的发表，引起苏联的严重不安。7月11日，《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把捷当时的形势比作1956年的匈牙利，确认“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国内“蔓延”。7月14、15日，华沙条约各国首脑在华沙开会（捷拒绝了事先的邀请），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的情况下，由苏联一手炮制通过了一封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5国联名信，信中以强硬的口吻告诫捷当局：“我们不能同意让敌对势力把你们国家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开。这已不仅仅是你们的事了，这是我们华沙条约国的共同事业。”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复信中要求五国不要干涉捷内政，同时表示愿意同5国分别地举行双边会谈。

7月19日，苏共领导“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于7月22—23日在苏联某地——莫斯科、基辅或利沃夫，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由于捷共坚持谈判必须在捷境内举行，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于7月29日在斯洛伐克东部离苏联国境只有3公里的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

会谈前夕，苏联又举行军事演习，给会谈制造紧张气氛。会谈过程中，双方唇枪舌战，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代表指责捷搞“自由化”的改革政策和对外政策，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则对种种不实之辞予以驳斥。由于勃列日涅夫心脏病发作，会谈只得暂停，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于8月初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

举行捷领导人与5国领导人的联席会议。

8月3日，6国会谈如期举行。本来，根据捷苏约定，会议只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在有关国际问题应予承担的义务和职责，而不讨论捷国内局势。但会议上苏联提出的联合声明草案有多处涉及捷内政问题，其中有一点称："对苏联和东欧人民取得的成果加以支援和保护，是所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是与会者的一致观点。"捷共提出要在此句话后附加"同时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民族独立"一句，遭到勃列日涅夫断然拒绝。事实证明，苏联的提法，成了以后出兵捷克的借口。6国会谈只举行一天，随即与会国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同日，苏军宣布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

8月4日，杜布切克发表演说指出："主席团完成了党中央和整个国家交给它的任务"，"没有理由为我们的主权担心"，他如释重负地说，捷克斯洛伐克"赢得了3个月或6个月的喘息时间，可以从事自己的改革试验了。"然而，此刻，苏联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干涉计划。

1968年8月20晚，布拉格上空一片寂静，忽然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划破了夜空，一架苏联运输机要求在布拉格机场紧急降落。飞机着陆之后，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苏联空降兵顷刻占领了机场，紧接着一架架满载轻型坦克、装甲车、反坦克炮的巨型运输机源源不断地飞抵布拉格。与此同时，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5国大约50万部队，从北、东北、南三面强行越境。到21日傍晚，对捷实行了军事占领。此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讨论预定于9月9日召开的十四大的具体事项。当获悉苏军入侵时，杜布切克说："我作梦也没想到，那些家伙竟会对我们采取这么卑鄙的手段。"捷电台说苏的入侵行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可卑的、空前未有的行动。"入

侵的苏军立即激起了捷人民的抵抗，群众在苏军坦克上画了当年纳粹的“卐”标志，有的坦克则被愤怒的群众放火焚毁。

苏联军队很快占领了捷共中央大厦，绑架了杜布切克等捷共改革派领导人。同时，苏共领导人还会见捷总统斯沃博达，暗示他出面组织新政府，遭到严辞拒绝。8月22日，捷共十四大提前秘密召开，大会重申了对杜布切克和党的《行动纲领》的支持。8月23日，布拉格举行全市大罢工，在这种情势下，勃列日涅夫改变了原来企图成立一个亲苏政府的幻想，决意通过谈判压捷共就范。

8月23日，捷总统斯沃博达飞往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谈判当前局势，谈判中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苏联被迫同意让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参加谈判。25日，双方谈判开始，杜布切克等坚持原先立场，草拟了一份最后公报的方案，提出5国必须撤军；捷国内政策仍以捷共《行动纲领》作为最后制定路线的基础。苏方不作丝毫让步，谈判多次陷入僵局，最后在苏方进行分化和施加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捷共领导人被迫在协议上签了字。10月，苏捷签定了《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条约》。

1970年5月，杜布切克辞去第一书记职务，而后又被逐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党籍。

“布拉格之春”终于在苏联的武力摧残下夭折，这一事件也暂时阻碍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潮流。这是勃列日涅夫推行强权政治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曾一度使勃列日涅夫外交陷入了困境。

珍宝岛事件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国利用这一机会试探同苏联和解和恢复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但是勃列日涅夫向中国代表表示，在同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方面，新领导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差别。苏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在中国代表面前鼓励把"毛泽东搞下去"，遭到中国代表团的强烈抗议。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的驻军不断增加，从赫鲁晓夫时期的10多个师增至40多个师。1966年2月，苏蒙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军事力量向中蒙边境的推进，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呈上升之势。1968年1月，苏联在乌苏里江中国七里沁岛上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竟用装甲车压死抗议苏军侵入中国领土的渔民4人。至1969年3月，又出现规模更大的入侵中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属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和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都确认这一点。苏联政府公然违背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准则，于1969年3月15日和3月29日发表声明，把珍宝岛说成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69年3月2日，苏联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出动全副武装的军人以及4辆装甲车、汽车，从南北两方侵入珍宝岛，突袭中国执行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开枪开炮打死边防战士多名，遭到中国边防战士英勇反击。

3月15日晨，苏军又出动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大批武装部队，再次入侵珍宝岛。苏军不顾中国边防军的严重警告，首先开

火，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下午，苏军还用大炮袭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与此同时，苏还向美试探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性。中国军民奋起还击，把苏军全部赶出了领土。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又在中苏边境的多处地方进行挑衅，酿成了新的流血事件。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前半期，苏中边界冲突事件达1.3万多起。

对于中苏存在的争议和边界冲突，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通过谈判将历史遗留的和当前存在的边界问题予以"全盘解决"。1963年8月，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六点建议。在中国政府的极力促成下，中苏边界谈判从1964年开始。由于苏联方面陈兵百万于苏中边境，企图用武力使中国屈服，边境谈判时缺乏诚意，谈判时断时续，收效甚微。

1969年9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两国边界、贸易以及两国关系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同意重开谈判，但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一谈判始终进展不大。

鉴于中苏关系的现实发展，1979年4月3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宣布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倡议同苏联进行新的谈判，谈判于9月开始，后因苏军入侵阿富汗而中断。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随后进行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副外长级谈判，但由于"三大障碍"① 的存在，双方谈判进展缓慢。

---

① 指苏联要从阿富汗撤军、敦促越南撤出柬埔寨、削减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驻军等三件事。

援越侵柬反华

越南长期处于对外战争状态，国内经济状况极其恶化，外交上十分孤立，由于迫切要求接受经援、军援，越南越发投靠苏联。1978年11月3日，苏联与越南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将越南纳入了苏的战略体系。同时，苏联通过在金兰湾建立军事基地、在越国内建立情报中心和电子监听站等，使越南成了苏推行南下战略的前沿阵地。

中越两国本有着悠久的深厚友谊。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黎笋集团开始推行反华政策，只是由于当时美越战争尚未结束，需要大量中国援助，才在势头上稍有收敛。70年代中期以来，越南政府在苏联的唆使下，在所谓的中越陆地边界问题、北部湾问题、西沙、南沙群岛问题、华侨问题上猖狂反华，严重地恶化了两国两党关系，并在边境多次制造事端。1979年，中国边境军民奋起自卫还击，取得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越南称霸东南亚的企图。

与此同时，1978年底，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越南凭借苏联的坦克、大炮，向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占领了柬埔寨大部分领土，并于1979年1月7日占领柬首都金边，随后在同年1月11日扶植起了一个伪政权，并与之签订了所谓"和平友好条约"。

出于控制东西方战略通道的重要一环——印支地区，进一步扼制中国的目的，苏联百般拉拢越南黎笋集团怂恿其推行反华、排华、武装入侵柬埔寨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透过越南侵柬反华的面纱，人们可以鲜明地看到苏联推行霸权扩张进攻外交战略的实质。

“勃列日涅夫主义”——苏联在东欧

苏联等5个华沙条约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前，苏联曾发表过一系列宣言和声明，在这些文件中，苏联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理论，这一切通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决定各自国家前进的道路”，但是“每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根据这种理论，除苏联以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都是有限的，谁要打算抛弃斯大林模式，走向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轨道，都是苏联所不允许的，必须加以干涉。不仅如此，苏联出于向第三世界扩张的考虑，竟然将“有限主权论”推而广之为“资源有限主权论”，从而为其争霸世界提供理论依据。

侵捷事件不久，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当反社会主义的内外势力试图扭转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当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危险——即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这就不再仅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关心的问题。”① 言下之意，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国专政自然就可以递变为“国际专政”。侵捷事件正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的需要。

透视勃列日涅夫主义理论和实践，它的实质是以“国际主义”为藉口和招牌，在全球推行霸权战略。为此目的，又不惜将苏联的利益凌驾于其它国家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主权之上。

① 1968年11月13日《真理报》。

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大俄罗斯主义"在新时代的延续，它直接损害了东欧诸国的主权和利益，增加了西方国家对苏"缓和"政策的不信任。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还通过控制"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组织来突出其在东欧的地位和影响。

60、70年代，苏联仍维持其在东欧的大量驻军，并通过"华约" 司令部来左右东欧国家的指挥权，并经常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此外，苏联利用"华约"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来协调和统一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内政策，防止东欧各国可能出现的独立意识。

在"经互会"，苏联推行广泛的"国际分工"，借以控制东欧一些国家的能源与原料的供应以及对外贸易。1969年，苏联在"经互会"提出要实行所谓的"经济一体化"建议，随后，"一体化"又被苏联推而广之到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各个领域。"一体化"是苏联借"经互会"控制东欧的理论依据。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东欧推行严格控制政策，使得这一时期的苏联、东欧一同处于一个政治沉闷、经济停滞时期。

第三节　对西方国家关系的调整和演变

制订和推行"缓和"政策

早在1969年，勃列日涅夫为摆脱侵捷事件给苏联外交带来的困境，在"华约"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提出了关于"欧洲缓和"的设想和主张。勃列日涅夫认为"缓和政策是运用于今后15年左右时期的一项策略性的政策转变"，目的是为了利用同西方的和解，"建立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使在80年代的美苏竞争

中，苏联能够不依靠协议就确立一种独立和优越的地位。为此，勃列日涅夫建议就建立包括两大军事集团在内的“集体安全体系”尽快“开始对话”，并建议就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问题举行会晤和磋商。

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争取和平和国际合作”的6点“和平纲领”，明确表示要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同美国进行“友好”的“对话”与谈判，并宣布要“把缓和摆在巩固和加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的首位”。这一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承认欧洲边界状况的不可改变，通过召开“欧安会议”；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停止军备竞赛，缔结裁军协定；建立起新型的国际互利合作关系。勃列日涅夫推行缓和政策，是旨在利用同西方的缓和，避免同美国发生一场直接的、耗费巨大的军事冲突，维护苏联的安全与全球利益，同时，还企图借助缓和来推进“世界革命进程”。自此，勃列日涅夫便开始了其“缓和”外交攻势。

随着美苏关系逐步出现转机，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双方共同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苏美相互关系准则等文件。1973年，勃列日涅夫回访华盛顿，1974年尼克松重访莫斯科以及勃列日涅夫、福特的海参崴会谈，把美苏“缓和”推向高潮。与此同时，从1972年11月底开始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筹备会以及1975年7—8月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安会”正式会议及被称作“赫尔辛基精神”的会议最后文件——《赫尔辛基宣言》，标志着勃列日涅夫“缓和”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政治成果。

欧洲边界问题和柏林问题的解决

50年代中期，苏联为了遏制美国的“冷战”政策，公开推行两

个德国政策，谋求西方国家承认战后欧洲边界现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西欧加紧展开外交攻势，多次提出召开全欧会议，讨论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

50年代至60年代上半叶，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推行哈尔斯坦主义，拒绝承认战后欧洲边界，不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实体，坚持不与和民主德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除苏联外）建立外交关系。阿登纳下台后，艾哈德政府于1966年先后照会一百多个国家政府，宣称将使用和平手段，谋取德国的重新统一，并表示愿意同苏联东欧就互不使用武力问题进行谈判。是年12月，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政府，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出任副总理兼外长，主张同东欧国家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和民主德国接触。

1969年，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在联邦德国大选中获胜，组成联合政府，勃兰特出任政府总理。勃兰特认为，美苏竞争已陷入"僵局"，使得欧洲"存在几代人的和平机会"，如果联邦德国继续实行"哈尔斯坦主义"，不仅不能获取重新统一，也不能消除苏联的威胁和美国的控制。为此，他认为，联邦德国只能以"承认战后现实"，来换取苏联的"谅解"。这就是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加强与西方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东方的谅解；承认战后欧洲现状，改善与苏联、民主德国的关系；承认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谋求两德加强直接联系。

1969年11月，联邦德国外长谢尔正式建议苏联，就签订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进行谈判，旋即得到了苏联的响应。此后，双方进行了三轮谈判，达成了协议。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亲赴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扩大双边合作等。勃兰特政府所推行的"新东方政策"，既是勃列日涅夫调整苏联外交战略的条件，也是

推行其“缓和”政策的一项积极成果。但是，该条约遭到了联邦德国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强烈反对，并于1972年2月的联邦议院辩论中遭到否决。为挽救这个条约，勃兰特进行了不懈努力，勃列日涅夫也不惜向联邦德国提供大批贷款，才换得议会的批准。

与此同时，在西柏林问题上，勃列日涅夫也同西方国家进行着紧张的谈判。战后，西柏林一直是东西方斗争的一个焦点，两次“柏林危机”的教训，使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这一棘手问题。1967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责联邦德国“对柏林这个同西德没有任何关系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但是，苏联为了争取西方国家承认欧洲边界现状，承认民主德国作为独立国家实体的存在，被迫改变了对西柏林的态度。1970年，苏联正式邀请美、英、法三国谈判柏林问题。1971年9月3日，四国才最终签订了协定，即《西柏林协定》。该条约确认四大国对柏林的权利，苏联对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交通畅通作出保证，西方国家则承认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

1972年11月8日，东西德代表在波恩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东西德承认彼此为主权国家，发展双方平等睦邻关系，互设常设机构，通商、相互贸易等等。至此，东西方关系中围绕德国问题的争端基本结束。

1973年5月，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实现了战后苏联首脑对西德的首次访问，并取得了成功。1973年9月13日，联合国同时接纳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为正式会员国，联邦德国还先后同东欧的波、捷、保、匈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赫鲁晓夫昔日的希望终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变为了现实，东西方关系得到了实质性和缓。

苏美首脑会晤

70年代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苏美两国扮演了主角。苏美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和勃列日涅夫、尼克松的互访，将苏美和缓推向了高潮。面对苏联核力量不断增长所形成的“恐怖均势”，双方为谋取优势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从而加重了双方的负担。从 1969 年 11 月，双方代表先后在赫尔辛基和华盛顿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核武器问题谈判。谈判过程中，美国正加紧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这就使美国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促使苏美关系的正常化。所以，当 1971 年 7 月发表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告之时，8 月 10 日，勃列日涅夫便向尼克松发出了访问苏联的邀请。

1972年 5 月 22—30 日，尼克松、基辛格访问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会谈。会谈中，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是双方关注的焦点。结果，双方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美苏关于限制反导弹系统条约》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等几个文件。双方保证全力避免军事冲突，防止热核战争，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同时也规定了双方以后 5 年战略核导弹的数量，而对于导弹质量和核弹头的数量都未加任何限制。1973年 6 月，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同尼克松在华盛顿、戴维营和圣克利门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果，两国又签订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 13 个文件。文件规定：双方进攻性核武器可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给双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核武器留下了很大的余地。1974年 6 月 27 日～7 月 3 日，尼克松重访苏联，与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举行了第三次会谈。“水门事件”以及苏联国内问题，驱使尼克松、勃列日涅夫都竭力想利用这次会谈

捞取政治资本，以缓解国内问题的危机。最后，两国签署了《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协定书》、《美苏促进经济、工业、技术合作长期协定》等10项文件。然而，这次会谈，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反而暴露了双方的分歧点。在进攻性核武器问题上美国提出双方洲际导弹数量"基本对等"，苏联为保持自己导弹数量优势，一口加以拒绝；美国为确保导弹技术优势，提出要限制试验多弹头导弹，苏联出于超赶美国的目的，对此又予以否决。此次会谈后，"水门事件"使得尼克松被迫辞职，1974年8月，福特入主白宫。11月23—24日，福特同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工作会谈"，在会谈公报中，双方"决心使苏美关系改善的进程不断发展并不致逆转"。此外，两国共同发表了一项《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明确宣布双方互愿依据"同等安全的原则"，签订到1985年以前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定。

苏美首脑会谈，对推动东西方缓和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话开始替代剧烈的对抗，苏美关系有所改善，从而部分地改善了国际紧张局势，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对勃列日涅夫来讲，苏美首脑会谈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显示了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突出作用"，也有效地巩固和加强了勃列日涅夫在国内的地位。

"欧安会议"和赫尔辛基精神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早由波兰外长腊帕茨基于1964年12月提出，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内容逐步具体化。在1966年7月"华约"组织成员国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宣言》中正式提出。"华约"集团认为"欧洲国家有能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解决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对此持反对态度。1969年底，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公开

声言，苏联积极提倡召开"欧安会"的"唯一目的是要求保留莫斯科对东欧的控制"，并表示，美国"决不参加一次具有批准或默许'勃列日涅夫主义'作用的会议"。最后，美国迫于盟国的情绪、态度，不得不在苏联作出让步的前提下，宣布考虑参加。

苏联对"欧安会"持十分积极的态度。首先，主动邀请美国、加拿大参加；其次，放弃了先开"欧安会"再开"裁军会"的主张，附和了美国提出的大体上同步进行的方案；再次，率先同西方达成了解决柏林问题的协定，以表明苏联的诚意。这些努力，促成了"欧安会"筹备会议于1972年11月—1973年7月，举行了第一阶段外长会议，9月举行了各委员会会议，1975年7月31日—8月1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第三阶段会议，与会各国首脑共同签署了《最后文件》，其中包括《指导与会国之间关系原则的宣言》、《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安全与裁军的某些文件》、《人道主义在其它方面的合作》、《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等，这些文件集中体现为一种"赫尔辛基精神"。

"赫尔辛基精神"，确认了欧洲现有边界的不可改变，同时也保留了通过协商改变边界的可能性。文件强调东西方人员和思想的"自由交流"，遭到苏联的反对。"欧安会"和"赫尔辛基精神"，是东西方妥协的产物，加强了欧洲的政治缓和和东西方的经济往来。"赫尔辛基精神"是勃列日涅夫缓和外交成果之巅峰。同时，它也为苏美以后在限制军备竞赛、裁军、人权等问题上的争夺埋下了伏笔。

第四节 对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变化

支持印度入侵巴基斯坦

为了实现进入南亚次大陆，南下印度洋的战略目标，从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就积极向南亚次大陆渗透，通过对印度的拉拢与控制，以实现其最终排挤美国，包围中国的目的。196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间发生了第二次战争，苏联一面从军事上支持印度，一面又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呼吁双方进行谈判。1966年1月苏联促成了印巴两国同意不使用武力的"塔什干宣言"。1970年初，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经济动荡以及之后出现的印巴冲突，给了苏联以可乘之机。

巴基斯坦原来由东西两个完全不相连的地区构成，由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的大权主要掌握在西巴的统治者手中，东巴一直有所不满，经常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1970年12月，巴举行大选，主张巴基斯坦东西两部分实行联邦制的充分自治的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人民联盟获得议会多数，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然而总统叶海亚拒绝了拉赫曼的主张。于是，拉赫曼要求接管东巴全部权力，叶海亚则马上颁布军管条例，宣布人民联盟为非法，对拉赫曼和人民联盟的其他成员进行逮捕和镇压，致使大批孟加拉人逃往印度。4月，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印度则乘机插手巴基斯坦事务。

正值此时，8月苏外长葛罗米柯访问了印度，双方签订了《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这项军事条约的签订，助长印度从11月21日向东巴实行全面推进，向巴基斯坦发动全面进攻。对此，美国曾于12月4日通过安理会提出提案，要求印度撤军，实行印

巴停火，遭苏联否决。此外，美国还多次向苏提出警告，同时命令自己的航空母舰特遣队进驻孟加拉湾，向苏联和印度施加压力，苏联也置之不理，坚持毫无保留地支持印度，反对停火。12月16日，印度军队最终占领了东巴首府达卡。1972年1月，拉赫曼在印度支持下正式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苏军入侵阿富汗

阿富汗位于中亚西南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沙俄曾多次觊觎过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富汗宣布实行中立不结盟外交。

1973年7月，阿富汗前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查希尔王朝，自任总统。达乌德上台之后，修改了"一面倒"的亲苏政策，重新回到比较中立的外交路线上来。他还注意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这一切引起苏联的不满。1978年4月，苏联在阿富汗策动军事政变，杀死达乌德，成立了由人民民主党主席塔拉基担任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塔拉基上台之后，推行全盘苏化的内外政策，使国内政治、经济出现严重危机。迫于形势，塔拉基起用了原副总理兼外长哈非祖拉·阿明为总理。

阿明上台后，有保留地保持同苏"友好"关系，阿明同苏的矛盾愈益尖锐和公开化。于是，苏联以接受"邀请"为幌子，于1979年12月27日晚杀死阿明的同时，集结大批苏军，长驱直入阿富汗，在一周内对阿富汗实行了军事占领。在苏占领军的辅佐下，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头目卡尔迈勒上台执政，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许多阿富汗人加入游击队，对苏军进行武装反抗，使苏军陷入泥沼不能自拔，侵阿战争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事态的发展充分表明，苏联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对外扩张，都成了勃列日涅夫继承者"令人伤透脑筋的包袱"。

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渗透

苏联对非洲一向有着强烈的兴趣，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大大增强了对卷入这一地区的愿望，苏联利用支持非洲国家反帝斗争为借口，积极介入非洲事务，干涉一些国家的内政。特别是进入 70 年代以后，苏联从外交、经济、军事上加强了对非洲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联系。非洲有着丰富的矿藏，苏伊士运河、红海、好望角、马达加斯加海峡等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长期以来，美苏一直加紧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多事之区，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对非洲的政策，主要是通过经济、军事援助，利用代理人进行战争，广泛签订友好条约为主要途径向非洲进行渗透和扩张的。除了对一些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外，勃列日涅夫侧重于向非洲国家输出军火，以军火贸易为主从经济政治上控制这些国家。同时还向这些国家派遣军事顾问，并通过这些军事人员利用代理国挑起战争。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先后对埃及进行渗透、控制和干涉；利用古巴武装干涉安哥拉；支持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并在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进行渗透扩张活动。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为了加强自己在非洲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同非洲国家广泛签订"友好条约"，派党政要员几乎遍访非洲国家。从而为苏联对这一地区进行干涉提供了口实。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拉美政策，主要是以古巴为基地，支持该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利用矛盾，扩大苏联的影响，削弱并牵制美国在这一地区同苏联争霸的实力。到 70 年代，苏联要求拉美各共产党发动组织"民主联盟"运动，即加强青年工人、学生、知

识分子、城市中产阶级、军队中的民主力量和其他一切爱国和进步力量的联合。这一运动由于含有向拉美“输出革命”的意思，受到许多拉美国家的反对。当然在苏联同拉美之间也存在着一条重要纽带，那就是经济贸易，但贸易不平衡又转而成了双方发展关系的重要障碍。

同时，在70年代，美国公布了大量材料，证明苏联利用古巴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搞颠覆活动。从而使许多拉美国家在同苏联打交道时显出特有的谨慎。墨西哥、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曾公开谴责苏联干涉内政，都驱逐过苏联的外交人员，巴西、阿根廷各政党内部都有强烈的反苏情绪，主张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对称关系。由于苏联在拉美地区推行扩张政策引起一些拉美国家对苏强烈不信任感，使得苏联在同美国争夺这一地区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第五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外战略

从“火箭战略”到“缓和战略”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个年头，苏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国际事务，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扩张政策，这一进攻性对外战略的形成，是勃列日涅夫针对当时国际局势的转变所进行的调整的结果。

赫鲁晓夫时期，美苏之间形成了核“恐怖平衡”。在此种情况下，美苏双方均有向对方施行核打击的能力，同时又都不能确保在核战争中获胜。于是，赫鲁晓夫提出了以防御为中心目的的“火箭战略”。但是，60年代初苏联在同美国对抗的失势证明了“火箭战略”的非现实性，它过分夸大了原子武器的威力。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勃列日涅夫汲取了苏联在两次“柏林危机”和“古

巴导弹危机"中的教训，对这一战略方针进行了批判性的调整，强调各军种均衡发展、协同作战的重要意义。即把战略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有机地结合起来，立足于常规战争和核大战两手准备，以战略进攻为主导方针，以战争初期的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为作战重点，用一切手段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外战略的核心。

60、7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缓和的征兆，尤其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收缩战略"，预示着国际关系将出现转折的势头。正当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将其对外战略打出了"缓和"的招牌，并加上了一层理论色彩，在苏共二十四大、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先后提出的6点、8点"和平纲领"，使"缓和战略"更加趋于完备。

60年代末期，美国的越战后遗症及国内"新孤立主义"思潮的抬头，以及整个西方由于受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的困扰和慑于苏联的军事威力，对苏"绥靖主义"势力的抬头，苏联充分利用这机会，大搞"缓和"外交，直接促成了"欧安会"的召开。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还在一切外交场合大谈"缓和"，矢志将同西方改善关系摆在首位。1973年勃列日涅夫曾在布拉格召开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秘密会议上阐述过苏联的"缓和"战略，他说："缓和"为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意愿。"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整个60—70年代，苏联凭借推行"缓和"政策获得了在与西方直接对抗中前所未有的好处。

勃列日涅夫坚信，在同美国的竞争中，只有拥有压倒对方的威慑力量，才能使美国由于害怕战争而缩手，才可能使西方各国在采取行动时犹豫不决或出现矛盾和不协调。因此，实践中，勃

列日涅夫以实力原则为基础，将争夺对美军事优势置于苏联内外政策的最优先地位。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加现实地看待60—70年代的苏美竞争态势，一改赫鲁晓夫谋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地位的目标，全力谋求"在对峙中能够镇慑对手。在实践中能够取得对对手的优势。"为此，勃列日涅夫淡化了"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的观点，重申核战争和历来的战争一样，"胜利将属于在装备上、理论上和士气上最有准备的一方"。并以此为方针向全球发出了咄咄逼人的姿态。

勃列日涅夫对全球的进攻战略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

第一，以美国为主要对手，全力建设一支实力雄厚的军事力量，作为向全球扩张的实力基础。到70年代末期，苏联共有军队400多万，超过美国两倍。从技术上，尽管苏联还落后于美国，但双方距离正日趋缩小。同时，为取得在同美国抗衡中的优势，苏联在大力发展常规兵力的同时，加紧发展战略核武器和战略海军，力争在80年代全面超越美国。

第二，以欧洲为战略重点，逐步加强东西两线的战略部署。80年代初期以前，苏驻欧兵力及其他华约国家部队总兵力比北约国家驻欧兵力多120万，数量上占明显优势；从质量上，苏军的新式装备往往最先武装驻欧部队。在东线，苏联为遏制中国，增加远东及太平洋陆、海军的部署，借以威胁美国和日本，特别是美国从西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战略要道。在南线，实行突破战略，包抄欧洲。北非、中东、南亚这一弧形地带是东西两线的侧翼，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战略资源十分丰富，苏联在该地区建立大量军事基地，借以控制战略通道、战略要地和经济命脉。

总之，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缓和"论调中，苏联对外扩张势头进展很大。直到1976年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历数苏联对外政策的成就时，宣称苏联已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

权"，它的对手已被迫"大大退却"。并进一步断言，西方、美国无论谁上台都不得不同苏联搞"和平共处"。

勃列日涅夫对外战略的实施就其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60年代下半期，是"进攻战略"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苏联为了消除"侵捷事件"所带来的消极被动处境，积极倡导东西方"缓和"，并以此作为"幌子"，积极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为"进攻战略"创造物质条件。

第二阶段：整个70年代，是"进攻战略"的实施阶段。这一时期，苏联在全球推行扩张霸权政策，是其"进攻战略"顶峰时期。苏联以"缓和"为旗号，"缓和"和进攻交互替用，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展开了同美国的争夺。

第三阶段，80年代初，"进攻战略"开始收缩。这一时期，苏联历史上积淀已久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经济水平的停滞不前，使80年代初苏联经济陷于危机的边缘；政治气氛长期的沉闷、封闭，使得社会孕育着新的危机；70年代全球性扩张，日益成为苏联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掀起，以及"华约"、"经互会"组织的内部不稳定性，充分说明从70年代初形成的"苏攻美守"战略态势正发生实质性转变，这一切制约了苏联"进攻战略"的继续实行。

"缓和战略"的利弊得失

70年代，苏联在全球推行进攻性"缓和"战略，既有所得又有所失。这一战略的推行，标志着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代表了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中所处的强盛时期，使得国际格局在整个70年代一直处于苏攻美守的对苏有利局面。

首先，勃列日涅夫推行"进攻战略"，为苏联赢得了时间，增

强了实力，充分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上半期，苏联经济、军事实力迅猛膨胀，一举成为可以同美国一争高下的超级大国。10年间，苏美军事实力的对比一直朝着更加有利于苏联的方面变化。战略武器方面，双方互有优劣，在欧洲地区苏联已稍占优势；常规武器方面苏优美劣的状况仍继续维持。从经济实力上看，由于部分地借助于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苏联亦有长足发展。再加上军事上苏向美发出的一连串咄咄逼人的攻势，使美国战后初期的国际地位一直没有能得到恢复，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左右国际局势的能力明显加强。

其次，勃列日涅夫进攻性"缓和"战略的推行，助长了西欧对苏联的"绥靖"思想，有效地削弱了美国同其盟国的关系。"赫尔辛基会议"之后，西方各国越来越怀疑美苏战略核武器协议取得战略优势之后美国核保护伞的实际价值，给苏联以可乘之机。苏联使用缓和与实力双重手法的交互运用，既使西欧置于了苏联缓和的幻想之中，又使西欧慑于来自苏联的核威胁。此外，勃列日涅夫通过同联邦德国签订条约，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实体地位，促使西方国家在法律上确认了战略欧洲边界和政治现状，从而巩固了苏联在东欧的战略成果。同时，70年代苏联推行"缓和"政策以后，美苏间签订的重要双边条约和协定多达100多个，这些条约不仅涉及两国关系的准则，还涉及贸易、农业、渔业、交通、环境保护、科技合作等各个领域和部门。

第三，"缓和"战略，促使苏联同西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苏联不仅从西方获得了大量贷款，而且还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据统计，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由1970年的46亿卢布增至1980年316亿卢布，前后增长6倍；1964—1970年，苏从西方得到的长期贷款仅38亿美元左右，而1971—

1980年间，贷款额增至300多亿美元。从1978—1980年，苏联从英、法、日、西德、意大利以及美国进口的设备和技术价值都超过了50亿美元；70年代，苏联还从西方购买了100多台电子计算机。同时，在西方经济萧条、能源短缺的情况下，西欧诸国对苏联的市场和能源却越来越存在着一些依赖心理。

当然，由于进攻性"缓和"战略的扩张性，以及勃列日涅夫外交上的"强权政治"做法，"缓和"战略也给苏联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因素，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推行这一战略的弊端也日益鲜明地暴露出来。

首先，苏联推行扩张战略，四处出击，不择手段，尤其是对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等国赤裸裸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苏联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使其在战略上日益陷于孤立。美国力图联合一切力量，彻底扭转美苏竞争的现有态势，谋求对苏的全面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提高了对苏的警惕和戒备，加强防务，敌视苏联；第三世界国家则掀起共同反霸的斗争，全力阻遏苏联的"南下战略"。

其次，长期推行全球扩张政策，巨大的军事开支，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负担，经济发展与军事实力呈反方向发展，使苏联出现了被沦为"一个拥有众多原子弹的发展中国家"的危险。日本、西欧经济水平的迅速上升，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受到挫折。

第三，长期受制于苏联的东欧，自强意识逐步增强，出现了越来越强的离心倾向。在东欧诸国都走上了批判性地重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改革道路之后，苏联不得不逐渐放松对东欧地区控制和干预。

第二十五章　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的苏联

第一节　安德罗波夫迈出励精图治的新步伐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12日，苏共中央全会一致选举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①。1983年6月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罗波夫具有丰富的高层决策的工作经验，对国内外情况有比较切实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他注重理论研究，思想开阔，处事果断有魄力。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政时面临严峻的局面。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个人专断作风严重滋长，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经济机制活力衰退，发展速度减慢，社会矛盾有所激化，社会生活陷入停滞状态。安德罗波夫执政后一反勃列日涅夫时期歌功颂德，粉饰现实，掩盖矛盾的习气，尖锐地揭露苏联社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采取了富有革新精神

---

① 尤·弗·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生。1939年入党，1953年入外交部工作。1954—1957年任苏驻匈牙利大使，1957年5月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6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62年11月任党中央书记，1967年5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直到1982年。同年6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的政策措施。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的一个有力措施，是抓了理论上的创新发展。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理论界严重僵化的状态，安德罗波夫强调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对“语录魔力”的迷信和教条主义地照搬公式，号召按照生活实际在各方面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先，对苏联当前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提出了较为现实审慎的论断。长期来，苏联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倾向。勃列日涅夫虽然纠正了赫鲁晓夫关于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宣称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但这种理论仍然存在超越发展阶段的倾向。安德罗波夫从苏联的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共纲领的一些内容脱离现实，超越了时代的发展，强调“谨防在理解我国接近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的程度方面可能出现的夸张”。他认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党和人民面临最大的历史任务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防止过早地提出“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安德罗波夫将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改为“起点论”，有助于人们更清醒地认识苏联所处的社会发展的性质，为调整各种政策，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安德罗波夫的推动和支持下，苏联理论界开始打破教条主义的禁锢，着手探讨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和改革设想。如关于所有制问题，提出了集体所有制须经多种途径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现阶段要允许包括私人辅助经济所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所有制的变革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不能一蹴而就。在所有制不变的条件下应实行灵活的经营方式。此外，在国家计划与市场关

系问题上，肯定了市场的调节作用，主张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在分配问题上，强调贯彻物质利益和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指出任何随心所欲地超越可能性的各种追求共产主义分配方式都只能产生不良结果，主张要切实保证个人、局部以及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使之与全民利益更好地协调结合，并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理论上的活跃给苏联社会带来了活力和改革的冲动。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严明纪律，整肃党风。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风和社会风气日下。纪律松弛、欺上瞒下、互相包庇、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现象泛滥严重。安德罗波夫执政后决定将整顿纪律、改变党风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认为严肃党纪国法、整顿社会秩序既有利于振奋民心，又无需任何投资，收效巨大。于是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3年1月，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从事居民服务工作的企业、单位和机构的工作制度》。8月6日，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方面的工作的决议》和《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补充措施》，用法律手段保证劳动纪律的遵守。此外，还把企业不按合同完成供货义务列为严重违反计划纪律和国家纪律的行为，对其领导人实行经济处罚。最高苏维埃还修改和补充了8个法律条文，以强化社会治安。对经济领域中的犯罪行为也给予严厉打击。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活动进行严肃处理。从1982年底到1983年底，中央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就撤换了70多人。少数情节严重者被开除出党，有的受到法律制裁，重大案件在报纸上公开加以披露。同勃列日涅夫关系密切，深受其重用的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因牵涉贪污受贿案而被撤职。为了使人民能及时知道国家

重大的事情，便于人民的监督，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安德罗波夫提倡实行政治公开化，并决定将党中央政治局每星期四例会的内容在报上公布。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的又一个重大措施。安德罗波夫十分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反复强调当前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生产力的深刻质变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完善不仅已迫在眉睫，而且势在必行了，这是客观的需要，无法绕过，无法回避，只有综合地全面改进管理体制，改革经济机制，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优越性。虽然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很短，又重病在身，来不及对经济体制展开全面改革，但他仍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产生一定的效果。

第一，推行农业集体承包制。为了使劳动者的利益与农业生产的最终成果相联系，解决农业中存在的尖锐问题，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1983年3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全苏农业会议分别作出决议，决定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广泛推行集体承包制。承包组织与农庄、农场签订合同，建立经济核算关系，对承包者按最终实际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实行集体包工奖励劳动报酬制。承包组织拥有决定生产业务问题的自主权。承包组织按自愿原则建立，通过选举产生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提出在3年内全面推广集体承包制的计划。到1983年10月初，承包作业队和承包小组已达150万个，承包的耕地面积占全国公有耕地的18%以上。在劳动和资金消耗更少的情况下，承包单位比未承包单位的产量高20—30%，劳动生产率提高20—30%。虽然集体承包制能激励优质高效劳动，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由于技术部门，计划经济部门和财会部门未配套改革，农庄和农场的领导人经常不履行合同，奖励不兑现，因此这一时

期的承包制推广不快，不少承包单位流于形式，甚至自动解散。除集体承包制外，自1983年始，苏联在一些地区试验性地推行家庭承包制，并在理论上肯定它是公有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强调家庭承包蕴藏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潜力，可把全民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

第二，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和完善作业队的劳动组织。作业队作为劳动组织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在建筑业中试行，但进展不快。安德罗波夫大力加以推广。1983年6月颁布了《劳动集体法》，制定了作业队的章程法规。同年12月，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工业中进一步发展劳动组织与劳动刺激的作业队形式并提高其效率》的决议，随后部长会议采取了相应措施。到1983年底参加作业队的人数占工业工人总数的60%。但大部分作业队的独立核算的水平不高。只有一部分作业队作为一个独立经济核算单位向企业签订包工合同，按合同规定的最终产品的数量质量取得报酬，节约的工资基金也由作业队支配，而90%的作业队，仅仅作为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只实行节约额提成或其它奖励办法，并非真正的独立经济核算单位。作业队从微观来看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先进的工业作业队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可增加5—10%，比建队前减少工时损失1/2。但是由于当时许多作业队一哄而起，管理不善，层次较低，同时计划、财务、工资制度未作相应的改革，因此，大大限制了作业队的积极作用。

第三，扩大生产联合公司的经营自主权。1983年7月25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工业生产联合公司（企业）在计划和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及加强其他经济成果所负责任的补充措施》的决议，决定减少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各部下

达的定额指标5年不变，超定额的节余全部归企业，上级不得占用。同时还扩大了企业对生产发展基金、社会文化设施、住宅建设基金的使用权和奖金的发放权。

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的政策和措施颇有革新的锐气，对苏联前一时期的沉闷空气和停滞状态有所冲击，但是，由于执政时间短暂，宏图难展。

第二节　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因病逝世，在位15个月。13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①]后兼任国防会议主席。4月11日，苏联第十一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举契尔年科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契尔年科执政后，继续执行安德罗波夫时期形成的路线方针，强调"依靠以前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创造性地丰富这些成就"。在组织上，最高领导层基本稳定，党政主要领导人维持原班人马，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正副主席都不作任何调整。在他执政期间，沿着前任的足迹，实施了以下几方面的政策措施。

在理论上，契尔年科坚持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同时又提出了全面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方针。契尔年科强调党的工作成就取决于对国家所处的时期的特点认识得是否正确，强调要坚决纠正以往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空想和简单化的观点，要"清醒地毫不空想地估计"苏联已经达

---

① 康·乌·契尔年科，1911年生，1931年入党，1956年到苏共中央工作。1965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1966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7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年为政治局委员。1983年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到的社会经济成熟的程度，科学地估计社会主义阶段的内容及时间的长短，正确地确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途径和当前的发展战略。契尔年科认为，由于苏联正处于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即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开端，因此苏联的战略任务在于全面完善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解决与共产主义直接相关的任务。他认为，全面完善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任务，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当前的具体任务是：政治上主要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完善政治制度，经济上主要是实行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继续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契尔年科强调改革既要三思而后行，又要大胆进行探索，实行"合理的冒险"，提出了"从正确的思想出发，掌握足够的经验，大胆地采取行动"的口号，并在以下三方面进行了努力。

第一，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1984年苏共中央作出决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编辑部拟订了长期的经济理论研究的专题计划，包括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完善计划工作和经济管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生产集约化等 5 个方面 69 个选题。同时，先后举行了以"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为主题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会。理论上的探讨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活跃了民主气氛，为经济改革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二，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试验。安德罗波夫时期曾决定从 1984 年开始在 5 个工业部进行新的经济改革的试验。契尔年科执行了此项决议。这次试验的内容具有综合改革的特点，计划、工资、利润分配、物质刺激方法、基建管理和科技进步等都包括在内。试验的效果较好，5 个部的主要计划指标都基本完成。1985年开始将试验扩大到机器制造、黑色冶金和化学工业

等21个全苏和加盟共和国的工业部。

第三，推进科技进步的改革措施。为了适应世界科技革命的新形势，促进经济的集约化，契尔年科执政时期苏联把加速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并采取了具体措施。1984年8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加速国民经济中科学技术进步的措施》的决议，强调加快科技进步是党、政府和一切社会团体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指出在使用自动化机器、机器人成套设备和计算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广泛实现工艺流程的自动化是加快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向。规定把科技发展计划完成的情况作为评价企业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之一。决议还规定要加强试验基地的建设，发展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加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结合，广泛实施科技发展专项纲要，完善产品的鉴定制度，加强奖金的刺激作用。此外，这一时期苏联加强了同西方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努力吸收西方国家的最新科技成果，苏联同法国、奥地利、联邦德国等签订了期限到1990年、1995年和2003年的长期科技和经济合作协定。

契尔年科执政仅13个月，且年老多病，基本上奉行安德罗波夫制定的路线方针。契尔年科上台后，最高层领导核心大部分是70岁以上的人，如此老化的领袖集团是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也决定了契尔年科执政时期的过渡性和保守性。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因病逝世。次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一致选举戈尔巴乔夫任党中央书记。

第二十六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

第一节　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新起步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的战略转变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召开非常全会，根据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提议，一致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按惯例兼任国防会议主席；7月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苏联正处在历史性关键时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苏联已成为世界超级强国。70年代初，战略核力量和美国达到了战略均势状态，但这种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惊人进展是用沉重的代价换来的。70年代苏联的实际军事开支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而苏联的国民总产值大致相等于美国的一半稍多，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国民总产值的5—7%，而苏联却占16%。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和各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使苏联在国际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出现扩大的趋势。苏联社会经济呈现停滞状态，社会总产值50年代平均年增长10%，1976—1980年降为4.2%，1981—1985年降为3.6%。国民收入50年代平均年增长

10%，70年代上半期降为5.7%，下半期降为4.3%，1981—1984年降为3.5%。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加剧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1983年，苏联国民生产总产值在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4%，日本占9%，到1985年日本已追上苏联，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苏联存在降为二等强国的危险。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东西方军事对抗的减弱，在世界局势的发展中，经济在决定世界局势发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范围内的争斗、竞争日益偏重于经济领域。这种历史大趋势对苏联无疑是严峻的挑战。正是在国内潜伏危机和国际面临挑战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决定调整社会发展战略，对原有"障碍机制"进行"根本改革"。

1985年4月23日，召开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第一次中央全会，首次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方针。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世界舞台上的崭新形势和苏联国内的严峻局势，指出近年来国家发展中积累的问题很多，管理方法僵化，惰性大，干劲不足，官僚主义滋长，社会生活中出现停滞现象。据此，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和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任务。四月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全会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调整干部队伍。干部是权力的载体，是推进改革的重要保证。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表示要保持党的领导的稳定性，同时又强调撤换那些"长期身居同一职位，往往不能再看到新的东西，对缺点熟视无睹"的领导人，叫那些思想僵化、不想改革、阻碍解决新任务的人"让路"，将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干部大胆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干部的调整首先从上层领导机关开始。在四月中央全会上就对政治局成员作了初步

调整，原有10名委员不动，新增补了切布里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利加乔夫（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雷日科夫（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书记）为政治局委员。在同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解除了罗曼诺夫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职务，增选了叶利钦和扎伊科夫为中央书记，将谢瓦尔德纳泽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7月2日，最高苏维埃十一届三次会议，在戈尔巴乔夫提议下，选举葛罗米柯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谢瓦尔德纳泽接任外交部长，选举利加乔夫为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按惯例此职务由党内第二把手担任。9月27日，解除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雷日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12月24日，格里申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接任。经过多次调整，新的最高层领导核心基本形成。随后对其他中上层干部作了适当调整。到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6个副主席中被撤换7人，部长会议12个副主席中撤换了6人，部长会议所属105个部委、局的第一把手更换了39%，党中央24个部长更换了8个。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5个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被撤换或调动，6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9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易人。在157个州中，有25%的州委第一书记被撤职。对军队的领导人也作了较大的调整，原陆军总司令彼得罗夫被提升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陆军、海军、战略火箭部队，驻民主德国苏军集群、南方战区、莫斯科军区、白俄罗斯军区的司令均被撤换。新提拔的干部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所有部长以上人选都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戈尔巴乔夫强调广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要与时代相适应。

其次是整顿秩序，加强法纪。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深感纪律

松弛，社会秩序混乱已严重影响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决定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顿，特别是对少数违法乱纪、懈怠渎职的干部严加惩处，有的公诸报端。在整顿社会秩序和劳动纪律的过程中，雷厉风行地发动了一场全国性反酗酒运动。1985 年 5月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克服酗酒和嗜酒现象的措施》的决定，接着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相继颁布法令和执行条例，决定从 6 月1日起，禁止在公共场所、劳动岗位上饮酒，禁止家庭酿酒和购买私酒，违者罚款或给刑事处分，干部和党员如违法情节严重者将撤职或开除党籍，并预定到 1988 年完全停止生产以水果和果浆为原料的酒精饮料。反酗酒运动后果不好，以失败而告终。

再次，初步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和措施。戈尔巴乔夫认为，克服经济发展的停滞现象，必须全面调整政策，进行综合的根本性的改革，经济改革应为实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服务，为经济集约化和科技进步这个全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强调经济改革不能小修小补，而是要对旧的"障碍机制"进行全面彻底改革，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战略要求的经济体制。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其一，深化改革试验。8 月 3 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广泛采用新经营方法并加强其对加速科技进步的作用》的决议，规定进一步运用价格杠杆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凡达到优质标准的产品实行不超过30%的加价，利用外汇有成绩者再额外加价 20%，质量差应降价或停产。按期完成合同的加价5%，未按期履行合同者处罚金5%。企业完成合同义务或科技进步计划指标时领导人可获得不超过两个月工资的奖金。

其二，加速发展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科技与生产的结合，完善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在科学院建立跨部门的综合科技试验中心，优先发展基础科学，充分挖掘和利用高等学校的科研

力量，调整投资政策和产业结构，规定在若干年内全国用于技术改造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从 1/3 提高到 1/2，将原有1/3的生产设备实行更新。

此外，还着手制定1986—1990年和 2000 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在计划管理上放松了对企业的控制，在商业服务性行业中允许集体和个体经营。在农村放宽政策，推行家庭承包制，等等。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1986 年 2 月 25 日到 3 月 6 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总结二十六大以来的工作和确定今后党的战略任务，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和进行根本改革。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戈尔巴乔夫的中央政治报告，批准了苏共纲领新修订本、修改的党章和《苏联1986—1991年和到 200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选举了新的党中央委员会。大会在公开揭发缺点和失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中进行，就国内外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作出了重大决策，主要内容有下列几方面。

（一）制定了"加速战略"。大会审议和确认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4月中央全会上提出的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简称"加速战略"）。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在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改造、经济管理改革和有效的劳动刺激形式的基础上对经济进行质的改造，实现生产全面集约化，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向生产力全面发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经济机制和谐的优化组织、高效益的经济过渡。"加速战略"规定到 2000 年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增长 1 倍，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倍，国民收入的年增长速度提高到 5%（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1981—1985 年平均每年增长3.1%），人均实际收

入增加60—80%。“加速战略”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速度和质量优化统一为一个整体，成了指导社会发展的总的战略方针和全党工作的指南。

（二）理论上的新突破。要实现“加速战略”，必须首先反对教条主义，“抛弃老一套的思维模式”，“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某些理论观点和概念”。强调理论是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不改变过时的观念和僵化的理论原理，“根本的改革”就无法进行。苏共二十七大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作了新的突破。第一，关于苏联社会所处阶段性质的估计。大会否定了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在规定党的当前任务时，只提“完善社会主义”而不再提“完善发达社会主义”①。第二，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大会批判了“自动适应论”，强调必须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过时的部分”和“过时的经营方法”。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大会批判了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急于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倾向，强调发展合作社所有制的重大意义和发展个体经济的必要性。第四，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理论。大会批判了理论界对商品货币关系“抱有成见”的僵化观点，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可以“有机地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可以“健康地发挥作用”。开始摆脱以往对商品货币关系教条主义的理解。第五，提出了衡量改革性质的标准。大会批评了“把经济机制的任何改变几乎都看作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流行看法”，强调“完善管理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最高标准，应当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苏共二十七大在理论上的突破虽然是初步的，但是对传统观念的反省和批评，对当前改革起了重大的推动

① 1986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高等院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提出苏联社会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新概念。

作用。

（三）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大会提出：(1) 调整全民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自治，继续发挥合作社所有制的潜在能力，发挥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2) 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促使计划经济同市场机制相结合。(3) 提高国家集中领导经济的效率，加强国家对宏观方面的领导，结束中央对下级经济部门的具体业务干预。(4) 扩大联合公司(企业)的独立自主权，逐步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财务自理，自负盈亏。(5) 进一步使部门经济管理和地区经济管理合理地结合起来。(6) 适应生产集中化、专业化、协作化的趋势，建立大型跨部门的经济综合体，使生产组织现代化。(7) 实现经济管理的全面民主化。(8) 在农业体制改革中，在作业队、生产组和家庭一级中推广承包制和合同制。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经济改革构想已开始考虑利用市场机制和所有制的多样化问题，这表明苏联的经济改革正开始深化。

（四）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大会提出：(1) 完善人民代表制度和加强苏维埃选举制度的民主化。(2) 扩大各种职务的选举制和征选制。(3) 逐步实行"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提高工会、共青团、各创作协会、志愿协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在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系统中的作用，扩大他们对国家决策机关的制约作用。(4) 贯彻政治公开性原则，提高公民对政府决策和执行结果的了解程度，并使公开化成为经常的制度。(5)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备的法制系统，法律要为经济改革和实现社会公正原则服务。

（五）对国际形势作了新估计。大会认为，尽管现代世界矛盾重重，各国间存在根本的差别，两个体系存在竞争和对抗，但是世界大家庭中的成员之间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世界在很大

程度上是个整体。在核时代，通过全面裁军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现实可能的。大会强调苏联的外交战略任务是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争取各国人民的安全和公正的和平。

（六）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党中央总书记，选出了中央委员307人，候补中央委员170人，中央检查委员83人。其中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占41%，新当选的候补委员占68%，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占61.5%，新当选的中央检查委员会占75%。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人员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在此前后，中央各部、委、局的领导人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军队高级干部都作了大幅度调整。苏共二十七大标志着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一代已掌握了最高权力。

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和6月全会

苏共二十七大后，党和政府为贯彻大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7月，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强调人民代表苏维埃是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的主要环节，并对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11月19日，通过了《苏联个体劳动法》，允许私人在手工业生产、居民生活服务和社会文化领域内27个项目中从事个体生产经营活动，但私人不得经商，私人不得雇工，不得搞非法劳动收入或损害其他公共利益。1987年1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进一步发展同外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贸易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在改革的推动下，1986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国民收入增长4.1%，工业产值增长4.9%，而1981—1985年间年均增长分别为3.2%和3.7%。

然而，苏共二十七大后，改革的阻力仍然很大，不少干部对改革的迫切性认识不足，相当多的群众对改革缺乏准备和承受

力，理论观念保守陈旧，脱离生活实际。为了推进改革，苏共中央于1987年1月27—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全会着重讨论了改革和干部问题，并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报告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揭露和批评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论证了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感。指出改革就是要克服停滞过程，粉碎阻碍前进的机制，更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有利于实现加速战略的优化机制，使苏联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最充分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戈尔巴乔夫还批评了理论上的僵化倾向，指出这是阻滞社会经济发展和妨碍改革深化的重要原因，强调民主化和公开化对推动改革的决定性意义。全会对干部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认为干部问题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强调对改革的态度和工作的实际业绩是衡量干部决定性的标准，要求大力调整干部队伍，撤换对改革无动于衷的不称职的干部，提拔积极投身于改革事业的新生力量，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措施。全会提议修改选举法，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包括第一书记以下的各级干部均在党委会的全体会议上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企业各级领导的选拔和更换也必须通过选举。这次中央全会反映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突出政治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作用，以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开拓前进的道路。一月全会后，苏联政治的民主化和公开化加速推进，如坚持公布每星期四中央政治局例会的内容，中央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不仅公布决议，而且公开发表代表的发言内容，包括不同意见。此外，中央决定重新审理不同政见者的案件，到 1987 年已有 140 多名不同政见者获释。

1987年 6 月 25—28 日，苏共召开了中央全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全会讨论和通过了经济改革的纲领

性文件《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6月 30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正式批准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基本原则》指出，在经济管理方面已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但障碍机制还没有被打破。文件强调实现对国家经济管理的根本改革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过程，其实质是使以行政领导方法为主转向经济领导方法，转向以利益和通过利益进行管理，转向广泛民主化和大力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改善对经济的集中领导，放弃中央对下级经济环节日常工作的干涉；改革计划工作、物资供应、价格形成和财政信贷机制；建立促进专业化，加强各生产部门协作、使科学直接参与生产的新的经济管理组织结构；保证部门和地区经济管理的最佳结合；发展自治，建立调动人的潜力的机制，明确区分党、政、社会团体的职能，改进工作作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出发点是企业，其任务是建立一种在完全经济核算，自筹资金和自我补偿基础上的企业现代化经营机制。《国营企业法》是苏联第一部有关企业管理的法律，它规定了企业的组织原则、活动原则及法律地位，确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由过去国家计划的单纯执行者变成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者，企业内部实行自治，推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企业法从1988年起正式生效，先在机械制造、化工、冶金、交通运输等部门中试行，1989 年再扩大到所有企业。全会决定在本五年计划(1986—1990年)内作好准备，到 1991 年把全国经济纳入新的管理体制和经济机制中。六月中央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构成了包括宏观和微观的全面改革方案，它使二十七大关于经济改革的总体设想进一步具体化，使改革从单项措施、局部试点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苏共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后，为了扫除改革的障碍，党中央

采用各种方法，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活动。1987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全面总结了十月革命胜利后70年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具体阐述了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发生的巨大灾难，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报告强调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根本改革是关系社会发展和改革事业成败的两大关键。报告强调要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认识，号召警惕有人利用困难诋毁革命，要学会识别、揭露和制止所要的手腕，同时要抵制那种不顾条件许可而一味要求加快改革的压力。

同月，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该书阐述了苏联改革的起源、实质、目的、内容、后果和前景，并对当代世界作了"独特性的评述和思索"，提出"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的观点，表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为了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理解改革的前提，苏联党和政府公开号召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甄别。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中不应有"空白点和被遗忘的名字"。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委托中央一个专门委员会重新改写苏共党史，决定由中央政治局成立一个委员会审理30年代到50年代初的冤假错案，并根据这一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来通过有关的决议。十月中央全会后，对"个人崇拜时期"和"停滞时期"(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公开批判"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主义"及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并对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大案进行了坚决处理。1988年苏联先后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等人平反。

1988年3月13日《苏俄报》刊登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

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此文矛头直接针对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讲话，对改革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该文发表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不少人投书报社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几代苏联人所奠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说当前报刊上不少耸人听闻的文章令人迷失方向，对30年代大清洗和其他历史问题的揭露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是给社会主义苏联"抹黑"，攻击改革派是"右倾自由化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4月5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批评该女教师的文章，认为它是一篇"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实际上是站在保守和教条主义立场上反对改革。这一期间，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指出教条主义、保守主义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但也告诫人们不要把每一个表示某种怀疑的人都算作改革反对者。1987年10月，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指责改革进展缓慢，人们一无所得，他们对改革的信心正在下降，并说"近来某些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对总书记的吹捧有所增长"，这"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他还指责书记处和利加乔夫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改变"。接着，叶利钦提出了辞职的要求。会上有9名政治局委员和17名中央委员对叶利钦的发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是不负责的，政治上是错误的，企图分裂党中央的团结。中央全会作出决议，要求政治局和莫斯科市委审议叶利钦的辞职要求。11月11日，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对叶利钦进行了批评，解除了他的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1988年2月中央全会上叶利钦被解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事件"在苏联引起了一场风波，莫斯科的一些青年学生曾举行集会，支持叶利钦，并要求党中央

公布他在全会上的发言。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1988年6月28日到7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举世瞩目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①]。会议的根本任务是深化革命性改革并使这一改革不可逆转。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总结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前期执行的情况和三年来改革的实践。二是商讨党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其中全面开展政治改革则是会议的主题。会议不仅揭露"个人迷信时期"和"停滞时期"存在的问题，而且批评了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3年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

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关于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进程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强调指出，3年来改革已深入人心，正在成为千百万人的实际行动，社会气氛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不能说改革已经不可逆转，苏联的发展还需要新的本质的变化。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虽有进展，但经济状况无明显变化，人民生活提高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对以往的扭曲和停滞的深度和严重性估计不足，长期积累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要推进改革必须要总结经验，从改革初始阶段的困难中吸取教训。报告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不可逆转的关键和保证，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舆论多元化是改革的必要条件，没有公开性就不可能揭露矛盾，克服消极现象。强调政治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将权力交给人民及其代表机构，让人民群众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

① 在苏共历史上，代表会议往往是在历史进程的转折关头召开的。许多会议就其重要性来说无异于代表大会。十月革命后，经常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对代表大会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会议是在1941年2月召开的，其后已有47年未召开过代表会议。

上参加国家的管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衡量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强调"我们的目标是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劳动者过上美好生活，国运昌盛"。为了在严格的法律基础上利用党的威信加强苏维埃的作用，建议把同级党委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职位上。还建议通过新的选举法组成新的代表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每五年选举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作为常设权力机构，并设立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①。最高苏维埃主席享有足够广泛的国家权力，负责解决内政、外交最关键的问题，领导国防会议，推荐政府首脑人选，最高苏维埃将在他领导下工作。报告强调恢复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指出在一党制的条件下，应建立一种在党内和社会中进行各种观点的对比、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机制，坚决反对迫害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党的工作中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包括公布各级党委会全体会议的发言内容，公开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党内选举要贯彻广泛讨论候选人，秘密投票、差额选举等原则。党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都只能连任两届，但如获3/4票数的赞成也可连任3届②。

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关于苏联社会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等7项决议。同时，会议决定在1988年底前对全体党员进行公开的资格审查登记，规定评定党员的唯一标准是对

---

① 原有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集体的国家元首，由主席、副主席、秘书、委员共39人组成，其主席只是集体国家元首的代表，实权不大。

②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的在特殊条件下可连任3届的意见被会议否决，他所提出的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同级苏维埃主席的建议也未获通过。

改革所持的态度。会议还决定在莫斯科建造一座斯大林时代受害者的纪念碑。

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把政治改革作为深化改革和使改革不可逆转的首要关键，从此，“全面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苏联社会进入了动荡多变的新时期。

第二节 动荡和危机

兴亡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

从1988年7月初到1991年8月中旬，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背景下，苏联长期来沉积的各种矛盾骤然尖锐化和表面化，政局动荡不宁，经济不断恶化，民族分裂日益严重，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之中。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苏联加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首先对领导核心作进一步调整，1988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葛罗米柯等5位政治局委员退休，提升了4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10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由戈尔巴乔夫取代退休的葛罗米柯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样戈尔巴乔夫一身兼任党和国家两个最高职务。

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上到下民主选举新的权力机关，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从1988年12月开始筹建，进行了公开的竞选活动；1989年3月，通过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选出了2250名人民代表（地区选区、民族选区和社会组织各选出750名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包括预备党员占87%，工人和庄员占23.7%，知识分子占27.4%，全体代表中88.1%是

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5月25日至6月9日，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成立了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并选出了其常设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由542名代表组成，其中联盟院和民族院各271名。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为第一副主席，选出了最高法院院长、国家总仲裁长、总检察长和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大会批准以雷日科夫为主席的部长会议作为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

9月19—20日，苏共中央全会对苏共领导核心又作了重大变动，谢尔比茨基等5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职务。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普戈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推进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过程中，苏联社会死水一潭的僵化局面被打破，同时，不安定的因素明显增长。从1989年始，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局剧烈动荡。群众性罢工风潮涌起，7月10日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州1.2万矿工举行罢工，抗议商品短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罢工很快波及西伯利亚、乌克兰和哈萨克各地，参加人数达50万左右。接着铁路、工程建筑等部门的工人也卷入罢工浪潮。罢工造成了严重后果，损失700多万工作日，引起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卢布。为了制止罢工的蔓延，10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议案，禁止在今后15个月内举行罢工，并立即生效。但罢工仍未停息，仅1990年1—4月，就有124个城市，1696个企业发生罢工，参加者达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卢布。社会不安定还表现在各种犯罪事件恶性发展，在许多大中城市出现黑社会集团，贿赂收买地方官员，作恶多端，引起群众不满。与此同时，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等所谓"街头政治"泛滥成风，动辄集会游行，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有

近200个城市举行5000多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1600多万，1990年1—2月全国举行了2000余次群众集会，参加者达800万人。频繁的集会游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政治后果。

1988年下半年后，民族问题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分离倾向增强，出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1988年9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间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之后，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分离倾向日益严重。联盟中央在各共和国发动的"主权战"、"法律战"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在实施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背景下，党内外各种反对势力猛然崛起，成为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对苏共领导地位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自1988年起，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织"纷纷建立，诸如"公民尊严"、"民主联盟"、"无政府工团主义联盟"、"莫斯科人民阵线"、"民主俄罗斯运动"及各共和国的"人民阵线"等等，据估计，1989年已有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个，甚至十月革命后被取缔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等也先后复活。这些组织性质庞杂，其中有1万多个带有政治色彩，900多个具有政党性质，其领导人或骨干分子有不少是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分子、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政治性组织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些组织的纲领和活动具有明显的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反联盟中央的性质。与此同时，跨地区跨共和国的联合组织开始出现，1989年10月28日举行了"苏联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成立大会，参加者有12个共和国的92个非正式组织，代表30万成员，协会鼓吹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参加地方苏维埃选举，主张实行三权分立，在人权和国际公法的基础上改造法律制度，促进军队民主化等。在"促

进改革"的旗号下，有些非正式组织公然进行违反宪法的行动。1989年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72周年时，一些非正式组织在莫斯科红场附近举行集会和游行，有人在会上声称十月革命是"反民主的政变"，是"俄国的悲剧"，宣传二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在"民主联盟"和"纪念协会"等非正式组织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有人公然宣称要以"和平方式"进行"新的二月革命"，推翻现政权，改变现存社会制度。

对于1989年春天以来出现的政治动向，苏共领导层中有不少人深感不安，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党和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6月，宣布禁止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前举行群众集会，重申举行群众集会必须经当局批准。6月中央全会强调两个基本思想，一是改革不能没有党的领导，二是改革要靠人民，同时强调改革不是否定一切，民主化不能走极端，公开性不能挖社会主义墙脚。10月2日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禁止在1990年底前举行罢工。但由于党的领导层认识不一致，措施不力，未能从根本上制止反对势力的发展。

随着改革的进行和政治局势的发展，苏共领导集团内部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原则性分歧和斗争。党内形成了所谓"稳健改革派"（也称强硬派）、"激进民主派"（民主纲领派）和主流派（也称中间派），戈尔巴乔夫自称坚持"政治中间主义方向"。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后，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势力积极活动并和社会上的反对派势力相呼应。1989年7月29—30日，约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连，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等5人为小组主席，代表小组成立后广泛开展政治活动。叶利钦等人利用各种方式攻击党内"保守派"，9月15日，叶利钦

在访美的一次集会上公开要求免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和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的职务。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问题日益突出和尖锐起来，成为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成了影响整个改革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在政治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号下，一些激进反对派势力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极力鼓吹实行多党制，要求修改宪法第6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国家和公众组织的核心"的规定。1989年12月10日，莫斯科一些非正式组举行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公然要求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同月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修改宪法第6条的动议。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举行经政府批准的游行和集会，打出了"不要独裁者"，"要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6条"等标语口号。党内也出现了主张实行多党制的政治活动。叶利钦在接见西方记者时说"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党的垄断，我们必须放弃党的垄断。"

苏共领导人最初以明确的态度抵制和反对实行多党制。1989年1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科学和文化界人士时说，"抛出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乃至私有制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信任，是与人民的利益相矛盾和反对改革的观点。"不久，他在一次会议上又说："苏联生活在一党制国家里，这是历史造成的"，"党作为政治先锋队在政治上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当反对派要求修改宪法的呼声日趋高涨时，1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大学生会议上指出有人以讨论宪法第6条为借口，"企图贬低党的威信、散布对党的怀疑，这是打击改革。有人认为实行多党制才能表达各方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在12月9日中央全会上又说，"目前

要求‘十万火急’地讨论宪法第6条的做法是别有用心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示反对实行多党制。迄止1989年12月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仍不顾多方压力，坚持一党制，坚持苏共的领导地位。但是到1990年初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戈尔巴乔夫开始改变调子。1月中旬，在结束立陶宛的视察后，他宣称，“我们不应象魔鬼害怕烧香一样害怕多党制。不过，多党制并不是万应灵药。我认为，即使实行多党制，也不是什么悲剧。而且，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它是作为正常的历史进程的结果而出现的，是符合社会需要的。”这些话，预示着戈尔巴乔夫在多党制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所转变。

2月5—7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会议的中心是如何改造和革新党。与会者就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和苏联国内形势展开激烈争论。不少人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的战斗作用。利加乔夫在发言中表示“坚决反对苏共纲领草案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私有制打开缝隙”，反对“把党变成一个反定型的组织，变成政治俱乐部”。布罗维科批评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离开苏共二十七大所拟定的路线，执行削弱党和败坏党的声誉的方针，“不仅党内失去方向，而且社会也失去方向”，指出“有人日益企图使它离开政治生活，从执政党变成辩论俱乐部，最好也不过是玩弄议会把戏的主体。据我看，允许这样做就意味着使国家遭受浩劫。”有些人批评纲领草案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要求明确写上“只有苏共才能成为发展道路的主要保证。”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则极力抨击保守主义并要求实行多党制。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具有生命力的党不需要对权力进行垄断，……必须有政治多元化”。雷日科夫指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由宪法赐予的，……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为时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

在。"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均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都表示赞成行动纲领草案关于党的地位作用的新观点，拥护修改宪法第6条。叶利钦说，党正处在危机的边缘，其原因是党信守教条，缓慢而不坚决地实现党内的民主化，不愿意对本身进行改革。党对政权的长期垄断把它变成了官僚主义结构，使千百万人处于贫困状态。他要求放弃一党制，允许多党制，苏共中央应自动放弃苏联宪法中保障苏共领导地位的第6条。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就召开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作了报告，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在苏联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宣称党将"放弃政治垄断地位"，"不再独揽国家大权，不觊觎特权和在宪法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将同其它社会政治团体与群众运动一样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宪法基础上进行政治对话与合作，同时要为维护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纲领草案提出建议修改宪法第6条。在苏共放弃统治中心作用的条件下，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有力的领导体制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能，监督最高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全会还建议设立总统制。7日，雅科夫列夫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央全会情况，说全会建议党主动提出修改宪法第6条，党不认为多党制是万灵良药，但也不认为一个党可以垄断。

1990年3月13日，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等决议，决定删去1977年制定的苏联宪法第6条，宣布苏共和其他政党及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通过自己被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及其他形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决议宣布实行总统制，将党和国家分开，使国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通过立法途径授予总统以处理各种紧急问题的全权，以便

克服危机，推进改革。3月15日大会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当天，戈宣誓就职，表示他不是某阶层或政治派别的代表，将不带感情色彩地考虑社会上的各种观点，按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行事，坚定地加快经济改革，保障联邦的完整和加强共和国的主权。大会选举卢基扬诺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3月下旬，成立了由总统任命的总统委员会，18个成员中一半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国家和政府各重要部门的领导人都包括在内。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内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这样，苏联的权力中心发生重大转移，总统委员会实际上取代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最高决策机构，① 苏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严重削弱。

在正式实行多党制以后，各种反对派势力进一步膨胀，积极进行活动，并越来越具有公开夺权的性质。反对派代表人物阿法纳西耶夫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把党和苏维埃对立起来，将党从政权体系中排除出去。在1990年春夏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中，有些非正式组织公然与苏共争权，一些"激进份子"在竞选活动中用批判共产党来争取选票，获取政治资本。在不少地区苏共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遭到严重挫折，有些地方政权将共产党员完全排除。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叶利钦的盟友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分别当选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的苏维埃主席。此外，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20个地区和城市，反对派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夺取了政权。全国最大的共和国和

① 1990年11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撤销总统委员会，将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苏联最高决策机构。

两个最大城市的领导权落入反对派手中，使苏联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此关键的时刻，1990 年 7 月 2—13 日举行了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中央政治报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和苏共党章，此外还通过了关于经济改革、军事政策、农业政策、民族政策、青年政策、文化政策等决议。大会宣布苏共的指导思想是"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目标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基础上确保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人民的自主意志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大会重申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在多党制条件下，苏共将同其他党派及社会组织平等竞争，通过竞选争取政治领导权和社会先锋队的地位①。新党章规定，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再是苏联最高决策中心，其主要职能只限于制定有关苏联内外政策的建议，指导苏共党团在全联盟代表机关的活动，向党组织发出决议等。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肯定了自1985年 4 月以来苏联发生的"革命性变革"，指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在取代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正在进行根本改造，包括自由选举、多党制、人权在内的真正民主正在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正在复兴。造成劳动者同所有制，同其劳动成果分离的生产关系正在解体，社会主义生产者自由竞赛的条件正在形成。把超集中制国家改造成真正的以各种人民自决和自愿统一为基础的真正的联盟国家的工作已经开始"，"在对外政策中放弃了对抗态度，苏联成了与世界合作和开

---

① 1990年10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结社法》，规定所有政党和组织一律平等，从法律上为实行多党制奠定了基础。一般认为自1991年 1 月 1 日起苏联正式进入了多党制时代。

放的世界。"同时也承认在经济、社会、民族关系、文化意识形态各领域中，出现了"沉渣泛起"的消极现象，政治局不推卸工作中失误的责任。戈尔巴乔夫还说："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伟大十月奠基的事业合乎逻辑的继续"，他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理想"，宣称要创造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也不是原来那种东西的翻版"的社会。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3411票赞成，1116票反对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大会新当选的24名政治局委员除戈尔巴乔夫外，都不担任政府职务，新当选的412名中央委员绝大多数也不在政府任职。

面对严峻的局势，二十八大上党内各派的斗争空前激化。叶利钦在发言中强调"保守势力已开始进攻"，要求各个纲领派别在苏共组织中得到确认，并主张将苏共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另一些"激进派"代表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目标，取消民主集中制，取消共产党在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基层组织。"传统派"的代表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反社会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分裂党组织，破坏苏维埃联邦、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给予揭露和批判。大会结束时，叶利钦在会上当众发表退出苏共的声明。7月13日，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退党声明。在二十八大上，利加乔夫被逐出党的领导核心。

苏共二十八大后，政治和经济形势继续动荡、恶化。9月初开始，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有计划地策动一场要求政府辞职、解散议会和罢免总统的风潮，同时发动了揭露所谓"军事政变"的宣传攻势以混淆视听。9月中旬，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要求苏联政府全体成员总辞职的决议，指责联盟政府"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极其深刻的经济危机"，要求采取紧急措施，组成人民信任的政府。10月3日，俄罗斯民主论坛提出《行动纲领—

90》，要求苏共下台，雷日科夫政府下台，建立过渡时期的联合政府，提前解散苏联人代会。10月20～21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召开成立大会，其政治宣言公开号召同苏共进行斗争，反对政治垄断，大会还通过专门决议发动公民不服从运动，要求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的政府立即下台。11月7日，莫斯科选民联合会和民主俄罗斯组织在莫斯科举行集会游行，其口号和标语是："十月政变是俄罗斯的悲剧"、"打倒列宁主义"、"打倒苏共""苏联总统和议会辞职"、"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救救俄罗斯"等。

1990年底，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中。党内有一部分领导人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稳定局势，摆脱危机。雷日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指出苏联的"国民经济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政治体制实质上已陷于瘫痪"，"国家已退到最后一步，再往后退，就要改变现行制度"，并指出反对派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国家，打击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最终摧毁这个制度"。军队的领导人也多次公开揭露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势力企图搞垮联盟、搞垮军队、夺取政权的政治目的，反对激进派鼓吹"军队非政治化"的主张。11月14日，苏联总统军事顾问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提出警告，如果苏联宪法遭到践踏，苏军将使用武力确保国家统一，拯救社会主义制度。军方还指责苏联在外交上对西方让步过多，批评谢瓦尔德纳泽丢掉了东欧，使苏联在海湾危机中过于靠拢美国，并在从东德撤军和东欧撤走常规武器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日益不满，一些州委第一书记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苏军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和科学文化界53名著名人民代表联名上书，呼吁整顿秩序，要求在民族冲突的热点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和总统直接治理。在多方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苏联局势确

在恶化"，宣称"不能再退让了。再退让会出现经济崩溃、国家解体和政治结构解体"，表示要采取强硬立场和严厉措施，保持政治稳定，"彻底克服党的休克和瘫痪状态"，维护苏共的执政地位，加速向市场经济过渡，尽快签订新联盟条约。国防部长亚佐夫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军队在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军人可使用武器自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发表电视讲话强调坚决同犯罪活动作斗争。同时改组内务部领导班子，由苏共中央监委主席普戈出任新内务部长，以强化国内秩序。

1990年12月17—27日，苏联召开了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内局势和克服经济政治危机的决定》，决议确定了整顿秩序、稳定形势、反对分裂、保持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宪法修正案》，指出，为了克服各级政权机关瘫痪无力，制止与中央对立的多头权势的增长，阻止国家的崩溃，必须修改宪法，建立强有力的"总统权力体制"，[①] 采取总统治理的方式强化统治。大会授权总统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行使一切权力来控制局势。同时设立副总统，执行总统委托的权力，并在总统不在或无法履行其职责时代理总统职责[②]。12月20日，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突然在会上宣布辞职，表示对"独裁"的抗议，会场一片混乱。戈尔巴乔夫大为震怒，在会上指责谢瓦尔德纳泽未经商讨就提出辞职，在国家最困难的关头离去是不可饶恕的。大会的另一中心议题是讨论11月23日公布的新联盟草案，斗争十分激烈。戈尔巴乔夫强调不允许把联盟变成无组织实

---

① 总统权力体系的主要机构是：直属总统领导的内阁（部长会议），由总统领导的联盟最高决策机关联邦委员会，总统领导的安全委员会和同罪犯作斗争的协调委员会，此外将国家最高检察机关也纳入，以监督国家法律和总统命令的执行。

② 在戈尔巴乔夫的坚持下，通过两次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纳耶夫当选为副总统。

体，更不允许联盟解体，主张按联邦制原则把国家改造成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立陶宛和亚美尼亚拒绝派代表参加大会，波罗的海三国联合致函大会，声明不参加签署新联盟条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表示拒绝签约。12月 24 日，大会就联盟是否继续存在问题进行表决，结果1657票赞成，20 票反对，61 票弃权。大会还就是否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称进行表决，结果以1365票赞成，189 票反对，170 票弃权而维持原名。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总构想及其签订程序的决定》，决定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起草新联盟条约。大会还同意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决定在1991年3月 17 日就签订新联盟条约举行全民公决。叶利钦公然反对大会关于维护联盟中央权力的措施，宣称“俄罗斯不会同意恢复克里姆林宫专制”，“由克里姆林宫来指挥的时代过去了，共和国已经不害怕大声吆喝和任何命令”。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会上作为“保守派”代表受到指责，终因劳累过度和对局势的极度忧愤突然心肌梗塞而被送进医院① 。苏联第四次人代大会为摆脱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并未发生多大效应，局势仍然趋于严重化。

荆棘载途的经济体制改革

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后，苏联经济改革的总目标是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变。戈尔巴乔夫等重视所有制的调整，强调“没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和结合，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并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重新考虑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现行观点”。首先在农村进一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租赁制和承包制，认为“发展农村租赁制是改革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

① 1991年1月14日，由戈尔巴乔夫提名，苏联最高苏维埃选定帕夫洛夫任部长会议主席。

途径之一"。1988年8月，决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可将土地出租给家庭和个人，租期可达50年(爱沙尼亚等地规定可无限期地将土地租给个人，并可出租和转让拖拉机、汽车及其他农机设备等)，承租土地者在农忙季节可雇佣劳动力。同时苏联还大力发展合作制，开展了新合作化运动。同年7月1日生效的《合作社法》规定，不仅农业，而且在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小商品生产、旅游、科技开发、医疗保健、法律咨询、住宅建筑、机器制造、交通运输、对外贸易等方面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使所有制结构更趋多样化。

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影响和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苏联在制定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时充满了斗争，迟迟未能确定。1989年12月，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作了经济健康化的报告，遭到反对派的反对。经过6天激烈争论，才勉强通过政府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方案放慢了改革步伐，分四个阶段进行，1991—1995年间主要是扭转经济的消极趋势，使国民经济完全健康化，从1996—2000年才真正实施新经济体制。此方案后来并未付诸实施。

从1990年起，经济改革的热点集中于市场经济问题上，领导层和理论界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展开了争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

1990年5月24日，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3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正式提出在苏联建立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所谓政府方案。方案规定分3个阶段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逐步过渡。1990年底之前为立法准备阶段，1991—1992年为实施重大步骤阶段，包括价格改革，统一税收，信贷改革、实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多种所有制，调整生产结构，改善消费市场。1993—

1995年为加速市场机制运转阶段，实行反国家垄断政策，进一步减少行政控制，加强竞争。雷日科夫政府的方案倾向于稳健慎重，力避失控。但是方案公布后仍在苏联引起巨大反响，预定于1991年1月1日起实行调价的消息触发了一场席卷全苏的抢购风潮。政府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对方案作了修改，决定暂停价格体制改革，把过渡重点放在国家企业实行非国有化方面，主张把工厂企业租给集体和私人，或改组成合营公司，或向劳动者发售公司股份。这个修改方案于9月初提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

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对政府方案进行猛烈攻击，指责政府方案保守，无法克服越来越糟的经济危机，并提出自己"激进"的方案相对抗。同年7月20日，由叶利钦任总理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提出了一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 天方案"。后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协商成立了由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及激进派经济学家、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亚夫林斯基等13人组成的专门小组对"500天过渡方案"作了修改(新方案又名叶利钦、沙塔林方案)，该方案规定在 500 天内在广泛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的基础上实行彻底改革。这个被称为采用"休克疗法"的方案主要内容是：全面放开价格，实行严格的财政限制，发展外汇市场；将国家财产清点后，出售给居民、企业或合作社，建立股份公司，吸引外国投资，实现所有制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至500天时，70%的工业企业和90%的建筑业、零售商业实现非国有化；允许集体农庄庄员自由退出集体农庄，实行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等。为了给实施"500天计划"搬掉"绊脚石"，反对派还刮起了一股反雷日科夫的"倒阁"风，要求苏联第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到任期即行下台。9月1日，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记者招待会上首先发难，宣布9月 3 日开幕的俄罗斯议会将讨论实行市场经济的"沙塔林计划"，而实现该纲领的首要条件是雷日科夫政

府下台。9月10日和11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波波夫、索布恰克分别宣布不再信任现政府，要求雷日科夫立即下台，组建"民主联合政府"。雷日科夫和一批经济学家对"500天计划"也进行了严厉抨击，他们认为苏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和适应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实行这个计划必将使苏联经济陷入混乱。结果政府方案和500天方案均未被苏联最高当局所接受。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委托戈尔巴乔夫在上述两方案的基础上拟订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统一新方案。10月8—9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国内形势和苏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任务》的决定，主张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形成市场的基础结构。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强调，苏共的地位和命运取决于党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情况下如何行动。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以333票赞成，12票反对，34票弃权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交的名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的统一方案》，即所谓"总统方案"。该方案以500天方案为基础，吸取了政府方案的部分内容。方案规定分四个阶段逐步推行，主要内容是：有控制地逐步放开价格，不搞一步到位；逐步实行经济非垄断化、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稳定消费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市场，形成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环境；进行工资改革等。但方案并未规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日程和细则。总统方案被通过后，叶利钦当天发表讲话，公然表示俄罗斯联邦拒绝执行总统方案，并将单独执行"500天方案"。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从10月1日起实行叶利钦—沙塔林500天计划。

由于长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以及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决策方面屡有失误，1988年起苏联的经济每况愈下，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经济连年滑坡，1990年出现了和平时期第一次发生

的经济负增长，据苏联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与1989年相比，1990年苏联国民收入下降4%，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劳动生产率下降3%，对外贸易额下降6.9%，外贸逆差由20亿卢布增加到100亿卢布。财政赤字连年上升，1980年为200亿卢布，1986—1988年年平均赤字为430—440亿卢布，1989年上升为1200亿卢布，1990年为1400亿卢布。内债由1989年的4000亿增加到1990年的5500亿卢布（几乎相等于全年的国民收入），外债由1989年的550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700亿美元。消费品严重匮乏，市场供应全面短缺，据苏联统计，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实行凭票供应商品的制度。苏联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相当一部分人有所下降。报界普遍认为"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政府领导人也公开警告"国民经济正在加速崩溃"，连戈尔巴乔夫也惊呼"经济方面的各种消极进程在不断发展"。1990年底，苏联的经济状况已达非常险恶的境地。

第三节 剧变和解体

层出不穷的动乱和危机

"8.19"事件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党内和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产物。自1989年以来，各派政治力量围绕两个中心展开：一是联盟国家的统一或分裂，二是苏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更新或取消。这两种斗争相互影响，交织进行，从1991年初开始，斗争趋于白热化。

年初，立陶宛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叶利钦乘机

大肆活动，积极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分裂势力，共同对抗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1月14日叶利钦飞抵立陶宛首都塔林，同三国领导人一起发表声明，并联名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召开世界会议来解决波罗的海三国的危机。这时，西方国家纷纷对苏联施加压力，警告苏联不要采取国际上不能接受的行动。1月20日，"民主派"在莫斯科举行10万人参加的声援立陶宛的集会游行，提出"今天的立陶宛就是明天的俄罗斯"等口号，要求苏联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和内务部长辞职，并号召公民投票反对保持联盟，煽动工人罢工。为了稳定局势，戈尔巴乔夫又采取了一些措施，1月26日，颁布了"关于保证与经济怠工和经济领域内其他犯罪活动作斗争的措施的命令"，授予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可以到有关机关、所有企业和银行进行检查的广泛权力。2月1日，苏联军队和警察受权正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实行联合巡逻。2月 4 日颁布了"关于最危险犯罪和团伙犯罪作斗争的措施的命令"。反对派势力指责总统的上述措施是实行"军事独裁"，群起反对。这时，叶利钦也进一步采取了进攻性行动，并掀起了一个"倒戈"高潮。2月 19 日，叶利钦在电视台的直播讲话中公然宣称："我正在和总统的立场和政策划清界限，主张总统立即辞职，把权力交给集体机构—联邦委员会"。叶利钦的讲话引起了全国强烈的反响。2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指责叶利钦的讲话"同苏联宪法相抵触，在国内造成紧张局势"，呼吁人民团结起来，支持苏联议会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指责叶利钦的讲话"旨在分裂苏联多民族国家"，指出那些自诩为"民主派"的人"实际上是右翼反对派"，他们"采取赤裸裸的反共方针，否定社会主义思想，并主张使社会资本主义化"。2月 21 日，绝大多数苏联中央报纸和莫斯科市的报纸都发表社论和文章，谴责叶利钦"挑起政治危机"，'利用民主满足权

欲"，表示支持苏联总统，要叶利钦下台。2月 23 日，莫斯科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建军节庆祝会，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和克格勃主席均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维护国家和军队统一的呼吁书，表示支持苏联总统的政策，支持新联盟条约和全民公决，并谴责叶利钦的"政治冒险"。2月 27 日，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共和国的党中央联合发表呼吁书，谴责"反社会主义势力公开力图改变苏联的国家制度，破坏联盟"。与此同时，各种反对派势力也纷纷举行支持叶利钦的集会，参加者达50万人次。3月 1 日爆发的煤矿工人大罢工至3月底全国1/3的矿井停产，30万人停工、罢工。在"民主派"的操纵下，要求总统和政府辞职，解散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把最高权力交给联邦委员会，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实行非政治化。3月10日，30万人在莫斯科练马场广场集会声援叶利钦，大会播放了叶利钦3月9日的讲话录音，号召莫斯科市民在28日举行俄罗斯非常人代会时到市中心集会，支持和保护叶利钦，并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还公开呼吁进行"有组织地夺权，不仅在市、区、州，还要在克里姆林宫夺权"。为了制止局势的恶化，3月25日，莫斯科市政府下令从3月26日到4月 15 日止暂时禁止在莫斯科举行游行集会。

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国就是否把苏联作为被革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保留下来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投票，结果，76.4%的投票人赞成保存联盟，这是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全民投票的形式来公决国家大事。但后来的事态表明，全民公决并未在事实上真正保证人民意志的实现，少数人根本不顾这次公决的权威，同时也没有举行新的全民公决。在全民公决后，苏联有关机构开始进行新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

4月 9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联邦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反危机纲领"，要求在维护国体，恢复行政权力，解决民族冲突

和稳定局势方面采取坚决措施，对不执行上级机关命令的机关和官员要追究责任，在年底前禁止罢工、集会和其它使国家局势不稳定的政治行动。4月21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议会间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与会者均为"民主派"，大会发表声明，要求在苏联成立过渡政府并将联盟权力交给共和国。大会还呼吁一旦苏联实行紧急状态，全民应开展不服从运动。4月23日，苏联总统和九个共和国领导人会晤(9＋1会晤)，就稳定国内形势和克服危机采取紧急措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普遍恢复宪法秩序，呼吁劳动者停止罢工。会晤还就建立"主权国家联邦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决定尽快签订新联盟条约。4月24日，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委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国内局势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的决定》和《关于共产党员在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中工作的决定》。6月 17 日，部长会议主席帕夫洛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反危机纲领的最后方案，并强调"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政治不稳定"，政府目前"没有足够的权力来进行有效的工作"，要求最高苏维埃授予补充的权力来保证实施反危机方案。6月 18 日，戈尔巴乔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政治失控、联盟解体的局面的出现，最高苏维埃曾先后酝酿和提出了4个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一个是主张在国内实施紧急状态，在 6 月一次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均发表激烈讲话，要求实施紧急状态。但戈尔巴乔夫以实施紧急状态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而加否定。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引起了持强硬立场的一部分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也引起反对派的严重关注。

在向戈尔巴乔夫发动"逼宫"攻势受挫后，叶利钦改变策略，一方面表面上赞同采取稳定局势的某些措施，以缓和与戈氏的

关系，一方面积极巩固阵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伺机发动新攻势。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总统选举，叶利钦和前总理雷日科夫、前内务部长巴卡金等六位候选人参加竞选。经过激烈的角逐，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首任民选总统。①舆论认为，叶利钦当选俄总统，加强了他同戈尔巴乔夫及联盟中央相抗衡的地位。

叶利钦当选总统后第一个动作是于6月19—21日出访美国，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和国防部长切尼，叶利钦认为此行"最重要的成果"是"美国政府将在与联盟保持联系的同时，同俄罗斯发展独立自主的联系"。6月28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俄政府关于在俄境内不执行苏联政府制定的明年经济计划的决定。7月1日，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9名政治活动家发表呼吁书，宣称为了拯救民主、保证政治和经济领域继续进行改革，倡议建立社会组织"民主改革运动"。7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发表书面声明，因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对其言论进行调查，宣布退出苏共。7月20日，叶利钦发布了第一个总统令，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7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声明，谴责叶利钦关于"非党化"命令践踏了苏联宪法，是非法的，它首先是针对苏联共产党的，妨碍了社会的和谐与合作。7月24日凌晨，苏联总统与各共和国全权代表团领导人在莫斯科近郊新奥加廖沃会晤结束后，对苏联记者宣布，制订新联盟条约的工作已经完成，将供签署。同一天，苏联15个共和国对外经济部门代

① 同时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分别获得6[illegible]、11%和70%的选票而当选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市长。在列宁格勒市举行的将该市恢复历史名称—圣彼得堡的民意测验中，约5[illegible]%投票赞成。7月10日叶利钦正式就任俄联邦首任总统。

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在撇开联盟中央的情况签订协议书，规定在各共和国之间分摊苏联的外债，分割联盟的黄金储备、钻石库、外汇基金以及苏联在国外的有价证券和不动产。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协议书是“建立各共和国经济邦联”的开始。7月27日，雅科夫列夫辞去苏联总统首席顾问的职务。7月 29—30 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共和国总统)三人会晤，讨论新联盟条约，并达成一致看法，确定8月 20 日正式签署这一条约。条约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并规定：每个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苏联为主权的联邦制民主国家；共和国有权决定本国大事，在共和国职权范围内，共和国的法律至高无上；联盟设总统、副总统、联盟内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这一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各共和国独立倾向大为增强，联盟中央作为权力中心的地位受到现实的威胁，这在苏联引起了极大震动，特别是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传统派”的严重不安和强烈不满，成了“8.19”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8 月 16 日，苏军党委和监委联合全体会议，并在《红星报》发表呼吁书，指出“苏联政治生活中一个责任重大的时期已经到来，经济危机因社会政治形势的激化而加剧。反动势力正在公开攻击苏共，企图诋毁、破坏和分裂苏共在劳动集体和军队中的阵地，使苏军非政党化”。呼吁书要求苏军中的共产党员“站在社会健康力量的前列”，“以实际行动确立苏共的威信”，“维护和巩固党组织在军队和劳动集体中的领导地位”。

“8.19”事件

雷鸣电闪预示着政治风暴的来临。8 月 5 日，戈尔巴乔夫一家赴克里米亚福罗斯休假。① 这时，在莫斯科一场重大的政治行

① 原计划于8月19日返回莫斯科，20日主持签署新联盟条约的仪式。

动正在秘密进行中。当时苏联的一些实权人物如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司令瓦连尼可夫等都参与策划。8月18日在莫斯科的一个军事设施中召开了一次极密会议，决定派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陆军司令瓦连尼可夫等5人前往福罗斯去劝说戈尔巴乔夫实施紧急状态，如不接受，就采取坚决措施。当天下午4时50分，5人代表团进入总统别墅，要求戈尔巴乔夫签署紧急状态令，否则就要他宣布辞职，把权力交给副总统。这要求遭到戈尔巴乔夫的断然拒绝。博尔金等当晚返回莫斯科后，事变参与者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实施紧急状态。8月19日晨6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从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20分钟后，亚纳耶夫发表《致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秘书长书》，通告自8月19日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行使，希望此措施得到各国人民、政府和联合国应有的理解，并保证信守以前按条约和协定承担的国际义务。6时34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指出，苏联目前"面临着致命的危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国内"出现了以毁灭苏联、瓦解国家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为方针的极端主义者势力"，"苏联日益加深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正在破坏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承

---

[1]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为：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农民联合会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联合会主席季贾科夫。

担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决心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尽快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告人民书呼吁全体公民大力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努力。

19日凌晨4时半，国防部长命令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调动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开进莫斯科市，7时这两个师开始出发，同时隶属于空降兵的图拉空降师和其他部队也向莫斯科开进。但行动迟缓，上午9时，坦克和军队开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最后一辆坦克到达指定地点已是18时30分，傍晚，几十辆装甲车包围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厦所在地白宫。

上午11时零6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1号命令，下令各级权力机构必须遵守紧急状态制度，否则将派代表接管权力，中止阻挠形势正常化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活动，对舆论工具实行监督，禁止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等活动。

19日清晨叶利钦获悉非常消息后，立即召集要员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中商量对策，会议决定实行全面对抗，并立即前往俄罗斯议会所在地白宫。在他们离开别墅约20分钟后，奉命前往逮捕叶利钦的克格勃特别部队才赶到。中午11时30分，叶利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告俄罗斯人民书》，宣称实行紧急状态是违反宪法的行动，要求立即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并要求让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表讲话，号召举行无限期罢工，呼吁公民行动起来反击紧急状态委员会。下午1时左右，响应叶利钦号召的人群开始向白宫前聚集，并在白宫周围设置障碍物，以阻挡军队的进攻。苏联矿工跨共和国独立工会决定从20日起顿巴斯等煤矿工人开始无限期总罢工。叶利钦登上白宫前一辆坦克发表演说，苏联电视台播出了这一场面，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时，叶利钦发布公告，以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名义要求共和国境内的军队、警察和克格勃不要参与政变。叶利钦还在

白宫接见美国驻苏代办科林斯，要他转交给布什的亲笔信，请求美国支持。同时派俄罗斯外交部长科兹廖夫躲过海关检查前往巴黎，寻求西方支持。19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不承认苏联新领导人，要求恢复戈尔巴乔夫的权力。

晚17时，亚纳耶夫召开首次记者招待会，强调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切行动都是合法的，已要求8月26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力。同时又说，戈尔巴乔夫是他的朋友，希望戈在健康恢复后重返岗位。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宣布于8月26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讨论关于实施紧急状态问题，同时还发表重要声明，声称新联盟条约的内容需重新讨论，条约签订将推迟。下午苏联内阁举行会议，宣布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的决定。17点30分，亚纳耶夫下令，莫斯科从19日起实行紧急状态，任命加里宁为莫斯科卫戍司令。17点35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二号命令，中央和莫斯科只准《真理报》《消息报》等9种报纸出版，其他报纸一律停刊。

8月19日，在列宁格勒，由于市长索布恰克的积极活动，军队没有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进入市区。

8月20日，苏联报纸公布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由第一副总理多古日耶夫代行职权，此消息在国内外引起许多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利的流言和猜测。同日，代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责成俄联邦所有政权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必须绝对服从执行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形势已向不利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方向发展。事变第一天持谨慎立场的各共和国领导人于20日开始表明自己的立场。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讲话，指出使国家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应建立在"严格遵循宪法原则的基础

之上"，并要求戈尔巴乔夫亲自证实他已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建议最高苏维埃讨论政治局势。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合法，表示坚决支持叶利钦的立场。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共和国先后声明不实行紧急状态。苏联全国各级地方权力机构极大多数都没有采取积极行动来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这时，军队也发生分裂。20日，空军司令、空降兵司令、海军司令和战略火箭军司令都表示不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莫斯科军区参谋长认为军队进入莫斯科是犯罪行为，该军区第106空降师奉命去抓叶利钦那支部队倒向支持叶利钦，塔曼摩托化师的部分部队掉转枪口，用坦克和装甲车保卫白宫。远东军区中支持和反对政变的军官各占一半，真正坚决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的部队为数不多。

20日上午在莫斯科市政府所在地苏维埃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聚集在白宫的人已达5万，下午又增至10万人。忠于叶利钦的俄罗斯电台"莫斯科回声"等仍在广播，被封的《莫斯科新闻》仍在出版，独立的《国际文传》通讯社未被关闭，对制造舆论起了很大作用。

20日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在21日凌晨3时发动进攻，占领白宫。但在发动进攻前，担负进攻突击力量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①决定停止行动，其他接受任务的空降兵和内务部的部队也按兵不动，攻占白宫的计划流产，此举至关重要，形势急转直下。

8月21日上午，亚佐夫召开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把部署在施行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到原驻防地。下午又召开了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在与会者要求下，会议决定把部队从莫斯

① 阿尔法小组平时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直接指挥的反恐怖活动的特种部队。

科撤出，并解除宵禁。随后，克留奇科夫打电话给叶利钦，表示将解除对白宫的封锁。这天出版的《消息报》在头版登载了编辑部坚决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并报导了戈尔巴乔夫身体健康的消息。

下午5时左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同时，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也飞抵总统别墅，但戈尔巴乔夫拒绝同他们会见。在恢复通讯后，戈尔巴乔夫首先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接着同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稍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非常议会派出由总理西耶拉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率领的一组人前往福罗斯总统别墅，戈尔巴乔夫同他们会谈一直进行到晚上9时多。

这时，莫斯科的形势也趋明朗。晚7时26分，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宣布取消在莫斯科的宵禁。7时30分，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停止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为非法行动。21日晚9时10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休假地发表声明，宣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一度中断的通讯联系已经恢复，他将在最短时间内返回首都履行总统的职务。至此，时仅三天的事变遂告失败。

解体前夕的苏联

“8.19”事件对苏联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它大大改变了苏联政治力量的对比，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宣称，事变使他成为“一个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他强调要“更加坚决、更加大胆、更加迅速地沿着民主改造的道路——走向新联盟和市场关系的道路——向前迈进”。

8月22日凌晨2时12分，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随即发布命令撤销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的一切决定，解除该委员会所有成员的现任职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八名成员除内务部长自杀身亡外，其余均被捕入狱，并以“叛国罪”予以起诉。之后，还逮捕了舍宁等六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陆军司令瓦连尼可夫等。戈尔巴乔夫还要求当时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维护法律”的人自己提出辞职，并对国防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部和新闻机构等要害部门都进行了改组① 。此外，对军队也大动手术，苏军的政治机关被撤销，约9万名政治军官被撤换。克格勃的部务委员会被解散，数十万克格勃的部队转入国防部。

“8.19”事件后，苏联的政权体制和政权机构也发生很大变动，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建立一种新领导机制，一旦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两人中有一个陷入无法下达命令的境地，另一个就立即接过他的权力和职责。8月24日戈尔巴乔夫任命俄罗斯总理西拉耶夫为苏联新政府领导人，并责成其组织新政府和国民经济应急管理委员会。9月2—5日召开的苏联第五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根据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10个共和国领导人的磋商，对国家最高权力和管理机构进行全面改组，确定了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权机构。在立法机构方面，解散1989年建立的任期未满的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改组苏联最高苏维埃，成立由共和国院(原称民族院)和联盟院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作为新联盟成立之前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

① 苏联总统先后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为苏联国防部长，巴卡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叶利钦为副主席，巴兰尼科夫为苏联内务部长，潘金为外交部长，伊格纳坚科为塔斯社社长，洛博夫为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雅科夫列夫为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

其代表由各共和国重新确定和派出。在行政管理机构方面，成立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委员会作为过渡时期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协调解决涉及各共和国共同利益的内外政策问题。同时各共和国在对等基础上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负责协调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经济管理、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① 。此外还决定，取消苏联副总统制，如苏联总统不能履行职责，苏联国务委员会将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苏联国务委员会主席，代理苏联总统职务。

通过上述中央政权的改组和实行"非常化"措施，"传统派"力量基本上从国家主要领导岗位上被排除出去。

"8.19"事变后，苏联共产党不仅被排挤出国家政权体系，而且在政治上失去生存权，组织被彻底瓦解。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势力，乘机向苏共发动进攻。叶利钦公然宣称要与苏共"清算"，要"结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的全面统"，完成"非共产主义化的任务"。8 月 22 日，叶利钦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为非法。23 日下令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并查封苏共中央大楼、俄共中央大楼及列宁格勒等市委机关等。25 日，叶利钦下令苏共和俄共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均为俄罗斯国家所有 。

8月 24 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称由于苏共中央及政治局、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则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戈尔巴乔夫还同时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苏联军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

---

① 9月 18 日，根据苏联总统的提议经苏联国务委员会同意，任命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西拉耶夫为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主席。9 月 27 日，西拉耶夫辞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的职务。

及其它执法机关、铁道兵、各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同时要求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准许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讨论苏共今后的命运问题，未见答复。苏联人民代表、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对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关于暂停苏共活动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这是“从一个政变逐渐走向另一种政变”。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其财产和档案由苏联内务部负责处理，并责成苏联检察院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或宣布脱离苏共，或更改党的名称，或宣布停止活动，或被禁止活动①。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顷刻瓦解，从组织上彻底解体。

“8.19”事变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注目的现象：叶利钦下令《真理报》、《公开性》、《苏维埃俄罗斯报》等6家报刊停止出版。俄罗斯联邦决定将十月革命前的三色旗作为该联邦国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前广场上的捷尔任斯基的铜像被推倒。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将列宁格勒改为沙俄时代的旧名圣彼得堡。莫斯科市苏维埃决定拆除大批纪念像。11月7日，苏联官方第一次没有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但有两个非官方的群众集会，一个是在红场举行的由劳动人民联合阵线等团体组织的集会，参加者2万余人，标语牌上写着“把十月的叛徒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会场上第一次出现“戈尔巴乔夫

---

① 8月22日，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下令逮捕共产党领导人。8月24日，爱沙尼亚禁止共产党活动。8月30日，乌克兰禁止共产党活动。8月25日，白俄罗斯宣布暂停共产党活动。8月28日，塔吉克共产党决定退出苏共，9月21日更名为社会党。9月8日，哈萨克共产党更名为社会党。9月14日，乌兹别克共产党改名为人民民主党。同一天，阿塞拜疆共产党宣布自动解散。9月28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决定停止活动，由各共和国青年联盟作为它的合法继承者。10月3日，塔吉克暂停共产党活动。

—叶利钦反动联盟"的标语口号。另一个是在卢比扬卡广场举行的由莫斯科民主力量联盟等团体组织的"追悼会"，悼念在苏维埃时期的牺牲者。

"8.19"事变在苏联造成的震荡，最直接的严重后果是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产生。原定于8月20日诞生的新联盟被事变所打消。事变后，戈尔巴乔夫为建立新联盟继续努力，然而，尽管戈尔巴乔夫为了挽救分崩离析的联盟，不断向共和国让步、妥协，竭力争取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维护联盟中央，但是，各共和国都趁机攫取政治经济实权，分离活动日益加剧，独立运动迅猛发展，致使联盟中央的权力陷于瘫痪，联盟财产荡然一空，总统有职无权，联盟陷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在向联盟中央夺权的过程中，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充当了带头先锋。"8.19"事件后，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在事件发生期间所颁布的许多越权命令的合法性，同时又颁布一系列新命令，把联盟中央的权力、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斯所有。9月11日，叶利钦下令停止苏联煤炭工业部、石油、天然气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部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将上述各部所属的企业、组织及其全部财产没收归俄联邦所有，同时宣布中央电视二台转归俄联邦使用。8月30日，乌克兰宣布将境内的全苏联盟的企业、组织收归共和国所有，将苏联对外经济业务银行乌克兰分行的职能转交乌克兰国家银行，将境内苏联内务部队和边防军转归共和国管辖并成立国民卫队，任命了国防部长。10月22日，宣布乌境内的所有军队包括黑海舰队由乌管辖。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摩尔多瓦等共和国各自采取了措施，将联盟在共和国境内的海关、边防部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收归共和国管辖。这样，联盟中央的行政和管理机关已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8.19”事件发生后，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仍决心维持联盟，并与共和国领导人频频会谈，但終究挽回不了联盟解体的命运。

第二十七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对外关系

第一节　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与对话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总构想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发表讲话，关于苏联对外政策，他说，苏联要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与进步的方针，永不放弃本国及盟国的利益；希望同美国停止军备竞赛，建议冻结核武库和停止继续部署导弹。两天以后，3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红场为契尔年科举行葬礼时讲话，重申苏联愿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睦邻关系。以后，戈尔巴乔夫形成了一套关于苏联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总构思，称之为"新思维"。

"新思维"的概念是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15日关于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中首次提出的。他说："新思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哲学"，它"经受了现实主义和理智试金石的考验"，结束了"冷战"，消除了直接军事威胁，使苏联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同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争取禁止核试验国际学术会议代表时再次提出了"新思维"的概念。他说，大家都生活在核宇宙时代，我们或者生存下去，合作和保护土地、海洋、天空

和整个环境，或者给文明造成灾难性后果。“必须在国际事务和国与国的事务中努力建立新型关系。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能指挥世界。”所以，“需要有新思维”。实际上，“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对当代世界的认识，构建新的国际体制的设想，以及苏联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等等方面的综合构想。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其书名为《改革与新思维》的著作中，对“新思维”的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随后发表的一些讲话又作了修正和补充。

对20世纪晚期当代世界特点的认识，是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总构想的出发点。他对当代世界有三点基本估计。

第一、战争已不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手段，国际格局应是所有国家利益的综合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不长的时间里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有较长远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战后40多年里，诞生了一大片“第三世界”，其中的一批国家已跻身于新型工业国的行列。这就是谁都无法改变的现实世界。这170多个独立主权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各自的利益，所有这些利益都应该在世界政治中得到合理的体现。过去的国际格局，实际上就是几个大国力量的平衡结构。这样的时代永远成为历史了。戈尔巴乔夫说：“过去，一切都很简单。有着几个大国，如果达到了平衡，它们就确定并平衡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达不到，就交战。国际关系就建立在这几个大国利益平衡的基础上”①。今天，武力甚至不能抹煞任何小国的利益，国际格局应该平衡所有国家的利益，再也不能用战争作为解决政

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70页，1987年12月新华出版社中文版。

治问题的最后手段，"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①。

第二、世界已成为互相依存的整体。

戈尔巴乔夫认为，当今世界尽管矛盾重重，各国之间也有着重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是一个固定的整体。1987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同拉美著名作家加·马克思谈话时说到："人类已经到了大家都相互依赖的阶段。不能使一个国家脱离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脱离另一个民族，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使当今世界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辩证法造成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不仅增进了彼此的联系，同时也使人类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某几个国家造成的，而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指靠几个大国，而是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戈尔巴乔夫把当代世界比作"在山坡上的一队拴在一起的登山运动员"，说："从宏观上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从这里发现了我们的相互依赖性，发现了世界的整体性"②。

第三、核战争"不会有胜利者"，核战争危及的是人类自身的生存，核战争不能成为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

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社会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战争，夺去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使无数城市和乡村变成一片废墟。但是，无论战争多么惨烈，都没有危及人类自身的繁衍。核战争就不同了！目前，一艘战略潜艇拥有的毁灭性力量就相当于几个

① 《改革与新思维》第177页。
② 同上，第172—17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①。如果爆发核战争，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毁灭的将是整个人类。戈尔巴乔夫进而认为，在军备竞赛中谋求优势同样是荒谬的。

基于以上三点对当代世界特点的基本估计，戈尔巴乔夫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着全面的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原料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信息科学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是一个空前的发展和进步潜力同极度贫困、落后和野蛮并存的世界；是一个有着广阔的“紧张区域”的世界。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构想是：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的道路；安全的唯一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军备竞赛本身就是和平的敌人，对话是实现政治解决的基本手段。戈尔巴乔夫总结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②。

根据这样的总构想，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确立全人类价值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必须从对抗走向合作，由斗争转向为实现和平、改善生活等“人的普遍价值”方面合作；对东欧实行不干涉政策，对西欧争取建立“全欧洲大厦”；继续与美国就裁军、削减核武器、限制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争取达成协议；和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加强彼此合作；争取阿富汗、柬埔寨、安哥拉、尼加拉瓜等问题的政治解决。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对外交工作中如何具体贯彻“新思维”曾有一个很好说明。他在1987年第2期《苏联外交

① 《改革与新思维》第173页。
② 同上，第184页。

通报》上谈苏联外交工作改革的主要任务时说："不要让国家为维持防御能力和维护自己的合法对外利益而多花钱；大力帮助国家机关在经济、科学、贸易、生态方面建立能大大促进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国际合作；更多地考虑经济方法，提高对外政策的盈利，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尽量少给本国经济增加负担；为使苏联人能安心工作建立稳定的心理环境。"

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以"新思维"为指导，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相比，苏联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转变。

苏美对话与限制军备谈判

自 1979 年 6 月勃列日涅夫与卡特在维也纳会谈以来，苏美两国争夺核军备优势的角逐愈演愈烈。这种激烈的争夺造成苏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连维也纳会谈签订的苏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也未能正式生效，难怪有些评论家把 80 年代初期称作"冷战"以来两国关系的最低点。1985 年 3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表示，希望同美国停止军备竞赛，冻结核武库，停止继续部署导弹。美国总统里根迅即作出反应，愿与苏联重开首脑会谈。此后，戈尔巴乔夫整个当政期间与美国共进行了 7 次首脑会议，使苏美对话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开始了苏美对话的新阶段，并且最终签订了苏美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苏美关系的转机，从戈尔巴乔夫来说，首先是出于稳定国内局势的考虑，希望在保持已取得的核均势的基础上，把精力集中于部署国内的改革。其次也想减轻核竞赛造成的经济负担。苏美庞大的核武库中估计共有 5 万枚核弹头，总当量不下 100 亿吨，从理论上说足可毁灭人类数十次，这在大规模的核冲突中，无论是苏联或者美国都无法确保自身的生存。从军事战略上

说，苏联和美国都没有有效的战略防御手段。因此，适量的核进攻和还击能力已可保证足够的威慑效用，过量的超杀能力反而成为储藏和保养的沉重军费负担。即使美国也有均衡裁减一定数量进攻性核武器的要求，苏联在这方面的要求就更加迫切了。

1985年7月，苏美两国商定，于同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晤，主要议程是武器控制问题、地区性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在准备第一次两国首脑会晤中，戈尔巴乔夫举起“和平”与“裁军”两面旗帜，力争外交主动。

同年8月6日是美国在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40周年，戈尔巴乔夫借机向美国发起外交攻势。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苏联将从8月6日至明年1月1日暂停一切核爆炸，呼吁美国也从8月6日起暂停核爆炸。当美国拒绝这一声明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5日给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组织委员会的信中，重申7月29日声明的内容。8月13日，戈尔巴乔夫再次呼吁美国响应冻结核试验。9月1日，戈尔巴乔夫就苏美关系答美国《时代》周刊问，谴责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是十分危险的计划”，说苏联一定会找到对应措施，到那时所有谈判将被葬送。9月17日，美国总统里根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重申美国将继续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建立一个战略防御系统，以对付苏联的核进攻力量，断然拒绝苏联的呼吁。

10月3日，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法国时又提出裁军新建议：苏美双方全面禁止发展、研制和部署进攻性太空武器；双方各自把能打到对方领土的战略核武器裁减50%；苏联愿与英国、法国单独就欧洲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苏联还宣布单方面把部署在欧洲的SS—20导弹减少到243枚。作为对苏联新建议的回答，里根于11月1日宣布：美国将依据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武器，不谋求第一次打击优势，继续进行防御研究和不进行欺骗

的原则，在日内瓦谈判中提出一个"非常大规模地均衡削减核武器"的建议。里根实际上是拒绝了戈尔巴乔夫的新建议。

苏美双方对于削减战略核武器50%，对双方战略核武器弹头规定限额等要求虽然大体一致，但是对哪些武器属"应削减战略核武器50%"的范围?如何削减战略核武器弹头?以及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分歧都很大。尽管如此，即将开始的苏美首脑会晤仍然为全世界所瞩目。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零票反对，12票弃权通过决议，希望苏美首脑日内瓦会晤"能对两国限制军备起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以便尽早达成有效协议。"

1985年11月19—21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会晤，会谈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关于限制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把反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放在首要地位，里根则表示要继续执行这个计划，致使关于限制军备竞赛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第二，关于地区性问题，里根提出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尼加拉瓜等五个地方，都是苏联的"扩张主义行径"造成的。戈尔巴乔夫则强调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且指责美国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以色列政府，表示苏联"今后仍将站在捍卫自己独立的各国人民一边。"因此，地区性问题也没有达成有效协议。

第三，在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进展是这次首脑会晤的明显成果。双方表示要扩大双边文化、教育、科技交流计划，发展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不过里根仍然把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同政治、人权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至于在涉及先进技术的贸易方面就卡得更紧了。

两国首脑会谈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局势和苏美关系的基本问题，双方就彼此观点在某种程度

上取得了进一步了解，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日内瓦会晤毕竟使两国的裁军立场更接近了一步，从而开始了苏美加强对话的新阶段。

1986年10月11—12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工作性会晤"，这是苏美两国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谈。这次会晤使两国在削减战略武器和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达成意向性协议，双方再次确认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原则。但是在太空武器和停止核试验等问题上仍没有进展。美国之所以一再断然拒绝苏联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正如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肯·阿尔德曼所说："美国（军备）现代化计划需要试验武器。"①

雷克雅未克会晤使苏美两国在削减战略武器上又前进了一步。里根说会晤"在解决大部分分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一次有希望的会晤。"

1987年12月7—10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苏美两国首脑举行第三次会晤。8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签署了《苏美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条约规定消除部署在欧洲的1000多枚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还规定，苏美双方在条约生效的3年后都不再拥有中程导弹、发射装置及有关辅助设施；在条约生效的18个月后都不再拥有中短程导弹、发射装置及有关辅助设施；在条约生效后都不再生产任何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及有关此类导弹的发射装置。

中导条约的签署，打开了自核武器问世以来苏美两国真正裁减核武器的通道；中导条约的签署也是戈尔巴乔夫贯彻"新思维"方针，缓和欧洲局势、构筑"欧洲大厦"的格局迈出的重要一步。

---

① 转引自《国际问题研究》1986年第3期第7页。

1988年5月29日至6月2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苏联，并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国际关系、两国双边关系、地区性冲突、裁减军备、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禁止化学武器、人权问题等多方面问题；签署了有关军备控制、双边关系等9个协定；互换了苏美中导条约批准书，使该条约正式生效。但是，拟议中的削减50%战略武器条约却未能签署。对此，里根用了一句俄国谚语："要足月分娩，不能匆忙催生。"

6月1日，苏美发表了最高级会晤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莫斯科会晤为苏美关系奠定更有成果和更加稳定的基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尽管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但是两国间业已形成的公开对话对于克服分歧具有决定性意义。联合声明说："两国领导人确信，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这种战争在任何时候也不应爆发。双方决心防止苏美间发生任何战争，并放弃获得军事优势的任何企图"①。

苏美中导条约正式生效，苏联为履行中导条约采取了切实的措施。1988年7月22日，在美国核查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苏联在伏尔加格勒州的卡普斯廷—亚尔导弹发射场，销毁了第一枚SS—20中程导弹。8月1日，在哈萨克的萨雷奥泽克导弹试验场，销毁4枚短程导弹。塔斯社宣布，自是日起，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外，将每天在该试验场销毁4至8枚中短程导弹，一年半内销毁926枚中短程导弹。苏联在乌克兰西部罗夫诺州的基地也开始销毁导弹的发射装置。12月30日，苏联政府宣布：根据苏美签署的中导条约，已销毁作战用和训练用两类导弹600多枚，相当于应销毁武器总数的1/3；在苏联领土上已拆毁24个导弹作战基地。

① 《人民日报》，1988年6月3日。

1989年，东欧局势发生剧变。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在马耳他海域的一艘苏联客轮“高尔基”号上举行非正式会晤。这是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第一次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首脑会谈。布什打算就苏联和东欧局势的变化，从戈尔巴乔夫那里了解“第一手情况和看法”，“既不要因情况不明而失去什么；也不要因处置不当而影响美苏关系和美国利益。”

马耳他会晤双方讨论了东欧局势、中美洲局势、军备控制等问题，而讨论的中心是东欧局势问题。戈尔巴乔夫向布什表示，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的变革是历史本身的进程，谁也不能阻挡，苏联保证不干涉东欧内政。布什得到了戈尔巴乔夫“不干涉东欧内政”的承诺，会晤结束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很有信心地说：已与戈尔巴乔夫商定了“确保莫斯科的盟国脱离旧式共产主义的改革运动和平进行的办法。”这实际上是表示苏联在两德统一问题上已无意设置障碍，布什很快就向联邦德国总理科尔透露了这一信息。

1990年9月9日，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芬兰总统府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次会晤的主要议题是海湾危机问题，此外也讨论了德国统一问题以及欧洲常规武器问题。会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伊拉克军事入侵和继续占领科威特，呼吁伊拉克无条件撤出科威特。联合声明强调，如果目前采取的措施不能结束侵略的话，“准备考虑采取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进一步措施。”

1991年7月29日至8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莫斯科。7月30、31日，戈尔巴乔夫与来访的布什举行第七次首脑会谈。此时，苏联国内局势已十分严峻，布什苏联之行的重点已不再像40年来那样讨论世界上的“热点”问题，而是讨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西方国家“帮助”苏联等问题。会谈期间，两国签

署了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合作的5个文件。尤令世人瞩目的是7月31日，两国首脑签署了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从而结束了苏美两国自1982年6月29日开始的长达9年的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根据这项条约，苏美两国都将削减射程为4800公里以上的远程核导弹及弹头：苏联从现有的11000多枚削减到7000多枚；美国从12000多枚削减到10500枚。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苏美两国开始实际削减战略核武器。对于这次会晤，戈尔巴乔夫说是"苏美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布什说是"许多共同的价值把美苏连结起来。"

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与美国总统一年一度地举行了7次首脑会晤，使苏美对话进入一个新阶段；苏美关系的缓和也是戈尔巴乔夫承认苏美两极对峙格局变化、苏联已势难坚持的反映。1990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苏美关系的总结："由于改革和新思维，苏美关系出现了由对抗和军备竞赛向相互理解发展的转折。在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甚至在向伙伴关系发展。"还说："仅在同西方进行意识对抗的最近20年，用于军事对峙的费用就增加了7000亿卢布。这个数字超过了取得同美国和西欧的军事平衡的需要。我知道，对外政策和我本人都受到指责，而在最近，直率地说是受到了咒骂，这无非是由于在安全领域内作出了让步。"戈尔巴乔夫的这段话既是苏美关系的真实写照，又是无可奈何的哀叹。

苏联与两德统一

戈尔巴乔夫在建设"欧洲大厦"的设想下，调整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处理和联邦德国的关系，也是苏联对西欧政策的重点。联邦德国不是核国家，但是在它的领土上却部署着大量美国核

武器。联邦德国自己不能挑起核冲突，但它可能成为美苏核战争的重要战场，它对苏联的威胁是严重的。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力图使联邦德国减少，乃至撤除美国部署的核武器；使联邦德国尊重民主德国为主权国家，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定的欧洲政治疆界。

1985年5月16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维也纳会见联邦德国外长根舍。葛罗米柯指出：如果联邦德国参与实施美国的太空武器计划，就要同美国一起对破坏军事战略均势的后果负责。在随后的几年里，戈尔巴乔夫曾数度向联邦德国领导人表示：德国分裂的过错不在苏联，存在两个德国是欧洲的现实，历史会对两个德国的命运作出决定。

1989年，东欧形势发生剧变，作为东欧前哨的民主德国更处于剧变形势的风口浪尖上。5月，美国总统布什呼吁戈尔巴乔夫帮助拆除柏林墙，使欧洲成为"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8月上旬，布什再次敦促苏联将柏林变为"一个合作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对抗的场合。"布什称柏林墙是"旧时代和失败政策的纪念物。"

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中央全会，接受昂纳克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请求。昂纳克同时还辞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克伦茨接替了昂纳克的全部职务。10天以后，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发布大赦令，对10月27日前因非法越境，或企图非法离开民主德国而被判刑者，均实行大赦。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取消两个德国间的公民旅游限制，这意味着实际上开放柏林墙，允许公民自由往来。到11月中旬，民主德国警察局已签发了1000万个私人旅游签证，批准近2万个长期移居国外的申请。这意味着全国1670万人口中，2/3的公民可随时出国"旅游"。

在这种形势下，11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向联邦德国议院提出实现统一的10点计划。在10点计划中，科尔建议两个德国先建立"联邦机构"，然后再过渡到一个联邦国家。民主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民德主张成立"一种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邦联"。

两个德国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如何实现统一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1989年12月5日，戈尔巴乔夫会见在莫斯科访问的联邦德国外长根舍。戈尔巴乔夫向根舍表示：民主德国是苏联的可靠盟国，是欧洲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障，苏联对它的声援和支持始终如一。根舍则坚定地表示：联邦德国只尊重民主德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情况下解决共和国发展问题的权利。根舍实际上是顶回了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当日，苏联和联邦德国两国外长举行会谈。谢瓦尔德纳泽除申述戈尔巴乔夫的意见之外，特别提醒对方注意，民主德国是苏联的盟国。两国外长会谈并未取得实际结果。

如何实现两德统一将关系到统一后德国的政治走向以及欧洲的外交格局。1990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单独会谈。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说，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是不可能的；战后欧洲边界是不可破坏的。可是，此时的民主德国已经无能为力了。4月10日，戈尔巴乔夫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时又表示：苏联不能接受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5月8日，莫斯科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45周年大会，戈尔巴乔夫在大会讲话中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定的欧洲边界不容更改。几天以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在华沙条约成立35周年纪念会上说：统一的德国如成为北约成员国，就会破坏战略平衡，这是苏联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美国。5月17

日，美国总统布什和科尔在白宫举行会谈。布什特地向科尔通报了1989年12月马耳他苏美首脑会晤时，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绝不干涉东欧国家内政的承诺。会谈结束后，布什和科尔向记者发表谈话，说：统一的德国将是北约的完全成员国；德国在北约中的身份是不容谈判的。

科尔在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并且得悉戈尔巴乔夫的最终态度之后，于1990年7月14日访问苏联。至此，戈尔巴乔夫的防线已崩溃。经过会谈，苏联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可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归属问题"。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和科尔在北高加索疗养胜地日列兹诺沃德斯克举行记者招待会。科尔介绍了他和戈尔巴乔夫达成的8项协议，其中包括：统一后的德国立即取得完全的、不受限制的主权；可以自主地决定，它将属于哪个联盟。科尔在这点上还补充说：统一的德国将成为北约成员国，这符合民主德国政府的利益。至此，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放弃了最后一点意见。

1990年9月12日，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的"4＋2"外长会议，即苏、美、英、法加联邦德国、民主德国6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这是解决德国问题的最后文件。文件规定，统一后的德国将拥有完全的主权。当月，民主德国还签署了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议定书。10月1日，苏、美、英、法、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等6国外长，在纽约的贾维茨会议中心签署宣言，宣布停止苏、美、英、法4国在德国行使权力。两德于10月3日正式统一，拥有完全的主权。

1990年11月9日，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首次抵波恩访问统一后的德国。10日，戈尔巴乔夫与德国总理科尔举行单独会谈，两国签署了《德苏睦邻、伙伴关系和合作条约》。条约共22条，规定互无领土要求，互不使用武力；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

两国经济合作的原则。条约有效期为20年。

两德的统一，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制在欧洲的解体。

苏日关系与"北方领土"问题

1985年3月14日，戈尔巴乔夫会见前来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苏联愿意同日本发展各个方面的关系，并愿意就此采取实际步骤。苏日关系由于存在着"北方领土"、军事威胁、渔业纠纷等三大问题，长期处于僵持状态。而其中的"北方领土"问题尤其成为苏日间最尖锐的矛盾，直接影响着苏日关系的发展。

80年代初，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53个师的兵力，140多枚SS—20中程导弹，被日本看作是一种军事威胁。为了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日本除加快增强防卫力量的步伐外，还加强同美国的军事合作。1985年9月，日本政府通过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划(1986—1990年)，重点是加强日本东北部的地面部队，提高协同美国封锁宗谷、津轻、对马等三个海峡的军事能力，承担保卫西太平洋上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的任务等等。苏日双方的行动，两国都把对方视作军事威胁。

渔业纠纷在近代历史上即已出现。1928年，日本与苏联缔结了有利于日本的日苏渔业条约，使日本渔民获得在苏联海域的捕捞权。1939年，日本在堪察加洋面和苏联海域捕捞的鲑鱼、鳟鱼达38.1万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从千岛群岛洋面的太平洋到堪察加半岛洋面的白令海，划了一条保护线，被称作"布尔加宁线"，把线内的日本捕鱼量限制在每年5万吨。1977年，苏日双方都实施200海里渔业经济水域，日本被迫从苏联的200海里经济水域全面撤退。自1974年至1982年

底，因进入“北方四岛”海域而被苏联扣押的日本渔船有1201艘，渔民8459人。苏日两国在渔业问题上矛盾很大。

苏联在远东太平洋上的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等四岛，属千岛群岛之列，日本称为“北方四岛”，总面积4996平方公里。周围海域正值千岛寒流和对马暖流交错，成为世界著名渔场。四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属日本行政管辖。根据《雅尔塔协定》中“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的规定，四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苏联。日本坚持“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苏联则认为苏日之间的领土问题早由国际条约解决了，不存在“领土问题”。在几十年里，苏联虽然在表达上曾有过松动，由于四岛对苏联在远东的经济、军事价值重大，苏联始终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国界不容更动，两国的关系也长期陷入僵局。

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积极谋求改善同日本的关系，日本也想乘机压苏联让步。可是，戈尔巴乔夫是想绕过“北方领土”问题来改善苏日关系，日本则想利用改善关系来压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作出实际让步，苏日双方的立场相去甚远。因此，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两国高层领导人接触频繁，但两国关系并无实质性改善。

1986年1月15—19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正式访问日本，这是10年来苏联外长第一次访日。日苏两国外长经过4轮谈判，签署了租税条约和1986—1990年贸易与支付协定，并达成了其他一些协议。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外长确定今后继续定期协商，并且进行副外长级事务性磋商；同意就日苏和平条约问题继续会谈。

日本时事社报道，两国外长用了3小时讨论领土问题，苏联方面仍坚持“领土问题已解决”的一贯立场，认为不存在领土问题。由于日本方面的坚持，最后在联合声明中写上“根据1973

年10月10日苏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协议进行了缔结和约的谈判，其中包括应能成为日苏和平条约内容的各种问题”，“双方同意在莫斯科举行的下次协商中就此继续谈判。”日本外务省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联合声明的关键在于苏方已改变了最近几年拒绝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的态度，虽然对领土问题仍持原来的立场，却同意恢复以讨论领土问题为对象的和平条约谈判。苏联想绕过领土问题，打开苏日关系的新局面，吸收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开发远东地区。由于“北方领土”问题的阻隔，谢瓦尔德纳泽的访日，收效甚微。

此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虽然越来越多，但是在领土问题上一直处于僵持状态。1986年5月29—31日，日本外相安倍对苏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安倍时指出：只有在相互的基础上，在认识到谁也不能违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边界的不可动摇性的情况下，才能顺利确立友好关系。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以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作为缔结苏日和平条约的条件。两国领导人多次接触，两国关系终无进展。

1988年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强调为解决日苏之间的分歧“无论如何必须想个办法”。5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来访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说的，“在苏联的国际政策中，日本是一个独立因素，发展对日关系是苏联的长远政策。”这个“办法”就是：苏联官方仍不承认存在“北方领土”问题；由学者、民间人士不断提出“共同管理”、“联合国托管”之类方案。在非官方方案中，特别突出的是叶利钦的“五阶段设想”。

1990年1月16日，苏共前莫斯科市委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叶利钦访问日本。叶利钦在东京日本记者协会会见日本记者时，提出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五阶段设想：第一阶段，苏

联方面应当承认存在这一问题；第二阶段，把北方领土指定为“自由企业区”；第三阶段，实现该地区非军事化；第四阶段，缔结苏日和平条约；第五阶段，斟酌当时国际形势和苏日关系，把这一问题交给下一代和新的领导人去解决。叶利钦的“五阶段设想”就是苏联官方由原来拒绝讨论的僵硬立场变为双方一起讨论、各方说各方意见的软磨态度。

1991年4月16—19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这是苏日关系史上苏联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日本。戈尔巴乔夫的对日政策一心想绕开领土问题，可是此次出访日本，讨论的中心仍然是领土问题。经过会谈，两国发表的《日苏联合声明》说：两国首脑考虑到关于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等岛归属问题的立场，就包括领土划定问题在内的有关制定和缔结日苏和平条约的所有问题，进行了详细而又彻底的会谈。联合声明最后含混地说：和平条约必须成为包括解决领土问题在内的战后最终处理的文件。戈尔巴乔夫的访日，既没有就拟议中的苏日条约达成协议，在领土问题上也仅仅是“各方说各方的意见”。这次访问，发表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可以看作是戈尔巴乔夫当政年代苏日关系的概括。

第二节　苏联与社会主义各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调整了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提出，在政治关系方面，“一定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政治关系体系”；在经济关系方面，“我们把

这种关系建立在始终不渝地遵守互利和互助的原则基础上"[1]。

在军事方面，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为华沙条约组织提出"足够防御原则"。亚佐夫解释说：这一原则意味着"拥有防御外部进攻所必需的那么多的武装力量"。在战略核力量来说，"足够性"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允许不受惩罚地发动核进攻；在常规武器来说，"足够性"就是能够有效地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武装力量和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亚佐夫说："军事战略均势仍然是目前防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华约国家并不想取得军事优势，但是也不允许有超越自己的军事优势"[2]。1985 年 4 月，华沙条约国家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首脑会议，签署了使华沙条约延长 20 年的议定书。1989 年，东欧形势发生剧变。不久，苏联国内局势也日趋混乱。1991 年 2 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在布达佩斯召开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级政治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签署了在 3 月 31 日前中止华约军事协定效力和废除华约军事机构的议定书。华沙条约组织作为军事集团于 1955 年 5 月正式成立。其间，阿尔巴尼亚于 1968 年 9 月正式退出，民主德国也已于 1990 年 9 月正式退出，早已残缺不全了。至此，它的实际活动与效力也结束了。

波兰是苏联的西部重要邻国，也是苏联在东欧的重要盟国。可是，两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积怨。从近代历史来看，俄国曾是三次瓜分波兰的主角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1939 年 9 月，就在波兰遭德国法西斯的闪电战打击、危在旦夕时，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规定，大举攻入波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甚至侮辱性地称波兰为"凡尔赛条约的畸形儿"。苏联通过此举，占领了波兰的西白俄罗斯和

---

[1] 《改革与新思维》第 210—212 页。
[2] 见《真理报》1987 年 7 月 27 日。

西乌克兰，波兰实际上是第四次被瓜分。历史上的种种因素，使得“摆脱苏联”倾向成为波兰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在处理和波兰的关系上，谨慎地承认一些历史问题，想从民族情绪上消除对立，弥合两国感情的鸿沟。

1985年4月27日，戈尔巴乔夫在出席华沙条约国家首脑会议后，在华沙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会晤，讨论了苏波两国在经济、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合作问题。由于波兰方面的坚持，双方还认为“有必要解释苏波关系中的若干问题。”

1987年4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莫斯科，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苏波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宣言说：“苏波两党极为重视研究我们两国、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历史，不能让其存在任何‘空白点’。（两国历史上）所有事情，包括那些悲剧性事件，都应当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根据现有的认识，作出客观而明确的解释”①。根据这个宣言，苏波两国成立了由两国历史学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重新审查被认为是苏波关系史上“空白点”的问题。

被双方联合委员会确定为历史“空白点”的有：1919—1921年的苏波战争问题；波兰共产党的被解散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附加议定书”问题；放逐和遣返波兰人问题；1944年8月华沙起义问题；卡廷森林大屠杀问题等6大问题，其中以第3、6两个问题更引起波兰的激愤。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波兰事实上的再瓜分，为波兰所深恶痛绝。在1939年9月的战争中，约20万波兰官兵落入苏军手中，其中一部分被关

① 转引自《今日苏联东欧》1989年第5期第11页。

押在科泽尔斯克、斯塔洛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三个集中营里。1943年，德国在卡廷附近的森林中发现了一个万人坑，坑内埋着 4143 具被关押在 科泽尔 斯克集中营的波兰男性官兵尸体。受害者都被反绑双手，被近距离内从脑后洞穿。

卡廷森林万人坑被发现后，德国和苏联曾互相指责对方制造大屠杀。现在已有足够的材料证明，这是苏联所为。波兰认为，还有十几万在苏的波兰人，至今下落不明。

1989年12月 24 日，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进行政治和法律评价的决议。决议说：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违背苏联对外政策原则。这一决议可以看作是苏联正式承认秘密附加议定书的实在性，自己出面来消除这一历史“空白点”。

同年12月2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波兰国名和国徽，国名：波兰共和国；国徽：红色天幕下的白鹰，加上皇冠。1990年 4 月，波兰共和国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就双边关系问题和国际问题举行会谈。双方签署的《苏波宣言》表示，相互尊重平等、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社会政治的自由选择，是苏波关系的基础。就在这次会谈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说：“查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关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波兰军官的死亡情况，具有特别的道德意义。”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可以看作是半遮半掩地承认卡廷森林大屠杀事件，并示意愿以实际工作来消除这一历史“空白点”。

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由于 1968 年入侵事件而蒙受巨大创伤，并且影响到华沙条约各国间的关系。1989年 11 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阿达麦茨指出，应当重新评价1968年

苏联等5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出兵问题，尽快同5国政府从政治方面解决这一问题。12月3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表声明，1968年华沙条约5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破坏了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准则。第二天，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5个当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宣布1968年他们的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这一行动应受到谴责。"此外，苏联政府还单独发表声明，承认"当时作出出兵的决定是错误的"。1990年5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杜布切克时再次表示：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是没有根据的，这对苏联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一直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温和关系。1986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访苏，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声称，每个党独立制订自己的政治路线，进行平等对话，消除某政党对真理的垄断，是发展合作的重要前提。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两国重申继续遵循1955年贝尔格莱德宣言和1956年铁托访苏时发表的莫斯科声明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在访问期间，戈尔巴乔夫承认：1948年苏联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攻击，给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事业都造成损失。

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的一个特殊国家，是1968年谴责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华约组织唯一国家，苏、罗两国关系微妙。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竭力让这种微妙的关系明朗化。

1988年10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表示：苏联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传统和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苏罗两国之间有点小磨擦。"齐奥塞斯库在会上说："应当时刻想到各国进行革命过程的条件是不同的。罗苏两国并非一切都

那么理想，但存在合作的传统。"经过会谈，双方表示要在完全平等、独立、不干涉内政、国际主义团结，以及各党有权自主地确立自己的政治路线、革命战略、策略的基础上，发展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广泛合作。

1989年12月的最后一周里，罗马尼亚局势剧变。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在仓皇出逃的途中被军队抓获。次日，以扬·伊利埃斯库为主席的救国阵线委员会成立，宣布解散齐奥塞斯库的所有政权机构，释放全部政治犯，改国名为罗马尼亚共和国。12月25日，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认定齐奥塞斯库夫妇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还在12月23日，苏联政府就罗马尼亚局势发表声明，支持救国阵线委员会。1990年1月3日，苏联外交部新闻局局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罗马尼亚事件中，苏联没有干涉该国的内部事务，这再次证明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性方针。1月6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罗马尼亚。苏联重申声援罗马尼亚人民实现自由、独立和民族尊严的理想，支持救国阵线委员会为消除独裁政权后果和形成民主权力结构而作出的努力。

苏中关系正常化

60年代中期起，苏中关系破裂。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在世界上处境孤立。1979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更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谴责。在这样的形势下，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曾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当时中国方面提出：苏联应当消除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即：苏联应当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解除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勃列日涅夫借口"不应有前提条件"，不愿消除"三大障碍"，一度举行的苏中副外长级谈判也告中断。

苏中关系仍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

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就表示，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改善。苏联对华行动的转机是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威讲话。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视察远东地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就苏联的远东政策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主要内容是关于苏中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在肯定当前国际发展中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说：目前正在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6年底，将有6个团苏军从阿富汗撤退回国。戈尔巴乔夫希望：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西方评论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想以从蒙古和阿富汗部分撤军，"消除中国提出的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两大障碍。"

紧接着戈尔巴乔夫的讲话，9月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塔雷津，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塔雷津是自1969年以来访华的最高级别苏联官员。塔雷津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就两国的贸易、经济问题，以及改善政治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签订了有关协议。塔雷津回国后，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接着召开例会，讨论塔雷津访华结果。政治局会议强调：苏联将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使苏中关系具有持久睦邻的性质。

苏中经济贸易在两国关系中历来占据重要位置，成为反映两国政治关系的水银柱。1950年，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59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18.49亿卢布，为两国贸易史的最高峰。1970年降为4.190万卢布，为两国贸易以来的最低点。1984年为9.778亿卢布，1986年上升到18.22亿卢布，接近历史上的最高

点[1]。两国贸易额的回升，反映了双边关系的缓和与改善。

1988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中苏两国外长就两国关系和柬埔寨问题进行了会谈，这是为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后一个障碍所作的努力。双方认为两国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两国重申愿意促进尽快公正合理地解决有关柬埔寨的问题。1989年新年伊始，苏联外交部就解决柬埔寨问题发表声明。声明说：1月6日，柬埔寨和越南最高领导人在金边举行的庆祝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集会上说，为了加速解决柬埔寨问题，两国商定在达成政治解决的条件下，越南志愿人员在1989年9月之前全部撤出柬埔寨。苏联欢迎并完全支持这一新的重要行动。苏联认为这一行动顺应了政治解决地区冲突这一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

这样，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得以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铺平了。

1989年2月2—4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正式访问中国。中苏两国外长举行会谈，讨论了中苏首脑会晤的实际准备工作。双方商定，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定于5月中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邓小平说："结束过去，放眼未来，这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谢瓦尔德纳泽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我们两国普遍形成的对话与合作气氛，和平与发展的利益，都日益迫切要求我们面向未来。"[2]

1989年5月15—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鹏同戈尔巴乔夫分

---

① 统计数字引自《国际资料信息》，《苏联问题专辑》第89页，1990年4月。
② 《人民日报》1989年2月5日。

别举行会谈和会见。

5月16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就中苏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回顾了近代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回顾了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在过去的曲折历程，说：关键是国家与国家要平等。中国不会侵略别国，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中国比较穷，但坚持独立自主。戈尔巴乔夫说，对以前双方关系恶化的历史，苏联认为自己方面也有过错。至于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很复杂，尽管邓主席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但苏联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两位领导人都表示：过去的事过去了，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多做实事①。

5月18日，中苏两国就这次首脑会晤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公报内容分为18条，涉及中苏两国关系和各种国际问题，其突出意义是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同时，确立了今后两国关系的新原则。

第一、两国关系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过去只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兄弟般的互助与合作"，这一原则往往被曲解，且不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邓小平在总结了战后国际关系的经验之后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形式。其他形式，如'大家庭'方式、'政治集团'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② 这次中苏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中国方面就强调，今后两国的关系和50年代中苏的结盟关系不同，因为这种结盟关系不符合中苏人民的长远利益。戈尔巴乔夫也说：今

---

① 见《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5页，1984年12月人民出版社。

后的苏中关系不是回到50年代的结盟关系，也不是60、70年代的对峙关系。对此，联合公报第3条说："双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这表明中苏两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

第二、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为了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中苏两国不仅是相邻的两个大国，而且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线。联合公报第6条说："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作出努力。"由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因此，"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

第三、确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增进彼此接触与交往。联合公报说："双方一致认为，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国家关系正常化，也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20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共产主义运动追求"一个中心"，或者形成"多中心"，都会制造党际矛盾，阻碍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联合公报第10条说："中苏双方同意，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这样，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

1991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访问苏联，受到苏联的最高外交礼遇。中苏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在建立友好睦邻关系方面又跨出坚实的一步。

阿富汗撤军

最终实现从阿富汗撤军，是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对外关系的又一重要行动。

1979年底，苏军集结10个师的兵力，大举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原来各派力量频繁的流血军事政变，演变成阿富汗游击队与苏军入侵者之间的民族战争。在阿富汗战争中，苏联耗资200多亿美元，苏军死伤近5万①，阿富汗战争成了苏联日夜不停的"流血的伤口"。

由于入侵阿富汗，苏联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以超过10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决议，苏联为此而承受巨大外交压力。阿富汗战争既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之一，又影响苏联与美国的对话与缓和。由于入侵阿富汗，苏联又和巴基斯坦交恶。推进到阿、巴边境的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经常炮击巴基斯坦的边境村镇，甚至越界侵犯巴基斯坦领土和领空。在几年里，约有300万阿富汗难民逃到巴基斯坦境内，给巴基斯坦平添很大负担。巴基斯坦政府因而坚决反对苏联的行径，全力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游击队的抗苏战争。

苏军入侵阿富汗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换来的仅是苏军推进到阿富汗全境，控制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建立了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阿富汗人民党政权。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的战略目标，即希图建立威逼波斯湾的前进基地来说，没有实际作用。戈尔巴乔夫环顾国内外形势，在"新思维"的总构想下，作出撤军的选择。

---

① 1988年5月25日，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宣布：在阿富汗战争中，苏军死亡13310人，伤35478人，失踪311人。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改变了对阿富汗的政策。1986年5月，以纳吉布拉取代卡尔迈勒，任人民党总书记。纳吉布拉上台后，一再表示愿意实现“民族和解”。苏联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称呼从“反革命匪帮”改为“政治力量”；从对之实行军事剿灭改为允诺其参加政府，表示要尽力促成“政治解决”。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威讲话中，提出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的打算：年底之前撤回6个团(约8千人)的兵力。1988年4月14日，阿富汗纳吉布拉政府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由苏美两国予以保证的解决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议。5月15日，苏联和阿富汗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日内瓦协议，苏军从今天开始撤离阿富汗，撤军将在9个月内完成。

苏军终于全部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在9年的战乱中，全国约有一半人口离乡背井，沦为难民；100万人丧失生命，伤残者就更多了。至于生产破坏，田园荒芜，建筑物变成废墟，以及民族内部的分裂，损失更难以计算。所有这些，都是苏军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严重后果。

1989年2月15日，苏联政府就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发表声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已经结束，这一行动完全符合日内瓦协议。3月22日，苏联《消息报》刊登谢瓦尔德纳泽对该报记者的谈话：“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是国家几位高级领导人关起门来作出的，这一决定极其粗暴地违犯了党和国家的道德准则。当时，如果有各部门懂业务的专门人员参加研究的话，就能得出结论：阿富汗问题是不能用军事办法解决的。”

第二十八章　苏联民族危机的加剧 苏联的解体

第一节　日趋激化的民族矛盾

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沿革

1922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各民族共和国的疆域不断进行了调整。1924年，俄罗斯联邦把一部分地区划给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因而增加了一倍。1924年10月，成立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归属乌克兰共和国。1924—1925年间，中亚各苏维埃共和国重新划分民族国界，分别成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属乌兹别克共和国），至1929年10月，塔吉克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并于同年12月加入苏联。1936年12月，外高加索联邦解散，其所属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个共和国直接加入苏联。同时加入苏联的还有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在1936年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联共有11个加盟共和国。在此以前，苏联与周边国家的边界没有什么变动，仅限于联盟内各共和国之间进行领土调整。

1939—1940年间，根据苏德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所附秘密协定书，苏联着手建立横贯自波罗的海至黑海的“东方战

线”。先后将所占领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划入苏联版图，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共和国，西白俄罗斯并入白俄罗斯共和国。苏芬战争后，把原属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连同维堡城划入苏联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苏联边境线向西北推移了150公里，随后，成立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并加入苏联。1940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又分别作为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同年，根据苏联政府的要求，罗马尼亚王国政府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割让给苏联。比萨拉比亚大部分地区归属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不久该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划归乌克兰。至此，苏联拥有16个加盟共和国，增加约1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肯定了战前苏联所获得的土地，略有一些小的调整。至此，苏联版图定形。

苏联成立后几十年来，在发展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潜藏着一些民族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经济发展不平衡。苏联幅员广阔，横跨欧亚两大洲，人口、资源分布很不平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例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原先发展水平较高，居民生活水平在加入苏联前与瑞典、芬兰相近，二次大战后却不断拉开了距离，因此，三国居民普遍感到并入联盟“吃亏”了。乌克兰资源丰富，文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较高，但联盟中央常无偿调拨其人力物力到其他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自身经济的发展。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亚各国，几十年来经济文化有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那里的人民也埋怨联盟未能帮助他们迅速改变落后面

貌。

第二，在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存在重大失误。波罗的海三国就其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来看，更接近于北欧诸国。1940年并入苏联后，对三国居民中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实行高压政策，并大量向三国移民，推行俄语，缩小其民族特征。本来，加入苏联就带有被迫的性质，对苏联的上述做法更存有芥蒂。乌克兰与俄罗斯虽同属斯拉夫民族，但苏联建立后也出现过对乌克兰的不公正待遇，如减少乌克兰语的教育和乌克兰文书籍的出版，向乌克兰派遣大批非乌克兰族干部。30年代初农业集体化的过激政策带来的巨大损失的阴影一直萦绕在乌克兰人民心际。又如二次大战前后，以"预防措施"为由撤销伏尔加日耳曼自治共和国和其他日耳曼自治区，将大约 78 万日耳曼人迁至远东地区；某些少数民族中有人叛国投敌，却惩罚整个民族，1943年撤销卡拉恰耶夫自治州、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1944年撤销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并将这些民族的数十万人民强制赶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迁徙到中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这些事件严重伤害了这些民族的感情。50年代后，苏联政府虽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但创伤仍然潜藏着。

第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对立和隔阂。沙皇政府几百年来一贯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对立情绪根深蒂固。十月革命后，列宁大力提倡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方针，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后来的领导人往往陶醉于社会主义下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矛盾"，既掩盖了民族工作中的失误，又对各民族在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于是在一定条件下又会产生强烈的离心倾向。加上各民族国家族际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各

种领土、宗教、社会等方面的矛盾和纠纷，在适当的条件下也会变成突出的民族纷争。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初，对国内民族问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承袭着前几届领导人对民族问题所持的盲目乐观态度。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成的。”可是，随着改革的开展，在公开性、民主化等口号的推动下，引发了原先潜藏着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演变成为一股要求民族分立的浪潮。

纳—卡州问题

剧烈的民族纠纷最早在南高加索的纳戈尔诺—戈拉巴赫州地区(以下简称纳—卡州)爆发。纳—卡州位于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领土较为接近，但并不接壤。该州面积为4400平方公里，人口约18万，其中80%是亚美尼亚人。

从历史上看，纳—卡州的领土归属问题，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就产生过不少纠葛。1918—1920年间，该地区尚属旧政权统治下，阿、亚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单在卡拉巴赫地区就有1/5的居民被杀害。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该州属亚美尼亚管辖。苏联成立后，1923年7月起正式划归阿塞拜疆管辖，成为阿塞拜疆的一个自治州。对此，亚美尼亚人一直表示不满，要求纠正，但这一要求始终未予认可。阿塞拜疆在该州长期奉行歧视亚美尼亚人的政策，对该地区建设投资少，发展缓慢，该州领导人均需由阿塞拜疆人担任，这些因素使两个民族之间积怨日深。此外，阿塞拜疆人信奉伊斯兰教，亚美尼亚人信仰基督教，宗教信仰不同也加深了两民族的隔阂和对立。居住在纳—卡州的亚美尼亚

人常受到来自亚美尼亚的支持，阿塞拜疆对此极端不满。于是，纳—卡州遂成为双方摩擦的发源地。

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号后，纳—卡州的亚美尼亚人开始活跃起来，从1987年下半年起，他们以不同方式活动，呼吁苏联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把纳—卡州划归亚美尼亚管辖。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之间的族际关系也因此紧张起来。1988年2月，苏共中央表示，不赞同更改现有民族地区布局的任何做法，认为这样做将“有损于民族之间的关系”。消息传到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20万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共和国议会就纳—卡州问题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几天以后，2月28日，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举行针对亚美尼亚的示威，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发生流血冲突，该市宣布实行宵禁。

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两民族间矛盾日趋严重的情况下，3月，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讨论该地区局势，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族际关系方面存在缺点是导致人们上街示威的主要原因，但不能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施加压力来解决民族问题，对双方冲突中有犯罪行为的人必须进行追究。阿塞拜疆当局对一名杀害亚美尼亚人的阿族青年判刑15年，亚美尼亚人认为处罚过轻。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和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分别出现群众示威，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6月，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党政领导机关开始直接介入纳—卡州的民族纠纷。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同意将纳—卡州划归本国，呼吁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这个问题。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也召开会议，坚决反对纳—卡州脱离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纳—卡州首府斯捷潘纳克特举行罢工，使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陷于瘫痪。

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重申纳—卡州归属阿塞拜

疆，但要求阿塞拜疆必须保障纳—卡州得到真正的自治。亚美尼亚人对此决定不满，在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无望的情况下，两族居民之间开始发生大规模的械斗，互相破坏对方的工业设施乃至居民的住宅、汽车。不久，冲突不断升级，一些地方响起了枪声，发生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下令在纳—卡州首府斯捷潘纳克特等地实行紧急状态法，但混乱状况没有缓解。12月7日，亚美尼亚山区发生10.7度的强烈地震，造成2.5万人死亡，50多万人无家可归，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本来被民族纠纷搞得疲惫不堪的亚美尼亚几乎陷于绝境。

1989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在纳—卡州临时实行特殊管理形式，组成纳—卡自治州特别管制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隶属于苏联最高权力机关，对纳—卡州实行特别管理。围绕纳—卡州的民族纠纷暂告平息。

这一年，苏联国内出现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波罗的海三国掀起独立浪潮，许多地方的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在这种背景下，南高加索的民族纷争随时可以重新爆发。9月，阿塞拜疆新巴库炼油厂举行大罢工，要求将有争议的纳—卡州还给阿塞拜疆管辖。这次罢工行动是由阿塞拜疆非官方组织人民阵线发动的，它得到巴库许多大型企业的响应。罢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仅第一天损失就达800万卢布。在此情势下，纳—卡州的民族冲突再起，警方被迫动用武器来控制局势。12月初，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又通过决议，要将纳—卡州并入本国；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则通过决议，强行在纳—卡州实行管制。这一切，预示着两个民族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1990年1月13日晚，巴库市中心广场15万阿塞拜疆人集会，会上有消息说，亚美尼亚人袭击了纳—卡州的一个阿塞拜疆

人村庄，并有人员伤亡。这则未经证实的消息使会场沸腾起来，有人呼吁将所有亚美尼亚人赶出巴库市。阿、亚两国原是近邻，在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原有20万人，两国关系紧张后已大量减少，尚剩数千人。会议尚未结束，一批全副武装的阿塞拜疆人就带着当地亚美尼亚居民的名单和住址，袭击他们的住宅，抢砸财物，杀死数十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次日，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30 万人集会，会上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报复，决定成立"特别自卫委员会"，实行全国总动员。与此同时，两国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本国所拥有的常规武器、装甲车、直升飞机、直至地对空火箭，局势骤然恶化。两国一些极端分子乘机煽动，要求领导人辞职，有的甚至提出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口号。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开会讨论纳—卡州局势，通过了《关于宣布纳—卡自治州和其他某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命令说，由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两国领导人的行动不够坚决，使紧张局势继续升级，已经发展到杀人、抢劫，企图推翻政权，用暴力改变国家和社会制度。命令宣布派军队前往该地区，维护社会秩序。为了执行上述命令，立即调去6000名内卫部队，另派5000名军队协助内卫部队。

新一轮的阿、亚两族冲突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短短几天内，已有72人死亡，100多人被拘留。阿塞拜疆一些极端分子袭击居民住宅、政府机关，他们抢夺武器，企图阻止苏军进入该地区，巴库市秩序混乱，共和国电视台被炸，电视节目中断。有人在会上煽动要阿塞拜疆退出苏联，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1月 19 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发表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呼吁书，呼吁在两国制止敌视、胡作非为和暴力，不能允许犯罪活动不受制裁，任何人

都无权利用民族感情，煽动人们盲目地仇恨和丧失理智。呼吁书说："无论如何要停止敌对行为和使用暴力，如不制止今天的悲剧，就会酿成明天的民族大灾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宣布从1月20日起在巴库市实行紧急状态。20日凌晨，苏军坦克从北路开进巴库，直驱市中心。苏军进驻后，局势得以控制，但问题仍未解决。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开会通过决议，谴责联盟中央派兵是一种"侵略行为"，并声言，如不立即撤兵，将对今后的联盟关系发生影响。为防止阿、亚两国边界武装冲突的加剧，苏联内务部、国防部在两国边境采取行动，解散了双方一些武装集团并缴获大量武器。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浪潮

正当南高加索的民族纷争不断激化的时候，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正酝酿着一股要求民族独立的浪潮。

1988年4月，爱沙尼亚成立了第一个非党大型政治组织——人民阵线，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其成员已发展到4万人。这个组织打的旗号是拥护和支持改革，反对保守，反对斯大林主义。在爱沙尼亚影响下，10月，拉脱维亚成立人民阵线。该阵线明确提出，要使拉脱维亚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包括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与其他国家建立独立关系，控制移民和出国旅行等权利。同月，"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萨尤季斯"）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了该组织的纲领和章程。纲领规定"萨尤季斯"为独立的公民运动，运动的目标是争取立陶宛的国家、经济和文化的主权。上述三国非官方政治团体的建立，成为推动这些国家独立运动的骨干力量。此后许多活动，都是在人民阵线的组织推动下开展的。

8月23日，三国首都及其他一些地方，普遍举行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抗议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1日，爱沙尼亚首都30万人集会，要求爱沙尼亚独立。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参加了集会，这一举动表明，党的领导人对迄今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表示默许和支持。

在群众推动下，三国领导人的自主倾向也日益明显。10月，立陶宛部长会议撤销了它在1949年3月通过的《关于将富农分子驱逐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境的决议》和1951年9月通过的《关于富农及其家属强制迁出立陶宛的决议》，并为因这两个决议而被流放的人恢复名誉。11—12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在两次会议上通过决议，申明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停止使用苏联的立法文件，有权否决苏联通过的法律，同时决定以爱沙尼亚语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在民间和官方的相互推动下，一股民族独立的潮流在暗暗地汇流着。1989年8月23日，正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潮流要借机表现自己的力量，经过周密的准备，这一天，三国都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200万人跨越国界，手拉手组成600多公里的人链，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导致三国并入苏联的苏德条约的抗议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与此同时，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1939年的苏德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40年立陶宛国民议会关于立陶宛加入苏联的宣言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接受立陶宛加入苏联的法律也是非法的。

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十分敏感。8月26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认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声明不是偶然的个别事件，它与三国某些势力近几个月来越来越顽固地实行分立主义路线直接有关。声明谴责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极

端主义分子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推行其反社会主义和反苏主义的阴谋。声明的语气相当强硬，中央的领导人意识到，决不能放任这股独立的潮流，否则后果难以设想。9月13日，戈尔巴乔夫亲自召见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到莫斯科会晤。在会晤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三个原则："第一，我们所有问题只有在联邦范围内，通过共同努力方能得到解决。第二，我们党的统一，党是改革和民族复兴进程的基本保证。第三，各民族公民权利平等。"戈尔巴乔夫强调说，如果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离出去，整个国家将倒退十年。

在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的浪潮中，立陶宛的独立倾向尤为突出。鉴于立陶宛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非常代表大会讨论民族独立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特地于12月2日发出《致立陶宛共产党员的呼吁书》，呼吁书号召维护全党团结，反对分裂，并指出，如果把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立陶宛的真正发展以及它的经济、文化的真实发展情况一笔勾销，其后果是无法设想的。

12月19—22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在维尔纽斯召开。会上有人主张立陶宛共产党独立，脱离苏共；有人主张在党内进行革新；大会最后通过了《立陶宛共产党独立宣言》、《关于立陶宛共产党地位的决定》等文件。得悉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的有关消息和文件后，苏共中央立即举行非例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强调说，这些文件超出了党内关系范围，是对改革的打击。然而，此时，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已经无法左右立陶宛共产党人的行动。由于得到立共中央的支持，从1990年初开始，立陶宛的独立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年初，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萨尤季斯"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胜。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新选举产生

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独立的立陶宛的法令，改国名为立陶宛共和国，废除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宪法和苏联宪法在立陶宛领土上的效力。59岁的"萨尤季斯"领导人兰茨贝吉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对此，联盟中央立即作出反应。3月12—15日，苏联召开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定，宣布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的立陶宛独立的文件是无效的。19日，立陶宛领导人致信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人代会有关立陶宛问题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立陶宛的人权应由立陶宛共和国的法律来保障。

联盟中央和立陶宛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联盟中央从多方面对立陶宛施加压力。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凡在立陶宛境内的所有联盟所属的设施全部归苏联所有，不允许某些主管部门擅自将其所属企业移交给立陶宛；要求立陶宛遵守苏联宪法和保障立陶宛境内的苏联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不准立陶宛成立"自卫队"，等等。面对来自联盟中央的压力，立陶宛不甘示弱，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民族独立情绪日趋高涨。3月24日，约100辆苏军坦克和军车开进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立陶宛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立陶宛的独立运动，阻止可能对立陶宛采取的武力行动。苏联方面则认为这是解决本国内部关系问题，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苏联外交部要求外国外交官立即离开立陶宛，不许外国记者去立陶宛采访。事态继续恶化。4月，联盟中央进一步采取行动。苏联政府下令停止对立陶宛的石油供应，削减天然气的供应。不久，又扩大到食品、金属、木材、工业配件的禁运，克格勃和边防军加强对国境线的巡逻，加强对海上船只、过境人员、运输货物的检查监督。立陶宛是个小国，并入苏联半个世纪来已同联盟各国经济上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经济制裁的措施立即在立陶宛引

起严重的困难和混乱。立陶宛承受不了苏联巨大的经济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经过一系列的周旋，联盟中央和立陶宛双方同意举行谈判。6月16日，立陶宛政府宣布暂停执行关于恢复共和国的独立法。随后，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在谈判期间暂停执行关于共和国独立的文件。6月30日，苏联政府恢复对立陶宛的石油供应。立陶宛的独立运动遂告一段落。

正当立陶宛独立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两国也采取许多相应的行动。两国共产党分别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将共和国党组织独立，脱离与苏共的关系。在拉脱维亚党代表大会上，250名代表因不同意上述决议而退出了大会。

为防止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采取立陶宛那样的激进立场，戈尔巴乔夫专门约见两国领导人并允诺，两个共和国如果留在苏联，它们将享有特殊的地位。在立陶宛的独立运动中，两国领导人也看到来自联盟中央的巨大压力，所以他们在推进独立运动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做法。

5月初，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分别改换国名，将加盟共和国改为独立的共和国，爱沙尼亚还将国旗改为兰黑白三色旗。不久，波罗的海三国首脑在塔林会晤，签订了三国合作宣言，强调在独立运动中相互支持和合作。在立陶宛局势暂告平静以后，三国领导人就要求苏军撤出该地区、签订新联盟条约等问题上进行磋商和协调步伐。

其他地区的民族纷争

纳—卡州的枪声，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浪潮，很快在苏联其他共和国和一些地区引起反响。

1989年4月，南高加索另一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发

生了群众性的骚乱。几天来，首都第比利斯经常举行群众集会，讨论民族独立问题。4月8日深夜，在一部分人的煽动下，群众情绪激昂起来，要求取消格鲁吉亚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共和国临时政府，退出苏联。政府派军警驱散了集会，一些人就用石块、木棍和其他器械同前来执行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16人死亡，75名军警受伤。当天，第比利斯市实行宵禁。

鉴于格鲁吉亚的局势严重，戈尔巴乔夫发表致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损害了国家改革、民主化和革新的利益。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共和国紧张局势的增长。错误的方针使一部分人走入迷途，出现了骚乱，死了人，流了无辜的血。呼吁书还指出，格鲁吉亚同其他共和国一样，同全国一样，存在着不少复杂问题，需要做不少工作，然而，"劳动人民的利益同下列企图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割断我们各族人民业已形成的友好和合作联系，消灭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它推向民族敌对的深渊。"戈尔巴乔夫还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格鲁吉亚人)前往第比利斯参加14日召开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全会。谢瓦尔德纳泽在全会上批评了当地党组织不善于同人们对话，自行其是，脱离群众，因而产生矛盾和对立。他还认为，出动军队是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

几个月后，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又发生民族冲突。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所属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居民中阿布哈兹族9.4万人，格鲁吉亚族24万人)。7月15—16日，该地为建立第比利斯大学分校问题，两族之间发生分歧和剧烈冲突，冲突中酿成13人死亡，200人受伤。

1990年，苏联的民族问题急剧增加，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要求更多的自主权、自治权，有的则宣布独立，民族

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时有发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

2月12日，塔吉克首府杜尚别发生大规模骚乱，大批群众在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大厦前集会，抗议在塔吉克为逃出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安排工作和住所。集会群众试图冲击中央大厦，内务部队鸣枪警告，并用水龙和警棍驱散集会群众，拘留了一些人，并宣布在该地实行宵禁。

6月3—4日，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州发生针对当地麦斯赫基土耳其族居民的骚乱，数百名青年人砸商店，烧住房，袭击民警。此时，苏联正在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事件发生后，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内务部长赶赴费尔干纳处理这一事件，并宣布该地区实行宵禁。

在乌克兰，民族独立的潮流也开始涌动。7月16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宣言称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是：共和国在其领域内的权力是居统治地位的、自主的、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在对外交往中也是独立和平等的。宣言还说，乌克兰有权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内卫部队和国家安全机关。同时，它又庄严宣告：乌克兰有意在将来成为一个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永久中立国，恪守三项原则：不生产、不扩散和不使用核武器。9月8—10日，乌克兰争取改革人民运动在基辅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有人高呼反共、反社会主义口号，要求脱离苏联，实现乌克兰独立。由于乌克兰在苏联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国家的独立运动不能不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6月初，居住在吉尔吉斯奥什州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居民发生民族冲突。当局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鉴于这一冲突可能升级为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冲突，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内务部队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10月下旬，摩尔多瓦出现紧张局势，一部分人要求摩尔多瓦脱离苏联，与罗马尼亚合并。连日发生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当局宣布在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

继波罗的海三国之后，199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言说，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同年 6 月至 12 月，苏联境内有 9 个共和国分别发表主权宣言，它们是：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是联盟中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大国，在其领土上还部署核武器基地，所以，哈萨克共和国的主权宣言宣布，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权的至高无上，哈萨克的全部领土在现有疆界内不可分割和不可侵犯，土地和各种资源都是共和国的财产。宣言强调，在哈萨克的领土上禁止试验核武器，禁止修建和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试验场地。宣言还指出，这个宣言将成为缔结联盟条约，制订本国宪法的基础。

第二节 新联盟条约的提出和波折

建立新联盟的构想

面对苏联国内接连不断、此起彼伏的民族矛盾和独立浪潮，联盟中央越来越陷入被动的境地，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这一切，标志着按从前的老办法去解决民族问题已经行不通了。

1990 年 6 月，戈尔巴乔夫在联邦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改革旧

的联盟制度，建立新的"主权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构想，其宗旨是使各共和国获得更多的主权。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苏共的"纲领性声明"和党的章程，关于民族关系，文件强调要"走向主权共和国的革新联盟"。戈尔巴乔夫认为，签订新联盟条约应成为解决族际关系问题的转折点。此后，联盟中央同各共和国代表开始磋商新联盟条约草案（波罗的海三国未参加）。9月25日，成立了包括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民族院主席、各共和国负责人在内的筹备委员会，起草新联盟条约。

经过近半年的酝酿，11月23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供全民讨论。其主要内容是：1．苏联是由各共和国自愿联合而成的"主权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联盟成员国是各主权共和国，每一共和国在自己境内拥有全部国家权力。2．联盟的权力是"通过、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保卫联盟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定和保卫苏联国家边界"、"保卫苏联国家安全"。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创造发展全联盟市场的条件将由苏联和各共和国确定。3．规定最高苏维埃是全联盟最高立法机关，总统作为国家元首领导联盟，设立总统领导下包括副总统、各共和国元首组成的联邦委员会，在总统和最高苏维埃协调一致的情况下组成内阁。

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后，各加盟共和国反应不一。有的共和国（如中亚各国）由于历史的地理环境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脱离联盟对它们的发展更为不利，所以它们表示支持建立以这一草案为基础的联盟。有的共和国（如摩尔多瓦）由于地处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边界争议地区，它们主张建立一个松散的邦联。波罗的海三国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它们将不签署任何联盟条约，格鲁吉亚也表示将不签署新联盟条约。俄罗斯是苏联的基础和核心，它虽然表示赞成建立新的联盟，也提出许多保留

条件，如要求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要建立诚实平等对话的基础，不能由“克里姆林宫发号施令”办事等。此外，俄罗斯还热衷于同其他共和国进行双边谈判和签订双边条约，对新联盟条约则采取冷淡态度。

12月17—27日，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措施的报告，讨论新联盟条约的构想及其通过的方式，讨论和通过苏联宪法的某些修改和其他一系列法律草案。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强调不允许将联盟变成无组织实体，更不允许联盟解体。他呼吁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他建议在全国进行公民投票，让每一个公民都表态，是否赞成在联邦制基础上建立主权国家联盟。会上就联盟条约和签署的程序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大会就联盟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问题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1657票赞成苏联作为主权、平等的共和国联邦继续存在，20票反对，61票弃权。大会就国家名称问题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1365票主张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原国名，189票反对，170票弃权。大会又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基本构想及其签订程序的决定，决定举行全民投票来确定是否保留各共和国之间的联盟。

立陶宛纷争再起

当1991年来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新年祝词中提出，苏联当前“迫切需要经济和政治形势的稳定”，维护和更新苏维埃联盟。可是，从1月上旬开始，新一轮的民族动乱和纷争又出现了。

在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1月7日，立陶宛政府决定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消息一公布，次日清晨，维尔纽斯几

千名居民就聚集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厦附近举行示威，抗议食品价格上涨。示威者主要是当地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他们同立陶宛当局派来维持秩序的人发生冲突。示威者砸开了议会大厦的大门，冲进大厦，不久又被从那里赶了出来，当局动用了高压水龙对付示威者。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吉斯认为，示威有造成骚乱的危险，并断言示威者中有不少是打扮成平民的军人，因此，他呼吁“萨尤季斯”和立陶宛居民前往议会大厦“保护自己的政权”。这样，示威者又同反示威者发生了冲突，形势十分尖锐。

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呼吁书，呼吁书认为立陶宛今天的局势“追根溯源是由于粗暴地践踏和违反苏联宪法和立陶宛宪法造成的”，他要求“立即恢复宪法的法律效力，取缔以前通过的反宪法文件”。这一呼吁书的针对性是很清楚的。因此，兰茨贝吉斯立即作出反应，他称苏联总统的呼吁书是“最后通牒”，是“蛊惑煽动”。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拉·尼沙诺夫和副主席鲍·奥列伊尼克受戈尔巴乔夫的委托，会见了立陶宛社会民主组织的一批代表。尼沙诺夫等提请人们注意：在立陶宛，官方政权大量有目的的、实质上旨在把非立陶宛族居民从共和国排挤出去的民族沙文主义宣传，激化了立陶宛的局势。在那里，公民的基本权利被粗暴践踏，现役军人及其家属、党的老干部、退休人员和退伍人员遭贬损，苏联军人墓地被污辱，纪念碑被毁坏，这些都是严重无视苏联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谈话的倾向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联盟中央和立陶宛之间矛盾的再次表面化，进一步加剧了当地两派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立陶宛当局呼吁维尔纽斯居民前往最高苏维埃和政府大厦以及报社、电台、电视台周围聚集，“萨尤季斯”拥护者在这里昼夜值班，它还用汽车把其他地区

的立陶宛居民运往首都。另一方面，许多工业企业、机关纷纷举行群众集会，成立罢工委员会，他们要求解散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在共和国实行总统治理，要求兰茨贝吉斯交出权力。11日，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占领了苏共中央在立陶宛的出版大楼和立陶宛边疆保卫局所在地。维尔纽斯、考纳斯等地一些企业罢工，铁路和汽车运输的劳动集体罢工，民航停止共和国国内航线飞行。

在局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立陶宛救国委员会宣告成立，它在向居民发出的呼吁书中说，在当前局势下，立陶宛救国委员会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防止经济崩溃和爆发内战，认为自己首要的义务是恢复立陶宛宪法和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境内的效力。救国委员会还宣布在维尔纽斯实行宵禁。兰茨贝吉斯称立陶宛救国委员会是一个"政治破坏者的组织"，并指责苏联对立陶宛进行一场"反对小国的战争"。

13日，苏联内卫部队占领了立陶宛电视中心、电报局和财政部。在两派群众冲突中已死亡13人，112人受伤。兰茨贝吉斯宣布实行"自己的"宵禁，并宣布救国委员会的宵禁无效。当天，兰茨贝吉斯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宣布同苏联处于"进行战争状态"。

立陶宛的严重局势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和反响。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也出现反对涨价、要求现政府辞职的群众性示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则表示，俄罗斯对立陶宛事态不会无动于衷，呼吁波罗的海三国的俄罗斯人联合起来抵制镇压立陶宛。莫斯科等地反对派组织集会抗议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的行动。1月20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有20多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声援立陶宛，要求苏联总统、国防部长等辞职，要求有俄罗斯自己的总统和军队。在国外，美国、欧洲许多

国家、日本都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在立陶宛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各方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表示要通过对话来解决立陶宛所发生的冲突。此后，苏联总统特使、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其他一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些领导人分别到立陶宛进行考察和会谈，苏军方领导人也同共和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和磋商，戈尔巴乔夫也特意会见立陶宛原部长会议主席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就执行苏联宪法的问题进行会谈。1月25日，立陶宛救国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停止活动。此后，立陶宛局势有所缓和。

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关于独立问题的民意测验，结果揭晓：在享有投票权的居民中有84.43%的人参加了这次民意测验，其中90.47%的人同意立陶宛成为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独立运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全民公决前后

根据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最高苏维埃决定，于1991年3月17日在全苏就是否保存苏联问题进行全民投票，即进行全民公决。

为稳定国内局势，苏联内务部、国防部发布公告，决定从1991年2月1日起在苏联一些大城市组织民警和军人联合巡逻，以维护社会治安。2月1日，上述命令生效，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等6个共和国拒绝执行此项命令。

面对社会混乱、经济困难、政治斗争剧烈、无政府主义泛滥、民族分立的呼声高涨，联盟经受着存亡考验的严峻形势，许多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纷纷向苏联领导人发出呼吁，要求当局采取措施恢复秩序，稳定局势。为此，苏联领导人也打算采取修改

宪法，扩大总统权力；制止反军活动；加强同经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等措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强调在新联盟条约签订前必须履行苏联宪法，必须刻不容缓地恢复苏联宪法秩序。哈萨克最高苏维埃也向其他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发出呼吁，要求同心协力，尽一切可能的努力，防止联盟国家的瓦解。

3月7日，苏联联邦委员会通过新联盟条约草案，并把它作为蓝本提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根据草案，苏联是一个"主权的联邦制民主国家，由各平等共和国自愿联合组成，在条约参加国赋予它的权力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各共和国均为主权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贸易和其他联系。属于联盟权限范围的权力有：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安全，组织国防，领导武装力量和全联盟的对外政策。

全民公决前夕，联盟中央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加剧，突出地表现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和表面化。进入3月以后，莫斯科街头几乎天天出现多少不一的示威游行队伍，示威者分别支持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的纲领和主张，双方相互攻讦，但没有发生严重冲突。叶利钦在煤矿中有众多的支持者。3月，俄罗斯北部多数矿井开始罢工，除要求增加工资外，还提出要苏联总统和内阁辞职的政治要求。"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几十万人集会并通过决议，呼吁全民公决时对联盟投反对票。"俄罗斯劳动民主联盟"集会时，打出了"取缔苏共！""不要戈尔巴乔夫的联盟，要叶利钦的联盟！""叶利钦当总统，戈尔巴乔夫下台！"等标语、口号。3月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民主力量全俄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讲，批评了新联盟条约的一系列条款，指责联盟中央企图在政治方面压制俄罗斯领导人，他声称，1991年对俄罗斯民主运动的命运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应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这一讲话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真

理报》认为，叶利钦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充满了对抗的腔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鲁基扬诺夫表示，叶利钦的这一讲话是“向国家领导宣战”，对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不能不闻不问。

3月17日，苏联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投票。投票结果，全苏有1.85亿公民拥有投票权，80%的公民参加投票。其中赞成保留联盟的占76.4%，反对保留联盟的占21.7%，有1.9%的票被认为无效。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官方反对全民投票，但仍有一部分公民参加了投票。

3月28日，非例行的第三次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由于这次大会是应反对叶利钦政策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6位副主席的要求召开的，大会将决定叶利钦的政治命运，因此这次人代会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叶利钦的支持者决定在开幕当天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苏联内阁则宣布，在俄罗斯人代会期间，禁止在莫斯科举行一切群众集会和街头游行示威。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不理睬苏联内阁的决定，批准“民主俄罗斯运动”于28日在莫斯科练马场广场组织集会。27日，苏联警察开始巡逻并封锁红场，直升飞机在莫斯科上空盘旋，装甲车停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待命。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号召人们不要参加集会游行，它警告说，万一出现骚乱和冲突，其罪魁“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8日，数十万群众不顾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警告，仍然走上街头，聚集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及其他一些地方，约5万名民警和内卫部队军人上街执勤。气氛紧张，但未发生严重冲突。在会议上，斗争也十分激烈。2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人代会上作报告，关于联盟和民族关系问题，报告建议在联盟一级建立“人民信任的民族和睦联合政府”。俄共议员团批评叶利钦的目标是“获得不受任何限制的总统权力”、“走向新的独裁”，激进派代表则表示支持叶利钦报告中所有主

要观点。4月2日，由170多名议员组成的“民主共产党人”议员团宣布，全力支持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及其主席叶利钦，使大会发生有利于叶利钦的变化。5日，大会授予叶利钦近于总统的权力，并决定，将于1991年6月12日举行俄罗斯第一次总统选举。与会者原则上赞同新联盟条约草案，重申俄罗斯在近期内一定签署新联盟条约。俄罗斯非例行人代会以叶利钦获得更大的统治权力而结束。

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单独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等9个共和国领导人发表关于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联合声明，即所谓“9＋1”声明。声明共5点：1.与会者认为，稳定国内局势的必要条件是，在通过新联盟条约和联盟宪法以前，采取坚决措施，普遍恢复宪法秩序，无条件遵守现行法律。2.克服危机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全联盟全民投票结果签订各主权国家新条约。3.重申联盟机关和各共和国在1991年经济协定中确定的义务。4.在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必须采取有利于公民特别是较贫困公民的社会保护的一系列补充措施。5.考虑到特别尖锐的形势，不能容忍通过挑唆公民不服从、罢工，呼吁推翻合法国家政权机关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

此后，苏联民族矛盾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7月12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获得通过，条约文本分别提交各共和国议会讨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共和国分别表示愿意签署新联盟条约。8月15日，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正式文本。新联盟条约大大缩小了联盟的权力，扩大了各共和国的权力，强调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加入联盟的各国保留独立决定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个别国家甚至可以以邦联成员的身份留在联盟内。

在新联盟条约中，各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关于征税和财政上缴的权限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经过多次会谈和磋商，7月30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就联邦直接征税问题达成折衷方案，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将实行一级税收体制，但要把它们的部分收入上交联盟中央。双方就税收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俄罗斯签署新联盟条约开辟了道路。至此，人们普遍希望早日签署新联盟条约。经商定，新联盟条约定于8月20日起由各共和国分批签署，俄罗斯、哈萨克为第一批签字国，预计到9月份签署结束生效。在作好上述安排后，戈尔巴乔夫8月4日开始休假，原定19日返回莫斯科，20日主持签署新联盟条约的仪式。可是，震惊世界的"8.19"事变，使新联盟条约夭折了。

第三节 独联体的建立，苏联解体

"8.19"事件后民族关系的变化

"8.19"事件发生后，苏联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新的转折。联盟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权力遭到极大的削弱，各共和国的独立倾向更趋高涨。

8月20、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两国趁局势混乱之机，分别正式宣布独立，脱离苏联。紧接着，乌克兰(8月24日)、白俄罗斯(8月25日)、摩尔多瓦(8月27日)、阿塞拜疆(8月30日)、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8月31日)、塔吉克(9月9日)，亚美尼亚(9月23日)、土库曼(10月27日)、哈萨克(12月16日)先后宣布独立，唯有俄罗斯没有宣布独立。

8月24日，俄罗斯带头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在由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的命令中建议举行会谈，早日建立外交

关系，并敦促苏联总统和国际社会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此后，其他许多国家纷纷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并相继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随着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和联盟中央权力的削弱，各共和国之间的双边接触和相互间矛盾增多了，一些共和国内部的民族纷争也剧烈起来。"8.19"事件之后，俄罗斯某种程度上已经顶替了联盟中央的角色。所以，乌克兰宣布独立，对俄罗斯震动很大。8月26日，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受权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一旦联盟关系终结，俄罗斯将保留修改同其他国家边界的权利。声明还说，此观点适用于所有同俄罗斯相接壤的共和国，唯有波罗的海三国除外。这一声明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许多国家领导人纷纷对叶利钦的声明提出质问，尤其是在乌克兰，叶利钦声明给已经十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加油。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表示，"对领土主权的要求蕴含着危险"，并打电话向叶利钦质问，叶利钦答应给予解释。28日，叶利钦派副总统鲁茨科伊等前往乌克兰，经过一天会谈，发表俄乌联合公报，声明双方彼此没有领土要求，并将共同解决经济和军事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绕开联盟达成这项重要协议的事实，表明联盟的存在已经无足轻重了；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几百年来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联结在一起，预示着双方分离后必将有许多遗留问题需要解决。

"8.19"事件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趋于紧张，格鲁吉亚的国内问题也严重起来。1991年4月，格鲁吉亚宣布独立。5月，格鲁吉亚举行总统选举，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首任总统。格鲁吉亚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经济最不发达的一个，苏联经济大幅度滑坡使格鲁吉亚经济更加困难，内部族际矛盾上升。继

1989 年阿布哈兹事件之后，北部的南奥塞梯自治州于 1990 年9月宣布独立，脱离格鲁吉亚，成立南奥塞梯民主共和国。格鲁吉亚议会宣布南奥塞梯独立无效，接着又宣布撤销该自治州并派兵进驻，实行紧急状态，使这一地区的暴力流血事件频频发生。加姆萨胡尔季阿任总统后，立即面临经济、政治、民族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又发生重大的政策失误。他上台不久，便将国防、内务、外交、司法和国家安全等 5 个重要部门直接归总统领导，同时严格控制舆论工具，压制不同意见，使原先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而是更加激化了。加姆萨胡尔季阿原本以一名反共反苏人士著称，但在"8.19"事件中，他却与发动事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妥协。"8.19"事件失败后，这些情况公诸于世，给各反对党派提供了反对他的口实。叶利钦也对加姆萨胡尔季阿产生反感，给日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关系蒙上了阴影。

一个时期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连续发生反总统的群众示威。前政府总理西古阿及一些政府高级官员与反对党派合作，发动推翻总统的各种活动。9月 2 日，保安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反对派利用这一事件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指责总统违反人权和自由，搞独裁统治，并要总统立即下台。许多政党和议员也宣布支持这一要求。9月 22 日，3000 多名国民卫队倒戈，占领了国家电视台，并与忠于总统的军队发生枪战。总统在第比利斯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对格鲁吉亚的局势，美国官方和俄罗斯总统都一致指责加姆萨胡尔季阿，使加姆萨胡尔季阿处于众叛亲离、内外孤立的境地。经过一系列准备，反对派于12月 22 日发起推翻总统的最后决战，加姆萨胡尔季阿被迫流亡亚美尼亚寻求避难，但他和他的支持者仍不甘心，格鲁吉亚局势仍处于不断的动荡中。

在苏联，俄罗斯联邦也拥有许多民族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在民族独立浪潮的冲击下，其所属一些民族的独立倾向也越来越显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车臣—印古什地区要求独立而引起流血冲突事件。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地处高加索北部地区，人口 117 万人，其中车臣族人 61 万，印古什族人 13 万，其余为俄罗斯人。"8.19"事件后，部分群众开始示威集会，要求独立。9—10月，形成以杜达耶夫将军为首的反对派和当政的共和国临时最高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俄罗斯副总统前往调解未获成功，暴力行为进一步升级，10月13日，俄罗斯议会作出决定，支持当政的一派，要求反对派交出"非法武装"。杜达耶夫当即认为，这一决定表明俄罗斯议会实际上已向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宣战，因而他下令15到55岁的男子总动员，他还号召居民捍卫自由和独立，不许俄罗斯帝国干涉。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全国国民大会定于10月27日举行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选举。10月底，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总统，他发誓要使该共和国脱离俄罗斯。俄罗斯议会则宣布选举无效。11月8日，叶利钦下令在车臣—印古什地区实行紧急状态，首府格罗兹尼出现严重骚乱。俄罗斯议会在讨论是否对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并于 11 日的会上否决了叶利钦在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认为应采用政治手段解决业已出现的危机局势。次日，叶利钦取消了他发布的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此后，紧急局势略有缓解，但双方的分歧继续存在着。

新联盟前途未卜

"8.19"事件后不久，刚恢复总统职务的戈尔巴乔夫就在为新联盟条约而奔忙。此刻，大部分共和国虽然都宣布了独立，但并不反对加入新联盟，只是所有的共和国都认为，新联盟条约的

内容必须作重大修改。戈尔巴乔夫最希望维持联盟，他几次表示，如果联盟解体他就辞职。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是联盟的积极支持者，俄罗斯虽也支持联盟，但对联盟中央重新恢复权力存有很大戒心，乌克兰则加紧准备脱离联盟。

9月2—5日，苏联第五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按照预定的议事日程，这次人代会主要讨论国内政治形势、修改苏联宪法等问题，可是大会一开始，哈萨克总统纳札尔巴耶夫出人意料地向大会宣读了一份由戈尔巴乔夫和10个共和国领导人在一天前达成的"10+1"声明，要求变更大会议程。非常人代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政权机构和管理机构法》。所谓"过渡时期"，大会作如下说明："为了避免政权机构破裂，特宣告我们正处在一个形成国家关系新体制的过渡时期。"上述"10+1"声明和人代会决议的主要内容有：1. 所有愿意的共和国起草并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每个共和国都可自主地选择其加入联盟的形式；2. 改变现有国家权力机构，组成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参加的跨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内外政策问题；3. 在过渡时期，苏联政权的最高代表机构将为两院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它由共和国院(上院，原为民族院)、联盟院(下院)组成；4. 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设立负责国防、安全、法制和国际事务的全联盟机构；5. 现有苏联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即行解散。这一切被认为是挽救联盟的"最后一举"，它实际上已经把国家权力给予了各共和国，以此来缓和共和国的独立行动，原联盟已经名存实亡了。

10月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12个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公报，确认必须在前共和国联盟范围内立即缔结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并商定10月18日正

式签约。可是，就在这个条约正式签字前，有4个国家变了卦，只有8个国家在条约上签了字。乌克兰没有参加签字，克拉夫丘克在一次讲话中说，乌克兰现在不希望，今后仍不会加入任何联盟和大家庭，不会签署条约，如果这些条约哪怕是在很小程度上有损于共和国独立的话。10月21日，新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首次会议，但出席会议的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5国，乌克兰未派人出席，联盟政治结构变成了"7+1"。为了等待乌克兰代表的到来，共和国院特地休会两天，戈尔巴乔夫还和与会国领导人一起给乌克兰议会写了一封公开信，热切地希望乌克兰派代表前来出席会议，但乌克兰代表始终未露面。与此同时，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国防法》和《武装力量法》，准备组建自己的军队，向独立迈出了一大步。

"7+1"没有放弃建立新联盟的最后努力。11月5日，跨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保留对武装力量的统一指挥，各共和国可以成立国民卫队，联盟机构大规模削减。11月14日，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7+1"再次就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进行谈判，条约草案又进行了重大修改，确认新联盟"将是一个邦联式的民主国家"。主权联盟条约预定在11月25日草签。但是，在25日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由于各方在联盟的名称上未能达成协议而没有举行签字仪式。其实，分歧不仅仅在于名称，而是关系到未来联盟是一个实体还是一个共同体。最后，国务委员会决定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交各共和国议会讨论，以便在年底前签署。按照条约草案，联盟将十分松散，各共和国拥有更多的主权，联盟中央只统管军队和协调外交、外贸等工作。但即使如此，乌克兰等国仍表示不愿参加，新联盟前途未卜。

从主权国家联盟到独联体

万众瞩目的乌克兰全民公决于12月1日举行。同时举行乌克兰总统选举。结果是：乌克兰3750万选民中有83%参加了投票，90%选民赞成乌克兰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并选举现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2月3日，叶利钦发表声明宣布承认乌克兰独立。

12月5日，克拉夫丘克宣誓就任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宣布，乌克兰议会已经废除1922年12月30日建立苏联的条约，它不准备签署任何新的联盟条约。

乌克兰无可挽回地最终选择了独立，无疑给戈尔巴乔夫的主权国家联盟敲响了丧钟。但戈尔巴乔夫仍努力试图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他向各共和国议会发出呼吁，请求它们批准新联盟条约。12月5日，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讨论联盟条约前途问题。戈尔巴乔夫说："我的立场仍然不变。我将尽一切可能来签署联盟条约"。叶利钦则说，如果乌克兰在联盟条约上签字的话，俄罗斯也会签字，但是，没有苏联第二强大的乌克兰的参加，联盟是不可能成立的。

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根据事先的宣布，这次会晤是为了交换几个双边协定书和就联盟前途问题进行磋商。然而，这三国领导人在这里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抉择。12月8日，3国领导人就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发表声明，并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三国领导人声明："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陷入死胡同，各共和国脱离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成为事实"，认为"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他们宣布废除1922年12月30日建

立苏联的条约，并宣布他们已自愿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

协议签订后，他们首先向美国总统布什作了通报，同时打电话给哈萨克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可夫通报情况。12 月 9 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当晚，戈尔巴乔夫就 3 国领导人签署的关于建立"独立国联合体"的协议在电视台发表声明，指出"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能由 3 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只能在所有主权国家的参加下，根据人民的意志，遵循宪法的途径来决定"，3 国协议未经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同意，没有经过 3 国人民讨论和议会的批准，"没有法律根据"。戈尔巴乔夫主张召开全苏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不排除可能就此举行全民公决。12月9日苏联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说，3 国 明斯克协议从法律观点来看是"纯粹的政变"。次日，戈尔巴乔夫与各大军区负责人举行会谈，讨论"目前局势"。会后，戈尔巴乔夫对 3 国协议的态度开始变化。总统发言人格拉切夫宣布："总统欢迎任何不同的设想，无论是联盟还是联合体。唯一的条件是这样的体制必须坚持其公开性，要符合法律，并且要向克服国家危机的方向前进。"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自己已无回天之力。12 月 12 日，他在接见记者时说，各共和国赞成明斯克开始的建立新的国家联合体的过程，他将同意这一选择，并且加入这一过程中。他颇为感叹地说，他的"一生的主要事业已经完成了"。他还说，他的政治生涯已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他表示，作为苏联总统，他"将竭尽全力使分离进程局限在宪法范围内完成。"

12 月 12 日，哈萨克、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中亚 5 国领导人在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紧急磋商，商量对策。次日，5 国领导人发表声明，他们表示愿意以平等创始国的身份加入独立国家联合体。对此，戈尔巴乔夫表示满意，认为这

是符合宪法的。

12 月 16 日，叶利钦向意大利《共和国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戈尔巴乔夫在重新改组的苏联已发挥不了作用，在独联体内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他应于 1992 年 1 月中旬前辞职。同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宣布，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全部财产转归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有，从而宣告苏联议会的寿终。19日，叶利钦下令从当天起撤销苏联对外关系部，授权俄罗斯外交部接管该部的职能、建筑设施及财产。

12 月 21 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 5 国、以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等 11 个共和国首脑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会晤，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书》，并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作为缔约各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所有签字国均为创始国。宣言再次强调，随着独联体的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在前联盟军事结构改编前，委托前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可夫临时指挥武装力量。独联体参加国决定由俄罗斯取代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将帮助其他成员国加入联合国。宣言确认，独联体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以上的结构。

阿拉木图会谈后，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也不存在。从 12 月21日起，苏联总统机构人员开始撤离克里姆林宫，原苏联总统办公室归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使用，克里姆林宫的财产，包括建筑物、住宅、外汇等动产和不动产均转归俄罗斯，直属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卫队、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以及同国外联系的通讯系统也归叶利钦指挥。

12 月 25 日晚 7 时，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

电视演说，宣读了他的辞职声明——《告人民书》。戈尔巴乔夫回顾了自1985年以来走过的道路，在列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承认这些年来所进行的改革“都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向所有支持他的人表示感谢，他说：“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也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并于当晚7时20分把核电钮交给了叶利钦。7时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国旗悄然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止。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从法律上宣布苏联终止存在，指出“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结束”。

结 束 语

当我们这本书打算修订和再版的时候，苏联的历史已经划上了句号。于是，我们把书名改为《苏联兴亡史》。苏联的解体，如同本世纪初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样，都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苏联的兴亡，又一次表明，一种新制度的成长和成熟，总是伴随着无数曲折反复的历程。尽管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70多年也许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然而，在世界现代史上，它毕竟是一个不太短的历史时期。尤其在社会化大生产和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落后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已成为历史激流的当今社会，大半个世纪足以使一个民族经济腾飞和社会取得长足的进步。事实上，苏联在它的发展历程中确实有过辉煌的成就，它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国力。可是，这样一个可以同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忽喇喇如大厦之倾倒，在很短的时间内毁于一旦？对于这个问题，世人正在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和探讨。要全面地准确地进行总结和研究，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我们深知无力独自完成这样的研究课题，然而，作为苏联史研究工作者，经常会在我们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十月的胜利，新生苏维埃政权经历的磨难和考验，列宁与斯大林时代的交替，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和强化，苏德战争的生死搏斗，战后美苏冷战格局的出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风风雨雨，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国家步步陷入泥潭，直至最后的解体，这一连串的历史进程所

蕴含的丰富内涵，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许多思考。

思考之一，苏联的解体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近年来，苏联学术界把国内遇到的种种问题、危机和困难，归咎于十月革命，对十月革命提出了诘难，说什么十月革命犹如"潜入没有灌满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唐·吉诃德式的行为"，是"俄国的悲剧"。这些言论，使我们联想起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那场争论（见本书第27页），其论据和论点如同一辙。历史已经裁决了论战的是非。事隔70年以后，为什么又有人要将十月革命看作一种"原罪"加以谴责呢？本来，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苏联的解体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根据。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懂得，不能把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崩溃归咎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同样，也不能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7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

关于如何看待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想强调以下三点：其一，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在条件完全具备、万无一失的情况下进行，革命也总是有风险的，对革命家来说，不顾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盲目蛮干，搞冒险主义固然是不足取的，但也不能拘泥于去计算和对照某种条件的余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在应当积极行动的时刻不敢行动或者动作迟缓，同样是不足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总是以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革命时机，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正如德国著名的革命左派罗莎·卢森堡所说："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从它在二月爆发到十月革命）就其一般进程来说是完全符合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图式的。……革命自然而然地按上升线展开：从温和的开端发展到提出愈来愈激进的目标，与此相应，从各阶级和各党派的联合发展成最激进的党派的独占统治。""一个党在历史的关

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① 其二，俄国原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沙皇统治极端黑暗腐败，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剧了反动统治的危机，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又立足未稳，力量脆弱，政治舞台上各党派纷争迭起，布尔什维克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得了政权。诚然，由于俄国尚未进入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物质条件是有欠缺的，是"先天不足"的。然而，即使如考茨基所说是一个"早产儿"，那也应当承认，它毕竟是一个有生命的婴儿。人们的责任是要在后天精心抚养它，保护它，使这个社会主义婴儿成长为健壮的巨人，而不是因为其"早产"而人为地否定它，抛弃它。列宁当年反复告诫说，俄国革命将是"开始容易，继续困难"，就包含这层意思。遗憾的是，社会主义苏联 70 年的历程，未能完全弥补"先天不足"带来的缺陷。其三，从十月革命所处的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看，那还是一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刚刚迈入垄断阶段，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到处显露出资本主义贪婪、野蛮、凶残的阶级本性。资产阶级在压榨本国劳动人民的同时，还要通过对外战争，掠夺殖民地人民，以牟取最大限度的本阶级的私利。于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也就经常地和战争伴随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这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陷入绝境，给革命冲破这个薄弱环节提供了机会，而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残杀又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于是，社会主义终于在一个国家里成为现实的社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第478、48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会制度。

思考之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来的。本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可是，历史的发展却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推到欧美先进国家的前头，而在这里，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小农在国内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文盲占人口的多数，社会化大生产的任务远未实现。所以，当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在执政的共产党人面前，实际上同时提出两大任务：一是社会改造，一是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对于这一点，列宁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明确提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在列宁看来，"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2]。毫无疑问，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对落后国家来说，这个任务尤为重要和艰难。列宁期间，因忙于对付国内战争和恢复经济的巨大任务，还未能倾注全力去进行经济建设。至2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才提上了日程。平心而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是相当重视的，他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和资金来源，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完成情况，他巧妙地利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引进一大批先进设备和技术人才，他亲自提出许多工业化的方针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口号，倡导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从而使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多一些的时间，就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以上，苏联用了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五十年至一百年走过的路程，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基础，使苏联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是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物质保证。20—30年代，正当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动荡不安的时候，苏联却以勃勃生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当然，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和不重视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重工业的片面发展严重压制了轻工业和农业的正常发展，高度集中而又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大量资金和人才集中于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日用消费品和食品长期匮乏，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缓慢。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实行粮食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等措施，广大农民承担过重的"贡税"义务，挖得农民太穷太苦，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粮食和农产品产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又反过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一贯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定时期内较快地弥补了落后国家薄弱的大工业基础，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缩短了与西方先进国家间国力上的差距。但长期的发展比例失调，必然造成某种恶性循环，阻滞国民经济持续地高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这个问题就已暴露，但一直调整不过来，成为一种痼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高科技的推广应用成为推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苏联僵化的体制和发展经济的固有模式，坐失了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并在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竞

赛中越来越处于劣势。从60年代起，苏联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即开始减退，进入70年代，更出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1%、3.1%、2.2%、1.8%，经济发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可以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的锐减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的终极原因。

思考之三，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僵化的经济体制阻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本来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的模式。列宁有一句名言：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群众自己创造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应当建立起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作体制，它应当是一种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体制。然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以行政领导和国家统一计划为特征的体制，有人称之为行政命令型的体制，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苏联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同这一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苏联走过的道路来看，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高度集权的、以强制为后盾的经济体制，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曾把它看作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但战争一结束，现实迫使人们改变认识，调整政策。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审时度势，及时地果断地实现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试图建立一种能容纳多种经济成分，容纳商品货币关系的新的经济体制。尽管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但他晚年对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商业、重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一系列论述，为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了方向。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虽然继续实行了若干年，但是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探索

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已逐渐抛弃，当斯大林战胜各种反对派以后，为了在短期内建立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就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消灭国民经济中的私有制成分，取消租让制合同，用强制手段消灭富农，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和开展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后，斯大林就直截了当地宣布，新经济政策已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可以把它"抛开"了①。此时，在斯大林心目中，已不限于所有制方面的"纯而又纯"，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而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等等东西，统统视为"异类"，视为必须加以消灭的资本主义祸害。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是看是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是否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是看有没有建立起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其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虽然排斥了一切资本主义成分，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成了无所不包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东西，可是整个体制却越来越陷于僵化，国民经济各部门都缺乏动力和活力，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应当承认，30年代苏联形成的经济体制，是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的产物。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作用，它能保证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解决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力求在最短时间内高速度地进行建设，在工业化初期，这种作用尤为明显。在国际环境险恶的情况下，这种体制也能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然而，当苏联的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社会经济面临向效益型和质量型的方向全面转变，世界经济向纵深发展，新技术革命浪潮迭起，提出经济管理科学化和决策民主化的更高要求时，这种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和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

强制政策以整齐划一的方式运转的体制，就日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一个有利的契机，利用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结构改革原有僵化的经济体制，但是，斯大林晚年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墨守成规，看不到时代的新变化和原有体制的严重弊端，不仅没有作必要的改革，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经济体制。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虽然对经济体制进行某些改革，如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等，但这些改革仅限于浅层次的调整和变革，没有触动原有经济体制的根基，正在酝酿中的在企业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因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告夭折。勃列日涅夫时期又不思改革，使苏联社会进入一个停滞和危机时期。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思考之四，缺乏民主，破坏法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斯大林时期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大清洗，错杀了一大批人，酿成大量冤假错案。冤魂的叫唤，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抹黑、毁坏社会主义声誉最有用的口实，也是使本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30年代大清洗的发生，纵然有某些客观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斯大林的主观错误铸成的。其一，错误的理论指导下产生荒谬的肃反运动。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争论激烈，本来，这些争论都是围绕在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看法展开的，由于夹杂着权力斗争的因素，使党内不同政见的争论变为你死我活的"路线"之争。当反对派相继失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斯大林仍经常把党内反对派人物视为"心腹之患"，他把建设事业和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失败和不幸事件统统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得出了"社会主义愈益成功，则阶

级敌人的反抗也就愈益加紧”的错误结论，并称这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于是，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深挖所谓“人民的敌人”，开展肃反运动，运动中又容忍种种不正当的刑讯逼供手段，大开杀戒，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分子以及大量无辜者都难逃厄运。其二，长期以来，苏联国家保安部门成了“国中之国”，不受法律制约，不受党和政府的监督，这种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政治警察的专横权力是斯大林时代最大的祸害"①。国家保安部门的权力恶性膨胀，势必出现层出不穷的政治迫害，这种现象与政治体制上的个人集权相结合，就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民主和法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曾一度废除对政治犯的死刑，但40年代末以“列宁格勒案件”为开端，重开杀戒，重演大清洗的悲剧，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生活在一种可怖的气氛中。因此，当斯大林一去世，恢复法制就成了首要的最急待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以巨大的勇气揭露了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他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然而，赫鲁晓夫未能防止和克服因公开揭露这一错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致使他在20大的秘密报告至今仍被一些人看作是一切罪过的渊薮。苏联的解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为历史的错误付出的代价。

思考之五，教条主义和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气息和创造精神。苏联一向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从20年代起，就利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等专门机构，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研究工作。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苏联长期

① 《斯大林时代》第9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了对列宁的神化和对列宁著述的教条化解释，1924年秋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论争中，这个问题已初露端倪。教条主义常常同个人崇拜结伴而行，随着斯大林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日盛，斯大林需要获得列宁主义思想正统继承者的地位，并使列宁、斯大林的话具有“句句是真理”的权威性，于是，在30年代，苏联形成一个新的造神运动，后来发展到连语言的定义这类纯学术问题也要由最高领袖来裁夺。要造神，要树立神的绝对权威，就要整肃“异端”。从20年代末开始，苏联学术界许多领域相继开展批判运动，又大大地加剧了教条化的倾向。1931年10月，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斯大林的文章《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这封信的发表，使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开始的批判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信中，斯大林点名批判了一名历史学家论述布尔什维克党斗争历史的一篇文章，并给他戴上了“反党”、“贩卖托洛茨基主义私货”、“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等吓人的政治帽子，一下子把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变成了敌我问题。尤为严重的是，这是第一次由党的领袖直接出面发表专文批判一名学者，对学术问题作出政治上的判刑，不能不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受批判的这位学者被开除党籍，《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勒令停刊，所有准备出版和已经出版的历史著作都必须根据这封信的精神进行审查，在史学界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接着，批判运动很快就越出了史学界，而在整个学术界开展起来，使一些领域原先已有的批判运动急剧升级，也使一些原先沉寂的领域卷入漩涡，哲学界、文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首当其冲，连音乐界、会计学界、医学界也难逃厄运。批判运动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教

条主义，党的领袖的话成为辨别真理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标准，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陷入死寂和僵化的状态中。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11月，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由于当时已形成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代氛围，《教程》一问世，就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①，在国内外大量印行，广为流传。《教程》突出的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对史实任意剪裁，开创了按政治需要篡改和歪曲党史的不良先例。为了神化斯大林，书中隐瞒了列宁对斯大林曾经作过的所有批评，把斯大林描绘成一贯忠于列宁，并被列宁嘱意的党的事业的继承人；而托洛茨基、布哈林则被描绘成自始至终都是面目可憎的阴谋家、野心家，通过歪曲史实，贬低和丑化一群人来衬托一个人的伟大，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最起码的要求。其二，书中包含许多武断片面，教条气息浓重，掺杂着明显的“左”的色调的错误理论观点，如为大清洗提供理论根据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只讲斗争，不讲教育，只讲决裂，不讲团结，只讲无情打击，不讲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理论；只讲生产关系变革，盲目求快求纯，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等等。《教程》这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以及被歪曲的史实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教程》被当作千百万共产党员必读的教材和所有国家共产党闹革命搞建设必须遵循的范本，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特别严重。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虽然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恢复了本来面目，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依然严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本来，马克思主

① 《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载《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50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义是开放的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教条主义却窒息了它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探索性，变成一个陈旧的封闭的体系，使人们对不断涌现的新事物麻木不仁，对遇到的新问题束手无策，在奔腾的时代激流面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于是当一些错误思潮涌来的时候，原有的意识形态的堤坝很快倒塌了，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思考之六，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妥善解决民族问题。由于历史的变迁，在原俄国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大小100多个民族。长时期来，沙皇统治在国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大俄罗斯主义肆虐。沙皇俄国历来有“各族人民的监狱”之称。十月革命以后，各民族独立运动普遍高涨，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许多民族地区的斗争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加上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使各民族地区的斗争错综复杂。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俄共(布)统一领导和组织在全俄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的互相支援，以战胜共同的敌人，并相继在各民族地区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国内战争结束后，各民族国家又共同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同外部世界谈判、交往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俄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也改变了原先建立单一制国家的构想，主张用联邦制国家的结构形式，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解决民族矛盾和各民族的发展这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防止各民族的分裂，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遂于1922年底成立了苏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共和国主要出于共同对敌的斗争需要，建立了联邦制的国家，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也应当承认，建立联盟的若干条件是有欠缺的，主要表现在各共和国之间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在较长时期内

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机制，以保障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数百年以来沙皇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对立情绪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消除；潜藏在人们头脑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还经常表现出来……这说明，当时建立多民族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存在着某些先天的不足。

列宁生前曾对党内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进行过严厉的批评，然而，苏联成立时，他已卧病不起，对联邦制内部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准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已无法过问。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名为联邦制国家，实际上建立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各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自决权受到严重的侵害，加上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使民族矛盾不断积淀下来，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掩盖了民族矛盾的爆发，严厉的压制手段使少数民族的对立情绪再次隐藏起来。斯大林和他以后的历届领导人无视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却盲目称颂苏联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形成了一个"不同民族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了适宜的气候，民族矛盾就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引发了原先潜藏着的民族矛盾。当矛盾暴露出来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又未能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妥善解决，往往采取堵和压的办法，或者以羞羞答答的让步企图缓解矛盾，然而，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又催化了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最终导致联盟的解体。

思考之七，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责任。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此时，世界时代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苏联这艘超级大国的航船上仍满载着军火弹药，人民生活水平还远远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实行改

革，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苏联原有的僵化体制使整个国家运转缓慢，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领导层老化。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推动社会进步和跟上时代潮流。苏联的改革，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更为艰难：其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建立了半个世纪，它已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人民对市场经济的观念极为缺乏。人们虽已觉察到旧体制的弊病，但已习惯于在旧轨道上行走，要从体制上、人们的行为规则上和思想观念上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决非易事。而况，改革如何进行，新的目标模式是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其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它在军备竞赛等方面可以同美国相抗衡，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比较落后，但已普遍达到小康水平，这样，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普遍较高，一时难以满足，群众无法从改革中很快得到实惠，就使改革难以获得基本群众的充分支持。戈尔巴乔夫作为这艘航船的船长，在领导改革中又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四伏，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就戈尔巴乔夫的主观错误而言，主要表现在：1.当经济体制改革受阻，无法深入的时候，匆忙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结果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权力的再分配又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2.提出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使各种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在国内抬头和流行，戈尔巴乔夫本人又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后退，一步步放弃阵地，直至自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鼓吹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全面移植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结果却引发和导致了经济、政治、民族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使整个社会陷入极为严重的失控状态。3.长期以来，苏共没有搞好执政党的建设。在思想上，教条主义倾向严重，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正确地解释当代世

界和国内许多现实问题，不能制订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来指导现实，使党完全缺乏战斗力；在组织上长期党政不分，不注意处理好党与政府、群众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又未能建立起正常有效的制度，实行新老干部的正常交替；在作风上，官僚主义、特权现象严重，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群众，共产党员也不能很好发挥先进分子的作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没有致力于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却是不断削弱党的领导作用，无原则地放弃许多阵地，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涣散广大共产党员的信念，瓦解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于是，当苏联陷入日趋严重的危机时刻，国内和党内反对派的势力却日趋强大，因而无法形成改革所必需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西方国家乘机加紧实施其和平演变的战略，东欧一系列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又给苏联形成巨大的冲击波。以"8.19"事件为转折点，苏共竟被一纸法令，不战而垮；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也失去了应有的权力和威信。戈尔巴乔夫无力挽回苏联解体的命运，也无可挽回地从最高宝座上跌落下来。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我执政的最后日子》中说，在举行一个简短的告别演说和新闻发布会以后，"再也没有象别的文明国家那样，举行其他仪式来向苏联总统告别了。那些前苏联共和国，现在是主权国家的总统们(其中大多数与我有多年亲密、友好的关系)，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来莫斯科，甚至也不给我打电话。"苏联既已覆亡，戈尔巴乔夫当然也只得成为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了。

[附录]　　大　事　记

1917年

3月12日(俄历2月27日)　二月革命爆发，推翻了统治俄国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

3月18日　《真理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

4月16日　列宁从瑞士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

4月17日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四月提纲》)。

5月7—1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俄代表会议(四月会议)在彼得格勒举行。

6月16日—7月7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

7月16日　彼得格勒人民自发举行反政府示威。次日，50万工人和士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号召举行大示威，强烈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调兵镇压和平示威群众。史称"七月事变"。

7月20日　临时政府下令通缉列宁，列宁被迫重新转入地下。

8月8—1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秘密举行。

10月2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在彼得格勒举行特别会议。会议根据列宁的《关于时局的报告》作出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10月31日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孟什维克派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透露了布尔什维克准备武装起义的消息。

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　彼得格勒20万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开始武装起义。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　彼得格勒起义者攻占冬宫，逮捕了临时政

府部长，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是日晚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11月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机关报《真理报》复刊。布哈林任主编。

12月3日　苏俄同德奥集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进行停战谈判。

12月20日　苏俄政府成立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

1918年

1月23日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大会宣布俄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会选出了由306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月28日、2月11日　苏俄人民委员会先后颁布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红海军的法令。

2月10日　负责同德国举行和平谈判的托洛茨基擅自发表一项不签订和约、不进行战争、复员军队的声明。和约谈判中断。

2月18日　德军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新的全线军事进攻，并占领多处城市，威胁彼得格勒。

2月23日　红军在纳瓦尔和普斯科夫一带，挫败德军进攻，后定此日为红军节。

同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全会决定接受德方提出的和谈条件。

3月3日　苏维埃俄国同德奥集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史称"布列斯特和约"。

3月6—8日　俄国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通过决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3月14—16日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并决定将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

5月9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命令，实行粮食垄断制。

7月19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公布。

11月11日　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1919年

1月11日　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在产粮省份收集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即余粮收集制的法令。

3月2—6日　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

3月18—23日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10月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通俗著作《共产主义ABC》出版。

12月26日　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在成年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

1920年

1月29日　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法令。

3月29日—4月5日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11月　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开始。

12月22—29日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国家电气化计划。

1921年

2月2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农民和粮食征收问题，通过《为改善农民的困难处境应采取的措施》的决议。

2月8日　列宁写成《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原则上决定利用征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自由地"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

2月28日　苏俄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

3月8—16日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和《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3月21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的收集制》的法令。

1922年

3月27日—4月2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4月10日—5月19日　苏维埃俄国参加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又称热那亚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英、法、日、德、意和比利时等国家。

4月16日　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俄代表团与德国代表团在拉巴洛缔结苏德恢复外交关系的条约。

5月22日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私人基本财产权》的决议。规定：承认并保护私人基本财产权和总额在1万金卢布以下的遗产继承权。

12月23—27日　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关于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决议。

12月23日—1923年3月6日　列宁患病，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以及《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书信及文章。

12月30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决定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通过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最初加入联盟的有俄罗斯、南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4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3年

4月17—25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10月25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全会，讨论托洛茨基给党中央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

12月5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内争论问题》的决议。

12月8日　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以《新方针》为题给全党的公开信。

1924年

1月16—18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谴责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

1月21日　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终年54岁。

1月26日—2月2日　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决定出版《列宁全集》，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在莫斯科红场建造列宁墓，在列宁格勒和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建立列宁纪念像。

1月29—31日　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决定为纪念列宁，开展征收10万名以上产业工人入党运动。3个月时间内，约有25万人入党。

4月初　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

4月17日　布哈林在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4月　俄共(布)中央政治理论杂志《布尔什维克》创刊。1952年11月改名为《共产党人》，出双旬刊。

5月23—31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9月　托洛茨基发表《一九一七年》一书序言《十月的教训》，党内争论重起。

1924年　是年英国、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挪威、奥地利、希腊、瑞典、中国、墨西哥、法国先后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1925年

1月17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2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任命他为租借权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4月6—8日　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起的为建立苏英工会统一委员会的代表会议在伦敦召开。

12月18—31日　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制定了实行

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并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26年

4月24日　苏德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在柏林签字。

7月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正式形成。

10月16日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格·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叶甫多基莫夫等六名反对派首领发表声明，表示放弃派别活动，但是“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10月23—2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全会。决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提出警告，并撤销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

1927年

5月25日　托季联盟提出《八十三人宣言》，坚持自己的观点；次月27日，又提出《十五人政纲》；9月3日，向联共(布)中央提交《反对派政纲》。

10月21—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标》、《关于农村工作》的提纲。全会还讨论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进行派别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决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11月7日　托季联盟利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机会，于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大城市举行对中央公开抗议的游行示威。

11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12月2—19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决定将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和“民主集中派”分子全部开除出党。

1928年

1月17日　托洛茨基被流放至阿拉木图。

7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公布顿巴斯

"经济反革命案件"(即"沙赫特案件")判决书。

1929年

1月18日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宣布，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22日，托洛茨基离开阿拉木图赴土耳其。

1月21日　布哈林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逝世5周年纪念会上作关于《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

1月30日　联共(布)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批评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于1928年7月进行"幕后秘密会谈"的错误。

4月16—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全会，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共产国际的职务和托姆斯基在全苏工会理事会的职务。

4月23—29日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案。

11月10—17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并决定撤销布哈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11月26日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3人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表示承认错误。

1930年

1月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决议确定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方针。苏联在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开展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

3月2日　《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

6月26日—7月13日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1931年

1月25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由于这一杂志被德波林学派所把持，决定撤销原编辑部，组成新编辑部，德波林仍为编委。

2月4日　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

1932年

1月30日—2月4日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指示》的决议。

1933年

1月初　苏联宣布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1934年

1月26日—2月10日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12月1日　联共(布)中央和列宁格勒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害。

1935年

1月15日　《真理报》发表消息：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叛国和阴谋罪进行了审讯，并判处他们5—10年徒刑。

2月11日　苏联召开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

5月4日　斯大林在红军学院毕业生典礼大会上讲话，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

8月31日　苏联顿巴斯矿区掘煤手阿·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102吨，迅速形成工人和集体农民掌握新技术、修改旧技术定额、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性运动，名为"斯达汉诺夫运动"。

11月14日　苏联召开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

11月20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授予伏罗希洛夫、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琼尼、布留赫尔5人苏联元帅军衔。

12月8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授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43人以列宁勋章，授予沃诺斯等97人以劳动红旗勋章。

12月29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高等学

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招生》的决议。决议指出：取消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女和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们的子女不得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学习的规定。

1936年

7月2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题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间谍恐怖活动》的秘密信。

8月24日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再次审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并以"通敌谋反"罪判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死刑。

11月25日—12月5日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宣布苏联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剩下了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

1937年

1月30日　苏联《真理报》公布：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进行了审讯，其中皮达可夫、谢列布利雅柯夫等13人判处死刑。

2月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反党活动"问题，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

4月　苏联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提前完成。

6月11日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鲍列维奇等8人死刑。

8月21日　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8年

3月13日　苏联《真理报》刊登消息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组织"右派—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图谋复辟资本主义"，"阴谋叛国"，从事"间谍"活动等罪名，判处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死刑，15日，布哈林等被枪决。

9月3日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巴黎召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成立大会，宣布成立第四国际。

10月1日　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

1939年

3月10—21日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8月23日　苏联政府同德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为期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9月28日—10月10日　苏联分别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了互助条约。

11月28日　苏芬战争爆发。

1940年

8月20日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次日身亡。

1941年

6月22日　德国法西斯以突然袭击方式进攻苏联。30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组成国防委员会，开始了卫国战争。

10月1日　苏、英、美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联合行动协定在莫斯科签订。

1942年

1月1日　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8月23日　侵入苏联的德军强渡顿河，直逼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开始。11月，苏军全线反攻，到次年2月初取得大会战胜利。

1943年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拟定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6月9日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决议上签字，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11月28日—12月1日　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晤。会议发表《德黑兰宣言》。

1944年

7月　苏军突破德军防线，进入波兰境内。

1945年

2月4—11日　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

4月5—16日　铁托正式访问苏联。双方签订有效期为20年的南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4月16日　苏军开始柏林战役。19日苏军强渡奥得河和尼斯河。30日苏军攻克柏林。

5月8日　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7月17日—8月2日　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7月28日后由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代替）在德国柏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签订了《波茨坦协定》。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8月14日　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8月15日　苏军进驻北朝鲜，配合朝鲜人民革命军迅速解放了朝鲜北部领土。

8月16日　苏联与波兰签订以寇松线为基础的边界条约。

1946年

2月9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苏联战后第一次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结果。斯大林的演说在英美等国当权派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2月27日　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莫斯科签订友好互助条约。

3月13日　斯大林就丘吉尔是月5日在美国富尔敦发表的"铁幕"演说，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这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3月18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即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的法令。

1947年

9月22—27日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波兰西南部西里西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的小温泉场举行。会议宣布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

12月14日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实行币制改革与废除食物与工业品购物证制》的决议。并决定自12月16日起实行币制改革。

1948年

2月4日　苏联同罗马尼亚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月18日　苏联与匈牙利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月20日　苏联通知南斯拉夫驻莫斯科代表，苏联不再同南斯拉夫继续进行经济谈判，并停止向南斯拉夫提供重要原材料。

3月18日　苏联通知南斯拉夫政府，苏联政府决定立即撤退所有军事顾问和教官。

3月19日　苏联与保加利亚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3月27日　联共(布)中央致函南共中央，指责南斯拉夫在进行反苏宣传，对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进行了严厉指责。

4月6日　苏联与芬兰两国签订为期10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5月4日　联共(布)中央致函南共中央，指责铁托采取"反苏立场"。

6月20—28日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三次会议，对南共实行制裁。

1949年

1月25日　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6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

10月3日　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2月16日—1950年3月4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

1950年

2月14日　有效期为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1952年

9月　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

10月5—14日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决定将联共(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

1953年

3月5日　斯大林逝世。

3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6月　南斯拉夫与苏联以及东欧各国先后恢复国家关系。

5月28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撤销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

6月下旬　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莫洛托夫等在莫斯科召见由拉科西、道比、纳吉等组成的匈牙利代表团。赫鲁晓夫等指责拉科西犯了严重错误，责令他放弃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留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由纳吉任部长会议主席。

7月上旬　苏联共产党中央举行全会，决定把贝利亚从苏共中央清除出去，并开除出苏共。与此同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解除贝利亚所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和苏联内务部部长职务，并把贝利亚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9月3—7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0月28日　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并改进其质量》的决定。

12月18日　苏联最高法院秘密审理前内务部长贝利亚的刑事案件。贝利亚和前国家监察部长麦尔库洛夫等7人于23日被处决。

1954年

2月23日—3月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关于开垦生荒地及熟荒地》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11月29日　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

1955年

1月7日　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召见拉科西、纳吉等匈牙利党政领导人，指责纳吉在政府工作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错误。

2月3—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接受了马林科夫提出解除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申请。任命布尔加宁为部长会议主席。

5月15日　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五国缔结《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同年7月生效。

5月27日—6月2日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签署苏南两国联合宣言（即《贝尔格莱德宣言》）。

9月13日　苏联与联邦德国建交。

1956年

2月14—25日　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24日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4月22日　苏联为李可夫、奥辛斯基等人恢复名誉。

6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免去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谢皮洛夫为外交部长。

10月19日　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未作事先磋商，突然飞抵华沙，与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10月30日　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10月底　赫鲁晓夫就匈牙利局势问题，先后与中、捷、罗、保、南领导人磋商并于11月3日决定出兵匈牙利。

1957年

1月4日　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工人党和政府代表，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谈。

2月1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6月22—29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定解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解除谢皮洛夫的中央书记、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

10月4日　苏联发射的第一颗地球卫星"人造卫星1号"进入轨道。

11月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毛泽东、哥穆尔卡等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1月14—16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莫斯科宣言》。

1958年

3月2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五届第一次会议，免去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的全部职务，任命赫鲁晓夫为部长会议主席。

6月1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通过关于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以及关于采购农产品的新制度、采购价格和条件的决议。

1959年

1月27日—2月5日　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6月20日　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9月15—27日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

1960年

6月24—26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

8月　苏联从中国撤走最后一批学生、学者、专家。

11月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莫斯科声明》。

1961年

10月17—31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12月11日　苏联外交部发表了关于撤离驻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和要求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离开苏联的公报，苏阿断交。

1962年

10月22日　苏联以"保卫古巴"为名，将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武装封锁古巴。

11月20日　鉴于苏联已于是月8—11日从古巴运回导弹，肯尼迪宣布取消对古巴海面的封锁，加勒比海危机结束。

1963年

3月30日　苏共中央就中苏两党会谈问题致信中共中央，系统地提出了苏共的观点，提出要在国际共运中推行苏共领导的总路线。

7月14日　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就中共中央6月14日发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总路线的建议》发表《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8月5日　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在莫斯科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1964年

10月14—15日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所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2月12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召开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的通告》称，第一次会议决定于1965年3月1日召开。

1965年

9月27—2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

10月4日　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

1966年

1月29日　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第一批企业转入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条件的决定。

3月29日—4月8日　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1968年

5月14日　苏联召开全苏经济会议认为，1969年应该把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实际地推广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7月14日　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五国领导人在华沙会晤，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并通过了一封给捷共新领导的最后通牒式的联名信，提出要对捷进行"集体制裁"。

8月21日　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武装部队同时从许多地方侵入捷克斯洛伐克。

10月16日　苏捷签订《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条件》的条约。

1969年

3月　苏军入侵中国珍宝岛，苏中双方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6月5—17日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75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17个党没有参加会议。

9月1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谈，就中苏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

1971年

1月11日　苏美"禁止在海底及洋底及其下面设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分别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举行签字仪式。

3月30日—4月9日　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9月11日　赫鲁晓夫病逝。

10月9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动员全体劳动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的工作经验》的决议。

1972年

6月3日　美苏英法四国外交部长在西柏林签署了四国关于西柏林问题的最后议定书。同日，联邦德国政府代表同苏联和波兰政府代表在波恩分别交换了苏联—联邦德国条约，和波兰—联邦德国条约的批准书。

是年，苏联允许3.2万名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73年

2月3日　由于粮食连年减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解除主管农业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利扬斯基和苏联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的职务。

3月1日　苏联共产党开始更换党证。按传统，第一号党证写上了列宁的名字。第二号党证发给勃列日涅夫。

5月18—22日　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

6月18—27日　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和法国。

1974年

12月4—7日　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

1975年

5月12—17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利比亚。两国达成协议。苏联向利比亚出售6亿美元的武器。

1976年

2月24日—3月5日　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11月15—17日　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

11月24日　苏联同安哥拉签订友好合作条约

1977年

5月24日　苏共中央全会解除波德戈尔内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决定解除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会议选举勃列日涅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6月23日　苏联《新时代》周刊发表题为《评西共总书记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编辑部文章，说卡里略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概念是要使欧洲自成一说来对抗苏联。

10月4—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并宣布从10月7日起开始实施。

12月27日　在苏联军队直接参与下，阿富汗发生武装政变，阿明政权被推翻，卡尔迈勒组成新政府。苏军入侵阿富汗。

1980年

10月2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解除柯西金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吉洪诺夫继任。

11月26日　苏联和蒙古在莫斯科签署两国政府关于苏蒙国界制度和在边界问题上进行合作互助的条约。

1981年

2月23日—3月3日　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1982年

11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逝世。

11月12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选举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4年

2月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罗波夫因病逝世。13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一致选举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4月11—12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契尔年科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吉洪诺夫再次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契尔年科发表长篇讲话。

1985年

3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契尔年科病逝。

3月11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3月2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一次例会。会上提出动员全国力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

4月4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同酗酒现象作斗争的问题。

7月2—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葛罗米柯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9月2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雷日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吉洪诺夫被免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10月15日　苏共中央全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关于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草案，关于苏共章程的修订，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200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草案等问题。

1986年

1月15日　戈尔巴乔夫提出15年内分三个阶段实现完全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2月25日—3月6日　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加速经济发展战略，批准了新修改的党纲和党章，选举了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4月26日　苏联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一座原子反应堆受到损坏，放射性物质发生泄漏，周围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造成放射性污染。

7月31日　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公开性”方针。

1987年

1月27—2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对两年来的改革作总结。

6月25—26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关于“党在根本改革经济管理方面的任务”。

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叶利钦发言，批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点名批评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叶利钦还提出要求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1月1日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

11月2日　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对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历史人物予以评价，并论述了改革与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世界问题。

12月7—10日　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一项消除部署在欧洲的1000多枚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8年

2月4日　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军事法庭1938年对布哈林等一批人的判决。

2月23日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围绕纳—卡州问题引起争端。

6月28日—7月1日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公开性，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七项决议。会议决定把一切权力归还苏维埃，并成立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

10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非例行会议，同意免去葛罗米柯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

1989年

3月2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在1989年至1990年苏联将裁军50万，并大量削减国防开支。

4月9日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骚乱。

5月15—18日　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两党关系正常化。

5月25日—6月9日　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即国家元首。

6月12—15日　戈尔巴乔夫对联邦德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苏联提出建立“欧洲大厦”的设想。

11月26日　苏联《真理报》刊登戈尔巴乔夫的长篇理论文章，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提出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

12月12—24日　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宣布：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决定应受到“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谴责”。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违背苏对外政策原则。

1990年

2月5—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就召开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修改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

3月11日　立陶宛宣布独立。

3月12—15日　苏联召开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修改了苏联宪法中确定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垄断地位的条款。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卢基扬诺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5月4日　拉脱维亚新议会通过独立宣言。

5月8日　爱沙尼亚议会决定将国名改为爱沙尼亚共和国，国旗改为蓝、黑、白三色旗。

5月29日　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叶利钦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7月2—13日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大会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叶利钦等人宣布退出苏共。

10月8—9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国内局势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务。

10月20—21日　"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政治宣言、章程和一系列决议。

12月17—27日　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就国名进行表决，1800名代表中有1365人赞成保留原国名，反对的有189人。

1991年

1月8日　立陶宛发生新的骚乱。

3月8日　苏联发表新联盟条约草案，根据草案，苏联是"主权的联邦制民主国家，由各平等共和国自愿联合组成。"

3月17日　苏联举行历史上首次全民投票，就联盟存废付诸公决。

4月2日　苏联实施新物价，价格的总增长率为60%。

4月24日　戈尔巴乔夫单独同俄罗斯、乌克兰等9个共和国领导人发表关于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联合声明，即所谓"9+1"声明。

5月15—1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访问苏联。

6月13日　列宁格勒市进行全民投票，55%的选民赞成恢复该市在沙皇时期的名称——圣彼得堡。

6月19日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8月14日　《莫斯科新闻》公布7月23日商定的新联盟条约本文。

8月19日　6时零5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表声明，宣布由他接替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全权。声明从8月19日莫斯科时间4时起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

8月21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21时10分发表声明：他完全控制

着局势，已恢复了与国家的联系。

8月24日　乌克兰宣布独立。

8月25日　白俄罗斯宣布独立。

8月27日　摩尔多瓦宣布独立。

8月30日　阿塞拜疆宣布独立。

8月31日　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分别宣布独立。

9月2日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宣布成立。

9月9日　塔吉克宣布独立。

9月23日　亚美尼亚宣布独立。

10月27日　土库曼宣布独立。

12月7—8日　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首脑就苏联前途等问题在明斯克举行会晤，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

12月21日　除格鲁吉亚外的前苏联11个共和国的首脑在阿拉木图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

12月25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时38分，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上降下，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